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第四卷

（约 1870—193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剑桥拉丁美洲史

〔英〕莱斯利·贝瑟尔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

高　铦　徐壮飞　张森根　总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1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ume IV: C.1870—1930

Edited by Leslie Bethe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根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4卷

（约1870—1930）

涂光楠　陈绂　刘宪生　江时学　等译

徐壮飞　涂光楠　张森根　校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23.75印张　617千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illegible]—850[illegible]

定　价：13.50元

ISBN 7-80050-199-2/K·5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4卷

（约1870—1930）

涂光楠　陈　钱　刘宪生　江时学　等译

徐壮飞　涂光楠　张森根　校订

出版说明

由英国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莱斯利·贝瑟尔教授主编的《剑桥拉美丁洲史》，是七十年代中期着手编撰的一部史学巨著。参加撰稿的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各国。1980年以来，该书已陆续上市，预计将在九十年代上半期出齐。

为推动我国的拉美学研究和繁荣学术文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同志、院科研局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和资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自1988年起组织所内外几十位学者着手将这一巨著译成中文出版。参加这项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及中国国际交流协会，新华通迅社、广播学院和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学者。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中文版先出第四卷和第五卷，接着再出其他几卷，每年推出一至二卷，九十年代内出齐。全书约合中文800万字。

我国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同志为本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已征得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莱斯利·贝瑟尔教授的同意，我们特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边码系原文页码。索引附于书后，注明原文页码，以便读者查考。

1990年12月

本卷作者：

威廉·格拉德，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经济学教授，（第1章）

罗斯玛丽·索普，圣安东尼学院（牛津）研究员，（第2章）

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托莱多大学（俄亥俄）历史学教授，（第3章）

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纽约大学历史学教授，（第4章）

阿诺德·鲍尔，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第5章）

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哈瓦那，（第6章）

詹姆斯·R·斯科比，（第7章）

科林·M·刘易斯，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和拉丁美洲研究所拉美经济史讲师，（第8章）

迈克尔·M·霍尔，巴西国立坎皮纳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和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纽约市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第9章）

查尔斯·A·黑尔，依阿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第10章）

杰拉尔德·马丁，朴次茅斯科技学院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研究教授，（第11章）

约翰·林奇，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和拉美史教授，（第12章）

本卷中文版分工如下：

译者：

朱云瑞（序言、书目评论、索引和地图）
江时学（第1、2章）
徐　杰（第3章）
李俊岭（第4章）
刘宪生（第5、11章）
姚小玲（第6章）
王赞桔（第7章）
胡毓鼎（第8章）
郝名玮（第9章）
陈绂、施兰卿（第10章）
涂光楠（第12章）

校订者：

徐壮飞
涂光楠
张森根

责任编辑：

张森根

加强地区研究，
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前言

李 慎 之

被誉为世界史学集大成之作的剑桥世界史系列之一的《剑桥拉丁美洲史》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是中国学术界特别是拉美研究界的一件大事。剑桥世界史系列开创于本世纪之初，在积累经验并且钦誉士林70年之后，又推出总共9大卷约800万字（中文）的《剑桥拉丁美洲史》，成为这门学科的权威著作。用本书总序的话来说，其“目的在于对已有的知识作一高水平的综合，使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今后的工作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不但于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而且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也有益。”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这也就是“守先待后”，“继往开来”了，得不谓之为盛事乎！

中国必须了解拉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谁叫中国是这么一个大国，而拉丁美洲又甚至比一个大洲还大呢？事实是，拉丁美洲这个名词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拉美研究这门学问确立于本世纪30年代，而中国之正式搜罗人才、组织机构、专门从事拉美学的研究，则始于60年代。中国对拉美的兴趣是浓厚的，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对拉美的了解还很不充分，很难使自己满意，就算不提过去那段以幻想代替现实的狂热岁月，我们现在对拉丁美洲也还是抽象的概念多于具体的知识，模糊的印象多于确切的体验。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做过研究工作的人大概都知道个中甘苦。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认识

并不是一蹴可就的，更不用说对一个大洲了。认识需要长时期、多方面的积累。在一时还来不及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有意识地想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时候就有人说过，吸收新知“翻译为先”的话。30年代，鲁迅又说过一时创作不出来，不如多些译作为好的话。这就是所以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还不惜动员所内外几十人的力量，化几年的光阴来翻译出版《剑桥拉丁美洲史》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的原因。

从地理上说，拉美之于中国可说是距离最遥远的地方了。虽说是“小小环球”，但是东北西南，正好相对，昼夜不同，寒暑互异，真可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从历史上说，除非将来真能证明慧深所到的扶桑确是今日的墨西哥，即使从15世纪算起，500年来双方也极少交通。虽然如此，中国和拉美也并不是没有可比性。首先，两者都是由多种文明交融而成的庞大的文明体。中国由于历史悠久而早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拉美虽然还是多国林立，但是文化的共同性远大于殊异性。这个由相异相敌到共存共荣的过程，看来是全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历史学家以及一切社会科学家都会感兴趣而且应该从其中引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的。对中国和拉美进行的比较研究更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双方今天同样面临着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课题。虽然双方的背景不一样，条件不一样，但是任务是一样的。拉美人常说“不能带着19世纪的镣铐进入21世纪”，这难道不也是中国人的任务吗？

大概自古以来，分居于世界各地的人类就对异域外界同属圆颅方趾的血气之伦有观察、研究、记述的兴趣，但是直到所谓地理大发现以后，对外国问题或者国际问题的研究才渐渐成为一门学问。不过，从科学的划分上说，这种研究大抵还是隶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哲学）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与此同时，却也渐渐地出现一种倾向，形成了从

地区或国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汉学、埃及学、东方学，等等。这种趋势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就是本世纪的下半期得到了特别强烈的表现。在今天的世界上，所谓地区研究（AREA STUDIES）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可与传统的学科分庭抗礼的地位。拉美学的确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但是一经确立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当然要凭借过去的基础）。这部《剑桥拉丁美洲史》就是其重大的成果之一。它当然是一部历史学的著作，但是更应该说是一部拉美学的著作。地区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世界学术的一个重大趋势。理由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交流越来越发达了，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了。任何国家，任何地区都需要不断加深对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了解，而且要把对象国、对象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了解。

我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一趋势在我国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学术界还不是十分自觉、十分有意识地去顺应这个趋势，推进地区研究的发展。地区研究在其初始阶段往往以政治、经济的研究为主，因为研究主体通常是由于外交、外贸的现实需要的推动，只求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去认识对象地区。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学者必然会体会到，要了解一个地区今天的政治与经济情况不能不深入到它的文化和历史的根源。这样，地区研究的内容必然越来越转向历史、哲学、宗教甚至文学。地区研究的综合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超出于传统学科的单一性之上。国际上的地区研究已经进展到这一地步了。对比起来，我们的地区研究还没有脱出初始阶段。我们必须认识世界学术的这种趋势而急起直追。《剑桥拉丁美洲史》的出版至少可以帮助我国的拉美研究的深化。我希望它也能促进我国所有的地区研究的发展。

《剑桥拉丁美洲史》的英文版第1卷是1984年出版的，全书9卷将在90年代初出齐。中文版第4卷能在1990年就译好付印出版，效率是很高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的同志们。我个人既不研究拉丁美洲，又没有对此贡献任何力量，唯一所做的就是在当初决定进行这一大工程时起了一点促进的作用。但是就是这一点作用也使我感到“与有荣焉”，因为我认为这确实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对中国有价值，对拉丁美洲也有价值，能被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所了解怎么说也是一件大事。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乐于向中国读者推荐这部书。它不但对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有用，对一切有志于了解世界，有志于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人都是有用的。

谨序。

1990年9月

英文版总序言

由已有定评的杰出历史学家们计划和主编并由各个领域著名专家分章撰写的多卷集剑桥历史，自本世纪初以来在英语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国际学术界通力合作的最高范例。由阿克顿勋爵计划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共16卷，已在1902年至1912年先后问世。随后，《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等也相继出版。上述近代史现已由14卷集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替代，而《剑桥欧洲经济史》最近已脱稿。剑桥伊斯兰史、剑桥伊朗史和剑桥非洲史或已出版或已将近完稿；正在进行中的还有中国史和犹太史，而日本史也将加入这一行列。

7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确定，着手出版一部剑桥拉丁美洲史的时机已经成熟。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自1960年以来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在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继续发展——这种情况出现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但也有居住在美国的英国、欧洲和拉美的历史学家），出现在欧洲（特别在英国和法国）并且也日益明显地出现在拉丁美洲本身（新的一代年轻专业历史学家，其中有一些人曾在美国、英国或欧洲得到培养，已开始脱颖而出）。由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以及拉丁美洲在世界中的作用——已经起了变化，看法也随之改变。来自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人口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研究其他领域的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和新的概念模式，正在被拉美历史学家们不断采纳。剑桥出版社已按步就班地出版了一系列拉美研究的专论并创办了《拉丁美洲研究杂志》，而且也开始将这种历史思想和研究的新成果公之于众。

1974年，伦敦大学学院西语美洲和巴西史主讲人莱斯利·贝瑟尔博士应邀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并在两年后为这个项目开

始工作，他是第一位受权单独负责计划、协调、组织和编纂一整部历史的主编人。

《剑桥拉丁美洲史》是第一部研究拉丁美洲独特历史过程的权威性大型著作，预计共分8卷*，陆续出版，其内容包括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美洲印第安人土著居民首次接触欧洲人之时（以及非洲奴隶贸易初期）开始，直到今天的将近五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剑桥出版社将另行出版一部剑桥美洲——北美、中美和南美——土著民族史，其中将对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达数千年之久的这个地区之民族、社会和文明演变作出应有的研究，正如本书将对欧洲殖民地统治时期和独立时期直到现在的拉美土著民族的历史进行较为详尽的阐述一样。)拉丁美洲主要由美国以南讲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美洲大陆地区——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与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地区——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通常还包括海地，共同组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包括19世纪前半叶期间西班牙和墨西哥先后通过条约和战争割让给美国的大片位于北美洲的领土。也不包括英、法、荷属加勒比岛屿，或圭亚那在内，尽管，例如，牙买加和特立尼达曾有过西班牙渊源的先例，现在又是美洲国家组织的成员。)本书的目的在于将现有的知识加以高度的综合，以便为拉丁美洲历史学家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套坚实的基础，将对研究拉丁美洲史的学者们有所帮助，致力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们也会对此感到兴趣。我们也希望，这部历史能为美国和欧洲通过拉丁美洲的历史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拉丁美洲作出贡献，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也希望能为促进拉丁美洲本身更加重视自己的历史作出贡献。

编写本书的有美国和加拿大、英国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撰稿人。

本书将按历史年序出版，这在剑桥历史的出版上尚属首次。

* 按目前计划已增为9卷。——译者

第1卷和第2卷（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内有介绍欧洲人入侵前夕美洲土著民族和文明的部分）于1984年出版；第3卷（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于1985年出版；第4卷和第5卷（约1870年到1930年）于1986年出版；第6卷至第8卷（1930年至今）将于1988年或此后尽快出版。每一卷或组成一套的几卷分别考察了拉美各个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尽管承认拉美在当今被称之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发展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决定性影响，并承认拉美首先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其次与英国和法国以至整个西欧、最后与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但这部历史书将侧重阐述内部结构的发展方面。而且，明显地把重点放在自19世纪初除古巴外所有拉美国家取得独立以来的这段时期上，同殖民地时期和独立运动时期相比，拉美史史学家们相对忽视了这段时期。自16世纪到18世纪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是8卷中两卷的主题。有6卷则集中阐述19世纪和20世纪，并与总体组合在一起，其中有围绕拉美史重大主题的章节，也有20个拉美独立国（外加波多黎各）的分国历史章节，特别是三个大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就巴西面积的大小、人口和独特的历史来看，在拉美通史中往往被忽略了，就大部分由西班牙语美洲人或西语美洲的专家们撰写的通史来说，对此须给予应有的注意。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一章将附有一篇书目评论*。这些书目评论将特别侧重于过去15—20年期间出版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也就是说侧重于自查尔斯·C·格里芬主编的《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指南》（此书是为1971年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的拉美史会议而出版的）出版以来的这段期间。格里芬主编的这本书志是在1966—1969年期间准备的，其中很少涉及196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著作。

* 书目评论集中放在各卷的正文后面，每一节的标题与各章相同，按顺序排列便于查阅。——译者

英文版第4卷和第5卷序言

《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2卷于1984年出版，该两卷广泛地阐述了从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自欧洲人“发现”、征服和移居这个“新大陆”，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前夕，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巴西）殖民统治三百年期间的拉美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第3卷于1985年出版，该卷考察了19世纪前25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殖民统治的崩溃和瓦解，并着重阐述了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的半个世纪期间西班牙语美洲各独立共和国和独立的巴西帝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史。而《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5卷则将转到1870年前后至1930年这段期间。

拉丁美洲独立后最初的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和思想冲突，政局相当动荡，其经济增长率至多也只有十分微小的进展，至少在西班牙语美洲是这样。除了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战争（1846—1848年）和外国（特别是英国）屡次对拉美的干涉以外，在这段期间的末期拉美国家之间也有两次重大的战争：巴拉圭战争（1865—1870年）和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与此相反，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期间，大多数拉美国家处于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增长“黄金时代”，物质繁荣（至少就统治阶级和城市中等阶级而言是这样），思想趋同与政治稳定，但是像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20年）这类情况则是突出的例外。此外，尽管拉美在这整个时期不断有外来的干涉——主要是美国对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干涉——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1883年）之后和查科战争爆发（1932年）之前的整个这段时期，拉丁美洲国家间并没有重大的国际冲突。

第4卷分12章，是阐述从1870年前后到1930年期间的这两卷

的前一卷，综述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和文化史。其中两章考察拉美的经济增长，第1章阐述1870—1914年期间的状况，第2章阐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30年代世界大萧条前夕的状况。拉丁美洲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与日益发展的国际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大大加速，以及外国资本，其中特别是英国资本和20世纪的美国资本，大量流入，是这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也未忽视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本的积累。关于拉丁美洲与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首先是在中美洲和加勒比与日益扩张的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则分别加以阐述。另有一章分析了拉美的人口增长（从1850年的3000万到1930年的1.05亿），部分原因是欧洲移民大批迁入的结果，特别在阿根廷和巴西。有两章的主题是关于资本主义渗透到农村的深远影响，其中一章集中论述墨西哥、中美洲和安第斯等传统高原地区，另一章则集中论述西语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的情况首先是，在1870—1930年期间，农村经济和社会经历的变化之大，超过以前除征服时期以外的任何时期，同时也试图阐明，在许多农村地区，特别在安第斯山地区，变革的力量遭到阻挠，前资本主义的结构仍然残存。城市社会在这段期间也经历了迅速变化，特别是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城等主要城市到1930年时居民都在一百万到二百万之间，可与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匹敌。关于拉美城市的发展、关于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巴西、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早期工业的状况，以及关于城市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许多国家的兴起和拉美早期的劳工运动史，均有单独的章节分别阐述。另有两章分别阐述拉美在这段期间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与不发达经济和独裁政治传统的多层次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自由主义，以及实证主义对统治阶层和知识界的精英造成的影响），以及拉美文学、音乐和艺术（以至拉美电影的早期状况）的重大运动和突出的个人成就。最后，以探讨拉美天主教在世俗时代其力量和特权下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调整并保持着绝大多数拉丁美

洲人信仰辟为一章，做为该卷的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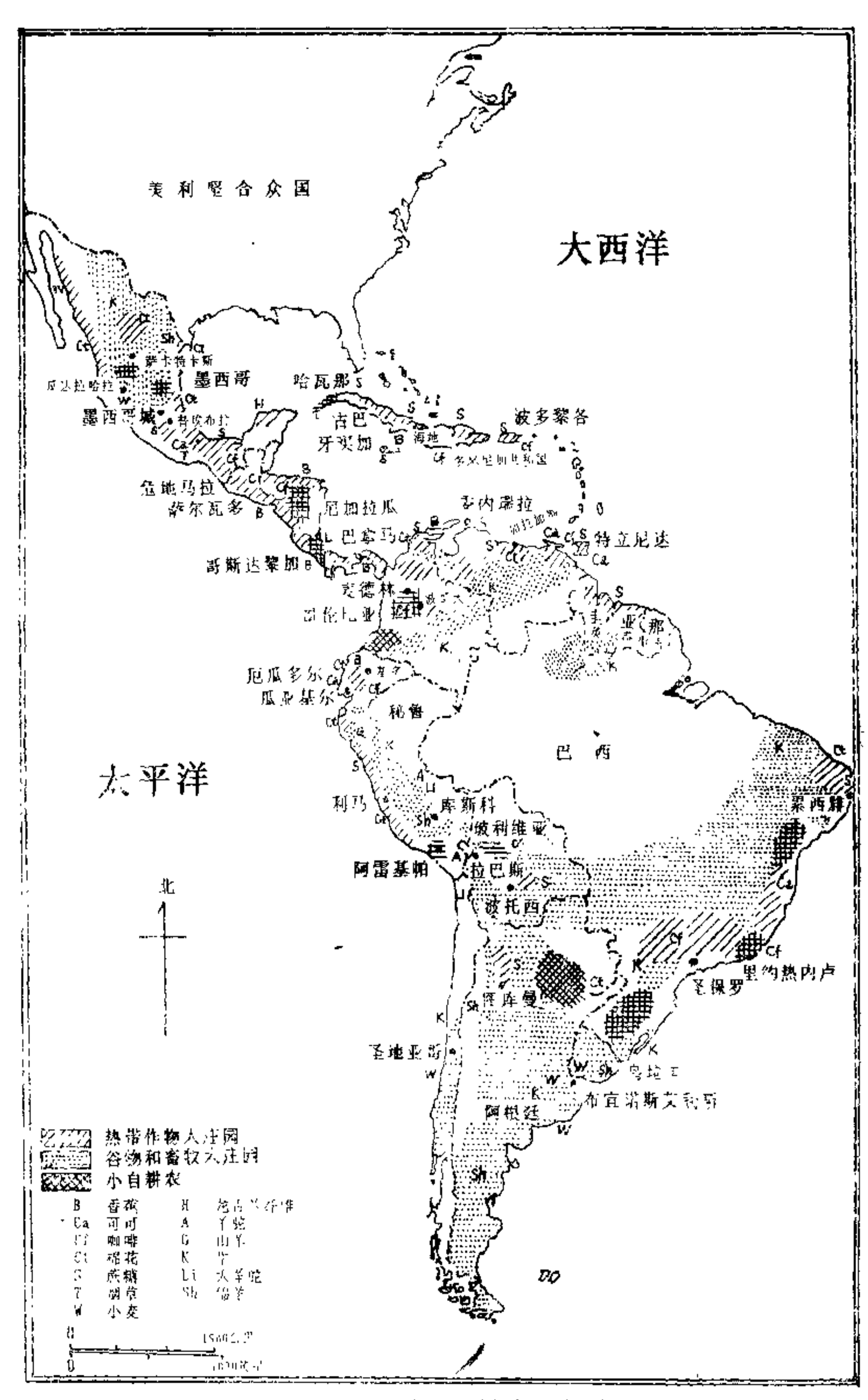
第5卷共21章，分别阐述从1870年前后到1930年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以后者为主。第一部分阐述了墨西哥在这段期间的某些历史细节。分章论述波菲利奥时期（1876—1911年波菲利奥·迪亚斯三十五年的独裁统治），墨西哥革命和20世纪20年代期间在“索诺拉集团”＊统治下的重建。第二部分《中美洲和加勒比》，其中，有一章单独阐述中美洲五国，另外几章则分别论述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第三部分《拉普拉塔国家》，其中，有四章阐述关于阿根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阿根廷到1930年时许多方面已成为拉美最先进的国家；另有两章分别论述乌拉圭和巴拉圭。第四部分《安第斯国家》，其中有几章分别论述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半个世纪的智利、玻利维亚和秘鲁，另有一章论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最后，第五部分专门研究巴西。其中有几章分别论述巴西在这段期间以咖啡为主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巴西帝国后期（1870—1889年）的政治改革以及第一共和国（1889—1930年）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许多历史学家为这两卷各章做出贡献——北美的12位，拉美的8位（巴西的3位，阿根廷和古巴的各2位以及乌拉圭的1位），英国的8位，欧洲大陆的4位和波多黎各的1位——他们还对自己撰写的以外的各章进行了检读和评论。在这方面我特别感谢马尔科姆·迪斯、埃塞基耶尔·盖洛和科林·刘易斯。此外，克里斯托夫·艾贝尔、艾伦·奈特和科里·米勒为一章或几章作了评论。许多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研究拉美的历史学家从一开始就为本计划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和给予鼓励。我还要在此特别向约翰·林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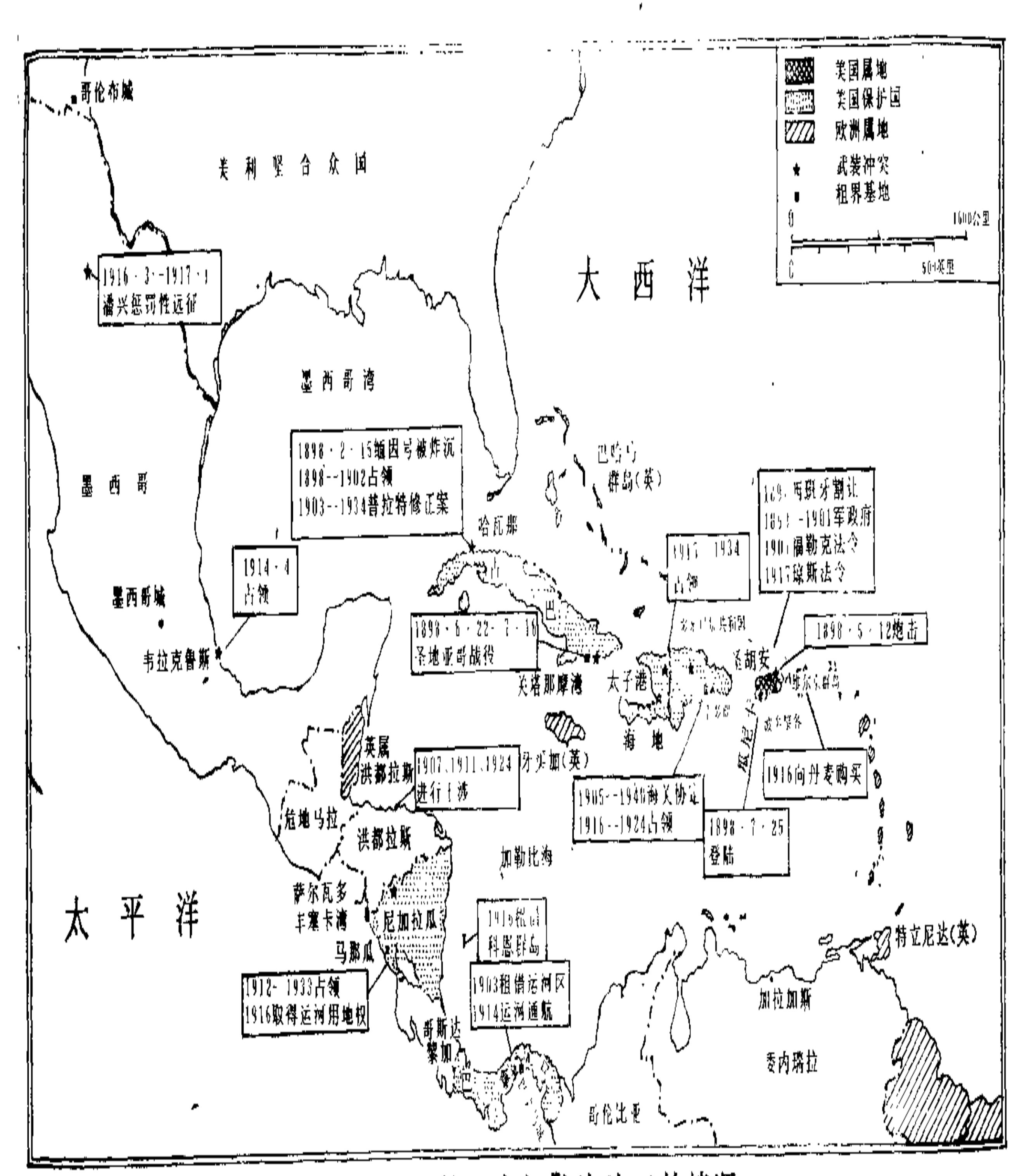
＊ 索诺拉集团（Sonoran dynasty），一译“索诺拉朝代”。主要指奥夫雷贡、卡列斯和阿道弗·德拉·韦尔塔，他们是制宪运动中“索诺拉州派”的领导人。前两人在1920—1928年先后担任总统，后者在1920年曾任临时总统。在奥夫雷贡执政期间（1920—1924）他们是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曾被称为“索诺拉三巨头”。——译者

理查德·莫尔斯和约翰·沃马克致以谢意。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韦顿负责《剑桥拉丁美洲史》的编辑工作。辛西娅·波斯坦和伊丽莎白·奥贝恩—拉内拉分别担任第4卷和第5卷的副编辑。希尔达·皮尔逊和安·赫德森分别为第4卷和第5卷编了索引。伦敦大学学院的纳兹宁·拉兹维为已出版的三卷和现在两卷的出版，都作出了十分宝贵的秘书工作。



1870—1930年拉丁美洲农业概况



1898－1934年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
大西洋
格兰德河
墨西哥
蒙特雷
巴哈马群岛
哈瓦那
瓜达拉哈拉
门达
多米尼加共和国
古巴
牙买加
墨西哥城
洪都拉斯
海地
波多黎各
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巴拿马
特立尼达
委内瑞拉
哥斯达黎加
麦德林
哥伦比亚
基多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贝伦
玛瑙斯
巴西
太平洋
利马
拉巴斯
圣保罗
亚松森
瓦尔帕莱索
圣地亚哥
乌拉圭
布宜诺斯艾利斯
蒙得维的亚
阿根廷
北
2000米以上的高原

1900年的拉丁美洲

目　录

第 1 章

1

1870—1914年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

导　　言

就经济增长而言，拉丁美洲在独立战争后的半个世纪（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或70年代）中普遍令人失望，尽管有些地方在摇摇欲坠但仍不断变化着的有如壁龛似的结构中，零零落落地取得了一些不大的物质和组织上的进步。在整个地区，殖民地时期商业化不平衡的扩散留下了一幅由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成的复杂的拼制图画，其中包括从互利劳工网络、奴隶制和其他强迫性劳工制度以及劳役偿债制直到分成制和各种形式的佃耕、雇佣劳动及手工业工匠和小业主经营的小规模商品生产。与大大小小的地产私有制共存的是土地的公社所有制，而其他农村地产所有权则由教会和政府当局控制。但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与资本主义模式交互影响的更为协调的关系逐步得到确立，而由来已久的殖民主义资源配置机制则被废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到扩展。半个世纪的增长性变化并未大到能使拉美的经济组织发生变革的程度，然而却足以为1870—1914年期间实现更大规模的体制和技术发展创造条件。

政府相继被推翻，不时引起纷争的新国界正在划分之中，与此同时，在殖民地时期确立的管理体系正在解体。这一切发展搅乱了拉美的内部贸易，并且多次中断了以前的地区之间（但至此

2 已发展为国家之间）的贸易潮流；而发展中的北大西洋经济的强大引力则促使经济生活重新定向逐渐加入不再由伊比利亚商业政策主宰的全球贸易行列。例如，19世纪40年代初期秘鲁开始出现了一次海鸟粪出口繁荣；也是在40年代，智利的矿产和阿根廷的羊毛出口开始迅速发展；巴西的咖啡出口同样获得了动力；其他地区在1870年以前也取得了一些显著进展，主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

尽管他们的增长带来了重要的新机会，但是在这一重新定向以后出现的贸易混乱也使地区经济中的某些方面付出了代价：手工业生产不断缩小、制造业工场、或作坊几乎绝迹、有些地区的经济下降、区域间的运输体系衰退。但这却是在当时尚难预见到，可能就长期而言，最为严重的体制上的一大损失。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介入和从国外引进的相应便利，不仅阻碍了本大陆内部制造业发展的历程，而且还窒息了本地技术生产的任何潜力；否则，由于西班牙王室在殖民时期的最后几十年内已经试图促进现代化，这种潜力是有可能发挥出来的。这种确实出现的技术转移提高了南北美洲的生产率，因此毫无疑问地使总产值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而如果没有这种技术转移，发展速度就不可能这么快。但事实依然是：这种跨文化的引进在说服或帮助引进国实现其本国技术进步方面并未取得成功。成本一利益关系使获得欧洲新的、“现成”的生产方法较之造就出能鼓励本国创造的同类社会环境要容易得多也更为合理。

由于对经济剩余*的控制和使用，从帝国统治者转移到了新

---

* 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激进经济学派常用的概念之一，指“社会的生产物与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始见于巴兰与斯威齐合著《垄断资本》一书（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版）。国外经济学界多用此表述上述概念，有时也用社会剩余”（social surplus）或“剩余”（surplus）表述同一概念。—译者

的民族政府手中，宗派争端与地区间的对抗和政治一管理上的缺乏经验结成一体，酿成了许多互相抵触的政策，使商业行为陷于瘫痪，其严重程度同殖民地金融结构行将彻底瓦解时的状况完全一样。事实上，独立后为无数次政变和军事暴动所打断的这段时期，是政治上异常动荡的时期。一些社会力量左右了独立后时期的反复无常的民族经济政策；如何弄清这些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非易事。新的不稳定因素中又加上了新货币体系和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财政等因素。困扰今天的许多新国家的低效率、无纪律和腐败，在那时同样危害严重、司空见惯。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导致相当严重的动乱和不安定的因素，从而危害了有关契约方面的法律环境，尤其是与长期大规模经营和交易有关的契约方面的法律环境。

不幸的是，这种体制上的混乱在阻碍拉丁美洲之日，正是世界贸易的实际数量不断增长之时，而且，在1850年以后，世界贸易量的增长率甚至可能高于1870—1914年的增长率。由于欧洲和北美洲的人口增长及其加速投资的效应，以及生产和运输的技术变革等交互作用的影响，宗主国经济的出口和进口的能力增长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增长为拉美提供更为吸引人的贸易机会，而拉美的政治环境必须得到改善。在这一时刻到来以前，尽管1870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内曾试图进行的多次经营均未成功，但关于该地区的资源和生产可能性的最终经济价值的许多资料已在进行累积。欧洲人在主要港口和其它主要人口中心都建立了经商的据点；新的海运航线将拉美与北大西洋的发展中心连结起来；开发欧洲以至美国的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门路愈益唾手可得。拉美社会中的权势阶层始终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同工业革命这个先驱的联系能成功地巩固下来，那么可能得到的（至少为他们而准备的）是什么。

当拉美进入19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时，独立后常为政治动乱干扰的商业气候开始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特点。依据法律和政府政

策而形成的交易结构也不例外。这并不是说拉美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气氛已是一平如镜。虚伪的各式人物仍然充斥着19世纪末拉美的政治舞台，其显著特点是往往靠宗派主义来打破平衡局面。操纵选举程序是习以为常的。政治生活多次回复到19世纪初期的状况。但是，尽管地区之间、阶级之间和派别之间不时出现争端，政府当局逐渐变得更为稳固和全面。此外，令人惊奇的是，激烈的国际冲突寥寥无几，其中最重要的是1879—83年的太平洋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幸的玻利维亚丧失了出海口；玻利维亚和秘鲁的主要硝石矿藏全部被智利夺去。

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墨西哥与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在国内政治稳定程度方面十分出众；这种政治稳定使得国家机器能够专心致志地把政策落实到确保物质繁荣的基础上。就巴西而言它避开了西班牙语美洲早期的动乱时期，度过了最佳的19世纪欧洲式进步和开明君主的长期统治，于1888—89年以非常和平的废奴和建立共和国而告终。除了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次短暂的内战以后，稳定性从未受到剧烈的动摇；具有理性的建设性政治领导使有利的投资气候保持在能够吸引大量外资的程度上，并使经济从正在改变国家的经济和地理格局的出口新高潮中获益非浅。智利亦非例外，甚至在1850年以前就已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创造一个相对而言有助于物质进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方面，智利首先迈出了第一步。而太平洋战争（虽然这一战争极大地扩展了智利的资源基础）和1891年的内战（这一内战结束了推行民族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巴尔马塞达政府）中断了智利的进步。但是在阿根廷（1880年以前常出现激烈的内部冲突），不断进步的地主阶级与出身于商界和金融界（在智利则是矿主）的财阀通力合作，建立了一个主持长期经济发展工作的联盟，尽管经济发展也出现波动。阿根廷的寡头统治是如此成功，以致于在殖民地时期结束前夕尚是一块不毛之地的阿根廷能脱颖而出，在该国与有关国家订立的国际经济契约的促进下成为一个善于采纳新思

想、新姿态、新行为模式和新生产方法的心脏地带。墨西哥是1870—1914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所在地，在与西班牙分离后的半个世纪内遭受了几乎从未得到缓和的动乱。以改革而闻名的自由派统治在经过一段专制时期后于1876年让位于波菲里奥；后者是一个强硬的独裁政府，在1911年垮台以前对内坚持政治稳定，并讨好外国企业。尽管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在自由民主方面令人大为失望，但它却受到了当时外国投资者的青睐，他们认识到，将墨西哥的多种资源与迅速发展的美国和欧洲市场连结起来是有利可图的。

这一时期中其他拉美地区的记录是不平衡的。虚假的政治秩序常常是在独裁者的护佑下才得以实现；其中有些独裁者在位时间相当长，如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1870—87)和胡安·比森特·戈麦斯（1908—35)、危地马拉的胡斯托·鲁非诺·巴里奥斯（1871—85）和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1898—1920)。但是，即使在政治动乱较为激烈的国家，至少有些商业企业和债券的预期回收率达到了能够诱导国内外企业家和投资者承担起建立新的贸易、农业和小工业企业的任务所必需的水平，只要这些企业能受到首都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比较富有的消费者的欢迎。

换言之，至19世纪70年代，拉美的主要地区已为外国资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较为友好的（即可靠的）投资气候，从而加强了基本文化姻亲关系，使拉美与资本出口国建立了一种亚洲、非洲或中东无法得到的更为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建立经济信息体系和共同交易结构以及从事与世界市场扩展有关的预测方面，用政治征服代替了一部分文化姻亲关系。）商业体制结构中稳定性进一步加强不仅增加了拉美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而且还助长了国内资本积累和国内私人投资。这种稳定性还因它影响到风险计算和分期偿还债务的后果而与从北大西洋的资本市场到拉美的公有部门的大规模资本流动有直接关系；在金

融经纪人和促使这些生意成交的政治内幕知情者以及最终债务人或最终债权人中间，这些资本流动对于前两者来说可能更为有利可图。虽然1870—1914年显然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也就意味着依靠私营部门)，但不能忽视这一点：这些大量的资源转移也是通过政府借款机制来实现的，其结果是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外债也有增长）。

进而言之，虽然政府的不诚实和财政管理中的某种软弱远远没有在这个地区被消除，但是政权的稳定性（且不论它使多少人受到损害）总是能够提高长期资本转移的使用效益，这是因为它比频繁的不正常的政府更迭过程中所发生的浪费和盗窃较少，而通过边干边学来提高管理能力的机会则较多。毫无疑问，在进行社会投资的效率方面，阿根廷或智利优于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墨西哥或巴西优于海地或萨尔瓦多，虽然这一点不能否认：就长期增长能力而言，政府和市场对大量资源配置不当，甚至这一地区的主要国家亦非例外。

如果较为稳定的政治条件有助于投资、生产和贸易的增长，那么这种关系不仅不是间接的，而且还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出口收入的增长以及由此而来的进口能力的提高，方便了政府主管的投资和经常性支出所需资源的征集。以进口税为主的贸易税持续上涨，从而使政府的财政基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这一财政基础的直接形式是税收本身，间接形式是依靠预期税收而在海外筹措的大量贷款。从对外部门的增长中获得收益的国家财政反过来不仅使政府能更为方便地购买镇压工具（在政治历史中这一方面可能常被夸大），而且为缓解国内征税的沉重负担（它常常是政治冲突的起因）提供了资金并为就业和利润提供了机会，这将在重要地方选区中增加政府的威信。政府部门中领薪人员的膨胀现象可能被许多当代的批评者斥之为官迷心窍。但是在对付那些如果被拒之门外就会制造麻烦的人来说这不失为一条方便的政治手段。

就长期而言，正是这种补充世界市场的资源，在支配拉美各国如何对世界贸易增长所提供的机会作出反应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在整个19世纪，出口普遍增长；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以前，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发展快于制成品；在最后25年中，两者的增长率相仿，每年约3％。20世纪开始以后，制成品贸易的发展则快于初级产品，每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5％和3％。这些趋势的地区性影响很大，但这种影响又是多种多样的，以至于在快进入19世纪的最后25年时，该地区已出现了不均匀性的特点。而拉美国家在出口基本商品方面的不同经验只能部分地从各国资源的天赋和出口工业中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各共和国之间的体制条件也能有助于决定不同的经济形势。正是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稳定性和延续性才能成为如此重要的因素；这完全是因为政治稳定性和延续性与国际间资本、技术和有些情况下的劳动的转移有着密切关系，而这一切能从土地、矿产和气候的自然天赋中创造出资源。

1870—1914年在拉美所发生的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是无可置疑的。这一时期内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经济中心国家的工业生产，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和经济变革。这些发达国家的总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生产的增长率决定的；这一增长率尔后又决定了对来自包括拉美在内的外围国家的出口的需求的增长率。与此同时，中心的经济剩余规模的扩大及其构成的变化，又为工业发达地区提供了旨在使外围地区被进一步吸引到经济引力圈即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的技术和经济手段。

作为全球进程的一部分，拉美不断地结合进（或拉美常说的“纳入”）由世界市场体系提供的圆拱形连接结构。有些学者认为这一进程早在征服时期就开始了；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始于18世纪中叶左右。我们在此不必关心19世纪中叶以前拉美经济体制与北大西洋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程度。对现在这个课题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至1870年，就拉美的大部分地区而言，这一进程确实早

8

已开始，甚至在加快速度。1870年以前初级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增长率（1853—1872年为每年4.3%左右）高于此后的增长率（1872—1913年为每年3%）。这一事实与世界市场对拉美国内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不断增强并不矛盾。在一方面，初级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增长的绝对数即使在增长率下降（其原因是统计数字的基数扩大了）时一般也仍然在扩大。在另一方面，世界制成品贸易不断地将贸易结合进投资设备中。这些投资设备使1870—1913年期间拉美的大部分生产体系发生了变革。

拉美对外部门的增长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它不时受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动荡的阻碍。如1873年危机以后使出口商品价格疲软，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拉圭、玻利维亚、危地马拉、乌拉圭和秘鲁因此而必须重新安排偿还外债期限。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也深受影响。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后期英国和法国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较小，但90年代初期至中期大部分工业先进国家的经济危机正好与巴林危机*（即阿根廷的倒帐）和外国信贷业普遍急剧收紧银根同时发生。墨西哥的政权由于越来越不得民心，因而在1907—08年的衰退中受害尤为深重。其他地区也受到了这一衰退的影响。出口价格的不稳定使形势更为复杂化。如棉花、羊毛和小麦的价格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期间普遍下跌。咖啡价格于80年代初下降，此后曾大幅度上升。但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以更大的幅度下跌。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较为普遍地处于不利地位，但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初期则有所好转。因此，甚至在20世纪的严重危机爆发以前，对外部门也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靠山。

---

* 英国商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1740—1810年）创建的巴林兄弟公司除经营商品进出口业务以外，还向海外发放信贷。该公司曾因阿根廷无力偿债而一度陷人危机，史称“巴林危机”——译者。

但是，且不论贸易量和价格的变化，1870—1914年期间拉美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出口带动的，因此主要是由先进工业国的需求拉力所诱导的。拉美经济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动力作出了反应，其结果是：西半球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当然在1870年以前就已存在）进一步加剧。至1914年，拉丁美洲内部的经济悬殊比半个世纪或更长时期以前的悬殊更为明显。进入世界市场的经济进程的重新定向和部门之间及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事实上正在成为这一时期的两个特点。在这一点上，学者们基本上持相同看法。但在阐述这一进程首先是如何开始的细节方面、在评价这一进程对于该地区未来的政策选择有何意义方面，学者们持不同观点。本章结尾处将考察这些不同观点的差异。但首先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国际经济对拉美经济组织的冲击的特殊方式。因为只有北大西洋工业中心的进口需求的膨胀才能推动拉丁美洲经济生活前进，所以产品市场，尤其是出口产品市场将被首先考虑。然后将通过分析要素市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变化来回顾拉丁美洲经济的适应性反应。

出口市场

在拉丁美洲被越来越深地吸引到大西洋经济中去的时候，生产模式和一些生产的地理配置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以适应海外对这个地区的矿产、畜牧和农产品的需求。运往海外的消费品和工业原料越来越多。

拉普拉塔河地区在商业上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在西班牙帝国统治的末期都是如此。然而，阿根廷和乌拉圭一经开发（后者次之）就产出了许多种温带商品，主要是畜牧产品和粮食。良种和杂交品种的引进使羊群得到改善，加之牧羊草地的大面积扩大，因此甚至在19世纪中叶之前就已出现了明显的效果；此后，畜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例如，阿根廷出口的羊毛在1840年只有160万公

斤，在1860—69年期间，每年出口量达4500万公斤。至80年代，羊毛出口每年为1亿公斤以上，1895—99年平均每年达2.11亿公斤。但是羊毛出口此后就下降，1910—14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37亿公斤。在乌拉圭，从1876—80年期间到1896—1900年期间的羊毛和其他牧羊产品的出口增加了两倍。虽然乌拉圭的总产量小于阿根廷。但是在1914年以前，乌拉圭的畜牧业在其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更大。这两个国家的羊毛大部分出口到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奥地利。1913年，拉普拉塔河地区出产的羊毛的将近1/5进入英国市场。

阿根廷的其他出口行业也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在1870—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传统产品皮革的出口收入相当于羊毛出口收入的2/3；而从70年代中期到1910—14年的这段期间，皮革出口额增长了将近1倍。但是，只有在19世纪70年代期间随着冷藏运输的发展，才为阿根廷和乌拉圭（后者次之）大量出口肉类铺平了道路。羊肉首先受到器重，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畜种质量的提高和技术进步使牛肉出口量到20世纪开始之时已超过了羊肉。1890—94年，冷冻牛肉出口额只相当于羊肉出口额的一小部分；至1910—14年，冷冻、冷藏牛肉这两种相对来说新开发的出口商品的出口额已相当于羊肉出口额的6倍。冷冻羊肉和羔羊肉的出口量从1894年的36,486吨上升到1914年的58,638吨；冷冻牛肉从1894年的267吨增长到1914年的328,287吨。1914年还出口了40,690吨冷藏牛肉。同期的罐头肉出口从1374吨提高到13,590吨，在1914年前夕，乌拉圭出口的冷冻牛肉相当于阿根廷的1/5，羊肉出口相当于阿根廷的15%。乌拉圭和阿根廷的几乎所有肉类都销往欧洲，许多种养牛业的副产品也销往那里。

阿根廷成为粮食净出口国的时间是在19世纪70年代；这一出口贸易从开始时的小规模很快地获得快速发展。1872—95年期间，潘帕草原上以谷物为主的所有作物的耕种面积增长了15倍；在此后的10年内，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翻了一番。在1880—84年

至1890—94年期间，小麦是主要出口商品，出口额增加了23倍。但在此后的10年中，玉米出口额的增长更快，几乎增长了6倍。此后继续快速增长。在1900—04年至1910—14年期间，玉米出口再次翻了一番多，而小麦出口额则增长了大约42%。至1910—14年期间，玉米出口额已仅次于小麦；玉米和小麦的出口额合计已相当于羊毛出口额的3倍左右。就出口量而言，小麦和玉米都有起伏。这种起伏反映了农产品生产条件的变化和对价格波动的反应。但小麦出口在1911—13年期间达到了230—280万吨的水平，而玉米出口在1912—13年期间则高达480万吨。鉴于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种谷物的出口量不大，因此，上述数字表明，阿根廷的谷物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单位是百万金比索）：小麦（78.1）、玉米（72.4）、冷冻和冷藏牛肉（54）、羊毛（51.9）、皮革（44）和亚麻子（41）。较为次要的出口包括：羊肉和羔羊肉、其他谷物（燕麦、大麦和裸麦）、和破斧树汁及原木。据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估计，从1875年到1914年，阿根廷的出口量和出口额每年至少增长5%。

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几乎全部进行了重新组合。西北地区在殖民地时期曾是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主要区域，但现在的相对重要性急剧下降，尽管蔗糖业满足了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的需求，并成为部分地区的经济支柱。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及以北的草原和地区则作为垦殖的主要区域得到了开发；小麦种植业则从农业垦殖区转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和以西的潘帕草原，羊毛生产则从潘帕草原转移到巴塔戈尼亚。

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更有甚者的是，阿根廷的经济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完全依靠出口贸易；这使阿根廷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共和国的公民。1914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象征着这种变化。19世纪初期坐落在拉普拉塔河畔的只是一个荒凉的帝国前哨基地。就在这个地方，后来出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国际

性都市，主管着进出这个国家的大量增加的货物。在介入世界贸易的广泛性和欧洲化方面，只有乌拉圭才能与阿根廷相比。

1870—1914年期间智利对国际经济的参与同样发生了势不可挡的变化，虽然与阿根廷相比这种变化对国内的影响较小。其原因一方面与主要出口业的性质和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下列事实有关：殖民地时期的体制结构对智利的束缚要严密得多甚至在进入19世纪后的一段期间其遗留的影响仍超过它的东邻。在本阶段初期，这个国家的出口商品主要是银、小麦和铜，大部分由本国公司经营。事实上，在1880年以前，智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产量最高的年份是1869—76年，产量保持在5.2万吨左右。迟至1878年，世界铜产量的约43.6%仍然来自智利，虽然1880年这一比重骤然降到25.3%，1890年和1900年再次分别下降到9.7%和4.3%。1897年的铜产量降到最低点，直至1906年，一直保持在2.6万吨左右，因为高品位的矿藏已告枯竭，而智利的中、小规模的矿产公司所拥有的有限技术能力又难以扭转这一趋势。进入20世纪后不久，外国矿业技术人员和资本被引进智利，从而开创了铜矿业的新纪元，即采用大规模开采技术的年代。由于实施了新的管理，大量低品位矿藏得到开采，现代化的智利铜矿业开始起步。至1908年，产量已达到4.2万吨，为188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917年已增长到10.25万吨。

幸亏智利的出口结构不是单一的，否则，两次铜业繁荣之间的这段时期将成为一次严重的萧条。而正是智利的资源和世界市场上的旺盛需求为该国提供了其他一些出路。在19世纪中叶还是次要的小麦出口，在此后75年中为赚取外汇收入作出了巨大贡献；谷物主要销往欧洲，其次是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小麦出口呈现出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周期性盛衰，但是在1893年以前小麦出口持续发展；其长期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被不断地大起大落的波动所掩盖，直到进入20世纪后才渐趋明朗。1870—74年期间小麦出口平均每年为100多万公吨；10年后平均每年为125万公吨；

但是在1910—14年只有39.5万公吨。羊毛出口量也相当大。1870—74年期间每年出口了约18,780公吨；1890—94期间将近28,860公吨；1912年以后猛增到12万公吨以上。以1913年为例，智利对英国的出口量相当于阿根廷对英国的出口量的1/3以上，超过乌拉圭对英国的出口量。冷冻羊肉出口量与乌拉圭的羊肉出口量差不多。智利也出口一些白银和锡，虽然锡的出口量只及玻利维亚的1/6。大约自1900年起，即在白银出口衰退以后，玻利维亚的出口部门几乎完全靠的是锡。

使智利出口部门在两次铜业繁荣之间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硝石。硝石主要销往欧洲大陆市场（首先是德国、其次是法国）和北美洲市场。硝石出口早在本阶段以前就已经开始了；1879年的出口量已达5.9万公吨。但真正的出口高潮是在太平洋战争以后发生的，这对智利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北部地区的生产（和出口）都获得快速发展，从1881年的35.6万公吨上升到1900年的150万公吨和1913年的270万公吨。根据马科斯·马马拉基斯的估计，在1900年以后的30年中，政府全部经费的50％以上来自硝石（和碘）的出口税。1882—1930年期间，硝石部门的资金剩余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虽然智利经济的出口导向转变不如阿根廷和乌拉圭那样面广，但是无可争辩，智利比墨西哥、巴西或哥伦比亚较为“现代化”，更不必说与秘鲁、玻利维亚或厄瓜多尔相比了。

14

巴西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主要集中在始于19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咖啡出口繁荣。大量气候适宜的沃土处于一种相对而言荒无人烟的状态，可供开发之用，正如当年阿根廷的粮食和畜牧生产迅速发展时的情况一样。因此，供给条件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咖啡出口从1871—75年的每年216,120吨上升到1881—85年的每年311,760吨和1091—05年的740,280吨。在1901—05年的期间，市场危机促使巴西实施了第一个由政府提供补助以稳定咖啡价格的计划；这种计划为随后增长的生产

在组织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实施了稳定价格计划和其他一些控制措施，以及世界市场对咖啡的需求得到复苏，1906—10年期间每年出口的826,908吨咖啡换取了年均27,877,000英镑，明显高于前一个最高纪录（1891—95年）的平均20,914,000英镑，更不必提及1871—75年期间这一出口作物每年平均获得的10,487,800英镑。从19世纪70年代至1911年，咖啡出口占巴西出口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世纪90年代期间曾高达2/3左右。这一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是美国，但也有大量咖啡运往德国和法国。

这一阶段巴西还出口了其他一些产品，其中有些产品的出口额和出口量不断增长，有些产品则下降。但是，与巴西在世界咖啡市场上所占的统治地位相比，这些变化对巴西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蔗糖是不成功的例子之一。蔗糖出口不规则地从1871—75年的平均每年169,337吨增加到1881—85年的年均238,074吨，但此后急剧下降，1906—10年年均只有51,338吨。尽管巴西政府努力促进这一传统出口业的现代化，但只是局部的成功，因为甜菜糖和加勒比（尤其是古巴）的甘蔗生产在主要世界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蔗糖出口额在巴西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世纪70年代的12%下降到1901—10年的不足2%。

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东北地区的烟草出口取得了一些发展；1913年的出口量（主要销往德国）为29,388吨，这一数字占巴西出口总额的2.5%。巴西东北部的另一出口商品可可也可以说出现过一次高潮，尤其是在20世纪初期引进一些高产品种以后。法国、德国和美国是主要出口市场。它们也为同一时期的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的不断增长的可可出口提供了市场。在拉丁美洲的可可出口国中，1900年巴西的出口量仅次于厄瓜多尔，两国的出口量分别为近1.7万吨和近1.9万吨。至1914年，巴西和厄瓜多尔的可可出口量分别为40,766吨和47,210吨。可可在厄瓜多尔对外贸易中占有主要地位；而巴西的可可出

口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中，约相当于该国出口总额的将近4%。但是，烟草和可可都没有抵销蔗糖的下降对人口稠密的东北部的虚弱经济结构的衰退性影响。

在本阶段开始的时候，巴西的棉花出口量已相当可观。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内战影响了美国的棉花出口，从而刺激了巴西的棉花出口。在1871—1875年期间，巴西每年出口大约1.09亿磅棉花。接着，北美洲生产的复苏和其他地区产量的上升缩小了巴西的市场；其结果是：至1896—1900年，年均原棉出口量下降到2460万磅。此后曾出现了一次复苏，1912年巴西棉花出口上升到3600万磅，但大部分棉花生产不断地用于发展中的本国纺织工业。如早在1904年，纺织工业就吸收了3.5万吨棉花。到本世纪第2个10年时，棉花出口在巴西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占2%左右。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巴西出口高潮中最后一种主要商品是橡胶。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橡胶出口在这一时期同样获得了发展。1880年，三国在亚马孙地区的产量为8635吨，其中巴西占绝大多数。至1910年，产量达26,693吨，销往北美洲和欧洲的工业中心。1914年，仅巴西的产量就超过7万吨；此后产量又有上升，但增产的好处却被不断下降的价格所抵销。1910年以前价格曾持续增长，但是在市场价格疲软后，巴西橡胶产量仍继续上升。1900—10年，橡胶出口额占巴西出口总额的28%，而在19世纪70年代仅占5%多一点，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盛极一时的橡[16]胶出口高潮终于结束；亚马孙丛林中的繁荣希望也随之消失。

但是，巴西里约热内卢以北地区的出口行业的发展都比不上咖啡繁荣那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咖啡繁荣始于里约周围地区，以后扩展到整个圣保罗地区，对南部其他各州也有一些波及性影响。给予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是皮革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皮革出口约占巴西出口的5%。因此，出口推动增长的变革性影响对于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来说是不大的。可以略带夸张地说：受益于咖啡大繁荣的地区几乎是一个新的国

家。不同于北部和中部地区，南部地区曾经长期徘徊在经济落后之中，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对生产可能性形成一整套新的布局时为止。当这个时机一到，南部终于将这个国家的老地区远远地抛在后面。

墨西哥经济在波菲里奥执政时期经历了异乎寻常的变化，从而使这个国家成为参与出口商品市场的另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一增长不仅归功于墨西哥的丰富资源天赋和有利的地理位置，而且也应同样程度地归功于波菲里奥的支持性政策。墨西哥因位于北半球而相对接近于通往欧洲的主要航线，在波菲里奥执政末期，墨西哥出口的大约22%销往欧洲（英国是最大的市场，其次是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墨西哥邻近不断扩大的美国市场；到那里的运输费用低，因此当时美国吸收了墨西哥出口的3/4。毫无疑问，美国市场的规模及增长速度与墨西哥的资源多样化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了墨西哥出口模式的显著特点：即贸易的商品种类很广。白银出口从1877—78年607,000公斤增长到1910—11年的230万公斤；此时白银出口已占墨西哥出口总额的1/3左右。黄金产量从1877—78年的1000多公斤上升到1910—11年的37,100公斤，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6；铜和龙舌兰纤维各占近1/10。但在波菲里奥执政末期，还有许多出口商品，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占1—5%不等：橡胶、皮革、咖啡、铝、牛、香草、鹰嘴豆、龙舌兰纤维和高级木材。更少数量的出口收入来自水果、辣椒、[17]豆类和蔬菜、蜂蜜、啤酒、烟草、草帽、糖胶树胶、锌、锑和汞等。进入20世纪后，石油工业中出现了显著的出口增长，因此在迪亚斯离任时，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石油出口国。

墨西哥销往海外的许多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表现出很大的不稳定性，甚至长期趋势亦是紊乱的。例如，在1877－78年和1910—11年期间，咖啡出口量翻了一番，但是在1914年以前未见增长。牛的出口量1878－79年为11,300头，1910—11年为170,200头；最高的年份却是1876—97年，向美国出口了313,600头。蔗

糖出口也有很大的变化，1904－05年是最高年份；而其他作物（如香草、鹰嘴豆和龙舌兰纤维）在本阶段末期的出口量则比初期的出口量大得多，而且生产一般也自始至终地呈上升趋势。以龙舌兰纤维出口为例，1878－79年达1330万公斤，但在1910－11年已上升到1.23亿公斤的水平。在本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矿产品出口量同样持续上升。

除出口市场中主要商业周期的反冲以外，墨西哥出口的多样化较之较为单一的出口模式，却往往能为整个对外部门提供更多的稳定性。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第一个10年，出口总量和出口总额都获得快速增长。以比索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出口总额从1877—78年的2930万比索上升到1910—11年的2.937亿比索。因为被出口发展所开发的资源并不是都位于相邻的地区，所以兴旺的对外贸易触及许多地区。如矿产和放牧使商业北移；龙舌兰纤维贸易延伸到尤卡坦；石油扩展到墨西哥湾海岸。不过这些地区发生的变化还没有大到如同巴西那样足以创造出一种实质上接近国家规模的新经济，但令人惊奇的是，物质进步不比以前更为广泛。如同巴西东北部的居民那样，大多数墨西哥人实际上也被对外部门的增长排除在外。巴西东北部的居民在咖啡将经济的引力中心拉到南方的时候仍然停留在外围。

秘鲁在19世纪中的出口发展是以鸟粪以及此后的硝石为基础的。这一早期阶段由于无能的国家政策和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突然告终后，又被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第二个更长时期的发展所 18 取而代之；后一阶段一直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二个出口阶段，出口商品的基础更宽广。山区出产羊毛（羊和南美洲羊驼）以及白银、黄金、铜和其他矿产品；内地出产咖啡、可可和橡胶；沿海出产蔗糖和棉花。这些出口商品的出口额从1880年的190万英镑下降到了年后的140万英镑。但是在经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以后，出口部门至1889年已逐渐复苏，11年后出口总额达到380万英镑。至1910年，秘鲁出口额高达620万英镑。

糖和铜是19世纪90年代期间秘鲁的主要出口商品；在此后的10年中，棉花和橡胶的相对重要性不断加强。在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中，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在的那个10年，石油的相对重要性上升，而橡胶则迅速下降，后者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910年的18%减少到1915年的只有5%。在1890年至1915年期间，白银的相对重要性普遍下降，从33%降低到5%。但是，除了黄金产量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的初期普遍下降以外，大部分出口商品的产量在1914年以前尽管上下波动但都有所增长；这说明秘鲁经济的生产能力正在不断上升。然而，尽管秘鲁出口业有所增长，产品品种多样，地理分布也广；但该国出口发展给国内带来的有利变化似乎比不上与此类似的墨西哥多样化和分散的出口模式给墨西哥国内带来的有利变化。

在拉美其他地方，19世纪后期的出口经济往往有助于形成一种以单一经济发展模式为基础的简单结构。例如，在哥伦比亚，咖啡自80年代后期开始，已是对外部门的支柱。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咖啡生产取得显著发展，而始于40年代的烟草出口周期就是在这一阶级停滞的。此后，哥伦比亚的咖啡出口一度下降，但是至1880年，出口量恢复到107,600袋（每袋重60公斤）。出口量大体维持在这一水平上，直至80年代后期再次开始上升。当时咖啡价格大幅度回升，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点；经过这一阶段的价格复苏后，至1889年，出口量达到475,400袋，出口额占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大约70%；至1898年，出口量上升到531,400袋。由于世界咖啡价格急剧下降影响了此后几年内出口量进一步增长，但最后咖啡产量重新开始增长，因此至1913年和1914年，每年的出口量超过了100万袋。在1905—14年的10年时间内，咖啡在哥伦比亚出口中的比重在40－46%之间。在20世纪一开始，香蕉出口也开始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一种植业部门中外国企业的组织（联合果品公司于1901年开始在哥伦比亚营业）。香蕉出口从1901年的26.3万串增长到1906年的140万串，1909年

19

达300多万串。在1910—14年期间，香蕉占哥伦比亚出口的9%。其他出口商品（黄金、皮革、金鸡纳、棉花和烟草）的销路绝大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一阵一阵的。不论是香蕉或是上述其他出口商品都不能克服那种出口经济严重依赖于咖啡的基本不稳定性。

在委内瑞拉，19世纪30年代咖啡取代了可可，成为主要出口商品，直至本世纪20年代被石油取而代之。确实，在哥伦比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超过委内瑞拉之前，委内瑞拉在这一地区是仅次于巴西的主要咖啡出口国。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出口部门为许多种热带农产品所主宰，主要是香蕉、咖啡、蔗糖和烟草。

国内市场

国内产品市场的变化，尽管也是重要的，但也许可以较为简单地从地区范围的角度来探讨；与出口产品市场相比，各国国内产品市场之间的差异性较少。在每一个国家，这些市场都受到了迅速扩大的城市人口消费习惯的显著变化（这些变化无疑是获得新产品的结果）的影响。就南美洲南部而言，在这一点上还应加上伴随着相对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而来的新的消费偏好。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还在农村居民中培养了欧洲风格，与出现在拉美大部分地区的显著的城市一农村文化鸿沟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不少情况下，城市食品市场的增长为边远地区（如阿根廷的产酒区门多萨和产糖区图库曼以及墨西哥的产糖区莫雷洛斯）的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刺激作用。

城市消费品市场上的制成品主要由英国出口商提供，但英国出口商受到了德国和美国的有力挑战，再其次是法国；此外，其他一些国家也提供了少量的制成品。多种产品不仅是第一次大量投放市场，而且消费量也明显大于以往。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棉制品在拉丁美洲消费品市场上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较小规模的进口商品包括羊毛制品（只要适合当地气候）、亚麻布、丝绸 20

和数量有限的鞋袜以及现成服装。精美的陶器、珠宝和家具也都进口；此外还有肥皂和卫生设备、药品、纸和一系列五金器具商品。在本阶段末期，进口货单上还出现了汽车——甚至飞机（1913年巴西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了16架飞机）。

但是，并非所有这些制成品全都来自海外。在以前的殖民地中心地带，尽管面对着现代工厂制造的进口商品，手工业并没有完全消亡，特别对内地农村市场和省一级的地方市场而言，它还是一个供应商品的来源。几乎所有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建立起一些本国工厂，生产铁器、烟草制品、纺织品（棉制品和羊毛制品）和低档非耐用品、家具、玻璃器皿、火柴、蜡烛、香水、药品、染料、马鞍、鞋子和靴子、其他皮革制品、食品和饮料、肥皂和一些五金器具，等等。至少在那些主要国家中，进口货单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了这种早期工业化的迹象。当然，本国工业化是有限和分散的，生产并非持续发展。各国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各不相同的。但是，1870—1914年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拉美工业时期的黎明——而随之而来的是隐含在工会组织和来自欧洲的各种社会评论中所谈的新的社会关系。

但是，除消费爱好发生变化以外，生产方法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为国内产品市场带来了更大的变化。因为，销售现代工厂制造的资本货的市场大大扩展，超过了19世纪里以前的任何时期，而以往充斥各地的几乎都是本地提供的陈旧的生产技术。确实，使1870—1914年的进口结构最为不同于前半个世纪的特点之一是进口贸易结构中生产资料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大部分新型生产资料都来自进口这一点表明：出口行业已开始发挥供应资本货
21 部门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支付特殊消费品进口的手段。

生产资料市场也变得更为复杂。有些生产资料来自拉美的建筑材料制造厂和新建立的本国铸造厂、钢铁厂以及机械车间；其中有些机械车间原来是为了修理和保养进口产品而设立的。但是，如前所述，大量新的生产资料来自海外，主要是英国、德

国、美国和法国。化学制品和染料、涂料和清漆、纱和线、润滑油和脂膏、煤和焦炭、各种形式的钢铁（薄钢板和中厚钢板、钢锭和钢杆、构件）、铜（板、锭、线和铸型）、其他金属半成品、铁路公司和电车公司的车辆、机器用传动带、机床和器具、电机和仪表以及所有矿业、农业、本国工厂和新的市政工程（如给水装置和煤气厂、照明和电力公司）所需的各种引擎、马达和机械——所有这些生产资料的进口量都在不断增长，以加快将拉美纳入工业社会的步伐；这一进程比拉美实施精心设计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要早得多。不容忽视的是，新的生产服务也进入市场，尤其是金融和保险业务；但也有其他服务，如商业信息、新的销售渠道、谷物仓库和冷藏设备以及建筑公司，等等。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商业发达程度不断提高是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

最后还需提及买卖集团商品和劳务的另一类市场。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军事装备以及有时与其相关的训练服务，已在1870—1914年拉丁美洲的消费构成中出现。就军备而言，正如此前几十年那样，进口仍然只供应部分市场，但国家武器库和本国工厂在一些大国中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军队领导人在政治中的作用是显著的，但人们不应该夸大军国主义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与当时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拉美用于武器的实际资源事实上是很少的。更为重要的是用于民用经济的集体事业。市政服务（如煤气厂、电车线路、街道照明、给水装置和卫生设备）、通讯体系、铁路运输和现代化的港口设施是这一阶段的更富创造性的公共设施；在所有国家的大城市中，它们大都由本国和外国合资提供。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资本是采用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形式来提供这些服务的，而必备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则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输入。但本国投资者也将其储蓄投入这些吸引人的新领域；而本国的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人员在这种公司的雇员中却是寥寥无几的。 22

国内产品市场的这些变化影响到了每一个国家，虽然这些变化的范围在拉普拉塔河、巴西南部、智利，其次是墨西哥，尤为广泛。此外，不仅在这些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品种发生了变化，而且还由于采用了新的电报通讯体系和运输设备，本国市场与地区市场在更大的范围中互相结合方面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新产品市场的特点和作用

就产品市场而言，拉美终于在利害参半的双重情况下加入了世界市场，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这种参与显然在资源方面受到很大制约，这是扩大销往出口产品市场的货物供应所必需的。鉴于拉丁美洲大部分出口产品的长期供应条件如此富有弹性，尽管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并在19世纪上半叶严重恶化的经济结构有局限性，但是人们应该得出结论：出口扩展的这一组织过程肯定为1870—1914年期间的民族资源配置进程提供了主要动力。诚然，这里或那里的地区性农业发展受到了人口增长和本国市场上不断上升的城市需求的刺激；19世纪中出现的零星的工业化事例——纺织厂、食品和饮料工业、造纸厂和钢铁厂等——是以那些本国的和地区的成就为基础的。但是，姑且不论这些事例如何，情况依然如此：是外国的需求，而不是本国的需求，才能发号施令。由于拉美出口的数量、价值和种类都得到增长，23 资源方面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必然屈从于这一高于一切的考虑。

另一方面，从国内产品市场的变化上也同样表明：参与对外贸易终于使不同的拉美国家各自的总消费模式受到多么大的制约。就几种出口产品来说，不断上升的产量中有一部分被用于满足国内需求的增长。但是可与巴西或墨西哥的棉花相提并论的例子不多。在巴西和墨西哥、越来越多的棉花最终被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而建立的制造厂所吸收。虽然初期工业化有其重要意义，但当时国内产品市场最主要的发展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和劳务

在品种和数量上不断增加。确实，拉美经济史中有许多课题尚未得到足够研究，其中之一就是，随着铁路运输的扩大（从而减少了因陆路运输成本价格高昂而产生的保护作用），19世纪早期为了向本国市场和地区市场供应制成品而建立的小工厂，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地理位置较为集中的工厂和进口货所取代的。

从拉美的进口构成来看，使我们对运转中的体制机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实际上，用于购买外国奢侈消费品的大量外汇为这种体制的延续提供了庇护。用于这方面的外汇为平抑出口收入的波动起了缓冲作用，从而实际上保护了生产资料进口能力不受这种波动的影响。换言之，只要出口收入的剩余部分能够用于消费，那么这种体制本身就能繁衍更生，现有的这种关系就能更有保证地得以保存下来。只是到了以后，由于国家财政混乱最后导致负债累累，由于政治原因使外汇短缺无法再通过削减进口简单地加以弥补，由于已经变化的进口结构使国内生产现状更严重地依赖于源源不断地进口燃料、原料和中间产品时，这种结构的基础才终于被削弱。

广而言之，向拉美市场提供新产品似乎是一种合理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本阶段末期德国、美国和法国的出口商快赶上英国出口商的时候尤为激烈。这并不是说，在国内向最终消费者出售商品总是在类似于纯粹的竞争的条件下发生的，也不是说，在更大的场合下缺乏垄断竞争的成分。远非如此。人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购买者对于零售市场的市场选择知识是远非完整的，吸纳进口货的本国销售网常常受到干扰，有时还受到中间商的操纵。购买者（或中间商）对某些进口商品的款式和等级或对特定的供应来源的爱慕似乎也是常有的。就本国制造厂而言，他们也能获得由早期多少断断续续的保护主义倾向带来的垄断利润。尽管自由经济模式大多主宰着这一阶段的决策过程，但是拉美的权贵在整个时期内并没有自始至终地一致接受开放经济增长模式。在进入20世纪以后的墨西哥和乌拉圭以及甚至早些时候的阿根廷、巴

24

西、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对自由增长模式是有疑议的，对自由放任政策也加以修改，以便使本国更高的生产成本受到保护和确定垄断利润的分寸。

拉美的社会批评家们在谈到世界市场的历史作用时带着怀旧心情，抨击“垄断利润”，然而这种“垄断利润”可能并非出于供应商的共谋也不是由于绝大多数供应商对广义的产品市场进行了高度控制，更不是来自保护主义政策。更确切地说，鉴于所有产品革新都来自国外，因此能够获取源源不断的暂时性垄断利润的正是欧洲和美国的供应商。这种垄断利润来自于新产品投放市场，直至仿制的竞争对手有能力赶上时为止。就此而言，毋庸置疑，事实上在这一阶段中实现的革新利润使拉美的这些贸易伙伴们获益非浅，而且，对于全体或某个类别（不是某一单独的公司）的外商来说，他们确实垄断了革新的全过程。因此，人们可以大胆地将大量的外国垄断利润说成是在整个阶段中可以计算在内的因素。

虽然有些拉美的供应商有时也能在出口市场上获得类似好处，但并非常例。哥伦比亚的金鸡纳霜（用于制作奎宁）、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古柯（用于制作可卡因）、亚马孙的橡胶、智利北部的硝石和玻利维亚的锡，即是这方面的例子，可能还有人还想加上香蕉和咖啡。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初，哥伦比亚的金鸡纳霜已被亚洲的生产取而代之；二十年后橡胶也遭到同样命运；对古柯的需求量不大；在香蕉上获利最多的是销售中间商，而不是种植者。在一段时期内，垄断利润的因素无疑使巴西的整个咖啡业获利甚丰，因为巴西很早就在世界咖啡市场上确立了统治地位。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实施价格补贴计划的必要性表明：巴西和拉美其他地方的不断扩大的咖啡供应量已经削弱了巴西在世界咖啡市场上的这种地位。锡的市场结构因欧洲的产量不断降低而使玻利维亚长期居于领先地位，而智利和墨西哥的供应量则次之。但是到20世纪时，亚洲作为一个重要的锡产地正在迎头赶上；而

当时首先主宰玻利维亚锡矿业的还是本国所有权；后来实际上因组织机构中心迁移国外而使锡矿业所有权非本国化了*。硝石可能代表着拉美、供应商拥有的最为长久的市场利益；智利是硝石的主要出口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在人工合成硝酸盐生产方面的技术进步严重打击了智利的硝石生产，甚至在此以前就已出现了一些硝石的替代品。

要素市场

土　地

当然，产品市场中的深远变化如果没有要素市场中的相应变革是不可思议的。在要素市场中，首先考察土地是合情合理的；土地这一术语就其经济概念而言，包括所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在本阶段（1）对于出口经济的兴起来说是基本的、（2）对于制约社会和政治状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变化来说，土地就其狭义的农业概念而言，一直是每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口的基本生产资料；几乎拉美的所有出口商品（作物、畜牧产品和矿物）都具有土地密集型的首要特点，甚至在资本密集型方法被运用于生产的时候（如20世纪智利的铜生产），土地仍然具有这一特点。 26

在某些方面，本阶段的唯一的、最为显著的经济变化就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土地供应量大幅度增加。它既是由

* 自19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玻利维亚的锡矿业几乎完全为帕蒂尼奥、阿拉马约和霍赫希尔德三大家族所占有。前两个家族是玻利维亚人，后者是迁居玻利维亚的欧洲犹太移民。其中，以西蒙·伊图里·帕蒂尼奥（1860—1943）创办的锡公司规模最大，20世纪20年代初已控制了全国锡产量近50%。1924年帕蒂尼奥将他的公司的总部从玻利维亚迁往美国，并在特拉华州登记注册，使该公司成为一家美国公司。——译者

于对土地所产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而引起的，也是因为国际和国内交通体系得到相当大的扩展和改善而引起的。土地供应量增加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

新增加的土地供应量中有一大部分是被私人占用的大片公共领地。在墨西哥的北部和南美洲的南部，从本阶段一开始起，土著人口就被赶走（有时是用武力做到这一点的），从而为确立更加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条件的土地管理开辟了道路。在拉美南北两头之间，经济用地的边疆区也同样被往外推，移往人烟稀少的地区或在此以前与资本主义体制结构的结合非常松散的地区。例如，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广阔的耕作区从已被开发的高原区的外围向四周延伸，扩展到亚热带区和沿海地带；在运往海外的、数量上不断增加的热带作物产品中，大部分来自这些地区。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也有商业性生产的类似扩散；前两个国家还具有这一特点：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定居点扩展到被称作"平地"的内地热带大草原。

至少有两种类型的边疆扩展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种是：沿着广阔的边缘区域扩展的定居点，直接与出口商品生产的增长相联系，如巴西南部的咖啡边疆或巴塔哥尼亚高原的羊毛边疆。但在第二种类型中则出现了一种取代作用。正如18世纪时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靛蓝染料繁荣将牧牛业转移到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那样，19世纪中美洲的咖啡种植业也将粮食生产和牧牛业推向离中心更远的边远地区。在其他地区也可观察到类似的取代。出口动力和种植取代结成一体，重新绘制了该大陆上的定居点地图。

在秘鲁，商业性农业区被推向配有大面积灌溉系统的沿海区，在高原或山区的零散谷地得到扩大，并且扩展到亚马孙内地（尤其在橡胶繁荣时期）。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也将商业性农业区扩展到亚马孙地区。但向亚马孙主要地区扩展的当然是巴西。与此同时，巴西的咖啡边疆向南部进发，导致了与其相关的农业发展；这一农业发展移到内地，推向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沿海则

27

从里约热内卢一直延伸到阿雷格里港以南很远。在阿根廷，除了前已述及的、智利也经历过的商业化南移以外，农村经济吸收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以西和西北面的新土地、扩大到沿着安第斯山的新的耕作区和另一方向的位于乌拉圭与巴拉圭之间的两河流域地区。乌拉圭逐渐以畜牧业充实了边境地区；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可耕地面积或畜牧区甚至有所扩大。林产品的商业化对巴西的一部分地区、智利南部、巴拉圭和中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等地都有影响。

拉美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墨西哥的北部和中北部（墨西哥湾沿岸一部分地区因发现石油还得到了开发）以及秘鲁的山区、玻利维亚和智利的地下自然资源储藏已被列入了生产计划。随着硝石业的兴起，智利北部的沙漠也获得了经济重要性。

将这些土地和矿产资源投入生产的体制机制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在矿业中常用的程序是官方承认用益权。至于土地的表层，一部分公共领地被拨给铁路公司，以支付铁路线的建设费用。一部分用以抵付土地勘察公司的费用；一部分给予土地垦殖公司和用于某些计划，其中既有在阿根廷和巴西南部流行的“真正”的计划，也有稍经伪装的舞弊和从不赢利的项目。剩余部分的公共领地因被用作赠地或以名义价格出售而转让了所有权：有时是中等数量的土地，如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区，但赠送给私人和土地公司的土地往往是数量很大的。政府债券的持有者偶尔也能获得作为一种补偿的土地所有权；有时候，赠送土地是为了促进新作物的耕种，尤其是出口作物。这种例子并非少见：公共领地被人用武力、法律诡辩术或某种擅自占地者的权利占有并拥有所有权——如果这些占有者是富人及（或）政治上有势力的人，那么这种权宜手段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毋庸赘述，用这种手段取得的“闲置”公共土地实际上并不都是无人居住的空地。 28

通过可疑的或合法的手段，大量国有土地和当时大部分已探

明的商业性矿藏控制权落入了私人手中，这种控制权有时被某个人或某一个家族所操纵，有时则被某一家公司企业所掌握。后者（即商业组织）在矿业中居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有不少拉美土地所有者家族很大，在许多继承人中分配土地所有权时也常常使用由法人持有的办法。就农村的大地产和法人持有的矿山而言，无论是法人的或自然人的地产的实际经营权，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不在地主的代理人掌握的；但是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大地主虽然不是经常性地、但也能定期地参与生产和销售的组织工作。就法人土地所有权而言，所有权集团有时由欧洲或美国的投资者组成，他们实际上从未亲眼见过其遥远的财产；例如英国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的一些养牛公司、或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香蕉公司和糖业公司即是如此。经营矿产的外国大公司基本与此相似，其中有些公司是在获得较小的、东道国拥有的租借地以后组成的。但也有的外国所有者实际上居住在拉美，如秘鲁的吉尔德迈斯特财产的业主及其以南的霍赫希尔德财产的业主*、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一些庄园主，以及墨西哥北部的牧场主。在巴西南部以南的地区，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抵达后立即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成为农村财产业主的事例不胜枚举。尽管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较少出现，但也有一些移民成为农场和牧场的业主或自行经营的农、牧场主，如危地马拉的咖啡园主。

29 从公共领地中挖出来的大片新财产引起了广泛关注；确实如此，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每一个国家，但在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的数量之大尤为显著。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地方，随着土地垦殖计划移民而扩散的小农经济或形成比较中小型农场和牧场的情况。而且，规模显然是个相对的问题。如危地马拉高原或厄瓜多尔部分地区或秘鲁山区的农业大庄园，几乎难以与潘帕草原或

---

* 指在秘鲁经营蔗糖业及进出口贸易的德国移民吉尔德迈斯特家族和在玻利维亚经营锡矿业的欧洲犹太移民霍赫希尔德家族。——译者

巴塔戈尼亚的大畜牧场相比，也无法与奇瓦瓦北部或杜兰戈北部的大庄园相比。

矿业中的所有权单位同样是各不相同的；在矿业中，几乎所有大企业都是外国人拥有的，只有玻利维亚的早期的帕蒂尼奥锡王国是例外。在整个拉美的矿藏区，都可找到由本国人经营的小矿区。中等规模的矿区更有可能吸收外国人参与，尽管这些外国人通常是来拉美寻找财富的移民，其中有些人本想最终返回母国，但这一愿望并非永远能实现。正是这种中等规模的矿产，才能构成一些较为突出的本国财产积聚的典型基础，如秘鲁的普罗亚尼奥家族、费尔南迪尼家族、加略家族、里索·帕特龙家族、博萨家族、本廷和穆西卡家族，以及智利的奥萨家族、普埃尔马家族、科西尼奥家族和埃拉苏里斯家族。但是，也有许多很有发展前途的矿业财产为本国业主所出售；这种转让构成了外国大公司财产的基础。就拉美整体而言，矿业中的非本国化进程较之农村财产中的非本国化尤为严重，尽管农业用地的非侨民外国所有权在一些地区确实处于显著的地位：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中美洲和哥伦比亚的香蕉种植园以及墨西哥的畜牧场，等等。

土地供应量扩大的第二个来源是将属于传统地产（用常见的术语来说就是大庄园）的土地转变到更为有效的商业性用途上。这一转变通常是在新开发地区内铺设铁路后出现的，有时则是在沿海运输得到改善、或新的本国市场和地区市场得到开发以后出现的，如都市和主要港口的发展、矿业活动的兴起、或以新的交通网为基础的新的内地市场中心的扩大。有时候，这种商业化能够根据不同情况依靠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雇农或佃农和分成制佃户，使以前闲置的庄园土地变成可耕地或牧草地。土地拥有者在试图将佃户通过各种途径占有的土地纳入自己的领地时，冲突经常发生。如果说，侵入公共领地代表着粗放范围的扩大，那么，第二种进程（即土地用途的转变）则代表着土地供应量的集约范围得到发展。这一进程往往集中在该大陆上老的居民区，大

30

多是（但也并非总是）发挥内地市场作用的农业区。

在有些地方，传统土地占有的商业化具有一种能够创造出一种在殖民地长时期从未出现过的活跃的土地市场的作用。但其结果是有好有坏的，反映了拉美生产区域中条件的巨大差异性。如在墨西哥低地和智利的中部，大庄园（和较小的农业单位）在1870—1914年期间似乎经历了一种进一步分散土地的进程，因此，在本阶段末的土地单位较之本阶段初期要多得多。农业庄园有买有卖，从而使土地的再次分散不仅仅限于继承遗产的转移。在拉美的少数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趋势：自耕农或通过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定居、或通过在市场上重新分配旧的土地所有权而得到增生。这并不是说大庄园已消失，因为大占有制的集中仍然是拉美大部分地区中土地占有制的特点，但这种趋势确实能表明商业化在这一要素市场上的扩散性影响。

另一方面，在一些老地区，市场需求的吸引力和生产技术的变革似乎产生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促使土地集中，将财产积聚成更大生产单位。巴西东北部和秘鲁沿海区的甘蔗生产区充分说明了这种发展，但上述地区并非出现这种发展的仅有地区。在智利中部和墨西哥的一些地区，也有原来已经很大的财产再次扩大的事例，厄瓜多尔和秘鲁高原等地亦非例外。而且在甘蔗种植业和榨糖业与铁路运输甘蔗和加工过程中使用蒸汽机相连系的那些地方，由于榨糖厂扩大规模似乎为土地集中提供了动力；而其他作物发展导致的土地占有制并不一定有同样后果。如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正在扩大的咖啡边疆比危地马拉的咖啡园繁衍了更多的小地产所有权，而巴西南部的咖啡庄园就其整体而言则规模更大。主要由佃农从事生产的典型阿根廷谷物种植业，大地产要比智利南部、巴西的南里奥格朗德、墨西哥的米却肯或秘鲁的曼塔罗谷地同类地产的规模都大。

提供给土地市场的农业用地的第三个来源是更老的传统地区的法人财产，即属于教会或五花八门的宗教和福利组织（如秘鲁

31

的公立慈善机构）以及土著人团体和西班牙人建立的团体所有的土地。例如，在墨西哥，受到自由思想鼓励的法律改革为19世纪50年代以后将那些财产转让给私人铺平了道路。其他地方的反教权运动——如19世纪60年代的哥伦比亚、70年代的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90年代的厄瓜多尔——也都试图缩小教会对不动产的所有权。为了转移那些无助于资本主义企业盈利的原机构持有的土地所有权，除了采用法律手段和简单的占领以外，还采用了市场购买的方法。在财产所有权仍然保留在这些机构手中的情况下，为了对这些财产进行商业性的管理，常常采用租赁的方法；但须补充的是，这种方法并不总是以公开投标为基础。在一些地方，这类土地转移到了中、小型农场经营者手中；但是在许多地方，原先的这些法人财产并入了大地主正在积聚的土地之中，这些大地主中既有个人和家族，也有商业性公司。在有些地方，即使公社土地还没有完全消失也常常受到私人的侵吞，因为这些土地具有靠近人口中心的价值。

这一阶段土地市场的运转情况尚待分类；而且显而易见，为了更精确地区分显然纷繁复杂的各种差异和更具体地说明构成这些差异的因素，大量的深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如同拉美经济史中许多领域那样，任何概括在本质上总是很不成熟的，应随着新的研究结果问世而加以修正。但是，对此只要有所警惕，仍然能够对土地市场运转的特点提出几点看法。 32

在配置土地资源方面，似乎有三种情况有利于中、小种植者。在一些较老的定居点，土地占有制是传统所有权和合法权益的复合体，推进商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国内和内地市场的扩大。在这些地方，土地所有制似乎还有使个人能够获得土地建立或者扩充中等规模的农场和牧场的机会。这种转移包括向他人购买土地、继承已分散的庄园的一部分土地、将草场改作作物用地、或获得公共领地中的一小片土地，尤其是已有人定居的地区中的较为边远的土地。这些地产也有的是在集体机构的力量正在削弱的

地区。从公社财产（或非赢利的法人财产）中挖出来的。一般说来，这些例子并不是出现在资源利用模式受出口市场支配的商业最发达地区，也不是出现在资本和技术要求很高的种植业或畜牧业那类地区。有利于中等庄园规模土地耕作的第二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安第斯和哥斯达黎加的咖啡种植区，以及巴拿马、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的经济作物主要面向出口市场，但劳动力相对缺乏和生产技术条件所限使人们选择了小规模生产。产生中等农场规模的第三种情况出现在欧洲移民定居的极少数地区：巴西最南部的几个州、阿根廷的一部分地区和智利南部。至于矿产资源，本国人获得并在中、小规模范围上经营的租让地，主要是那些性质和地理位置都宜以较少的劳动力和资本进行开采的矿山。

除上述三种情况外，一般条件总是使大地产拥有者占居上风，正如那些勘探和开采大规模的、地质构造更为复杂的矿藏特许权总是不断地落入外国公司手中那样。在政府分发大矿产特许权和赠地的时候，能够得到政府官员厚爱的那些人总是富绅和权贵。在大片土地被出卖或昂贵的土地进入市场的时候（在拉美一些地区，地价不断急剧上涨），能够有把握获得抵押贷款或拥有其他金融后援来购买土地的人还是他们。有些地方在出口市场机会的吸引下，由于转向现代化的畜牧业或采用更先进的耕作技术提高了对土地的需求量，激起地价上涨；没有门路获得银行贷款的小农场主、农民和无地劳工因土地价格过高而被排斥在市场之外，或者只能在货币经济地区边缘上获得一块近乎不毛之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初期在秘鲁高原南部由于羊毛价格上涨似乎出现过这种情况，虽然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进程，如在大庄园土地上放牧的传统权力被取消和公社财产遭到侵吞对此也有所影响。

通过这些手段，大地产的巩固和壮大在拉美的许多地方呈现出某种强化的局面。正如从体制结构的其他运转中所能看到的那

样，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拉美内部社会力量的结构受到主要来自外部条件的影响有多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拉美的扩散并没有消灭全部前资本主义的法人财产和公社财产以及农民种植者和依用益权惯例对大庄园土地的要求，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幸存者的地位在当时新的社会和经济母体中被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

劳 动 力

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与世界经济结构之间不断加强的相互渗透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亚于对产品市场的影响。一方面，就“燕子”(golondrinas)，即在地中海农闲时自该地区来到阿根廷人烟稀少地区寻找工作的季节工的情况而言，新的劳动力市场的运转对于南、北半球中劳动力需求节律的季节性变化作出了非常灵敏的反应。可能被看作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秘鲁国内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敏反应的结构，并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因此不得不从太平洋彼岸引进苦力劳动力，用于沿海区的农业和铁路建筑。这种劳动力引进在一开始是以包身契约为基础的。由于引进 34 了苦力，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本国的劳动力从不参与本国劳动力市场。亚马孙内地的许多部落土著人完全被排斥在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劳动力流通体系之外——多亏这种隔绝，他们才能在橡胶繁荣中避开降落在那些不够幸运的土著劳动力头上的恐怖。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大规模欧洲移民中到拉美的人虽然不及到美国的人多，但仍然是大量的，而且对于这一地区的某些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和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洲际性的人口流动并不是始于本阶段。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是随着征服而开始的；甚至在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德国等地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移民来到了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地。奴隶贸易曾将数百万非洲人引入拉美；在巴西，奴隶贸易直到1850—51年才被废除，

在古巴则迟至1865—66年。在1847—60年期间，大约有5万华人作为契约劳工来到古巴；至1862年，在这个国家的华人已超过6万。但是，只有在1870年以后，真正大量的欧洲移民才开始对拉丁美洲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如同其他事物那样，这种影响在整个地区内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阿根廷是国际经济这一方面的主要受益国。在1871—75年期间，进入这个国家的移民平均每年为3万人；虽然在1876—80年期间下降到平均每年2.2万人，但在1881—85年期间上升到5.1万人，1886—90年则为11.7万人。欧洲经济危机使1891—95年的年均流入量下降到4.7万人。但此后这一水平开始回升，在1906—10年期间和1911—15年期间分别达到每年平均24.8万人和20.2万人。来到阿根廷的450万移民并非全部定居，更不必说季节性移民了；但是在1871—1915年期间进入阿根廷的移民净人数几乎达到250万。至1914年，阿根廷人口中的30％是在外国出生的。移民活动所揭示就业地区分布更能说明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年居民中70％是在外国出生的。

这一人口流动中的绝大部分移民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约占总数的4/5，其中意大利人多于西班牙人。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所占比重较小，依次为法国、俄国、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英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设现代阿根廷经济的大部分劳动力和技术是由这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提供的。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阿根廷经济获得的劳动力的质量为什么高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原因——文化程度更高、技术更熟练、身体更健康。不仅如此，从各个方面来说，阿根廷劳动力市场的运转与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平稳，从而导致了促使生产率水平持续上升所必需的配置状况变化。跨大西洋的季节性移民和大量非季节性移民都说明了市场指导的有效性。所有经济部门都得益于高质量劳动力的输入和母国对移民的大量补助。作为大部分移民的新家园，沿海地区发展成一个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具有欧洲特色的

区域。

巴西是拉美的第2大受益国，在1871—1915年期间共接受了来自国外的大约320万人。如同在阿根廷那样，进人巴西的移民并没有全部定居。这一迹象表明：如同在拉普拉塔河那样，巴西的劳动力市场在运输过程中带有一定的灵敏度。但是根据关于再移民的零星统计数字，可以粗略而合理地推断，在这个国家扎根的移民约在170—200万之间。意大利人在这股移民潮流中占多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分别居第二和第三位。其次是德国人和俄国人；剩余部分是来自欧洲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种类相当多的民族。日本移民始于1907年。大部分移民被吸引到圣保罗州；在19世纪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日本移民占圣保罗总人口的1/5。其余一大部分来到巴西南部的其他州和里约热内卢。只有少数人到巴西的其他地区。但是就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巴西的比重要小于阿根廷。

如同在阿根廷那样，来到巴西的一些新居民常常带着母国政府给予的补贴，在有组织的不同农业垦殖区定居。其余移民是单独或举家全来的，他们有时也能得到对增加劳动力输出感兴趣的政府的援助，就巴西而言，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都采取了旨在吸引 36 移民的政策。在阿根廷和巴西，政府领导人将外来移民和垦荒视作占据各自国家领土的主要无人地区或人烟稀少地区的手段之一；这两个国家似乎都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移民能够为他们的新家园带来先进技术、欧洲化的习惯和态度。移民劳动力完全被看在是建设巴西的咖啡经济和阿根廷的粮食—畜牧经济的主要因素。不仅这两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依靠移民劳动力，而且建设基础设施的工程和不断扩大的城市部门中的大部分经营管理亦非例外，不断扩大的城市部门在将其盈余用于建设更为复杂的国内经济结构的过程中对出口繁荣作出了贡献。确实，这两个出口发展和移民中心享有较高实际工资水平的本身，在这种派生的国内部门增长中就是一种因素。

在其他国家中，乌拉圭接受的移民与本国稀少的人口相比，数量相当大；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来到拉美的其余移民中，大部分被智利、古巴和墨西哥等其它几国所接受。但是到墨西哥的移民与该国的人口相比数量较少。只有在乌拉圭、智利和古巴，欧洲人的进入才对这几个国家的劳动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尽管其他国家为吸引欧洲移民也作出了努力，然而只是断断续续的，大多没有什么效果。总的说来，除巴西、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共和国、智利和古巴以外，其他拉美国家吸收的移民较少，其影响主要在工商界，其中有经营制造业的企业家、商人、金融家、工程师和从事其他专业及技术的专家。但他们在这些职业中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大大超过了他们人数的比例。

在整个拉美，国际经济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相当多种多样的，反映了几种影响的综合作用，其中包括：除劳动力以外的地区性天赋生产要素的差异；在调节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传统体制的不同力量；各种出口业的生产结构和外来移民数量的变化。37 任何一个特定地区的经济变化的速度和动力也是一个起制约作用的变量，正如独立于国际性移民以外的人口增长趋势所起的制约作用那样。因此不容忽视这一点：1870—1914年期间的人口持续增长，即使受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较小的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精确的数字难以得到，但是可以举例：墨西哥的人口在1850—1930年期间可能翻了一番，在同一时期中智利人口可能增长了两倍，而秘鲁的人口增长速度则可能更快。这种人口发展的总的影响是国内对食品的需求量增加（从而提高了商业性农业的利润率）、加剧了对土地的竞争（也导致了大庄园与土著公社之间的冲突）、土地价格因地主能够（通过规定劳动力服务质量、租金和工资水平）支配比过去更多的劳动成果而上涨。

谈谈仅能加以概括的几点看法：奴隶制作为一种正规的体制终于在拉美被消灭了——在古巴，最终废奴的时间是1880—86年，在巴西是1888年——而劳动力市场作为不同地区和生产进程之间

的一种连接的体制，却由于整个大陆上劳动力市场条件千差万别而反映出许许多多的缺陷。除了以上概括的两点还可加上第三点：总的说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运转比农村市场更为顺畅自如；而在农村市场，陈旧习惯和陈旧关系的现象可能尤为显而易见。同早期的欧洲一样，可以说是“城市空气带来自由”。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劳动力流通的程度各地差别很大。在有些地方，如危地马拉、秘鲁高原和玻利维亚高原，在当地公共工程中仍以强制性无偿劳动为主，在本阶段初期私人农场还用这种手段募集劳动力，尤其在危地马拉是如此。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采用殖民地时期遗留的古老方式摊派劳力去矿井服役并不少见；而在土著居民多的国家，则以流浪罪法令逼迫工人从事强制性劳动，尽管这种做法似乎并未长期奏效。（从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直到阿根廷的图库曼都有采用这种权宜手段的例子。）但是以劳役偿债更为盛行，因此贫穷的土著人被迫接受债务劳役制，直至债务还清为止。地主控制的声名狼藉的赊购商店（即大庄园和种植园的内部商店）以高利贷利率发放贷款，试图通过这些措施保证债务劳役制与农村庄园对劳动力的要求相适应。在墨西哥（特别是尤卡坦）以及危地马拉债务劳役制的主要作用是从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土著人中募集劳动力。亚马孙河的橡胶产区和安第斯高地的部分地区，存在一种叫做“恩甘切”制度* 的债务劳役制变种。

在更多地了解地区性劳动力市场的运转以前，尚难确定这几种类型的劳动力募集制度的流行程度事实上有多大。但现有的证

---

* enganche system，一译“包身契约工”制，一种由包工头通过各种手段，往往是拐骗诱胁等不正当手段，承包募集劳工的制度。包工头利用应募劳工的困难处境，以预付部分工资为诱饵，同后者订立盘剥性契约，在立约期内劳工须按约为资方工作但领不到全部工资，受到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和控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译者

据确实能表明：这几种类型的强制性劳动完全不如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流行，尤其在中美洲地区以外更是如此。在一些地区，由于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通有限，强制性劳动是毫无必要的；大庄园的扩大使大地产得以控制大部分现有生产资料，当然也控制了附近最好的土地，而且地主还能使邻近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无法去选择更好的工作。在大规模赠地极盛时期，散布在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带的居民常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发现在遥远地方发生的土地交易已经使自己变成新农业企业的长年劳动力。在较老和人口较多的地区，由大地产占有生产资料所引起的对就业选择的垄断，尤其是大庄园对村社土地的剥夺，同样发挥着作用。在类似的情况下，地主也能修改约定俗成的租佃权安排，从而使劳动力在地主的土地上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使庄园按分成制所得农作物的份额有所增加。

尽管在资本主义性的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同时，拉美的一部分如同东欧那样，也经历了一种第二次封建化，但是在另一些地区——可能比以前设想的地方还要多些——由农产品、畜产品和矿物出口市场上吸引人的机会所激发的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超过了许多地区对劳动力的低水平需求量；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的长期经济混乱中，许多地区性经济就是在这种对劳动力需求量相当低的水平上运转的。其结果是在雇佣劳动明显增长的同时，多种类型的租佃制和分成制协议被重新调整。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各地在出口诱发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工人相对缺少的双重推动下改善了租佃条件，将服劳役和交纳实物地租变换成支付现金，而且当农村雇主想吸引和留住工人时也提高了雇工的实际工资。（在大庄园服劳役时间的多少也对农村居民实际工资的变化有所影响。）

还要指出的是，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深蒂固的南美锥形地区以外，在其他地区的国家中也能发现诱发大量劳动力供应量的商业性手段，尽管这些新的劳动力制度在拉丁美洲其余地区农

业部门中扩散的确切程度尚待确定。显而易见的是，北大西洋地区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长而扩大的需求，对拉美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有利影响，并以某种形式在该大陆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劳动力市场上引起了反响。巴西南部、阿根廷—乌拉圭是实际工资增长的受益地区，除此以外，其他地区的实际工资增长无疑是不大的；这一点从其他地区对欧洲移民几乎没有多少吸引力的现象上显而易见。大量欧洲移民竞相涌往国外就是为了寻找有利的职业。

资　本

拉丁美洲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发展是1870年以后这一阶段的中心特点，这一点在拉美地区的资本市场上反映得最清楚。工业中心与拉美的联系是整个大陆资本积累进程的推动力。国际资本转移为这一进程提供了燃料，但决不是它的全部。作为本国资本形成的催化剂，可能是这些国际资本转移更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四五十年时间，即资本主义的高潮时期，是拉美引进外国投资的黄金时期。如前所述，接受外国资本的条件与前几十年相比有很大改善，超越国界的资本运动几乎不受任何正规的限制。外国资本利用当时产品市场条件不断发展的这一优势，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涌入拉美。这一进程并非永远一帆风顺。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出现了几次政府债券倒账的风波；1890—91年的巴林危机构成了另一个障碍。不仅发行公共债券陷入困境。许多采矿企业遭到失败，而且一些银行股息也下降了。但是面对各种障碍，外国资本仍然不断涌入。在整个时期，英国提供的资本在资本转移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他欧洲国家，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投资很少，主要集中在墨西哥的铁路、金矿和银矿、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中美洲的一些铁路公司和种植园以及其他地区的铁路公司（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

木材制品企业、农业部门和商业机构。在90年代期间，更多的美国投资进入墨西哥的铜矿和铝矿、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以及哥伦比亚和秘鲁的许多种行业。但是迟至1897年，美国在拉美的直接投资的80％（美国在海外的资本中大部分是直接投资）集中在墨西哥和古巴；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两个国家接受了更多的美国资本。至1914年，美国在智利和秘鲁矿业中的投资显著增加，因此几乎87％的美国直接投资集中在4个国家：墨西哥、古巴、智利和秘鲁。美国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总额从1897年的3亿美元上升到1914年的16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13亿美元。

欧洲投资进入拉美的时间更早；至1914年已达到大得多的数额（约70亿美元）。除此以外，欧洲投资与美国投资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以下两个重要方面。其一，地理分布范围更广：在本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欧洲是资本主要的来源。其二，证券投资占很大比重：主要进入基础设施类型的活动，如铁路、港口、电车、电力公司和其他公用事业。此外，约1/3的资本投入政府债券，而此相当多的资本被转移到公有部门，尽管当时宏观经济组织中的私营企业占优势。固然，这些公有部门资金中不少部分重新被用于补贴私营部门的投资，但似乎可以不无道理地推断：输入大量外国投资之所以在政治上如此畅通无阻，至少在一定程度正是由于其中有一部分用于对各国政府当局进行了疏通的缘故。

英国投资虽然涉足该大陆上的每一个国家，但是在分布上仍然多少有些集中。在本阶段末期，阿根廷接受的投资占投资总额（50亿美元）的1/3以上；巴西占将近1/4。墨西哥占16％左右，因此这三个国家占英国在拉美投资总额的3/4以上。其他国家依次为智利、乌拉圭、古巴和秘鲁，约占总数的18％。除了前而提到的投资者对投资部门的偏好以外，在矿业、海运和银行业等部门中也可找到英国资本。

法国投资主要集中在巴西，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投资也很

多，在后两国的数量基本相同。部门偏好同样是政府债券、铁路、矿业、银行业和金融业，等等，虽然法国投资者对于公用事业的兴趣不如英国投资者的兴趣大。德国投资者喜爱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他们提供的资本少于法国资本；投入铁路或公用事业的资本相对来说很少。

在对进入拉美的资本输入的规模作出这些估计以及类似的估计时，可以提出一些问题，而且应该说这些数字确实只能说明巨大投资规模的大致次序。此外，即使考虑到计算中的错差，这些数字也能充分说明拉美准备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程度以及拉美依附于那个北大西洋中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但是除了巨大投资规模以外，有两点值得加以评论。

首先，正是这种资本流动，从资本主义中心组织比较严密的资本市场流向几乎没有资本市场的拉美，才能使拉美地区对出口产品市场上的新的销售机会作出反应。例如，新的电报和电话公司、经济情报体系、和更为快速的海洋运输服务，将拉美国家经济的生产决策计划更为紧密地交织到世界市场之中。由于技术得到改善，海运公司更快地、更廉价地将拉美的出口货物运送到主要消费中心，同时又将进口货物运回拉美港口的集散中心。 42

在评估实际资本运动的影响和解释金融流动时，铁路的重要性尤为显著。从港口向内地扩展的新铁路线被用于聚集可供出口的矿产和农产品，并将这些产品运到水路码头——在墨西哥还被运往北部边境。不仅铁路系统的地理分布是为了提高该地区在生产矿物、纤维制品和食品等出口产品时的比较利益，而且运价结构的发展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因此，铁路公司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与更为昂贵的陆路运输方法（而不是水路）展开竞争；一旦随后出现的生产增长能够得到刺激，那么铁路运输就能通过大量降低物资运输的单位成本，发挥出催化剂作用。在美国或欧洲对早期铁路体系为社会降低费用的那种怀疑，在拉美是不太强烈的。

这并不是说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铁路永远是成功的。毫无疑

间，有一些铁路（主要是在安第斯地区）是令人失望的；这些铁路建成后为生产者、销售机构和消费者降低的费用并不能弥补巨大的铁路建筑费用和保养费。此外，在当时的放任自流和投机性的商业环境中，其他线路也深受财务结构不合理或工程质量差和保养不足之害。因此，即使在按一般估算有可能为社会降低费用的那些线路，如果政府当局认真监督的话，降低费用的幅度也不会那么大。而有些线路对股东说来是无利可图的——然而这些线路的发起人和为它发行债券的投资银行却大赚其钱。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铁路的建设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另一些铁路建于50年代。但是铁路发展的主要时期实际上是在1860年、尤其是1870年以后，这一时期几乎完全处于为兴办铁路筹款和建设的热潮中。1870年，在南美洲铺设的铁路线长度已超过1770英里。至1900年，这一数字超过26,000英里。在本阶段结束时，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的铁路网的面是最广的，但由于铁路轨距和铁路车辆缺乏标准化，铁路的覆盖面并不像铁路图所显示的那样广，即使上述三国亦不例外。

国际资本转移中有利的技术影响是广泛的，因为拉美的所有出口部门——矿业、畜牧业、农业和加工工场，等等——从海外引进了新的生产方法，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技术也得到改善。在所有大国和大部分小国中，本地小工厂工业的兴起如雨后春笋，这些工业因运输成本低廉也往往因关税已提高到保护性水平而受益，这些工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海关对进口商品的过高估价以及19世纪90年代影响遍及拉美国家的货币贬值。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的制造厂商使用的技术都来自国外。

值得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社会性的资本转移。来自海外的资本以一种有组织的基体而体现出来，而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提供了资本运动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尽管难以得到精确的数据，但看来至1914年在拉美的很大一部分“外国”资本的股本已不仅

是最初的国际资本转移，而且包括再投资收益；换言之，外国公司以一种主要方式为本国资本形成发挥着代理人作用。而且，这种资本形成的组织可以被仿效。拉美人日益熟悉现代的商业方法、信贷分级体系、管理和组织生产的模式、广告术和商品宣传。其中许多人（来自较高的社会阶层）到国外去寻求商业实践经验。拉美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为工业发达国家令人赞叹的物质成就所激励，开始攻读土木工程、应用科学和矿业工程等实用性专业；而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中，一些共和国的学校则已着手在国内培养这些技术人才。此外，拉美人还受到边干边学的商业教育；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著名巴西企业家毛阿男爵曾在拉美地区的一家外国企业中就业而受到这种教育。外国公司在整个地区的扩散当然使这类企业雇用学徒的开放程度大大增加。对于外国公司选择雇用人员的问题，有很多推测是片面的。19世纪下半叶，外国公司发展所需的专业人员大大超出了拉美各国教育体系供应专业人员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墨西哥尤为突出，在那里，越过国境聘进技术专家和财务专家是相对容易的。然而，事实上是：在整个大陆上，许多本国人在外国人拥有的铁路、矿业企业和公用事业公司等部门中供职，学会了股份公司的方法和资本主义管理的其他方面——上述情况为以后分析继续招聘外国人员究竟有多大社会必要性的问题提供了基础。

44

这样一种人力资本形成是本阶段在拉美扎根的新体制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人建立的商行在组织进出口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公司一马当先，但随之而来的德国、法国、比利时、北美和其他外国公司不断增加，有时甚至取代了英国公司。有些较大的商行起初兼营银行业务，后来参与了银行建设，它们出于自身的金融利益，对工业、地产业和矿业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为了说明这股扩大规模的趋势，可以列举许多商号名字，如邓肯·福克斯、安东尼·吉布斯、H·S·博尔顿、鲍尔弗·威廉森、吉尔德迈斯特、特恩奎斯特、格雷厄姆·罗和A·威斯-

F·威斯。拉美市场与美国、欧洲制造商之间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随着本国交通的改善，本国商人，尤其是内地商人，能够降低大量库存，将资金用于其他方面。主要城市中心的批发兼仓贮业务大大发展，而推销人员则深入内地。商业信贷网络已经建立，有时还得到了欧洲专业银行的支持，并向内地发展业务。

拉美自从获得独立以后，一直缺乏战略性金融领域的体制基础，而且建立永久性金融媒介的条件也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地方曾为此作出了努力，但很少取得历久不衰的成功。在这方面巴西的成绩也许最大，因为正是在巴西，引人注目的毛阿商业帝国即以其广泛的银行业务而享有盛名。19世纪60年代，几家英国银行开业，给这一地区带来了正统的英国银行业务：伦敦—巴西银行（1862年）、伦敦—普拉塔河银行（1862年）、墨西哥和南美洲伦敦银行（1863—64年）、南美洲英国银行（1863年）、里约热内卢英国银行（1863年）。后来又建立了盎格鲁南美洲银行（由设于1888年和1889年的两家银行合并而成）。这些银行和其他英国银行逐渐通过他们的分行网络，将业务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更大区域。步英国银行后尘的是欧洲大陆上的银行，如德意志海外银行、德意志巴西银行、德意志南美洲银行、法国南美洲银行和法国阿根廷银行。此外还有一些意大利银行和与荷兰、比利时、瑞士有联系的银行。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这些银行的分行也增加了，尤其是法国和德国银行。须补充的是：随大陆银行而来的还有一种不同于英国惯例的银行业务，即起源于圣西门主义的类似于"动产信贷"机构。

这些银行的大部分资金是在本地筹措的；这一点表明：作为资本积累的长驻机构，这些体制上的移植体，同外国商行和由移民资本家及企业家创建的工厂和矿业公司一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及此后的一般时间内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发挥积累的金融机制和提供其他服务的机构，其形式是抵押公司和保险公司。这并不是说拉美的所有新建银行都是由外国

人办的。但是即使就许多由本国人管理的银行来说，它们在创建过程中也得到了外来移民和外国人创建的公司的帮助，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银行的体制原型都是来自欧洲的。

最后，在本阶段中转移到拉美的有组织的资本还有另一方面应该引起注意：即工业企业家才干。如前所述，许多种关税已发展到保护主义的地步，有时是故意的；这是因为，即使在自由主义浪潮高涨的时候，自由贸易也根本没有被拉美的决策人士所接受。有时也采取了其他一些鼓励性措施；在关税程序变得尤为复杂、为征收关税而高估进口商品时，则采取了一种行政性保护措施。1873年以后，本国货币为与西欧国家的金本位挂钩而贬值；此时，出口商获得了好处（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的上升速度往往慢于本国货币含金量的下降速度），本地生产商也因进口商品在当地的价格不断上升而在竞争中多少轻松一些。

尽管证据是相当零碎的，但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移民企业家为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秘鲁等国在本地建立数百家小工厂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而在哥伦比亚，本国公民可能对外国企业家和技术员的依赖较少。关于拉美工业化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更不用说断言起始更晚的一些说法了）；从1870—1914年的记录中可清楚地看到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本文讨论产品市场时提到的那几个领域。本国城市的一般商品和生产资料商品市场，以人口增长和由出口诱发的收入增长为基础，因而获得了发展；新公司则应运而生。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在数量上来说并不多，其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尽管出口获得了增长）、基于优惠条件的进口供应弹性、国内投资资本市场不完善以及维护企业体系中的其他一些因素。可用于投资的国内资金仍然极少；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出口工业的海外市场巨大、信息网络和销售渠道得到很好的开发，出口业的拉力难以抗拒。

结论：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演变

在1870—1914年期间，拉丁美洲不仅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地区性差异，而且还因这一阶段的需求引导发展（但这种发展并非仅仅受需求制约）而经历了生产要素天赋的不同演变过程。第一次47 世界大战前夕，作为这一地区各国经济基础的资源模式，已显然不同于本阶段伊始经济进程所依靠的那种资源模式，劳动力更为丰富，质量更高，具备的技术也更为多样化。土地，包括地下财富，已获得可观的增长。各地区的积累和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一地区所依靠的资本的股本增加了，但其质量的提高尤为重要。虽然在消除迟至19世纪中叶仍使拉美步履维艰的技术落后方面已迈出了一大步，但是这一地区依然被排斥在孕育了工业社会的科技知识的主流之外。这一发展中的决定性要点难以精确地确定，但是1870—1914年期间积累的量变促使体制构成发生了重要的质变，尤其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其他地方的体制机能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这一地区的几乎所有统治权贵似乎都热衷于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好处。这种现代化就其进程所提供的大量新资源而言，基本上是自我融资。确实，这些权贵和政界及商界中的中等阶级享受的繁荣只能证明对世界经济的这种依附是完全正确的，从而强化了有利于继续依附的政策。这种新秩序的合法性就其根据而言，是来自欧洲现成的另外两种引进：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在人烟稀少的拉普拉塔河地区，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资本主义形式；对于这一地区的居民来说，新政策是以“文明”形式出现的，它与强人统治和低水平的地区性经济自给自足那种“原始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普遍的状态正如阿尔韦迪的格言

所述："统治即拓荒"。① 开发潘帕草原及其周围地区的商业性垦殖浪潮不断高涨，几乎成为政府的中心任务。在巴西，"秩序和进步"被绣在国旗上；政府满怀热情地为自己提出了促进秩序和进步的任务——这种热情甚至使国家采取了一种温和的干预主义。在其他地方，如人口较稠密的危地马拉高地、厄瓜多尔高地、墨西哥高地和秘鲁高地，那些对西班牙帝国尚未实现的封建主义感到婉惜，甚至对前哥伦布时期遗留至今更为古老的生存环境也同样感到婉惜的人们，都一致赞扬这些新的经济形式。 48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赞扬声并没有对改变社会投资模式和体制模式，进而使更多人获得现代化好处起任何促进作用。社会权贵阶层中不断增强的世界主义，尤其在消费偏好方面，常常是社会上颇受青睐的行为趋势。总的说来，殖民地心脏地带的体制环境相对而言仍然与新的商业思想和商业惯例的传播格格不入，即使在这些新思想和新惯例在原则上受到赞赏的地方亦非例外。在这片大陆的许多地方，传统社会和大庄园社会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化远远没有完成。即使墨西哥也是如此，在波菲里奥时期，推行资本主义秩序的热情十分高涨，只是在他任期结束前的最后十年里因局势告警而受干扰。

尽管物质上的前景愈益光明，但一些地方的当代社会批评家仍然指出了流行的发展计划中的矛盾，如秘鲁的冈萨雷斯·普拉达或墨西哥的莫利纳·恩里克斯。更多地依据欧洲准则是南美洲南端国家的社会特征，在这些国家里出现了劳工运动的雏形，试图在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寻求调整；这些主旋律在其他国家普遍弱小的无产阶级组织中引起了共鸣。在南美洲的南部，多少带有法国式的中等阶级激进主义已开始倡导温和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把较老的政权还俗主义和现世主义以及流传更广

* 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18 0—1884），阿根廷著名作家和政治领导人——译者

的自由主义向前推进一步。换言之，国际经济既引起了转变拉美社会—经济的变化，又为它们的重要性提供了对比性的解释。

但是，不妨回顾一下，这些变化的重要性是什么？如果把费边主义者的说法颠倒过来，那么似乎毫无疑问，至少是：资本主义取得了对经济的高度控制权，促使这一地区的新资源主要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经济的需求作出反应。进而言之，尽管它们的影响并非遍及各地，但来自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经济力量无疑远远渗人内地，例如，甚至远至亚马孙部落居民。正如罗杰·凯斯门特所指出的，这些部落成员被臭名昭彰的残酷暴力推人橡胶贸易。旧的生产组织体系仍然存在，但在几种共处的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最终确立为居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根据有些学者的说法，如乔纳森·莱文在《出口经济：其发展模式的历史性透视》（1960）一书中所举例子充分说明：其结果是一种飞地式的发展；这块飞地集中了、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转变经济的力量，尽管周围的经济活动领域也受到了蚕食。在飞地以外的地方，社会组织较少受到外部力量诱发的变化波及——可谓束之高阁依然如故，不在市场体系的范围内。从内外两方面来考察历史过程，对外部门似乎是一个以不完备的社会—经济转变为背景的怪瘤。大多数这种解释的含义是：在资本主义飞地与较老的或“传统”的部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而且这两个部门处于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之中。但是，只要经过更长的时间和市场力量的经济动力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在前资本主义残余被逐渐卷人现代经济发展的旋涡后，体制的分布最终必然会趋于更均匀。有些地方的经济体制的转变显然是不彻底的，其原因可能是出口部门的规模仍然相对弱小和人均出口值的增长率不高，而不是缺乏连结出口部门和传统部门或对内部门的传递机制。换言之，即使当时有那么多的增长和积累，也没有如此大量的剩余用于促使社会生产组织中的非资本主义方式瓦解；正如当代发展社会学所指出的，那些前资本主义方式总是充满了固有的

保守主义和传统体制普遍具有的惯性力量。

最近问世的一种修正主义学派（主要产生于拉美）认为，这种对增长动力的阐述本质上是新古典学派和二元论的，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对于殖民地时期拉美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以及这样一些零散的事例，即：甚至在1850年以后，投入市场的产品数量增长后，似乎强化了奴隶制关系，而不是加速这种关系的崩溃这种现象，这股依附论思潮的一些诠释者们并不全信，或至少要重新确定概念；与此同时，这些诠释者们将拉美介入资本主义秩序的时间追溯到1492年。在他们看来，自从征服时期最初的几十年起，拉美各部门和各地区已显现出全局的整体性，而非二元性；这种整体性来自各部门和各地区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共同结合，在1850年以后二元性非但不是日益明显，而且可能已最后趋于消失。根据这后一种对历史的诠释，被称为二元主义的传统看法所掩盖的正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和交换的结构。 50

因此两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而非各自分离的。作为一种控制劳动力和限制公众消费的机制，社会等级制和组织上的分裂发挥了调动和保护经济剩余的作用，从而将这种剩余交给得宠的阶级去支配。不仅如此，传统社会及其经济支柱甚至通过克扣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和提供社会福利职能，设法扩大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占有的剩余，而不必使积累进程直接受到影响。如果从这种分析角度剖视本阶段的历史过程，显而易见，在备受赞扬的自由经济理想与现实之间长期存在的体制差距方面，用传统的二元性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可能令人迷惑不解。事实是，将资源用于消除二元性的真诚承诺，以及为了把拉美社会纳入自由派想象的标准而设计的体制改组（例如，曾在注定要失败的墨西哥改革中出现的情况），大多与统治集团（因而处于决策地位）和被统治集团之间保持既定关系完全水火不相容。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阻碍各阶级之间"贸易比价"（不

妨借用一下这一术语）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正是对剩余的支配权，而非剩余的规模。

尽管这些相互争论的理论探讨非常一般化（既无法类比，又太抽象），尚不足以正规方式提出缜密的假说和受到真正严格的反复检验；但是，这些理论探讨所提出的关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看法，却可作为引导人们关注该地区重大历史问题的总方针。特别是，如果放弃那种想把非常复杂的拉美历史过程各个方面纳入某种包罗万象、首尾一贯的单一理论结构中去的企图；如果主要是为了指导探索提出一些假设、为了排定历史的次序和为了奠定比较分析方法的基础而更为谨慎和兼收并蓄地进行这种广泛的理论性概括的话，则更有助于对重大问题的探讨。

51

例如，修正主义的观点认为1492年以后拉丁美洲完全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这种观点很容易被有些人看作是一种武断的说法，尽管对外贸易在组建两个伊比里亚帝国（尤其是葡萄牙）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因为就现有论题而言，资本主义是随着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到来而在拉美确立的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因此资本主义来到拉丁美洲时间是那时候还是更晚这个问题可以说完全无关紧要。据此看来，有些修正主义分析家的观点，即外围经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后将产生出一种阻碍性的所谓“不发达”依附状态，似乎表明：与“未发展”的巴拉圭相比，阿根廷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因为阿根廷在全球贸易和资本运动中的参予程度比巴拉圭大得多。但是，尽管阿根廷在20世纪中受到了不少苦难，与巴拉圭相比，阿根廷似乎更有能力改善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福利，而且公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政治的程度也遥遥领先——即更为“发达”，无论怎样理解这一术语也是如此。不发达这一概念的特殊用法可能同样被抛弃，因为它并没有明显地改进诸如既得利益、势力范围、政治联盟和阶级扩大之类的标准概念，甚至没有在此前马克思本人的见解上提高一步。但与此同时，在引导人们关注特权集团的政

策偏好方面，依附论所作的分析却具有很大价值。正如依附论所指出的那样，从社会观点出发，在政策主要反映某些社会阶层的愿望时，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佳程度。对两种观点作出上述和类似的删除以后，显而易见，这两种阐述性的探讨并非完全对立的；确实，如果能更为谨慎地运用的话，那么他们大概能够阐明同一个社会复杂问题中的不同方面，从而在根本上相得益彰。

在另一方面，依附论确实对20世纪发展中明显的冲突性特点和19世纪发展中隐蔽的冲突性特点作出了解释，并对二元论和飞地理论中比较传统的分析方法所描绘的既简单化又使人误解的景象加以揭露。飞地理论在观察市场和其他体制之间的关系时似乎过分拘泥于资本和过分机械；这种理论还绘制了一幅假想现实的幻象，在这幅幻象中，确实难以分辨出拉美的结构复杂的多元经济。但是飞地观点本身却也相当出色地突出了对外部门与几个国内部门之间对比鲜明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并找到了各个部门的组织特点中重大差别的含义。新古典二元论观点同样有助于辨明拉美经济结构中出现的由需求决定的增长点；这些增长点上集中了不断增长、但仍然为数有限的资本供给，以增加产出和生产率；此外，新古典二元论观点还对各个国家采取的发展道路之间的差异性作出了解释。例如，成本—价格报酬率决定了增长的主要途径，从总体上来说，应该是那些投资和生产的机会，这些机会一方面取决于北大西洋地区工业先进国家的快速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技术的变化和国际、国内运输价格的降低；技术变化和运输价格的降低有助于扩大耕种面积，并开发了新矿区被出口增长诱发而派生的国内发展使拉美各国经济面临新的生产选择，但因其需求规模十分微小只处于次要地位。但是，如前所述，所有这些因素在各地区的差异性很大，取决于国内市场规模、不同出口行业的技术以及在出口业兴起地区盛行的生产关系，等等。

在导致本阶段的不均衡发展方面，供给条件起了作用。影响

最大的是当时正在兴建中的现代运输体系的覆盖面有限，而且当时的主要自然资源煤和铁的质量低劣，分布不均。运输网络沟通了对外部门的出口渠道，因为外国资本在铁路发展中独占鳌头，而且铁路线主要为出口贸易服务；这种运输网络为那些可向国内外市场提供商品的地区确定了严格的界线。除了铺有铁路的区域以外，陆路运输费用异常昂贵。煤和铁的不幸匮乏就其本身而言，影响了本国有效利用由机器和机械工业组成的新经济结构创造的最为重要的后向带动* 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拉美的最北部，即蒙特雷，才在本阶段的结束前夕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钢铁工业。当然，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外贸对发展产生的刺激作用向整个地区的本国经济体系扩散；至于运输的局限性，则很有可能同样阻碍了出口多样化的发展。墨西哥这个例外，似乎证实了运输变量的特殊重要性。由于波菲里奥执政时期兴建了广泛的铁路网络，许多种自然资源能够得到开发，销往出口市场。此外，虽然收入分配严重限制了国内市场规模，但仍然出现了适度的工业发展，因为运输体系使本国生产商能够根据现有的需求状况扩大其供应范围。如果墨西哥本国市场当时更为分散，如果铁路线路不是如此发达，那么众多的小工厂就不可能被建立起来。

53

其他供给因素对发展选择幅度的影响比较难以断定。在国内市场需求较大的地方，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以及在常规的成本一价格关系有利于向本国市场供应制造业设备的地方，必需的资本、劳动力和企业家人才似乎总能唾手可得——如果不是来自本地出生的人，则来自移民——从而开始一定规模的生产。如果企业家人才更多一些，如果要素市场的运转更有效率（例如，在本国筹措更多的资本），那么形势至少可能有所好转。食品加工厂的分布相当广泛，铸造厂和机械工场次之。纺织厂主要集中在

* backward linkage，这里指带动那些供应机器和机械工业所需原、材料生产的工、矿业发展。——译者

巴西和墨西哥，但其他国家也有一些。这种早期工业化可能表明：如果投资者和企业家更多，那么可以利用的机会将更多。诚然，没有人会声称资本市场运转体制是完整无缺和不偏不倚的，即完全按商业投资准则为基础的。相反，整个地区和居民中的所有阶层难以接近这一领域中刚刚起步的体制发展。况且，在当时的体制结构中，微弱的需求和有限的运输覆盖面以及企业环境还应具备的其他基础设施方面的条件如教育制度和通讯服务的不完善等等，可能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这些障碍导致了成本一收益率无利可图，并使风险水平和不稳定性太高。

54

把对外贸易视为动力，把出口视为收入增长以及与发展相关的某些结构性变化的源泉，而强调它们的关键作用，并不意味着拉美的经济行为仅仅是作出被动的反应而已。以内部因素为基础的有利供给条件强化了市场反应能力，并将拉美分化成两类区域：第一类地区的出口增长刺激了更为广泛的增长，另一类地区采纳了飞地式的经济结构。完全不考虑这种强化和分化的程度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方面，阿根廷和巴西南部的经历尤为突出。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贸易与资本运动的相互关系（姑且撇开劳动力和企业家人才的国际流动不谈）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有利的内部供给条件本身几乎没有独立于对外部门的运转。在政府政策的帮助下，巴西南部和阿根廷的国内制成品市场得到扩大，从而出现了本地工业的发展。这一制成品市场的扩大与对外部门保持着双重联系：既与相对高的工资水平相联系，这种工资水平与横越重洋的大规模移民有关；又与出口行业的生产功能相联系，这些出口行业所需的大部分技术和管理都能由当地提供。

与此同时，来自修正主义分析倾向的研究，似乎同样指明了：国际贸易之所以能够导致大部分拉美国家所经历过的畸型发展，正是因为社会一经济结构的性质从属于占主导地位的有关国际经济利益集团。生产组织往往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对外部门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部门以外，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比较落

后，但是，如前所述，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还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这是因为，使大多数人口——墨西哥、大部分中美洲、安第斯共和国和巴西东北部——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体系，都往往压低了货币收入，并通过经济剥夺与政治剥夺相结的方式，保护可供出口的剩余和外国人策划的资本积累过程，以免因民众消费水平提高或要求大量社会投资而遭受损失。当然，特权阶级的消费要求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保护是以牺牲物质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形成为代价的。否则，更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本来是可以在本地除对外部门以外的领域促进上述两类资本形成（有几个地区已出现了这种事例）；可是，这种代价对于那些将其财富投入进口奢侈品和半奢侈品、投入出口业和投入与出口部门有关行业的集团来说，并非十分不利，因为，这些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已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然而，与这些为保存既得特权地位的安排相一致的是，那些权贵们一般不会急于将大部分剩余用于全面性的改进和结构改革或结构更新。

国内经济所处的这种从属地位也意味着对外部门采用的本国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是较低的。换言之，对外部门在获取现有生产要素方面享受着有利的投标条件，或至少是以较低的价格获得这些生产要素的，如果国内经济部门蓬勃发展并与外贸及其辅助行业争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话，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在这种盛行的分配体制中，国内部门通过节约资本，使现有的资本供给集中使用于发展出口行业，同时又使劳动力的实际报酬维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上，以致除拉普拉塔河地区和巴西南部以外，供外向型增长中心雇用的劳动力其价格往往相当低廉。在许多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发挥着类似劳动力后备军的作用；这个部门蓄养着一批土著劳动力，在商业性农业（如秘鲁的棉花种植业和危地马拉的咖啡庄园）解雇季节工的农闲期间维持其生计。以同样的方式，农村部门也常常向矿业提供临时工，从而阻碍了一个持久性的农业或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在独立拥有的小片土地和

55

村社土地上经营的小农，以及根据与大庄园达成的各种租佃协议进行耕作的小农，通常也在国内农业市场上发挥着台柱作用，向遍布内地的城镇中心和矿区供应食品，但在稀少的资本供给中并不占有重大份额。关于这一点，小农、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创造的有限的经济剩余中的大部分，通过课税和市场销售渠道结构，可能被吮吸到城镇中心。毋容置疑，小农部门通过社会投资或要素报酬形式得到的回报通常却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传统的观点与依附论的观点对1870－1914年经济史的阐述在有些方面是相同的。由于出口增长的势头不断加强，拉美的这段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拉美一些地区的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尤其是北大西洋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前资本主义形式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拉美许多地区仍然处于显著地位，在有些地方甚至强化了；但是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按它自己的逻辑在所有其他经济成分上覆盖了一层的新的镀金，甚至为了有利于当时正在形成的制度而保持旧生产方式组织的情况下，仍然控制并组织了本国大部分经济的进程。1870年，这些制度尚处于一种形成状态。至1914年，这一新制度已经完全巩固，而且已在创造那些将来迟早会进一步使自身更新的条件。

第 2 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世界大萧条时期的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了根据“外部冲击”为拉丁美洲经济史进行分期的做法。尽管如此，我们若想探讨国际经济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世界大萧条时期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它填补了始于1870年左右的“黄金时期”出口导向增长机制的最终崩溃和20世纪第一个主要的“外部冲击”*之间的缺口。这一阶段还代表着从一种霸权转移到另一种霸权的主要年代：战争加快了英国这个主要经济大国的衰落（其间德国被消灭），而美国则被推上了拉丁美洲主要投资者和贸易伙伴的角色。然而，要对整个拉丁美洲进行概括，即使在它最顺利的时期也是危险的，那么，在它的转变时期就更困难了。变化速度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对变化的理解也有差异；在有些国家，“黄金时期”显然持续到1929年；在有些国家，根本性的变化发生在1914—1929年期间，用“大延缓”来刻划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贴切的；在其他一些国家，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扎下了变化之根。

本章将首先阐述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世界萧条期间变化中的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尔后将探索这些变化对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的影响。结论部分将试图对变化的范围以及这一阶段的长远意义作

* 这里指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萧条。——译者

出评价。我们力求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是如何刺激那些争取变革的内部力量的，以及20年代期间进一步的重要变化是如何受到影响的，而这些重要变化则制约了拉丁美洲对世界大萧条所作出的反应。

世界经济的变化

58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在古典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世界经济是以英国的统治地位和金本位的作用为基础的，但是人们仍然很容易夸大这种重要性。当然，在此之前，这一体系的运转是非常顺利的，尽管其原因尚不明确。这一体系的效率究竟是来自工资和价格的浮动性，从而有利于通货收缩和调节；或来自对竞争中出现巨大悬殊做到了防患于未然；还是来自利率机制的有效性，从而平衡了资本流动？①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仍然很大。但是早在1913年以前，争取变革和威胁到这种和谐的力量已开始不断强大。变化的领域主要有两类。一是贸易和投资结构中业已发生的转变。英国在制成品贸易中的领先作用隐含着这样的因素，即随着贸易集体中其他成员的发展，英国所占比重则不得不下降，它在某些行业的竞争力的减弱更使情况恶化。英国不断衰退的工业日益失去地位，然而，由于英镑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其地位不断加强的作用和海外英镑负债相应扩大的作用，弥补了这一劣势，从而出现了一个充满增长的"幸福晚年"。这是一个"无害赤字"的典型例子。②但是，虽然英国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美国自本世纪开始以来即在贸易和投资中的

① 关于其他观点以及在国际收支的货币理论基础之上的解释的最新综述，参见J·R·策歇尔著《金本位是如何运转的，1880—1913年》，载D·N·麦克洛斯基和J·R·策歇尔合著《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企业与贸易》（伦敦，1981）。还可参见P·H·林德特著《1900—13年的主要货币和黄金》（普林斯顿，1969）。

② 林德特：《主要货币》，第75页。

作用迅速提高：截至1913年，墨西哥、所有中美洲和西语加勒比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甚至秘鲁，从美国的进口业已大于从英国的进口（见表4）——这一点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意味着重要的转变。美国投资的发展也很迅速，如在墨西哥的矿业和铁路、秘鲁的铜矿、智利的硝石、哥伦比亚的香蕉和古巴的糖业，以及一些中美洲国家。第二，变化正在向初级产品不断供过于求和市场波动愈益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趋势既出现在需求方面，又出现在供给方面。在需求一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正在减慢，收入的上升则使食品需求的增长出现相应的低速。在供给方面，技术改革和现代化使生产率不断提高，并且随着生产的进一步资本密集化，在某些方面也提高了供给的短期稳定性。技术改革仅仅使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石油和铜)没有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而技术改革本身却导致了新的需求——到20世纪20年代时，这一因素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在战争中，贸易和投资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快，因为一方面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下降了，此后从未彻底恢复；另一方面，美国得到的出口机会也相应出现变化。美国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在海洋运输非常重要的时代，就澳大利亚等与英国距离遥远的国家而言，美国具有相对优势。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1919年末，美国是一个拥有33亿美元以上净值的长期债权人，而在战前时期，美国则是一个数额同样巨大的净债务人。③ 美国在海外的私人对外投资从1914年的35亿美元上升到1919年的64亿美元。④美国抓住战争提供的一切机会加紧出口，其决心之大反映在它与拉丁美洲贸易迅速增长（见表1）和为此开始发展的基础设施上面，如美国银行力图向海外建行，以及信息大量输入等情况日益

③ D·阿尔德克罗夫特著《从凡尔赛到华尔街——1919—1929年》（伦敦，1977），第239页。

④ C·刘易斯著《国际投资中美国的股本》（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研究所，第75号出版物，华盛顿，1938），第449页。

普遍。双方都出现了供出口商使用的咨询手册，其中拉丁美洲是兴趣的中心。⑤1914年，美国修改了联邦法规，允许美国银行在海外发展分行；1914—1918年，仅美国花旗银行一家就在拉丁美洲设立了12处分行。

战争还刺激了已经出现供过于求危险的许多初级产品，使它们的生产能力继续提高。糖可能是最突出的例子，但许多食品和原料亦非例外，因为欧洲的国内生产暂时中断。

60

表1 1913年、1918年和1927年美国与拉丁美洲的贸易占拉丁美洲对外贸易总值的比重（百分比），

	1913	1918	1927
南美洲			
从美国进口	16.2	25.9	26.8
向美国出口	16.8	34.8	25.2
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			
从美国进口	53.2	75.0	62.9
向美国出口	71.3	73.4	58.4

资料来源：M·温克勒著《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世界和平基金会，波士顿，1929）；詹姆斯·W·威尔基编《统计与国家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拉丁美洲中心《拉丁美洲统计辑要》附录3（1974）。

此外，战争还有许多特定的影响。拉丁美洲同德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突然停止了，从而为美国的迅速发展打开了一个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银行、信贷和货币市场机构的整个体系陷于

⑤ E·菲尔辛格著《向拉丁美洲出口》（纽约，1916）是一个好例子，（并且很有趣）该书长达369页，对经商各个方面提出了详细指导，包括使用广告"影片的价值"的忠告和涉及许多实用的细节，如进入安第斯山需要使用合适的马鞍，并有必要携带"大量防治蚊叮虫咬的外用油膏"。

瘫痪，使拉丁美洲在1913—1914年面临严重的清偿危机和财政恐慌。在整个战争时期，进口货源中断既提供了机会也带来困难，其详细的含义将在后面再探讨。从另一个层次上来看，政府的作用在所有西方各国经济中发生了猝然变化；它出于调节战时经济这种突如其来的需要。民族主义也成为一股更强劲的力量，而且劳工运动也有重要的发展。

随着旧体系陷入混乱和要求变革的力量以多种形式出现（如政府作用的提高），1919年为新思想和试图鉴定及处理潜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问题尚未辨明。战后时期被公认的真知灼见，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有必要恢复旧体制——尤其是恢复金本位，乃至尽可能恢复战前的汇率平价。美国采取了一个旨在再次降低政府作用的强有力步骤：放弃价格控制和任何对贸易及汇率的干预，并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的”“自由”竞争。⑥鉴于战时需求大大受到抑制仓促恢复市场力量的做法尤为草率，结果是1919—22年出现了因管理混乱面造成的繁荣和物价暴跌，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投机性的。⑦在此期间农产品供过于求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自1922年起，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英国正在努力实现通货收缩，试图恢复和维持战前的平价。但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是不稳的，资本流动仅仅起到用纸糊裂缝的暂时作用。重新建立的黄金汇率体系从未出现顺利的运转：中心太多，美国缺乏经验，而且法国和美国又都没有承担使这一新体系发挥作用的义务。此外，短期和浮动的资金不断增

⑥ 见《财政部长关于1919年7月1日—1920年6月30日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华盛顿，1921）第8页：“……现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放弃对银行业和外贸的干预。……财政部反对政府控制外贸，尤其反对私人控制。……他们希望取消政府的控制和干预，恢复个人能动性和企业中的自由竞争，……在公共开支方面实施紧缩经济。……”

⑦ 见W·A·刘易斯著《1919—1939年经济概览》（伦敦，1949）该书对此作了系统和详细的说明。

加，从而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对几种主要货币平价的定值严重失误。而且，美国的顺差如此之大，以致它迫切要求实行鼓励进口和资本输出的政策，以缓解接受国的支付问题。但是，贸易对美国来说并非重要因素，而对英国来说则不然；事实上，施行的政策正好与现实需要背道而驰。美国仍然执行其始于内战时期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它的资本输出政策则为输入国造成了许多严重问题。20年代，由于管理不严美国推销商乘机向政府牟取了大批贷款，对外私人放款盛极一时，大大纵容了借款人不受节制地举债。这些钱往往被用于非生产性目的或进一步增加业已出现供过于求危险的农产品供应。

在这些贷款的帮助下，初级生产的产量继续增长。与此同时，作用于供给和需求上的力量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20世纪20年代是农业技术进步尤为迅速的时期：农业发展步伐有史以来第一次赶上了工业，出现了耕作的机械化和引进了作物新品种和化肥。初级产品市场也出现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替代品损害了硝石和橡胶。这一个十年的价格行为十分复杂，难以回顾，因为继1920年的突发性繁荣之后出现了猝然的价格暴跌，尔后是1925年所有初级产品得到复苏，接着便是许多市场遇到了不均衡的衰退。但这一切是以不利的长期趋势为基础的；至1926—29年，所有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已急剧下降到低于1913年的水平。⑧各种初级产品的数据见表2；从表中可看出：在上升、下降和回升的背景下，对燃料和矿产的需求基本上都很高，对肉类也如此。美国南部的棉花病虫害问题有利于提高对棉花的需求。因为巴西实施了向咖啡提供补贴的稳定价格计划，所以咖啡仅维持在表中所列的水平上：至20年代中期，库存量达到危险的水平，如同小麦和糖那样。锡的低价主要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低成本矿的迅速发展

62

⑧ J·F·罗著《国际贸易中的初级产品》（剑桥，1965）第83页。

表2 1928年部分初级产品的内隐价格指数※

（1913年＝100）

产品	指数
原油	158
铁矿石	142
铜矿石	119
棉花	149
咖啡	137
肉类	129
锡	102
小麦和面粉	104
糖	84
可可	68

资料来源：根据P·L·耶茨著《对外贸易40年：初级产品和不发达国家专题资料统计手册》（伦敦，1959）计算。

* Implicit price indices

造成的。⑨

63 至1928年，不同初级产品市场中的压力和紧张开始出现——小麦的情况尤为显著。因此，世界大萧条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体系中深刻的失衡所造成的结果；但其严重性则被随之出现在美国内部的政策失误大大加剧。在美国的繁荣于1928年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高度时，资本从四面八方被吸引进来；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国际收支问题开始陷入困境，因为资本不再流入，甚至开始朝相反方向流出。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初级产品价格直线下降；由于下降速度快于平均价格水平的下降速度，贸易条件开始不利于初级产品生产者。仅有的一点资本流动停止了。其结果

⑨ 关于原料，见M·T·科普兰著《初级产品革命》（企业调查研究第19号，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马萨诸塞州剑桥，1938）。

众所周知：世界贸易和投资停顿了。欧洲以较快的速度从衰退中复苏——但美国在下一个10年中并没有真正得到复苏。这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世界大萧条的进一步冲击迫使经济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是必要的，但在20年代期间内部力量尚未强大到足以使经济方向发生这种变化。

对拉丁美洲的影响

我们现在首先评论世界贸易和投资结构的变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影响，然后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世界大萧条期间商品市场日益衰落和动荡不定的状态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影响，而当时的拉丁美洲几乎仍然是单一的初级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我们还要就能够对渴求一种新方向的各种迹象作出反应这类更深一层的问题进行考虑，同时评论体制发展以及工业化。

这一阶段中最大的转变是在投资方面：正如表3所示，英国和

表3 1913年和1929年美国和英国投在南美洲的名义资本①

（百万美元）

64

	美国投资		英国投资	
	1913年	1929年	1913年	1929年
阿根廷	40	611	1861	2140
玻利维亚	10	133	2	12
巴西	50	476	1162	1414
智利	15	396	332	390
哥伦比亚	2	260	34	38
厄瓜多尔	10	25	14	23
巴拉圭	3	15	16	18
秘鲁	35	151	133	141
乌拉圭	5	64	240	217
委内瑞拉	3	162	41	29

① 应注意到这一点：完全按国别区分是不可能的。S·G·汉森的《南美洲的法卡尔辛迪加企业》一文（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1937年8月）列举了巴西铁路公司的例子："由美国人注册，加拿大人联合创立，属巴西财产，在伦敦市场上融资，主要由法国和比利时投资者提供资金"。关于更早的阶段，D·C·M·普拉特在其《1870年以前英国在海外的证券投资：某些疑问》一文（载《经济史评论》1980年第33期）中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严重夸大了英国的数字。但相对重要性的变化是本表反映的一个主要方面。

（续表3）美国投资与美国十英国投资总额之比（%）

	1913年	1929年
阿根廷	2.1	22.2
玻利维亚	83.3	91.7
巴西	4.1	39.3
智利	4.3	50.1
哥伦比亚	5.5	88.1
厄瓜多尔	41.7	53.2
巴拉圭	16.7	45.5
秘鲁	20.8	51.7
乌拉圭	2.0	22.8
委内瑞拉	6.8	54.9

资料来源：M·温克勒著《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世界和平基金会，波士顿，1929）。

美国在南美洲的投资资本总额中，美国所占比重在许多情况下都上升了30个百分点以上；当美国投资急剧增加的时候，英国投资几乎没有增加。英国缺乏兴趣、美国人的活力和美国官方的支持在这一重要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尚不明确。1924—1928年期间，拉丁美洲吸收了美国向外国帐户发放的新资本额的24%，获得美国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44%。⑩ 在资本流入额达到高峰的1904—14

⑩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的外国资本》（纽约，1955）第7页。

年期间，美国资本的流入显然超过了英国，即使考虑到价格变动也是如此。

直接投资是两个组成部分中较小的一部分。矿产、石油和公共事业吸收投资的数量最大，尽管一些最大国家的工业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在整个20年代，智利的矿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吸收的美国投资最多。甚至墨西哥也继续吸收外国资金：革命后的几届政府在对待美国财产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不加干预的政策；1917年宪法带来的潜在威胁在20年代中并不十分严重。

直接投资的扩大当然与间接资本流入密切相关。银行的作用愈益重要：至1926年，拉丁美洲共有61家美国银行的分行。[11]美国建筑公司与一些银行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在秘鲁的美国基金会公司。通过这些和那些手段，拉丁美洲政府在20年代获得的外部资金迅速增长。这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推销术盛行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的约束。一个参议员调查委员会发现仅在哥伦比亚就有29个美国金融公司的代表，力求同全国政府和省政府商谈贷款。竞争是不择手段的，贿赂则司空见惯：向古巴总统的女婿提供一个美国银行驻古巴分行中薪俸可观的职位，从而成功地与其他银行展开竞争。这还是比较清白的手法之一。[12]秘鲁总统奥古斯托·莱吉亚（1919—1930年）的儿子如何发财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13]胡安·莱吉亚的最为有名的一举是1927年从纽约投资银行家塞利格曼家族那里获得总额为52万美元的佣金，作为对他帮助他们通过两项巨额外国贷款协议的报酬。

随着投资的上升，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也得到增长(见表4)。美国在战争时期获得的地位在20年代进一步加强，因为她在这一

---

[11] C·W·费尔普斯著《美国银行的对外扩张》（纽约，1927）第211—212页。

[12] 刘易斯著《美国的股本》，第377页。

[13] R·索普、G·伯特伦著《1890—1977年的秘鲁：出口经济的增长和政府》（伦敦，1978）第376页注13。

阶段的富有生气的新产品上具有不断提高的竞争优势（尤其是汽车）。这一点产生了有趣的转换关系和一种潜在的新失衡；阿根廷之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情况。1913年，阿根廷如同巴西那样，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有限；而秘鲁和厄瓜多尔则已经从其北邻那里输入商品和资本了。在20年代中，阿根廷越来越想从美国购进现代农业和其他机器，但仍然与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受到这种关系的掣肘。[14]乌拉圭也同样受到不断依赖于英国的贸易的牵制，因为冷冻牛肉已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15]

66

下面转入商品市场的不利趋势和日益严重的动荡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已经说过，初级产品价格正在对强大的失衡力量作出反应。因此，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出口收益方面的动荡达到了新的高度；1921—22年的繁荣和物价暴跌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动荡，但这种动荡持续到整个20年代。就阿根廷而言，某个作者坚持己见，总是认为1929年的大萧条仅仅是另一个周期而已；[16]对智利来说，有人认为这几年与早期的黄金时期大不相同。[17]古巴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犹如鬼使神差，在劫难逃——1921年的蔗糖业勃兴；此后却发生了大规模破产，外国人接管了甘蔗种植园和银行体系。[18]

67

---

⑭ 关于早期的"三角关系"分析，参见J·福多尔、A·奥康奈尔著《20世纪上半叶的阿根廷与大西洋经济》，载《经济发展》第13期（1973），第13—65页；关于这种关系对巴西的促进作用，参见马塞洛·德派瓦·阿夫雷乌著《20世纪30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英、美国际经济政策的影响》，载罗斯玛丽·索普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世界危机中外围的作用》（伦敦，1984）。

⑮ M·H·J·芬奇著《1870年以来的乌拉圭政治经济》（伦敦，1981）第133页。

⑯ A·奥康奈尔著《陷入萧条的阿根廷：一个开放经济的问题》，载索普编《30年代的拉丁美洲》第188—189页。

⑰ J·G·帕尔马著《从出口导向到进口替代的经济：1914—39年的智利》，载索普编《30年代的拉丁美洲》第50—74页。

⑱ H·C·瓦利奇著《出口经济的货币问题——1914—1947年的古巴经历》（马萨诸塞州，剑桥，1950）第52—53页。

表4 1913年和1927年拉丁美洲从美国、英国的进口占进口总额的比重（%）

	从美国进口		从英国进口	
	1913年	1927年	1913年	1927年
南美洲				
阿根廷	14.7	19.8	31.0	20.7
玻利维亚	7.4	28.8	20.3	19.4
巴西	15.7	28.7	24.5	21.2
智利	16.7	29.7	30.0	18.4
哥伦比亚	26.7	40.0	20.5	12.8
厄瓜多尔	31.9	58.5	29.6	18.4
巴拉圭	6.1	18.6	28.9	11.0
秘鲁	28.8	42.3	26.2	15.8
乌拉圭	12.7	30.3	24.4	15.7
委内瑞拉	39.0	45.9	21.5	13.5
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				
哥斯达黎加	50.4	50.3	15.0	14.9
古巴	53.7	61.8	12.3	4.5
多米尼加共和国	62.9	66.5	7.9	5.6
萨尔瓦多	39.5	46.3	27.2	16.1
危地马拉	50.2	44.1	16.4	9.4
洪都拉斯	67.4	79.8	14.6	7.0
墨西哥	49.7	66.7	13.0	6.5
尼加拉瓜	47.2	66.4	20.0	11.5
巴拿马	54.8	69.0	21.9	9.0

资料来源：M·温克勒著《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世界和平基金会，波士顿，1929）。

表5生动地反映了各国在出口财富比价方面的不同经历：从表中可看出：就出口的实际购买力比价而言，只有4个拉丁美洲国家（他们都是国际上需求量最大的石油和其他一些矿产品的生产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增长率。

使出口诱导增长的"黄金时期"趋于消亡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力

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也是最为明显的力量是需求的提前衰减、或甚至彻底消失。第二种是不断加剧的资源短缺；显而易见，1840年以后的出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的，它将更多的土地、劳动力或其他资源结合进要求生产率稍有提高或无需提高的进程之中。第三个因素是出口构成转向外国拥有的厂家生产的产品，从而将相对少的出口价值返回本国经济。这种出口收益中回收价值的减少不仅放慢了增长率，而且还产生了分配上的紧张。

智利是一个出口崩溃最为严重的例子，其硝石出口的下降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另一方面，咖啡销路继续扩大，但增长缓慢。肉类销路因英国在20年代的缓慢增长而受害非浅；它对乌拉圭的影响大于对阿根廷的影响，因为肉类占前者出口的33%，占后者的15%。但是这两个国家在资源短缺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乌拉圭没有“开放的边疆”，而阿根廷则直到30年代才开始感受到那种限制。在中美洲，对土地利用的竞争开始导致这一阶段的食品进口不断增加，秘鲁也在几年时间内遇到这种情况。在 68 中美洲，这种情况还开始产生一种以外国资本为焦点的紧张局面：如在哥斯达黎加的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了274,000公顷土地，但使用面积仅为20,000公顷。⑲

在1913—28年期间取得成功的4个国家中，墨西哥的状况尤为出众，尽管在进行革命的十年中出现了动乱和破坏。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油、矿产和龙舌兰纤维生产都获得了发展，至1918年，这一生产增长使出口商品的实际购买力的增长速 69 度高于任何一个国家。20年代期间委内瑞拉成绩卓著的出口业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石油，秘鲁——甚至哥伦比亚也在较小程度上得益于石油出口。（至20年代后期，石油已是哥伦比亚的重要出口产品——美国对哥伦比亚石油的兴趣是解决巴拿马运河赔偿问题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将看出：哥伦比亚的大部分成功应

⑲ V·布尔默—托马斯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美洲》，载索普编《30年代的拉丁美洲》第309页注12。

表5 拉丁美洲出口商品的实际购买力，①1917—18年和1928年

（1913＝100）

	1917—1918年平均数	1928年	1923—1925年的主要出口商品③
高增长：②＞每年5％			
委内瑞拉	37	281	铜、石油
哥伦比亚	54	276	咖　啡
墨西哥①	173	251	石油、银
秘　鲁	106	198	石油、棉花
适度增长：每年2—5％			
巴拉圭	96	174	坚木、木材
萨尔瓦多	82	167	咖　啡
巴　西	48	158	咖　啡
阿根廷	60	146	小麦、玉米
危地马拉	34	139	咖啡、香蕉
低／负增长：＜每年1％			
哥斯达黎加	52	118	咖啡、香蕉
古　巴	118	118	糖
智　利	78	108	硝石、铜
尼加拉瓜	43	104	咖啡、香蕉
乌拉圭	87	100	肉类、羊毛
厄瓜多尔	48	93	可　可
玻利维亚	95	82	锡
巴拿马	46	56	香　蕉

资料来源：进口能力。巴西：A·V·维莱拉、W·苏济甘著《1889—1945年巴西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载《巴西经济研究》（里约热内卢应用经济调查协会）1975年第3期；智利：J·G·帕尔马著《1830—1935年智利制造业的增长与结构》（未出版的博士论文，牛津，1979）；阿根廷和墨西哥：拉丁美洲经委会编《1949年拉丁美洲经济概览》（纽约，1951）；其他国家：美元价值引自J·W·威尔基编

《统计与国家政策》（洛杉矶，1974），国际联盟：《国际收支年鉴》，按美国和英国的价格指数的平均数折算。主要出口商品。国际联盟：《1911—25年贸易和国际收支备忘录》（日内瓦，1926）。

① 出口商品和贸易比价的产品数量指数。

② 洪都拉斯的出口状况最好，因此根据数字，洪都拉斯可放入这一组。但是由于香蕉是唯一重要的出口商品，数据必然是不精确的。

③ 以比重的大小排列。比重在10%以下的第二种出口商品未列入。

④ 1910—12年=100，无1913—17年的数据。

归功于它充分利用了巴西自我限制咖啡出口的时机）。但是石油和矿产正好是回收价值相对低下的产品（出口收益中的这一部分回收价值是通过税收、工资、建筑或其他开支而留在国内的），因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具有资本密集型的性质，而且被外国人所拥有。有一个例子——在秘鲁——这个因素的作用在20年代期间大到足以使回收价值的增长率下降到几乎等于零的地步，尽管以美元计值的出口业务活动虽然是正常的。⑳ 与此相反，1913—28年期间阿根廷出口商品的实际购买力增长了46%；这一增长的重要性更大，因为它是以回收价值很高的初级产品为基础的。

在对预示着出口增长“黄金时期”末日来临的外因或内因问题的发展状况进行解释时，我们也指出了一些围绕分配或资源利用问题而出现的冲突或紧张的潜在根源。这似乎是说，以某种形式出现的力量向决策者发出了有必要进行改革的信号，或以某种方式迫使决策者解决这一问题。但正是这一阶段出现的困难却使得一些因素发生作用，压抑或以某种方式减弱了这一信号的强度。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资本流入，尤其是贷款；另一因素是价格行为。

70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外国货币的流入总是惯于与这一阶段的浪费、挪作奢侈浪费之用和行贿等等形影不离，但是在缓解资源

⑳ 索普和伯特伦所著的《1890—1977年的秘鲁》一书第6章估量了20年代秘鲁的出口收益与回收价值之间的差额。

紧张的模式中，外国货币仍然发挥了传统的作用。例如，在哥伦比亚，咖啡和其他产品的发展迫切要求在基础设施中大量投资；如果得不到外国贷款，那就难以看到交通体系和港口设备的发展和改善能够通过别的途径付诸实现，从而不可能有效地到达太平洋和开发所有新地区。但是，在许多其他事例中，同样是在哥伦比亚，滥用资金的情况相当严重，几乎没有受到资金供给紧缺的丝毫影响。古巴铺设一条国家公路是一个典型故事：公路建设一再拖延，人人都有好生意，并且还建造了“装饰性的公园和其他一些点缀门面的东西”等等，直到1亿美元的有价证券被花光——但是公路始终没有完工。㉑ 这类故事不胜枚举。㉒ 不过这些贷款也能有所作为，那就是在短期内维持需求、刺激建筑业繁荣和消除一切关于外汇紧缺迫在眉睫的感觉。在这一进程中，这些贷款为那些在出口部门中缺乏机会的人们提供了投资或投机的良机；否则原则上他们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如保护主义政策，寻求能为他们自己创造赢利机会。

掩盖了现实的第二个因素是国际价格行为。我们已表明：从事后和长远观点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商品的销路正在减弱，价格也呈现出一种长期不利的趋势。但是上述这种动荡在当时的几十年中被大大掩盖了。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价格迅速上涨。进口商品价格也迅速上升，但因进口货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得到，所以出口盈余总是大量积聚；其形式往往是已经出售，但因难以运输而囤积的存货。这些事件之后接着出现的是1920—21年的大肆投机和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繁荣。因此，在1925年或1926年以前，有些商品仍然经历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有利价格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是不平衡的。价格运动掩盖了有时出现的出口

㉑ 刘易斯著《美国的股本》，第384—386页。

㉒ 刘易斯的《美国的股本》一书列举了无数例子。关于玻利维亚，参见M·马什，《在玻利维亚的银行家》（纽约，1928）。

量增长的低速。乌拉圭是一个例子，巴西是另一个例子。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直接用于支撑传统出口部门的政策革新在数量和范围上甚至也是有限的。众所周知和最为重要的例子就是巴西维持咖啡价格的计划。第一个计划可追溯到1906年，20年代实施了一个以提供补贴形式稳定价格的“长期”计划。不幸的是，该计划虽然非常成功地稳定了价格，然而它既没有控制巴西的咖啡种植业（它在20年代期间得到扩大），也没有得到其他咖啡种植园的合作：在1915年至1925年期间，哥伦比亚充分利用这一稳定价格，使咖啡种植面积增加了两倍。有人认为，即使不发生世界性萧条，巴西的行为仍有可能在咖啡市场上导致危机。[23]

在各种部门中采取国家所有制是某种有限的革新措施的另一个领域，这体现了国家的作用对出口部门的需要所作出的反应。这方面的带头人是乌拉圭；在当时的拉丁美洲，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因为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具有非同寻常的个性。他于1903年第一次执政，1903—07年任总统，1911—15年再任总统；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29年去世。对于他的个人观点的相对作用和乌拉圭社会更深一层的力量的相对作用，目前还有严重分歧；乌拉圭社会面对高度城市化的和多得不正常的中等阶级人口，受到疆域狭小和资源匮乏的严重限制和挫折，20年代中这种挫折进一步加剧，因为牛肉价格疲软，并向不利于外国商行的方向发展。在人们眼中，这些外国商行不公正地将较少的好处分配给他人。1928年建立国营冷藏库是答案。该冷藏库是为了与外国公司竞争而设计的，以此来促使政策更符合民族利益。但是，阿根廷的类似行动需要在30年代条件成熟时才能奏效。

对外国人的作用所作出的这种反应似乎是资源的压力日益增

[23] C·M·帕拉埃兹著《1906—1945年巴西咖啡补贴计划的经济分析：理论、政策和衡量》，载帕拉埃兹编《咖啡与经济发展》（圣保罗，1973）。

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一般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并使人们进一步接受国家的作用，这两方面相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如前所述的国际气候的变化作出了反应。这次战争使许多人相信：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可能是不明智的。军人和其他人更为关心对战略部门的民族控制权。与此同时，政府岁入随出口而增长，从而为不受外国利益的 72 控制提供了手段。

然而，外国资本流入的积极作用被看作是防止战时的那种发展或防止资源使用中新的潜在紧张超过冲突的水平；而防止后者的出现一直是外国经济存在的特点。就一般而言，政府乐于欢迎和鼓励新的资本流入，尤其是美国表示出来的新的和充满活力的兴趣——从而限制了出现分配冲突的可能性。当然严重的冲突还是有一些的，乌拉圭即是一例。而且至少在基层一级上还有另外一些冲突；如20年代末哥伦比亚的香蕉业罢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完全可能站在外国资本这一边。

因此，不足为怪的是，这一阶段的大部分体制革新正好出现在为建立秩序和促使拉美国家经济更为“适合”于外国投资而制订的措施方面。这一点在银行和金融领域尤为显著。20年代是凯默勒特使的年代。美国金融专家埃德温·凯默勒博士，被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相继召去帮助进行货币体系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才按照联邦储备的模式普遍建立了中央银行。在体制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20年代的特定背景对这种类型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邀请凯默勒通常是鼓励外国投资战略的一部分，因此改革也就为了这个目的。在鼓励和安排贷款方面，凯默勒本人也很活跃。我们已证明这一阶段中国际范围内公认的智慧怎么成为对恢复至少是一种变通形式的古老的金本位的需要的；这种需要遍及拉丁美洲，并且是要求进行金融改革压力背后的强大动力，而国际金融团体方面则希望为自己在拉丁美洲的不断增强的金融利益确保一种有秩序的气候和兴旺发达。其结果首先是许多

国家将票面价值恢复正常作为一种政策目标，要求将汇率升值：如秘鲁中央银行于1922年出卖了其大部分储备，试图将汇率重新提高到平价；20年代中期筹措大量贷款的明确目标是为了稳定汇率。㉔第二，金汇兑本位制被广泛采用；至1926年初，它在12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中得到确立。㉕这种本位制的运转并不太成功；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并不完善的时候，这种本位制只是一种不成熟的机制；而且它没有考虑以下两点，一是在银行体系中，主要债务人可能是政府；根据传统的处方，政府无法削减其开支；二是私人资本的不稳定性可能同样损害金汇兑本位制的运转。

显然，通过这些改革，进行控制和施加影响的手法得到了发展。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尼加拉瓜——竟达到了美国占领的地步。在南美洲，金融控制的手法不太直接，但远非难以捉摸。为了在1922年得到一笔3300万美元的贷款，玻利维亚不仅被迫将所有关税和一部分直接税作为抵押，并被迫允许由三个成员组成的常驻财政委员会（其中两个成员由外国银行任命），来管理在为期25年的贷款期限内的财政事务。㉖在秘鲁，美国官员管理海关，另有一个美国人管理中央银行。这些例子在这一阶段中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典型的，只有几个最大的国家例外。换言之，与早期的英国人相比，美国的存在更为突出，对控制的兴趣更为露骨。拉丁美洲一方为取得控制权而作出的努力是微弱的：如1928年哥伦比亚确实通过了一个法令，要求省市级政府在今后进一步谈判贷款以前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㉗——但通过这一法令时哥伦比亚已遭受了损失。1927年，秘鲁中央银行总裁去纽约对美国银行提出：正在谈判的这笔贷款数额太大——但他的意见被置之不理。㉘

㉔ 索普和伯特伦著《1890—1977年的秘鲁》，第129页。
㉕ 阿尔德克罗夫特著《从凡尔赛到华尔街》，第151页。
㉖ 马什著《玻利维亚的银行家》，第100页。
㉗ 刘易斯著《美国的股本》，第381页。
㉘ 同上，第380页。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有待我们探索，即工业以及有利于工业增长的发展政策。在研究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时，总能遇到一个最为复杂的问题：在拉丁美洲通过初级产品而被强有力地结合进这个体系的一段期间内，新出现的国内团体和政策基础在增长机制衰退的时候是如何逐渐发展——或没有发展的，从而为另一种可采纳的政策提供基础。

74

显然，鉴于这一阶段的国际经济和国内事件提供了一些性质混乱的信号，出现了例如激进的并前后一贯的方向性变化，以及走向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但就工业而言，有些发展却是重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直接影响是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英国银行和贴现商行迫于来自伦敦方面的压力，开始收回贷款和削减放款；首先出现的最为显著的结果是恐慌和流动资金短缺。但是至1915年，出口开始急剧增加，贸易出现了巨额顺差。进口商品价格随国际通货膨胀而大幅度上升，国内物价稍后才随之上升。因此，在需求扩张的时期，保护性作用十分强大。这是一个少见的非常时期。但问题出现在供应方面：显而易见，来自欧洲的正常的资本货来源已不复存在。

下面来谈谈这几种相持不下的对立论点是如何引起学术著作不同寻常地集中讨论这个问题的——不确切的数据则促使更多的著作问世。早期的观点源自塞尔索·富尔塔多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著作，这种观点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拉丁美洲工业的增长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刺激。这些论点首先在关于巴西的问题上受到了华伦·迪安的挑战，此后又受到了其他一些作者的挑战。㉒实际上迪安认为：大战中断了一个相当令人难忘的增长进程。此后出现的一些谨慎的著作得出结论：在大战期

㉒ 华伦·迪安著《1880—1945年圣保罗的工业化》（奥斯汀，1969）。关于此后对巴西工业化的争论，参见《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的书目评论第2节。

间，巴西出现了产值增长（早期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出口数据不同的加权处理），但产值增长是以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生产能力为基础的。换言之，大战期间并不是一次大的间断，而已在运行中的一次发展却是它的基础。

有人认为，大战也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刺激小规模修理车间扩大其活动的必要性，从而为刚出现的资本货部门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种似乎能自圆其说的观点强调生产能力增长阶段（在进口货既便宜又能得到的时期）会取代产值快速增长阶段（在进口货昂贵和或得不到的时期）的长期趋势。因 75 此，对于在战前就已拥有工业基础和生产能力的巴西等国家来说，人们似乎都同意这一点，即大战使产值获得了一定的增长——每年约8%或9%。这一观点也适用于智利和乌拉圭。

表6 来自英国和美国的进口，1912—20年（1913年价格）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秘鲁
1912年来自英国的进口在来自英美两国进口中的比重（%）	66	60	66	51	54
来自美英两国的进口指数（1912年＝100）					
1913	108	97	100	115	115
1914	64	52	69	83	85
1915	63	52	54	94	78
1916	68	57	32	139	112
1917	59	52	95	76	123
1918	57	45	101	55	103
1919	72	70	73	105	121
1920	90	90	74	229	192

资料来源：R·索普、G·伯特伦著《1890—1977年的秘鲁：开放经济中的增长和政策》（伦敦，1978）第128页。

注：表中所列数据已按美国和英国的出口价格或批发价格指数折算。

但是，其他国家与别的进口来源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如与美国和日本（与后者则远不如与前者密切）。如表6所示，秘鲁和哥伦比亚等西海岸国家与美国已建立了重要的贸易联系；在战争中，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联系——与其他国家（如巴西）相比，西海岸国家的促进进口替代的刺激相应减弱。这一情况也同样适合于墨西哥，但这个国家的内部动乱重于其他因素。尽管有些看法是令人感兴趣的，但仅就短期而言，革命也并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经济灾难，[30]不过，制造业直到1920年才恢复到1910年的水平。就国家幅员之大，过去工业基础较为雄厚以及与美国的联系相对疏远等条件而言，阿根廷的例子可能是令人惊异的。为什么截至1918年它的生产仅比1914年的水平高出9%，似乎可以用大战初期存货大量囤积以及国内需求增长缓慢来加以解释。[31]最小的国家，如中美洲各国，并不能视战争为良机；这些国家的权贵人士通常被描述成仅仅等待动乱结束，全心全意地回复到出口模式。 76

在20年代期间，我们可再次发现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力量以及在解释方面产生的大量歧义和困难。在影响工业增长的许多直接经济变量中，我们应首先考虑需求，其次是相对价格，因为这些价格来自包括汇率、关税、非关税限制和与国内价格相对的国际价格水平的运动在内的综合作用。这一阶段的需求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工业家一般仍将其处境依赖于出口部门的增长。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凡在出口增长（或至少回收价值）逐渐消失的地方，总能在靠外国贷款刺激而增强活动以及随之兴起的建筑繁荣方面得到一些补偿。在乌拉圭，这种补偿未曾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深思熟虑的“巴特列主义”的再分配政策。在巴西，1924—

---

[30] 参见J·沃马克著《1910—1920年墨西哥革命时期的经济：史料编纂和分析》，载《马克思主义展望》，1/4（1978）。

[31] 拉美经委会编《经济发展分析和计划；V：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墨西哥，1959）

25年的限制性货币政策尤其阻碍了纺织业的增长，这一政策遭到了工业家和出口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至于汇率，我们已看到这一阶段的思想——恢复金本位的愿望、凯默勒的影响和总的正统金融政策——是如何导致汇率升值并且打击工业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俟战争结束，就出现了一种减轻通货膨胀对关税制度的灾难性影响的趋势；因为这种税制严重依赖于“从量”税，即按一定单位的量计征，从而在价格上升时收益容易受到损失。图表Ⅰ试图说明4个主要拉美国家中关税在进口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水平，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下述的这种迹象是难以解释的：即对某几种商品实行保护如果十分成功的话，当然会导致关税收入的下降。“有效的保护”可能是最为确切的标帜，因为它考虑到了生产者在进口投入时获得的免税的影响以及在最终销售水平上的保护，然而，“有效的保护”并不普遍也不可靠。即使有的话也仍然面临着衡量的困难（“世界价格”和投入—产出关系必须得到确定），因此可以说，如同名义保护那样，“有效的保护”也不是
77 一种可靠的衡量手段。

我们尽可能地对这种迹象加以解释，似乎有理由说：20年代中保护的增加总的说来并没有抵销前一阶段的下降，因此这一阶段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软弱的保护主义。在巴西，尤其是纺织业，深受不断加剧的竞争的打击；这种竞争来自国际价格趋势与升值的综合作用。关税的增加并不足以弥补纺织业所受的损失。阿根廷执行的一般性保护主义政策未能将关税的征税范围提高到战前的水平。有一篇论文对秘鲁进行了精心的评估，这是研究文献中充分考虑到了非关税措施，如政府的垄断以及政府力图使提高关税的有利影响与汇率升值的不利影响保持平衡，消除差额等情况
78 的唯一的一篇。[32] 有人认为，1923年以后发生的变革的积极作用

---

[32] C·博洛尼亚著《1880—1980年秘鲁的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1981），他的研究不同于一些早期的分析，如索普和伯特伦著《1890—1977年的秘鲁》。

确实弥补了此前出现的损失。在智利，在20年代末的伊瓦涅斯执政时期，改革确实使关税的征税范围提高到本世纪初已取得的水平以上。但汇率再次沿着反方向发展。（有趣的是，有人表明：在哥伦比亚，凯默勒并没有努力降低关税，其原因是他意识到汇率政策正在损害任何潜在的保护性作用。[33]）在智利，这些政策最终取得了一种积极的保护性效果；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乌拉圭。

前后一致的工业政策显然从未出现过。许多人都接受这一观点，甚至那些认为表明保护加强的迹象十分可信的作者也接受这一观点；即使在保护主义最强烈的国家——巴特列——奥多涅斯执政时期的乌拉圭，这种工业政策也从未出现过。税率的上升通常是个别的小规模谈判的结果（而且正是因为这些谈判是个别的小规模，因此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在今天被看作是工业化政策的组成部分的许多要素（涉及信贷、劳动力培训和技术等等），在当时却完全没有。因此毫不奇怪，我们可以将后来出现的许多问题追溯到这一阶段，因为国际技术的高、尖、精程度快速上升，而且当时的潮流就是接受外国的东西。现代技术被一位当代的评论家描述成“通过简单的模仿即可采纳，不必分享其精华，只要使用在其他国家中发明的工序的结果即可。不存在进行革新和改善的愿望”。[34]还有一点可能值得提及，作为说明工业缺乏吸引力的间接证据：输出本国资本。在外国资本源源而来的时候，国内资本就会流向其他地方；不过这一问题尚需更多的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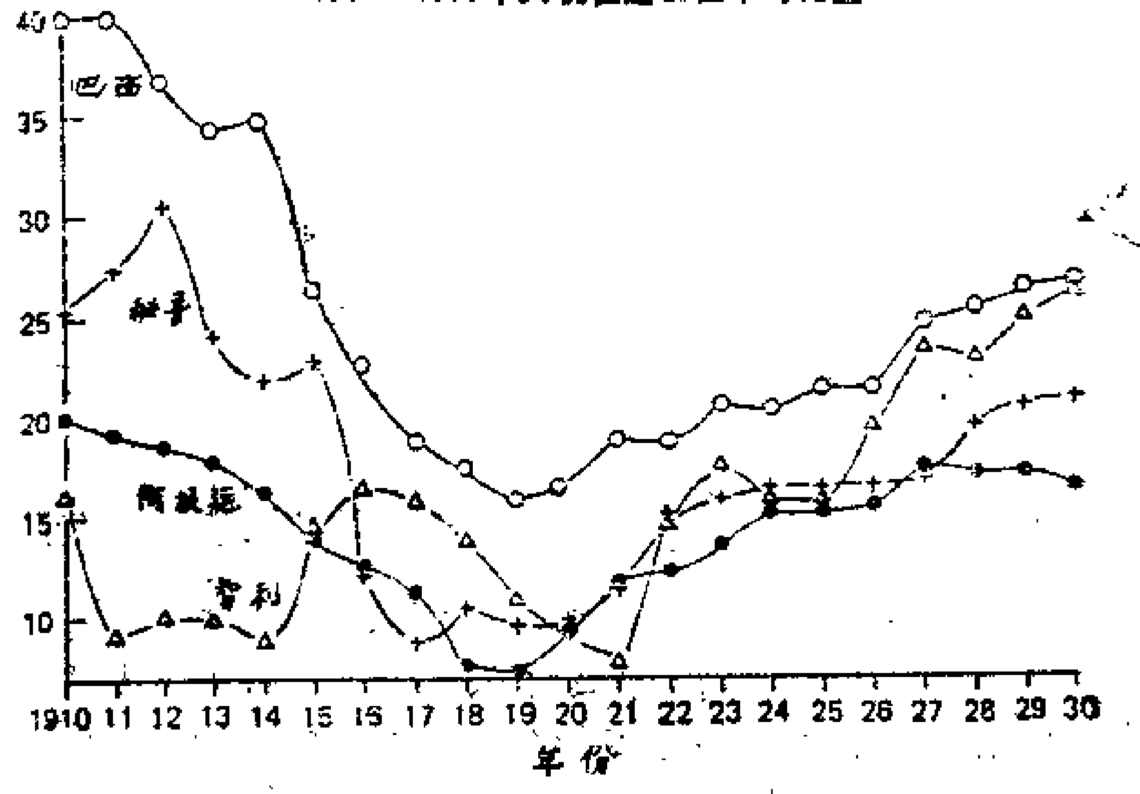
基于上述分析，源于大战期间的巴西和智利的工业增长在20年代不断放慢也就不足为怪了。巴西的纺织部门受到相对价格劣势的严重打击后停滞不前，而其他部门的境况略为好一些。但是，

[33] M·帕拉西奥斯著《1850—197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业：经济、社会与政治史》（波哥大，1979）第292页。

[34] 引自J·G·帕尔马著《1830—1935年智利制造业的增长与结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1979）第307页。



1910—1930年关税在进口值中的比重



进口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C·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编《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纽黑文，1970）；A·V·维莱拉、W·苏济甘著《1889—1945年巴西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载《巴西经济研究》（里约热内卢，应用经济调查协会，1975）；C·汉默德著《1830—1930年智利的政治经济》，载《经济研究》（圣地亚哥），1974年第3期；《秘鲁资料摘要》（利马）。

这一阶段的生产能力却得到大幅度增长。在智利，1918—1929年期间工业实际增长率为每年1.9%，而1913—1918年期间为9%。[55]在秘鲁，工业增长几乎没有：出口收益中的回收价值有减无增，徘徊不前，加之不利的比价趋势回升乏力，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这一切使工业部门的增长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阿根廷是例外，它的出口状况可能是最佳之一，但在大战期间工业部门根本没有增长。“赶上去”以及旺盛的需求使工业在1917—1929年每

79

[55] 同[54]，附录第47页。

年增长了8%。[30]哥伦比亚也获得相当快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前的工业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

这种缺乏前后一致的工业政策的情况甚至在大国经济业已到达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全相同。除此以外根本不再有任何基础。常常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出口权贵占优势的国家是如何设法保住他们获得的保护程度的。这一点似乎来自于这一事实：出口商往往喜欢对进口货课以关税，而不愿意对他们自己征税，虽然从长期来说这种态度可能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地位。有人把这一解释用于巴西和智利。事实上，工业并非永远被看作是这样一种威胁：在智利，传统的农业集团发觉他们的出口市场日益萎缩，因此就不断地转向国内市场。在巴西，工业使用那些在海外没有广大市场的产品，而且企业联合和连锁董事会促进了利益的融合。具有小规模性质的关税改革同样发挥了促进作用。这种复合的程度和利益的融合既使保护的程度继续深化，又抑制了一种工业"意识"明确地显现出来。

结　　论

那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世界大萧条时期的重要性究竟是什么？这一阶段是否具有与此前40年（即所谓"黄金时期"）不同的特点？我们的论证已表明，答案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本阶段的国际经济是如此不健康，而且还因为这种差别大大改变了我们对拉丁美洲受世界大萧条影响的评价。我们已说明出口导向模式中的某些方面在20年代期间是如何出现衰弱和紧张的。这种模式似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好地满足了该大陆的需要，至少在增长方面是这样。这些问题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后来导致世界大萧

[30] 卡洛斯·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纽黑文，:970）第52页。

条的那些力量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问题又与资源短缺和分配问题有关。事实上，早在1929年以前，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就已产生出一种减速，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1928年后，阿根廷的小麦市场萎缩；同年还出现了对美国经济繁荣作出反应的资本外流，国际收支进一步受到打击。许多国家的这种资本外流量相当大。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都有触动，而且其影响可能更为广泛。其他出口部门也在1929年以前出现了衰落：我们已援引了秘鲁出口收益中的回收价值徘徊不前的事例；中美洲在1926年后经历了一个衰退；墨西哥也不例外，紧缩性的内部政策使问题更为严重。哥伦比亚同样受到了外国资本纠纷的影响。忽视所有这一切必将夸大1929年大萧条的突发性。

但这并不是说战后时期可以简单地被融合在大萧条以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有一种趋势总是把大战看作是有利于促进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就整体而言，大战提供的许多机会在20年代几乎没有被利用；而确实出现的一些变化却导致了新的形式的脆弱和外部控制。

这种有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这一明显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外部冲击，它造成了出口的增长；即使在今天，这一点仍然是符合实际的：不断扩大的出口很可能会侵蚀民族发展的动力。进而言之，大战的主要意义是加快了英国的衰落，并将德国这个贸易和投资伙伴排除在外：这一切提供给拉丁美洲的机会却因拉丁美洲处在美国的卵翼下而大大减少，而美国则随时随地将贸易和投资机会占为已有。（我们已看到：总的说来，这种影响的力量在程度上大大超过了此前与美国结为一体的特定影响——除了某些例外）。可见，在旧的联系被削弱的时候，新的联系得以形成，并往往具有更强烈、当然也更明显的依附和控制性质。这就使如何对1929年大萧条作出抉择受到了制约。

尽管如同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出口模式中已出现了紧张和衰弱的先兆，但是，在主要经济集团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完全不同于

外国人的利益以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强烈的信号。此外，在一定意义上，大战期间出现的变化是不成熟的，此前工业部门的扩大和中等阶级或其他集团的发展都缺乏必要的基础，而中等阶级和其他集团则意图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工业增长紧密相连。由于这两种原因，在要求变革的各种力量还不能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对真正可行的政策作出抉择以前，拉丁美洲只有坐待大萧条的到来。

然而，这个延缓期在解释下述问题方面却有关键意义：在大萧条到来的时候，尽管其严重性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拉丁美洲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得到复苏？在有些例子中，尤其是巴西和哥伦比亚，这一复苏甚至早于出口的任何回升。1929年以后的工业增长速度是惊人的。[37] 这就再一次表明，过高地把1929年视作一个转折点是多么错误；1929年的萧条是此前15年中所有业已发生的——或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结局，并且成为此后一切事情的基础。

[37] 参见索普主编《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一书中的各篇论文。

第 3 章

83

1830—1930年的拉丁美洲、美国与欧洲列强

拉丁美洲独立后的英美竞争

1830年，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国际竞争与强权政治的世界之中。欧洲列强，特别是曾在拉美独立斗争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英国，直到20世纪仍继续在拉美政治与经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英国对独立后的巴西、拉普拉塔地区、智利、中美洲及墨西哥特别关注。其次，法国对拉普拉塔地区和墨西哥也感兴趣。与此同时，加勒比海依然犹如在欧洲统治下的一个湖泊，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在此拥有很多殖民地岛屿。

1830年到1890年期间，欧洲列强多次以不同程度的军事方式直接干涉西半球。有些干涉是为了保持影响，其方式是援助拉美友好国家同敌对的邻国相抗衡，有些干涉是为了保护侨民免受拉美政府虐待。1836年到1850年期间英法对拉普拉塔地区的多次干涉，上述情况兼而有之。其中有两次，即1836年法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封锁，以及1845年英法联合封锁均持续了两年半。阿根廷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是引起干涉的主要原因，他对外国企业和对邻国乌拉圭和巴西都怀有敌意。

根据19世纪公认的国际惯例，大国有权保护其海外公民生命

84 及其财产，并推行所谓文明的行为准则。后者包括从禁止横渡大

西洋的奴隶贸易直到惩罚那些袭击外国人或干涉国际贸易的人。外国侨民的索赔要求引起了几次干涉。1838年4月，由于墨西哥拒付60万比索的各类赔偿费，法国人随之封锁了韦拉克鲁斯港。由于其中一笔800比索的赔偿案是因法国侨民开设的糕饼店遭到墨西哥军官袭击受损而提出的，"糕饼战争"因而得名。法国海军炮轰了圣胡安德乌卢河要塞，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但只对索赔问题重新进行了谈判，并未赔款。更为严重的是，1861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进行干涉，使用武力索取约8000万比索的债款和赔偿。法国的拿破仑三世不仅仅是索债，而怀有更大的野心，他派部队登陆并立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此后，英国和西班牙退出了这次行动。在34,000名法国正规军和外籍军团驻守期间，这个傀儡政权得以苟延。由于美国北方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可以腾出大量军队调往国外，而且法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纠纷不断加剧，拿破仑三世认识到在美洲复兴法兰西帝国之举过于冒险。1867年法军撤离墨西哥后，马克西米利安也被枪决，卡洛塔皇后则进了疯人院。

在美国内战期间，西班牙试图重温它在西半球的帝国旧梦。1861年西班牙控制了圣多明各，一直到1865年为止。1863年西班牙还攻占了秘鲁沿海的钦查群岛以抵偿西班牙公民的索赔要求。西班牙人开采、销售鸟粪，其间与智利进行了海战，智利同它的对手秘鲁，后来又同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组成统一战线对付宿敌。1866年西班牙舰队炮击了卡亚俄和瓦尔帕莱索。在以后30年期间，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丹麦和俄国为欧洲侨民的索赔要求而进行的小规模干涉，或武力威胁至少有16次之多，涉及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圣多明各和海地。

美国也逐渐卷入西半球的国际竞争，过去许多年来它对欧洲在这一地区的作用至少基本上是漠然置之。在拉美独立之时，美国政策是阻止恢复经济重商主义和政治独裁的殖民地旧秩序。正如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在1823年5月所指出的，美国政策的

目的应该是“挫败欧洲人在谈判中极力想达到的企图，这种企图，毫无疑问，就是要继续推行他们的君主政体与垄断计划”。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亚当斯希望与新成立的共和国以“独立、互惠和互利等开明和自由的原则”为基础，谈判签订条约。①1823年12月门罗总统的声明，是对“美洲体系”的一种设想，它不仅基于自由经济原则，而还以于公民自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为基础。在实践中，遭到国际强权政治的冲击时，这些理想可能会被修改、甚至歪曲。总之，门罗主义只是对未来希望的一篇宣言，而非直接的行动计划。长期以来，美国对拉美的卷入受制于它担心陷入同英国或法国的战争，受制于它专心致力于国内政治和解决国内冲突，也受制于有限的军事能力。

19世纪40年代中期，美、英之间在墨西哥的角逐突然加剧了。1836年得克萨斯省脱离墨西哥后，英国代理人在那里十分活跃，并鼓动得克萨斯人不要加入美国。1844年英国代办劝说墨西哥政府承认得克萨斯独立，如果后者同意继续保持独立的话。由于得克萨斯政府愿意并入美国，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于是爆发了战争。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总统为并吞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辩解的理由之一就是英国（后来还有法国）正试图以敌视美国的手段施加影响。按照美国扩张主义者的想法，得克萨斯与太平洋之间大片的领土大部份还没有人居住和未被管辖，这就为欧洲人的野心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因此，如果美国不把它并入合众国，那就违反了美国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命运天定”（Manifest Destiny）之说。

当美墨战争（1846—1848年）结束时，加勒比却成了与英国对峙的地区。1839年，一个英国皇家代理人占据了鲁阿坦岛（洪都拉斯北部沿海），1843年，英国政府恢复了对尼加拉瓜和洪都

86

① 沃尔特·拉费贝尔编《约翰·昆西·亚当斯和美洲大陆帝国》（芝加哥，1965）第123页。

拉斯东海岸莫斯基托印第安人的保护制度。与此同时，向太平洋扩张的前景引起了美国对中美洲的兴趣。穿越中美洲的运输通道是美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1846年美国与新格林纳达（哥伦比亚）就比德拉克条约进行了谈判。英国和法国拒绝了哥伦比亚提出的巴拿马地峡国际中立化的建议。比德拉克条约保证美国公民与新格林纳达公民享有同等通行权，而美国则保证地峡的中立地位以维护自由通行。此外，美国还保证新格林纳达对该地区享有主权。1848年英国占领了位于圣胡安河口的圣胡安城以巩固它对莫斯基托的保护制度；该城再次被命名为格雷敦。而后，1849年10月一名英国海军官员占据了丰塞卡湾内的蒂格雷岛。英国政府否认了这次行动，但是随之而来的美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却使双方进行了谈判。1850年4月19日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其中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对中美洲任何地区进行“占领”、“殖民”或行使“管辖权”。该条约还规定，如果开凿运河，任何一方不得对运河设防或实行专属管辖。

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最初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英国人辩解说，条约是肯定了现状，而美国人则认为英国应根据条约放弃控制，特别是对莫斯基托海岸的控制。1852年英国政府将鲁阿坦及其毗连岛屿合并成为海湾群岛*殖民地，美国则谴责这是背信弃义。1854年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炮击了格雷敦为一名外交官遭暴徒袭击事件进行报复，此后，即传开了将要爆发战争的流言。实际上中美洲并不是英国利益的重点地区，克里米亚战争已经使英国无暇他顾。待气氛缓和后，双方于1856年签订了另一个条约，英国同意放弃对莫斯基托的保护制度，并且把海湾群岛割让给洪都拉斯。由于在次要问题上有保留，美国拒绝批准该条约，但英国则根据条约规定着手解决中美洲问题。除了伯利兹外，英国放弃了其他一切要求，伯利兹于1862年成为英国殖民

---

* 海湾群岛（Bay Islands），即今巴伊亚群岛——译者

地，改称英属洪都拉斯。英国官员当时曾私下表示，今后美国将是这一地区的主宰。然而，实际上大约在40年后，美国才起了这个作用。

詹姆斯·布坎南总统（1857—1861执政）认为美国应该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担当警察任务以保证混乱的状况不至威胁到外国侨民或者中美洲的运输通道。他辩解说，美国必须这样做，否则欧洲列强就会进行干涉。他要求享有使用武装力量的权力以进行这类干涉，但遭到国会否决。西奥多·罗斯福以对门罗主义的引申为理由提出美国享有在加勒比地区行使警察权力的主张，那已几乎是五十年后的事了。

在19世纪下半叶，许多拉美国家要求美国的保护。1857年，尼加拉瓜签署了一个保护条约，但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1868到1892年期间，圣多明各至少三次表示愿意出租或者割让一个海军基地（甚至该国本身）给美国。这些建议均被拒绝，同样，海地的类似建议也被拒绝。拉美国家与欧洲国家之间因索债引起的纠纷也要求美国予以调解。

1878年，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取得了开凿地峡运河的权力。美国政府表示反对，但未奏效。从那时起，美国国内要求美国在加勒比—中美洲地区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的压力加强了。美国海军前往地峡进行了考查，1880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敦促废除克莱顿—布尔沃条约。1884年，国务卿弗雷德里克·弗里林海森就签订一项运河条约同尼加拉瓜进行了谈判，其中规定美尼共同拥有一条运河。该条约将单方面废除美英1850年的条约，但参议院以5票之差未能通过。

1881年，国务卿詹姆斯·G·布莱恩试图让美国在拉美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美国政府就召开美洲国际会议发出邀请，但布莱恩国务卿却由于政治原因而辞职。他的后任弗里林海森取消了这次会议，尽管有好几个拉美国家接受了邀请。布莱恩本来希望这次会议为西半球建立一种促进和平与稳定的体系，这种情况将

有助于美国向欧洲经济霸权进行挑战。

大多数拉美国家不仅依赖欧洲的市场，而且指望欧洲政府提供经费并为经济发展计划提供资金。在19世纪2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投资繁荣时期，但大多数企业不是破产倒闭就是被清理停业。在60年代以后另一个大规模投资开始了，大多数资金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尽管有些波动，英国投资从1870年的8,500万英镑增加到1914年的约7.5亿英镑（37亿美元）。1914年时，法国投资将近60亿法郎（12亿美元），而德国投资是38亿马克（约9亿美元）。英国投资大多投入铁路建设、采矿业（智利硝石）和制造业（拉普拉塔地区的肉类工业）。法国投资投向铁路及不动产、银行、采矿和制造业。而德国人则对抵押银行和种植园（特别是中美洲的种植园）更有兴趣。

19世纪后期美国投资者开始注意南方；特别是古巴和墨西哥。但是，美国资本在1900年以后才开始大量流入，而欧洲资本甚至在进入20世纪后仍继续居于统治地位（特别在南美洲）。美国企业家利用欧洲的资金为经济发展作出了一些贡献。例如，亨利·梅格斯和迈纳·C·基思在秘鲁和中美洲建筑铁路。基思还在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开始大规模种植香蕉。

19世纪末的美国与拉丁美洲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欧洲列强之间竞争日益尖锐。非洲已经瓜分完毕，最后瓜分亚洲的角逐也在进行。对许多有识之士来说，控制世界领土、资源和市场的竞争，看来确已进入最后阶段。各国对文明和基督教使命的各种不同观念又促使这种竞争越演越烈。商业竞争，甚至在非殖民地地区的商业竞争，日益激烈，是与国家权势至上的霸权观念密切相关的，并因这种观念而加强。美国领导人由于担心落后和被排除在市场竞争之外，竭尽全力改善自已国家的销售地位。在本国实行保护主义和在国外

采用特殊的片面经济措施（特别是排斥第三方的商业协定）是其特点。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对外贸易就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被视为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一个部门。19世纪末美国人日益认识到，新的霸权世界秩序对他们出口贸易的威胁。例如，1880年美国来自拉美的进口货值为1.76亿美元，而出口仅有5,800万美元。从而美国似乎比它自己的所谓后院还要落后。当美国人感到他们一度繁荣的商船业衰退时，这种忧虑更无以复加了。1850年，美国商船的装载吨数占美国各港口总吨数的50%以上；而1900年，却猛降到只占17%。美国越来越多的有影响的人士和政界领导人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必须重新制订对外政策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有效地面对霸权竞争提出的挑战。国外和国内商务局官员弗雷德里克·B·埃默里在他1898年的报告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这种新的忧虑：

> 可以说，今日欧洲外交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其“势力范围”和扩大其贸易机会，以及通过从人口较多的国家向外移民占领相应的领土……。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与此几乎同等重要必须予以考虑的经济性问题。因为，与此同时，比较活跃的商业国正在计划不断扩大它们在拉美市场的贸易份额，这对我们的影响甚至更加严重，将有损于我们同西半球南半部商业关系的发展。②

詹姆斯·G·布莱恩是明确吐露了这种想法和忧虑最早的人士之一。他认为西半球的和平关系、调解争端、消除欧洲的影响和美国出口贸易的增长等等都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虽然他的第一次努力即召集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以实现这些目标，是失败了。但是，他关于西半球关系问题以及美国政府必须发挥更大

② 费雷德里克·埃默里著《1846和1897年期间美国的商务关系》（华盛顿，1898）I，第19—22页。

作用的看法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却受到了支持。1888年5月美国国会要求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为举行美洲国家会议发出邀请。由于1888年总统竞选中共和党获胜取代了民主党，布莱恩再次出任国务卿，并于1889年在华盛顿召开并主持了美洲国家会议。

在拉丁美洲代表们尚未安顿下来举行会议之前，美国政府为代表们精心安排了一次通过美国工业地区的火车观光旅行。他们访问了41个城市，参观了工厂和显示美国技术成就的展览，并聆听了无数次演说和吹奏乐。英国《旁观者》杂志评论说，安排这次旅行旨在引起对一个国家的敬佩感，"它把6000英里的一次火车旅行作为一次接待来安排，精力旺盛令人可畏"。③ 无疑，安排这次观光旅行和会议，其目的显然是促使拉美国家依靠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领导，而不要去指望欧洲。

1889年11月再次举行会议，并由布莱恩提出了建立西半球关税联盟以及为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仲裁的措施。阿根廷带头反对前一个提案，而智利由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了重要的领土，又反对了后一个提案。关税联盟提案没有通过；经过妥协后拟订的一项有关仲裁的条约，只有11国赞成（但均未批准）。然而，会议决定建立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及其常设机构美洲共和国家商务局，后者受权收集和传递有关关税和商业规章等情报资料。

布莱恩想像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美洲国家体系陷入了神话的泥淖，他认为有可能建立一种真正的西半球利益共同体，而且在美国领导下就能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在20世纪，布莱恩的许多继承者都试图制订各种政策以建立一种体系来解决美洲国家关系中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问题。由于泛美协调一致的种种宣言根本不能解决某些基本利益冲突，他们所作的努力成效有限。

---

③ 引自托马斯·A·贝利著《美国人民外交史》（第9版，纽约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4）第408页。

况且，许多拉美国家领导人采取了他们各自的对西半球特定的关系的不同看法试图把理想主义的国际行为标准强加于美国。他们的这些努力，效果也不怎么样。

1889年的美洲国家会议（会上美国并没有被各国推举为西半球公认的领导者）丝毫没有缓和美国对欧洲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的重重忧虑和日益增长的商业竞争意识。美国必须在拉美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赢得更高的威望的那种信念，是促使美国同智利（1891—1892）以及同英国（1895）之间出现两次危机的思想基础。在这两次事件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届政府，所作出的反应都带有出自国际竞争紧迫感的一种民族主义感情色彩的姿态。美国对于西半球问题的看法开始带有一种“危机感”的特点。

智利危机起因于1891年10月的一次事件中，美国军舰巴尔的摩号的120名水兵，在瓦尔帕莱索上岸度假时遭到袭击。其中两名死亡，17名受伤，其余的被殴打并被逮捕入狱。根据调查证实，智利警方参与了这次袭击。通过革命掌权的智利新政府由于美国按照正常外交方式支持前政府（巴尔马塞达政府），而采取敌视态度。智利官员并未表示道歉，他们在初次外交磋商中态度暧昧并对本杰明·哈里森总统有所批评。当一名死难水兵的遗体郑重其事地停放在费城独立宫中时，战争热蔓延到美国全国各地。1892年1月哈里森向智利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由于连同发表总统致国会的特别咨文而加强了效果。智利的新外交部长向美国作了满意的道歉并为死难伤员作出了赔偿。在国家尊严的大肆渲染之下，哈里森实际上宣布了美国在西半球是一个大国，必须受到与英国同等的待遇。美国的国徽必须受到尊重，其官方代表不得遭到虐待，否则，蓄意进行侮辱的国家必须予以追究。就智利方面来说，当时则越来越指望得到德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起因于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殖民地之间长期的边界争议。多年来委内瑞拉当局就企图拉拢美国进行强制仲裁。1887年英国拒绝了美国的调解。1894年委内

瑞拉人雇用了美国前外交官威廉·L·斯克鲁格斯，做为说客，他撰写的一本题为《英国侵略委内瑞拉，或者说，门罗主义正在受到审判》的小册子广为流传。由于他的几分努力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决议案，敦促通过仲裁解决这一争端，最后并经两院一致通过。

1895年4月当英国占尼加拉瓜科林托，并接管了海关使用武力索取英国公民财产损失的赔偿费时，担心欧洲在西半球扩大影响和势力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在英尼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以后，英国部队撤退了，但是许多美国人认为，这次事件更加证明门罗主义是不起作用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在他向《北美评论》杂志投稿中，把尼加拉瓜、委内瑞拉边界争端的形势和对欧洲的霸权扩张的忧虑联系在一起，举例说明了这种危机感：

> 如果允许英国占领尼加拉瓜的港口，更糟的是，如果允许它占领委内瑞拉的领土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办法阻止它占领整个委内瑞拉或者南美洲其它任何国家。倘若让英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法国和德国也将步其后尘。④

在1895年7月20日给英国政府的一份照会中，理查德·奥尔尼国务卿对于通过“地理上的接近……自然的同情心……同类性质的政府”等纽带而与美国结盟的西半球景象，作了夸大的表述。国务卿在照会中指出，联盟根据门罗主义对西半球所有国家予以保护。奥尔尼强调，美国“有权”要求委内瑞拉边界争端予以仲裁，并作出如下的著名声明：“今天美国实际上在本大陆拥有最高权力，对于由美国调停的那些对象国来说，美国的命令就是法律”。

11月末，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一份复照中对奥尔尼关于美国权力所下的过于夸大的定义作了回答，这个答复几乎

④ 《北美评论》，160（1895年6月）第658页。

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索尔兹伯里纠正了奥尔尼所犯的历史性错误，给他上了一堂关于国际法和门罗主义的课，并且断然拒绝了他提出仲裁的要求。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极为愤怒，因此向国会申请了专款成立了一个边界调查委员会。国会兴高彩烈地通过克利夫兰关于由美国单方面划定边界和不顾英国政策而强制执行的建议。

93 两国都盛传关于战争的流言，但英国由于前有南非的布尔危机，加上德国的威胁使它后顾之忧日益增长，从而促使它作出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在美国调解下，委内瑞拉和英国于1897年2月签订了一项仲裁条约。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委内瑞拉接受了一项对各方已占有50年的领土免议的妥协办法。1899年10月的最后解决办法中委内瑞拉继续持有奥里诺科河口，但是该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拒绝支持他们大部份过份要求仍感不满。拉美其他国家领导人对于奥尔尼关于美国权力的声明也感到不快，虽然这种主张事实上主要是说大话，是讲给当地人听的。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这个争论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英国面对德国日益加剧的竞争，为了博得美国的友谊，跨出了一大步，表示接受美国在西半球的政治优势地位。经济优势则是另外一件事了。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平民和政府官员认为，世界正在被日益扩张的帝国所垄断，而美国可能发现自己已被孤立。因此美国将听任世界列强的摆布。美国可以不参加国际强权政治的角逐，但却无法因此而避免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角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所谓落后国家的和平、秩序和稳定。在这种地区，有力量施加重大影响的国家才能行使警察职权。到19世纪90年代时，一些美国知名人士也采取了这种欧洲式的国际关系观点。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想得到重视，并要求其他大国尊重它的利益，那么它就必须在那些于美国利益特别重要的地区，行使警察职权，以便恢复并维持和平与秩序。加勒比和墨西哥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防务地带的一部分，由于它是进

入美国防御薄弱地带和密西西比－俄亥俄内河运输网的入口处。鉴于美国领导人认为美国必须开凿和控制一条地峡运河，中美洲也被纳入这一防务地带。这一运河对于美国在南美洲和亚洲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言，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以钢铁和蒸汽机装备海军的现代世界中，一条运河之差可能意味着闭关自守和四通八达之间的天渊之别。但是，如果美国在自己的后院都不能维持和平的话，就无法有效地保护运河及其来往航线。因而，根据这一论据，美国必须在加勒比—中美洲地区行使警察职权，否则其他大国就会越俎代庖。从非洲和亚洲各种事件的前因后果中，美国许多领导人认识到必须排除欧洲的影响或者控制。

这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并没有形成任何用于执行的具体政策。在关于特定政策和特别是关于使用武力的问题上，美国国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某种美国传统思想意识的复活，而使这种争论更加复杂化。这就是，相信美国——往往与其他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同——赋有一种注定的命运（也被称为天定的命运）去传播英美文明、共和制政体和基督教新教以拯救世界的信念。文明则包括促进经济发展、教育和公共卫生等许多方面。

所有这些问题和论点都是在有关美国应在1895年爆发的古巴独立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的公开辩论期间出现的。威廉·麦金莱总统不希望战争，但他同意这种看法，即美国最终要对加勒比地区的法律和秩序负责。当西班牙既不能取胜又不肯以撤退方式结束战争时，麦金莱要求国会授权以介入并平息古巴战争。公众舆论热情支持总统的建议，因为西班牙军队的暴行事件早已引起公愤，1898年2月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古巴港口被炸沉更使群情激奋。总统要求国会授权以行使美国的国际义务；这是所有文明国家保卫和平的职责：

> ……采取措施，设法完全和彻底结束西班牙政府和古巴人民之间的敌视状态，设法在该岛建立一个像我国一样的有能力维持秩序和履行国际义务、保障和平与安定并保障其公民安

全的稳定政府……⑤

一些国会议员希望授权承认古巴独立并由古巴临时政府主持工作。麦金莱和他的顾问们不相信被一些人称之为“在困境中的政府”，是有能力在和平时期统治古巴的一个起作用的实体。他们担心在这个政权下独立的古巴将会成为另一个海地或多米尼加共和国并且为欧洲干涉增添了更大的诱惑力。如果美国给古巴带来了和平，麦金莱相信美国有义务为该岛筹建自己的政府同时保护其幼年时期的共和政体。总统说，他将否决任何承认古巴独立的决议。但是，他同意特勒提出的一项折衷的修正案，特勒修正案指出美国无意兼并古巴并在完成古巴局势平定后将把“治理和控制该岛的权利交给该岛人民”。

美西战争和巴黎条约（1898）是美国在加勒比建立利益范围的第一步。波多黎各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和被人遗忘的角落——被大多数美国领导人所遗忘，只是在改变殖民地地位时偶而有几次放宽了限制。然而，古巴是墨西哥湾——加勒比地区的要冲，所以该岛的地位和美国在古巴事务中的作用问题争论了几十年之久。其结果，正如有关应否在加勒比—中美洲地区占有优势的大辩论一样，导致了性质前后抵触和模棱两可的混乱政策和行动；这是一种具有两重性格自相矛盾的帝国主义，由于内疚感、国内政治捭阖和缺乏真正的殖民性动力而不断地更改。

对于美国领导人来说，平定古巴意味着建立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以便为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提供稳定的经济和打下基础。从1898到1902年美国军政府统治了古巴，这段关于国家建设的经历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期间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策有所影响。里昂纳德·伍德将军于1899年12月担任第2届驻军司令。根据他和国防部长伊莱休·鲁特的指示，有关公共卫生、建设学校、培训师资、防治疾病、改革监狱和精神病院、改革司法制度和发展政

⑤ 《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纽约，1922）X111卷第6292页。

府机构的大量计划付诸实施。伍德认为，稳定的政府和秩序井然的社会需要有“……好的学校、好的法院、公用事业体系、交通工具、医院、慈善机构等等……”，但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满足这些需要。他曾就此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了汇报：

> ……鉴于古巴的地理位置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控制和保护，那么，为了使它繁荣自得从而永远友好并化为支持我们的一份力量，何不给予适当援助以促进其工业？此举则远胜于把一个有如圣多明各或海地那样秩序混乱饱受贫困煎熬的穷岛置于我国门前，把一个生存在种种条件下的穷岛置于我国门前，将对我国千百万公民的生活构成威胁。⑥

伍德明确地表达了一种金元外交的概念，而这是1900年以后美国越来越经常的做法。在这种概念中，经济发展、可靠的政府和社会秩序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可靠的政府将厉行节约并创造一种以合理的利率吸引外国（最好是美国）资本的局面。这种资本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又增强了政府的力量，带来社会的和谐。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加上可靠的政府将保证和平、秩序和稳定。伍德等人认为，这将促进双方的利益，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得以不断增长。

伍德将军和罗斯福总统深信，这一进程1902年时在古巴早已在进行。美军撤离该岛，1902年5月20日新的共和国正式成立。作为美国撤离的交换条件，美国要求古巴制宪会议将若干条款（即普拉特修正案，这些条款早已加在1901年的美驻军征用法令中）列入古巴宪法。这些条款对新政府在举借公债、与外国洽商军事问题以及废除美国军政府法令等方面的行动，作了某些限制。此外，该修正案还赋予美国在某些条件下干涉古巴的权利，并规定古巴须向美国出售或出租“加煤站或海军驻地所需的土地”。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向一个古巴代表团保证说，美国只在出现极端

⑥ 1901年伍德给罗斯福的信，国会图书馆（华盛顿）伦纳德·伍德手稿第29格。

的无政府状态时进行干涉，并承诺罗斯福政府将对销往美国市场的古巴糖给予特惠待遇一事作出支持；这项诺言在与国内保护主义者经过一番激烈斗争后，于1903年才得以兑现。

普拉特修正案是一个多种思想的产物，并且是那些希望在加勒比发挥绝对霸权作用的人们同那些希望美国只需拥有一种一般性优势影响的人们之间的妥协方案。鲁特认为，把普拉特修正案纳入1903年美古条约是使门罗主义转变为国际法的步骤。从历史方面来说，这是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出现的对门罗主义的阐释。在伍德的言论中使广为流传的信念具体化了："……无法避免的事实是，即使我们不能拥有这个岛屿，我们仍将对它的行为负责，保持一个稳定的政府并以公正和平等的待遇对待在该岛居住的外国人"。⑦有关的基本思想在此后30年中有助于美国对加勒比政策的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

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利益不断增长的国家并不是美国一国。德意志帝国与拉丁美洲的联系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人员和军事方面都有所加强。1900年时，在巴西南部的德国移民已达35万人，居住在智利的德国人约有12万。在阿根廷和中美洲也有德国移民的居民点。德国政府积极鼓励这些移民保持和发扬德国民族传统，并资助德语学校和德国教会。德意志帝国海军在西半球海域加强活动，1900年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通知帝国国会预算委员会，德国终将在巴西海岸建立海军基地。⑧德皇

---

⑦ 同上注。

⑧ 霍尔格·H·赫维希著《未实现的政治活动：1889—1941年德国海军计划中的美国》（波士顿，1976）第73页。

威廉二世毫不掩饰他要使德国在西半球起主要作用的信念。他认为古巴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在美西战争中他纠集欧洲国家反对美国的努力受到了挫折。1900年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在一份奏章中提出，德国昔日在拉丁美洲获得一块殖民地，其价值将比夺得整个非洲更大。德皇在这份奏章上所加的批语是：“正确，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该地区取得‘最高权力’的原因所在”。[9]德皇始终拒绝承认门罗主义并主张欧洲国家有权干涉西半球。

德国在拉丁美洲的军事存在日益明显。1896年德国教官开始为智利训练陆军，1900年德国军事代表团为智利建立了军事学院。智利陆军采用了普鲁士式的灰色制服和黑色钢盔。1914年以前，德国已向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巴拉圭派遣了军事代表团。这类行动引起了墨西哥政府的严重关注。唯一能与此相匹敌的行动是法国（于1895年）向秘鲁派遣了军事代表团。[10]

1903年，德国海军部拟订了第3号行动计划，这是一项万一在西半球同美国进行战争的应变计划。这项计划设想用1.2万至1.5万人（在1903年到1906年期间这一数字有所增加）占领波多黎各，并以该岛为基地指挥海军向美国进攻。1906年，这项计划被拼凑为德国计划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欧洲和改变联盟的结构方面。[11]

德国对西半球的野心并未减弱，引起美国的疑虑，担心欧洲可能控制西半球的部分地区。从而，德美之间的竞争是美国在加勒比一中美地区进行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海军部并不掩饰它想在加勒比海建立基地以控制地峡运河的愿望，就美国领导人

---

⑨ 前引书，第21页和第68页。

⑩ 《在拉丁美洲的外国军事训练团》，1944年12月28日。计划和开发处（OPD），拉丁美洲资料档案第336号第74案。陆军部总参谋部和各兵种参谋部档案，RG165；美国国家档案局（华盛顿）。

⑪ 赫维希著《未实现的政治活动……》第85—92页。

而言，曾在萨摩亚岛（1888）和马尼拉湾（1898）发生过的德美之间的海军对峙，似乎会在更靠近美国本土的地方重演。⑫本世纪初，在美国时常流传着可能与德国作战的谣言。参议员洛奇曾向罗斯福总统进言，他深信德国皇帝“会有狂暴到不择任何手段的时刻。如果〔战争〕终于爆发，将会在南美洲，很可能在巴西，因某种蓄意图谋的事端而引发”。⑬1913年美国海军总部拟定了它的“黑色作战计划”；这是一项针对德国袭击西半球的防御行动。总部强调，一旦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德国一定会占领西半球的土地，把它插上德国国旗，而美国必须以武力捍卫它的政策，否则只得默认德国的占领”。⑭

100

1902年委内瑞拉危机，为德美竞争提供了新的刺激，并使西奥多·罗斯福等深信美国不得不把他的权力扩展到古巴和波多黎各以外的地方。在此以前罗斯福曾经宣称，拉美国家不能滥用外国的关心和指望躲在门罗主义的后面；在某个南美洲国家做了错事的情况下“……就得让欧洲国家来揍它”。⑮在最初，罗斯福似乎默认了英、德、意1902年12月9日开始对委内瑞拉实行的和平封锁。几艘委内瑞拉船只被击沉或被俘获，一些海岸要塞遭到联合舰队炮击。委内瑞拉独裁者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接受了他早先拒绝接受的国际仲裁，但封锁却变成了一场正式的战时封锁，使最后解决成为悬案。接着，在1903年1月17日，一艘德国炮舰把守卫马拉开波海峡的圣卡洛斯要塞夷为平地。其他事件相继发生，于是罗斯福通知德国大使，指出美方已密令海军上将乔治·杜威（率驻波多黎各库莱布拉岛54艘军舰组成的一支舰队）

---

⑫ 前引书，第68—72页。

⑬ 亨利·卡伯特·洛奇著《1884—1918年西奥多·罗斯福与亨利·卡伯特·洛奇通信选集》（纽约和伦敦，1925）I，第487—488页。

⑭ 引自赫纽希著《未实现的政治活动……》第105页。

⑮ 转引自贝利著《……外交史》第502页。

准备就绪待命驶往委内瑞拉海面，并在行动命令下达一小时后即可启航。2月13日，英、德两国政府签署了议定书，撤销了封锁。

1901年到1902年期间，罗斯福为加强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地位作了各种努力，除了在库莱布拉岛集了一支舰队，把该岛拨归海军部布防以外；他还试图购买丹属维尔京群岛，并调出一支秘密远征队侦察了委内瑞拉沿海选择登陆地点和派遣了一名海军代表帮助委内瑞拉为抵御外来入侵做好准备。这种突如其来的集中行动和暗示性的显示武力，不仅仅是针对委内瑞拉危机，而且与美国为开凿一条地峡运河而寻求地点的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的实际情况有关。1901年11月美国和英国之间签订了第二个海—庞斯福特条约。这一条约代替了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承认美国有权开凿任何运河并进行控制和设防。选择运河线路的工作已进行多时，但美国国会（经法国新巴拿马运河公司代表菲利普·比诺—瓦里拉几次精明的游说后）于1902年6月选定了巴拿马——只要总统能在“合理的时间内和合理的条件下”取得运河用地即可批准。

哥伦比亚和美国之间的条约谈判几乎进行了两年。这些谈判最初是按照哥伦比亚的意图行事的，罗斯福和国务卿约翰·海都认为，海—埃兰条约中最后的条件已满足了哥伦比亚政府的意愿。不料，哥伦比亚总统为此召集国会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在他的领导下，会议拖延了几个星期之久，最后拒绝批准该条约。巴拿马人发动了叛乱，罗斯福作出了反应并援引1846年比德拉克条约阻止哥伦比亚增派援兵。美国在巴拿马共和国成立后立即予以承认，并在12天以后与巴拿马签订了一项运河条约。这时，哥伦比亚总统答应批准原先签订的条约，但罗斯福置之不理。哥伦比亚人则大骂“背信弃义”并谴责美国的强盗行径。但是，哥伦比亚对巴拿马的控制一向只是断断续续的，并且经常依靠美国干涉才保持了对后者的某种名义上的主权。(自1846年以来，巴拿马地峡发生过大约53起叛乱，而且哥伦比亚至少曾6次请求美国进

行过干涉。）西奥多·罗斯福希望尽快地开凿运河。1903年11月的海—比诺—瓦里拉条约规定运河区10英里宽的地带由美国控制。该条约还使巴拿马实际上沦为一个被保护国。

美国取得运河区以后，开凿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运河的工程随之开始，中美洲由于同美国的利益休戚相关，从而加强了美国必须进一步控制该地区的信念。罗斯福抓住了英国首相阿瑟·贝尔福在1902年12月不慎说漏了嘴的一句话——英国政府将十分满意看到美国管教拉丁美洲的“闹事者”。1904年，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濒临破产之际，罗斯福抓住了机会提出一种预防性干涉的理论，以后被称之为对门罗主义的“罗斯福引申”。罗斯福向国会解释说：

> 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有本事合理有效和恰当地处理各项社会和政治事件，并能维持秩序和履行自己的各项义务，则不必担心美国会干涉。但也许在美洲，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如果由于不断的混乱，或由于无能而导致一种全面脱离与文明社会的联系时，最后就必须由某个文明国家加以干涉。如果，在西半球，这类混乱或无能的情况特别严重，奉行门罗主义的美国，只好勉为其难，不得已而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16]

102

罗斯福从而把应用于平定古巴及普拉特修正案的基本论据引伸到加勒比—中美洲整个地区，并且明确划定了美国的利益范围。就多米尼加共和国而言，罗斯福签署了一项条约，根据这项条约由美国当局控制该国的关税。美国当局从而掌管了该国的财政收入，以便拨出一部分收入逐步清偿债务。参议院没有批准原来签订的条约，罗斯福不得不以签订行政协定的方式继续下去，直到经过修改后的条约在1907年被批准时为止。

---

[16] 《总统咨文和文件汇编》XIV卷第6923页。

由于美国国内的反对和“文明使命”的本身受挫，在国务卿伊莱休·鲁特保守方针的影响下，罗斯福开始承认，推行美国利益范围外交的可行性是有限度的。例如，1906年当古巴政治家们使古巴政府陷于瘫痪时，他是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出兵古巴的。罗斯福曾一次试图在加勒比地区建立共和政体，但他在1906年也向怀特洛·里德（一位编辑兼外交官）透露过，他在“应用自治的北方民主政治管理人口密集的热带地区……”⑰方面，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为了和平解决争端，1907年在华盛顿举行了中美洲国家会议。这次会议设立了中美洲法院以裁定争端，并为平息该地区濒濒发生的周期性骚乱制订了对应政策。

与此类似的是，罗斯福的后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宣布了一项“以金元代替枪弹”政策。塔夫脱和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认为，财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关键。这届政府鼓励银行家再次对几个国家的债务提供资金以消除欧洲干涉的潜在威胁。美国银行家向海地国家银行大量投资并贷款给尼加拉瓜以清偿英国债券。美国也接管了尼加拉瓜的海关。塔夫脱和诺克斯指望用美国金元来稳定美国利益范围内各国政府的财政，以避免大规模的干涉。塔夫脱政府也试图通过调解来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并主持签订了一系列的仲裁条约。

103

在这段“美国利益范围外交”时期，拉美大国的反应是不尽相同的。1900年以后，巴西对美国采取了友好的政策以作为牵制阿根廷的一块平衡筹码。另一方面，同美国关系发展得十分密切的墨西哥却开始不断地讨好英国和德国。(美国国务院在1907年甚至提出可以让墨西哥与美国共同承担中美洲地区警察的责任。但是，墨西哥对这个地区另有野心，与美国并不一致，因此合作的

---

⑰ 转引自阿伦·里德·米利特著《侵略政治：1906—1908年对古巴的军事占领》（俄亥俄州哥伦布，1968）第251页。

前景消失了。）⑱有一些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采取了阿根廷人倡导的两种理论，并试图把这些理论制订为美洲国家共同遵守的法律和国际法。卡洛斯·卡尔沃在1868年到1896年发表的几卷著作竭力主张国家享有绝对主权并把它应用于处理国内的外国侨民和外国企业问题。他主张，外侨只能享有与驻在国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必须遵守和服从驻在国的国内法和司法管辖，他们无权要求母国政府给予支持。他反对发达的工业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民，免遭驻在国统治者滥用权力、不同法律体系和政治动乱的侵害而制订的那种治外法权的理论。西方国家则坚持，诸如信守契约和正当的法律程序等原则是国际法，而不论驻在国统治者如何对待其本国公民，外国侨民及其财产均应受到保护。治外法权的这种原则在实践中常被滥用并被用于为外国企业寻求特殊待遇。但是卡尔沃走向另一个极端，坚持各个国家可以做它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包括对来到一个国家进行投资的外国人不按常规办事。从特定的意义来看，卡尔沃想把这样一种概念，即并不存在所谓国际行为标准，确立为一种国际法原则。1890年以后，卡尔沃理论变成了想要阻止工业大国保护其侨民及其财产的那些拉美国家在法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战斗口号。这是债务国和债权国、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以及弱国与强国之间经典性的辩论。这种理论上的论战几乎在每一次美洲国家会议上都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在第2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1901—1902年在墨西哥城举行）上提出了一项基于卡尔沃理论的有关外侨待遇问题的议案（同第1届会议上通过的但遭到美国反对的那个决议类似）。不出所料，凡主张对外国人在内战时期遭受的损失概不负责，或外侨无权求助于母国保护的那些建议，都遭到美国反对。

第二种理论（它以第一种理论为基础）是1902年由路易斯·

---

⑲ 见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著《对外政策活动，第一部分》，载《墨西哥现代史：迪亚斯·波非里奥时期》（墨西哥，1960）第5卷620—692页。

德拉戈拟订的，它直截了当地提出，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武力向他国索债。美国比较同情这种理论，只要债务国不把这种理论作为它拥有绝对权力无故赖帐的借口——而这一点却正是有些国家的真实意图。在里约热内卢（1906）举行的第3届美洲国家会议上，美国同意了一项建议把这个理论提到第2次海牙会议上讨论的决议。这次海牙会议于1907年举行，由于国务卿鲁特所作的努力，所有拉美国家都应邀出席。德拉戈作为阿根廷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代表支持采纳德拉戈理论，但作了重要修正，即：不干涉的先决条件是接受仲裁。海牙会议以这种方式采纳了德拉戈理论，但只有6个拉美国家批准了这项议定书。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10）举行的第4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上，建立了泛美联盟，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由美国国务卿担任常任主席。美国在这个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但这个机构并没有多少实权。并非所有的拉美国家领导人热情支持这个新建立的泛美联盟，然而有些人却认为它有可能使美国的政策发挥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自1898年以后以空前的规模大量流向美国以南的地区。其中大部分投人生产原料以供出口的私营企业，并集中于古巴和墨西哥。美国在古巴的直接投资主要投入蔗糖业。1909年，古巴糖产量的34%是由美国资本的糖厂生产的。也有一些直接投资是投入采矿业、烟草业和公用事业的。1896—1915年之间，美国在古巴的投资从5000万美元左右增加到2.65亿美元，尽管欧洲资本当时仍占优势。由于古巴糖产量自1900年以后不断增长，到1913年时古巴糖在美国食糖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已猛增至50%。美国向古巴出口商品的势头也一样，到1914年时古巴已成为美国出口商品的第6个最大的买主。美国在墨西哥资本一般投向采矿业和石油业。诸如美国冶炼公司、费尔普斯—道奇公司、格林—卡南尼亚铜公司和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等在采掘铜、铅、锌和金矿等方面占有优势地位。1908年时，美国公司占有了

105

墨西哥盈利的矿场的3/4。1901年爱德华·L·多希尼及合伙人开凿了第一口油井，大量外国资本涌人如今被称“黄金之路”的地区。多希尼的瓦斯特卡石油公司扩大了业务，但是它的英国竞争者阿吉拉石油公司（业主是威特曼·皮尔逊一以后被授为考德雷勋爵）由于享有墨西哥政府给予的特殊待遇，发展得更快。美国企业在中美洲也得到发展。联合果品公司进入了几个中美洲国家，1899年两个意大利移民家族在新奥尔良组成了标准果品和轮船公司。在1914年以前的时期，南美洲的国家中智利接受的美国资本超过其他国家。

1904年时，智利的铜矿业下降到世界铜矿生产的第6位，智利政府鼓励美国公司予以恢复。布雷登铜矿公司于1904年组成，古根海姆家族在1912年创办了奇利克斯公司。1914年时这两家公司都尚未盈利但已为铜矿业总共投入了资金1.69亿美元。1900年以后，几家美国公司开始在拉美建立分厂。联合制鞋机械公司、胜家缝纫机械公司、一些药品和化妆品公司、以及几家芝加哥肉类工业公司等是最突出的例子。尽管经济活动增加的情况有如上述，但在第一次大战以前欧洲资本和企业仍占优势。

1913—1921年的美国和拉丁美洲

1913年，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政府深深陷入了一种世俗化了的加尔文教派的想象，把造就一个负有特殊使命和命定的救世主民族引为己任。这种传统在20世纪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此为动力的改革世界的进步运动。威尔逊的内政部长富兰克林·K·莱恩简单明了地表达这种观点及其与种族优越论信念的联系：“在美国人当中有大量的专业警察、卫生工程学家、社会工作者和福利事业专家。……这是最根本的特点之一，它使白种人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载入了过去一千年的史册。”⑲

⑲ 《纽约世界报》，1916年7月16日。

对于莱恩和这种“命运天定”之说新版本的其他信徒而言，“白种人的重任”是振兴国家和维护和平的使命。

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新政府的几位关键人物试图拟订一项整顿世界落后地区的合作计划。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上校在他1913年的欧洲之行中曾向德国和英国的官员提出过此项行动的建议。豪斯在他同德国驻美大使约翰·冯·伯恩斯多夫伯爵的一次谈话中曾指出，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应该共同作出努力以“……保证和平和落后地区的正常发展，并在任何地区对任何国家都应继续保持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德国驻美大使表示赞成。当1914年豪斯访问英国时，他认为英国官员对此有“热情的反应”。[20]

豪斯上校向威尔逊总统汇报时，曾构想出一项庞大计划，这项计划将鼓励“借款国和开发国”“按合理的利率取得贷款并在优惠条件下开发世界落后地区，另一方面，将创造条件使这些放款又可以得到合理的保障。”[21]欧战的爆发使推行这种旨在缓解大国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竞争的合作金元外交受到了限制。然而，豪斯继续推行这项计划的小型化方案，指望在战后以此为核心形成一个更大的体系。它将通过一项泛美公约把南美国家囊括在内，豪斯认为这项泛美公约还能有助于解决“墨西哥问题”(这指的是自1911年以后来势汹涌的一场革命）。威尔逊政府为这项公约而努力工作使之成为一种合作推行门罗主义的手段。由于遭到阿根廷的反对而受挫，此项建议因1917年美国参战被束之高阁。

伍德罗·威尔逊坚信维护世界的和平、秩序和稳定是美国的使命。他强调英一美政治体制在确立这些条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由于坏人企图通过违反宪法的手段攫取权力，或者

107

---

⑳ 查尔斯·西摩编《经查尔斯·西摩整理编纂的豪斯上校私人文件》(波士顿，1926）I，第240—241页、第264—267页。

㉑ 前引书，第264—265页。

由于人民没有可能进行自由选举才会爆发革命。如果实行选举，遵守宪法和不让坏人掌权，革命就不会发生。对威尔逊来说，宪法秩序是秩序和稳定的基础。威尔逊总统一再强调遵守宪法秩序的好人统治。但是许多国家并不总是选择好人作为领导人。因此，1913年11月当威廉·蒂勒尔爵士要求威尔逊说明他对墨西哥的政策时，总统回答说："我要教会南美国家如何选举好人。"[22]

美国在严厉的威尔逊教授的领导下，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积极程度，并在军事上，卷入了加勒比—中美洲地区。这一点，部分是出于对欧战的反应，这场战争不仅仅加深了美国对德国的戒心而且为它提供了消除欧洲全部影响的机会。1915年，新上任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经威尔逊批准）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有赖于干涉和镇压叛乱并帮助人民"建立和维持负责和公正的政府……。"[23]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出现动乱以及法国和德国暗示有意派兵登陆以后，美国进行了干涉——1915年和1916年先后对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干涉。两国都被美国派驻的军政府所控制。两国都采用了美国拟订的宪法，都通过了有利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留驻的条件。由于美国佬振兴国家的改革热再次发作，两国都施行了种种关于环境卫生、公共卫生、教育和通讯的计划。在试图创建立宪共和国的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却未必都是华盛顿官员们能够计划或批准的。在海地，出现了武装的抵抗，约有3,250名海地人因此而丧生。[24]

---

[22] 伯顿·J·亨德里克编《沃尔特·H·佩奇的生活和信件》（纽约州加登城，1923）I，第204—205页。

[23] 1915年11月24日备忘录，《门罗主义当前的性质和范围》；资料档案编号 710.11/188$\frac{1}{2}$；美国国家档案馆（华盛顿）国务院档案 RG59。以下简称SD，只标资料档案编号。

[24] 汉斯·施密特著《1915—1934年美国对海地的占领》（纽约州新布伦瑞克，1971）第103页。

1916年美国购买了丹属维尔京群岛，于是占据了控制进出加勒比海每一条重要通道的咽喉。同年，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同尼加拉瓜签订的布莱恩—查莫罗条约，参议院只是在批准前才将其中带有普拉特修正案色彩的内容清除掉——部分应归功于对干涉持谨慎态度的伊莱休·鲁特参议员所作的努力。该条约规定：美国单独享有它所选定的一条运河路线永租权；租用加勒比海上的大小科恩群岛和租用拟在太平洋沿岸丰塞卡湾设立的海军基地，均以99年为期——关于上述的租让，尼加拉瓜政府将得到补偿。然而，美国参议院仅仅是在听说尼加拉瓜领导人所谓德国企图取得一条运河路线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尼加拉瓜的邻国对该条约中所涉的一些领土提出主权要求，并向中美洲法院提起诉讼。中美洲法院判决它们胜诉，但尼加拉瓜和美国都拒绝接受此项判决。因此，中美洲法院失去了任何意义，从而不复存在。

墨西哥革命是令威尔逊政府长期感到头痛的问题。暴力行动直接威胁到在墨西哥居住的美国人并不断越过边界去美国境内骚扰。有些越境骚扰活动打出了圣迭戈计划的旗号，这是由少数种族主义分子发动并得到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各州支队响应，号召在美国境内举行起义的一个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卷入了这一阴谋活动，指望挑起美国对墨西哥进行大规模干涉。齐默尔曼在（1917年的）电报中曾建议，如果美国同德国交战，帝国政府应同墨西哥结成军事同盟并援助墨西哥收复1848年失去的领土。[25]

威尔逊政府首先试图推翻维多利亚诺·韦尔塔以影响墨西哥的局势，后者曾借助于前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一臂之力，废黜了“民主使者”和革命“之父”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这种情况导致了1914年4月美军对韦拉克鲁斯港的占领，当时美国企图阻

109

[25] 查尔斯·H·哈里斯和路易斯·R·萨德勒合著《圣迭戈计划和1916年墨美战争危机》，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8/3（1978）第381—408页。

止向韦尔塔增援的部队。以后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调停下美军撤离墨西哥。韦尔塔被打败以后，威尔逊试图在交战各方的革命领导人之间进行调解，最后把美国的支持投向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一方，从而激起了1916年3月潘乔·比利亚向新墨西哥州哥伦布镇的袭击。威尔逊派遣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由约翰·约瑟夫·潘兴将军任司令，并指示要生擒比利亚。远征军并未完成此项使命，但它击溃了比利亚一伙。在1916年5—6月间美国和墨西哥双方几乎交战。但是欧洲局势的发展不允许美国大规模卷入墨西哥，于是潘兴奉命撤回美国。当欧战结束时，有些美国人重新叫嚣动用武力平定墨西哥，但大多数官员们懂得这种行动极难奏效并且得不到多少人的支持。

好象美墨关系被暴力和外国阴谋搅乱得还嫌不够紧张似的，有关外国人财产的待遇和地位问题又冒出来火上加油。墨西哥革命领导集团中的民族主义一改革派分子要求实行土地改革和要求对外国投资实行某种程度的国家控制——特别是在石油工业领域。这种要求明确地载入1917年墨西哥宪法中，它在有关土地所有制、矿产管理权和外侨权利的若干关键性的条款中把卡尔沃理论具体化了。宪法第27条包含了这一理论，该条规定了一切地下矿产权属于国家所有，从而使此后的20年期间外国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时常为该条的解释和履行问题而发生冲突。

新宪法的颁布使墨西哥革命成为第一个对外国投资真正构成威胁的民族运动，而且这个运动对于外国资本赖以存在的法律原则本身也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美国政府只在给予“即时、充分和有效”赔偿的情况下才承认征用权。但是，在真正实行国有化之前还有一个管理措施具体落实漫长的过渡阶段，地下所有权的真正问题集中于国家所有权实施的追溯效力问题。如果石油公司把它们的地契更换成经重新批准的租让权，那么各种征税、管理法令和要求（后者最为重要）是否也适用于它们在1917年以前取得的各项权益？这个问题在1918年和1919年引起了个人抗议和外交

110

抗议的浪潮。因此，墨西哥政府作出了让步，直到20年代才力图履行宪法第27条。

美国在保护其公民投资的问题上陷入了重大困境，其他国家也一样。按照传统的观念，保护海外侨民及其财产是一国的尊严。但是，难道美国为了保护其投资而同墨西哥交战？大多数美国人是不赞成的，但美国人的公司还是要保护的。

石油对于海军、商船和国内电力以及供热已经越来越重要。这意味着控制石油的问题超过了保护投资的问题，因为它对当前工业国家及其海军的运转至关重要。1914年英国政府曾经答应在处理墨西哥事务方面追随美国，但希望美国能保证英国皇家海军的石油供应畅通和保护英国石油公司。英国保持了继续追随美国的政策，尽管英国认为威尔逊政府对墨西哥太软弱。然而，在整个革命时期石油供应仍然畅通无阻，其部分原因在于，坦皮科油田是无党派人士曼努埃尔·佩莱斯将军所控制的；英国和美国石油公司向他提供武器和支付现金作为供应石油的交换条件。

威尔逊并不真正信任英国并担心它在战后同墨西哥民族主义分子单独解决问题，有损于美国的利益。1918年美国国务卿要求摩根公司的托马斯·W·拉蒙特组成一个国际投资金融家委员会以便使英、法的经济利益服从美国的领导。处理墨西哥问题的国际金融家委员会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协调有关墨西哥债券债务，可能借款和其他外国投资事务方面的一个非官方助手，从而对各国政府或私营企业同墨西哥单独解决问题将会起限制作用。大多数英法企业都接受了美国的领导，但几年来在解决墨西哥拖欠债务的问题方面没有多少进展。

威尔逊和蓝辛国务卿认为欧洲对西半球的经济卷入是政治动乱的基本因素，而政治动乱则将导致有损于门罗主义的干涉主义。就墨西哥的情况而言，威尔逊认为，英国石油巨头惠特曼·皮尔逊（考德雷勋爵）是支持韦尔塔"篡权"的幕后人。海地的有些问题则应归咎于法国金融家，并认为德国企业卷入了加勒比

111

地区的各种阴谋活动。蓝辛建议美国应努力削弱欧洲的经济卷入，他并提出要重申门罗主义，其内容应“……包括欧洲通过在美洲国家推行金融霸权的机构取得政治控制”的问题。[26]国务院的各级官员则主张美国政府主要应支持美国金融机构的发展，鼓励美国商品和使交通设施美国化。欧战似乎为促使拉美国家减少同欧洲的经济联系并与美国集团重新调整提供了机会。

政府为促进这些变化所作的特殊努力，成就有限。尽管美国敦促同德国宣战的那些国家清理德国企业，但只有在危地马拉的一些香蕉种植园和在海地的一些财产被没收。然而，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促使拉美的国际经济关系起了显著的变化。例如，在战前，美资中美洲和南美洲电报公司曾在南美洲太平洋沿岸铺设海底电缆。一家英国公司因拥有独家经营的特许权而阻止美国公司的电线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延长到乌拉圭和巴西。1917年美国人开始向阿根廷和巴西的法院起诉，由于美国国务院的支持，在1919年终于突破了英国对海底电缆的垄断。1914年以后美国银行的分行也到拉美开业。例如，1919年时美国银行在巴西已设立了10家分行。欧战结束后英国经济势力在大多数南美洲国家中仍占优势，但美国正迅速赶上。

美国在动员拉美支持对德作战方面所作的努力成就十分有限。巴西对德国宣战，但随后宣战的其他7国都是加勒比一中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则是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拉圭、萨尔瓦多和委内瑞拉宣布中立。墨西哥在1917年初试图组成一个中立国家集团，但未成功，以后卡兰萨总统又企图在“卡兰萨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拉美其他国家组成一个拥护卡尔沃理论和不干涉、反对

112

---

[26] 1914年6月11日备忘录；SD 710.11/185$\frac{1}{2}$。

美国佬的集团。这个集团“不承认”门罗主义并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强国结成联盟。这个企图也没有实现，而这个特定的主义也因1920年卡兰萨去世而一同消逝。但是这种思想和表现以后则变成了反美民族主义的左翼变种的组成部分。

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与拉丁美洲

本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势力迅速发展。投资从1924年的将近15亿美元增长到1929年的30亿美元多一点。在1929年时英国的投资总额仍超过美国，但差距越来越小。以巴西为例，英国投资者拥有一部分1914年以前发行的债券，但美国却是新资本的主要来源。美国公司还在无线电、电报、电影和新闻电讯业务等领域占优势。但是，在航空运输方面美国大大落后于德国。这又勾起了担心德国的余悸，特别是因为这些航线接近巴拿马运河。一些美国官员想要促进美国的战略性工业，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也未见成效。

1921年美国政府试图制订一项对于外国借款进行某种管理的政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拉美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阻止借款，（1）被用于扩充军备，（2）进入已经举债过多的国家以及（3）进入由于政治腐败而浪费资金的国家。总之，国务院希望鼓励把美国资本用于促进扎扎实实的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的忠告并不具有约束力，这项计划所收的成效也很有限，但是对中美洲的一些没有把握的贷款项目减少了。

战时的混乱曾一度使拉美与欧洲的贸易关系中断。20年代期间，德国、英国和法国恢复了它们失去的商业市场，但美国在西半球的商业中仍是最重要的国家。但阿根廷与英国的贸易关系却是一个重大的例外。

113

以1918年到1930年期间，美国的各种企业在拉美迅速发展。这一期间投资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投向公用事业和制造业。后一项

投资集中在阿根廷、巴西、古巴和乌拉圭。通用电力公司在1923年组成了美国和外国电力公司，在巴拿马、危地马拉开业，通用电气公司的另一个子公司则在古巴开业。1929年通用电力公司又在另外的8个拉美国家控制了电力工业。所有这些公司都以充分的生产设备能力和相应的通讯和销售设施开拓业务发展现代体制。该公司除了供应动力和照明电力以外，还经营电车、人造冰、自来水和煤气。1920年索斯特内斯·贝恩组成了国际电话和电报公司，并在10年内控制了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墨西哥的各大电话公司。美国还在整个西半球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方面取得领导地位。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以及联合果品公司都是这方面的主要公司。美国的汽车公司开始在若干国家建立了装配厂。1926年时通用汽车公司已在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建立了装配厂。福特汽车公司也进入了拉丁美洲甚至在墨西哥建立了一个拖拉机厂；而在2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该国信誉并不高。1913年12月花旗和大通等美国大银行也开始建立分行。到1930年时，这些大银行在西半球的绝大多数主要城市都设有分行。此外，一些投资公司（诸如摩根公司、大通证券公司和公平信托公司）开始发行政府公债券。

在20年代期间，美国政府在与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奉行了比较合作的政策。从1921年1933年之间，在西半球涉及各国的44次会议中，美国出席会议达41次，而在1899年到1921年期间的50次会议中，美国出席会议只有23次。在这些会议中有几次还举行了美洲国家高级委员会，此外还陆续讨论了解决商业性问题的总方案。每年通常包括这样一些活动：为订立有关商业纠纷仲裁、商标保护、保护商业旅行者、商品统一分类等公约进行谈判。由半政府机构进行的这种低水平、没有危机的外交表明了政策的总趋势——多边合作，为发展商业开辟道路。

114

共和党领导人确实试图在这一地区限制军事活动，尽管他们并不否定军事活动。海军陆战队1922年撤离古巴，1924年撤离多

米尼加共和国，1925年撤离尼加拉瓜（但1927年又返回尼加拉瓜）。继续占领海地，但在1933年以前即已拟订撤退的计划。临时性“登陆小分队”的使用，也受到一定的约束。此外，从1929年到1933年期间在许多暴乱发生的时期，关于武装干涉的所有要求国务院一概加以拒绝。胡佛总统明确表示，他不希望由海军陆战队在国外代表美国。

1923年沃伦·哈定总统向国防部长和海军部长下达命令，禁止美国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向任何外国出售军事装备。他特别注意拉美的武器增长状况。1931年胡佛总统一再重申了这一政策。[27] 1919年美国向巴西派遣了一个小型的海军代表团，而1930年有两名陆军军官被调往危地马拉负责管理该国的军校。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向国外派驻军事代表团，但是法国政府却开始了它的军事活动。1919年第一个法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巴西，而1927年时代表团则拥有70名军官并由一名少将任团长。在这一时期巴西的大部分武器也是向法国购买的。法国一直在秘鲁派驻了军事代表团，而且在1926年到1930年期间在巴拉圭派驻了军事代表团。法国军事活动增长与美国军事情报系统的工作有关，美国希望增加法国在拉美的影响来抵销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影响。1922年意大利政府向厄瓜多尔派遣了一个军事代表团，西班牙政府派了几个小型的代表团。[28]

就世界其他地区而言，美国领导人设计了一套和平解决争端 115 和促进政治秩序稳定的条约体系。1923年贡德拉公约要求在发生国际争端时安排一段冷却期；关于后者，1928年下半年在华盛顿举行的调解与仲裁会议上作出了具体规定。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积极领导了这次会议，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和弗兰克·比林

[27] 1937年3月18日约瑟夫·C·格林备忘录；SD美洲国家事务处1918—1947年备忘录，RG59第2格。

[28] 陆军部1944年12月28日报告，拉丁美洲资料档案第336号第74案。

斯·凯洛格国务卿都支持他关于美国将接受会议拟定的这些条约的主张——不过，对某些条款有所保留。美国批准了上述条约并参加了美洲国家仲裁法庭。除这些措施外，美国国务院还起了一种有如美洲国家独国法庭的作用，仲裁了许多起边界纠纷。到1933年时，美国在这个方面发挥的作用涉及拉美国家之间纠纷案件的大约3/4。

大多数美国官员认为中美洲是西半球中问题最难解决的地区，也最需要建立一套秩序井然的体系；而加勒比地区所有独立国家则几乎都已受到单独的条约规定和借款协议的约束。1923年，在美国的领导下，中美洲国家签订了《和平与友好条约》，该条约是1907年以托瓦尔理论为根据而制订的《总条约》的再现。托瓦尔理论主张拒绝承认通过政变和叛乱而执政的政府以杜绝政变和叛乱。1923年条约对承认增加了更多的限制条件。这一体制旨在杜绝任何革命。20年代期间中美洲上层集团中的许多保守派分子热切支持这种条约，由于他们特别担心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的蔓延。美国尽管没有签署该条约，但这却正是美国政策的一项工具而且是在美国领导下缔结的。

这一套条约体系在尼加拉瓜却遇到了最严重、最难驯服的挑战。1927年美国决定进行干涉，其中部分原因是下决心立下这套规矩，即使遇到了像埃米利亚诺·查莫罗这样一位受到某些官员支持和受到在尼加拉瓜拥有产业的各种实业集团支持的保守派挑战者，也要把这套规矩贯彻下去。可是，柯立芝和凯洛格认为，迫使尼加拉瓜按照“宪法程序”进行政治变革是保持整个中美洲现状的最佳选择。与这次干涉有关的还有其他的因素。各种政治派别的内战对于美国人的财产是潜在的威胁，以及墨西哥还在向自由党分子进行援助。美国政府有意防止墨西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

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在美国国内引起激烈的辩论，因为它有可能导致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由于国会中反对的人越来越

多，政府领导人认识到他们不可能继续保持大规模军事行动。亨利·刘易斯·史汀生作为调解人前往尼加拉瓜进行安排，以便通过宪法秩序解决问题。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国民警卫队而不是平定该国的叛乱。有一些海军陆战队军官想歼灭奥古斯托·桑地诺的反美游击队，但美国政府决定美国军队不得卷入尼加拉瓜的政治事务。[20]这种做法是想要尽快地取得一项合法的和解，培养一支政治上中立的国民警卫队以便支持这一套条约体系，然后美国再退出。

而事实上，反对入侵尼加拉瓜的反应（美国国内和拉美的反应）以及1928年以后拉美各地造反得势的浪潮促使胡佛和史汀生国务卿对他们的策略作出进一步修改。有关承认的一套规矩在形式上还得保持，"新政府"需具备依据宪法继承的某种"合法"资格。然而，这一点可以作出广义的解释。史汀生也排除了军事行动并试图避免外交官和企业家插手政治事务。

美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墨西哥的革命民族主义。墨西哥新领导人远远不如某些美国官员所想像的那样激进，但他们的确主张对经济进行某种控制。特别是在石油和土地等自然资源方面。威尔逊政府拒绝承认1920年5月取代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的墨西哥新政府，共和党政府直到1923年9月以前仍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国务院也阻止向墨西哥贷款。1922年国际金融家委员会同墨西哥之间的谈判即墨西哥外债问题达成了协议，它有助于为承认墨西哥的问题打下基础。在要求承认阿瓦罗·奥夫雷贡政府越来越高的呼吁中，美国出口商也占有一席地位。国务卿休斯作出结论说，墨西哥的确十分稳定，投资者实际上并未受到多少损害。1925年以后当墨西哥总统普卢塔科·卡列斯试图履行1917年宪法第27条时，美墨关系恶化了。由于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詹姆斯

117

⑳ 1828年4月13日罗伯特·E·奥尔兹给弗兰克·R·麦科伊将军的信，SD弗朗西斯·怀特案卷，RG59。

·罗克韦尔·谢菲尔德持反墨态度，情况未能改善。他和其他几名官员主张武力政策，即使引起战争也在所不惜。然而，由新任驻墨大使德怀特·W·莫罗（他是摩根公司前合伙人之一）、金融家和墨西哥官员之间的幕后谈判在1927到1928年间作出了和解的安排。正如国际金融家委员会主席托马斯·W·拉蒙特指出的"米尔豪泽〔即米尔豪泽一斯派尔合伙公司〕夸口要挥舞大棒或者踢他们的肚皮，说得倒轻巧。我们没有大棒可以挥舞，也没有哪个人的皮靴能踢得着那么远和那么结实的肚皮。"[30]

照某些美国官员看来，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局势是由于那里有共产党而闹得复杂了。拉美共产党与苏联及其通过共产国际执行的对外政策有联系，这被视为对西半球的一种新型的外部干涉。1926年共产国际曾指定美国共产党专门负责组织和领导拉美共产党。共产国际认为，美国是拉美的主要敌人，美国官员们正确地断言，如果共产党在某个国家得胜，该国将倒向苏联而反对美国。1923年共产国际给墨西哥的指示中有一段话："摧毁资本帝国主义的最后保垒，推翻北美资产阶级，是所有美洲国家工人和农民的任务"。[31]但是，美国官员们往往夸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而这一点却促使他们对诸如尼加拉瓜桑地诺领导的起义等某些政治发展，产生扭曲了的概念。

拉丁美洲共产党第1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有来自14个拉美党的代表和美国及法国的代表出席大会。会上通过了苏联的"绝对不妥协"的方针，并保证要奉行战斗性的

---

[30] 拉蒙特给维维安·史密斯及J·R·卡特（摩根公司巴黎办事处）的信，时期不详（可能是1928年11月），托马斯·W·拉蒙特手稿，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

[31] 斯蒂芬·克利索尔德编《1918—1968年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历史资料》（伦敦，1970）第86页。

革命策略。1929年共产国际指示墨西哥共产党命令武装的农民联盟袭击政府部门并发表宣言号召人民发动全面战争。墨西哥政府谴责苏联资助和煽动颠覆活动，并在1930年1月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1930年拉美的共产主义运动规模很小但在发展，苏联因此而成了西半球国际关系的因素之一。

118

20年代期间拉美领导人曾把国际联盟视为在西半球关系中可能起作用的一个因素。9个拉美国家是创始会员国，其他国家也在20年代陆续加入。在第1届大会上阿根廷曾建议将盟约中有关门罗主义的词句删去。该建议未能采纳，阿根廷随即退出并在20年代其余的期间不再参加国联的活动。关于门罗主义问题的争论1928年再度出现。巴西因未被推选为国联行政院常任委员国而退出国联，哥斯达黎加则因欠会费而被除名。国联行政院在邀请两国重新加入时，曾向哥斯达黎加保证，所有国家均具有同等的权力和义务，并声明，盟约并未确认门罗主义的效力。秘鲁和玻利维亚因国联拒绝受理太平洋战争后被智利占领的塔克纳一阿里卡问题，于1921年退出国联。两国的这一争端经美国调解后，于1929年重返国联。1928年，国联就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两国之间的查科争端发出警告谴责侵略行动，但未奏效，几年后战争终于爆发。在大多数情况下，国联置拉美于不顾，而且也不是美国的对手。

美国的力量不断增长及其在加勒比—中美洲建立利益范围的做法在拉美引起了某种敌意，特别是在知识界。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对抗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与文化的拉丁观，并提倡拉丁人联合反对“北方巨人”的思想。为大多数后辈作家所效法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何塞·恩里克·罗多所著的《爱丽儿》(1900)，在这本书中把北美人刻划成唯利是图的人而拉美人则是理想主义者。哥伦比亚作家J·M·巴尔加斯·比拉所著《反对野蛮人。美国佬——看清敌人》(1919)一书则走得更远了。到20年代时，反美主义不仅在民族主义改革运动热情高涨的拉美大学中是一股常见的潮流，而且是整个拉美政治词藻中一种普遍的特征。

119

总的说来，除了在墨西哥和拉美共产党中间，反美情绪并未集中于经济问题方面，而是集中于美国对加勒比和中美洲进行军事干涉的问题方面。这种情绪在1928年哈瓦那会议上达到了顶点，当时，拉美代表们一个接着一个把郁积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倾泻到美国代表团头上。但是，前任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扭转了局面，他发表了一篇卓越的演说，对干涉理论下了明确的定义。国务院于是决定发表一份白皮书，划清门罗主义和武装干涉的界限。J·鲁本·克拉克的备忘录于1930年发表，这是美国官员们对来自拉美的批评越来越敏感的明证。

到1930年时，美国显然已是西半球占支配地位的力量。但拉美各国也在争取获得较之1830年时更多的独立性，而美国也在消除对加勒比—中美洲地区的军事干涉。美国领导人并不准备放弃在这个地区推行利益范围的总政策，国务卿史汀生1931年在文件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个地方是我们海岸的外围地区，这对我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天经地义的，更不用说它对于我国繁荣兴旺的意义了。"[32] 然而，许多美国官员都认识到保持这种利益范围对美洲国家关系的全局带来的种种问题，大多数人希望能形成某种和解的局面。随后的数十年期间新的国际竞争将对美国和拉美关系发展的基础有所削弱。

---

[32] 《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国务院拉丁美洲丛书，第4册（华盛顿，1931）第5页。

第 4 章

1850—1930年拉丁美洲人口情况*

总 的 趋 势

从独立到19世纪中叶（大体上是经济停滞或者经济只有小幅度增长的时期），整个拉美人口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这同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增长率一致而低于美国，也低于殖民地后期的增长率（即人们曾预期在独立后会继续甚至加快的增长率）。在自给自足农业居支配地位和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的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地区，由于在只能说成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条件的阻碍下，人口增长缓慢。例如，1825年以后，墨西哥中部各州的人口每年以0.4—1%的速度增长；韦拉克鲁斯和恰帕斯这两个东南部州有稍高的人口增长率；西北部和尤卡坦的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在减少。①适合于培植正在实行工业化的欧洲国家所需要的主要产物的那些拉美地区则经历了较有力的人口增长。这些地区的人口虽然一般很稀少，但往往增长速度较快。例如，畜牧业的发展就是造成人口聚居在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潘帕斯地区的原因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不包括首都）的农村人口在1836—1855年

---

* 戴维·布鲁克肖译自西班牙文，译文经本书编者校订。

① 维维亚那·布拉谢著《1824—1895年墨西哥各州的人口》（墨西哥城 1976）第105页。

表1 1850—1930年拉丁美洲人口

（数字单位：千人，增长率%）

	1850	1900	1930	1850—1900	1900—1930
温带南美洲					
阿根廷	1,100	4,693	11,936	2.9	3.1
智利	1,443	2,959	4,365	1.4	1.3
乌拉圭	132	915	1,599	4.0	1.9
巴拉圭	350	440	880	0.4	2.3
小计	3,025	9,007	18,780	2.2	2.4
热带南美洲					
巴西	7,230	17,980	33,568	1.8	2.1
哥伦比亚	2,065	3,825	7,350	1.2	2.0
秘鲁	2,001	3,791	5,651	1.3	1.4
委内瑞拉	1,490	2,344	2,950	0.9	0.8
厄瓜多尔	816	1,400	2,160	1.1	1.5
玻利维亚	1,374	1,696	2,153	0.4	0.8
小计	14,976	31,036	53,832	1.5	1.9
加勒比					
古巴	1,186	1,583	3,837	0.6	3.0
波多黎各	495	959	1,552	1.4	1.6
多米尼加共和国	146	515	1,227	2.4	2.9
海地	938	1,560	2,422	1.0	1.5
小计	2,763	4,617	9,038	1.0	2.3
墨西哥和中美洲					
墨西哥	7,662	13,607	16,589	1.0	0.8
危地马拉	850	1,300	1,771	0.9	1.0
萨尔瓦多	366	766	1,443	1.0	2.1
洪都拉斯	350	500	948	0.7	1.5
尼加拉瓜	300	478	742	0.9	1.5
哥斯达黎加	101	297	499	2.2	1.7
巴拿马	135	263	502	1.4	2.7
小计	9,764	17,211	22,494	1.1	0.9
总计	30,530	61,871	104,144	1.4	1.7

资料来源：一般说，有关1850年的情况，见拉多夫·巴龙·卡斯特罗著《西班牙拉丁美洲人口的发展（1491—1950）》，载于《世界史杂志》，5,(1959),第325—343

页；有关1900年的情况，见卡门·A·米罗著《20世纪拉丁美洲人口》,(1965),智利圣地亚哥拉丁美洲人口中心；有关1930年的情况，见拉丁美洲人口中心编《拉丁美洲各国人口》，载《人口公报》，(1970)。另外，有关阿根廷的情况，还见雷吉尼·德·拉特斯、苏尔玛·拉特斯、阿尔弗雷多·E 合编《阿根廷人口》(国家统计与普查局，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有关智利的情况，见马科斯·马马拉基斯《智利历史统计资料》，第2卷，(韦斯特波特和伦敦，1980)(1850年校正版)；有关乌拉圭的情况，见胡安·里亚尔编《1850—1930乌拉圭历史统计资料》，乌拉圭资料与研究中心，第4期(蒙得维的亚，1980)；有关1850年的巴拉圭情况：根据安纳利斯·凯控勒·德·加莱亚诺著《1846年人口普查的历史意义》，载《巴拉圭社会学杂志》，35(1976)第71—121页作出的估计；有关巴西的情况，见托马斯·W·梅里克、道格拉斯·H·格雷厄姆合著《1800年至今的巴西人口和经济发展》(巴尔的摩和伦敦，1979)；有关哥伦比亚1900年的情况，见安德鲁·科尔弗《拉丁美洲的出生率—历史趋势和起伏的新评价》(国际问题研究所，伯克利，1965)；有关1850年秘鲁的情况，见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1970年秘鲁人口情报》，(利马，1972)；有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情况，见根据弗兰克·莫亚·庞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问题讨论会上作的《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发展史的新考虑——曲线、比率和问题》报告(圣多明各自治大学，圣多明各，1975)第37—63页作出的估计；有关1900年哥斯达黎加的情况，见杰弗里·凯西·加斯帕《利蒙关于1880—1940年的哥斯达黎加香蕉业的研究》，(圣何塞，1979)；有关1850年巴拿马的情况，见米格尔·乌鲁蒂亚和马里奥·阿鲁布拉合编《哥伦比亚历史统计概要》(波哥大，1970)；有关1850—1900年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情况，见根据西罗·F·S·卡多索和埃克托尔·佩雷斯·布里格诺里合著《1520—1930年的中美洲与西方经济》(圣何塞)作出的估计。

间以每年4.2%的惊人速度增加。就全国范围来说，阿根廷的人口每年增加2%强，与直到19世纪第三个25年还大量输入非洲奴隶的巴西和古巴的速度相似。

对比之下，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几十年(总的说来这是出口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拉丁美洲的人口有了很大增长。表1提供了全面的概要，为了实际方面的原因，只列出1850、1900和1930年三个时期的数字。该表还表明各自时期的增长率。正是这些增长率比人口数字本身提供了关于拉美人口趋向的最清楚的说明。在1850—1900年间，拉美人口翻了一番，总数从3050万增加到6190万。1900—1930年又增长了68%，达到1.041亿。前一

时期的年增长率为1.4%，而后一时期则上升到1.7%。不过，这种全面的增长包含着不同周期性的模式，甚至各种相反的趋势。

经历了最蓬勃增长的地区是南美洲的温带：1850—1900年，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而在以后的30年又翻了一番多。在这个地区，阿根廷的人口先是翻了两番，然后增加了250%。乌拉圭在前一时期人口增长还要快，即增加了7倍。智利的人口经历了一个比较缓慢的但正常的增长，前一时期比后一时期稍高一些。相反地，巴拉圭的人口在19世纪后半叶几乎毫无增加。三国同盟战争（随后是霍乱大流行）对巴拉圭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据说巴拉圭失去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尽管或许有夸大之处。战争行动结束后16年，1886年的人口普查仍然记载着15—45岁的年龄组受战争的影响最大，即男人比女人少70%，而且战争期间出生的儿童比战争以前出生的儿童减少17%，同任何正常的年龄分布相反。②该国人口只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开始恢复增长。

热带的南美洲没有呈现出首尾一贯的模式。巴西所走过的是类似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道路，尽管增长率较慢。由于内战及由此引起的经济混乱，哥伦比亚的人口最初增长较慢，尤其是接近19世纪末时，20世纪又好起来。秘鲁和厄瓜多尔经历了正常的增长。玻利维亚和委内瑞拉的人口仍然处在停滞状态，前者比后者更甚。尽管这样，玻利维亚设法使其增长率在20世纪头30年翻了一番，而委内瑞拉的增长则略有下降。

在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人口以很低的水平为起点，在前一时期增加了3.5倍，在后一时期增加了2.5倍。波多黎各的人口80年间增长了3倍。相反地，19世纪后半叶，起义和战争的爆发阻碍了古巴的人口增长。1899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同1887年的普查相比，甚至减少了59,482人。独立（1898年）后，移民使人口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反之，向国外移民使海地人口

② 多明戈·M·里瓦罗拉等著《巴拉圭的人口》（亚松森，1974）第13页。

的增长比较有节制。

在中部美洲，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适中。最大的国家墨西哥的人口在革命前增长很平稳。1910—1921年，人口从1510万下降到1430万，这意味着减少了82.5万人。除了战争造成的死亡外，相当大的损失是1917年的时疫和向美国移民造成的，除了出生率的暂时下降外，上述是一个重要因素。据美国1920年的人口普查记载，布拉沃河以北有65.1万墨西哥人。其中1/3大概在革命前已经到达了那里，但其余的人是在1910—1920年间越过边界的。尽管向外移民使人口继续外流，但墨西哥的人口增长率很快又开始有了起色。在中美洲（除了哥斯达黎加外），象在其他地区一样，重大的增长时期是在20世纪。香蕉种植园将外国人和本国人都吸引到了哥斯达黎加的西海岸。例如，在1883—1892年的9年间，利蒙地区的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而全国的增长率则为3%。[③]在巴拿马，运河的建造和航运的增加，再加上香蕉种植园吸引了移民，结果人口增长很快。

125

这期间，巴西取代了墨西哥而成为人口最多的拉美国家。然而，以最惊人的速度增长的却是阿根廷。1850年，其人口为墨西哥的1/10，80年以后已经上升到约7/10。1850年，阿根廷人口居古巴、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和哥伦比亚之后，但到了1900年已超过所有这些国家，继巴西和墨西哥之后居第三位。

在结束这段简短概述时，应当提一下人口迅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农产品出口有关。拉普拉塔河流域是大规模生产谷物、肉类、羊毛和皮革的地区。巴西和哥伦比亚出口咖啡。哥斯达黎加出口香蕉及其传统名产咖啡。圣多明各作为蔗糖生产国进入竞争激烈的市场。古巴和波多黎各继续从事蔗糖生产。在太平洋沿岸，专门化的商品作物的种植较少而限于特定地区：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种植咖啡以及在秘鲁北部生产蔗糖。这些作物推

---

③ 杰弗里·凯西·加柏斯著《1880—1940年利蒙对哥斯达黎加香蕉业的研究》，（圣何塞，1979）第215页。

动了服务行业的兴起和国内市场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矿业不需要这样庞大的劳动力，它促进人口的流动，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并没有提高增长率。智利和秘鲁的铜、智利的硝石或者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后来发现的石油对人口的影响是不能同巴西的咖啡或阿根廷的谷物所产生的影响相比的。每当经济有了增长，以等待人口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机会时，发展就必定受到延误，而且意味着会失去了其中的某些机会。如果劳动力依然短缺，当出口经济有赖于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出售产品的能力时，工资必然猛涨。所以实业家、立法者和思想家一致认为有必要吸引移民。

移　　民

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大都解除了殖民地时期对外国人进入的限制，尤其是对欧洲移民打开了大门。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富有的商人和军人来到了拉美各地，尽管留下来的不多。有些国家在独立后还着手实行了农垦计划。尤其是瑞士和德国的殖民者被安置在巴西南部、秘鲁、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特别是智利南部。从1862年起，威尔士的殖民者在巴塔哥尼亚的丘布特河下游定居，他们在那里就象德国人在阿劳科人的森林里一样兴旺起来，并且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在殖民地定居。还有好几千欧洲人为其本国的贫困状况所驱使而在拉丁美洲找到了就业机会，如委内瑞拉的加那利岛民、巴西的亚速尔群岛岛民、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巴斯克人和爱尔兰人。城镇和乡下都吸引了移民。虽然185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内地人口只有10%是外国血统，但首都的移民人口却达到35%。移民从事手艺、贸易和自由职业，而本地出生的人则受雇于公共行政部门或从事非熟练劳动。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乌拉圭，尤其是该国首都蒙得维的亚。1843年，该国人口的63%在外国出生。虽然外国人的比例在1852年和1860年分别下降到45%和48%，但1868年又上升到

68%。在乌拉圭发展的这关键的30年期间，该国经济最活跃和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居民有一半左右是在境外出生的。其中许多是来自比利牛斯山脉两边的巴斯克人，因而属于西班牙或法国国籍。

随着横越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1850—1851年结束，加以奴隶人口的出生率低，巴西不断扩大的咖啡种植区所需要的劳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各州之间的奴隶贸易来供应。据估计，1850—1881年，约有20万奴隶从北部和东北部（这些地方由于蔗糖和棉花价格下跌，要求对农业出口经济实行广泛调整）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从南部和西部转移到了里约热内卢州和圣保罗州。到了1873年，对巴西的奴隶人口已经进行了重新配置，以致奴隶总数的2/3被安置在中南部。在另一方面，古巴在1865—1866年结束了奴隶贸易之后，在短时期里转而要求中国苦力劳工，这些苦力据说是根据契约但事实上是被强制并且在几乎没有自由迁移的情况下输入的。1853—1874年，有12.4万中国人抵达哈瓦那。④1859—1874年，有8.7万中国人也进入了秘鲁，前往北部的甘蔗园和南部的鸟粪岛（波利尼西亚人和夏威夷人也是通过各种暧昧的手段乘智利船只被输入秘鲁的）。1876年，几乎有2%的秘鲁人口是中国血统，1877年古巴人口的3%是中国血统。中国劳工还在智利北部的硝石矿、在哥伦比亚的铁路和后来在巴拿马运河的建造中从事劳动。不过，中国人一有机会就逃脱束缚而到城市去避难。他们的后裔现在大部分就住在这些城市。

19世纪70和80年代，欧洲人开始大规模向拉美移民。某些土著人对待第一批外国人的那种偏见如今已经消失。由于第一批移居者的消息开始在旧世界传播，亲戚朋友的联系也开始把人们吸引到美洲去。大批的移民偶尔也是由诸如巴黎公社被粉碎后的迫害和乌克兰的大屠杀等政治或宗教性事件促成的，但主要原因看

---

④ 胡安·佩雷斯·德·拉·里瓦著《1853—1874年古巴的中国苦力人口》，载《何塞·马蒂国立图书馆馆刊》57（1966）第3—32页。

来是经济上的。拉美在各个领域所提供的种种机会当时是异常优越的。这些机会正好出现在南欧和东欧的农业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可以从新世界获得廉价食品而正处于危机状态之时。因废除奴隶贸易而使拉美极需人力更加尖锐的时期，同在欧洲最能得到人力的时期相吻合。因此，拉美就有能力同在吸引移民方面已有长期经验的美国相竞争。与此同时，可以获得的人力决定了移民的阶级出身和国籍，这当然是同北美洲“新浪潮”中的那些人一样的。

关于1870—1930年移居拉美的实际人数，没有一致看法。“移民”一词在普通语言中有明确的含义，但在统计资料中则不然。况且原籍国与移居国的统计数字也不一致。并非所有移民都永久定居下来，而另一些人则是非正式入境的。计算这个时期的移民有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即移民通常由欧洲乘船来，而从海上移民远较陆地边境移民容易监控。不过，在一些统计资料中，只有二、三等舱乘客被当作移民，而其他人则不加区分。有些统计资料只考虑入境而不考虑出境。以阿根廷和乌拉圭为例，移民先在其中一个国家碰碰运气然后终于在另一个国家定居下来的情况，并不是少见的。一部分到达智利和巴拉圭的人也同样地是再移民的产物。

与其他发表的表格不同，下列各表所概括的是净移民数字（即入境数减去出境数），而且为了避免长串数字而把数据压缩成为期5年一个时期。可是，就巴西而言，没有办法减去出境人数。巴西只登记第一次入境的人，连再入境者也不记载，而后者最终占全部入境人数的10%。有幸的是，全部移民的一半以上直接去圣保罗州。其入境口岸桑托斯对入出境人员都有记载。因此，根据这一半到巴西的移民，就能算出净移民人数。

按照入境数减去出境数的办法计算，就排除了临时入境的外国人，可能混到统计中去的归国国民以及旅游者，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成为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这些数字只包括长期定居的人。既然这些数字还包括了那些在定居拉美期

间所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已登记在册的人，它们就是绝对的最小数字，而且可以正当地认为，它们贬低了移民的作用。不过，在人口统计上最重要的永久定居就用这种办法更精确地表示出来。

只有少数一些拉美国家从大量的欧洲移民中得到好处。以重要性为顺序，这些国家是阿根廷、巴西、古巴、乌拉圭和智利。约有400万欧洲人移居阿根廷。其次是巴西，为200万（如果以圣保罗的定居率代表全国）。有近60万人在古巴定居；也有同样多的人在乌拉圭定居，但1930年乌拉圭的人口既然是古巴的一半，对乌拉圭的人口冲击必然要大得多。智利的净移民数在1907年以前记载不全，有可能达到20万左右，远低于上面提到的国家（见表2、3、4）。进入巴拉圭的移民可见表2注脚，因为他们是这个

130

表2 1881—1930年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的净移民人数

（单位：千人）*

	阿根廷	乌拉圭	智利	总计
1881—1885	191.0	26.7	4.3	222.0
1886—1890	489.4	42.1	23.9	555.4
1891—1895	156.1	13.8	2.8	172.7
1896—1900	303.9	33.9	4.1	341.9
1901—1905	329.3	43.8	3.6	376.7
1906—1910	859.3	92.8	35.6	987.7
1911—1915	490.4	101.0	53.3	644.7
1916—1920	2.4	53.1	14.8	70.3
1921—1925	510.2	70.0	34.3	615.5
1926—1930	481.6	102.6	6.3	590.5
	3,813.6	579.8	183.0	4576.4

资料来源：有关阿根廷1881—1930年的情况，见雷奇尼·德·拉特斯、苏尔玛·拉特斯、阿尔弗雷多·E合编《阿根廷人口》（国家统计和普查局，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200页；有关乌拉圭1881—1892年的情况，见沃尔特·F·威尔科克斯《国际移民》（国家经济研究所，纽约，1929）第568页，载统计年鉴；有关智利1882—1907年的情况，见乔治F·W·扬《智利的德国人——移民与殖民》（移民研究中心，纽约1974）第6页；另见马科斯·马马拉基斯《智利历史统计资料》，第2卷（韦斯特波特

和伦敦，1980）第109页；

*进入巴拉圭的移民

1818—1885	0.8	1911—1915	4.6
1886—1890	4.7	1916—1920	1.6
1891—1895	1.8	1921—1923	1.6
1896—1900	1.2	1926—1930	1.7
1900—1905	2.3		
1906—1910	5.1	1881—1930	25.6

资料来源：里拉·皮杜·德·德拉琴堡著《1870—1970年巴拉圭的移民和殖民》，载《巴拉圭社会杂志》34（1975）第65—123页。

地区再迁移过程的组成部分。很少人直接从欧洲来，其人数也总是很少，甚至不足以弥补流向邻国的农村劳工。在拉美各国人口中居第二位的墨西哥，1904—1924年只从大西洋彼岸来了33,980个定居者。当然，与这些数字相对应的年份并不利于移民，因为当时该国政治动荡。然而，如果与同一时期离开墨西哥的人数相比较，则总数同样是低的。在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在1905—1930年接纳了约30万外国人，但只有1/10设法留下来。

事实上，大批移民离开欧洲比1881年即表格所列的第一个年份早10年就开始了。1871—1880年，有10万外国人在阿根廷定居，还有大致相同的人数被允许进入乌拉圭。1872—1880年，大约20万外国人第一次进入巴西。在古巴，国民统计是1902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很难把定居者同派到这个殖民地的行政官员或军事人员区别开来。1898年获得独立时，有大批西班牙人回国。

当然，移民浪潮的起伏由于我们的为期5年的划分法而部分地被掩盖了。19世纪70年代经历了普遍而持续的增长，于80年代末达到高潮。在阿根廷，1890年的危机使这一增长突然中断，离开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外国人确实比进入的多。但巴西没有经历过这种下降。当时禁止意大利人移民巴西，因为两国政府有分歧，但当罗马在1891年授权恢复移民时，许多意大利人就急切地抓住这个新的机会移往巴西，特别是到圣保罗的咖啡园劳动。于是意

表3 1881—1930年的巴西净移民人数(单位:千人)

	巴西						圣保罗州			
	首次到达人数	% 葡萄牙人	意大利人	西班牙人	德国人	日本人	到达人数	占巴西%	出境人数①	永久定居率
1881—1885	133.4	32	47	8	8	—	19.02②		—	
1886—1890	391.6	19	59	8	3	—	199.4	51	—	
1891—1895	659.7	20	57	14	1	—	413.4	63	65.5③	84
1896—1900	470.3	15	64	13	1	—	281.6	60	122.9	56
1901—1905	279.7	26	48	16	1	—	194.3	69	171.4	12
1906—1910	391.6	37	21	22	1	1	190.2	49	173.6	9
1911—1915	611.4	40	17	21	3	2	339.0	55	173.9	49
1916—1920	186.4	42	15	22	3	7	99.9	54	69.5	30
1921—1925	386.6	32	16	12	13	5	222.7	58	108.5	51
1926—1930	453.6	36	9	7	6	13	263.4	58	141.4	46
	3,964.3	29	36	14	5	3		56④		46④

① 从桑托斯港来的三等舱乘客。 ② 1882—1885年 ③ 1892—1895年 ④ 只是1892—1930年的。

资料来源:有关巴西的情况,见马里亚·斯特拉·费雷拉·莱维著《巴西人口发展中的国际移民(1872—1972)》,载于《公共卫生杂志》8(增刊)(1974)第49—90页,特别是第71—72页;有关圣保罗的情况,见托马斯·H·霍洛韦著《大陆的移民。1886—1934年圣保罗的咖啡与社会》(查珀尔希尔,1980)第179页。

131

表4 1902—1930年古巴净移民人数(单位：千人)

	旅客人数（入出境人数的差额）	定居率①	接受移民人数	
			西班牙人(%)	安的列斯群岛人（%）
1902—1905	64.3	57	81②	1②
1906—1910	66.9	41	71	14
1911—1915	72.0	40	75	11
1916—1920	253.1	63	52	37
1921—1925	158.7	53	50	37
1926—1930	－18.9	－16	30	58
总　计	596.1	47	58③	31③

① 入出境余数与接受移民数的比率

② 只限1904和1905年

③ 1904—1930年

资料来源：古巴，财政部，《1902—1930年旅客的移民和流动》。

大利移民在其后的20年一直很多。到了20世纪初，阿根廷再次成为移民普遍喜欢去的地方。1900—1910年，它每年接纳约30万欧洲人，尽管只有一部分永久定居下来。到巴西去的潮流同时减弱了，1903—1904年的危机使很多人回国。一般说，欧洲战争使更多的人被遣返回国。阿根廷失去了大约8.7万外国人，尽管来自非交战国的移民继续到达该国。圣保罗和智利所记载的负差较小，而抵达乌拉圭的人数仅略有下降。战争对古巴的影响恰好相反。随着糖价上升，移民达到了新的高潮，但持续时间不长，1920年的危机将很多新近到达的人送回国。1927、1928和1929年该岛的离境人数超过入境人数。最后，随着1929—1930年世界危机的爆发，向拉美大量移民的60年告终了。

南欧和东欧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这种大量移民起了作用。1881—1930年获准进入巴西的400万外国人中，意大利人占36%，居第一位。意大利人移居巴西的高潮是在1896—1900年。其后，

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年代里，意大利人的比例下降到9%。随着人数的减少，其地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北部的人为南部的人所取代。第二大移民集团来自昔日的母国。在开始大量移民之前一直占多数的葡萄牙人后来把第一位让给了意大利人。以后在葡萄牙出现了农业危机，而当大批意大利人开始退缩时，葡萄牙人着手飘洋过海。从1906年起，葡萄牙人再次恢复了其地位，占移民的29%。西班牙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后居第三位：共有50万西班牙人，占总数的1/7。涌进最多的年份是1906—1920年，当时西班牙人超过意大利人，尽管在20年代西班牙移民人数下跌。1906—1920年，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占进入巴西的移民总数的2/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自德国的移民大量增加。大部分德国人移向南里奥格朗德、圣卡塔林纳和巴拉那各州，加入到了帝国时期就已经在那里定居的先驱者的后裔的队伍中去。战争还使斯拉夫人(不论其国籍为南斯拉夫人、波兰人还是俄国人）和不同信仰的人（其中包括犹太人）的限额增加了，也使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他们在那里就象在拉美其他地方一样，被认为是突厥人）的限额增加了。事实上，他们在战前就是持奥托曼帝国的护照进入了这个国家的。

被拒之于夏威夷和美国门外的日本也把目光对准巴西。从1908年起，日本的一些移民公司把几千户人家交给了咖啡种植园主随意支配使用。由于缺少内聚力（后来很清楚，这些“家庭”中的许多人事实上并无家庭联系）和期望的落空，那些日本人移殖点终于证明是不稳定的。他们移居城市特别是圣保罗郊区，经营菜园，或者移向拓荒的边境地区成为独立的棉花种植者。巴西取消补贴后，日本政府于1924年承担了资助移民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约7万日本人于1930年前进入了巴西。1932—1934年，日本人在人数上甚至居于首位。日本人移居到拉美各国，但从来没有象到巴西那样多。

意大利人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就象在巴西一样，是最大的移民

集团。1860—1900年他们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20世纪开始时，其人数下降了，尽管没有象在巴西那样低。其地区来源也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不勒斯人即南方人超过了来自北方的移民的人数。因此，塔诺人取代了“外国佬”而成为对意大利人流行的陈旧称呼。西班牙人在阿根廷居第二位。葡萄牙移民寥寥无几。1911—1920年的10年间，移来的西班牙人数终于居于榜首，占全部移民的1/3。按地区来源来说，其多数来自西班牙北部沿海地区。俄国人（斯拉夫人）和突厥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亚美尼亚人）也横越大西洋来到阿根廷。然而，向阿根廷移民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向巴西移民：法国人从1871—1890年来的人数较多；英伦三岛的少数民族，如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也更喜欢大陆的这个地方；光临的日本人和德国人为数不多。有两个方面使乌拉圭与阿根廷有所不同：西班牙移民的人数接近于意大利人，法国人甚至更为突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已经成为最大的一支队伍而一直保持了这一传统。

134

在古巴，西班牙移民远远超过所有其他移民人数。自相矛盾的是，即其人数在殖民地军队和行政机关，撤离之后反而增加了。按洲际移民来说，也就是说除去从加勒比其他岛屿以及北美洲和中美洲来的人之外，西班牙人占移民总数的85%左右。

如上所述，移民的到达未必意味着就是永久定居。阿根廷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特别接受了大量来此进行收割的“季节性”工人。这是由于地中海地区的农业淡季适值潘帕斯大草原的农忙季节。因为旅费低廉，农业工人们可以带着一些积蓄回国，而他们自己的土地也未受到忽视。其他移民只是来赚够钱回家置产或者怀抱“逛逛美洲”的雄心大志。他们如果继续交了好运，就返回本国。西班牙的坎塔布连山脉沿岸，这些还乡的“美洲人”盖的房子星罗棋布，花园中种着异国情调的棕榈树，表明其主人无法医治的怀乡病。在圣保罗，1892—1930年到达的人中只有46%实际定居下来（见表3）。在阿根廷，1881—1930年这个比例下降

到34%。而且不是所有国籍的人都以同样的比例定居下来。旅程的远近和旅费的高低影响作出任何最后的决定。对日本人来说，计划的改变证明比意大利人花的费用要多得多。所以，1908—1932年在桑托斯港登陆的日本人中有92%在圣保罗定居，而意大利人则只有13%。要一个南斯拉夫人漂洋过海到一个语言和习惯都很陌生的国家去定居，就包含着比葡萄牙人要下更大的决心。永久定居的南斯拉夫人约有80%，而葡萄牙人则只有42%。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定居率分别为50%和18%。⑤

定居的趋势还因时因地而异。1881—1890年来到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有74%扎下了根。在随后的1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47%，总的说来，意大利移民似乎比任何其他移民对短期经济原动力尤其敏感。西班牙人则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定居倾向，正如同期的85%和56%这两个数字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永久定居未必意味着同化。圣保罗的日本妇女与自己同胞结婚的比例很高。相反，日本男人由于缺少和他们相同血统的妇女而往往同巴西妇女结婚。同族通婚倾向的变化取决于性别和国籍。这仍然是所有外国妇女的一个共同特点。尽管在日本妇女中不那么显著。相反，这种现象在男人中要少些。首先摆脱同族通婚制的是意大利人。一般地说，通过婚姻关系进行同化的倾向在城市比农村多。

横越大西洋的男女数目不等。典型的移民是成人、男性和单身。例如，有关1904—1928年向古巴移民的情况，可见表5。1907年的古巴人口普查表明男性比例为110.3，即岛上每有100个女性就有多10个以上的男性。1919和1931年，男性比例分别为112.7和113.1。表6对阿根廷的本土人和外国人口作了区分。前者看来女性比男性多，这可能是由于男性的死亡率较高（1895年男性比例为90），外国人的情况则相反(1895年男性比例为173)。

---

⑤ 小阿尔弗雷多·埃利斯著《圣保罗的人口》，（圣保罗，1934）第135页。

此外，该表还说明外国人中的成年男性比例要比本地人中的成年男性大。

表5 1904—1928年古巴移民的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百分比）

时　期（年）	男性人数占移民总数的%	14—45岁人数占移民总数的%	单身人数占移民总数的%
1904—1908	82.6	82.9	70.7
1909—1913	81.2	83.1	70.4
1914—1918	83.7	90.1	76.4
1919—1923	88.6	95.4	86.0
1924—1928	83.5	91.9	79.1

资料来源：人口研究中心《古巴人口》，（哈瓦那，1976）第75页。

大量欧洲移民对整个人口增长产生什么影响？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和古巴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能单单用生殖这一理由加以说明。1880—1930年，阿根廷每年每千人增加32.5，而出生与死亡数相减增长率为每千人18.1。因此，14.4的差额相当于移民数。重要的是要看到，移民情况表明每年平均增加44%，自然增长80%左右。⑥同一时期，巴西内部增长的作用是一样的（18.1），但那里的移民每千人只增加3.3，即约为增长总数的15.4%。⑦按照以上估计，移民对阿根廷的人口增长比对巴西重要3倍。如果人们将阿根廷和美国做一比较，也看到类似的差异。美国191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其人口的14.7%是外国血统，而阿根廷1914年的人口普查则表明是此数的2倍。

所有拉美国家先后都通过了移民法或者资助移殖计划。圣保罗州通过大咖啡园主建立的组织移民促进会或者通过海运公司与

⑥ 苏尔玛·L.，雷奇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特斯合编《阿根廷的人口》（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第24页。

⑦ 托马斯·W·梅里克和道格拉斯·H.格雷厄姆合著《1800年至今的巴西人口和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79）第38页。

表6 阿根廷人口中的外国人

	男人比例			14—64岁%			14—64岁外国人占总人口%
	总人口	阿根廷人	外国人	总人口	阿根廷人	外国人	
1868	1.06	0.94	2.61	56.5	—	—	12.1
1895	1.12	0.90	1.73	57.9	48.6	85.0	25.5
1914	1.16	0.98	1.71	61.4	50.3	87.4	29.9

资料来源：希诺·希尔马尼《阿根廷的大规模移民与现代化》，载于I·L·霍罗威茨编《拉丁美洲大众》（纽约，1970）第297页。

农业部拟订的合同以大宗款项补助海上航行。此外，该州当局在州府设立了移民接待站，全部移民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使用其宿舍和食堂。他们正是在这里领到去“高原”的火车票。该州在1892—1930年将财政收入的5.2%投用于促进移民事业，这项投资产生了很大的效益。⑧

有些国家白花了钱或者效果不大。波菲里奥·迪亚斯曾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移民于北部边境（该地区太容易招致美国的扩张主义倾向）、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土地正被交出用于种植出口作物）及中部地区（其农业生产正实行现代化）。1881年建立的意大利人垦殖点证明是失败了，并以使用墨西哥劳工而告终。实际上墨西哥并不缺乏劳工。不久，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尽管劳工分布很不当而且对招募作出的反应很慢。移殖成功的仅有例子都是私人组织的，如莫尔蒙斯的移殖事例。不过其数量微不足道。尽管如此，墨西哥的外国人口还是在增加。据1910年人口普查记载，该国有外国居民116,527人，其中有索诺拉的华人渔区、为数不多的波多黎各人从事龙舌兰纤维生产和 138

⑧ 托马斯·H·霍洛韦著《国土上的移民。1886—1934年圣保罗的咖啡和社会》（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1980）第56—57页。

少数牙买加人受雇于修筑铁路。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更喜欢城市和贸易及服务行业的工作。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各国，没有流入大量欧洲人。前往这些地区的人不是通过底层阶梯而是通过高层阶梯结合到社会中去的。例如，在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园主和秘鲁的银行家中，欧洲人占了很大比重。从底层进人社会的是亚洲人、其他拉美人以及来自牙买加和小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当蔗糖业未能跟上技术革新步伐的时候，加勒比诸岛的许多人由于这些岛屿人口迅速增长而人口严重过剩之时被暂时解雇。约有14.5万牙买加人离开本岛去中美洲修筑铁路、挖掘巴拿马运河或者收割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他们在收获季节还成群结队去古巴和圣多明各当种植园工人。有相当数量的牙买加人终于在他们的目的地国家的群体社会中定居下来。例如，在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的大西洋沿岸，至今还能听到有人讲英语。从委内瑞拉延伸到波多黎各呈弧形状的群岛也失去了它们的许多居民。在圣多明各，来自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种植园工人很快就被“可可罗斯”（英属西印度群岛人在那里通称此名）的洪流所吞没。他们后来在圣多明各和古巴又归海地人所取代。波多黎各人则向圣多明各、古巴和尤卡坦迁移，更不用说去夏威夷这个更非同寻常的地方了。同样地，就象哥伦比亚人在委内瑞拉那样，数千危地马拉人在墨西哥定居。

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和巴西不仅能吸引欧洲人，而且还吸引了邻国的人们。巴西人移居乌拉圭北部各省，1908年在那里占居民总数的1/7到1/5。⑨智利人到达巴塔哥尼亚的林区和荒地，而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则在阿根廷的最北部定居。

移民具有强烈的文化以及人口方面的影响力，尽管开始时不总是人们所渴望和追求的那种影响力。19世纪初，各国政府曾经

⑨ 胡安·里亚尔和海梅·克拉斯克科著《城市国家乌拉圭》（蒙得维的亚，1981）第75页。

热切希望让北欧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德国人移居它们的国家，他们因勤劳和具有公民责任感而受到称赞。他们被看成是实行社会变革和现代化的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劳动力来源。而且，欧洲移民并没有被看成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手段，而往往看来是使政府省却力量去通过教育和卫生政策来动员他们居民的一种程式。这一态度意味着是对它们自己国家的民众阶级的某种恐惧和偏见。这种政策不时还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阿根廷的1853年宪法实际上指示联邦政府鼓励移民，但规定应当是欧洲移民。60年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1912年移民法规定对高加索人要优先照顾。种族偏见甚至严重到只批准某些欧洲人的地步。然而，是经济需要高于法律和意识形态。获准入境的外国人都是当时可供利用的。到达的人们不是令人羡慕的北方人而是不那么受重视的拉丁人。加勒比的黑人和亚洲人也被接纳了，尽管是很勉强的。

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容接受国有时间实行任何歧视，移民自己就有许多地方可以选择。北美洲有一个时期已经成为吸引力的焦点。拉美本身在同一时间内也打开了几个大门。不管决定是由个人还是集体作出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等因素无疑都影响了未来的移民。葡萄牙人极其喜爱巴西这一事实就支持了这一论据。西班牙人转向独立后的古巴，也可以同样地以他们同该国有传统联系这一点来解释。尽管如此，这样一些亲缘关系也不能充分说明这些或其它的事例，更不能说明移民流入的年代顺序和周期性。

最近，历史学家一直集中注意成为衡量大量移民的标准的社会经济状况。实际工资的差别很有助于说明意大利和阿根廷之间人员的来来往往。外国投资和贸易也说明移民浪潮的方向和波动情况。移民和这些可变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密切，但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巴西和阿根廷之间进行选择。当地劳工市场的种种变化，看来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

140

死 亡 率

移民只说明拉美一些国家在1870—1930年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的部分原因。自然增长是其他原因，即主要原因。死亡和出生在不同程度上相结合决定这一增长。

拉美居民曾经经常易受高死亡率之害，由于战争、时疫和庄稼欠收，死亡率常常急剧增加。例如，我们已对巴拉圭战争对其人口的影响作了评述。更加频繁而更少有规律的是时疫，其中有些是内部生长的，如天花、麻疹、黄热病，而其他一些时疫，如霍乱等，是进口的。

霍乱是19世纪的灾祸，主要是由于洋际交往的进一步加强所致。其发源地是恒河三角州，通常从那里传播到中东，然后传播到欧洲，三、四年之后又从遥远的孟加拉越过另一个大洋传到美洲海岸。霍乱曾于1833、1856、1867—1870、1887和1894年五次袭击美洲。时疫发生的确切时间和严重程度因地而异。例如，据估计，19世纪后半叶霍乱在巴西夺去了15万人的生命。首先遭到最严重感染的地方是港口。然后霍乱就会向内地蔓延，尤其是影响到所有的城市，或出现在人口集中的地方，诸如巴拉圭战争时的战壕。在另一方面，距离远和交通不便是保护大陆内地不受传染之害的一些因素。确实，孤立状态证明是防止时疫蔓延的最佳保障。接近19世纪末时，船泊检疫和国际上采取的其他措施成功地制止了霍乱的复发。霍乱大流行时期已经过去了。

黄热病是另一种常见病。它以幼虫形式已经在加勒比存在了一些时候。不那么致命的一种黄热病变种还可能发源于美洲雨林地区。19世纪，黄热病经常发生（哈瓦那70年发生过7次）。传播黄热病的蚊子蔓延到土著人居住区之外，它们藏身在航船的船壳和帆缆里到达温和的低地。不过，黄热病从未感染海拔1000米以

141 上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黄热病袭击利马，而在另一海岸黄热

病被船只从新奥尔良带到了巴伊亚并由巴伊亚传播到里约热内卢。随后的10年又从里约热内卢向南传播。1857年黄热病传到蒙得维的亚，一年以后跨海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具有破坏性影响的一次是在187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居民近1/10死于这种传染病，给幸存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10]值得注意的是，在巴西，黄热病对刚从欧洲来的人的致命性比对黑人或巴西出生的白人的致命性要大。这一消息传到欧洲，使很多可能的移民推迟行期。

黄热病也是致使19世纪末第一次企图开挖巴拿马运河的尝试遭到失败的一个因素。北美人只是在开展了旨在根绝这种疾病的大规模熏蒸消毒之后才恢复运河的建造工作。古巴医生卡洛斯·芬利已证明了黄热病的传播媒介是蚊子。有组织的熏蒸消毒成功地使古巴和巴拿马摆脱了黄热病，同时也摆脱了疟疾等其他疾病。在其他地方，黄热病仍在肆虐。在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直到1932年还记载有5000个黄热病例。

除了这些大时疫以外，还发生过1917—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和1899年感染到桑托斯的淋巴腺鼠疫等地方病。其他传染病也经常发生，但主要是有选择性地传染儿童，有时也达到流行的程度。天花和麻疹尤其在农村居民中间继续造成死亡。范围广泛的肺病、肠道或寄生传染病长期以来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在19世纪的病死者中，儿童占有很高比例。1899—1931年，古巴将其婴儿死亡率降低了1/4，降到了仍然很高的168‰。墨西哥降低了一半多：从1896—1898年的324‰，1929—1931年这段时期儿童死亡率下降到了146‰。在同一时期，乌拉圭的儿童死亡率达到空前低，几乎稳定在98‰这一数字上，是拉美各国死亡率最低的。1865—1895年，出生儿童平均寿命（这是分析死亡率的另一种方法）在拉美大多数国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没有超过26.9岁。到1930年，平均寿命不过36.1

142

⑩ 参见米格尔·安赫尔·西纳著《187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死亡之时》（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

岁，在50年时间每年只缓慢增长2.2个月。在象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平均寿命到1930年才达到27.1岁，这个数字相当于其他国家大约50年前的数字。⑪

有关平均寿命的数字仍是不确定的。不过，这些数字揭示了这个时期拉美的死亡率趋势。总的说来，这方面没有惊人的改进；平均寿命依然保持在不稳固的低水平上。而且，有些国家的情况明显地糟。然而，在阿根廷，平均寿命早在1914年就达到了48岁，仅低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这个数字掩盖了地区间的巨大差异。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北部就大不相同，其数字分别为51岁和38岁。就婴儿死亡率来说，差异也是相当大的。其差异甚至高达200％。⑫

只有拉普拉塔河流域终于设法使其平均寿命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与乌拉圭一道是拉美最城市化的国家。而且相当一部人口住在首都。在抗菌素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时代，传染病的预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卫生标准以及可供使用的公共和私人卫生服务。这个时期，公共工程和公用事业尤其是在城市迅速发展起来。这是大部分拉美城市享有饮水和排水系统的时代，是市、州或国立医院建设的时代，是医疗职业在规模上有了发展并获得良好培训的时代。例如，根据普查，蒙得维的亚的医生人数在1889—1904年间从150人增加到243人。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进展不是在这个层次上，而是在水平比较一般、但同样有能力的辅助人员这个层次上，护士同期从3人增加到250人。从每71,687居民有1个护士的比例来看，到1908年这一状况有了改进，达到可以接受的每1,237居民有1个护士的比例。⑬这时已在城市

⑪ 爱德华多·A·阿里亚加著《拉丁美洲死亡率的下降及其影响》(伯克利，1970)。

⑫ 豪尔赫·L·索摩查著《1869—1960年阿根廷的人口死亡率》（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

⑬ 胡安·里亚尔著《1850—1930年乌拉圭历史统计资料》（蒙得维的亚，1980）第137页。

普遍开展起来的提高卫生水平的活动也有助于减少疾病和死亡。在1914年前后的阿根廷，外国妇女的平均寿命高出当地出生妇女的大约15%。[14]这种差距的产生多主要不是由于享有较高的地位，因为情况未必如此，而是由于受教育和习惯的原因。拥有众多欧洲人的城市通常较早地降低了死亡率，与欧洲的情况类似。因此，可以认为这是移民对人口趋势产生的进一步影响。

营养对死亡率的下降也起了作用，尤其是在农村。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粮食危机已不那么尖锐和频繁发生了，尽管营养不良状况和饥荒并未完全消除。在拉普拉塔河流域这个粮食大产区，食物丰富，品种多样。这是其居民健康状况较好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同太平洋沿岸各国加以比较，拉普拉塔河流域就得天独厚了。在这里，不同地区的出口作物是在损害自耕自给农业的情况下扩展起来的。因此，营养状况不会获得改善。相反，情况必然是更糟了。而且，这里的死亡率几乎毫无下降。

总之，通过逐步消除由时疫和饥荒引起的死亡高峰，死亡率似乎是平稳不变了。同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地方之间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些国家没有能解决造成死亡率高和平均寿命短的传统原因。少数国家走上了向现代过渡的阶段。可是，只是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对传染病采取果断行动，情况才更加普遍地加速好转起来。

出 生 率

20世纪初，所有拉美国家都显示了高出生率。在人口和面积占拉美大部分的12个国家当中，除一国外，出生率均超过40‰。乌拉圭这个唯一例外也没有落后多少（参见表7），根据现有证据，其出生率在20年前还高出1.2个百分点。

---

[14] 索摩查著《阿根廷的人口死亡率》第165页。

表7 20世纪第一个25年拉美出生率（‰）

	1900—1904	1910—1914	1920—1924
乌拉圭	38.9	36.5	30.1
阿根廷	44.3	40.3	35.0
古巴	44.6	44.7	36.7
巴拿马	40.3	42.0	40.0
委内瑞拉	41.8	44.3	41.2
智利	44.7	44.4	42.2
哥伦比亚	43.0	44.1	44.6
哥斯达黎加	46.9	48.9	44.9
墨西哥	46.5	43.2	45.3
萨尔瓦多	43.8	44.7	46.6
危地马拉	45.8	46.6	48.3
巴西	45.7	47.3	4[illegible].6

资料来源：O·安德鲁·科尔弗著《拉丁美洲的出生率：对历史趋势和波动的新估计》（伯克利，1965）。

但是，在这个比较均匀的高出生率格局内，有可能在本世纪前25年将这些国家划分为三类。第一类的出生率略有下降。在一些国家（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哥斯达黎加），这种下降是在短期增长阶段结束时出现的；墨西哥则相反，它是在革命期间的大幅度下降之后出现了较低的出生率，在这种意义上倒是一种复原；在智利，出生率下降很慢。第二类（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巴西）的出生率略有上升。虽然幅度不大，但与死亡率下降相一致，所以人口还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第三类（乌拉圭、阿根廷和古巴）到1920年出生率都低于40‰。必须记住，表7列出的出生率因纯数学方面的原因而往往将情况夸大。当出生数字除以较大的分母（由于移民到来和死亡率下降而使人口增加）时，商数必然下降。可是，如果出生率按育龄妇女所生女孩的数目来衡量，这种下降就不那么急剧了。

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移民引起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如果这

确实是原因的话。大部分移民来自南欧，这是一个家庭观念和生育观念强而赞成家庭子女多的地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外国妇女起初比阿根廷妇女生的孩子多，但很快就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为什么会这样？人口出生率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和南欧的同时下降难道是这两个地区生活和教育水准同时提高的结果吗？

145

在这方面，城市化看来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看来城市的生育能力低于农村。如果阿根廷农村妇女在1895年，平均有4.4个孩子，那么她的城市女同胞只有4个。同样地，乌拉圭内地的出生率为33‰，蒙得维的亚市为22‰。城市观念和城市价值观从城市传播到周围地区。乌拉圭内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出生率低于拉美其他农村地区。全拉美的高出生率可以主要归因于拉美这个地区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具有的农村性质。

在这些农村居民中，结婚的确是不普遍的；普遍的做法是自由同居。同居（未必不稳定）这种关系所生的子女按法律规定是没有合法身分的。私生现象在殖民地时代就很多，后来继续存在，只是有波动和地区差异。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大西洋沿岸地区，1915—1917年间每1,000出生儿中非婚生占630。在这个刚有人居住的地区住着的主要是流动人口。生活不稳定，助长了私生，但全国平均只有200‰。这个较低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⑮在另一方面，结婚率和出生率并不同步。在乌拉圭内地，结婚率提高时，出生率却下降了。阿根廷也是这样。

因此，当拉美某一地区遵循人们所期望的慢速生育模式时，而其他地区却解放了以前曾一直受到抑制的某种生育能力。一个因素也许是结婚年龄或开始性关系的年龄在降低。例如，墨西哥在1905—1925年间看来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最后，另外一个对外部的影响更加开放的地区，正在开始采纳更现代的习惯和逐步降低出生率。这种变化集中发生在拉美最大城市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

146

⑮ 凯西·加斯帕著《利蒙》第258页。

斯和蒙得维的亚，并扩展到拉普拉塔河两岸的农村地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虽然是罕见的和局部性的，却代表着后来被称为“人口过渡”这个现象的第一阶段。不过，在这个初级阶段，出生率比死亡率变化小些。特别是由于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以及由疾病和饥荒引起的人口危机的减少，更多的儿童活到了成年，生儿育女并加快了人口增长率。

内部移民

当国内外市场增加其对商品的需求时，农业开始需要更多的劳工。如前所述，欧洲、亚洲和加勒比工人以及邻国拉美人的到来，部分地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但是，在1930年前的50年中，拉美某些国家内也有相当规模的内部移民，迁移到在名义上受该国管辖的荒无人烟的“边疆”，迁移到似乎能提供较好机会的地方，迁移到小城市和大城市。在这方面，吸引力或拉力的诸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也有推动力的因素。在那些人口增长率快于经济增长率的地方，人口外流的阀门实际上是开着的。国内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发展便利了人们的流动。

如果移民越过省界，普查报告可以使我们再现其流动量。如果没有进行过普查，或者如果移动是季节性的或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移民留下的踪迹就容易失掉。今天可以得到的资料只能提供对内部移民的部分看法，而且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得到了充分探讨。

凡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殖民地时代未能渗入到的地方都还存在着“边疆”。例如，巴西及其邻国共有的亚马孙河流域、大陆最南端、墨西哥北部和热带沿海地区。分布稀疏的印第安人在这些地方的存在不妨碍这些地方被视为荒地，因此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财产。各国中央政府拟定了占有这些领土的各种计划。阿147 根廷的“荒漠运动”在1877－1881年的几年时间把相当于整个国

土一半面积的近140万平方公里土地合并于共和国。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向南贯穿整个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这里大部地区土地干旱，气候恶劣，土地很快被少数大土地所有者所瓜分，运来的羊比人还多。向北，查科这片面积不那么大的热带森林地区也被征服了。虽然新来者（无论阿根廷人还是外国人）人数少，但这些边疆领土的人口增长率却当然高于已经是很高的全国平均增长率。

墨西哥的"向北进军"，虽然在征服索诺拉并把亚基族印第安人撵出索诺拉时使用了武力，但并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中部和东南部过剩人口的缓慢渗入。对这些墨西哥人最有吸引力的地区是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湾沿岸。1921年，在下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人口普查中注册人口的59％、索诺拉的16％和纳亚里特的20％是州外出生的。在产油区塔毛利帕斯，是31％。在北部的中央地区，科阿韦拉和奇瓦瓦的人口中分别有32％和13％来自其他州。[16]对相当多的移民来说，到北部搞农业或畜牧业是他们继续前往加利福尼亚或得克萨斯路程上的一种过渡性活动。

巴西人口像往常一样集中在沿东海岸的狭长地带。该国的西部边界很含糊不清，是与邻国有争议的问题。在这片难以驾驭的杳无人烟的广大领土上，从不同方面开发了几个边疆地区。橡胶热把巴西人吸引到亚马孙地区。许多采胶人都是逃避塞阿拉旱灾的东北人。1877—1890年，亚马孙地区的人口增加了65.7％，在19世纪最后10年增加了40％。在1890—1920年间，富裕的马瑙斯城是这股热潮的繁华中心，该城也对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东部领土产生了反响，寻出路的人就是通过上述地区进行扩展的。

接近19世纪末时，咖啡种植业促进了圣保罗北部和西部的垦

---

[16] 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1900—1970年墨西哥人口与社会》（墨西哥城，1974）第1和第52页。

148 殖。迟至20世纪20年代，最后一批拓荒者仍然在推进，尽管是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即上苏鲁卡巴纳地区。最重大的变化是，最初的渗透是外来移民进行的，到1920年已为土生巴西人所接替。前外国殖民者要么再次移居城市，要么成为小自耕农，开始雇用日工。日工从巴西其他州纷纷而来。咖啡种植还开辟了一条后期向南方发展的路线，那里的劳工主要是土生巴西人。同时，巴西中部的戈亚斯和马托格罗索也从东北和东部地区吸收了大批人，开始了它们的人口扩展进程。

从塔毛利帕斯到马拉开波延伸着一条长长的长期被当作有损于健康和不安全的海岸地带，除了象韦腊克鲁斯和卡塔赫纳几个重要港口外，实际上这条海岸地带几个世纪一直没有人居住，尽管偶尔有人试图占领它。然而，有两种产品帮助形成这个边疆：先是香蕉，后来是石油。19世纪末，向美国运送香蕉的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大西洋沿岸地区取得了慷慨的租让许可。香蕉种植园很快通过巴拿马的博卡斯德尔托罗和哥伦比亚的圣马尔塔向南发展，沿洪都拉斯湾沿岸向北扩展。在墨西哥的坦皮科、哥伦比亚的北部和委内瑞拉的马拉开波湾还发现了石油埋藏。开采许可给予了美国和英国公司。钻井工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加紧进行起来。香蕉种植园和油田是外国的飞地，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没有什么贡献。大部分利润被弄走，但劳工留了下来。人口增加了，象接受移民的所有地区一样，年龄和性别都不对称。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外国工人在种植园被录用，而油井则将就使用当地劳工。例如，马拉开波的吸引力在委内瑞拉整个西部平原甚至遥远的安第斯山区都能感受到。

边疆是一块尚未被抢夺的土地。但在阿根廷、墨西哥、中美洲和别的地方，要占领的土地常常已被抢夺走了。当地和外国的少数人或公司，由于在政府中有影响而获得了土地所有权。他们能够挫败会给稳定的家庭生活打下基础的小规模定居的单独尝149 试。相反，被招到边疆的居民主要多是男性而且流动性很大，这

不利于人口繁殖。边疆地区常时期地依靠外界来的人。

那些长期以来就曾有人居住的地方生产能力有了加强，或者为满足市场需要而引进新作物来取代旧作物的时候，也吸引了移民。例如，在古巴，当老式糖厂被庞大的炼糖厂取代时，在奥连特和卡马圭省开辟了新的工作机会。古巴西部的古巴人和外国人在本世纪初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个地区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在阿根廷，除了新近合并的以畜牧为主的潘帕斯草原和巴塔哥尼亚以外，还有两个农业发展中心。第一个是在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北部延伸到科尔多瓦省中部的地带，谷类种植取代了畜牧业；第二个是遍及整个图库曼省甘蔗园。种粮食和甘蔗尤其是在收获季节需要大批劳动力，并从各邻省吸引了农村劳工。移民流动不时发生变化，但有两支很稳定：从河间各省往南流向圣菲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牧场；从西北各省到图库曼。在有195.4万外国移民进入阿根廷的1895—1914年期间，单单省际迁移的净人数（不包括省内迁移）达34.2万人。[17]

公开的劳工市场已在阿根廷建立起来。每当邻近地区因发展不平衡而造成尖锐的机会反差时，人们就自发地流动起来。不过，也存在劳动力不愿进入市场的情况。甚至在阿根廷西北部，为收割甘蔗而发生过强迫招募工人的众所周知的事件。在安第斯山、墨西哥和中美洲，强迫招募并非不常见。奖励往往与强迫交替使用和作为强迫的补充。人数上在这些地区占优势的印第安人并不总是欢迎货币奖励，而土地所有者为降低成本硬要把工资压得很低。因此，普遍的做法是通过代理人招募人，象债务奴役那样把工人留住一样。各国自由派政府奉行的将村社土地和公有土地转为私人所有制的政策在将工人撵出家园方面起了作用。正是这种政策将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沿海地带和墨西哥的恰帕斯进行开发以种植咖啡，将秘鲁北部开发以种植甘蔗。响应这种诱导 150

---

[17] 苏尔玛·L.、雷奇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特斯合著《在阿根廷的移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第131页。

的移民经常只不过是季节性的。然而在总的来往过程中，工人们偶尔选择在大庄园或种植园或附近的一些村子里定居下来，因此这个地区的人口还是增加了。

如果人口的增长与阻挠土地所有者使用土地两者相巧合，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基本上就是移民。在智利中部谷地的农业进入新的资本主义阶段时，庄园主比以前更不愿意出租小块土地，而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对劳工的需求。结果，农村的过剩人口不得不往别处寻找工作。北格兰德的采矿业在1855—1915年间吸收了大约15万人。南部边疆和更远的巴塔哥尼亚边疆提供了第二条出路。不过，都不足以解决问题，仍有大批流动人口在各地游荡，改换工作。铁路建设曾一度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个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同他们在自己家乡或庄园干的工种是确实相协调的。在收获季节，铁路的活儿就停了下来。最后这大批人到了城市，尤其是妇女在城里找到了做家庭劳务的工作。

在这期间，哥斯达黎加中部高原的小咖啡种植园开始落人大企业手中。因此许多土地所有者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资料，有些选择当了拓荒者，而另一些人则尝试别的工作。他们转向西北部的阿拉胡埃拉和瓜纳卡斯特和南部的彭塔雷纳斯而没有去香蕉园所在地大西洋沿岸。由于他们的带头，咖啡和其他商品作物传播到这些地区。

在乌拉圭，农村也不能够吸收过剩人口，因为其主要经济活动的性质是大规模放牧。乌拉圭虽然同阿根廷一样也种粮食，但只限于拉普拉塔河河口湾沿岸。内地仍主要用作牧场。牛、羊不需要什么人来照管。结果，人们前往小城镇，这些小城镇在向畜牧经济提供服务的同时，日益增多和扩大。

这些由于其所起的作用而具有部分农村部分城市性质的城

151

镇，也在阿根廷的牧区发展起来。在潘帕斯大草原，2000—10,000居民的集居点由1869年的27个增加到1914年的225个。在全国由48个增加到283个。这些城镇的人口从19.7万增加到116万，平均每

年增长4%，超过同期全国人口的增长率（每年3.4%）。相反，在1900年的墨西哥，2500—5000人的城镇有395个，5,000—10,000人的有121个，人口共计216.4万。10年后，城镇的数目几乎未变，而人口却下降到213.2万。1930年，第一类城镇有338个，第二类有136个，比1900年只多一点儿，而人口是213.8万，比1900年还少2.6万。这些城镇之所以稳定不变，可能是归因于波菲里奥政府实行的土地政策遭到了失败，由于革命，农村工人仍保留在土地上以及存在着可供生存的选择，即移民。

在整个拉美，大城镇和大城市从绝对数字和从占总人口百分比方面说甚至比小城镇发展得更快。有些国家的增长，如前所述，是由欧洲不断的移民浪潮造成的，而其他各处则是由从乡下和小城镇来的内部移民造成的。⑱

结　　论

拉丁美洲人口在1850－1930年间的突出特点是增长幅度大（大于当时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地区）和流动程度大。与此同时，其生活方式仅略有变化。

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拉美看来已走过了旧式人口制度的最后阶段。死亡高峰似乎注定要消失了，尽管死亡率依然很高。出 152 生率同样也很高，或者实际上在增长。不过，在有些地区，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在下降，从而预示着人口过渡的到来。这种转变始于象拉普拉塔河流域这些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尤其是城市。然而不应忘记，当时的拉美主要是农村性质的。不论其最终有什么意义，这些变化是不大的和局部性的。拉美人口十分年轻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拉美人口模式依然是比较传统性的。年龄金字塔

⑱ 关于这个时期拉美城市的发展情况，请参见斯科比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第7章。

底部宽，上部相当窄。老年人人数很少。

在这个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是相当稳定的社会里，人口流动性相当大。欧洲人、亚洲人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人作为移民进来，他们无论在哪里定居都促使各个地区和各国人口的增加。在这个地区范围内，也存在着相当规模的人口的重新分布，甚至跨越政治边界。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中断了一个世纪的边疆发展又恢复了。在大西洋沿岸一些地区，这种发展意味着重新占领16世纪以来已无人居住的地区。人们特别是移往因发展国际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地区。城市人口最终比总的人口增长快。关于拉美内部的移民，也可以说，一般讲，人口从山区流向沿海。高地不再拥有以前的那种优势。人口流动也是离心的，从安第斯中部和中部墨西哥流向大陆最北部和最南部，尤其是流向东海岸，那里是经济上最活跃地区和最繁华城市的所在地。人口的这种重新分布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也加强了社会稳定，因为人口压力解除了，人口灾难避免了。

第 5 章

1870—1930年西班牙语美洲农村状况

导 言

西班牙语美洲一词所包含的地区，地域广阔而多样。想要研究这一地区的农村历史，首先必须要明了概念上的困难和研究工作的不平衡所造成的限制。[①] 有一种方法是把整个地区以海拔高度为准，划分为低地和高地；或者把整个地区按种植园和大庄园划分为两种类别的若干区域。这种方法可以在诸如安的列斯群岛这种从前实行奴隶制度的产糖地区和以古典庄园为主的墨西哥中部或厄瓜多尔高原之间，做一概括的和有效的区分。但是，当人们试图以此方法分析其他地区时，这种有效性就不适用了。例如，墨西哥莫雷洛斯州的库奥特拉洼地，或阿根廷的萨尔塔，两者都带有种植园经济的许多特征，如资本密集型的大糖厂和现代的全国性市场，但是它们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印第安人小农。

① 本章的重点是中部美洲（墨西哥和中美洲）和安第斯高原（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传统的”核心地区。有关西语加勒比，特别是古巴的种植园经济和社会，参见《剑桥拉美史》第4卷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所撰第6章。有关19世纪的新拓居地，特别是阿根廷和乌拉圭，参见《剑桥拉美史》第五卷，科尔特斯·孔德、加略、罗克和奥多内所撰第9至13章。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以植物种类作划分，也就是说以其出产的作物来考察农村社会。鉴于咖啡、烟草或蔗糖生产确实具有某些共同的或一般的要求，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才如此。昆迪纳马卡咖啡种植园所产生的社会与卡尔达斯或哥斯达黎加的咖啡自耕农的情况就十分不同。虽然在中部美洲（Mesoamerica）*和安第斯高原古老文明残迹上建立的古典庄园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在土地所有者和农村劳工等方面都有人种和文化的极大差异。

这些分类法更大的问题在于，会使人堕入迷途，去孤立地分析农业社会各个部门，在现代和传统，庄园和社区之间做出错误的划分。之所以会犯这种错误，是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870年至1930年期间，以及在许多地方更早得多，与其他地区或市场的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农业社会的根本特征；农业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密切结合。再者，一个国家内的不同部门不仅已联结为一个体系，而且，这些部门同样也常常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甚至因外部需求而产生。最后，即使这样一个较为全面的情况也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法加以分析。有些人看到了引进新技术和组织的现代经济飞地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好处，而另一些人则指责这一进程，认为它是一种使穷人和无权者陷于不发达，或至少使他们的生活沦入困境的进程。

尽管西班牙语美洲农村情况各异，对大部分地区的研究十分零散，但在它1870年以后的发展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定的统一性。正如亨利·法夫尔指出的，西班牙语美洲是研究殖民地社会和封建社会如何对资本主义做出多种反映极其丰富多彩的园地。有些人可能认为“反应”一词学术味太浓，因为经济发展的六十

---

* 一译美索阿美利加，考古学上的地名，包括今墨西哥中部和南部、危地马拉、伯利兹、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一部分。——译者。

年周期的后果是从阿劳卡尼亚到亚基河*的残存土著人的毁灭，以及从尤卡坦到亚马孙成千上万土著人的受奴役。资本主义的渗透也为那些服从其纪律的人带来更多的工资，使那些不愿意服从的人受到强制和剥夺，而往往有“持续不断的调整，使两种社会形态得以在一段时间后结合起来并使本身得到巩固……因而有助于当地殖民地制度的与世长存，使他们（农业人口）一如既往牢牢地继续被埋置在这种制度之下”。②此外，另一个问题是1870年到1930年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经济力量（人口和特别是市场的兴起）的作用，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自由派国家支持的土地所有者的超经济强制的作用，或以稍许不同的方式说，变化的动力究竟应强调具体化了的世界体系呢，还是内部的政治活力，特别是阶级间的冲突？

要弄明白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情况不同并非易事，特别是我们缺乏书面证据，因此我们往往必须从行动或抵抗中寻找动机。除此之外，也往往难以确定我们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或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但是最近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以庄园记录和当地档案为依据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在这一章里对1870年到1930年间西班牙语美洲农村的社会变化做一总的评论，以及对有争论的某些理论问题做一概述。

1870年前后的西班牙语美洲农村

首先看一下西班牙语美洲农村在1870年左右形成的主要格

---

* 阿劳卡尼亚（Araucania），指智利南部地区，原为土著居民阿劳科族印第安人聚居地区；亚基河（Yaqui river），位于墨西哥西北的索诺拉州，过去是土著居民亚基族印第安人聚居地区。——译者

② 亨利·法夫尔著《秘鲁中部印第安农民社会的生机和向沿海种植园的迁徙》，载肯尼思·邓肯和易安·拉特利奇主编《拉丁美洲的土地和劳工》（剑桥，1977）第253—267页。

局。我们将考察老的殖民区的三种类型的农业环境，这些地区大多数位于中部美洲和安第斯中部的高原地区，这些地方与世隔绝的农业社会主要从事自给自足或为本地市场生产粮食的生产活动。在所有这些地区，大私有庄园（阿西恩达），农民村社和独立的家庭农场之间以各种方式相互连结在一起。

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农户在农业人口中人数虽少，但却具有重要经济意义，他们分散在墨西哥的伊达尔戈山脉或者巴希奥、哥斯达黎加中部、安蒂奥基亚、哥伦比亚，以及分散于西班牙美洲各地的其他几个小地区。哥伦比亚的卡尔达斯咖啡种植区只有28个占地超过60公顷的单位，其余为自耕农户所有。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秘鲁万卡约周围地区，大概只有不到2%的农业人口为大庄园工作，其余大多数是独立的小农。厄瓜多尔的洛哈和卡尔奇、秘鲁阿雷基帕周围地区，以及智利中北部的圣弗利佩省，都是普通独立农户非常普遍的地区。在一个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家庭农户的广泛存在非常值得注意。

157

这一现象可以从历史和种族的方面加以解释。独立的家庭农场的出现似乎是由于人口和海外移民在那些没有定居的土著农户的地方（或者在他们已被灭绝的地方）建立了边疆定居点，它们出现在土地尚未被大片地分封的地方，以及出现在尽管存在市场，但尚不足以促进规模经济的地方。18世纪巴希奥以及19世纪安蒂奥基亚的定居点格局，都是移民，主要是梅斯蒂索移民的产物。在其他情况下，当地城市市场对蔬菜的需求，或者大的庄园的偶然解体都导致小农的大量出现，与那些大庄园成为城市与乡村的纽带的地区不一样，这些地区在1870年时已相当城市化，已雇佣家庭的或工资劳动者，并在其后几十年当资本主义农业全面出现时与其顺利融合。

16世纪在定居的和人口稠密的印第安人地区，如墨西哥中部，危地马拉高地和安第斯山区大部分地区，强迫实行欧洲的农业形式，这些西班牙语美洲核心地区的农业社会类型是最具西班牙

语美洲特色的。其基本的成份是大的私人庄园，通常称为阿西恩达（hacienda），以及小农的村社。

西班牙语美洲历史上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西班牙人抵达前原有的村落（通常按一定的共有形式组织的）与欧洲人定居点所带来的私有庄园之间的冲突。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阿西恩达设法占据了大量肥沃和水源充足的土地，按照旅行者生动和充满羡慕的描写，其中有一些规模宏大，地域广阔，实际支配了整个地区。例如，范尼·卡尔德隆对米却肯圣巴托洛那位有教养的庄园主产生深刻印象：他是“他周围万物的君主”，是农场仆役和印第安工人的国王。[③] 尽管还有其他大量的类似描述，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例外情况当成普遍规律。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典型的阿西恩达是一片极其粗犷、四至不清和边界不明的广阔地域，生活着过多的长年劳工和放养着骨瘦如柴的牲畜。阿西恩达与村庄和占耕农拓居地并存和相互交错，不断与它的因地界和用水权问题发生纠纷，并时而发生暴力事件。 158

但是，尽管农村的庄园是一个粗犷和落后的地方，它却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部分。阿西恩达长期被人忽视，而近些年来成了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使我们看到，阿西恩达是一个具有双向性的农业组织：向前方，面向本地乡镇城市的市场经济；向后方，则是一支依然时常被前资本主义关系所吸引和制约的劳动力。庄园主将他们的农产品卖给当地市镇和矿区换回货币，然后他们购买设备，基础的制成品，和他们自己不出产的食品和商品，如国外进口的奇异装饰品和豪华的衣物。毫无疑问，拥有土地会带来威望，庄园的确具有自给和消遣的价值，但它主要的事务还是赚钱。对于19世纪普通的阿西恩达来说，自给自足（尽管从来不能完全做到）原则上是方便易行的。因为长年劳工成本低廉和附近没有生产厂商，拥有自己的石匠，冶金工匠和皮匠是很正常的。

③ 范尼·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著《在墨西哥的生活》，霍华德·T和马利恩·霍尔·费布尔编辑和注释（纽约州加登城，1966）第561页。

当时存在一个开放和活跃的土地市场。阿西恩达非常频繁地更迭主人，并不断地分割和合并。因而对某一个庄园的历史很难追溯到二、三代人以前。在所有这些意义上讲，不论是经济功能还是感情价值方面，最近的研究削弱了我们过去认为阿西恩达是自给自足“封建“庄园的看法，并使我们勾划出这样一个格式；甚至在厄瓜多尔和萨卡特卡斯的偏僻角落，阿西恩达也是以利润为目的和积极地（即便是不那么有效率和成功）参与市场经济。

在这个核心地区的农村，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与大庄园相联系而又必然对立的农民村社。许多这些村社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它们在西班牙人到达之前的根源；另一些可以追溯到传教市镇和西班牙16世纪的殖民政策。这些村社因与道路远近，与城市和矿区的远近不同，传教活动的多少和土著人反抗程度的不同，除了不同程度引进欧洲、亚洲的植物和动物以外，还引进了四个具有长期影响的文化因素：基督教，卡斯蒂尔形式的市镇政府，西班牙语和干亲关系——地中海体系的辅亲制。

159 尽管人们喜欢加上“本地的”或“印第安人”这类前缀，但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村社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的农民村社，它的合法地占有土地，主要种植本地的作物，生产和销售手工制作的商品，并享有很大的政治自治。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经过三百多年与私人庄园的冲突、调和和最终的共存，这些村社坚持了下来。例如在玻利维亚，这些村社到19世纪60年代至少仍占有农业土地的一半。甚至在墨西哥谷地的查尔科地区，尽管阿西恩达与村庄之间竞争激烈，但到19世纪中叶，村社依然拥有大量的土地。按照埃里克·沃尔夫的说法，村社“拥有政府授与的土地，其自治权受到维护，被赋予自主实施社会管理的职责，形成了一个小的，严密防卫的岛状地区，在内部保持其成员的社会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来自外部的攻击努力保持其完整性”。④

④ 埃里克·沃尔夫著《公社关系的等级》，载《中美洲印第安人手册》第6卷，引自本杰明·奥拉夫和格伦·卡斯特里德著《拉丁美洲的土地与权力：安第斯农业经济和社会进程》（纽约、伦敦，1980）第19页。

西班牙语美洲自1870年以后的历史大部分是为了摧毁阿西恩达和村社的这些双重基础。在这个阶段，村社首先受到了攻击，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斗士们力图使村社社员们脱离他们的谋生手段，并将他们的人身关系改变为契约关系。在这同一阶段，大庄园本身通过逐渐的再次分割和现代化，为了适应新的经济机会而重新加以组织。但这个过程对于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来说，未免不够迅速。1930年以后，阿西恩达也受到了攻击。

农村中第三个大类是大庄园占统治地位的地区，自耕农和村庄都不构成其政治对手，也没有对资源的争夺。在这一方面，墨西哥北部和相距遥远的智利中部十分相似。在这两个地区，欧洲人的殖民点扫除了根基不深的土著人口，并且由于几乎完全控制了土地，他们鼓励所剩不多的幸存者在阿西恩达的范围内定居下来，成为实物地租佃户或者劳役地租佃户。这类庄园有些规模十分庞大，并在19世纪期间扩展得更大。最近对萨卡特卡斯州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占地416平方英里的“马盖”庄园在该州仅名列第八。其他一些占地1,000至3,000平方英里，科阿韦拉州的桑切斯·纳瓦罗拥有的土地在19世纪40年代占25,000平方英里。马盖庄园基本上是一个畜牧庄园，它平均雇佣260个长年劳工，而将草场和小块耕地出租给另外100名佃户。智利中部的阿西恩达组织形式相似，但规模小些，而且由于土壤和灌溉较好，常住人口就更多。随着时间的变迁，在农村被忽视的空隙地带出现了占耕农村落；或者，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大庄园本身内形成了附属村落。当市场要求庄园增加生产或转产时，它就可以从这些村子里以及有时从流动的劳动者中获得现成的临时劳动力。占耕农和附属村落以及庄园主府邸周围的劳役地租佃户聚居地，当然与墨西哥中部或安第斯中部古老的村社迥然不同。在不存在村落中心的地方，农村人口就围绕着阿西恩达，它形成农村的社会、经济、并且往往是精神的中心。许多阿西恩达都有自己的小教堂，有些还有常驻的教士。鲜有市镇的存在，农民文化没有发展，也很少爆发农

160

民叛乱。阿西恩达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个环节，并有效地统治着广大农村居民。

夸大农业社会的传统特点是很容易的，想描述出一幅田园画卷也是愚蠢的，因为如果人们工作的不多，所得到的报偿和他们生活的舒适同样就会很少。但是无论如何，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些与世隔绝的内陆地区，其经济生活节奏缓慢，人们依季节和气候作息，外部广大的世界很少侵扰。尽管早在16世纪西班牙语美洲已被纳入大西洋经济，广大的农村地区只受到这种联系很小的触动。例如库斯科北面只几英里的锡夸尼，或安第斯中部深山里的阿西恩达实际上自17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如果我们看一下离城市或偏僻矿区市镇更远些的农村，路易斯·冈萨雷斯所生动描绘的与世隔绝的农村场景；在西班牙语美洲大部分地区直到19世纪60年代依然如故。在圣何塞一德格拉西亚（墨西哥中西部），时间是以季节和教堂日历来划分的，没有人阅读，没有学校，监狱或法官。很少有村民远离家园一天远的路程，当地的宁静只有每年两次骡队的来到才受打扰，马帮来收购皮革、奶酪、蜡和一点龙舌兰。人们小心翼翼地从泥罐中掏出一把把硬币来换取马帮留下的盐和几只铁皮锅。⑤

1870年以后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

对1870年以后西班牙语美洲传统的和与世隔绝的农村社会变化的总的分析，必须包括几个问题。首先，毫无疑问由于城市化而出现的贸易发展，以及从银矿区直到香蕉种植园等各种出口经济飞地对农产品的需求，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农产品更大的需求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了新的获利机会，但是随着更好的道路和铁路修建到内陆地区，他们也卷入了更激烈的竞争。其次，我们的分析

⑤ 路易斯·冈萨雷斯著《小镇上的人民：圣何塞·德格拉西亚简史》（墨西哥，1968）第100—113页。

必须考虑到人口，或者更具体地说，要考虑实际的和潜在的农村劳动者人数。对欧洲农业制度的研究早已表明，在向农业资本主义过渡中人口统计是一个关键的变项。人口增加是与价格上升，庄园利润增长，农村广大群众收入降低相互联系的，而当人口减少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尽管西班牙语美洲19世纪末向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欧洲更早些时候的过渡是否相似，这是可以商榷的，然而西班牙语美洲的变化却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还应当提醒自己，西班牙语美洲不连贯和偶然的发展与其说是由于有机的发展，倒不如说是由于外部影响所引起的。因此，尽管1870年以后西班牙语美洲变化的动力落到了农村的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使用许多具有17世纪特征的技术和与此相应的观念，但是这些西班牙语美洲的农民面临着一个不断扩展的城市开发地，并且往往有蒸汽机车将他们带到城市去。西班牙语美洲人口增长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是，当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土地所有者却总是抱怨"缺少人手"。第三，是国家的作用，它为农业变化提供了政治和司法的框架，并制约着发展过程。

尽管市场、人口和国家的作用都是分析农业社会的关键因素，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孤立地对待，显然，它们都密切相关又 162 相互依赖。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论是非人力力量还是市场和人口的客观力量，都无法为西班牙语美洲1870年至1930年间的变化提供一个充分的解释模式。首先，这是因为这一阶段实际上交错着几部历史而不只是一部历史，并且对农业变化非常难以做出一套单独的解释。此外，当人和土地尚不是商品的时候，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讨论农业变化是不够的，更何况这套机制本身就不完善。对市场和人口的考察确有所得的，是把重点放在西班牙语美洲农村的阶级结构，以及土地所有者为了榨取农村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使用的一整套经济的和超经济手段的方法上。现在让我们讨论各种劳动制度，它们相互的关系以及与土地的关系。

农村劳动制度

到1870年，在西班牙语美洲庄园上工作的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农村人口。第一种的长住居民，他们包括管理人员，农田作业队领班，职员和工匠，以及一些劳役地租佃户，后者在墨西哥称为棚户雇农，在安第斯地区称为契约雇农，养牛地佃户（瓦西庞格罗）、垦殖农和亚纳科纳，在智利称为因基利诺。长住居民往往是实物地租佃户或转租人，尽管他们也可以是来自勤奋的小农或其他土地所有者。第二种庄园劳动者的主要构成成分是季节性劳动者，他们来自长住家庭本身，如果附近有村社则来自村社，如果附近没有村社则来自占耕农或者流动的劳工。

从长住居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的形式是多样的，当然也因生产性质和庄园的目的而异。为了换取一小块口粮地，每天的玉米或面粉定量配给，以及一定数量牲畜的放牧权，劳役地租佃户必须在庄园上劳动。这些劳动可以是全年的一般性工作，但在收获季节或每年的屠宰时节，佃户的家庭必须提供额外的人手和劳役。

在某些情况下也付工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庄园帐册上登记的金额，而且往往只是帐面工钱而非现金。在1870年和直到20世纪，普通的庄园工人几乎没见过或使用过货币。基本的商品，如线、染料，刀具或进口的布料是由庄园商店经营的，工人购货款从他们的帐户上扣还。在某些情况下，庄园发行代价券做自己的货币。庄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同时尽量少付出现金。由于庄园是以自己的产品，如玉米，以及更主要的是以烈性酒交换劳动，这个目的明显达到了。无论如何，商店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尽管近来对庄园帐册的研究表明利润率并非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高。

163

在远离市镇或矿区市场的地方，庄园工人之间以及与世隔绝的村民之间的交换一般是以易货方式进行的。他们节省下稀有的

钱币向流动的商贩或当地的牧师购买商品。教会的服务一般需要付现金，但是往往也同样可由庄园透支的，而新婚夫妇或年轻的父母答应今后提供劳动。那些能生产出蜂蜜，蜡或陶器的村民或庄园工人，用这些物品交换铁皮锅，刀或一块漂亮的手帕。在米却肯的一个普通的村庄圣何塞一德格拉西亚，货币对当地牧工有三个作用：用以购买一小块地；在舞会和婚礼上装在衣袋里“叮嗤作响”以示炫耀；作殡葬的费用。

另外一种主要的庄园工人是在劳务需求高峰时期按日或周所雇佣的季节性劳力。他们通常是从附近村庄，占耕农拓居地，流动人口或为了增加收入的家庭里招收的。庄园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的季节性，当然它是随着技术水平以及活动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地主的角度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年当中特定的农忙时期有一大批可以招之即来的男女劳工，对他们只付很少报酬，而在淡季时又可以离开庄园，而不必加以照料供养。对于庄园主来说，他们并不愿采取奴隶制，尽管在某些地区因没有其他劳动力来源而又是绝对必要的。按照同一观点，村社是招收季节工的理想来源，只要庄园召唤他们时，他们不坚持先照料或收割他们 164 自己的庄稼。当土地充足而又使用不足，在铁路或市场尚未迫使人们严格遵守时间安排，以及在获取利润的时机尚不十分明确时，庄园容忍而且确实鼓励就业不足的剩余人口在庄园上定居。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大多数地方长住人口减少了，季节工也越来越多地以现金交易。

季节工的工钱是以货币计算而且也往往付给货币，但是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善。从不完整的记录和稀少的资料看，19世纪70年代雇主和劳工都处在学习工资劳动规则的阶段。在19世纪中叶，所有日工资的起点似乎是二个雷阿尔，或者是25分比索或等值的数额。很明显，童工的工钱要低些，同样，对于重活的女工，如果认为她们效率较低也付给低些的工钱，但对普通成年男性，上

两个世纪的两个雷阿尔惯例的工钱是最低的基线。从墨西哥到智利的庄园主就打算付这么多，有时根据手头工作的性质加上或减去食品配给。

在劳务需求高峰时期，工钱往往是以对许多农村人口比货币更有吸引力的方式付给的。在厄瓜多尔以及秘鲁高原的许多地方直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在19世纪中智利农村的占耕农拓居地，对于需要大量人手进行短期但是特定时间劳动的工作，庄园提供丰盛的食物和饮料作为刺激和报酬。

关于这种盛宴以及工资劳动的主要论据是，一个人除非被饥饿驱使否则是不会工作的，不管工资多少劳动质量都是一样的，一旦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劳动者就会偷懒或者不干。因此，一方面需要庄园的监督，另一方面要有大量的失业后备军。

在18世纪到处都开始了人口增长，由于霍乱，天花和百日咳不断造成死亡，人口增长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后，从1870年起人口普遍增长。因此，不但存在大量待招的日工后备军，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对于了解1870年以后农业生产增长时期的农业劳动形式，以及工资不变甚至实际工资下降，人口因素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口绝对密度本身并不能对此作出充分解释，尽管它确实变得有利于土地占有者。同样，更充分的解释在于农村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们相互间的关系。

165

季节工绝大多数是从附近的小农或独立农户中招募的。他们自己的种植和收获时间安排恰恰与庄园的相同。因此，只要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自然将庄园的招募置于次要地位。我们可以从最近有关墨西哥谷地的查尔科地区19世纪初的研究清楚地看到这种局面，庄园主恳求和引诱，但都几乎无法从拥有土地的村民那里招到劳工。

在19世纪后期，随着市场发展而尚未对村社土地进行大量掠夺时，处处都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人口密度大而庄园主却又不断抱怨“人手短缺”。庄园主认为，只要劳工没有按他们指定的日

子，限定的工钱和要求的进度工作时，就存在人手短缺。随着铁路和批发商的出现，要求有交货的时间安排。庄园主对于他们与农民之间在种植和收获时间上的冲突不那么愿意容忍，不那么容忍旷工和怠工，但仍不愿意付给足以吸引住一批稳定劳动力的工钱。在这种情况下，庄园主本身的种族观念和新接受的自由思想，以及获取利润的新机会同时发生作用，他们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在智利中部或墨西哥北部这些地区同样存在大量人口，在这些地方不存在古老的村落，人口增长以占耕农拓居地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有时出现在庄园上，有时是在庄园之间；而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另一件形式，即向外移民。1870年以后，成千上万的雇工从智利中部流向硝石矿区和铁路建设工地，而在同时，虽然技术没有多少进步，农业生产却稳步增长，而工资则几乎没有增加。由于城市里的建筑工程，或其他国家以高工资的方式提出了竞争，庄园主为了保住依附性的劳工和低工资必须寻找解决 166 办法。

自由主义发展：态度和政策

随着铁路渗入西班牙语美洲以及世界和本地区对产品更大需求的增长，在为了获取利润的庄园主和企业家中，态度发生了逐渐的变化。从18世纪末就出现了这种变化的许多因素，但现在已形成一种正统观念：迄今受到监护的农民从此应成为自由劳动者。为了实现这一点，几个世纪来为了从印第安农民那儿榨取劳役的陈旧的殖民式赋役（土地所有者通常替印第安人付税，然后要求他们服劳役作为报偿），在受到少数不服的庄园主抗议下，终于于1854年在秘鲁，1857年在厄瓜多尔，1882年在玻利维亚被废除了。农民村社同样受到攻击，理由是它们窒息积极性，阻碍了社会一体化，而同时自由派坚持要降低关税，这意味着农村工匠要么被迫与廉价进口品竞争，要么进入劳动力市场。教会被看作是

落后思想的巢穴和鲸吞资本的吸血鬼，在19世纪70年代被一步步地从经济领域里排除出去。

但是这一套古典的自由派态度并没有完全和迅速地转变为成功的政策，其原因有自由派对其下层阶级深深的蔑视和对成功的机会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同时也因为在政治上遭到了反对。因为1870年以后，有产阶级，特别是进步的庄园主控制了国民政府。直到1910年墨西哥发生革命，以及1920年以后智利和秘鲁出现城市群众政治运动后，情况才有所改变。此外，西班牙语美洲各地顽固的现象情况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诸如尤卡坦，亚马孙流域，或墨西哥东南部的巴耶纳雄耐尔等劳动力稀少而利润又高的特殊地区，国家准备以武力支持种植园主，并提供罪犯劳动力和强制移民。考虑到人们不愿在这些地区艰苦的条件下工作，所有这些手段都被认为是必要的。

然而，19世纪下半叶权贵们的观点普遍开始转向反对债务劳役制和使用包工头制——恩甘切（enganche）* 制度——只有在为组成严守纪律的劳动力必须使用这些手段的地方除外。一位参加墨西哥恰帕斯1896年农业大会的代表指出："自由劳动有更高的生产率"，而其他代表则向大会指出恰帕斯的劳动制度是"文明世界"所不容的，他们担心这会对那些可能提供资本的国家造成消极的影响。尽管这种观点在当时统治西班牙语美洲的人们当中越来越普遍，同时却又并存在着另一种难以消除的观点，即认为作为印第安人宿命论和黑人游手好闲产物的农村下等阶层的懒惰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只有在棍棒下才能很好工作，而且不可能有所进取。

167

---

* 一译募工制，一种由包工头通过各种手段，往往是拐骗诱胁等不正当手段，承包募集劳工的制度。包工头利用应募劳工的困难处境，以预付部分工资为诱饵，同后者订立盘剥性的契约，在立约期内劳工须按约为资方工作但领不到全部工资，受到包工头的中间剥削和控制，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译者

因此，尽管农业资本主义的冲击要求发生巨大的变革，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关系依然顽固地保持不变。从1870年到1930年之间，并没有出现向雇佣劳动的直接过渡，也没有取得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相反却完全取决于新生产力的力量，个别庄园主或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和农民的抵抗，从而出现了不连贯的、注重实效的前进和倒退，强制和抵抗。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居住在庄园上的劳动者的变化，有些观察家称他们为“内部农民”。⑥

首先，有证据表明出现了从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这种作法把销售的责任转到分成制佃农的身上，而且只有在类似墨西哥巴希奥这种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实行，实际上这个地区早有这个趋势。更普遍的作法是重新商订实物地租的分成份额，而地主试图获取更大份额的牲畜和谷物。同时，各地的庄园主对农村下等阶级中那些没有稳定租期和服役的劳役地租佃户农民开始增加服劳役的要求。1870年以后，智利的庄园要求因基利诺（劳役地租佃户）从他们的家庭中派出两个甚至三个劳动力，付给他们标准工资。为了要求长住住户增加劳役，地主试图从劳役地租佃户中产生出劳动力掮客，让他们负责使劳工服从安排，但这种作法充满了不稳定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同时，许多庄园吸收新的劳役地租佃户，但却大大减少对他们的津贴。这种作法对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特别是灌溉土地来吸引和维持佃户生活，而附近的村子又没有现成和可靠的劳动力来源的庄园来说是可行的。但是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秘鲁南部普诺的大畜牧庄园也紧紧抓住它们的垦殖农（劳役地租佃户），并且不愿减少他们按惯例在庄园上放牧的畜群，庄园继续以放牧权，食品和庄园商店的货物而不是现金工资来报偿佃户。在1876年和1940年两次人口统计期间，阿桑加罗省 168

⑥ 拉斐尔·巴劳纳著《厄瓜多尔山区庄园人种类型》，载奥斯卡·德尔加多编《拉美土改》（墨西哥，1965）第688—696页。

（普诺）居住在庄园上的人口从23％增加到36％。

在其他地区，新的市场机会刺激庄园主将更多的土地投入耕种或设立栅栏阻档放牧，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让新的全年性的、占地住户在庄园上定居。简·巴赞特曾对圣路易斯波托西19世纪最后30年的进程作过详细描述，庄园主取消了低价玉米优惠，逐渐减少佃户数量，而雇佣更多的日工。特拉斯卡拉—普埃布拉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中叶，庄园对它们从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大量就业不足长住住户和食客仍愿意容忍和保持。这种作法也许减少了失业和流浪人数（否则他们会流动），从而也没有必要制订类似美国的济贫法，并减少了农村中潜在的巨大社会问题。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及其后，实行现代化的地主普遍开始驱逐住户，如果增加新的住户则减少他们对土地的权利和减少面积。还有一个趋势是重新划定庄园的合法地界，因为在不那么严格的时期，地界被忽略或划分不严。在某些情况下，在被认定是庄园界划内曾存在着过多人口形成的占耕农拓居点，现在，庄园试图驱逐他们，对无法赶走的则限定在固定的地方。

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秘鲁一些畜牧庄园的记录表明了农民为反抗驱赶他们及牲畜做出了不懈努力。有一则报纸广告曾要将庄园“连带雇工”一同出售，这个例子过去用来说明封建制度 169 的不人道，现在则常被解释为要将佃户们认为是惯例的权利和保障剥夺掉是多么不容易。这也表明甚至在被认为是庄园主基本上控制的地区，庄园主的权威也是有局限的。如果手段太严厉的话，被驱逐的佃户有可能返回侵占庄园的土地或偷盗牲口。

在多余的佃户被逐的同时，被认为最忠实和勤劳的则留下来，成为农村中的特权人物。他们经常受到仁慈的家长式的照料，形式有医疗，在举行农村生活中重要的出生和婚礼仪式时得到礼品，免于饥荒和征兵。农民付出的代价是接受纪律和更繁重的劳役。

欧洲殖民者及其克里奥尔和梅斯蒂索后裔对土地的占有是一

个早在16和17世纪就开始的漫长进程。私有的和教会的庄园数量和面积都在增加，采取的方式有王室的赏赐，购买，边疆地区拓展，以及对土著人土地的不断掠夺。到19世纪中叶，尽管对分布情况没有全面的准确数字，但很清楚庄园已占有大量土地。

在土著人对土地的占有根基不深的智利中部，约90%的土地都处于大庄园（占地200公顷及更多）的地界内。在墨西哥靠北部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大的庄园占地约25,000到30,000公顷，而且随着干旱程度和离墨西哥城距离的增加，面积也就越大。但是在这一地区征服后由南方来的移民形成的印第安人村落也拥有大量土地，而在其他情况下，当时被忽略后来又被称为非法的占耕农自行在庄园上安了家。在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地区的中心地带，由于印第安人的顽强抵抗和王室对他们的保护，私人庄园的扩张被迫放慢。由于这一情况，以及缺少市场机会和随后庄园主减弱了获取更多土地的兴趣，到19世纪60年代，村落仍然占有玻利维亚2/3的土地，以及墨西哥中部和安第斯山区大概一半的土地。

1870年以后西班牙语美洲农村所发生的许多深刻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庄园对村社的侵袭和对它们土地的兼并。19世纪末自由派的立法及其对它的解释使得村社可以出售其地产，私人土地所有者可以购买。在墨西哥，《莱多法》以及1857年宪法对它的引伸，1861年哥伦比亚对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撤消，以及19世纪西半球各地类似的法令，目的都是将小土地所有者变成自耕农，简言之就是要形成真正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自由派从三个方面发起了进攻。庄园上的工人得到更好地组织，在有些地方对耕作技术做了改进以便减少所需要的工人人数；试图对地界做出划分，驱逐非法的占地者和实行反流浪法；最重要的是，夺取村落的土地。

170

侵占村落土地的浪潮在墨西哥是跟得最紧的。有些十分极端的例子，如在莫雷洛斯的甘蔗种植园主把好几个村子都抹掉了，或者把地界一直扩展到村落的大门边上，到1910年小农几乎完全

被转变为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了。然而，在莫雷洛斯尽管有咄咄逼人的种植园主和国家的坚决支持，但就我们在此所讨论的传统地区而言，仍然是个例外。在其他地方这个过程没有走那么远。在玻利维亚，1870年后的几十年，约有全部土地的1/3转入私人手里，大约1/3仍掌握在村落手里。在哥伦比亚的考卡山谷，危地马拉和秘鲁高原情况也大致相同。

这个进程的效果和目的都并非象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对村落土地的取消。在没有贮存临时工机制的地方，以及在城镇，矿区或建筑工程又形成实际竞争的地方，庄园确实通过提供灌溉的土地安置了额外的佃户。智利中部和墨西哥最北部情况就是如此，而在后一地区美国提供了报酬更高的就业机会。

但是在真正的村落农民"自古"就存在，人们与土地的关系根深蒂固的核心地带，掠夺农村土地的后果不是把村落完全铲除和把村民转向庄园。相反，村落被保留下来，但是被降到生活水平极低的程度，以致村民为了生存必须到庄园去工作。到1910年，墨西哥核心地区的农业人口只有45％靠庄园生活，在秘鲁到1940年只有20％。其余的人被驱赶到地域极度缩小的贫脊的土地上，通常是干旱或是陡峭的山坡地。他们生活贫困，因而可以被墨西哥或高原秘鲁的普通庄园吸引去当临时工，以及后来被热带地区完全资本主义性的农业新飞地。铁路建设承包商，矿主和城市的

171 雇主招去做工。

农民收入的另一个成份是家庭手工业。作为国家财政主要来源的关税，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曾为当地的纺纱和织布手工业者，帽子和鞋子工匠以及其他种类的粗劣产品生产者提供了某些保护。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偏僻地区高昂运输成本所提供的保护。对进口货物不加限制的自由化目标从未彻底实现，而关税的降低和铁路的修筑却使进口货可以与本地生产者竞争和把他们挤垮。哥伦比亚的桑坦德长期以来是一个繁荣的手工艺生产中心，但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女帽制造者，蜡烛制造者和织布业者无法维

持生产。在智利，由于英国兰开夏棉布的竞争，纺纱和织布者消失了。20世纪初，美国和英国商务密使所做的有关贸易和生意机会的乐观报告，反映了市场的规模和对当地制造业的蔑视。

核心地区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付给散工的日工资中看出。17世纪圣路易斯波托西和普埃布拉很长时期一直保持在每日付给两个雷阿尔，甚至还减少了。在阿雷基帕附近和智利中部，名义工资增加了，但是现有的资料表明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更为隔绝的地区实际工资普遍下降了。在当时大致相同的技术水平上出现的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并非象人们设想的那样出于真正的市场模式所产生的效果。部分原因是由于强制实行了更严密的组织，更严格的纪律，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每年更多的工作日而带来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在19世纪末，压低工资和榨取剩余劳动是地主阶级得以垄断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限制了农村不断扩大的贫苦群众的出路。其根本手段就是对土地和水源的控制。这一方法极为有效，以至几乎不需采取超经济强制。但是，万一出现冲突，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是召之即来的，尽管不一定直接使用。

对农村历史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超经济强制。人们长期认为，西班牙语美洲在正规的奴隶制，即监护征赋制和徭役被废除后，债务劳役制一直是地主控制劳工的手段。知识渊博的弗兰克·坦南鲍姆在本世纪20年代的著作中指出，大部分庄园工人被"一种债务制度束缚在庄园上"。[⑦]许多学者，特别是墨西哥和秘鲁的学者在30年代也这样认为，因此有关普遍存在债务劳役制的观点成为教科书中既成的事实和标准的解释。这种观点由于60年代围绕安德列·冈德·弗兰克著作而引起的有关生产方式的争论的论据而得到加强。在反驳弗兰克关于拉美农村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事实上从16世纪起就如此）的观点时，他的批评者极力想说

172

⑦ 弗兰克·坦南鲍姆著《墨西哥土地革命》（华盛顿，1930）第110页。

明，资本主义向拉美的扩展实际上却加剧了对农民的奴隶性的剥削，在此过程中债务劳役制就是一个主要的工具。

自从这场争论发生之后，对庄园记录和当地档案这类更基本的证据进行了大量新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债务应该真正被理解为一种债权，也就是说，它是给予农村劳动者中最可靠和最固定者的恩惠。其他学者发现，劳动者要求预付工资，尽管它在帐册上可能记为欠债，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劳动者因此而被约束在他的工作上。新的研究工作对以前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也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表明原先似乎有根据的事物对新一代学者来说也许情况相反。

研究的新结果表明，市场和人口是最能说明1870年至1930年期间农业变化模式中的关键因素：村民和庄园居民在寻找工作时都比以前所认为的要自由，地主为了获得他们的劳务而互相竞争；重心已从阶级结构方面转移了。但是如果说债务劳役制不那么普遍，债务也不具有那么大的强制性，这也并不意味着在1870年以及甚至1930年劳工和工作可以自由讨价还价和自由交换；恩里克·塞莫提醒我们，地主对劳工实行了控制，因为他付钱给进 173 行宗教服务的教士；他维持了提供初等教育的学校，让经过挑选的劳工的儿子上学；他控制或影响着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他是唯一可以提供医疗照顾的人，是本地以及海外商品的垄断进口商；他可以侵占叛乱村社的土地并能在耗时长久和花费昂贵的法律诉讼中胜诉；他可以影响当地的有时甚至国家的官员。归根结蒂，他有力量惩罚冒犯他的人，把他们投入庄园监狱，甚至处以死刑。⑧

这一分析毫无疑问适用于1870年，甚至1930年时期西班牙语美洲的许多地区。当然，在1930年墨西哥正在经历一场农业革命，

---

⑧ 恩里克·塞莫著《回忆录》。载《墨西哥历史上的劳动和劳工》(墨西哥，1979)第395页。

它开始打破阿西恩达的旧秩序，并使国家成为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停者。在其他地方，不断增长的人口浪潮已大大消除了公开的"领主式统治"的必要性，因为，没有组织的农村居民为了寻找工作已在阿西恩达大门前排起了长队，在这支不断延长和喧嚣的队伍中，地主可以随意挑选劳动力。

反抗与起义

西班牙语美洲农村的历史具有大量冲突与暴力的例子。对于19世纪特别是1870年以后，首先有必要将我们已讨论过的地区与出现了更新形式的农业资本主义地区区分开来。在现代经济飞地部门（我们在后面将详细阐述），工人以大种植园为其集中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组织了工会，稍后，又组成了政党，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而斗争。例如在秘鲁中部的瓦拉谷地，无政府主义思想从瓦乔港传播到农村劳工中，1918年该地的几名罢工者被军队枪杀。在北部沿海，甘蔗种植工人和糖厂工人组织了工会，其中有许多被纳入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普拉党)。在哥伦比亚，第一批农会组建于1917年，1918年位于圣玛尔塔的联合果品公司以及波哥大河下游的咖啡园周围地区举行了罢工。所有这些运动都有其思想和组织，并往往要求对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真正的变革。然而，在更偏远的地区偶尔出现更大的动乱事件。例如1931年5月1日，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占领了科亚伊马小镇，他们打出了赤色的旗帜并建立了苏维埃。 174

在内陆以及更传统的地区，反抗与起义往往是针对庄园侵占村落的土地，或者针对庄园为了使内部的农民无产阶级化的改组而举行的，这些斗争经常是采取本地化的种姓战争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斗争是"古代式的"社会运动，因为它们反映了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民对农业资本主义渗透的适应过程，这些人基本上是现代化所不能容纳的牺牲品。埃里克·沃尔夫指出，农民起义是对贫困化的反应，也是对乡村生活或庄园社会被破坏而替

代的体制又未建立时人与人之间关系质量迅速变化的一种反映。正如约翰·沃马克在研究西班牙语美洲农民运动中最重要的一次斗争时作所做的那样，这也许是用转弯抹角的方式来谈某件其实非常简单的事。莫雷洛斯的人民希望能象他们祖辈那样，不受侵扰地耕种自己的土地。当事实非常清楚，贪婪掠夺土地的甘蔗种植园主不允许他们这样生活，也不需要雇用他们很多人时，革命爆发了。导致萨帕塔革命的情况或多或少可以解释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农民起义。这些起义有它们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财产关系方面的根源，1870年以后它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冲突。

我们首先提到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情况到处都一样，因为形势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采取社区性的反抗和行动。纵观整个拉美，我们看到在智利中部或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北部即使发生起义，也为数很少。在迪亚斯时期，庄园控制了墨西哥北部农村地区，庄园本身形成了一个社区，拥有自己的一排排劳工住房，自己的小教堂和守护神。在墨西哥革命初期，尤卡坦的龙舌兰纤维种植园的玛雅劳工几乎没有什么行动，尽管皮萨弗洛雷斯的牧民狂热支持起义运动，而洛斯阿尔托斯和哈利斯科的则不然。

除了发生于1910年—1919年的莫雷洛期起义的典型事例，在庄园和村社共同存在的安第斯地区到处都发生了相似的起义。以规模和暴力程度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发生在1899年玻利维亚阿尔蒂普拉诺的起义，它是村社首领巴勃罗·萨拉特（后被称为“可怕的威尔卡”）领导的一次运动，目的是把庄园主夺去的土地归还印第安人。在塞罗—德帕斯科、万塔、托克罗约克和莫略卡瓦，在秘鲁高原，仅列举已经研究过的几个列子，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是由经济发展引起的冲突的例子。所有这些起义都被当地警察或国家军队与当地地主联合行动以武力镇压下去了。在托克罗约克，起义首领被陈尸于当地一所教堂屋顶数月之久。

175

自由主义国家的作用

东西欧农业社会的历史表明，在中世纪末和近代初期地主和国家在剥削农民阶级的共同利益中产生了对农民的不同态度。国家同地主争夺农民的剩余价值，而且往往希望保持农民阶级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的基础。西班牙语美洲殖民地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情况也是如此，王室和教会对土著人实行某种家长式的监护。王家法庭偶尔制订制约殖民地权贵的法令；王室与农民偶尔结成联盟。当然，近代欧洲民主国家的城市中等阶级在19世纪初被迫向农民和自耕农寻求政治支持。

西班牙语美洲到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国家在经过独立时期的政治不稳定后已走上正轨。除极个别例外，从那时到墨西哥革命（1910）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群众性政党的出现（以及在某些国家晚些时候），政治权力与阶级力量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治权力与地主阶级是相互关联和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在老的墨守成规庄园主和现代商业性地主之间，或在矿业的或新生的工业部门与农业利益之间偶尔出现阶级内部冲突（例如19世纪90年代在智利和哥伦比亚），但是这并不会转变他们反对农村下层阶级的立场。自由主义国家在调节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有时能起关键作用，例如将教会和村落的土地转入私营部门；而有的时候，例如实行反流浪法或在偏远地区建立法庭和秩序时，由于行政管理的无能则是无效的。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国家无疑是统治阶级的手臂，它却是一条软弱的手臂，在农村社会关系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迁就和妥协。因而，地主对农村劳工的有效控制，特别是在偏僻地区是有限的。但也有例外，如危地马拉高原，尤卡坦或亚马孙，因为国家非常重视咖啡、龙舌兰纤维和橡胶的出口，所以投入了充分的力量。但是当人们得悉一位智利庄园管家在1895年所说的，他不得不使劳工明白“好的和谨慎的指示”，并容忍一切形式的“无礼的行为”，就会对实际状况更了

176

解。⑨

可以在农村税收方面看到地主和国家的联盟。在欧洲，国家和地主经常争夺农民的税收，而在西班牙语美洲，地主往往答应替国家向农民收税。这种作法在殖民地时期很普遍，地主可以借此榨取农村劳工的劳役，由地主代他们交付贡税，在19世纪初共和政府也欣然把这个榨取劳役的工具交给庄园主。当贡税废除后，对农民的税收已不值得争夺。在秘鲁，从16世纪起对印第安家庭征收的人头税一直沿续到共和初期，到了1854年被废除，在厄瓜多尔1857年废除。在智利，国家曾考虑对小农征税，但是当设想的收税成本明显高于贫困的小农户所能提供的税收收入时，国家放弃了该项计划。只有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产才付税，其余农村下层阶级付印花税和一系列少量的市政税，对农民的产品很少征收什一税，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大多数共和政府基本上把它作为自愿的。

1870年以后，随着西班牙语美洲更充分地被纳入世界市场，出现了比农户税更方便的税收来源（主要的一项是关税），这种丰富的税源无疑减少了把农民作为国家收入来源之一的兴趣，也使地主控制的政府可以卸下或减少自己的负担。

如果说农村没有为国家提供多少税收，那么国家所提供的服务同样也是很缺乏的。19世纪70年代，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只驻扎了很少数量的乡警，其简陋的兵营通常设在庄园内，迪亚斯统治时的墨西哥对农村警察早已重视，19世纪80年代重新组织和加强了乡村骑警队。在秘鲁，直到本世纪20年代莱吉亚总统时期组建了国民警卫队才有了重大改进。大约在同一时期，智利组建了卡宾枪队。当然，在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之后，军队主要忙于对付国内敌人。军队不仅被用于镇压农村起义，征兵还被当作搜集不满分子和捣乱分子的罗网。对于莫雷洛斯的青年农民来

⑨ 拉斐尔·埃雷拉著《1895年'孔德家族'庄园回忆录》，冈萨罗·伊斯基耶多撰导言，《智利历史研究院简报》第79期（1968）第202—3页。

说，没有什么比征兵更难以负担和更可怕的了。

司法组织同样是与有产阶级密切联系的。智利在渡过独立后的动乱之后，到19世纪40年代已建立相当有效的财政管理和省级法院。但是在墨西哥更加偏远的农村地区，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建立法庭和国家监狱，而同一时期，秘鲁北部海岸的地主阿斯皮利亚加家族在没有国家法官的情况下实行着事实上的领主或司法权。例如，当一个庄园监工被人砍死之后，庄园审讯并处死了一位假定的嫌疑犯——一名中国劳工。直到19世纪90年代，国家才有效地把卡雅尔蒂和其他北海岸种植园置于其司法管辖下。

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当地主在农村地区的霸权正被打破时，在危地马拉和秘鲁实行的筑路强制劳动上可以看到国家和地主的合伙关系。秘鲁1920年制订的一项筑路法《公路征工条例》要求18到60岁的成年男子每年必须有6到12天的时间无偿地从事修筑和保养道路的劳动。在农村地区，当地地主往往控制了省政府，利用国家托管的劳工修筑将其庄园与集市城镇联接起来的道路。

无疑，国家为地主阶级提供的最重要的帮助就是将教会的土地转入私人手中。私人除了通过大量合同或开垦获取了大片荒地外，教会上百万英亩土地的出售使大的庄园获得巨大增长和巩固，以致到上世纪末叶大庄园在农村的霸权大大超过了封建殖民地时期的规模。

实际上，对教会土地的接管可以追溯到18世纪60年代，当时首要的教会土地所有者耶稣会遭到驱逐，其土地被公开拍卖。19世纪特别是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法制订后，成百万英亩教会土地转入私人手里。从生产和技术角度来说这没有造成多少变化，因为在强制出售以前，大部分土地曾由教会出租给私人土地所有者经营，但是突然抛售大片土地使地价下降并使商人和城市自由职业者有可能加入土地所有者阶层，因而扩大了地主阶级的社会基础，保持了地主阶级的社会价值观，并且总的说来大大加强了私人地主阶层。

178

除了将教会土地转入私人手中，自由主义国家还着手解除地主自古以来负担的教会债务。在以前的几个世纪，几乎所有地主，特别是在墨西哥和秘鲁教会势力根深蒂固的核心地带都必须设立一座捐建的小教堂或宗教基金，庄园必须每年拨付，尽管不一定总是履行，特别是到了19世纪初，但这些名目通常使庄园收入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教会遍布各地的网络被吸走了，而对这些教产只有债权和留置权。19世纪50和60年代，几乎西班牙语美洲的所有共和国都实行了一系列政策，它们使地主在以后的几十年摆脱对教会义务的重负。哥伦比亚1851年的一项法令允许地主以其拥有留置权的全部教产的一半价值的价款购进国家债券，赎回该项教产。然后，国家同意负担教会的开支。到了1863年，新的立法更有利于庄园主。他们可以用购买公债的方式赎回捐建的小教堂和拥有留置权的教产，其价格仅相当于全部价值的1/10。类似的法令在秘鲁于1850年和1864年通过，智利于1865年通过。智利国库从1865年至1900年间收到约350万美元的赎金，也就是说地主至少免去了1,700万美元的负担。在墨西哥，尽管1859年的改革法令没有明确涉及捐建小教堂和教会事业的问题，后来的立法实际上允许地主清理这些教会债务，赎回其抵押财产，所付的价款仅为价值的一小部分，常常只有15%。教会，以及依赖教会社会事业的广大群众最终是自由主义政策的牺牲品，而地主阶级则获得了大笔资本并降低了经常开支。

179

现代经济飞地部门

我们讨论了中部美洲和安第斯高原。到目前为止，为了方便起见，姑且称之为——传统的或与世隔绝的阿西恩达一村社社会，以及在国内市场和人口都在发展的时期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变化。在这个古老的社会的外围，通常是中低海拔高度的地区，出现了极为不同的农业生产组织，这些生产组织是因北大西洋国家对热带食品和纤维的巨大需求而产生的。咖啡种植园迅速发展，

尽管到1900年时巴西提供了世界市场需求的70%，但是咖啡也改变了从委内瑞拉到哥伦比亚，从中美洲到墨西哥的大片中度海拔的地区。同时，世界蔗糖生产也有巨大发展，尽管其价格在国际甜菜糖竞争打击下从1880年的每英担25先令下降到1900年的不足上述价格的一半。结果在美洲热带甘蔗种植区，出现了大公司（通常是外国人）对更有效率的和大规模的蔗糖工场的大量投资，这些大蔗糖工场设在加勒比，巴西和秘鲁北部海岸。此外，它们还对哥伦比亚，阿根廷的萨尔塔和图库曼，墨西哥的莫雷洛斯和韦拉克鲁斯海岸等规模较小一些的糖业生产飞地进行了大量投资。

除了这两种基本的出口产品，还有中美洲沿岸和厄瓜多尔的香蕉；到1910年时占巴西出口25%的橡胶；以及龙舌兰纤维，尤卡坦有成千上万的雇工从事这种生产，从而使美国和欧洲的谷物收割可以保有足够的劳力。龙舌兰纤维产量从1877年的约11,000吨增加到1910年的129,000吨，并占墨西哥出口的15%；秘鲁的棉花和羊毛，委内瑞拉和中美洲的可可，智利中部和新征服的阿劳卡尼亚地区的谷物。

这些新型的农业部门呈现不同的节奏。工人必须按时间表和持续地工作，而不能猛干一阵就要"饮酒狂欢"，他们也不能回家和村子去照料自己的土地。这种新型的农业部门根据世界市场安排自己的时间表，按照需要随时招收劳动力，而不是听从工人的方便。这个新市场受到欧洲需求和运输革命的驱动，使偏远的角落也有可能参加世界性竞争，这样一个新的市场突然落在了一片农村居民的头上，他们虽然人口众多，习惯于艰苦劳动，但是对新的劳动纪律要求却还没有准备。对过去习惯于按气候和自然季节劳动的农民，现在装上了秒表，时钟和铃。1916年，塞罗—德帕斯科铁路的一名工人因迟到一分钟，而受到工头的罚款和虐待。

按照E·P·汤普森的说法，象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一样，农

180

村人民的忙闲基本上是"随收获量为转移的"。[19] 也就是说，在收获季节，每年屠宰和剪毛时节，男人和女人们劳动时间既长又辛苦，但是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例行工作是修理围栏，清理沟渠，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庄园的记录表明，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三、四天，许多人每月工作不到15天。其余时间工作拖拖拉拉，按照路易斯·冈萨雷斯的观点，这有着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意义。对圣何塞一德格拉西亚的小农说来，享乐和工作并不冲突，它们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对于当地的牧主而言，甚至连在外地主都不值得他们羡慕。然而，只有男人才可以享受游手好闲的陋习，妇女则要整日操持家务。

新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对劳动的要求在有些地方如何产生具体影响。自16世纪以来秘鲁北部沿海就种植甘蔗，直到1850年那儿的劳工一直是黑人奴隶。在废除奴隶制后的最初阶段，种植园主雇了一些黑人自由民，从沿海的独立小农户中招募工人，设法从卡哈马卡山区主要是梅斯蒂索人中吸引工人，但是最后他们在1874年之前的时期不得不从中国招进88,000名男工（以及170名女工）。必须要到太平洋彼岸7,000英里之外招募工人，并要为此以及他们的船票支付费用，充分说明招募本地工人之困难。尽管许多种植园主认为秘鲁人，特别是山区人干活更出色，但也认为他们不可靠和反复无常。为了在需要劳力时唾手可得，种植园雇了苦力劳工，因为他们受到包身契约的约束。

太平洋战争（1879—84）摧毁了北部沿海的蔗糖经济，但是德国人，美国人和本地资本家的投资使其恢复了生气。为了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秘鲁新的种植园主实行规模经济，并特别注意降低劳动成本。种植园主试图从解放的黑奴，包身契约期满留下来的中国人和当地小农户中招取劳动力。但是由于几个原因，这

181

[19] E·P·汤普森著《时间，工作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载M·W·弗林和T·C·斯莫特合编《社会历史论文集》(伦敦，1974) 第42页 。

种办法不能令人满意。当地人有土地，渔业或手工艺制作等其他谋生手段，而中国人一旦契约的强制力结束后往往都脱离种植园工作转入从事小商业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种植园主设法从卡哈马卡和利伯塔德附近高原的梅斯蒂索中招收季节工。这一地区有大规模的庄园（例如，佩拉约一普加家族拥有30万公顷土地）和小农户的社区，大多数人居住于此。1876年的人口调查表明，人口总的说来是由白种人和梅斯蒂索农民组成的。仅仅在报纸上登广告或在村子里的墙上张贴告示是不够的，随着对劳工需求的增加，沿海种植园主采用了一种较为古老的方法，恩甘切，或包身契约工制，以便获得劳工。典型的包工头是一位在沿海和山区社会生活中都有地位的人。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他接近于种植园主阶级，他通常是一位商人或山区的地主，在当地有联系和影响。种植园预付给他们现金，规定对劳工的要求。包工头或他的雇员极力动员山区男子签订劳动契约，并将谈好的工钱以工资或货物的形式预支一部分给劳工。这种直接的和可见的报酬是必要的，因为每当工作完成后，没有几个山区雇工会为了遥远的和见不着工资的空诺言而进入劳动力市场。与现代工人不同，他们要求预付工钱。包工头提供到沿海的交通，并要对种植园负责必须按预付的工资完成劳动。雇工从事一般性的除草或砍甘蔗的工作，直到抵偿了预付的工资为止。由于负责招收，运送和监督这些庞杂的、未经训练的劳工，包工头可以得到工资总额的20%。

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制度所存在的弊端，雇工对和厉害的包工头打交道毫无经验，有时他们是通过劝酒或被灌醉时签的契约；一但他们到了沿海，很容易因食物或种植园商店分发的物品而欠更多的债，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偿还原先预付的工钱。有大量关于恩甘切制的不公正和弊病的记录，许多学者指出这是一种残酷野蛮，经常是强制性的劳动制度。当然，雇工也自愿地一年接一年地签订契约，也有人留在沿海而要求继续向他们在山区的家人

182

预付工资。契约季节工的人数从数百增加到数千。仅北部沿海的甘蔗业在1912年就雇了2万余人（1912年女子在整个劳动力中仅占3%），十年以后达3万人。

一旦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并尝到了它的好处，越来越多的雇工留在沿海。有些人在糖场找到了固定工作，其余的人涌入了新市镇和占耕农拓居点；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们看到的已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迁徙性劳动力，而是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他们组成了工会和政党，切断了和土地的联系，多多少少接受了对农村的工业纪律。

在许多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现代种植园和农民地区的同样联系，但有时结果完全不同。在阿根廷北部的萨尔塔和图库曼蔗糖生产区，劳工包工头从卡塔马卡和胡胡伊高原招收工人。有证据表明，种植园主买下庄园主的产权，作为获取糖场工人的一种手段。德国商人在本世纪初前后获得了危地马拉咖啡种植地的60%，乡警极为积极地站在他们一边，严厉惩治“流浪罪”，而在哥斯达黎加，人们似乎较轻易地过渡到联合果品公司的种植园制度。在另外一个事例中，亨利·法沃尔描述了万卡维利卡附近传统的印第安农民在1880年，是如何既不需要预付工钱又不需要包工头而选择了在沿海棉花种植园工作挣工资，然后带着收入返回家园保持古老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无产阶级化。

传统的庄园只是在现存经营方式下通过强化劳动的作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出口市场为主的新农业组织在性质上则不同，它要求劳动力具有完全不同的纪律和稳定性。在两种情况下，超经济强制都不那么重要。在内陆地区，村社土地的减少和人口增长使庄园主可以从雇农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在现代经济部门，种植园主和他们的代理人调整了经济刺激的形式来吸引前资本主义的农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代挣工资的农村无产阶级。当然，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也是在下列情况下发生的，人口增加了，在农村出现了一系列衣服和商品，这些吸引人的东西只有货币才

183

可以购买，以及自由主义政府越来越不容忍懒惰和游手好闲（现在称为流浪罪）。为了充分理解为什么有人留在了笼罩在庄园阴影下的小块土地上，而另一个人选择到沿海的种植园去砍甘蔗，必须要研究所具备的选择条件，以及至关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们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在这些思想未被探明之前，我们只能根据观察到的行动推断动机。历史的演员不以言词而是以行动表现自己的。

外围地区

在西班牙语美洲主要中心地区的外围，如亚马孙源头，智利的阿劳卡尼亚，尤卡坦和墨西哥的远西北，在1870年还有未完全有效地纳入国民经济和甚至未被“平定”的民族。欧洲殖民者没有征服这些民族，一方面他们进行的抵抗，另一方面他们的土地或资源尚未被看作十分有价值，因而不值得花力气去驱逐他们。在这些地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宣告了他们的末日。

在墨西哥北部的索诺拉州，亚基族曾抵抗西班牙人的占领，受到耶稣会的保护，在19世纪的头70年抵抗全国政府，而现在他们则受到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的巨大压力，迪亚斯政权把亚基族和阿帕切族看作是进步的障碍。迪亚斯政权的目标，按其本人的讲法就是把每个亚基人放在一张犁后面，正如一位科学家派大人物所说的那样，把印第安人转变成一项社会财富，变成新的灌溉土地上的垦荒者。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对大规模的灌溉工程进行投资，有一家合资公司，墨西哥北美索诺拉与锡那罗亚灌溉公司在亚基流域得到547,000英亩土地。他们希望3万左右的亚基人在看到了新工具，牲畜，衣物和灌溉工程后，会乐于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定居垦荒。矿业生产和19世纪80年代铁路的开通加剧了压力，1875—1886年亚基人和玛雅人被迫公开反抗。尽管该运动被 184 联邦军队镇压下去，亚基人在随后的25到30年间继续进行游击抵

抗活动。在上世纪和本世纪之交，索诺拉州政府平定亚基人的目标和尤卡坦庄园主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巧合（实际上，至少一位负责镇压亚基人的将军同时在尤卡坦拥有大规模的龙舌兰纤维种植园），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大批亚基男子被放逐到尤卡坦的龙舌兰纤维种植园，严加管束，强制劳动。尽管当地地主或开发者认为对亚基人的流放夺走了他们的劳动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反对，但是这种流放活动一直持续到1910年墨西哥革命前夕，在亚基族总数3万人口中至少有3,000甚至多达15,000人遭到放逐。在墨西哥东南部，龙舌兰纤维和甘蔗种植极需劳动力。在原料加工中使用了一些新机器，但却很少使用于种植和收割，因为即使是在劳力短缺地区还是能够找到人手，而总的成本仍比机器便宜。种植园主以减少津贴和增加劳动向定居的工人施加压力，尤卡坦和金塔那罗奥孤立无援的玛雅人被迫去干活；但是南方的种植园主仍需要到外地寻找劳工。当时引进了中国和朝鲜的契约劳工，甚至还曾试图引入意大利人；但是亚洲人无法忍受那儿的条件，欧洲人又成本太昂贵。由于这些原因，地主转而使用被放逐的亚基人，罪犯劳工，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流浪者和失业者，按照迪亚斯的标准这些人都被视为罪犯。

在智利南部，四百多年来抵抗了印加人，西班牙人和智利人的阿劳科人，现在都无法抵挡铁路和连发莱福枪，新的入侵者在考廷肥沃的土地上看到了在国际谷物市场上获利的机会。从19世纪80年代起的几年内，阿劳科人被限制在保留地上，或在这一地区新建立的庄园上充当有限制的劳役地租佃户。在亚马孙源头的普图马约地区，从热带部落招募或从加勒比和巴巴多斯运进橡胶工人。他们在"胁迫和烧酒"的双重驱使下来到这里充当割胶手，从巴西东北部干旱地区招收来的橡胶工人到1910年时出产的产品占巴西出口的25%多。

135

结　论

1870年以后的60年，西班牙美洲农村人口所经历的变化，也许是除了征服美洲时期以外他们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化。1870年以后，这一变化的推动力不是征服者或瘟疫的突然闯入，而是市场和人口不可抗拒的发展。经济和人口这两大力量是农业社会藉以构成的总格局。但是，正是农村劳动者之间及其与有产阶级的社会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下人们对生活的看法等等，有助于理解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冲击所作出的各种反应。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能孤立地看待。尽管很明显，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国外，但也必须明确指出西班牙语美洲农村的变化是通过城市作为媒介，和最终由城市控制的。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语美洲的以欧洲人为基础的城市，如瓜达拉哈拉，普埃布拉，圣何塞，麦德林，阿雷基帕，圣地亚哥等，都是人为建立的，它们是产品的集散地，农村权贵的居住中心，欧洲文化的中心和政治权力的所在地。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铁路建设的格局，中央控制的军队的建立和职业化，中央政治管理的进一步巩固，以及银行和信贷机构的兴起，保证了城市对农村的统治地位。

这种观点与先前对地主在榨取农村剩余中的作用的阐述并不冲突。在这一时期，土地所有者居住在城市，并形成城市权贵的一部分。尽管有时候他们依赖于商人和银行家，但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及本身是与当地外围商业和金融权贵交织在一起和相互关联的。在我们所讨论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地主在政治上具有绝对的影响，甚至在工业和城市服务部门出现后的初期，他们仍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结成政治联盟，以保证没有组织的和无权的农村承担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负担。

第 6 章

1860—1930年西语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经济与社会[①]

概　　况

在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加勒比地区的蔗糖生产和蔗糖贸

① 种植园是一个有组织的生产单位，生产单一品种农业原料　用于出口（或运往其他地区），因此，即使种植园由当地个人或集团所有，也已受到外国（或外部）市场的控制；种植园必定是建立在一个具有依附性的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国家或地区；它的效率必定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开发大片富饶肥沃的土地（更多的是依赖自然条件而不是技术或工艺因素），最后，种植园必须以使用大批非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为主，它以奴隶、债农、包身工或契约工等形式或对农业无产者采取各种形式的混合型剥削方式来使用上述劳动力。此外，一个生产单位作为一个种植园（它区别于农场、大牧场或庄园），它必须具备其中一个或所有这些特点。自19世纪40年代，古巴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咖啡生产开始衰落后，在古巴仅剩下了甘蔗种植园。波多黎各于19世纪70年代废除了奴隶制，咖啡和甘蔗种植园成为大庄园；由于美军占领该岛，种植园体制才得到恢复，但当时恢复的只是甘蔗种植园。在这一时期，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只有甘蔗种植园存在，因此，下文要讨论的几乎完全限制在蔗糖方面，因为我们要研究的国家和时期（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约1860—约1930）中的“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实际上是同义词。

易形式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只是地理位置的改变（生产从一个岛屿移向另一个岛屿）和有限的技术革新带来了一些变化。自18世纪60年代至18世纪90年代，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制糖工业结构被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和贸易形式以及新的成品，即生产出不同等级的糖，甚至使用不同的包装形式装船运输。大约自1860年以来的30年里，制糖工业持续不断的发展对蔗糖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产生了影响，它缓和了人际关系与劳资关系，并改变了古老的消费习惯。这一巨大的转变与其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又与一些世界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如西班牙殖民主义危机、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兴起、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口普遍增长和新的通讯系统问世等等。

188

制糖过程的每一道工序都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革新，旧式手工操作的机械（由非熟练工人操作）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复杂的机器，需要熟练的操作工人和有效的技术管理。安装这种新机器需要大规模的经济投资，而且要废弃现存的生产线、甚至包括大多数在旧体制下建设的厂房。因而，不能把新企业看成是经过革新的旧糖厂（就象糖厂过去引进了第一台蒸汽机那样）；我们这里所说的废除旧糖厂，是把它拆毁，在原地或其他地方重新建立新的厂房，由新型工人操作新型机器。旧联合糖厂一般保留下来的是一些供社会交往使用的建筑物、通讯基础设施和甘蔗田，不管怎样，它们只能满足新生产中心需要的一小部分，很显然，新型工厂要想赢利其产糖量必须大大高于旧糖厂的产糖量。新型工业种植园（制糖中心，或中心糖厂，19世纪末开始为人们所知）取代了一个或多个旧糖厂，并且寻找更多的肥沃低廉的土地。

这里，既有数量也有质量的变化。从数量上看，新的制糖中心同旧糖厂在碾磨能力上有所区别，而且碾磨甘蔗的出糖率更高。例如，在1860年所谓“新式的”机械化糖厂，碾磨甘蔗平均为30—50卡瓦耶里亚（大约425—500公顷，或约1050—1250英

亩）土地，② 在1890年，可以碾磨甘蔗达150或200卡瓦耶里亚的制糖中心并不少见。但是产量的增长高于碾磨能力的增长，因为同样数量的甘蔗，新糖厂提取的糖几乎是旧糖厂的两倍。

生产能力的提高加速了兼并过程，例如，1860年古巴有1,318家糖厂，生产约515,000吨糖；到1895年，糖厂数量降低到250个，而产量几乎上升到100万吨。波多黎各不久也发生了同样的兼并过程，1870年有550家糖厂，生产约100,000吨糖，这是19世纪最高的糖产量；到1910年，15个制糖中心生产233,000吨糖。接着，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兼并过程比巴巴多斯等英属西印度群岛晚一个半世纪）出现了大的甘蔗种植园。从社会意义上讲，兼并过程破坏了种植园奴隶主阶级（多米尼加共和国除外，它不存在这种阶级）。一种新型的工业企业家取代了种植园主。到1895年，古巴制糖中心的业主只有17％出身于旧的种植园主家庭，制糖工业中的“工业革命”同样要求改变劳资关系。旧糖厂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现在发生了奴隶制的总危机，1873年，波多黎各废除了奴隶制，古巴也于1880—1886年废除了奴隶制。

然而，加勒比工业革命并没有伴随一个互为补充的农业革命。相反，即使在新的合法政权下，制糖工业在农业方面（耕种和收割方面）仍保持了它传统的落后方式，这种方式源于奴隶制文化模式。因此，工业部门与其他的农业基础部门之间产生了技术鸿沟。与制糖中心相比，农业部门保持了它传统的陈旧模式：

---

② 本章使用的有关面积和重量单位换算如：

1卡瓦耶里亚（古巴）＝13.42公顷＝33.162英亩。

1卡瓦耶里亚（波多黎各）＝78.58公顷＝194.178英亩。

1卡瓦耶里亚（多米尼加共和国）＝75.45公顷＝186.444英亩。

1短吨＝2000磅（美吨）＝0.907吨。

1长吨＝2240磅（英吨）＝1.016吨。

在本章中，1吨＝1000公斤。

几年之内，报酬递减律（它适用于那些没有努力靠现代耕作方式提高产量的地方）则产生效应，其特征就是蔗糖产量不断减少。

其他社会和立法因素使这种局势更加恶化，其第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制糖业（工业部门）和甘蔗原料供应（农业部门）之间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分离，自19世纪末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冲突的根源。古巴和波多黎各老的克里奥尔糖业寡头，大部分被排挤出工业制造业，在很多情况下，种植园主们就象占了地盘赖着不走的垦殖农那样，时常与新的工业企业家——制糖中心的业主发生冲突。 190

随着工业化进程，制糖中心工人的生产率增长很快；但是农业工人、尤其是砍甘蔗工人的生产率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没有改进耕种和收割方法。此外，为了利用新工业设备巨大的生产能力，在榨糖季节甘蔗收获量越来越高，并需在短期内收割完毕，一般从1月开始，到4月结束。这又产生了两个影响极大的问题：其一是劳动力问题；另一个关于新工业设备的折旧费用和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这些大型设备的问题。

关于劳动力问题。根据现代工业所消耗的甘蔗数量，每年必需在3、4个月的期间内同时雇用成千上万名农业工人（收割甘蔗者）。因此，从不利的一面看，这出现了每年雇4个月的季节性雇工问题，对大多数劳工来说，这意味着一年中有8个月失业。起初，这种矛盾并不突出，因为非熟练的奴隶劳工（一年四季忙忙碌碌）用简陋的设备在小作坊和长时间的收获季节里几乎人人都有活干。但是，现代甘蔗种植园，要想经营的得心应手，需要一支失业大军，理想地分布在制糖中心周围，他们屈服于经济压力，被迫廉价出卖劳动力，是社会中得益最少的人。砍蔗工人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人组成了一支流动大军，他们可以在国内流动（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也可以在国外流动（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而常见的是两者混合流动。

由于现代工业设备的安装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需要找到额外

191 的收入来源，这项来源不必同制糖工业相联系，它可以帮助分期偿还巨额经济投资。除某些双重目的的设备（铁路、发电厂、铸造厂等）外，还有一些特定的服务部门成了自主的、有经济生存能力的"独立"企业。因此，我们发现，在典型的制糖中心里，运送甘蔗的铁路也为旅客提供服务；发电厂除向制糖中心供应电力外，还向付给电钱的附近居民供电；铸造厂生产的东西有为市政当局生产的公园坐凳和井口盖等——所有这些价格非常昂贵，因为制糖中心在它所在的地区享有经营这些服务项目的垄断权，此外，它对经济和政治有决定性的影响。19世纪90年代，古巴典型的制糖中心控制了百货店、旅馆、房屋和临时或永久居住的棚屋、理发店、肉铺、药房兼杂货店、有时甚至包括赌场和妓院。制糖中心这样做一部分是为赢利，一部分是为了全面控制它所管辖的地区。制糖中心甚至用一种代价券的形式发行自己的货币。因此，在殖民主义和不发达的情况下，古巴、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再现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典型的一个方面。③

使用代价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制糖中心用代价券支付工资。这些代价券在糖厂附近所有店铺和设备都是"合法"货币，而且可以在那里兑换成官方货币，当然得打折扣，这相当于减少工资。另一种方式是制糖中心用官方货币支付月工资；但是，由于工人得从工作第一天起偿付日常必需品，店主提前借给他们一小部分代价券，这些代价券只能在他的店或上属同一集团的其他店里使用，店主会通知制糖中心资方有关每个工人预支的情况，然后月底自动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一旦工人生病或被解雇，工厂会立刻通知店主停止借贷。从古巴和波多黎各现存的工场工资清册中，可以看出为什么许多工人在月底只收到工资10％的现金，

③ 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著《古巴糖厂中的代价券》（哈瓦那，1975）。

因为其余部分已被“预支”了。④

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个不引人注目、但极为重要的变化：新型工厂生产出的成品糖与原来的产品不一样，就象制糖中心与种植园不同一样。的确，这在19世纪60年代的市场报告中随处可见，给各种糖定价，而不是给一种糖定价。到了19世纪60年代，哈瓦那市场在确定世界糖价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哈瓦那和波多黎各的经纪人每天报14种不同种类的糖价。荷兰标准（西语国家称之为Tipo Holandés）被认为是最适合世界糖贸易的标准。它以成色为基础，分21个不同等级，1级实际上是糖膏，21级是粉状白糖。把糖分成多种等级是由加勒比上百家小工厂以不同方式安装的原始制糖机造成的：工厂成品糖的质量取决于自然因素（甘蔗成熟的程度）或取决于手工操作所提取蔗糖汁的纯度，以及煮糖锅的火候（烧火奴隶添加的木柴有多有少），最后，取决于名师的技术水平（一般都是文盲），他的指导仅仅根据他的感觉（闻、尝、摸、听），长期工作经验以及口头传授下来的规程。 192

另一方面，19世纪糖厂的工业制作程序是符合标准的，它们由训练有素的技术专业人员监督管理，采用国际通用的分析方法，用现代实验设备进行生产。由于采用了这些措施，在19世纪末，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工厂都能用离心机生产纯度为95°的糖。20世纪初期，纯度为96°的糖是标准纯度。在前工业时期，不同品种的糖至少需要三种类型的包装：箱子、大桶和袋子。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很少使用袋子（只占纽约市场销售总额的4%），

④ 19世纪80年代，古巴希瓦拉的圣卢西亚糖厂经营5个百货店，7个食品杂货店，1个鞋店，3个理发店，1个酿酒厂，1个药房，9个酒巴，1个学校，1个糖果点心店，2个小饭馆，3个铁匠铺，3个面包房，3个服装店，2个裁缝店和1个马具店。在所有这些服务行业中均使用由制糖中心发行的镍制代用币。非同寻常的是这些地区不接受由西班牙银行发行的古巴官方纸币，它必须兑换成圣卢西亚公司的代用币——而且要按至少低于面值10%的比价兑换。见《商业简报》（哈瓦那）1886年7月14日第2版。

到19世纪90年代，情况有了变化，美国进口的95%以上的糖是用袋包装的，到本世纪初，箱子和大桶实际已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了。

什么品种的糖就有什么形式的包装：这对食糖贸易的改变产生了影响。正如我们所知，新工业时期纯度为96°的糖是标准产品，它的原料（甘蔗或甜菜）或产地（古巴、波多黎各、爪哇、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巴西）已无法确定。这也是一种可以长期存放的产品，用袋包装，堆放和储存都方便。相比之下，60年代的混糖在质量上差距很大，容易损坏，用大桶装运只能堆放三层，否则底层的就会被压破。其他主要不同点即：大桶价格昂贵，而袋子便宜；大桶重（占总重量的10—14%），而袋子轻(不到1%)；大桶搬运困难，运费高，而袋子则容易搬运。

所有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种新的商业习惯：即储藏大量的剩余蔗糖。当新型离心糖出产后，越来越多的糖采用袋包装，因此它可以不定期地储存起来。这是“初期”存货带来的新问题，（在年初产糖时，仓库中就有现货），它是影响糖价的一个因素。食糖贸易商在定价时总要考虑库存初期的价格，因此，它本身并没有发生新的变化，所改变的是它的数量。这点十分重要。1860年以前，现有库存很少达到每年预计消费量的10%；到19世纪90年代，达到每年预计消费量的30%已经十分普遍，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⑤ 进口商库存的糖越多，他们对生产者的收购价格压得就越低。

所有这些新情况（统一的产品、袋包装、国际标准、大量库存的现货）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所谓“食糖贸易革命”。这种商

⑤ 总的来说，19世纪关于糖的统计数据一片混乱。1872年，西泽·查尼科夫的著名杂志《价格形势周刊》是开始为欧州市场发表“股票开盘和收盘价格”的第一批系列正规报导，以前虽有过但只是零星报导。几乎与此同时，F·O·利希特的《食糖月报》及威利特和哈姆伦的《纽约食糖贸易统计杂志》也开始刊登其他价目表。这些刊物上出现的数字有时相差80%。

业革命部分是由于上述具体的原因，但它也受到19世纪后40年其他世界经济因素的影响。在19世纪60和70年代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例如，历史学家们指出，1871年，蒸汽机船第一次超过帆船（后者取决于风向），前者不仅速度快、时间准而且运费低。一艘蒸汽机船运载货物的吨位是同一排水量帆船的5倍。此外，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又淘汰了定期行驶于欧洲一远东之间的大帆船航线。大体上可以推断，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运费，在1860年至1880年之间，平均降低了25%；同时，来往于欧洲和远东产糖殖民地（印度、爪哇、毛里求斯、菲律宾）之间的运费则下降了63%。结果，东方的殖民地终于突破了限制他们发展的高运费屏障。与此同时，夏威夷生产的糖开始运往加利福尼亚。 194

就此而言，这些新的因素仅仅影响产糖国。然而，与此同时，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甜菜糖生产出现特大的繁荣。1860年生产了35.2万吨甜菜糖，占世界全部糖产量的20%。而到1890年，甜菜糖产量上升到370万吨，占世界食糖总产量的59%，欧洲大陆由纯进口糖的大陆一跃而成出口糖的大陆。自然，这不是由“公平竞争”造成的，而是用补贴和直接援助（所谓的“糖奖金”）建立起来的一种错综复杂的保护主义体系，使甜菜糖价格降低到无法与之竞争的地步，从而将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的蔗糖驱逐出欧洲市场。1870年，古巴向欧洲（不包括西班牙本土的市场）出口糖约26万吨，占其全部出口总量的37%。1880年，古巴向欧洲出口量下降到5万吨，占出口总量的8.54%；1890年，古巴向欧洲出口只有4,702吨，只占古巴糖全部出口量的0.72%。

这三个讲西班牙语的海岛（其中两个仍是殖民地）只剩下美国一家主顾了。由于荷兰市场受到保护，爪哇提高了糖产量，从英国的保护主义中，印度和毛里求斯得到某种程度的好处，留尼汪岛（原波旁岛）从法国的政策中受益。另一方面，古巴和波多黎各（还有菲律宾）从未有过受到保护的市场：欧洲所有拥有殖民地的国家中，西班牙消费糖的人均数量最低，除此之外，西班

牙商业和海上贸易落后，使它无法成为其殖民地原材料的再出口国。圣多明各的糖也几乎全部掌握在美国手里。

到1890年，食糖贸易的国际市场仍具有同样的特点，并一直持续到1960年。首先是欧洲甜菜糖生产者在保护主义的壁垒下得到高速发展。其次是一些殖民地（法国和英国殖民地，荷兰的东印度群岛和夏威夷）将生产的糖运往他们的母国保护下的市场。第三是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等殖民地和象巴西和圣多明各这类的独立国家在没有受到保护的市场出售他们的糖。欧洲全部食糖的消费量与当地甜菜糖及来自受保护的殖民地的蔗糖供应量之间的差额是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各和巴西主要的竞争对象。这个在保护主义壁垒下幸存的最小的缺口，这种不正规、不稳定和残余的市场，在20世纪时却被冠之以“自由市场”的称谓。

19世纪末，欧洲食糖的进口行情的特点是缺乏弹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仅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上述所说的“自由”或残余市场）才存在自由竞争或供需相互作用。美国市场具备自由市场的特点，尽管本国产糖者从保护主义中受益，但他们的供应仅占全国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古巴是美国所需糖的主要供应者：19世纪60年代，古巴对美国出口蔗糖的数量占美国消费量的60％之多，而且在不断上升。其余主要由波多黎各和巴西提供，圣多明各提供的数量更少。然而，古巴和波多黎各都是殖民地，尽管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但从经济角度看，它也是一个殖民地。它们贫穷，受到单一作物向单一市场进行单一出口的限制。它们经济上毫无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它们也丝毫没有建立厂商联营的机会以保护原材料的价格。⑥

⑥ 在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时期，糖价常常降到低于生产成本，就在这时举行了首次限制糖产量和固定出口额的国际会议。1937年4月5日至5月6日召开的伦敦会议签订了《国际食糖协定》，第一次把进出口国双方全包括进去，进口国要向出口国保证一定数量的固定进口额。然而，直到签订《1968年国际食糖协定》之前进行讨论时，生产糖的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维护他们的基本利益。

在蔗糖生产国实际缺乏保护能力的情况下，强大的国际贸易集团迅速垄断了食糖贸易，它们甚至排斥当地商人，使他们全然沦为大国际公司的掮客。定价市场的地点也起了相应的变化，例如，1884年，汉堡的价格比哈瓦那的行市更重要，在商业决策中起的作用也更具有决定意义。此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发展，它标志着一个食糖贸易新时期的来临。到19世纪60年代，糖价一直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的概念是一个严格的物质概念：它指的是地理上拥有货栈的都市地区，买卖双方可以在此成交的地点。在伦敦是明辛街；在纽约是下华尔街；在勒阿弗尔*是如今股票交易大楼所在地的大广场；在哈瓦那，是靠近经纪人协会的海港地区，那里座落着主要的贸易公司，如德拉克兄弟公司，萨马—西亚公司；阿胡里亚兄弟公司等等。而"市场价格"是指当天最大出售量的最高和最低价格，即糖现货（"迅速"或"立即"）成交时最高和最低的现金交易价格。现金购买一般是现货交易（虽然惯例是装船运往欧洲或美国市场，通过那里的代理人出售，但仍是现货交易）。 196

在这个物质的和有形的商业界里，参数的确定不但客观也很具体，它需要商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具体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市场情况和趋势的理论分析上。商人是用初等数学进行计算的——因为，堂堂富绅不过是些没有文化的蔗糖商。就象由奴隶操作的旧糖厂被现代工业取代一样，在19世纪最后30年里，这种贸易形式（还有这类商人）一定会被采用新方法的新型公司所取代。一个简单而不可抗拒的现实是：旧的贸易组织再也不能应付现在订立食糖销售协议时遇到的诸多因素，也无力应付将来在纽约、巴黎、伦敦或汉堡交易所进行的交易。

简而言之，19世纪末现代制糖工业诞生了，它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综合体，其巨额产品必须符合国际质量标准。自19世纪60年

---

* 法国北部的商港和工业城市——译者

197 代以来，世界不断受到新发展的冲击：世界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运输速度的不断加快，处理信息的全新技术。把数学应用于商业（尤其是抽样调查、指数概念、经济统计的改进）；现代数据程序（十进制分类法、其他编码和检索系统、穿孔卡片），信息传递的新方法（电报机、电码、电话机、大西洋电缆、自动记录收报机）；商品销售概念，评定管理效率和操纵公众舆论的新方法；初生的国际托拉斯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来取得经济控制权——所有这一切都能在19世纪末大规模食糖投机买卖中找到。

从这个意义上看，食糖贸易在国际商业中居领先地位。例如，建于1861年的一家德国企业，F·O·利希特公司，是第一家食糖经纪人公司，它成功地、大规模地运用抽样调查来预测世界糖产量。利希特（Licht）的数字自1868年刊载于著名的《食糖日报》，成为食糖大投机商的重要工具。伦敦C·查尔尼科夫有限公司象利希特公司一样也进行预测，但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地区。1897年，后者在纽约开设了一家分公司，它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的食糖贸易中起决定作用：1909年它同以纽约为基地的古巴经纪人曼努埃尔·里翁达合并成查尔尼科夫—里翁达公司，几年之内，这伙经纪人控制了市场，成为第一次大战期间（1914—1918）古巴农作物的独家经纪商，同期他们还是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农作物的80%的经纪人。⑦ 他们和其他同类公司同时发挥着市场研究、商情发布和经纪人的作用，他们还充当了某些大糖业集团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往往谨慎从事。例如，威利特—

⑦ 关于F·O·利希特公司总的情况，见1961年纪念该公司成立一百周年时出版的《纪念册》。当时，F·O·利希特公司采用的抽样调查法的现代报表可在1890年9月13日出版的《法国经济学家》第340页"食糖"部分找到。关于查尔尼科夫公司的情况，见赫福特·简斯和H·J塞耶斯著《查尔尼科夫的故事》（伦敦，1963）。关于查尔尼科夫—里翁达公司的成就可向设在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咨询。

哈伦合伙公司（即以后的威利特—格雷合伙公司），暗地里充当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托拉斯之一的美国炼糖公司的代理人。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世界食糖市场落入一小部分加工者和银行家手中，他们采用最新式的“大企业”手段控制原糖生产者并排斥老式商人。这里，不能对这场斗争作详尽描述，⑧当观察供求法则时，关键的战略是要创立一种有可能控制市场的订价机制。这里，商品交换起根本作用，它开辟了殖民地产品贸易的新时期。对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古巴、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来说，伦敦食糖交易所和纽约农产品交易所（即以后闻名于世的纽约咖啡和食糖交易所）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这些交易所，至少在理论上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一些学者声称，它们是中世纪证券交易所的直接后裔。但是，不管它们关系如何密切，其相同点只是表面的。在商业革命之前，商品交易所一直是由买卖双方共同组成的机构，是一种有组织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中，供需相互见面以便实行商品交易。但是，新的交易所的一个基本不同点是，产品实际上不直接售出，所实行的交易完全是投机性的。简言之，商品交易包括签订买卖协定，其一方必须在限定日期提供一定数量的糖，以当天订价出售，然后交货。当交货日期已满，而糖没有运到，这时协定上的糖价要按到货当天的实际价格重新计算，两种价格之间的差额由一方向另一方支付现金，并向交易所支付少量的服务佣金。由于每天都有许多这样的业务，交易所为解决这类事务采取了必要措施。例如，它扮演了票据交换所的角色。实际上，真正转手的糖仅占交易的不到1%。因此，交易所并没取代进行实物买卖的糖的市场，它只是

⑧ 关于美国糖业托拉斯的兴起及其采取的办法的翔实材料，见艾尔弗雷德·S·艾希纳的《商品供应垄断的出现——蔗糖提炼专题研究》（巴尔的摩，1969）和杰克·辛普森·马林斯的《糖业托拉斯：亨利·O·哈夫迈耶和美国炼糖公司》（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南卡罗来纳大学，1964）。

控制这个市场，对价格和期限施加压力。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伦敦权威刊物《经济杂志》把19世纪80年代产品票据交换所描写成“……一个赌场，明辛街的一个蒙特卡罗”。[9]

然而，前面已经提及过，交易所并不仅是对商品价格下赌注的地方，而且还是由经济占优势集团为了扩大和加强对市场控制而设立的。1897年，在美国参议院调查大糖业托拉斯丑闻的听证会上，美国炼糖公司董事长西奥多·哈夫迈耶曾揭露，他经常通过股票交易所贿赂政府官员，并通过商品交易所将他所需要的价格强加于古巴、圣多明各和波多黎各生产的原糖上。[10]

不出人们所料，商品交易所的活动在19世纪最后十年里是不正规的。每天进行的交易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能。然而，必须记取的是，数据的集中和处理在当时是新事物，不同交易之间的关系不受任何规则的影响（由于当时国际电讯本身就很不正规，此外，它还被一小部分投机商所控制），因此，有人可以利用伦敦与美国东海岸5小时的时差，在纽约交易所开盘前就知道伦敦的收盘价格。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在美国（当时实际上只是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食糖的市场）食糖销售的期货不受任何法律条例的约束。1920—1921年，猖狂的投机活动导致了1921年8月24日通过有争议的《期货贸易法》。这项法令不久被宣布是违背宪法的，不过，以后又稍加修改，最终于1922年9月21日再次通过。

1860年前后到1900年前后的蔗糖产量增长状况

整个19世纪，古巴的甘蔗产量年年都在稳步增长，直到1875年，当时奴隶种植园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危机征兆，开始衰落。随

---

⑨ 见A·埃利斯著《投机引起价格上升吗?》载《经济杂志》第1期（1891），第197页。

⑩ 见马林斯《糖业托拉斯》第7章。

着奴隶制的结束，奴隶种植园于19世纪80年代最终解体。绘制一张曲线图就会发现制糖工业的发展表现出不规则地上下波动，尤其是1876—1880年这段时间，它反映了从旧糖厂向现代糖业中心的转变。然而，不到19世纪90年代，古巴又重新获得世界最大产糖国的地位，曾连续五年获得约一百万吨的蔗糖大丰收。但独立战争（1895—1898）使产量急剧下降。 200

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多黎各经济稳步增长的经济趋势只保持到19世纪50年代，当时出现了一条系列动乱，这反映了它的以奴隶为基础的生产的不稳定性。1873年，在丰收时节废除了奴隶制。然而，波多黎各奴隶制的废除并没伴随一个全面的现代化过程，19世纪90年代生产急剧下降。

不同的因素使这两个殖民地发展各异，尽管二者曾有同一母国，同一政府形式以及同一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

这首先由于两个岛国的历史背景不同。自16世纪到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古巴是西班牙帝国保护的中心，是海军和商船队的主要海运基地，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区域。这些因素使古巴产生了寡头政治集团，逐渐掌握独一无二的政治权力，并从一开始就从贸易、造船、修筑防御工事等项目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数额。结果，他们把这些资本投入农工联合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上，即烟草、咖啡和甘蔗。古巴的寡头政治集团极力利用1791年海地革命造成的对外贸易的有利条件，在这以前，海地一直是世界最大的产糖国。古巴作为重要的蔗糖联合企业的所有者脱颖而出，到1840年，古巴生产的蔗糖超过了英属西印度群岛产糖量的总和。

在古巴，不象在法属或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建立糖厂所需资金均在当地筹集，除极少数例外，糖厂的主人大都并非不在业主。* 相反，业主们住在古巴，按照惯例，每当甘蔗收割开始，他们都要搬进糖厂，实行监督，直接经营企业。他们象现代企业

---

* 不在业主（absentee owners），指居住在岛外的业主。——译者

家一样，紧跟世界技术的发展，并且迅速采用能使古巴制糖工业扩大生产能力或增加赢利的设备和先进技术。

早在1796年，这些本地企业家已首次尝试把蒸汽机引进蔗糖厂；1837年，他们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条将糖和糖浆从工厂运到码头的铁路通车仪式（这的确也是拉美第一条铁路），1842年，他们开始用真空平底锅制糖，1844年，他们架起了第一批电报线（美国也在同一年）；1849年，他们安装了蔗糖离心机。古巴，一个殖民地，在19世纪技术发展方面超出了所有拉美国家。在具备立法特权和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的双重影响下，依仗着天时地利（土地富饶、气候理想，森林资源丰厚，等等），古巴从1840—1883年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产糖国。波多黎各由于不具备这些特点，在产量方面比古巴要少得多。

然而，19世纪60年代，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种植园的危机初露端倪。这是一种结构性危机，是以奴隶为主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以及由于采用新技术带来的困难。[11]

于是，开始了不稳定阶段，生产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官方面临的问题）是要找到把奴隶转变成工资劳动者的解决办法。生产者的目标是从西班牙获得一项废除法令，保障他们能够收回他们曾向奴隶投入的那部分投资，从而用于现代设备的再投资。他们还希望制订相应的法律，使他们不断获得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即半奴隶性的劳动力——被迫每天劳动12—14小时，而仅能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并且在收割结束后就被解雇。

事实上，1863年，古巴糖业资产总额的95%以上作了抵押。对这一阶段的经济研究表明，对糖业进行3亿比索的投资，却承担2亿比索的抵押，这就是说，三分之二的制糖工业把持在商人

---

[11] 这里关于奴隶制对奴隶主利益的结论是根据对古巴糖厂账薄作出经济分析得来的。见曼努埃尔·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著《旧糖厂》（哈瓦那，1977），第2卷，第1章。关于1870年前一阶段的古巴制糖业的进一步讨论，见托马斯文，《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7章。

手中，他们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履行着银行家的职能。[12]

19世纪60年代，一系列有利的外部事件使这两个岛国的严重局势迅速缓解，但并没有从固有结构上解决问题（因为奴隶种植园不可能进行任何内部改革），也不能延长这种体制的寿命。美国内战和欧洲普法战争造成了典型的战时后果：市场情况混乱，需求增加，推动物价上涨。古巴国内的十年战争（1868—1878），是第一次大规模为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它加剧了蔗糖贸易的恐慌，并且扩大了有利的市场条件。由于古巴几乎连续10年获得丰收，而且糖价提高（尽管大多数年份是在十年战争期间）使古巴蔗糖生产者得以偿还了大部分抵押贷款，而他们的波多黎各同行也开始实现糖厂现代化，一般说来，后者在这方面落后于古巴。但是这个阶段是例外，古巴一旦渡过危机，它就会比以前更强大。

在波多黎各，老式甘蔗种植园迅速解体。1870年，有550家工厂，总产量为9.6万吨；到1880年，工厂数下降到325家，总产量为5万吨。由于技术太落后，生产危机加上质量上的危机使许多美国进口商拒绝购买波多黎各的原糖，因为加工厂拒绝接收。但是，解释该岛危机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其根本问题在于没有物质和经济的基础设施来建立工业化的基础。没有投资资本或足够的铁路系统，而生产者又没有采取共同行动，只是个别人做了一点尝试，大部分地区购买机器（即使有机器往往也无法有效地安装）和进行建设都很有限，因而只创立了几个制糖中心。到19世纪末，这些制糖中心尽管因年景好坏而有所不同，但一般都由于债台高筑而倒闭。仅举一例为证：1873年，卡沃一卡里韦侯爵莱昂纳多·伊加拉比德斯在贝加巴哈（Vega Baja）创建圣维森特制糖中心接管了周围很大面积的种植园以确保其工厂甘蔗原料的供应，并雇佣了几百名工人砍伐甘蔗。但是到1879年，它

[12] 劳尔·塞佩罗·博尼利亚著《糖业和奴隶制的废除》（哈瓦那，1971）第39页。

所欠下的债达一百万比索之多（1比索等于1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除圣维森特外，1880年，还有其他4个制糖中心，即路易莎糖厂、圣弗朗西斯科糖厂、科洛索糖厂和卡诺班纳斯糖厂。从经济方面来看，它们在整个19世纪的遭遇如同一辙。

另一个限制波多黎各制糖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没能有效地促成从奴隶制向自由劳动的转变。人们常说，波多黎各的奴隶制是1873年废除的，但这仅限于法律条文上。事实上，奴隶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到19世纪20年代，该岛缺乏符合种植园主要求的劳动力。波多黎各不象古巴那样有大量移民劳工流入，它只有来自中国的少量苦力；波多黎各也未能建立西班牙移民劳工（当时被生动地称为燕子）制度；一度曾试图从英属西印度群岛进口劳工，但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别克斯附近和庞塞、乌马考、洛伊萨和卡罗利纳的糖厂安顿下来。⑬

古巴情况则不同。港口附近地区蔗糖业呈现出一片十分繁荣的景象。到19世纪中叶，这些港口已经拥有极好的铁路网，最初设计这个铁路系统主要是用来运送桶装和箱装的蔗糖，现在可以把地里的甘蔗运到工厂，用处极大。至于劳动力问题。1847年，大批苦力开始移居此地，到19世纪末，已约有15万人。劳动力的另一个来源则非同一般。西班牙正规军必须在国内参加卡洛斯战争*，古巴的卫戍部队主要由从西班牙招募的壮丁组成，古巴颁布的一系列规定（当然西班牙认为这是完全违法）为应征入伍者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服兵役，另一种是签约在糖厂做工。古巴十年战争一爆发，许多新兵自然而然成了砍蔗工人。在19世纪

⑬ 关于波多黎各制糖业，见安德烈斯·安东尼奥·拉莫斯·马泰著《1873—1898年机械化对波多黎各糖生产体制的影响》，（未出版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7）和《19世纪波多黎各甘蔗种植园的发展与危机》(圣胡安，1981)。还有何塞·库雷特著《废除奴隶制》（圣胡安，1979）。

* Carlist Wars，这里指1870—1875年支持唐·卡洛斯后嗣争夺王位继承权的西班牙内战。——译者

80年代，新建的大蔗糖工场的场主设法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季节性劳工流动制度，这些劳工在1月初抵达，4月底离去。他们来自加那利群岛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省，那里生活水平极低，人口过剩，失业率很高。

许多西班牙商人和老一辈的克里奥尔(古巴出生的)政治寡头家族拥有大量资本并向制糖中心投资，这种现象自19世纪80年代起尤为突出。在这方面有必要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古巴血腥的十年独立战争对制糖工业现代化十分有利。这场主要在该岛东端进行的战争摧毁了100多家旧糖厂，这都是些技术落后和生产效率低下的糖厂。而位于国家西部的那些新的“巨型”糖厂（其产糖量占古巴总糖产量的80％）并未遭受战争的破坏。⑭

此外，殖民地银行和古巴岛西班牙银行都被西班牙大商人和古巴寡头政治集团的某些成员控制着，他们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提供战争费用，而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交易。古—西海运和铁路公司负责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运输。在殖民政府的军事统治以及在“战争状态”的心理压力下，出现各种地下交易，非法致富比比皆是。事实上，战争结束时，这些集团拥有必要的流动资金向“新型”(即非常现代化的)制糖工业投资。

还有其他因素。当地生产者出身于产糖世家，他们有政治经验，长期共同利益使他们很好地组织和团结起来，他们充分意识到时代的需要，并开始创建一系列机构来指导新兴工业。根据这一思想，1879年成立了古巴岛庄园主联合会，目的是要协调制糖业主要有识之士（和最大的资本投资者）一起行动。从一开始，联合会就指导生产者的活动，提出引进季节劳工的方案，成立农

⑭ 19世纪古巴只进行了两次糖业的统计调查，这些可以在下列书中找到：卡洛斯·雷韦略著《与古巴岛蔗糖生产有关的糖业状况》(哈瓦那，1860，书中没注明出版社名称，该书实际是在纽约印刷的)，《1877—1878年古巴年初预算中关于现存甘蔗种植园的资料》，此报告载《经济杂志》(哈瓦那，1877年1月)第60页以下各页。

业和工业培训学校，主持调查研究工作，与纽约和伦敦糖业交易所建立直接联系，出版普及性刊物，组成强大的院外集团以保护工业利益。在这期间，纷纷成立了许多类似的地方性垦殖农或甘蔗种植者联合会。

最后，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说明。第一个是关于废除奴隶制的问题。[205] 1880年，古巴废除了奴隶制（比波多黎各晚7年）。然而，废除并不意味着对主人唯命是从的广大群众一下子以为他们都自由了，并获得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责任。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废除奴隶制就会带来制糖工业的全面崩溃，因为到1877年为止（这是能够准确统计古巴奴隶人数的最后一年），70%以上的糖产量是以奴隶劳动为主生产的。然而，前面所述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实际情况是，《废奴法》仅仅是对奴隶制事实上已经解体的形势予以法律上的承认而已。

早在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70年代，"奴隶制"的词意实际包括范围广泛的对劳工进行剥削的手段。首先是"纯粹"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在糖厂强制劳动。其次是雇佣奴隶，他们的情况与前者完全不同：禁止体罚，可以领到一部分工钱。最后是日工或称为挣工资的奴隶，是前者的一个变种，由奴隶本人与糖厂签约，领取一定的报酬，定期向他的名义主人交纳部分工资作为获得半自由人地位有权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交换条件。还有一种挣工资的奴隶（在当时很普遍），他们的工资一般相当于自由民工资的50—70%。上述各种类型的奴隶中间，许多人拥有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一部分收成卖给糖厂。同他们一起劳动的有黑人自由民、白人、中国人和来自尤卡坦（他们实际上是奴隶）的契约劳工；往往还有犯人，后者由政府送往糖厂干活，只领取少量工资。这种劳动力供应方面的不正常现象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起着阻碍作用，《废奴法》是使混乱的劳工体制不断合理化的一个途径。

所有这些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古巴

糖业生产变革的实质主要是经济和社会方面而不是技术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设备和工艺程序方面没有重大改进，这种改进是有的，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我们所证实的生产工艺程序的全面革新不仅仅是安装现代工业设备问题（古巴许多糖厂自19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这项工作）；它还表明在社会和体制方面的革新，它绝不能由奴隶主来完成。他们中间的比较反动的分子尽量保住和剥削他们的奴隶，死死抱住注定要灭亡的一切，紧紧抓住他们视为部分投资的奴隶。对他们来说，也许别无选择。 206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古巴的兼并过程。正如我们见到的那样，工业化挤掉了效率低的单位。在古巴最重要的蔗糖区马坦萨斯，1877年，有517家工厂，产糖量约35万吨；到1895年，糖厂数量下降到99家，但产糖量上升到60万吨，几乎提高一倍。[15]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糖产量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工厂，但在土地所有权方面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变化。也许是留置权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其他义务（尤其是资产抵押的不可回赎和不可分割性）凑合在一起阻碍了有利于工业集中的土地兼并，致使工农业之间的悬殊拉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工业和技术进步时期，甘蔗种植方面的落后状态。

就土地或糖厂的直接所有权而言，19世纪在古巴制糖工业中几乎没有美国资本。当然，有个别美国糖厂主，这与其中有法国、加拿大和德国糖厂主没有什么两样。1898年，占领该岛的美军军方的调查数字表明，当时93.5%的糖厂属于古巴人和西班牙人；仅有6.5%属于外国人，当然其中也包括美国公民。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有许多工厂列入“美国人”一栏，他们实际是地

---

⑮ 关于1877年的情况，见注⑭。关于1895年的资料数据，来源于《各省糖厂的名单及其有关资料》，马坦萨斯，1895年9月23日（这是奉各省当局之命编制的登记册）。原稿在马坦萨斯历史档案馆。

道的古巴人和西班牙人，这些人是不久才获得美国国籍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19世纪后几十年古巴制糖工业发展的内部因素的变化。但是，外部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美国在古巴制糖工业中只占有限的部分完全是指对糖厂所有权而言。但是，从国际贸易观点看，美国曾长期行使霸权，到19世纪70年代时，在美国的“竞争的黄金时代”已告结束，至少在制糖业方面是这样，当时，商品供应的垄断结构已经存在。1887年8月，糖业托拉斯依法成立，吸收美国炼糖公司为其会员，同年10月，并同意吸收美国7个城市中的21个炼糖公司为其会员。实际上，十年前托拉斯就已经存在了。[16] 美国的《1871年食糖法》是新殖民统治的第一个法律工具，是迫于来自美国东海岸炼糖商的压力炮制出来的，其主要目的是在经济上控制古巴、波多黎各和圣多明各。到19世纪80年代，三个岛国实际上将其全部蔗糖出售给美国，在市场上只与美国炼糖公司进行贸易；他们的糖由美国船装运，糖价也由纽约农产品交易所制订；岛上的种植园主和糖厂主从威利特—格雷公司获得市场价格和对产量的预测，这些预测由美联社报道，刊登在《西部联盟》报的新闻栏目上。美国在无需对土地或工厂进行直接投资的情况下进行了对三个岛国的经济吞并，几年之后，又开始用武力进行领土吞并。

1895年，古巴糖业发展突然中断。2月24日，正逢丰收季节爆发了一场新的独立战争。这次与十年战争不同，波及整个岛屿。军事行动规模之大可由几个数字得知：西班牙动用40万名士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跨过大西洋一支最庞大的军队。这表明岛上每三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西班牙士兵。在独立战争（1895—1898）期间，成千上万公顷甘蔗地反复被火焚烧（甘蔗是容易燃烧的作物），无数糖厂被摧毁。不幸的是，缺乏能够准确估价制

---

⑯ 马林斯著《糖业托拉斯》第32—33页。

糖工业由于战争遭受的损失的数据资料。

传统的古巴历史编纂学受蔗糖巨头利益集团的影响，编造了战争期间制糖工业全部毁灭的神话。由于战争期间没有对甘蔗种植园进行统计调查，全部毁灭的论点在许多近代历史学家中依然盛行。但是，艰苦的定性研究分析了数千份分散的原始资料，似乎可证明在甘蔗产量大幅度下跌（由于反复被焚毁）的同时，工业部门所遭受的损失却小得多。1895年，生产能力最高的50个制糖中心中，只有7个在战争中被毁坏；4个受到一些损失；39个保存了下来并正准备迎接一个新的生产季节。工业遭受的全部损失也许最多是已安装生产能力的20%—25%。重新恢复工业生产需要一个范围广泛的甘蔗种植规划，当时农场工人已经分散到各地（因为战争完全改变了许多地区村落的格局）。这解释了战争中和战争刚刚结束时生产下跌的原因，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战争结束的三年之内蔗糖生产能达到约一百万吨，这大约相当于1895年总的安装生产能力。

19世纪末，圣多明各的制糖工业受到古巴十年战争的很大影响，大批古巴人因战争移居圣多明各，其中许多是来自古巴东部的小资本家和糖厂主。圣多明各为他们提供了避难场所：这个国家同古巴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地理和社会状况也同古巴相近，政治上相对稳定，而且鼓励和保护外国资本对农工联合企业进行投资，对投资者提供的便利条件包括免收进出口关税，甚至允许他们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糖厂。其自然条件（气候、土地肥度、自然灌溉等等）也适宜制糖工业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圣多明各现代制糖工业的第一阶段，尽管还有其他国籍的人，但它主要由古巴企业家控制。最初的投资由这些企业家独自进行，或由他们多米尼加的合伙人进行，他们一般比较谨慎；后来的投资由当地企业家和放债人提供，或由外国机器制造商提供贷款，以新兴工业作为抵押。土地十分便宜，政府不久将最初的优惠扩大到购买土地和租借土地方

209 面。从技术观点看，尽管已在当地现有糖厂的标准上进行了技术革新，但是，这些新糖厂完全以古巴东部糖厂为样板，这就是说，它们仍是一些不能吸收最先进的工业设备的"旧糖厂"。很显然，这类企业只有在官方支持下，而且只有在19世纪70年代这个特殊的蔗糖市场环境中才能成功。到1882年，圣多明各有21家糖厂，但是，一旦它们首战告捷之后，所有糖厂迅速面临着危机。1884年，当糖价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时，许多最初的企业家被排挤出去，所有权开始集中。1884年以后，一个金融家能够控制10家以上的糖厂。在1884—1900年间，约有14家糖厂破产，有的暂时关闭而有的则永久倒闭了。

萧条的另一个结果是，圣多明各在挽救幸存的部分糖厂吸收现代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方面不断作了努力，使圣多明各出现了第一批古巴式的制糖中心，它们也存在上述同样问题：制糖中心需要扩大甘蔗种植园，要求更迅速地将甘蔗运到工厂。铁路为大庄园提供了结构条件，但是，象在古巴一样，土地集中的步伐赶不上工业联合。新型大制糖中心发现它们必须建立所谓"垦殖制"独立的甘蔗种植者体制，使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分离。19世纪圣多明各最大的制糖中心是圣佩德罗—德马科里斯（San Pedro de Macoris）的孔苏埃洛制糖中心，由古巴人帕德罗、索劳恩—西亚合伙创建。19世纪90年代，在新的合伙人，美国人威廉L•巴斯的管理下，制糖中心变成了一个"小共和国"——用当时报纸的报道来说，这可以被理解为，它已具备了经济巨人的特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统治着这个地区。

在19世纪，圣多明各的制糖工业同古巴、甚至同波多黎各的制糖工业相比则非常弱小。在19世纪80年代这段关键的10年里，年总产量从未超过2万吨。然而，由于1895年古巴独立战争开始，蔗糖一时短缺，世界糖价也随之上涨。多米尼加糖厂提高了它们的产量，但是已安装的生产能力最高不超过5万吨；而古巴在这几年战争期间，生产一直超过25万吨。

1900年前后到1930年的甘蔗产量增长状况

210

1900年，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糖产量总和为43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在其后20年里，古巴的制糖工业增长速度为每年14.2％，波多黎各为14.3％，多米尼加为8.2％。因此，到1920年，三国糖产量共计4,533,119吨，占世界总糖产量的29.3％。但是，必须承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欧洲制糖工业的危机，使1920年的数字多少有些不正常。这三个国家的增长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分别受到美国军事干涉的推动。应当记住，美军1898年占领了古巴和波多黎各，后者随即被吞并。美军对古巴的军事干涉持续到1902年，1906—1908年间再次进行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情况不同。自1844年以来，多米尼加名义上获得独立，国内的动荡招致了1905年协定，授权美国征收和管理该国的关税。1915年，由于即将当选的政府有可能危害美国的利益，美国出兵进行了干涉，1924年以前，美军一直占领该国。

在这几个国家里，占领当局为那些对糖业生意感兴趣的美国公司在物资方面给予方便，同时也是保障它们对有利可图的经营进行投资的合法机构。从20世纪初美国糖业公司的简介和广告中可以看到，他们预测的前提很简单：首先，由于美国人口增长非常快（绝对增长），人均消费量也不断扩大（相对增长），因此，美国是一个不断增长的糖业市场；第二，美国的干涉（如武装占领）或直接兼并既成事实，当地国内的司法状况和社会政治条件为美国投资的持久性提供了保证；第三，从外部看，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同样被确定下来，因此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第四，由于三国自然条件（雨量、温度、土壤等）都是理想的产糖国，地理位置又都靠近大陆，这更突出了它的优越性；三国都是美国的加勒比—中美洲利益范围政策的关键；第五，在这种情况 211

下，对糖业贸易进行投资是世界上最保险和最有利可图的生意之一；第六，即使从长远看，这些条件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必须记住的是，美国除了拥有能够制造各种耕种和搬运甘蔗设备以及一整套榨糖机器的工厂外，还有卓越的制糖技术。美国人可以单独或在由他们的技术和文化培训过的当地员工的协助下，把工业联合企业的成套设备运输、组装、运转、操作和管理得更为出色。

这类投资唯一的致命弱点是甘蔗本身，甘蔗必须由当地劳工或由附近岛屿输入的劳工在这几个国家栽种、耕作和收割。大型机器、它们的安装、庞大复杂的厂房、交通、能源、电话和电报、维修车间等等意味着要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将一笔极大的资本投资作为垫本，它们的赢利依靠甘蔗供应的绝对稳定性，即确定的价格及规定的数量、质量和交货期。在这些方面甘蔗比甜菜易受损害。甜菜可以在收获之后储藏起来以备加工，而收割的全部甘蔗必须在24小时之内碾磨成浆，甘蔗是不能储存的。

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制糖业的农业方面（基本是体力劳动者，20世纪20年代古巴一国就使用了多达30万名工人）必须准确和谐地与工业方面相配合。但是，由于甘蔗收获季节平均时间为4个月，在甘蔗收割结束之后，有一半以上的农业工人会立刻被解雇；随之再陆续地解雇一些人，只有10％的工人全年被录用，这就使情况复杂化了。

鉴于这些情况，现代制糖工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保证甘蔗供应；二是收割甘蔗时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下面将讨论一下劳工制度。关于古巴和波多黎各（不包括多米尼加共和国）种植甘蔗的历史可分三个阶段进行描述。第一阶段相当于原始阶段，是以奴隶劳动为主的甘蔗生产体制（残余部分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糖厂（或称“老式糖厂”）基本上是一个农业企业，因为它的财产或资本的两个主要成分是土地和奴隶（农业劳动者）。在这样一个企业里，必须全年畜养奴隶，很自

然，他们必须一年到头地劳作，在农闲季节，他们栽培和耕种甘蔗。因此，糖厂厂主是为他自己的工厂榨糖所需而种植甘蔗。

第二阶段是废除奴隶制之后，可称之为过渡阶段。上面讲过，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分离。这个所谓的"劳动分工"阶段发生在大工业中心（制糖中心）发展时期，在这些地区，甘蔗田属于现存的以奴隶劳动为主的旧糖厂所有。这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是，大制糖中心加工的甘蔗不仅出自自己的蔗田，因为这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还要从周围的垦殖园（Colonias），或者说，甘蔗种植园那里购买其他数量的甘蔗。

新型工业中心从外部种植园主那里购买甘蔗的这种模式的建立，标志着讲西语的加勒比地区近代史上出现了一个异常重要的社会经济阶层。这些被称为垦殖农（Colonos）的甘蔗种植园主通常是旧糖厂从前的主人（或他们的后嗣）。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政治经验和群体意识，如果不是一个阶级，至少也具有同一性。到19世纪80年代，他们开始组织协会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一旦制糖工业的工农两大部门的经济分离既成事实，这两个部门之间会出现公开的利害冲突；也许可以这样说，至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垦殖农的地位很高。

这就是美国资本开始渗人加勒比制糖工业时大投资公司所面临的情况。很自然，这些公司不愿意让一个有良好组织并有民族主义政治倾向的当地团体控制甘蔗供应。当时，根据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情况，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建立新型制糖中心，而且那里的土地便宜，制糖中心所需的甘蔗不是自己耕种，就是直接或通过他们选择的经纪人来耕种。波多黎各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屿（8,896平方公里），19世纪一直是以大批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的制糖业基地，这里已没有适合种植甘蔗的无人居住的处女地，而且情况不同：新公司用强行购买现存甘蔗种植园主地产的方式来确立其经济控制。另一个同样重要原因是，美国在某些作物耕种方面的机械化程度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因

此，较为合理的是，新型投资公司应当在古巴东部开垦新的蔗田，由于那里劳动力少，它们还要实现甘蔗耕种机械化以便获得规模经济的边际利润。但是，大规模农业机械化意味着要有大片的土地，因此，大甘蔗种植园在古巴兴起。经济现实并不象当时政治作品所描述的那样，只是贪婪地为了攫取土地。结果，农业机械化并没有实现，有些是因为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基础结构条件尚未具备所致（文化水准低、机械设备不够、有关土壤条件的知识差、甘蔗品种缺乏必要的多样性、等等）；有些是因为适合栽培、耕种和收割甘蔗的机械发展水平还太低。

但是，为古巴找到了第三个解决办法，这是一个在经济上满足美国糖业公司、但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却为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办法：即粗放农业。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甘蔗问题专家之一，诺埃尔·迪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访问了古巴，他迅速抓住隐藏在矛盾后面的原因，即这个世界上最大和最经济的产糖国是"所有生产甘蔗国家中耕作最差的一个"。[17] 在土地富裕、劳动力缺乏的地方，经济规律导致了少用人力多用土地。很显然，使用这些方法，土地平均产量会下降，但是，甘蔗成本会比多用（价高的）劳动力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要低廉。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卡马圭和奥连特省份的大甘蔗种植园实际上达到异乎寻常的规模，我们知道古巴的总面积约111,000平方公里。例如，1900年，在卡马圭，属于当地古老家族所有的两

214 个旧糖厂，在约4,000公顷土地上生产总数为21,700吨糖。1925年，卡马圭已有26个制糖中心，都为外国人所有：只有这两家老厂仍掌握在古巴人手中。这26家新糖厂拥有或控制了近一百万公顷的土地，它们年产糖量是1,402,175吨。同样，奥连特省在本世纪初的20年内建立的新工厂，其中三家（查帕拉、德利夏斯和梅塞迪塔，都属于古美糖业公司）就拥有约18万公顷的土地。

---

[17] 诺埃尔·德尔备忘录：《古巴制糖业的状况》（哈瓦那，1913）。

1900年5月1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旨在使波多黎各美国殖民地政府体制制度化的联合决议，其中规定："……今后凡受权从事农业的公司必须持有许可证，其拥有土地所有权和控制的土地限额不得超过500英亩"。这项法律一直有多种解释，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它自颁布以来就是一纸空文。[18] 在波多黎各，土地所有权集中在糖业公司手中的进程实际上相对来说比古巴更快。1899年，种植甘蔗的土地总量是29,197公顷；到1909年，上升到58,857公顷；到1919年，达到92,197公顷。据估计，1919年，波多黎各所消费的农产品有60％需要进口，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即从小农转变成农业工人业已完成，家长式的庄园制已不复存在。

1915年以后，反对甘蔗种植园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500英亩法"列入该岛"1917年根本法"条款中的原因，但是，该岛的立法机关并未就实行限制而通过一项必须遵守的法律。尽管如此，法律是存在的，而糖业公司却只是用它来保护自己，例如，1917年中阿吉雷糖业公司"出售"它的全部土地，并将其所控制的甘蔗种植面积的一切权利（拥有完全所有权的5,558公顷，租借的3,211公顷）转让给卢塞公司；同年，南波多黎各糖业公司以同样方式把土地转让给拉塞尔公司。不用说，卢塞和拉塞尔是这两家糖业公司的子公司。1936年，在波多黎各开业的4家最大的美国糖业公司拥有29,646公顷土地，而且还控制着另外20,902公顷，总共为50,584公顷，占波多黎各经过土壤改良的优质土地总面积的10％以上。[19]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糖产量自本世纪以来一直缓慢而稳定地增长（1900年为53,000吨；1915年为126,058吨）。拉罗马纳（仍为该国最大的糖厂）建于1911年。其他诸如孔苏埃洛（由巴特拉姆集团买下）、圣菲、基斯克恩和圣伊西德罗（也属于巴特拉姆集

---

⑱ 阿瑟·D·盖尔[illegible]《波多黎各的糖业经济》（纽约，1938），第97页。

⑲ 同上注，第103—105页。

团）等糖厂到1916年时合并为公司。尽管如此，在美国占领期间（1916—1924）产量进一步上升。巴拉奥纳和帕哈斯—博卡·奇卡两糖厂是在美军占领时期创立的。美国糖业公司获得土地的历史充满了欺骗、敲诈和违法行为。1900年《土地登记法》实施后，多米尼加近代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土地调查，《土地登记法》的实行剥夺了许多小农户的全家多年赖以生存的无证土地。新的大蔗糖工场和现存的旧糖厂的扩大使糖产量在占领时期增加了一倍，从1916年的128,000吨增加到1924年的233,000吨。同期，糖业公司所拥有的土地增至三倍：从1916年的56,420公顷增加到1924年的159,913公顷。美国公司的投资和控制过程可以从下述情况看出：190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有14个糖厂，没有一家是美国大公司所有的；而在美国占领期结束时，多米尼加共和国有22家糖厂，其中12家已归美国人所有。更重要的是，这12家糖厂拥有该国种植甘蔗土地面积的81%，并且相当于制糖业登记资本的82%。仅拉罗马纳、孔苏埃洛和巴拉奥纳三家糖厂就占多米尼加糖产量的约50%。

1929年，古巴制糖工业大规模的扩展猝然停止，当时糖产量为5,352,585吨。仅过了三年时间产糖量即下降了61%，跌至2,073,055吨。古巴的最后一个糖厂是1929年在卡马圭的圣玛尔塔建立的，其合伙人和经理是马里奥·加西亚·梅诺卡尔将军，他1912—1920年任古巴总统，多年来他同时又担任古美糖业公司这家美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常任理事。时隔50年之久，古巴才开始建设另一家新糖厂。

216

在整个20世纪，古巴制糖工业投资的着眼点只有一个主要市场，即美国。但是，以上述同一个市场为角逐目标的投资者们还把钱大量投入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夏威夷这些美国属地，投入美国占领时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当然，也投入美国本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表明了，一个失去控制的经济究竟是如何使一个生产能力几乎两倍于市场实际需求量的制糖业建立起来的。

此外，古巴糖除了美国找不到其他市场，因为欧洲甜菜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危机后早已得到了恢复，而且再次加强了保护主义壁垒。爪哇、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蔗糖产区也提高了生产能力。

古巴政府为商订一个调节世界糖市场的协定第一次采取具体措施。但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缺乏政治影响，它的干预最终只是接受所谓的《查德伯恩计划》(1930年)。由于美国各家公司与各个糖业集团（以及与在古巴、波多黎各、圣多明各、菲律宾、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糖厂）就产量问题进行了调整，这项计划无疑在调节美国市场方面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但从世界市场考虑，这项计划却毫无作用。就在古巴糖产量1933—1934年降到历史最低点时，美国三个属地——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夏威夷的糖产量却达到空前的好收成，每个地区都产糖一百万吨以上。多米尼加共和国并没受到《查德伯恩计划》紧缩的影响，因为，尽管它的产量主要控制在美国之手，但并没有投放到美国国内市场。1912年，多米尼加的近一半糖出口到英国市场，剩下的大部分出口到加拿大。美国占领后改变了这种情况：1920年，多米尼加糖产量约70%出口到美国市场。但是，当美国新关税实施时，政策发生了变化，到1925年，只有2%的多米尼加糖出口到美国，其他98%出口到加拿大、荷兰、法国、还有英国，英国在60年代以前一直保持了主要主顾的地位。

由于大萧条，过去40年里一直赚大钱的蔗糖不再是获得超高额利润的源泉，"糖王"的王位已经丧失。因此，美国资本流向了利润更高的领域，古巴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糖国所遭受的损失必然最大。美国公司开始向古巴工商界出售它们在古巴的糖厂和土地。有些人把这一过程理想化了，以为这是制糖工业逐渐古巴化的过程，应当这样考虑，这实际上只是将利润不断下降的企业脱手给当地人而已。然而，另一个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时常带有挑战性的古巴民族主义和强大而统一的工人运动正在兴起，它提出了

217

一系列要求（包括提高工资、8小时工作日和利润分成），甚至强行占领了美国拥有的几家最大糖厂。

蔗糖与劳动力

在种植园历史上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性的发展轨迹。最明显的是，由于土地—劳动力比率一直在调整，种植园主对大量廉价、顺从的劳动力的渴求也一直不能满足。1714年在伦敦发表的一个小册子指出："……殖民地没有黑人，就无法生产蔗糖；黑人越多，越廉价，他们生产的蔗糖也就越多、越便宜"。[20] 这是18世纪种植园主们的哲学，也同样是20世纪种植园主们的哲学。古巴、圣多明各、波多黎各的现代甘蔗种植园对劳动力自然有其特殊要求。出糖率（即从一定量甘蔗中提取的糖）从1800年的2.5％提高到1900年的10％，在此期间，由于使用现代机器设备和复杂的制作方法，制糖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1500％之多。但是，1900年使用过去那种同样工具和方法作业的砍蔗工的平均收获量同1800年一样低下。因此，在播种、耕作和收割甘蔗的农业部门同把甘蔗加工成糖的工业部门之间技术上的差距扩大了。

目前，严格地说虽然制糖工业技术还不能把甘蔗中的糖分完全提取出来，但是，出糖率的增长显然是有极限的，这是由于甘蔗本身含糖量的限制。当工业产出率接近这种极限时，由变化缓慢的农业部门支付的生产成本的相对份额就会越来越大，甘蔗价格同非熟练体力劳动力价格高低密切相关的事实反映了这一点。因为种植园主们不可能进行一场农业革命（至少近期内不可能），于是他们把农业开支，特别是砍蔗工的工资压到最低限度，以此来解决与总生产成本有关的甘蔗成本提高的问题。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有必要对现代种植园主们关于缺乏劳

218

---

[20] 无名作者《目前甘蔗种植园状况，主要侧重巴巴多斯岛》（伦敦，1714）第27页。

力的怂恿作一番解释。总的来说，劳力是相对缺乏而不是绝对缺乏；可以对劳力缺乏下这样一个定义：所谓缺乏是缺乏足够数量的失业工人，他们被迫流往甘蔗种植区做3个月或至多4个月的收割工作，在收割结束后就离开这一地区；他们得到的是刚够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吃最劣等的食物，住简陋的工棚，更有甚者，在多数情况下，不以合法货币支付工资，而发给只在糖厂经营的店铺中流通的代价券和票证。

在1899到1902年之间，即古巴独立战争刚结束后和美国干涉的期间，一些制糖厂家和矿产公司反复向占领当局请求进口劳工，而当时也正是该岛城乡到处游荡着失业大军的时期。这一矛盾现象突出地表现了制糖业中的农业部门以及矿业中恶劣的劳动条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本国失业大军断然拒绝到矿山和甘蔗园去工作，因为那种工作还不如失业。

由于一些超经济因素使当时古巴劳动力市场失调，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势。古巴解放军（其中绝大部分是黑人和穆拉托人，至少士兵中是这样）的老兵，正在成为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力量。他们代表着最底层人民，身受对工人和黑人的双重压迫。与此同时，正如我们看到的，商业贸易和蔗糖资源主要掌握在西班牙白人手里。因此，古巴社会经济中的三个基本冲突就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阶级（雇主—工人）、种族（白人—黑人）和民族（西班牙—古巴人）。外国占领军的存在和拒绝缴械的人民民族军的存在又为这些冲突铺垫了一个凶多吉少的背景。

219

迫切要求进口劳动力的部门主要是在古巴经营的美国糖业和矿业公司，而不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利益集团。尽管如此，这些要求被美国占领当局拒绝，它不允许西印度群岛的黑人进入古巴。与这一政策相应的是占领当局及随后投靠美国的几届共和国政府对鼓励从西班牙移民的政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禁止黑人移入和鼓励西班牙移民（甚至为西班牙败军提供留在古巴的机会）这一双管齐下的政策实现了同一社会、政治本质的三个不

间的目标。第一，"白化"古巴岛，减少不断增长的黑人的政治影响，试图把黑人人口限定为廉价的和温顺的劳动力来源。第二，通过从古巴刚刚推翻的殖民统治者的母国那里移入大量人口，达到非民族化的目的。第三，赢得岛上未受战祸冲击的西班牙资本家的支持，他们当时已经成为美国兼并古巴的忠实仆从。(结果，经济、种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情绪高涨，兼并未能实现)。美国反对移人契约工（主要是西印度群岛黑人和中国苦力）在法律上是有先例的。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上禁止这类工人移人美国，既然美军占领了古巴，有人主张以同样法规制约该岛。尽管困难重重，在美军占领的四次收获期里(1899—1902)还是有足够的人手在成千公顷的土地上播种和收割甘蔗；恢复过程也很顺利，致使古巴在190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产糖国，产量为876,000吨，仅次于爪哇（897,000吨）。

220

在1900—1925年间，古巴制糖业的增长令人瞩目。糖产量的年增长率为12%，即从年产30万吨增至450万吨。这一惊人的增长与当时制糖业地理中心的迁移有关，正如我们所知，这种迁移是从岛上人口稠密的西部地区东移至人口稀疏的卡马圭和北奥连特。新糖厂的建立不仅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而且需要招雇成千上万名工人来修建工厂和安装机械设备。在这项工作中，官方宠爱的西班牙移民曾起了决定性作用。1902—1911年间，古巴共接收移民322,878人，其中77.26%是西班牙人。同时，所需砍蔗工的人数从1900年的3万增至1925年的31.5万。新开发的产糖区卡马圭和奥连特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最后突破了美国占领期间的"只进白人"的移民政策，古巴向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打开了大门。

正规地合法进口契约劳工约始于1913年，当时尼佩湾公司得到许可招收31,000名牙买加劳工。在此之前已有5000人进人古巴；这一数字古巴并没有记载，而是在牙买加移民登记册上找到的。1913—1929年间，大约28万海地人和牙买加人进入古巴。由

于这种迁移是季节性的，许多人在收割结束后返回家乡。但仍有许多人滞留不归，干些甘蔗种植和栽培的活计，想方设法熬到收咖啡（9—11月）和收割甘蔗（1—5月）季节。这部分人绝大多数以非法手段留居古巴，这种非法身份又使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各种剥削。这些西印度群岛人，特别是海地人住在甘蔗地里，挤在一处，情况惨不忍睹。据1933年的统计，共有79,838海地人和40,471牙买加人住在古巴；而古巴移民局认为这个统计不准确，说两国移民共计15万之多。甘蔗种植园最终找到了足够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砍蔗工。

1929年的甘蔗收获季节同1925年一样，大约需要31.5万名劳工；但时至1933年，大萧条业已开始，劳工只剩不到10万。可惜的是，当时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人数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从当时照片上可以看见糖厂办公室前长长的失业大军，渴望得到在甘蔗地里干几天活儿的机会。此后，在二次大战中古巴经济恢复和上升时期的官方统计数字表明，该岛50%的农业劳工每年只有四个月就业。㉑ 如果这些是经济危机过后一段时间的数字的话，那么1930—1935年期间的失业数字肯定是骇人听闻的。

古巴本土人口相对较少，加上大量外籍劳工移入的特点，结果外国人替代了本国劳工，这些外国人都是走投无路的失业者，情愿拿最低工资；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合法（多数是滞留在古巴的海地和牙买加人）极易屈服于经济上的压力，接受一般本国工人拒绝接受的条件。不仅如此，这些非法工人还形成了能够用来破坏罢工的顺从的群体，而且由于害怕被驱逐出境，他们不肯参加任何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这种情况很快激起了古巴人的仇外情绪，在大萧条期间，这种仇外情绪致使1933年11月8日通过了“雇佣本国劳工法令”，俗称“50%法”。这一法令的目的是让古巴人代替一定数量的长期外籍劳工，这一步骤主要针对西班牙人（他们之

㉑ 胡利安·阿列内斯·乌罗萨著《古巴经济的基本特征》（哈瓦那，1950）

中的大多数都是全年工作）。这一法令没有解决，甚至也不想正视失业问题，仅仅把失业痛苦从一部分人身上转嫁到另一部分人身上。因为它只适用于长期工（非季节性工），所以它主要影响城市企业，如大多数西班牙移民干活的商店、百货店和一些小厂商。

大萧条期间采取的另一个主要法律措施是1933年10月19日法令，它是专门针对制糖业的。这项法令要求所有失业和没有谋生手段的外国人重返祖国，结果造成古巴军队用武力驱逐海地和牙买加人（主要是海地人），并在一次行动中酿成严重的暴力事件。然而，实际被驱逐的海地人不到一万，因糖业公司为保留失业工人施加了压力，致使这一丑恶行动半途而废。

古巴制糖业的工业部门的情况完全不同。前面已经指出，甘蔗作物从种植到收割，看上去与前几个世纪的情形相同，而且1914年收割甘蔗的生产能力实际与1814年的一样。但是，制糖业的工业部门，即加工以原始手段收割来的甘蔗的那个部门却是世界上最先进、技术水平最高、产量最多的部门。以黑人劳动力为主的原始农业和以白人为主的现代化工业，作为古巴经济基石的制糖业在结构上的这种不平衡现象加重了社会中存在的两级分化。

222

工业生产为工人联合行动创造了机会，这在农业生产中几乎不可能存在。到1917年，工业劳工运动已经发展到普遍罢工的水平，它可以施加影响使西恩富戈斯地区几家糖厂举行联合罢工；当时这一地区生产古巴产糖量的30％以上。罢工的基本要求是提高工资和8小时工作制（8小时工作制已在很多城镇实行，而糖厂仍然坚持一天12小时上两个班或6小时换班制）。西恩富戈斯的罢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个别工厂的工潮和停工以前就很频繁，但是，这次罢工是第一次使这一重要产糖区遭受工人联合行动的打击。尽管工人的要求没有全部得到满足，但是他们得到了10小时工作日制，工资提高了10％，并且取消了代价券或票证等

支付形式（个别工厂把这个制度保持到20世纪30年代）。[22]

当1914—1920的食糖繁荣结束之后，特别是1923—1933年糖价暴跌之后，古巴制糖工业中的工人斗争不断增长。劳工运动加强联合同经济危机的恶化恰成正比。全国糖业工人工会（SNOIA）成立，并于1932年12月在一连串罢工之后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然而，据工会领导们自己分析说，这些罢工对卡马圭和奥连特并未产生什么影响，而这两省的产糖量占古巴全部糖产量的56%；而且大量海地和牙买加籍劳工又不可能参加罢工。应该注意到，就在这两个东部省份，这些外籍季节工占劳工的90%，这更突出了已经强调的论点：即外籍劳工除向种植园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还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因为这些工人不会参加到不断增长的劳工运动中去。

1933—1934年间，糖价一直很低，一些最大的蔗糖工场拒绝接受劳工运动提出的条件，并以停产闭厂相威胁，但实际上却妨碍了收获的准备工作。在极度紧张并有可能发生大的暴力冲突的形势下，工会占领了其中20个工厂，扣留工厂经理和工头，建立了它们所谓的“苏维埃”。1934年9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糖厂哈罗务蔗糖工场即建立了“苏维埃”。[23]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停止宪法保障，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以惩罚那些犯有焚烧蔗田或其他蓄意破坏罪行的人。一方面由于这些镇压措施和糖价上涨，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显地改善了劳动条件，使危机得以解决，或至少有所缓解。

波多黎各土地—劳动力比率同古巴差别很大。1898年，当美军占领这两个岛屿时，其人口密度为：古巴每平方公里14.2人；

[22] 在约翰·德莫林著《糖与阶级斗争》一书中可以找到对这次罢工的有趣的描述。（哈瓦那，1980）。

[23] 这是首次在古巴（很可能也是首次在拉美）使用“苏维埃”这个词作为地方工—农委员会的名称。

波多黎各每平方公里107.2人。人口密度的这种悬殊差别可以解释两国种植园不同的人口变化过程。但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解释总的来说是不充分的，古巴与波多黎各之间的差异不能仅仅靠这些人口数字来解释。1898年，古巴的主要农作物是蔗糖，而波多黎各是咖啡。生产咖啡需要的劳动力和投资比蔗糖相对要少，而且咖啡园一般都比甘蔗种植园要小。19世纪最后30年里，波多黎各咖啡产量迅速增长，同时甘蔗产量下降了40%，经济上的这种变化导致该岛咖啡主要产地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口增加，并且导致工人在国内的季节性流动，他们迁来收获咖啡，而后只有一小部分人到平原去收割甘蔗。结果，波多黎各的咖啡种植者说"人口过剩"，而甘蔗生产者则报怨"人手不足"。

19世纪后半叶，波多黎各的咖啡种植园以及许多甘蔗种植园可以说是奴隶种植园的延续。同时，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已经解体，并最终被废除。土地—劳动力比率与半奴隶性的劳动形式不相适应，而且又缺乏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农业单位趋于小型化（大部分在40—120公顷之间），而劳工与庄园之间通过下列方式相联系：工资报酬、农作物分成协议、用现金支付部分工资和拨给小块份地的协定、以及家庭纽带或这些方式的综合形式。[24] 1899年普查数字表明，波多黎各50%的可耕地是属于20公顷以下的咖啡园的。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分散于各处，毫无组织，没有大批充当合同工的农业工人。迁移可以减轻人口压力。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些波多黎各工人开始向圣多明各甘蔗种植区实行季节性迁移。19世纪80年代，古巴岛庄园主联合会曾设法使这一迁移运动转向古巴的种植园。而在20世纪初，当时波多黎各已成为美国殖民地，因此，不幸的移民群参加了夏威夷的甘蔗收割。

---

[24] 关于这时期委内瑞拉的庄园和小块份地的研究见加斯乐·卡瓦略和何塞菲娜·里奥斯·德·埃尔南德斯合著：《关于委内瑞拉农庄中的种植园—小块份地两项研究的诠释》（加拉加斯，1977）

1898年，美国占领波多黎各，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这使该岛经济、政治情况大大改观。转变如此迅速，仅三年时间就使蔗糖出口份额占由出口总额的30%提高到63%。该岛经济中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与过去30年截然相反的国内迁移运动：人口从中部和西部多山地区流向生产甘蔗的平原，尤其是向南部沿海地区移动。部分地区的人口在短短几年内就增长了两倍多。虽然蔗糖业已成为该岛的主要经济的活动，现存的人口压力变成了人口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蓄意造成的相对的人口过剩，以便为建立大蔗糖工场创造条件。

农业财产的再分配、甘蔗大种植园的出现（前面已经谈到）以及要求最大限度地开发甘蔗地，有助于减少土地占有量和实际耕种量之间的不平衡，取消为雇工养家糊口而拨给的小块份地，并有助于将剩下的旧奴隶糖厂并入现代种植园。与此同时，咖啡园在不断减少（这实际是必然结果），到1930年，咖啡只占波多黎各出口总额的1%。他们旧日的生产关系解体了，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小块土地，这些一无所有的农民就变成了纯粹的农业工人。

美国投资者发现，波多黎各，尤其是产糖区与古巴人口稀少的地区情况截然不同。如前所述，古巴有大量廉价土地，适合于粗放耕种，这样可以使用较少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投资。而波多黎各则土地资源不足，这不仅决定了对土地实行全面占有的政策（实际上是掠夺土地），而且还决定了集约耕种方式。这个过程是在投入大量资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即使用农机、化肥等等，结果单位面积和每个工时的甘蔗产量都有明显的提高。由于单位面积生产力提高，种植和收割每一吨甘蔗，以及生产每一吨糖所需的工时都相应减少了。

所有这些因素，诸如相对人口过剩、再已无业可就以及现代技术的引进等造成失业率在大萧条期间达37%。这种高失业率最终导致官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即将剩余人口向外移民。1916—

1924年美军占领多米尼加期间，将波多黎各工人"移居"多米尼加的方案已经出笼。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一家公司，即在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均设有糖厂的南波多黎各糖业公司在其多米尼加分厂使用了来自波多黎各的剩余劳力，然而，这项方案始终是失败的。20世纪20年代，一批波多黎各工人迁移到古巴糖厂，最后甚至掀起了一场大肆宣扬的移民运动。新成立的古巴工人组织在写给西班牙一波多黎各劳工领袖圣地亚哥·伊格莱西亚斯的历史性信函中抨击了这场运动。[25] 1910—1930年间，波多黎各向外移民的总数为46794人。1931—1934年间，由于大萧条在美国引起普遍失业，一度出现波多黎各人回流的现象，但到1935年，移民运动又重新兴起，一直延续至今。

波多黎各同所有加勒比国家一样，由于移植了现代化体制的甘蔗种植园，经历了大批农民和小农户转变成农业无产者的痛苦过程。这支无产者队伍作为一个阶级，主要通过"工人自由联盟"(FLT)为自己的行为开辟道路。"工人自由联盟"创建于19世纪末，1915年，波多黎各社会主义党从"工人自由联盟"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它的主要政治力量。在1920年选举中，社会主义党在不同地区所得的选票多少与各该地区甘蔗种植范围大小相关。[26] 这种相互关系说明阶级意识在当时一系列日益广泛和激进的工人行动中逐渐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大萧条期间，劳工运动自然加强了对恶劣工作条件的抗议：1931—1932年举行了10次罢工，涉及3,355名工人；1932—1933年，罢工14次，涉及13,594名工人；1933—1934年，共计有33,333名工人参加了18次罢工。[27] 1933年签署的《全国产业复兴法》——美国针对不断增长的工潮推行

㉕ 首次发表于哈瓦那的工人日报:《正义报》1922年12月16日第1—7页。

㉖ 安赫尔·金特罗—里韦拉著《波多黎各的阶级冲突与政治斗争》(圣胡安，1977)。另见金特罗—里韦拉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撰写的第6章。

㉗ 盖尔著《波多黎各的糖业经济》第223页。

“新政”的主要措施之一——有关条款规定了最低工资额，最长 227 劳动时间和承认工会，等等，致使工人和糖业公司之间谨慎地和解。次年，双方签署了历史性的“总协议”，这是该岛制糖业为规定劳动条件而订立的第一个范围广泛的协定。根据协议的条款，各种不同工种的工资从20%增加到69%。但是，美国实施《恢复法》后食品价格猛涨，波多黎各农业工人的食品开支平均上涨了58%。总的来看，工人们的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糖价上涨后。

在制糖业方面，古巴和波多黎各代表了同一劳工问题的两个加勒比变种。多米尼加共和国则提供了第三个变种，目前社会科学学者们正集中精力对比进行研究，该国的失业率极高，居民移居国外寻找工作是该国的一种突出的倾向，与此同时，在该国的糖厂工作的却又是流入该国的外籍劳工。

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19世纪末，多米尼加共和国人口密度低，48,442平方公里上居住着约61万人，即每平方公里12.6人。农业结构是以小农为基础，农民有各式各样占有土地的权利。㉘总的来看，当时该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它是一种“自然的”“小农式的”或“自给自足式农业”经济，他们往往注意小农的优越性，甚至从农业多样化方面（烟草、蔗糖、咖啡、可可、木材、水果和蔬菜等）指出它的优点。在当时的作品中可以普遍发现，它们强调这些“独立的”农民不必向早期的糖业公司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即使他们出卖劳动力，也不是正规的基础上的雇佣。那么，可以理解的是，多米尼加制糖业从一开始就是 228

㉘ 古巴和波多黎各两国都有这个时期完备的农业统计数字。然而，多米尼加共和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实行土地注册，这是分析拥有土地财产的基础。它解释了为什么直到目前为止所有研究要以部分调查为依据，调查的数字集中在一些具体地区或经济活动上，但总的来说缺乏精确性，不管怎样，缺少土地注册本身说明土地并不是决定性经济因素。然而，美国占领之后，扩大了甘蔗种植园面积，同小土地所有者发生了财产纠纷，因此，很有必要制订现代的农业地籍图。

依赖外国劳工重获新生的。

海地共和国位于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端，人口压力很大，又是全世界经济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两个因素使海地成为20世纪美洲最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因此，多米尼加甘蔗种植园主会在边境地区得到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劳工。但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势不两立。[29]

此外，文化差异一开始就使海地工人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努力成为泡影。因此，多米尼加种植园主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寻找糖厂所需要的劳动力。因而，直到1916年美军占领多米尼加初期，外国的糖业工人大多数来自讲英语的小安的列斯群岛。由于缺乏官方记录，没有这些移民劳工总数的可靠来源，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保存官方纪录，这才能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作出估计。[30]然而，1912—1920年间，估计平均每年约有6,000名移民劳工进入，这可能是最接近实际的数字。

但是，在占领期间（1916—1924），由于美国资本不断流入，工业迅速扩展，海地移民开始稳定增长，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他们形成种植园主们所需要的廉价和顺从的劳动大军。经济现实驱使雇主们进口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外国劳动力——其工资还不够一个多米尼加农民维持生存的水平（来自多年被视为敌国的人工资则更低）。然而，民族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这种经济现实之间的冲突却必然产生经常和持续的内部矛盾。

正如“50%法”在古巴发生的情况一样，一场要求糖厂“只招本国人”的强大运动兴起了，再加上世界范围的大萧条和当时

229

[29] 关于1870年以前这段时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之间的关系，见莫亚·庞斯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撰写的第6章。

[30] 见何塞·德拉·卡斯蒂略著《1700—193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季节性糖业工人的移民情况》，载多米尼加人类学研究杂志（圣多明各自治大学）第7期（1978）和帕特里克·布赖恩著《1870—1916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济变革》（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伦敦大学，1977）。

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掌权的特鲁希略政权仇外情绪的影响，这场运动终于1937年达到高峰，致使12,000多名海地移民惨遭杀害。[31]

尽管关系如此紧张，多米尼加甘蔗收获季节，绝大多数的砍蔗工仍旧是海地人，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为什么这种现象在高失业的情况下能幸存下来，其答案必须在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中寻找。首先一点在古巴问题中曾阐述过，即当制糖业的工业生产率的增长接近其极限时，降低农业部门的费用就越发重要。而且，由于多米尼加种植园主同古巴的同行们一样认为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农业革命。他们还受到同一原始种植甘蔗方法的束缚，因此，削减成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尽可能压低农业工人工资的现象。而且，海地是美洲工资最低的国家，联合国将它列为世界上10个最贫穷国家之一。"最低工资"的概念是相对的，海地的最低工资比多米尼加的最低工资还要低。

多米尼加种植园主还有其他优势。该国的劳工运动在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国家中是最弱的，它一直没能形成协同一致的罢工、停工和抗议浪潮，未迫使糖业公司提高工资。此外，工运自身陷于进投无路的境地，它太软弱，无法抵制海地劳工入境，而且每次外籍工人移入的浪潮都会进一步削弱劳工运动。

由于收获甘蔗以海地人为主，加上工资低，因此多米尼加的农业工人拒绝从事这项劳动，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早已存在的对海地人的歧视。但是由于多米尼加移民率高（主要去美国），减少了人口压力，从而减缓了潜在的爆炸性失业形势。因此，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形成了一种在加勒比地区与众不同的劳资关系和移

[31] 关于这段插曲，官方认为是海地人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后来当选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的华金·巴拉格尔1945年10月11日在写给罗伯托·加西亚·佩纳的信中说明了这点。佩纳是《波哥大时报》的编辑，1945年是政府的一位部长。（安得烈斯·科尔顿等合著《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蔗糖与政治》（第二版，圣多明各，1976）第32页。

民现象相辅相成的状况。

结　　论

230

最后，本章要说明的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地区甘蔗种植园有两种界限分明的模式：第一种，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包括一座旧式糖厂，即半机械化糖厂或仍以兽力为动力的糖厂，生产十分低级的混糖。其特点是专业化程度不高，即奴隶不加选择地从事任何劳动，或在甘蔗地或在糖厂里干活。除奴隶外，工人还包括苦力（契约工）和很小一部分雇佣劳工。第二种"现代"甘蔗种植园，只生产甘蔗但不加工甘蔗，它与高效率和先进技术的糖厂，或者说制糖中心，相联系。后者生产标准原糖，而且必须事先进行大量投资。"新型"种植园完全是农业性的，它是根据劳动分工特点产生的必然结果。尽管这类种植园表面上适应后奴隶制状况，但剥削劳工的风气仍很盛行，或者直截了当地利用饥饿作为威胁手段，或者只付给工人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而且付给的还是只能在该公司内部商店通用的代价券，等等。从技术方面来看，也一直没有任何改进，其农业生产方式和工具还是象旧式种植园那样原始，生产力也几乎与旧式种植园同一个水平。制糖中心不是种植园，它从一开始它就是种植园和外国炼糖厂之间的工业性中间环节。制糖中心为炼糖厂提供标准的经过半加工的原糖（纯度为96°的原糖），炼糖厂再将此加工成不同形式的精糖。当然，制糖中心和种植园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由共同所有权或契约相联系，但是，不管哪种，都是制糖中心控制种植园。大型现代制糖中心（以及与它们相联系的种植园）都是利润极高的企业，尤其对那些在本世纪初对其进行投资的外国公司来说，更是有利可图。但是，这些制糖中心由于以下一些因素，诸如生产的季节性强、内部的劳资纠纷、它们企图建立大庄园的倾向、它们在与其相联系的种植园蓄意继续实行原始粗放耕

种的生产方式、它们在所经营的整个地区实行经济和社会统治等等，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政治和劳工问题，以致不可避免地遭到几乎各阶层人士的抵制，即使它们是所在国工作和收入的主要来源时，依然遭到抵制。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抵制更引人注目，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和工农组织公开反对它们，要求结束资金不断外流、结束大庄园制和外国公司的权力。此外，从纯经济观点看，落后的农业部门（甘蔗种植园）和工业部门（制糖中心）之间的悬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当最初的高投资利润不复存在时，这些困难也随之消失了。当劳工运动兴起后，并随着它不断团结壮大，企图继续残酷地剥削工人已有困难，工资因此而提高了。为了弥补这种损失，有必要采用化肥、灌溉和机械化等措施以改善原始的农业技术，但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利润。与这些地方因素同时存在的其他外部条件促成了西属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的解体和衰落：如固定糖价（国际市场和进口国家的国内市场的糖价都固定不变）、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生产大量补贴糖、食糖的人均消费量呈下降趋势，所有这些因素都对世界糖市场产生了不利影响。危机在高峰最初的特点是投资减少，最后是把所有权转向地方集团。然而，此时在其他领域进行投资所得的利润比在食糖业更高。

233

第 7 章

1870—1930年拉丁美洲城市的发展

导 言

在1870年前访问过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和北美人在离开时为该地区在地理、人民、环境方面的缤纷多彩所震惊。那里确实存在着城市。事实上，城市至少在西语美洲的发展中起了支配作用，尽管当时城市人口只占该地区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总的看来，这些城市显得狭小、贫穷和破烂不堪。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拉美乡村——雄伟的安第斯山脉，广阔的亚马孙丛林，无边无际的潘帕斯大草原，别致秀丽的印第安小村庄，庞大的地产。因此，恰恰是拉美的农村极其生动地展现在19世纪中期的游记、书信和新闻报道中。尽管如此，对1870年的拉美城市作一概括性描述，将为随后的几十年给这一地区城市风貌带来的巨大变化提供背景情况。

即使是一些最大的拉美城市，看上去也显得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城市是广场导向型的。富人和权贵阶层的住宅以及城市的主要行政管理活动、服务和贸易都集中在中央广场周围。里约热内卢、哈瓦那、墨西哥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只有几百条街区组成的中央地区。这些地区通常是在由主要的广场延伸不超过5条到10条街区的范围内。这些地区具有城市化区域的外

貌，大面积的住宅区，铺设过的道路，人行道和路灯。市场、办公建筑、商店、俱乐部、剧院、教堂和学校也坐落在这一中央地区，为上层人物服务。在远离中心的地区绵亘着穷人的简陋小房，肮脏、凹凸不平的小路，以及在浮光掠影的观察者们看来象是农村而不是城市的环境。

在这些小的城市中心住宅尤其是上层阶级的住宅受到保护，而免受城市干扰的西班牙式的庭院建筑很普遍。在厚厚的院墙、坚实的木门和铁格子窗后，一种很少依赖于外部世界的自足的社会实体发展起来了。这些舒适的住宅建在细长条的城市地基上，其宽度为20—30码，而和街道的距离则多达其宽度的3至4倍。这些舒适的住宅拥有庭院、水井、花园、果树、堆放柴禾的小棚、厕所，还饲养鸡、鸭，偶尔还养羊、猪或马，此外还住有仆人，远房亲戚，阿姨，或者一些雇工及其家属。由于只有家族成员才能进入这一圣所，炫耀财富的诱惑力是微乎其微的。 234

构成城市居民主体的工人、仆人和工匠的生活条件要朴素得多。他们的房屋都是用当地最便宜的材料如竹条、树杆、稻草和石块搭起来的，并且建立在城市的边缘上，通常距主要的广场有几英里之远。他们的日常食物构成依地区而定，但一般不超过一、两种，有玉米、豆类、土豆和木薯属植物，不包括新鲜的水果、蔬菜和肉类。尽管如此，这些下层阶级由于居住在城市或流入到城市，得以逃脱了大部分与拉美的农村相关联的那种剥削和控制。在城市货币经济范围内，对他们的技能和劳务的需求甚至还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就在这种看起来原始和停滞的城市环境中，欧洲的工业革命已播下了变革的种子。欧洲市场和企业对拉美能够生产的各类食品和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再加之拉美的城市居民对国外制造品所形成的购买力，开始促进贸易的发展，使之达到了在殖民地时代难以想象的水平。同时，新技术也促使商业活动进一步加强。蒸汽船的航行使船舶的运载能力在19世纪70年代及前的20年增长

了1倍，并且使横跨大西洋所需的航行时间缩短了一半。另外，不光是数量大得多的货物可以花费小得多的运输成本，而且由于19世纪70年代增加了精制冷藏设备和改进的装卸法，使得易腐烂的产品也得以进入世界贸易。到了19世纪中期，成效已很显著。进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国葡萄酒的数量在1850年以前每年仅为500桶，到19世纪70年代则增加到每年30万桶以上。与此同时，羊毛的出口从每年7000吨增加到每年10万吨。在巴西，咖啡年出口量从19世纪20年代的1.9万吨增加到19世纪50年代的15.8万吨。智利的对外贸易在1845年到1860年期间增长了2倍。一些沿海城市从渔村或沿海小村发展成为主要港口：象墨西哥的坦皮科，巴拿马的科隆，哥伦比西的巴兰基亚和阿根廷的布兰卡港。

铁路的使用带来了甚至更为重要的变化。运输费用降低到牛车和骡子车队的费用的1/12，而运输速度提高了30倍。尽管铁路线路往往采用早期的破旧商路，它们却给充作中心或铁路终端的中枢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生机。因此，1850年—1870年间，瓦尔帕莱索人口增长1倍的惊人发展，大概既归因于瓦尔帕莱索在太平洋上的得天独厚的位置，也归因于智利首都开往瓦尔帕莱索的铁路在1863年的完工。同样，第一条从罗萨里奥这一河港通往阿根廷内地的主干铁路于1870年的修通，使得罗萨里奥的规模在随后的10年几乎增加了1倍。当连接科隆的穿越地峡的铁路在1855年完工时，巴拿马脱颖而出，摆脱了严重的经济虚弱困境。连接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和沿海城市桑托斯的铁路的开通引发了1870年后圣保罗开始出现的迅猛而不稳定的增长。

铁路和轮船从根本上大大改进了运输工具，从而促进了商业的集中化趋势。交通运输方面的新技术，与其说是扩大已增长的贸易的效果，毋宁说是促进了已经存在的若干中心的增长。每一辆火车运载的货物越多，则意味着货物就必须在中心位置上加以处理，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运载能力。由于货运量依然很大以及不断往返停靠的费用，海运公司力图只在每一个国家的一个贸易

中心进行装卸。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船舶定期在瓦尔帕莱索、卡亚俄和瓜亚基尔停靠，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船舶定期在加勒比的韦拉克鲁斯、科隆、卡塔赫纳、拉瓜伊拉和哈瓦那港口以及南大西洋的里约热内卢、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停泊。

首都城市由于拥有各种设施处理成品的进口和原料的出口，同时拥有大量的上层和中等阶层来消费欧洲货物，因此受益最大。发展最快的是沿海都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里约热内卢、利马及其临近的卡亚俄港，还有加拉加斯及其临近的出口港拉瓜伊拉。连接最近的海港的铁路的修建也往往促进 236 了内陆首都及其出口港的发展。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墨西哥城和韦拉克鲁斯，或正在发展中的巴西咖啡区及圣保罗州首府及其桑托斯港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到了1870年，新技术和贸易的扩大几乎没给城市生活质量带来什么变化，即使在港口和主要城市，情况也是如此。仍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港口活动很忙乱，一捆捆的兽皮和羊毛，一袋袋的咖啡豆、小麦或粗糖，一箱箱的欧洲华贵服装、食品和五金器具都还没有达到足够的份量以便使码头装卸工人和雇工的冷漠无力的动作更紧张和充满活力。轮船或火车的到来也许会激起暂时的忙乱景象，但很快就又恢复了平静。

除了贸易和商业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富人走出他们的宅第或使穷人离开边远的郊区。因此，街上走动的人不多，只有一些当差的仆人，偶尔可见到一群妇女去做弥撒，或是一辆过路的马车或马车夫。街道的宽度很少超过30英尺这一在征服时期规定的标准，加之被紧挨着人行道建起的房屋的坚固的石头围墙从四面包围着，又有2层或3层高的阳台悬于其上，街道愈加显得狭窄昏暗。采用石子铺路使街道多少有所改进，但街道上坑洼、灰尘、泥泞和废物仍比比皆是。类似中世纪的情景，许多人家甚至富有人家将桌子上的残羹剩饭、垃圾以及夜壶里的东西一起倒向

街头。下水道彼此相隔一定的距离，并通过城市中心的街道，它们有助于在雨天或在山地冲走一些不断堆积的污垢，但根本无法掩盖它们作为敞开的污水管道的主要功能。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景况看起来更是处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失散了的家畜，尤其是猪和狗，乱窜于街头寻觅食物，增加了遍布四处的垃圾。牛群被驱赶着，把牛奶挨家挨户地送到富人的宅第。骡子、驴和马也同样把货物和食品运到各家门前。一队队的牲畜驮着货物走在通往市场的路上的场面直到19世纪末期在拉美很多城市中仍然随处可见。另外，所有在街上赶畜群的人都骑在马上而不步行。甚至在殖民地时期，一些建筑的门前已经悬挂闪烁着的火炬或油灯，在晚上点燃了几小时。但很少有人愿意胆敢在夜间行走。如果的确需要，明智的人会挂枪佩剑，提着灯笼，在一群带着武器的朋友或亲戚的陪同下骑马在夜间穿越城市。负责治安的是一些大声报时间的守更人，他们几乎起不了一支有效的警察部队那样的作用。

尽管如此，拉美的城市风貌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由于受到下面若干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加速；拉美经济作为初级产品生产者更有效地一体化到世界经济中去；一些地区的工业开始增长；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得到改进；实行国家政治一体化和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化；社会的分化加剧；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精英集团逐渐离开靠近主要广场的传统居住区而转向周围郊区。许多次要的城市以及城镇和村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常显得停滞不前，但拉美的主要城市至少在规模和结构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几乎在各处，首都城市终于与欧洲和北美的主要城市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享受欧洲和北美主要城市才有的许多娱乐和服务设施。

城市人口和城市规模

世界性的人口增长和人口集中于城市的趋势在19世纪有了进一步加强。在欧洲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尤其是在英国，人口增长率和城市的扩展速度显得最为显著。但影响这一增长的诸因素在某些方面也适用于包括拉美在内的非工业化地区或刚刚起步的工业化地区。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化，机械化的发展和蒸汽力的使用，新技术在交通运输尤其是在铁路和轮船方面的迅速应用，随之而来的劳动的专业化以及商业、工业职能的专业化，以及公共卫生措施和对特别是城内流行病的控制，这一切可以使之促进人口增长和集中，以至达到了迄今难以想象的程度。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在拉美发挥出重大作用。也许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在那些有 238 自来水和下水道工程的最大城市。死于胃肠炎的婴儿人数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在下层阶层中。而对诸如黄热病等流行病的控制措施也增加了其影响力。与此同时，除少数例外情况，出生率没有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即使在城市的环境下也是如此。另外，铁路和轮船的使用为扩大日益有利可图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以及为集中对产品的必要加工和销售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和便利。这种交通运输的革命推动了相当多的人向城市迁移，在有些地区，促进大规模移民向城市和乡下移居。

由于这些因素，拉美总的人口在1850到1930年间呈上升趋势，在1900年以后，其增长速度快于欧洲或北美。拉美人口从1850年的3,050万增加到1900年的6,190万，1930年的1,041亿[①]。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拉美的人口就绝对人数而言一直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但在本世纪50年代由于美国和加

---

① 参见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剑桥拉美史》第4卷第4章表1。

拿大的人口出生率下降，拉美的人口最终再次超过了北美。在这些年（根据人口预测这一局面将至少持续到2000年），相对而言，没有什么趋向表明拉美将重复欧洲或北美的低出生率使人口增长减缓的模式。

在人口增长的这一总的轮廓中，拉美各国人口增长的情况差别很大，这也必然影响到拉美各国的城市化程度。但在任何情况下，人口的迅速增长都导致了高速度的城市化。到1930年，乌拉圭和阿根廷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两个国家，也是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最高的两个国家。巴西和古巴在本世纪初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也同样与它们人口的高增长率有关。在上述4国中的每个国家，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和由于经济变革而产生的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推动了人口的增长并促成了城市人口的爆炸。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基本上未受到人口大规模迁移的触动，人口239 增长率较低且有规律，这使得城市的扩张不显得那么引人注目。再看看其它各地。墨西哥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发展因受到1910年以后革命年代的影响而缓慢下来，而委内瑞拉相对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对城市化水平没有带来什么变化。

因此，在1870年到1930年这段时期，拉美城市的发展模式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奇怪的是，根本无法以总人口的统计数所具有的那种精确性来确立拉美的城市人口。表1的统计数字提供了对这一时期拉美城市人口最可能提供的估计。但读者必须意识到这些数字的局限性。②

无论是当代的统计或人口普查还是历史著作都从来没有明确规定对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划分。尽管研究城市化的学者们基本上同意将2万居民这一数字作为研究当代城市的低线，但19世

② 下面的资料来源于国会图书馆，《美洲人口普查和重要的统计数字》（华盛顿特区，1943年）。这些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试图将1940年以前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数字进行比较时所遇到的问题。

阿根廷：明细到2,000居民的城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很完备，在1869、1895和1914年进行过范围广泛的人口普查。

玻利维亚：1900年只发表过一项人口普查，是根据十分不完全的收回的调查表作出的。

巴西：1940年以前未划分城市人口。于1872年、1890、1900和1920年进行的所有人口普查均因在计数上有更严重缺陷而受到批评。

智利：尽管19世纪时对城市和农村所作的划分有缺陷，其有利之处是有小到1,000居民的城市的人口，而且人口普查频繁，1865、1875、1885、1895、1907、1920和1930这些年都进行了人口普查。

哥伦比亚：1870、1912、1918、1928和1938这些年的人口普查均因计数不充分以及缺乏对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精确划分而受到影响。

哥斯达黎加：第一次充分的人口普查始于1927年。

古巴：1877和1887年进行的西班牙人口普查因计数不充分以及没有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划分而具有局限性。1899年美国进行了全面的人口普查，随后于1907、1919和1931年进行的人口统计主要涉及获取有关选举配额的信息。

多米尼加共和国：1920和1935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

厄瓜多尔：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也没有发表过普查结果。

危地马拉：在1880、1893和1921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计数不足现象很严重，且没有对城市和农村加以划分。

海地：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也没有发布过普查结果。

墨西哥：首次人口普查开始于1895年，随后于1900、1910和1921年进行的普查由于计数上的严重缺陷而遭到批评。1930年的人口普查包括了城市和农村的划分，并对人口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划分。

巴拉圭：1886年的人口普查不完整，1936年的人口普查从未公布。

秘鲁：1876年的人口普查有严重的计数不足现象和缺少对城市和农村的划分，此后直到1940年未进行过人口普查。

乌拉圭：1860、1873和1900年为人口普查只提供了简要的概貌，1908年的人口普查是本世纪60年代以前所进行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因为乌拉圭人认为人口普查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委内瑞拉：存在缺乏城市和农村的划分的严重问题；1873和1881年的人口普查因严重的计数不足而遭到批评，随后于1891、1920、1926、和1936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有所改进。

表1 各主要类型的城市居住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每一类型居住区的数目）

国家	1	2	3	4	5
	全国人口（单位：千）	主要城市（100,000人以上）	次要城市（20,000人到99,999人）	镇（10,000人到19,999人）	村庄（5,000人到9,999人）
阿根廷					
1869	1,737	(1) 10.8	(2) 3.8	(5) 3.5	(12) 4.7
1895	3,955	(1) 16.8	(7) 7.4	(8) 2.6	(29) 5.0
1914	7,885	(3) 24.1	(19) 9.4	(26) 4.6	(80) 7.1

续表

国　　家	1 全国人口 （单位：千）	2 主要城市 （100,000人以上）	3 次要城市 （20,000人到99,999人）	4 镇 （10,000人到19,999人）	5 村庄 （5,000人到9,999人）
巴　西					
1872	10,112	(3) 4.9	(10) 3.6		
1890	14,334	(4) 5.8	(11) 2.8	(19) 2.4	
1940	41,570	(10)10.7	(31) 4.6		
智　利					
1875	2,076	(1) 6.3	(1) 4.7	(6) 4.2	(14) 4.3
1895	2,696	(2)14.0	(4) 5.0	(6) 2.8	(22) 5.9
1930	4,287	(2)20.7	(13)11.7	(17) 5.6	(22) 3.7
哥伦比亚					
1870	2,951	—	(2) 2.4	(7) 2.7	
1905	4,144	(1) 2.9	(6) 4.8	(5) 1.7	
1928	7,851	(1) 1.8	(15) 6.9		
古　巴					
1877	1,509	(1)13.2	(3) 7.4		
1899	1,573	(2)15.0	(5)10.0	(7) 5.7	
1931a	4,962	(2)12.7	(8) 7.4	(26) 7.4	(28) 2.9
墨西哥　1895年以前的人口普查数字无法获得					
1900	13,607	(2) 3.3	(21) 6.0	(35) 3.4	
1930	16,553	(4) 8.8	(26) 6.8	(51) 4.3	(137) 5.6
秘　鲁					
1876	2,700	(1) 3.7	(2) 2.2	(10) 4.7b	
1876年和1940年间的人口普查数字无法获得					
1940	6,208	(1) 8.4	(10) 6.2	(41) 6.0	
委内瑞拉c					
1873	1,725	—	(4) 7.3	(14) 9.5	
1891	2,222	—	(4) 8.5	(23)14.2	
1926	3,027	(1) 4.5	(11)12.5	(45)19.7	

续表注：

a. 在1931年人口普查分类中，次要城市居民相当于25,000—99,999人，镇的居民相当于8,000—24,999人，村庄居民相当于4,000—7,999人。

b. 估计数据。

c. 次要城市和镇的统计存在疑点，因为有可能将农村人口包括在城市的分类中。

纪的人口普查人员和分析家们并没有规定这样一个数字界限。对这种何谓城市何谓农村追溯性地规定一个界限的作法势必引起对若干问题的争论。根据国家和年代的不同，给城市可以下这个定义：其人口的最低规模要在500—2,500人之间，或给市镇下的定义：其人口偶尔只有几百人。即使规定了最低标准，人们也必须面对如下困难的现实，即在拉美，不同国家之间市镇的面积或界限相差悬殊。以前就象目前一样，常常将面积相当大的农场和农村居住区包括在市镇的范围内，由此可能使“城市”人口的统计出现百分之几百的误差。例如，巴西的出版物直到1940年人口普查时才试图对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加以区分。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秘鲁，也不存在系统的统计方法以便把那些住在镇上或城市街道上的人们同住在农场或郊外农村居住区的人们区别开来。

除了人数上的考虑外，还有在可以区分什么是城市人口和什么是农村人口的职能、态度和生活方式这些比较主观性的判断标准。例如，村社经常拥有几千农民。这种居住区是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一些高原和印地安人地区所特有的。看来这些居住区不具有什么城市因素。与此同时，几乎拉美任何一个地方的火车站及其附近不多的店铺、房屋以及几百个居民，可能声称拥有许多更高的通常与城市相关的设施，且代表某种城市的生活方式。

除了在划分城市和农村方面的困难外，还存在着按城市居住区的规模作进一步区分的问题。拥有几千居民的城市和一百多万居民的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为了将这些差别同各国城市居民的人数联系起来，为了同时规定一些可以从人数上说明的城市居住区的可行定义，表1将8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口规定为4类：

表2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的各种不同分类1870—1930

国　　家	全国性的分类（2,000人以上）	20,000人以上的城市	10,000人以上的城市	5,000人以上的城市
阿　根　廷				
1869	28.6	13.8	17.3	22.0
1895	37.4	24.2	26.8	31.8
1914	52.7	33.5	38.1	45.2
巴　　西				
1872	—	8.5	—	—
1890	—	8.6	11.0	—
1940	22.5	15.3	—	—
智　　利				
1875	24.0	11.0	15.2	19.5
1895	32.7	19.0	21.8	27.7
1930	46.1	32.4	38.0	41.7
哥伦比亚				
1870	—	2.4	5.1	—
1905	—	7.7	9.4	—
1928	—	8.7	—	—
古　　巴				
1877	—	20.6	—	—
1899	—	25.0	30.7	—
1931	—	20.1	27.5	30.4
墨西哥				
1900	—	9.3	12.7	—
1930	37.2	15.6	19.9	25.5
秘　　鲁				
1876	—	5.9	10.6	—
1940	26.9	14.6	—	20.6
委内瑞拉				
1873	—	7.3	16.8	—
1891	—	8.5	22.7	—
1926	—	17.0	36.7	—

表1和表2的资料来源：理查德M·莫尔斯著《拉丁美洲的城市》（2卷本，墨西哥联邦区，1973）第2卷，第62—63页、82—84页、120—121 页，144—145 页、164页、

174—175页、200页、214页；泰尔赫E·哈尔多伊，玛丽亚·埃莱娜·兰东著《1850—1930年拉美城市化的初步统计分析》，载《巴拉圭社会学杂志》42—43（1978）第115—173页；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拉丁美洲的人口》（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74），第178—179页；威廉P·麦格里维著《哥伦比亚经济史1845—1930》（纽约，1971），第110页；米格尔·伊扎德著《委内瑞拉历史统计丛书》（梅里达，1970），第54—60页；秘鲁，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局，《秘鲁的人口》（利马，1974），第147—148页；阿根廷，《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3卷本，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1952），第1、68、146—149、171、198—199、226、246、263、284、307、331、355、372、397—398、424、440、472、530、546页；马里亚诺·费利佩·帕斯·索尔丹编《秘鲁地理统计词典》（利马，1877），第716—740页；智利，《第十次人口普查》（3卷本，圣地亚哥，1931—1935），第1卷第46—49页；巴西，《人口普查结果的分析》（12卷本，里约热内卢，1944—1950）第9卷，第9页；墨西哥，《第五次人口普查》（8卷本，墨西哥联邦区，1933—1935），各州统计部分中的表Ⅲ；约翰·杜兰德，塞萨尔A·佩莱斯著《拉丁美洲城市化的模式》，载《米尔班克纪念基金会季刊》，32/34，第二部分（1965），第166—196页；委内瑞拉，《1926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4卷本，加拉加斯，1926）。

我在此对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约翰·隆巴迪·托马斯·戴维斯、小布赖恩·洛夫曼、理查德M·莫尔斯、约瑟夫·洛夫和斯图尔特·施瓦茨在寻找资料过程中给予我的帮助表示谢意。他们将不对这些数据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承担任何责任。

居民超过10万人的城主要城市；居民在2万人到10万人之间的次要城市；居民在1万人到2万人的镇；以及居民在5000人到1万人的村庄。由于有些类别的数据对有些国家无法作出精确的估计，因此根据三个数字界限来说明城市人口的百分比。这三个数字界限是：居民超过2万人的城市；所有国家都有这一方面数据，居民超过1万人的城市以及居民超过5,000人的城市，只有阿根廷和智利有这方面数据（参见表2）。 243

尽管数据残缺不全，还是可以从这些数字中得出几个有意思的结论。不管采用哪种关于城市的定义，8个国家在从1870年到1930年的60年中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增长。很明显，在这些国家中，阿根廷、智利、古巴和委内瑞拉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这4个国家中，有3个国家的城市人

口增长是引人注目的。在阿根廷，居住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中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7.3%增加到38.1%；在智利，这一比例从15.2%增加到38.0%；在委内瑞拉，这一比例则从16.8%增加到36.7%。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的情况却十分不同。到1930年居住在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接近15%，而不是1/3或更高。

除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外，各国的主要城市从未超过两个，244 而那一增长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被主要城市吸收的。人们可以很清楚地从这些数字中得出如下结论，即人口增长和资源集中于主要城市这一当代现象是根源于全国人口和城市中心迅速扩展的这个时期。阿根廷和古巴在19世纪70年代时集中于一个主要城市的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10%多一点。在1931年时古巴两个最大城市的人口一直保持着占全国人口10%的那个比例，到1914年时，阿根廷的三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4。再看其它一些国家，1875年生活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3%，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0.7%。1876年秘鲁利马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7%，到1940年时为8.4%。1900年墨西哥3.3%的人口居住在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⑨]，193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8%，分布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蒙特雷和普埃布拉。这种模式的唯一例外是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仅有的一个主要城市波哥大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05年的2.9%下降到1928年的1.8%。

包括在主要城市这一类中的一个相关的现象，是首要城市或超越该国其它地区之上的单一大型城市。最近几年，学者和分析家们已经断定，首要城市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往往起了控制和指导的作用。移民们涌入各国的主要的城市，使主要城市的人口猛增到全国人口的1/5，在有些情况下猛增到1/3。以政治

---

⑨ 墨西哥第一次人口普查可以追溯到1895年，如此早的数据仍属于一种猜测。

权力、消费需求和工业潜力而论，资源是以压倒优势集中于这一核心地区的。

依据最简单的定义，向首要城市发展趋势可以通过其人口超过该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一倍以上来加以说明。表3以首要程度（据1930年的情况）依次下降的顺序列出了拉美最大的8个国家的首都，以及这些国家各自两个最大的城市在1870年和1930年时的人口。根据这一定义，在1870年的古巴、墨西哥、阿根廷和秘鲁，首要城市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1930年所有上述国家加上智利的首要城市也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1930年时巴西向首要城市发展的趋势最不明显，尽管对巴西的情况人们可以争辩说，即由于这个国家领土面积大，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累西腓和阿雷格里港这些最大的主要城市在1930年时各自发挥了所在地区首要城市的作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首都均明显地未达到首要城市的程度。在最小的国家中，乌拉圭的人口以三分之一的压倒性集中在蒙得维的亚；1930年时甚至没有一个城市达到蒙得维的亚二十分之一的规模。厄瓜多尔则是另一极端，地处高原的首都基多到1930年时拥有居民10万人以上，实际上同与之相匹敌的热带港口瓜亚基尔的人口一样多。

采用一个比较复杂的方法可以扩大关于首要城市程度的这一简单定义。办法是考察由城市的大小排行顺序和其规模为横纵坐标轴而建立的分布，并假设这种分布越偏离正态分布（第二、第三、第四大城市等分别拥有第一大城市人口的一半，三分之一和 245 四分之一），则向首要城市发展的程度越高。这表明到1870年时，墨西哥、古巴和智利的首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首要城市的程度；阿根廷、巴西和秘鲁则在1870年和1930年之间形成了某种首要城市结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首都只是在本世纪60年代才达到首要城市的水平[④]这一方法加深了我们对拉美首要城市水平和领

④ 参见威廉P·麦格里维著《拉丁美洲城市规模的正态分布的统计分析》，载M·莫尔斯主编《拉丁美洲的城市》(2卷本，墨西哥联邦区，1973)第2卷，第231页。

表3 1930年和1870年主要拉美国家首都向首要城市发展的程度（由该国最大城市人口与第二大城市人口的比例来决定，并据1930年的情况按向首要城市发展的程度依次下降的顺序排列）

国　　家	第一和第二大城市	数据年代	第一大城市（单位：千）	第二大城市（单位：千）	比例
1．古巴	哈瓦那／圣地亚哥	(1931)	654	102	6.4
	哈瓦那／圣地亚哥	(1876)(1879)	230	45	5.1
2．墨西哥	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	(1930)	1,049	180	5.8
	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	(1877)	230	65	3.5
3．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	(1932)(1930)	2,178	481	4.5
	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瓦多	(1869)[a]	187	29	6.4
4．秘鲁	利马／阿雷基帕	(1931)(1933)	273	66	4.1
	利马／阿雷基帕	(1876)	100	29	3.4
5．智利	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	(1930)	696	193	3.6
	圣地亚哥／瓦尔帕莱索	(1875)	150	98	1.5
6．哥伦比亚	波哥大／麦德林	(1938)	330	168	2.0
	波哥大／麦德林	(1870)	41	30	1.4
7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马拉开波	(1936)	203	110	1.8
	加拉加斯／巴伦西亚	(1873)	49	29	1.7
8．巴西	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1940)[b]	1,519	1,258	1.2
	里约热内卢／萨尔瓦多	(1872)	275	129	2.1

资料来源：豪尔赫E·哈尔多伊和玛丽亚·埃莱娜·兰东著《1850年和1930年间拉丁美洲城市化的初步统计分析》，载《乌拉圭社会学杂志》，第42—43页（1978）第146—148页。

a．该组统计数字来源于阿根廷，《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3卷本，1948—1952），第1卷，第68页和第198页。

b．该组统计数字来源于巴西，《人口普查结果的分析》（12卷本，1944—1950），第9卷，第9页。

导地位的历史渊源的理解。例如，比上述方法更为复杂的衡量方法说明，尽管巴西出现了几个主要大城市，里约热内卢还是在20世纪初确定了其首要城市的地位。

在次要城市这一级（居民为2万人—10万人），无论是从人口

的绝对数字还是从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而论，也都出现了增长，尽管极少达到主要城市和首要城市那样的增长速度。1869年阿根廷属于次要城市这一档的有2个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到1914年，次要城市增加到19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4%；1875年智利有1个次要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7%，到1930年次要城市增加到13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7%；1870年哥伦比亚有2个次要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4%，到1928年次要城市增加到15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9%；1900年墨西哥有21个次要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到1930年次要城市增加到26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8%；1876年秘鲁有2个次要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2%，到1940年次要城市增加到10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2%；1873年委内瑞拉有4个次要城市，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3%，到1926年次要城市增加到11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2.5%⑤。

城镇（居民在1万人—2万人）这一层次的发展总的说比次要城市要有节制。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通常记载有3%—5%的人口居住于城镇。委内瑞拉是唯一明显地背离这一倾向的国家，到1926年它有近20%的人口居住于城镇。后一数字也许由于将相当大面积的农村地区包括在城镇的范围内而被夸大了。但是，同时由于委内瑞拉人口集中于主要城市和次要城市的程度没有那么高，城市居民很可能更偏向选择城镇作为居住区。古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有这一趋势。1931年古巴有7.4%的人口居住于城镇，据记载，次要城市人口也占同样的百分比。

247

关于村庄（居民为5,000人—1万人）这一层次，我们只能对

⑤ 以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1870年的情况为例，首都城市加拉加斯和波哥大均被包括在次要城市这一档内。

阿根廷、智利和1930年的墨西哥的农村进行概括⑥。在其它国家，人口普查人员未能将邻近的城市型的住宅与分散的农场或乡下的一小簇房舍区分开来。在阿根廷，在村庄定居方面看来获得了重大发展，其发展程度略高于城镇，与次要城市相似，而在智利和墨西哥，村庄的模式更类似于城镇。

从有关拉美城市的人口和规模的讨论中可以得出几点结论：第一，1870年和1930年之间（总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主要拉美国家的城市居民的人数和其全国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比例都有了大幅度增长；第二，那些总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往往由于大规模移民而更加明显，同时这些国家也成为城市化进展最快的国家；第三，最大的城市往往增长最迅速，倾向于吸收总人口中很大的一部分人口；第四，在大部分拉美大国以及在几个较小的拉美国家，首都的非同寻常的增长证实了向首要城市发展的趋势；第五，尽管次要城市、城镇和村庄的人口在人数上、在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上也都有增加，但它们的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

经济职能：商业、官僚机构和工业

拉美城市在人口和规模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经济职能的不同。商业证明是所有这些城市发展经验中的主要因素，至于是否增长还是停滞，主要取决于这些城市及它们所在的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而世界经济受到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国家的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伴之而来的城市发展是在由于日益扩大的农矿产品出口而带来的经济繁荣中出现的。城市发展的不足则表明这些城市孤立于世界贸易之外或表明对所生产的某一原料的价值或竞争优势的丧失。

248

⑥ 在古巴，尽管1930年的数据包括村庄一级，但因对镇和村庄的定义不同，故无法进行比较。

为了弄清楚有关城市职能的讨论，可以将拉美城市归为四大类。最引人注目并广为人知的是商业一官僚城市型。第二类的城市不那么常见，它们除了有商业和官僚机构的活动外，还有重要的工业组成，因此这类城市与西欧和北美的城市更为相似。第三类城市是一种专业化型的，即商业一矿业城市。这些城市除了贸易活动外，其主要活动是对某一矿产品进行采掘和加工。上述三类以外的城市都归为商业类型，其主要职能是充当临近的周围地区商品的集散地或货物的汇集中心。

第一类，即商业一官僚型，包括所有国家的首都、省府或州府，甚至包括一些区、县政府所在地。但是，这类商业和行政中心同出口导向型经济之间的直接关系，可以从国家这一级最充分地看出。因此，下面将集中讨论各国的首都。除了地处高原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面对着热带港口城市瓜亚基尔这样一个迥然不同而且敌对的权力中心，以及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不得不与其它几个地区中心相竞争外，其余的那些曾于18世纪成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帝国政府的所在地继而于19世纪成为新兴国家的首都将对所在地区商业资源和财力的非同寻常的控制与政府职能的行使相结合起来。

在一些国家，首都的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对商业和行政管理的统治地位可以从其首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上反映出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到1930年占阿根廷全国人口的20%，乌拉圭总人口的1/3住在蒙得维的亚，古巴首都哈瓦那和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人口到1930年都占全国人口的16%（参见表4）。而且，在1870年和1930年之间，各国首都的人口占其全国人口的百分比都有了增加。拉巴斯、波哥大、圣地亚哥、墨西哥城和加拉加斯在60年中使这一百分比翻了一番，而里约热内卢、圣约瑟则增加将近1倍。

各国首都的增长率千差万别，这与各国参予生产出口产品的情况密切相关（参见表5）。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增长率摆动于3%—

6%之间，直到这一时期末期才有了下降，这并不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因为联邦区的人口已经接近饱和状态，增长开始向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相邻地区扩展。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阿根廷经济沿着已经确立的路线持续发展中受益。这一路线在20世纪初仍得

249

表4 1870年和1930年各国首都的规模（单位为千）和在各国首都居住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

国　家	首　都	首都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比	
		1870	1930	1870	1930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187	2,178	10.8a	18.8
玻利维亚	拉巴斯	69	176	3.5	8.2
巴西	里约热内卢	275	1,701	2.7	5.0
哥伦比亚	波哥大	41	330	1.4	3.8
哥斯达黎加	圣约瑟	9	51	5.5	10.8
古巴	哈瓦那	230	654	15.2	16.5
智利	圣地亚哥	150	696	7.2	16.2
厄瓜多尔	基多	76	127	7.1	8.2
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城	50	121	4.6	6.0
墨西哥	墨西哥城	230	1,049	2.4	6.3
巴拉圭	亚松森	25	97	7.6	11.0
秘鲁	利马	100	273	3.7	4.8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110	572	25.0	33.0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49	203	2.8	6.0

资料来源：同表3。

a. 以1869年阿根廷全国人口普查数字取代了哈尔多伊和兰东所使用的数字。

以坚持，办法是增加冻肉的出口以补充羊毛、兽皮和小麦的不足，并增加外国投资额。蒙得维的亚朝着50万人口这一方向的迅速增长同样地是由于通过这个首都兼港口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繁荣所致。在其它地区，增长模式证明更不规范。圣地亚哥在这一段时间一直以2%—3%的增长率稳步发展，因为铜和硝石生产的周期性繁荣从小麦和羊毛这两种农产品的出口获得补充支持。里约热

250

表5 各国首都的年平均增长率（%）1870—1930a

国　家	城　市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3.3	6.0	5.5	4.0	4.9	3.4	1.0
玻利维亚	拉巴斯	0.1	-5.5	2.1	1.1	3.7	2.4	3.8
巴西	里约热内卢	2.8	—	3.6	2.8	2.9	2.1	2.4
智利	圣地亚哥	2.7	2.3	3.1	2.2	—	3.3	3.2
哥伦比亚	波哥大	2.2	6.3	2.5	-1.5	2.8	4.2	3.5
古巴	哈瓦那	1.0	—	0.4	1.8	2.4	4.0	2.9
墨西哥	墨西哥城	0.6	3.7	0.8	1.1	3.2	3.1	5.2
秘鲁	利马	0.8	—	0.3	1.8	—	3.0	3.4
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4.7	5.9	6.1	0.8	3.5	1.5	3.7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0.3	1.7	2.5	0.4	—	2.0	5.1

a．所引用数字的年限因可获得的资料的情况而异。

资料来源：同表3。

内卢也有十分类似的经济增长率，在里约热内卢，巴西咖啡的繁荣局面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推动了圣保罗州首府的工业以及商业和官僚机构的发展。另外一些国家的首都主要是在20世纪显示增长势头。高原城市拉巴斯在玻利维亚锡出口增长的基础上在1900年以后开始有了显著发展。波哥大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有利可图的咖啡出口中受益。哈瓦那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是由于该岛依赖于美国市场和投资的蔗糖生产增长迅速。加拉加斯在委内瑞拉不断增长的石油生产的推动下，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达到了5%的年增长率。利马的增长率为3%，这一不高的增长是由于利马对秘鲁其它城市在商业和政治方面的控制有了加强。

以上述各国首都的发展为例，商业—官僚城市表明了在增加贸易的基础上以求扩展的一贯倾向，而原料出口的繁荣局面和政府对交通运输和财力的影响力促进了贸易的增加。即使当商业方

面的促进因素减缓时，这种商业一官僚城市对其临近周围地区所施加的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往往会支撑持续的增长。当加强贸易的影响和对某一扩展了的地区实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的影响压倒性地集中于一点的时候，最令人瞩目的发展情况就出现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提供了商业一官僚发展模式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它在1870年时仅是一个拥有将近20万居民的主要城市，但到1930年却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以上人口的世界大都会，与此同时，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0%上升到20%。17世纪后期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曾经是拉普拉塔河流域地区最大的城市，从1776年以来，最初成为拉普拉塔河总督辖区的首都，随后成为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9世纪后期之所以获得异乎寻常的发展直接起因于它通过其港口在统辖阿根廷不断增长的出口品和从海外进口的消费品方面享有实际上的垄断。到1890年，它又成为正在发展中的全国铁路系统的枢纽。因此，它充当了整个阿根廷的以及进出玻利维亚和乌拉圭的大部分贸易的货物集散地。富饶的潘帕斯草原看来对发展农业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正如欧洲市场对阿根廷产品的需求看来也是无限的一样。欧洲移民——主要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纷纷涌向阿根廷的沿海地区，以期响应当地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外国资本也流入了这个国家，为商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及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代化提供资金。经济繁荣也加强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国家首都的地位，并进一步增强了官僚统治职能的重要性。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化逐渐取消了各省的地方自主权，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民族精英的理想居住地。这种中央集权化进一步扩大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联邦资金的份额，增强了对交通运输网和投资机会的控制。

尽管第二类拉美城市，即商业一工业一官僚城市，远不如商业一官僚城市那样常见，但证明是意义重大的，因为它存在工业职能，而工业职能作为拉美城市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的情况是少见的。更为常见的工业发展经验是，原来兴旺的手工业和

251

家庭工业被廉价而通常优质的外国制造商所压倒。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商业一官僚城市的典型特征是工业生产往往被局限于出口原料的初步加工或者局限于诸如一些建筑材料、饮料和食品等体积大或易腐烂产品的生产。以下对工业在增长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城市的实例研究，表明它们同这些城市与商业一官僚城市的有意思的异同之处。

这类城市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圣保罗。圣保罗的起步是受巴西的咖啡繁荣局面所产生的商业一官僚模式的推动以及它作为重要的圣保罗州的首府所具有的地位。圣保罗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1870 年圣保罗只有3万居民，到1930 年在它迅速增长以赶超里约热内卢的过程中，其居民人数接近 100 万这一目标。 252

19世纪30和40年代在靠近里约热内卢的谷地开始了的咖啡繁荣局面，在随后几十年中向南部和西部扩展，深入到圣保罗州，以寻求适应大面积种植咖啡的新边疆。1870年里约热内卢周围地区的咖啡产量仍然比圣保罗州的咖啡产量高10倍。到1890年这两个地区的咖啡产量是同等的，而在1900年和1930年之间圣保罗的咖啡产量则是里约热内卢的咖啡产量的1倍了。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一样，大批移民——1890年以后主要是来自意大利的移民——和外国资本对上述种种机会迅速作出反应，并使得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

但是，证明圣保罗的事例具有独到之处的是，其相当高的人口年增长率（1890年为4.2%，1900 年为14.0%，1910 年为4.8%，1920年为3.6%，1930年为7.1%）不仅仅是由于商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州政府为繁荣的农业出口商品提供的强有力支持，而且是由于出口带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增长。由于从种植咖啡以及从事与之相关的晒干、包装和运输工作中所获得的不断提高的收入形成了地方需求和地方市场，这就鼓励了当地的生产商向从国外进口全部消费品的倾向提出挑战。咖啡大亨们至少将他们的部

分利润投入到当地的纺织和食品加工工业以及建筑业、瓷器、玻璃制品、木材加工和初级化学工业部门。基于内部通婚和共同利益而促成建立的天然联盟在圣保罗的农业投资者和工业投资者之间崛起了，这一联盟进一步对该市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些条件为圣保罗1930年以来以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增长为特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哥伦比亚的咖啡繁荣局面开始的比巴西晚得多，但这一繁荣在1900年到1930年间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集中在安蒂奥基亚一个地区，尤其是集中在该区的主要城市和首府麦德林。该城的人口1870年为3万人，与圣保罗相同。到1900年，人口将近翻了一番，到1930年人口再次翻了一番。到1920年安蒂奥基亚生产的咖啡占哥伦比亚出口总额的1/4以上。鼓励圣保罗工业增长的同一地方市场和多重作用刺激了对麦德林纺织工厂的投资。许多作者还认为，安蒂奥基亚在较早时候出现、并持续到1850年的金矿繁荣，培育了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能力和结交能力，并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和有用的技能。中央政府采取的保护关税措施，水利发电的大力使用，帮助建立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外国资本的流入，以及咖啡种植者支持本地制造业的倾向，到1930年这一切有助于为麦德林的工业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54

在墨西哥，蒙特雷的发展更多的是由于交通运输设施和矿业资源，而不是由于出口农产品的刺激或企业家的传统。1882年建立的蒙特雷与美国的铁路联系途经拉雷多，蒙特雷靠近该城北部和西部的煤田及铁矿床，它与邻近港口坦皮科的联系和它通向墨西哥城的铁路线，以及存在着丰富的水力发电的潜力，这一切促成了19世纪80和90年代受到美国资本大力资助的金属冶炼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形成。19世纪后期国家立法和州立法鼓励这类外国投资，同时，附近的牧场和灌溉农田可以提供建立在当地工人、消费者和资本的基础之上的基地。蒙特雷的增长与麦德林很相似，该市人口从1880年的2.9万人发展到1930年的13.3万人。到了这

一时期的晚些时候，生产啤酒、玻璃制品、陶器、纺织、水泥、食品的工厂以及冶炼业、铁制品和铸造业，使工业对蒙特雷的重要性至少和它作为新莱昂州首府或作为墨西哥东北部主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圣保罗、麦德林和蒙特雷各自提出了城市发展的不同实例。但它们都表明具有重要的工业职能这一共同特征。它们的经历说明，即使在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工业在某些条件下仍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获得蓬勃发展，而且正如在欧洲或美国一样，工业可以同样成为城市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三类城市，即商业—矿业型城市，表明了专业化城市中心的特征。可以在智利北部产硝石的荒芜地区、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油田产区以及智利中部、秘鲁、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开采铜、锡、银和金矿的高原地区找到这类城市。亚马孙丛林中的采胶站和村庄由于具有经济上的相似之处，也应包括在这一类中。在上述所有情况中，城市的增长或衰落都直接取决于世界对该地区产品的需要。该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该产品的初级加工或提炼吸引了能提供劳动力的人口，这些劳动力反过来又成为城市劳务和零售销路的消费者。但当世界市场不再需要这种产品，或转向比较低廉或质量较好的供应来源时，没有其它职能可以支撑这类城市中心，因此这类城市中心很快就衰落或消失了。 254

智利北部和秘鲁南部干旱沙漠上的硝石矿床在19世纪60和70年代曾成为世界上制造化肥和炸药所需的这类成份的最佳来源。智利从1879年至1883年间发动了对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战争，以确保完全占有这些资源。在智利的主权统治下，其规模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采矿营地收容了移民来的工人，这些工人将坚硬的硝石板在沙地上粉碎，将其装到大桶中溶解、净化和干燥，然后再把它们装上板车运到伊基克、阿里卡和科皮亚波这些港口和省府。这些采矿营地随着移民们洪水般地涌向北部而繁荣，又随着世界市场的波动而因移民退回到智利中部传统的农业劳动和勉强

维持的生计而衰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人造硝石最终导致了这些城镇的衰落，其中许多城镇到1930年时已经消失了。

同样，作为工业化国家所需的原料的橡胶业的发展，促使1890年到1920年间巴西亚马孙地区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未必是真的繁荣。许许多多的小河岸居住点一跃而发展成为马瑙斯和贝伦这样迅速扩展中的商业—官僚城市。居住点提供从野生胶树上采集的胶乳，然后将其置于烟雾腾腾的火堆上烘烤使其凝结成硬团。英国的植物学家在19世纪后期将树苗移植到锡兰、马来亚和印度的种植园的成功，迅速地结束了巴西亚马孙丛林的野生橡胶产品所享有的比较优势。种植园的橡胶远比野生橡胶容易管理、收割和销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德国人对橡胶需求的刺激，代用品人造橡胶应运而生，敲响了许多上述沿河村庄的丧钟。

尽管在其它地方对锡、铜、银、金和其它金属以及对石油的需求出现了高潮和低落，但不如硝石和橡胶高潮和低落那么引人注目，对世界市场同样的依赖性也支配了这些采矿营地和村庄的生存。凡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或商品化农业能够支撑相当数量的当地人口的地区，如在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的大部分高原地区或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沿海，这些中心可以回复到主要是商业性的职能。但在城市人口仅依赖某种矿产品的出口的地区，世界市场价格或需求的下降则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最后一类拉美城市，即商业型城市，无需详细探讨，尽管这类城市从数量上说，提供了大部分拉美城市的经历。商业职能在前面所讨论的三类城市中起了主要作用。在商业城市中，商业职能是唯一重要的职能。这些城市规模不一，小到铁路线上快车不停靠的小站或土路上的农村小镇，大到巴西的桑托斯、阿根廷的布兰卡港和罗萨里奥以及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这样的重要港口。这些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是农业区下述物资小规模集散的前哨，如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咖啡，秘鲁北部沿岸的蔗糖，墨

西哥北部、委内瑞拉内地、巴西南部、阿根廷中部的牛群，乌拉圭、阿根廷南部的羊以及智利中部和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区的小麦。在这些地区，一些交通运输线路的交叉点往往有助于较大城镇和城市的发展。这些城镇和城市提供村庄无法支持的各项劳务和活动设施，如一系列零售网点，医疗和法律服务，银行、初等教育、报纸、剧院或电影院。所有这些商业城市即使为相当多的农村人口服务，但是其繁荣和发展最终也要有赖于由商业一官僚城市所控制的城市网络的运转，在某些情况下也要有赖于国外市场和需求。但那种依赖从来达到象商业一矿业城市所具有的那种极度的依赖程度。

就城市的经济职能而言，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严重影响着整个拉美地区城市的发展。在矿业中心和较小的商业城市这一层次上，世界市场价格的跌落或来自可替代资源的竞争可以急剧削弱增长，甚至导致人口数量的下降。即使对较大的商业城市和许多商业一官僚城市来说，它们的增长严重地依赖于国外市场对当地产品的需求。此外，这种外部因素带动的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往往偏重于主要的商业一官僚城市或那些还另具有工业职能的城市。如表6所示，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古巴和秘鲁的次要城市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主要城市、所有商业一官僚城市的增长速度。乡下的增长甚至还要慢。主要依赖于商业和在一些地区主要依赖于矿业的镇或村庄的人口也包括在乡下人口之内。 256

城市的有形变化：广场和郊区

虽然拉美城市在规模和职能上存在差别，但它们在因增长而带来的具体扩展类型方面都有着同样的经历。在有些情况下，如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这种扩展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在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城市，这种扩展到19世纪末期已经在进行（但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中美洲，要等到本世纪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

表6 一些有选择的国家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

国　　家	时　　期	总增长率	100,000人以上的城市的增长率	20,000人—100,000人的城市的增长率	20,000人以下的城市的增长率
阿根廷	1869—1895	3.9	4.2	2.5	2.7
	1895—1914	3.5	4.8	3.9	
玻利维亚	1900—1950	1.1	2.9	2.0	0.9
智利	1907—1920	1.1	2.4	1.9	0.6
	1920—1931	1.4	2.7	2.4	0.9
古巴	1919—1931	2.6	5.4	2.5	2.4
秘鲁	1876—1940	1.2	2.1	1.7	1.1

资料来源：关于拉丁美洲城市化问题讨论会，智利：圣地亚哥，1959，菲利普M·豪泽编《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纽约，1961），第97页。

a。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的定义是，某一时期人口增长总数除以平均人口数（初次人口普查和末次人口普查的平均数）和两次人口普查之间所间隔的年数。

后才开始这种扩展)。在所有情况下，这种扩展都是向外推进，即从作为殖民城市枢纽的主要广场向毗连郊区扩展。

在主要城市和在次要城市，这种向外扩展的方向和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层阶级决定的。尽管这一上层阶级迁往郊区居住的现象看来同精英们早些时候逃离欧州和美国城市的古老中心的情况相似，但拉美的上层阶级仍保持着他们对广场地区的情感，由此形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城市环境。

257

在不断增长的商业利润转向各个城市的情况下，上层阶层的住房式样和生活方式在19世纪后半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富人们开始将其住宅迁出中央广场，往往寻找较高级，因而也是更宜人和更健康的居住环境，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寻找更大的空间。这种迁移决定了城市扩展的方向。在墨西哥城，富有的墨西哥人将住宅用地越来越选在延改革大道向南沿伸的地带。在1864年时则开始转向查佩特克宫的方向。在瓜达拉哈拉，富人向西扩展，进入新

形成的郊区住宅区。在圣保罗，靠咖啡致富的新富们沿着以圣保罗大街为界的山脊地带建造其庄园住宅。在里约热内卢，富人们的住宅沿里奥布朗库大街而建，该街是从旧城中心开拓的，在此可眺望风景如画的甜面包山，或沿海向南延伸到卡特特和拉朗热拉斯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层阶级的家庭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向北迁移，占领北郊宅第，与五月广场的郊野相距十一、二条街。到1910年，则沿着三角湾边迁移联邦区以远的郊区。在蒙得维的亚，上层阶级的家庭沿着港湾的海岸向东，朝波西托斯方向迁移。利马与卡亚俄港及与临近的南部沿海城市乔里约斯的铁路联系，最初促进了上层阶级向外扩展。到1920年，高级的阿雷基帕大街的修通加速了人们向西南向太平洋方向的迁移。在圣地亚哥，最初以主要广场的临近地区扩散的做法20世纪20年代由于向东迁移而进一步得到加强。这种迁移目的是为了能在朝着安第斯山脉缓缓升高的地带获得更新鲜的空气和更多个人的小天地。在波哥大，富人们的住宅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内仍集中在军人广场周围，但随着商业的扩展和咖啡繁荣局面的出现，这些人家开始往靠近市中心北部的地势较高的地区以及朝着鞋匠村的方向迁移。在加拉加斯，方向是向南朝着埃尔帕拉伊索郊区迁移的，随后到1930年，向东朝着洛斯乔罗斯迁移。

上层阶级不仅改变了他们住宅的地点而且也改变了其外观和结构。封闭式的宅院式建筑风格已不受青睐，取而代之的是法国、意大利、英国的模式、到1930年则还有美国的模式。富人们尤其是那些暴发户更喜欢按巴黎或布鲁塞尔的制图板设计而成的多层住宅，这些住宅能更好地显示了他们的地位。庄严雄伟的大门和弯曲迂回的扶栏给人一种新的空间感，同时也向世人通告住宅主人的权势。装饰华丽的休息室和门厅垂吊着厚厚的帷幕，摆设着锦缎面的沙发，使其与具有殖民时代风格的会客厅中土里土气甚至斯巴达式的木椅子或马鬃做的床相距更加悬殊。远离街道的两层楼的别墅或小一些的平房则典型地表明人数不断增多的自由职

258

业者和管理阶层的偏爱。在每一种情况下，住宅已丧失了那种封闭的世外桃源的主要性质，住宅成为其居住者特权和收入的公开体现。

要求更多空间的娱乐活动随着这种向外迁居而被采纳。高尔夫球、橄榄球、马球和网球成为深受富人们欢迎的运动项目。乘坐四轮马车或汽车在下午或傍晚出外郊游也越来越时兴，去处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勒莫公园，墨西哥的改革大道和查佩特克公园，里约热内卢的植物园，利马的科隆大街，蒙得维的亚的散步草坪以及圣地亚哥的杨树林。一些迎合富人们需要的餐馆、俱乐部和剧院开始在上层人物居住的边远郊区出现了。

富人们最初向外迁移的活动，因人数越来越多的所有阶级的呼应而很快得到补充。在某些悦人心意的大街或僻静的郊区成为富人们聚集之处的同时，城市的扩展产生了其它许多郊区，居住在这些郊区的主要是中等阶层和工人阶级。对这些居民区来说，教堂、警察局、集市、有轨电车、火车或公共汽车站和广场构成了城市的核心。围绕着这个核心，出现了一些商店、银行分行和自由职业者的办事处。同殖民地时期的城市一样，富人们把他们的住宅建在靠近这个中心的地方，以便接近交通和服务设施，而地位低下的住户则分散在不热闹的小街上。当城市主要以一层或二层的住宅的形式向外扩充时，随着这一扩充而来的是杂货店、肉店、面包房、水果和蔬菜摊等零售网点。在已有人定居的地区，购买日常用品、肉、面包和其它一些供应的商店从未超过两、三条街的距离。同样，在这由十几条街组成的同一居住区，通常有一个牙科大夫，一个裁缝，一个修鞋匠，一家药店，一个洗衣工，一个铁匠，一个送奶人，一个家具制作人，一个瓦匠，一个理发师，换言之，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可能需要的技艺或行业。因此，即使城区急剧向外扩展时，郊区和一些较小的居民区仍证明是非常自给自足和完备的。

在城市漫无计划地向外扩展的同时，城市的核心部分仍保持

着它的重要性。拉美的上层阶级和中等阶层即便迁出到更悦人心意的居住地，他们仍然保持着与中央广场的联系及对它的依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不断集中逐步导致了各国首都城市的精英居民的形成，他们开始坚持创建乔治•豪斯曼曾介绍到巴黎和其它一些欧洲城市的那种现代的开放的环境。由于街道狭窄和乱占土地的这种布局，每况愈下的房屋变得更加局促，上层阶级居民试图为他们的首都城市寻找一种崭新的面貌和建筑风格。这种作法继而被所有的省府或州府的精英以及事实上被拥有改善资金的任何城镇的精英们所仿效。

这一环境重建的中心思想认为，主要的广场本身就代表着城市。这种思想深深扎根于这些西班牙城市的起源。在较大的城市里，广场成了为拓宽狭窄的马路并使之产生深远的景观和空间感而建的斜型建筑和林荫大道的焦点。在这个广场周围的主要公共建筑物，如教堂、行政官员的官邸、议会、最高法院和内阁各部的建筑都得到了改建翻新，更为常见的是照搬希腊一罗马的宏伟外形进行彻底的重建。在较小的城市，属于相同层次的教会和政府也从改建中获益：一座崭新而堂皇的市政大厦，或是对地方教堂进行一次耗资巨大的整修。

尤其是在首要城市中的剧院、俱乐部和饭店，给闹市区不断变化的风貌增添了异彩。墨哥西城的美术馆，里约热内卢和加拉加斯市政剧院，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哥伦布大剧院、利马的玻利戴阿玛剧院，还有蒙得维的亚的索利斯剧院，都反映了民族精英的一种愿望，即能有一个为歌剧和戏剧的演出场所，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在此观看和让人观看。宏伟的剧场门厅，大理石铺设的包厢，各式各样的壁毯，用天鹅绒制的地毯、窗帘等室内装璜，以及现代化的灯光设备和舞台效果，往往可以同米兰、伦敦或纽约的剧场相媲美，并吸引了来自拉斯卡拉歌剧院，科文特加登剧院和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些世界最著名的人材。在附近街道上，还可以找到精英们聚会和消遣的其它地方。

日益增多的中等阶层成员们也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这些地方。这些剧院、电影院、餐馆、私人俱乐部和咖啡厅迎合了富人们想要获得欧洲最高级最时兴的享受的愿望。

对阔市区尤其是主要的广场的美化工作也付出了重大努力。由于地方精英们力图创造出尽可能美的形象，雕塑、树木、花园、长椅和喷泉交替地加以设置、移动或提高质量。附近的街道不管是铺木还是上面铺柏油的，都是第一批得到铺设的，并且随后获得用最新技术进行装修。马车道和尔后的有轨电车道从市中心向周围扩展。水管和下水道的安装，油灯、继而是煤汽灯、最后是电灯作为公共照明工具的采用，电话的安装、垃圾的清理、街道的打扫、警察和消防人员的治安保卫工作，都总是首先开始于市中心，并继续得到较好的维护。在最靠近主要广场的地区，这些设施也就更加现代化和高效能。

所有这些变化导致了拉美城市的大规模重建。在殖民地时期和19世纪，富人们总是居住在靠近权力和特权机构所在地以及拥有城市各种便利设施的主要广场。根据这一方案，除了仆人住在富人们的宅第外，所有下层阶层占有城市的边缘地区。随着19世纪后期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精英们以及新兴的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这些中等阶层的成员对住宅的偏好开始发生变化。正是他们的要求不仅仅是要求交通运输设施或工业及城市规划。指引了各城市向外发展的方向和时间。既然广场和市中心对精英和中等阶层仍具有吸引力，所以向外移动是朝着最靠近能提供较大用地，容易通过市中心，以及具有隐居条件的地势高的场地上进行的。富人们由于选择新的住宅区并选择要求有更多的空间和更能炫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种风气下开始大大改变以前那种以广场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尤其是在1900年以后，开始使拉美的城市布局与北美和欧洲郊区型的城市布局更趋一致。与此同时，261 他们对作为工作和消遣的主要中心的市中心继续予以高度重视。其结果是，尽管主要广场周围地区已不再是居住区，但仍然具有

更重要的地位和更具有诱惑力。

城市化的政治后果

总的说来，城市的发展对地方市政府的影响极微。市政府当局一贯软弱无力和一贫如洗是殖民地时代特有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9世纪，至今也还是这样。假如说，城市曾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它们的美洲帝国的控制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是由马德里和里斯本委任并领导的军事和行政官员的所在地。帝国统治只许可市或镇一级拥有管理度量衡、维修道路照明设施以及对守更人进行监督的自主权。几乎完全缺乏资金来源的情况就进一步决定这一级政府对权力无法实施有效控制。权力空虚到如此程度：帝国当局甚至允许有限的地方代表通过出售方式而进入仅具有荣誉价值的议会。

软弱无力的市政机构这一遗产传给了新独立的国家。地方长官和农村考迪罗行使有效权力，并且，当他们决定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时他们就要利用全国的或州的政治机构而不是市政机构。随着城市的扩展以及公共医疗、卫生、交通和治安问题变得日益紧迫时，再一次是由国家当局和州当局不是由市政府提供指导、资金和提出解决方案。商业一官僚城市由于可以兼得国家或州的财富和行政权力，是最能够解决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且，在整个拉美，最终治理城市的，是警察首脑、卫戍部队司令或其它高级权力代表，而不是市政议员们。与此同时，在这几十年中，政治活动总的来说不是旨在寻求解决城市问题的办法，相反，所关注的是地区问题和全国性问题。

从国家一级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的观点看，有关观念和任务方面的几次重大的调整是1870年—1930年期间城市的重要性日益加强的结果。首先，对日益城市化的面貌几乎无需作什么探讨，因为这一面貌在这一时期开始时就已完全展现出来了。在所有拉美主 262

要国家中，农村考迪略时代到了19世纪中期已开始接近尾声。在马德里和里斯本行使的帝国统治被推翻后的几十年，在地方土地所有者家庭中，尤其是在那些能够从其土地上的工人中召集一支缺乏训练但人数众多的军队的家庭中形成了很大一部分权力。这些强大的农村考迪略土地所有者因此成为整个拉美有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力量。不管国家是经历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迅速达到独裁统治下的秩序和稳定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首领之间的斗争能多快地产生一位能成功地对他人行使权威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考迪略。但是，在建立全国性统治的过程中，这些农村首领再也不能单单依靠由农民组成的非正规军了。他们越来越转向城市居民寻求财力、专门知识和获得支持。农村考迪略们自己也渐渐地变成了城市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终也就失去了他们在乡下的权力基础。

另一个与之相关的事态发展出现在上层阶级的内部。由于人口和商业的发展使得城市的规模和财富膨胀起来，达官显贵们日益居住城市里，他们的眼界也变得更加城市化了。他们也终于越来越依靠城市，特别是各国首都。并不是所有的上层阶级都居住在首都，但他们开始组成单一的民族精英集团，这一集团在首都建立起某主要的权力中心和领导地位，并且，它的许多成员也居住在首都，至少有些时候是如此。即使他们住在州府或镇上或乡村庄园时，他们仍同首都的事态发展和那里的同僚保持紧密的联系。民族精英集团的产生反过来又促进了以体制化的政府取代个别的强人或考迪略的统治。这种体制化的政府是由一个经精英集团一致任命的全权执行机构和由同一个精英集团提供人员并受其控制的主要是咨询性的立法机构所组成。

这种由民族精英集团进行统治的局面激起了反抗。这一反抗是由主要的城市之间在规模、财富和社会方面日益加剧的不平衡所酿成的。新的集团出现并成长起来了，例如比较职业化的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战中和战后时期）、大学生（尤其是

1918年后阿根廷科尔多瓦省的大学改革运动的展开）、有组织的劳工，特别是行政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商业人员这些中等阶层，这些人扩大了热切希望参政的人们的基础。

特别是来自中等阶层成员的抗议和影响开始引发了一系列变革，使得一些拉美国家中由民族精英集团实行政治控制的程度大大受到削弱。拥有更广泛基础的政党，日益增多的选民参予，以及旨在使居民中广泛阶层受益的政治纲领，这一切最终都是主要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后果。

19世纪初以来政党在拉美各地获得了蓬勃发展。但政党当时只是作为支持农村考迪略的派系而存在，尔后则是作为民族精英集团内部的联盟而存在。领导者们可以动员散工和工人去投票，就象他们可以动员他们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非正规部队来进行决定性的对抗一样。但选举充其量不过表明了经精英集团之间密谋政策所事先决定好了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政治进程中，没有民众的参予。但是，19世纪后期，城市人口的日益增多，特别是那些无法跻身于精英集团或上层阶级、但在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观点立场上又使自己不同于广大的体力劳动者的中等集团的人数尚日益增多，使得精英集团继续维持政治控制的局面日益困难。从城市中等阶层中涌现出政治领导人，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政党或扩大已经存在的政党的基础。他们通过报纸、公众集会、游行示威的手段，将越来越多的公民集结起来，反对贪污腐化，或比如说，反对通货膨胀，主张更多的参予政治。甚至有相当多的城市平民成份卷入了叛乱，例如189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叛乱，1895年利马和瓜亚基尔的叛乱，以及1904年亚松森的叛乱。几乎所有的政变或长久存在的政权至少都要获得城市中等阶层的默认。城市中等阶层反对派对1911年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的倒台是起了作用的，并由此触发了持续十年因紧张关系和不平等现象而加剧了战争和动乱，波及范围远远超出墨西哥各主要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中等阶层是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1903年在乌

264

拉圭夺取政权，以及1895年—1899年秘鲁尼古拉斯·彼罗拉政府的幕后支持者，尽管对后者的支持是暂时的。在阿根廷，由于激进党1890年以后在相对城市化的沿海地区的吸引力和享有权力，执政的精英在1912年接受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并于4年后将总统职位拱手让给激进党考迪略伊波利托·伊里戈延。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在参加智利1920年的竞选时所提倡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反映了这同一中等阶层的许多看法，正如军人干涉者在1924年和1925年所做的那样。就在这同一个10年期间，奥古斯托·莱吉亚与秘鲁传统的地主权贵集团的决裂，莱吉亚在公共工程和政府官僚机构方面的巨额开支，以及由此而来的大量新成份涌到具有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职位上，这一切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及其领导人维克托·罗尔·阿亚·德拉托雷提出更为激进的要求打开了道路。

为扩大政治参予权所采取的起步性活动主要来自城市白领中等阶级层。他们经常吸收学生和部分军人参加到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中来，"民众主义的"领导人则开始求助于工人。他们最初能取得成功通常是因为他们看来如此无组织性，而且与民族精英集团在态度和背景方面如此相似，以致他们没有怎么引起这些精英们的畏惧和反抗。随着民族精英的政治控制开始削弱，扩大参予这一有限目标往往发展成为取代掌权的民族精英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中等阶层十分缺乏团结或目标的状况虽一度曾起到消除精英的畏惧感的作用，但最终证明是中等阶层的致命弱点。在1930年之后的几十年，这一弱点可以使诸如军人或工人那样的纪律性更强的成员抓住了主动权。

结　论

本章概述了迅速城市化的过程，特别集中探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这段时间拉美的主要城市和首要城市的情况。到1930年，曾一度是世界上农村占压倒优势的地区也可以炫耀有了象布

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和墨西哥这样的大都市。居民在2万人以上的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在阿根廷和智利是1/3，在其它主要国家大约为15%。在一些国家，有一半人口住在2,000人以上的居住区。商品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城市扩展。对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国家原料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主要是为了满足来自城市的新的需求而使消费品源源不断的流回，刺激了加工工业中心、矿业中心、港口、铁路中枢的发展，特别是刺激了首都和省府的发展。随着城市的扩展和财富的增加，上层阶级，特别是较大城市的上层阶级离开了他们以前主要广场周围的所在地，而是在地势较高的郊区寻找更好的住宅区。尽管如此，富人由于商业活动和娱乐消遣以及传统关系，仍然同广场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因此也就花费了大力气和钱财来美化他们的首都城市并使之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在各国首都和一些州府或省府最为明显，这一发展推动并促成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精英的形成。但到1930年，这些曾以对他们的统治作出迅速反应的代议制政府基本上取代了19世纪早期的农村考迪略集团，却又发现他们自己处在新的城市集团、特别是中等阶层要求分享或放弃那一统治的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因此在1870年到1930年期间城市对拉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 8 章

267

1930年以前的拉丁美洲工业

导　言

要建立一个以发达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是拉丁美洲坚持不懈的目标。自从19世纪初独立革命以来，许多思想家和政策制订者便不断为此冥思苦想。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是发展工业生产。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最能促进工业发展的真知灼见：包括国家直接资助制造业以及较全面地刺激经济增长等选择方案，以便在对其它经营活动进行投资的同时，促进个人积极性在工业部门充分发挥。当时经常求助于 industria 这个词（往往用来表达现代用语“工业化”一词的意义）就足以说明对工业的重视了；同时又可能感到发展制造业基础难以成功——至少在1930年前这段时期便是这样。

拉丁美洲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工业化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即在主要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经受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之后才能实现。世界经济危机以及与之有关的国际贸易衰退严重冲击各共和国的对外贸易部门，并破坏了基于经济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所特有的社会体制秩序。有一种意见（主要与依附论观点作者有关）认为外部不利因素造成的混乱局面促进了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出口企业的不景气消除了拉丁美洲社会反对工业的偏见，同时地主和商业寡头在政治上的统治也受到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在一些情况下）初生的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

挑战。

结构主义者事先已经精心设计了一种大致相同的编年表，试图把1930年之前因出口增加而带动经济增长这个时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制造业增长情况（虽然产品品种和地区都很有限）与工业化本身加以区别。参照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对二次大战后拉美大陆经济问题的评价，结构主义者把工业化描述为一种极其深远的长期性变革，尤其提到农业生产要相对下降，迅速实现都市化，工业部门将作为自给经济发展的主体出现；并且认为只有在国家直接采取行动克服诸如基础设施不足、市场不完善、销路不畅、分配不合理和物资匮乏各种不良因素之后，拉丁美洲才能着手工业化，因为以上因素都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

268

因此无论是依附论学者还是结构主义者都倾向于不是无视便是贬低1930年以前制造业的全面发展。上述态度也无法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试图发展多种经营采取的各种早期措施给以正确的评价。由于最近进行了较为慎重的调查研究，现在已有了一本关于着重全面介绍制造业发展的编年史：提出主张把1914年，19世纪80年代或者甚至更早几十年作为工业发展的开端比1930年更合适。对粗浅的依附论教材中暗示的单一原因已有争论，对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理论上的假设也提出了疑问。关于外来不利冲击对拉丁美洲工业发展进度影响的讨论除了考虑两次大战之间不景气的状况之外，现在已扩大到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说通常被作为重大事件提出来的话，）这是原来讨论就应列入的事件，尽管只有一时的重要意义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早期关系中断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独立时期初期战争引起的冲击以及19世纪后期金融和商业危机。有关脱钩工业化的这些解释*只有当其他混乱状况出现时工业化仍能持续下去才能令人信

* 依附论学者认为，只有当外国从中心脱钩时，它们的发展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拉丁美洲国家只有摆脱它们与发达国家的联系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译者

服。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巴林危机，1873年的大恐慌以及1866年世界商业和金融市场的真正不稳定虽然都是一些暂时现象，但对个别国家经济正在进入国际体系与之结合为一体的重要阶段来说，也许比一致公认的1929年灾难性冲击更加重要。在紧接1914年以前的几年里对外贸易部门不断增长的活力或者在20年代再次出现的变化，虽然没有世界经济大萧条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对政策的重新评价使之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并非不重要。

目前须要考虑的另外一些主要问题是关税制度的调整，最初征收关税的基础，以及对制成品、中间投入和原料各种不同税率的应用。与此有关的还有拉丁美洲货币的对外价值，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市场价格的动态。这一切都与有效保护争论有关。在讨论中还特别提到信贷和货币政策。此外，十分重要的是，把殖民地后期和民族独立时期初期手艺人，制作工场和家庭手工业生产重新作为研究的项目。这些“原始的工业”活动是否能成为某种基础，从此产生现代的工厂制度呢？与殖民地制造业的成就以及持续多长时间有关的最令人关心的是积极参予工业发展进程的那些社会活动家的出身问题。究竟谁是实业家？他们与主要的上层统治集团有什么关系：实业家的出现是否已经构成对现状的威胁？实业家究竟是一个成分不同的还是同源的群体？关于工业劳动者也提出了类似问题。应在多大程度上看待1930年以前工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对近代修正主义最主要的是工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策的形成，决策人的作用以及决策机构的作用，还有工业化的定义。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定义，从60年代以来它一直首先干扰着我们对这个课题的研究。

工业变革的分期

全面概括1930年以前的工业结构情况并不容易，但可以划分

几段时期。虽然对拉丁美洲各国经济也许不能把每个时期都严格分开，各个不同时期的具体特征，以及从这段时期到另一段时期有关的变化过程，却具有普遍的（即使不是全大陆的）性质。对所有国家经济情况不可能精确地划分日期，因此各段时期的确切持续时间也往往无法确定：各国变化的大小都不一样（某个地区很小的变化在别的地方也许会范围很大）。但是可以看出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时期：（1）紧接独立以后的几十年，也就是殖民地制造业各种形式迅速重新调整的那几年，因此也可以说是试图建立现代工业的年代；（2）从大约1870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出口增加而带动经济发展的杰出年代，随之而来的便是机构的现代化，基础结构部门的发展和需求扩大，从而建立了消费品和资本货市场；（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这段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制造业的规模和工业产品的构成都发生了变化。就有些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来说，这第三个时期大约在20世纪初便开始，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在两次战争之间的萧条时期前第二个时期则尚未结束。

从1850年以前的工业记载中多少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报道均提到国内生产数量濒临危机并处于紧缩状态。这个时期的另一特征是生产方式多样化，以及还存在独立前的生产程序和生产单位。工业部门的结构多元化已成为一种持久的特征。可是19世纪初期主要的问题是，由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引起的长期动乱所造成的威胁，并对此作出的反应。对外贸易自由化对民族工业也有重要意义。

在民族独立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已存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制造业，多数是印第安人村社，它们自给自足，几乎不参加市场经济。一些大的庄园，象巴西东北部的制糖业或中部美洲的天然染料种植者，尽管也向国际市场提供初级商品，但主要供他们自己所需。供出口的热带或亚热带作物农业生产通常依靠某种强制劳动方式；满足大量黑奴或印第安人半奴仆所需要的主要食品和家

庭基本用品均来自庄园经营的简陋的作坊。有时农村小工厂把多余的商品拿到镇上去卖可以赚到点钱，一年一度的集市上通常供应印第安人农村公社为当地或国内市场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产品。虽然如此，就整个大陆来说，制造业是一种城市现象，即使有人认为有省的资本和国家资本许多种形式。在“殖民地”工业结构鼎盛时期便是作坊。作坊具有悠久的历史，至少从17世纪起在西班牙美洲的一些主要国家便出现了这种工场。作坊的生产既以城市又以工厂为基础，而且规模几乎始终很大。较大的康采恩雇用了数百名工人，他们通常都住在厂里。这些企业的特征也是使用奴隶劳动力，他们要末从农村被征募而来，要末便是从当地奴隶市场上买来的。在殖民地时期后期，有些重要地区的制作工场和血汗工厂已越来越多地推行雇佣劳动，这些劳动力主要从有色的自由民或新来的移民中招募。

实际上在所有城市中心区大规模的制作工场旁也都有较小的生产车间，即简陋的车间和许多手艺匠经营的企业。但在19世纪开始时，拉丁美洲大陆一些较发达地区，如墨西哥，大的企业均倾向于搬离城市。这种赞成重新安置工厂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是想逃避同业公会和行政当局过份苛刻的规章条例而引起的。在18世纪末期造成这种搬迁过程加剧的原因，也许是决心逃避殖民地行政官员的监督。所以说，假使后来反对制造业的被旁条例严格执行的话，西班牙殖民地在独立时除了最主要的出口加工工厂本来不会有多少企业的。在巴西同样有禁止工业的措施。但是使大工场重建的紧迫原因可能是需要就近得到原料供应或利用流速高的江河以驱动水力机械。这也许就是殖民地后期制造业发生量变和质变的原因吧！

早期民族工业规模的差异是通过各种商品对当地市场、国内市场，有时还有国外地区市场的销售品种不同反映出来的。最重要的工业产品——如果工业指的是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过程，而且使用的技术与其它工业化国家使用的技术没有多大差别的

话——便是纺织品（主要是毛纺产品），虽然棉织品在19世纪50年代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9世纪初期墨西哥面粉厂特别兴旺。19世纪40年代在巴西东北部建立了棉纺织品生产。别的地方，如拉普拉塔河流域的畜牧业经济，把皮革加工处理后制成一系列产品——皮鞋、皮裙、皮裤、马勒、马具、皮带、皮包、皮桶，以供消费者和工业的需要。那里还生产畜牧出口公司供国内使用的两轮马车。其它畜产品，如油脂和硬脂肪，提炼出来供国内市场生产肥皂和腊烛。其实，供国内消费的大量农村产品，从腌肉到面粉、面包，还有啤酒、果酒和廉价烈酒，到处都制作。还烧制供家庭使用的餐具、陶器、瓷器，玻璃制品和砖瓦。在矿产经济方面，外国旅行者常针对民族独立时期初期墨西哥金属制造业的简陋条件评论当地需求的生产状况。在19世纪中叶，智利的铜和白银生产均以当地资本为主，同时采矿业是作为向其它金属制造部门传授早期熔炼和工艺的媒介；因此，在墨西哥，铸铁厂仅试图供应地区和本国有限的需求。

然而，事实上向国内市场提供的产品大都是在采用这时工艺的传统小厂家生产的。再说，在19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因国内市场受到内乱和外国竞争的双重灾难，日益瓦解和衰弱，靠当地工业供应的一些地区越来越成为地区性市场。市场范围缩小加强了拉丁美洲工业的原始特征及其停滞的前景。但过去曾一度普遍认为独立后才能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破坏了民族工业的这种看法，无法再持续下去。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例子表明，外国制造业纷纷涌进一些沿海地区；当外国商人过高估计市场潜力的贪欲无法实现时，便在附近的城市中心大量倾销，以便获得现金，破坏当地工业。而这种情况在别的地方却不太明显。虽然争取独立斗争毁坏了工厂，使劳动力大量死亡，生产陷入混乱和中断了传统的通商路线（如近期国内战争以及随后划定国界所造成的情况），但其结果并非都是消极的。阿根廷西北部的家庭工业便是最好的例子。在独立以前该地区一向是给刚发展起来的海岸市

272 27

场，以及上秘鲁的矿区提供商品的。自由贸易使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遭受损失，同时上秘鲁和智利早期的保守派得势时关闭了开设在保守派和叛乱者双方边境地区的市场。后来，由于玻利维亚独立以及智利保护主义盛行，阿根廷工厂主实际上甚至完全被排斥在这些市场之外。然而，当阿根廷解体成为一个松散的各省联邦时，却给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制造商带来了两种宽慰，因为省政府很穷，通过它们的财政政策发挥了地方主义的潜力，依靠省与省之间的通商获得大量税收。在加强财政政策的同时，安第斯和墨西哥的工业借助于他们国家地理位置天然屏障的保护也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外国竞争的损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最后25年建成铁路之后。但是让地区性市场独自恢复元气，很难有足够的活力来支持本国工业。

如果说传统的殖民地工业长期前景并不乐观，那么就出口生产的某些特定的行业来说，它们的前景显然要好得多，甚至在1850年这段时期都是如此。向大陆和世界市场出口的畜产品加工可能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工业部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腌肉工厂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向美国市场出口腊肉和咸肉。到40年代其它供应厂家也打入美国市场。恩特雷里奥斯省的厂商们设法避开了罗萨斯政府的限制条例，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跟，从而乌拉圭的产量得以恢复。后来，到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羊毛洗涤和羊脂提炼厂已可以加入为海外市场加工的工厂行列。在民族独立时期初期很少有别的其它出口工业。殖民地时期长期以来的主要产品贵金属生产由于连绵不断的独立战争，受到严重影响，而且直到19世纪50年代甚至还要晚一些时候都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哥伦比亚的黄金开采，因为只是规模不大的冲积矿床淘金，没有遭受多少破坏，而且仍旧有利可图。但矿主榨取的“油水”简直无法同秘鲁和墨西哥矿井区的经营相比。仅以智利来说，19世纪中叶的30多年金属生产持续增长，尤其是铸铜工业，产品除供应国内，还远销英国和亚洲各国

市场。

经营出口商品加工的企业象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号一样，多种经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腌肉工场和制作腊烛的作坊，虽然依靠集约劳动较高的简单技术，而且只在头年11月到次年3月的季节里才开工，但它们象修道院神父经营的那些工场一样，都是很大的企业，雇用了数百名工人，占用大量的资本。19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典型的制盐工厂都变成大型工厂企业。这些企业都是规模很大的纵向联合综合性康采恩，统管生产和销售全部过程，包括畜牧业、肉食和副产品加工以及批发经营①。为了加速屠宰配制工作，均使用新的处理方法，充分重视对副产品的利用，并通过减少浪费普遍提高效率。这些变化，随着对蒸气瓮和大锅的使用以及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这一工业的注册成本增加了，并促进了合并。在另一端是西海岸的采铜生产者。19世纪中叶智利已经是世界上著名的最大的铜出口国，"智利铜锭"是确定铜在国际市场上参考价格的标准。但是这项工业都是采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中小型规模的公司经营，主要是民族资本②。 274

民族独立时期初期的"工业"便是上述情况。对研究这些课题的学者来说，最感兴趣的是国内消费的二等品生产。然而，即使是这个时期最初的阶段，在这种拥有大量自给自足、非盈利部门的经济中，也许只有采掘和加工等出口工业才可能从数量上对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大的贡献。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各种商品，为出口加工的各类货物，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大不相同，表明两者在同一部门内的差别，从而使工业活动难以简单地进行分类。对制造业的各种不同"定义"争相得到承认。一种是强调工厂生产

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1882年统计年鉴》（布宜诺斯艾利斯，1883）；第371页C·布朗著《1776—1860年阿根廷社会经济史》（剑桥，1979）第111—12页。

② M·J·马马拉基斯著《智利经济结构的发展：从独立到阿连德》（纽黑文，1976）第40页；A·平托著《智利：发展失败的例子》（圣地亚哥，1962）第15页。

（通常与家庭承包作业协作）便是使用机械动力，生产工艺现代化和能够创新或吸收新技术。第二种观点同样想强调经营规模和资本数额。但对这一点有很大争论，而且对由原始的企业发展为“现代的”制造厂这种变形过程也难以正确评价。根据上述后者 275 的标准，许多手工业和家庭工业生产部门便要被排除在外，尽管某些手工业厂家的产品可能是符合这一标准的。第三种定义是指生产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是制成品的差别；另一方面是原材料加工制作的差别。这种定义将把绝大多数出口加工工业排除在外。

在拉丁美洲工业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时期各种定义没有多大问题。虽然许多地区仍然有手工业生产（它使得工业部门的不完整性显得突出）但由于19世纪70年代后拉美大陆逐步和更全面地介入世界经济，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的结合，基础结构出现了现代化。尤其是阿根廷、智利、乌拉圭位于南端的国家以及巴西部分地区建设港口、修筑铁路等等，使国内厂商面临外国竞争的严峻形势。进口数量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增长事实上已彻底清除了殖民地式工业生产所留下的残骸。到处出现的一段段以地区格局为主的铁路建设，如果不说全部破坏，那么也是损害了手工业和其它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进程。类似的因素也使某些出口加工行业发生了全面的变化。没有哪个地方的变化比19世纪80年代后智利采铜业的变化更彻底了。当地资本证明已经无法（或不愿意）把主要以简单方法开采高品位矿石的原始生产方式改变为采用资本密集型复杂技术和大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而这是从贫矿石中提取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结果是公司规模和工业非本国化迅速发展——也是西海岸早期开采硝石时反映出来的发展趋势，而且是安第斯山脉和墨西哥最初在有色金属生产，后来在石油生产中类似趋势的前兆。

在其它出口生产部门也可看到相应的趋势。因为世界对糖的需求不断增加，随着制糖方法不断革新，蔗糖生产不得不变成一种更加复杂和综合性的生产过程；部分原因也是对欧洲市场上保

护国内甜菜生产造成威胁所作出的反应。在加勒比，生产规模和生产组织的变化与受美国公司资本所控制的企业有关。在墨西哥，尤其是秘鲁，由于注意和支持制糖业在技术上创新，并组织甘蔗种植，本国资本仍占主要地位[3]。新技术和越来越认清国外市场还促使普拉塔河地区以畜牧为主的加工工业实行非本国化[4]。阿根廷和乌拉圭，从低级的牛肉脯或咸牛肉生产变为现代化的肉食加工工业，都是由于早期外国资本的渗透以及后来外资占统治地位造成的，尽管巴西只有较小的变化。阿根廷的肉食冷冻厂于19世纪80年代由出生在当地的英裔资本建立，然而传统的腌肉作坊在19世纪末以前仍控制着加工肉食的出口，那时冻羊肉的出口价格超过牛肉干的价格。但是当1907年美国的肉罐头厂老板来到后（那时冻牛肉已占肉食出口总值的1/2），标志了英国资本控制地位的结束，以及本国大量资金的出现。英国参予这一行业，只是托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间英国市场对冻牛肉的出口十分重视。

因而，世界对拉丁美洲出口需求的增长，再加上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对各种出口工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复杂的采掘方法或生产工艺改变了生产规模和生产性质，结果经济是使本国失去了控制。那时出现的工厂类型也同样值得注意。1914年智利在埃尔特尼恩和丘基卡马塔兴建两座铜矿，它们各自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矿和矿井。座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穆尔和斯威夫特肉罐头加工厂在20年代可以与芝加哥同类公司的经营相媲美。总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拉丁美洲的资本密集型出口

③ 见B·艾伯特和A·格里弗合编《1860—1914年国际糖业经济的危机和变化》（伦敦，1985）第1卷165—166，200—201页。

④ S·G汉森著《阿根廷的肉食和英国的市场：阿根廷肉食工业历史篇章》第53—54页、143—185页（帕洛阿尔托，1938）；J·富克斯著《美国托拉斯对阿根廷的渗透》（布宜诺斯艾利斯，1958）第193—197页。

加工工厂在规模和结构上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同类采掘企业和加工企业相比。

可是，除了出口部门之外，便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工厂了。在20世纪初期一些资本密集型工厂均为国内市场生产。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有些国家很快便接受了需要大量资本的酿造业技术改革。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基尔梅斯酿酒厂和洛马斯德萨莫拉酿酒厂在当时世界上生产淡啤酒的最大厂家中负有盛名，而那时圣保罗的安塔尔蒂加酿酒厂作为巴西的最大合作企业之一也已经开设⑤。英国出资开设的里约热内卢面粉厂和格拉纳里斯公司等现代化的面粉厂同样也是高级和赚钱的工厂⑥。对1914年前已出现了集中的城市大市场的国家来说，其它经济也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这个时期重要城市已拥有大量自动化工厂，生产各种各样的食品和饮料。设在阿根廷和巴西的阿尔帕盖特分公司为了满足其它基本消费者的需求，采用大规模生产工艺制造了廉价的绳鞋和便鞋等低档商品供应市场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墨西哥和巴西的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许多纺织厂都雇用了大量工人来操作新式纺织机械设备。这些工厂同它们出口对口部门一样，实际规模都很大，控制了工厂所在地区，并使用了当时已有的一些最新式的生产工序。然而，这些公司都并是不是典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的劳动密集型车间只雇用少数工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1882年出版的年鉴指出，工业企业雇用的工人平均人数是6名，从省的个别酒厂雇用1人到腌肉工场平均雇用145

⑤ 南美比克尔特斯酒工厂：《一百周年纪念1860—1960》（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时代报》，1918年8月31日；J·帕迪利亚著《关于啤酒工厂的统计资料》（布宜诺斯艾利斯，1917）。

⑥ R·格雷厄姆著《1850—1914年，英国和巴西现代化的开始》（剑桥，1968）第146—149页，《1886—1920年，在巴西的英国工业：里奥面粉厂》载《工商历史》7/1（1966）第13—38页。

⑦ R·格雷厄姆著《1850—1914年，英国和巴西现代化的开始》第144—145页。

人不等。1914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小工厂而不是大工厂，仍旧是绝大多数工业分支机构的主要特征[8]。可能到了20世纪，智利的工业公司除了采矿部门，如果雇用5名工人以上，均被登记为“大”公司——这说明是以血汗工厂开设的沿革而不是以现代工厂的出现为衡量标准。1914年雇用5名以下工人的企业仍占智利本国制造业的一半以上[9]。在太平洋战争以后建立的秘鲁工业，主要是粮食、制革、烟草和家具工厂，仍以小型为主，只有棉纺织厂例外。秘鲁的纺织厂象墨西哥和巴西的纺织厂一样，都相当大，1906年提供的产量约占全国消费的50%[10]。

278

这一特征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拉丁美洲工业发展战略上的弱点。有些企业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造工艺，结果并没有很快改变（或许甚至还延缓了）整个工业的面貌。旧的生产程序和企业与新的同时并存；工业仍然支离破碎，不同技术的使用和组织结构的多元性阻碍了工业水平的一体化，而且也无法实行让母公司把子公司全部股本收回使之脱离的做法，以及在部门间进行转让。制造业国际贸易的区划化和工业内部各个公司的分隔状态先天性地阻止了工业深化的后向和前向带动作用，从而没有出现专门供应中间产品的经纪商，以适应制成品生产的日益增长。与日本不同，拉丁美洲的经济几乎没有可能在大规模资本的集约工厂和小作坊（或家庭手工业）之间建立共生的联系。

拉丁美洲工业的两重性传统上强调的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之间这一段较短的时期。出口部门主要都是从事矿产品以及某些

---

[8]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统计年鉴》第371页；阿根廷共和国《1914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第7卷，第26—34页。

[9] J·G·帕尔马著《外部不平衡和内部工业化：智利1914—1935年》，载C·埃布尔和C·M·刘易斯合编《拉丁美洲，经济帝国主义和国家：从独立至今外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伦敦，1985）。

[10] R·索普和G·伯特伦合著《秘鲁1890—1977年，开放经济中的发展和政策》（伦敦，1978）第120页。

农产品加工企业单位，技术高，规模大。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由原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小作坊经营，它们主要向市场上供应低档的粮食、饮料、衣着用品和鞋类。对这种对比悬殊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看法供商榷：第一，正如曾经说过的，认为有几类从事国内非耐用品生产的行业是以资本密集型工厂为基础的；第二，当地制造商提供的商品品种要比以前判断的多得多。工业石油、采矿机械和纸张生产是1914年时智利工业已经形成的特征[11]。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已经利用进口的铁锭制造供家用和工业用的多种金属产品。1895至1914年间，阿根廷冶金工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从6,000名增加到1.46万名，有些人还在巴塞纳铸造厂那样的大工厂工作[12]。在巴西也同样如此，在19世纪90年代早已建立了金属制造业，许多公司在该世纪第三个25年间即开始创办。到处都有本国的化学产品（药品和工业原料）。第三，有些国家的经济已拥有其它重工业部门，主要是公用事业大公司（特别是铁路）有自己的制作车间和修配厂。到20世纪初期，拉丁美洲所有主要铁路均拥有规模宏大的维修站，有些站已开始制造铁路车辆，甚至火车头[13]。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部门都是为供应国内市场需要而开设的重要工业联合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规模有时只有军火工厂和国家办的兵工厂和船坞的规模能与之相比。

279

什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这一阶段的最终状态呢？正如上面指出的，不可能用一个总的框框来套整个

---

⑪ H·W·基尔施著《传统社会的工业发展：智利企业家和现代化的冲突》（盖恩斯维尔，1977）第25—45页；O·穆尼奥斯著《1914—1965年智利工业的发展》（圣地亚哥，1968）第53，55—56页。

⑫ R·科尔特斯·孔特和E·加略合著《现代阿根廷的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第77—78页；V·巴斯克斯·普雷塞多著《阿根廷专题研究：工厂迁移，对外贸易及发展，1875—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第223—234页；《时代报》，1918年9月10日；《理性报年鉴》第4卷（1920）158页。

⑬ C·M·刘易斯著《1870—1929年，铁路与工业化，阿根廷和巴西》，载埃布尔和刘易斯合编《拉丁美洲》；基尔施著《工业发展》第12，32—33页。

大陆。在有些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会发生从工业增长到工业化的转变。在别的地方，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即使制造业产量增长很不稳定，也出现了在次要经济部门——主要就生产组织而言——质量变化持续发展的过程。而且有些国家的经济在1910—1929年期间，工业变化的速度放慢了。有人往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加速了巴西向工业化的转变，这一转变促进了资源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有利于制造业体制的巩固。还有人十分自信地认为，智利于1914到1936年间实现了工业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个时期工业已起到了主导部门的作用。但是这一过程究竟是硝石时代以来必然的进步呢，还是有别于本世纪最初十年期间对制造业不断下降的情况，都有不同的意见。阿根廷的经验通常被当为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工业持续发展的一个代表，即使有周期性和次要部门发展的特点。可是，有人反对这种分期法，特别是对1914—33年这段期间，认为这是一段错过机会的时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时代⑭。另一方面，秘鲁的制造业部门处于长期衰退状态。随着1891至1908年繁荣的工业活动年代之后，以后的20年又回到了衰退时期。国内需求呆滞，外汇平准的消极后果，以及对国内制造业保护的削弱，工业活动出现了衰退现象，于是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取代了国内生产的商品⑮。

280

在阿根廷，农业和家畜产量同制成品产量的比例，从1900年的2.1比1改变为1929年的1.3比1。证明当时农业生产指数已从29上升到117，而制造业生产指数最快增长速度是从9到46（1950年

⑭ G·迪·泰勒和M·齐梅尔曼合著《阿根廷经济发展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

⑮ 索普和伯特伦合著《秘鲁1890—1977年，开放经济中的发展和政策》（伦敦，1978）第112页、第118—131页。

为100）⑯。上述趋势表明，经济在进行重大调整，尽管底数很小很小，制造业在原有基础上已扩大或在工业部门中继续偏向于发展食品加工业。但是，这种偏向不应夸大。因为虽然食品和饮料产量增长2.5倍，衣着增长2.6倍，化学产品增长5.1倍，而金属机械和车辆产量的增长倍数则为24.6。20世纪20年代末，墨西哥的工业活动也很值得注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墨西哥已从革命影响中恢复过来，但也反映了是在波菲里奥的成就基础上取得进展的。制造业产量在1901—1910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3.1%，而1911—1921年每年下降0.9%，尔后又于1922至1935年间，每年平均以3.8%的速度发展⑰。墨西哥和巴西制造业在质量上的变化表现在增加对电力的使用方面（改变了早期发电方式，诸如过去利用的蒸气发电，但这只是部分原因），特别是廉价的水力发电；也表现在公司的规模扩大方面。就巴西来说，对这个时候制造业是否开始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对1914到1929年间工业产量显著发展这一点，即使持犹豫态度的人也不敢表示怀疑。这个时期最后几年，最重要的特征多半是在运输设备、化学和电器用品部门有以下两方面互相联系的变化。首先，在电力供应量增加和国内需求扩大的影响下，生产能力迅速增加；其次，这些次一级部门受到跨国公司资本的渗透。1914至1929年是智利工业持续发展时期，即使它变化无常；关于这个时期的智利工业可以看到有四种主要趋向。生产规模上发生了有利于大企业的变化；本地制造商增加了将近50%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日用消费品如食品、纺织品在国内制造业总产量中相对下降；而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如纸张、化学制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的比重增加；制造业增加了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

---

⑯ C·F·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历史论文》（纽黑文1970）第418、420、433—434、449页。

⑰ L.索利斯著《墨西哥经济》（墨西哥城，1970）表3.1。

比例（部分原因是硝石生产发生危机）[18]。此外，20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工业产量和投资显然稳步增加，这可能是近代的第一次。

经济部门内部的多种经营——扩大耐用消费品生产（主要是家庭用品制造业和汽车装配），扩大包括化学制品在内的中间产品和某些资本货——是普遍的发展过程；它于1900和1929年间发生在绝大多数较大的经济部门和比较发达的一些二等国家，如智利和乌拉圭。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工厂生产最终取代了手工业生产。1930年后工业的巩固证明经济危机前制造业是有一定基础的。显然，20世纪初期工业变革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制造业产量与已投产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必须与对外贸易部门的连续优势保持平衡。即使工业可以成为活跃部门——可能是最活跃部门，农业和采矿业仍然是经济的活动中心。针对那种过分乐观地估计阿根廷、巴西、尤其是智利已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说法，应该作出更加谨慎的解释，即着重指出由于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增长而引起的工业断续发展（尽管有各种不同形式）到20世纪20年代所达到的程度是有其局限性的。拉丁美洲各国经济通过大量使用自然资源来实现不断增长的出口流量，可能早已耗尽它们的生产能力。1914年后北大西洋金融和商品市场的不稳定，标志了不断同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融合时，从中获得的利益可能会更加有限。基于农产品加工，矿物提炼和基本消费品生产的工业发展的顺利阶段正在大国的经济中接近尾声。深化工业基础，当然还有制造业产量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组织社会秩序，才可以使政策制定完全符合工业部门的需要。秘鲁工业增长停滞的情况对其它国家是一次警告，尽管它是由于许多特殊情况共同造成的。哥伦比亚是工业增长有限的另一种例子：到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雇用的工人仅占就业劳动力的3%，绝大多数工人都在小

282

---

⑱ 帕尔马著《外部不平衡》。

工厂工作，同手工业生产方式没有多大差别[19]。就这一点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大战揭示了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的战略弱点，同时又突出了过份依靠对外经济部门的危险性。关于国内制造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已投产的生产能力得到更有效地使用，而1919年以后的重新整顿又加强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中大公司的地位。

出口导向工业化和外界的冲击

283

在因出口增加而带动经济增长的循环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工业增长十分重要的条件。对外贸易部门的扩大使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间的货币经济得到巩固，同时也有助于政治制度（有时是半代议制）的稳定。早在19世纪结束以前，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已成功地解决了曾经在独立革命时期诱发的与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等不稳定的离心势力有关的一些问题。与世界经济有效的结合，其基础是国际商品交换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后者，就拉美大陆而言，则是合理使用在集中供应某些商品方面拥有最大比较利益的拉美国家的自然资源。这种与世界经济有效的结合，除了别的影响以外，终于导致了运输和通讯现代化，对某些国家来说，还带来秩序和发展。铁路建设和电报线路的铺设（实际上是军队的专业）使政治上出现了稳定，同时创造了有利于经济普遍发展的环境，从而提供了使国内消费品制造业得以发展的特殊的社会、法律和体制上的条件。随着初级出口产品的生产，国内利润有所增加；外国资本的流入则与因人口增长和外来移民大量入境引起的消费需求上升和工资经济巩固有关。

这种工业发展模式强调由对外贸易部门向国内制造业扩散资金和技术。20世纪初以前，当北美和欧洲的制造商开始派遣他们

---

⑲ W·P·麦格里浦著《1845—1930年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第213页。

的代理商到本大陆时，拉丁美洲的贸易主要控制在代表许多家公司和经营各种各样产品的商行手里。他们充当代销商，把生产者同（出口商品的）顾主，以及制造商同（工业进口商品的）顾主连接起来。这些商行经营各种质量不一的商品，往往通过浮动的外汇市场成交；也办理最简单的银行业务和开办铁路工程项目。每当汇率或关税制度，特别是针对那些单位利润不高但因原料价格低廉或可获得国家补贴而在国内生产也许有利的大宗基本必需品，作出有利于国内制造业而不利于进口的变动或边际调整时，贸易商行只要能了解到出口部门利润高低和熟悉市场情况，是最有条件作出反应的。此外，贸易商行是加速走向工业资本主义和可能是金融资本主义转变时期出现的商业资本现象，受到北大西洋各国经济正在继续进行的工业转变过程的排挤。新的制造业生产过程和高级工业产品，在日益竞争的环境中须有服务周到的销售或售后服务，而这一切进出口商行都无法提供。进出口商行还受到其它方面的压力，主要是利润率不断下降，因此促使海外的工业企业在所有生产方面实行内向化和商品化，同时寻求拉丁美洲市场的直接代表，或者在生产和资金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趋向在较活跃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尤为明显。出现在德国的那种工业兼办银行的一贯做法，对象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一些传统的商行来说尤其危险，因为在拉丁美洲许多共和国里早已开设了各种外国银行。贸易商行可以做到的唯一选择，便是改为制造业。例如格雷厄姆·罗弗、邓肯·福克斯和鲍尔弗·威廉森等一些西海岸商行，便欣然采用了这种办法，它们分别改变为炼糖厂、棉纺织厂和谷类加工厂。 284

移民构成了下述工业企业家另一股力量。在移民时期，小资本家进行一系列投资，虽然大多数企业在性质上也许与从事手工劳动的血汗工厂没有多大区别。有些人有时可以形成一帮家族，如圣保罗的马塔拉佐家族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迪特利亚家族，或者成为一个工业企业集团。这些大企业以及仿效它们的一些小企

业，不仅发了财，而且还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进入了寡头政治的行列。社会升迁的例子表明，在有些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权贵们也许并不完全符合人们有时所描述的那样。智利和哥伦比亚的精英们尤其显得他们能够汲取富有抱负的移民的才能。

就巴西来说，沃伦·迪安便一直认为，最初集中在出口部门的本国资本是主要用于发展制造业的。[29] 独立经营和与外国人合伙的庄园都被卷入多种业务活动，有制造业的，也有其它方面的，并不总是与咖啡有关的业务。正是因为经营咖啡可以增加收益，使发展制造业的要求有了保障，所以民族精英们就用经营咖啡的利润来投资开设工业企业。这种假说令人信服，因此争论的焦点便从直接讨论工业转向其它问题。发展货币经济时开发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总需求的性质和商品结构的变化对制造品消费十分重要。日益上升的实际工资使得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增长，由此对制造业提出了更多不同的需求，不仅要有基本商品，而且还要有耐用消费品。在巴西，政府的政策对工业的需求也许比迄今所谈到的更要关心得多。因而，出现了巴西工业化的历史时期。所以说，制造业与农业对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实业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与咖啡经济部门有共同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除了决定经济活动总的水平，经营咖啡挣的钱还可以创造外汇来购买所需要的进口工业设备和原料。圣保罗的种植园主都是些理智的资本家，他们使利益多样化并调配资金，以便扩大利润，同时他们还表现出更喜欢股份有限公司和体制性的投资方式。咖啡部门的不稳定有时也出现对地主采取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同时促使地主放弃咖啡转向种植园内销路稳定的产品和经营制造业。

285

以圣保罗经验为主的方法能否对巴西其它部分，其它咖啡生

---

[29] 沃伦·迪安著《1880—1945年圣保罗的工业化》（奥斯汀，1969）。

* discretionary income，指个人收入中扣除衣食住行及税款等必需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译者

产区或甚至初级出口产品经济得出一般的结论呢？墨西哥的例子说明，出口诱发的工业增长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同别的地方一样，墨西哥也经历了基础结构的现代化，尽管晚了些，而且同，譬如说，南部锥状地带相比，其铁路建设数量较少但在地区分布上，却更集中，大部分铁路网设在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北部矿区除外）。墨西哥不仅从事大量多种出口经营，而且还拥有庞大的采矿业，从该部门就可以把技术转让给适应国内需要的金属制造业。正如上面提到的，墨西哥在独立时便拥有拉丁美洲最大，最发达和品种多样的制造业基地，所以，在1911年显然已可能建立了制造业，这并不奇怪。它的金属制造业也许比南美洲任何国家都更发达，而纺织工业也仅次于巴西。但工业发展的起步是在革命前夕踌躇不决地开始的。

制造业在革命前的危机征兆是多方面的。紧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随着世界经济日益不稳定，发生了周期性总危机。墨西哥由于受到银矿业特殊问题的困扰，试图与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妥协。在制造业内部，由于工厂倒闭，使危机更加激化；而且因为采取罢工、闭厂停产方式，更多地以镇压手段来对付日益加强的工人斗争，劳资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加深。对国内制造业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口增长难以促使国内市场迅速扩大。在国内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因货币贬值而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扩大有效保护征税范围，都无济于事。在19世纪末和1911年间，墨西哥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虽然各地区差别很大。这种可悲的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是就出口部门较活跃的资本密集型企业情况来说的，尤其是由于迪亚斯时期的模式的性质正是方便外国资本渗透和财富分配非常悬殊。结果是资源不断从墨西哥外流，而且严格限制了国内收入的附带利益。与这些问题有联系的是，最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这就减少了货币经济中的可支配收入*）；由于

286

* disposable income，指个人收入中扣除税款后的剩余部分。——译者

肥沃的土地都改种了出口产品，结果是主要食品供应减少。工资也由于人口增长而受到压缩；庞大的仅能糊口的阶层——劳动后备军——又进一步使城市工人的工资率降低。在上述情况下，曾经有过某些积极特征的墨西哥制造业（即首先采取股份有限责任制、接受使用新技术和实行重要产品多样化）在20世纪初期多半也停顿下来了。1907年工业总产量和各经济部门的增长率曾达到顶峰，随后便逐渐下降。于是便要求革命来影响制造业提高生产率，并发动又一轮新的资本积累和投资。

然而，如果说墨西哥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主要弱点是没有在拥有大量土著居民的经济中通过广泛就业，或不断增加实际收入来引起对工资商品的需求扩大的话，那末在其它经济大国中并没有反映如此情况。在巴西和拉普拉塔河周围的一些共和国里，市场扩大要末是农村货币经济的发展，要末就是因为工资实际增长，但并不是出现了较为公平的收益分配格局。在1914年前，出口和公用事业部门的职业刺激了智利国内需求的增长。欧洲移民来到这些共和国，以及人们跨越国界和省界的流动，都是对工资水平差异的反应，至少认为，某些地区比其它地区的条件要好。在19世纪90年代至1914年期间的阿根廷，就可以看出，总需求不仅扩大了，在质量上也起了变化。[21]对增加的制造品消费数量按项目分类说明，进口商品多样化方面反映出国内供应正出现上升趋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段时间，阿根廷进口商品结构的各种变化证明，工业品种多样化的程度很广。不仅基本消费品进口确实表明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相对稳定下降，而且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也从运输设备转向工业机械，以及燃料和工业原料。其它共和国的情况不太明显，不过类似的倾向到处都相继出现，

㉑ 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第40—44页；巴斯克斯·普雷塞多著《阿根廷专题研究》第135—137页；R·科尔特斯·孔特《1880—1914年阿根廷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年版）第211—240页。

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则变得更加明显。

在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这一时期内，根据制造业活动增加的情况突出说明，主张自1929年从零开始而1939年已惊人地发展到国内市场在不同情况下在高级消费方面占有优势地位的那种分析是难以置信的。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内制造业产量迅速增长，那是由于过去已投产的但利用不足的生产能力全日开工了。根据前工业经济必须进口制造业设备这一点来推断，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因此，外来不利冲击理论中的脱钩观点，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抨击。对这种看法最明显的指责是没有恰当区分战争和经济不景气的后果，而事实上也就是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实际影响没有恰当地区别。世界性冲突往往造成行情看涨，因此拉丁美洲出口商品提高了价格。因为交战国家的经济重新调整生产以适应战事的需求，在供应方面有了问题使进口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出口价格疲软，同时国际贸易中双边关系原则的趋势使市场交易机会更加狭小。对不加区别地谈论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也应该有所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的商业孤立状态不太明显，从日本和美国的进口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欧洲列强供应不足而造成的空隙。这一理论的创导者也曾被批评为过分夸大了对外贸易部门的规模，以及在海外商业关系关键问题上抓不住特点。最近受到批评的主要论题是，没有认清冲击和危机期间来自中心经济的压力，认为这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外部联系。这个过程的实际例子便是协约国在战时实行的垄断购买力，或强加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双边贸易和结算协定，如1933年英国和阿根廷签订的罗卡—伦西曼条约。上述许多问题都不是本章该谈的范围，只是表明这些看法对解释的重要性。

288

危机、战争和制造业

奇怪的是，对不利冲击学派最初关于拉丁美洲工业化的粗浅意见进行攻击，却使讨论重新活跃起来，结果使分析的主要话题退回到了19世纪。如果说最初的意见认为世界大萧条是一举促成工业大发展的突破点再也站不住脚的话，那末对外贸易部门最早的不稳定时期也许对制造业产生了比较积极的好处。19世纪贸易和金融的大恐慌，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次重大的关系中断，与其说是1929年式“脱钩”的先兆，也许倒不如说是引起企业家主动精神或重新制定政策的直接刺激因素。

到目前为止，外部不稳定因素诱发的周期性危机都是指经济关键部门的非本国化。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经历了本国企业大量转让给外国人。在秘鲁和阿根廷就有大量清理的本国公用事业公司被出售给外国财团。由于国外注册的公司买下本国资本家的全部产权；在19世纪末期拉丁美洲各国制造业部门的本国企业不断 289 消失。外国公司依靠它大规模经营的有利条件和通过不断压低国际运费，肆无忌惮地向拉丁美洲市场进行渗透，从而阻碍了拉丁美洲真正本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现在流行为一些不同说法。说在19世纪80年代起，外国企业界肯定把阿根廷和西海岸各共和国财政上陷于困境的本国资本诸如谷类加工业、酿造业、制糖业和棉纺织业的产权买了下来。但这些外国企业往往早已在各国经济中建立，从事商品出口和向早期的工业部门提供资金。这些集团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现在应该看成是带头向制造业扩散了有生气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现在同样也应该承认它积极的一面。以前认为，欧洲发生的战争基本上使来自劳动密集型血汗工厂的制造业产量得到暂时的增长，在1918年当同国外的正常商业关系重新建立之后，就无法与外国的供应厂商竞争了。力量薄弱，投资不足的公司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它们

无法向直接得到政府机构帮助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出口部门集团进行挑战。这些集团对任何保护主义的建议都表示反对，认为可能引起海外市场的不利影响。受雇于与出口业务有关部门的有组织的城市工人们的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工人们由于身受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的痛苦，充分理解增加税收会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带来什么影响。较少绝对化的一些解释，驳斥了对工业化冲击论的这种粗浅的反驳，反而强调战争为制造业创造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并揭示了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结构上的缺陷，这样便促进了新的政治经济的发展。

有三个方面尤其可以说明对外贸易部门的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同时也表明，在研究这个课题时仍须谨慎一些。墨西哥提供了19世纪初期对外贸易业务受到战争冲击的最典型例子。阿根廷的情况同样十分重要，它表明世界经济内部在结合的开始阶段不利的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智利，还有巴西，已越来越多地被最近的教科书用来作为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它的工业产生活力的专题研究。

墨西哥已被选为受到特别注意的国家[22]。墨西哥在殖民地后期，拥有西班牙美洲，也可能是整个美洲最精密的制造业部门。这个国家在18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期间，经历了几次很长的与外界脱钩的时期。正如当前人们所说的，墨西哥的制造业和手工业生产是在欧洲发生战争，而殖民地（或共和国）处于和平时期兴旺起来的。也就是说，来自“中心”的大西洋彼岸的贸易中断（例如1825年伦敦发生的经济恐慌）促进了工业活动的发展。当欧洲的战争使它同西班牙的交通中断，海上私掠船队又对 290

㉒ C·卡多索编《19世纪的墨西哥，1821—1910》，（墨西哥，1980）；R·波塔什著《墨西哥信贷银行：工业的发展，1821—1846》（墨西哥1959）；P·C·汤普森著《墨西哥的保护主义和工业化，1821—1854普埃布拉专题研究》载埃布尔和刘易斯合著《拉丁美洲》一书。

有利可图的走私交易形成威胁时，墨西哥见不到进口商品，而出口商品（主要是银锭）越积越多。白银的积压增加了货币和资本的储备，加之进口商品减少，造成通货膨胀，从而诱发企业家们不断希望从国内生产和交易中谋取较高的利润。流通货币库存增加扩大了货币经济领域，同时也使墨西哥日益发展的人口提高了工资和薪金。活跃的市场和对国内制造品需求增加，引起无法把积累资金用于海外贸易的商人们的注意。这种积极景象准确地反映了18世纪70年代末期，90年代中期和19世纪初期与末期的状况，无疑刺激了各种商品的生产。在这些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大规模发展。因此，在与中立国进行贸易之前，墨西哥工业便全面开工，向西班牙在加勒比和中美洲派兵驻防的城镇提供粗布、面粉和糖，有时还有咸猪肉。19世纪20年代虽然工业各部门主要限于面向国内市场，但生产始终欣欣向荣。在同大西洋彼岸贸易稳定期间，出现相反格局。因为不向国内制造业投资并把资金用于进口，银锭和银币纷纷外流。商人们便由经营生产转向经营贸易，而在与外界脱钩期间曾经充满活跃气氛和兴旺发达的墨西哥工业，从此就沉寂冷落下来。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才意识到要控制对外关系，以便更好地为国内需要服务。实行了对部分商品征收进口税、对工业官方资助和发行贱金属（锡、铅）货币等办法。贱金属货币虽然缺少内在的价值，但它既可以增强货币基础，也可以保持国内货币供应量防止货币外流。可是，如此一成不变地与外界脱钩，即使一贯实行并长期持续下去，是否就会促使自给自足的工业得到发展，仍值得怀疑。

墨西哥在这些年里的经历，使人们得到不少教训。虽然政策的连续性也许十分重要，但与其说是这样，倒不如结构主义者的意见：1865年战争以前巴拉圭的情况充分证明，如果不是同时实行经济基础结构的广泛调整，光靠政府的法令是难以使工业持久维持下去的。墨西哥在这段时期没有实行工业化，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制造业传统（显然不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因为政治上

不稳定和进口商品日益泛滥造成不良影响（虽然这些因素也许十分重要）。同外界脱钩并未使自给自足的工业得以发展，是因为交通不便；这一点在后殖民地时期使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更加根深蒂固，因此工业的发展只局限于省的范围以内；而且，最为重要的是，19世纪40年代以前企业的重商主义特征。在19世纪30年代前受到外来冲击期间，商人们向纺织制造业投资时，他们主要把钱用在业务经营而不是以工厂为基础的生产上。他们经营原料、纱线和衣服，通过把亏损转嫁给家庭纺纱工人、手工织布工人或零售商来分担他们的风险。重商主义的做法其经营特征是，对固定的工厂设备进行有限的投资，保证资金周转流畅，以及从原料供应到最终产品的业务活动环节中设法获得商业利益的支配权。

对外经济关系突然中断的其它一些例子进一步证明，仅靠外来冲击本身无法促进工业发展。在1840—80年毛纺生产周期，阿根廷对工业的认识要比墨西哥在19世纪最初的25年间目光短浅得多。当看到因世界对羊毛的需求减少和羊毛价格下跌而引起灾难，以及社会动乱时，舆论界对阿根廷依靠出口未很好加工的羊毛和进口毛纺织品制度中的一些缺点，议论纷纷。无论在1866年经济大恐慌时期，还是在1873年经济萧条时期，阿根廷制订的计划都鼓励本国企业大力参加把羊毛织成衣服的加工程序㉓；然而很少有各种切合实际的计划以促使制造业更广泛地发展。本国市场当时都很小。1869年阿根廷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总人口还不到20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营畜牧业的一些行业，在19世纪60—70年代危机时是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的核心，他们认为阿根廷国内市场只能吸收一小部分全年剪下的羊毛。他们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是暂时的，是危机时刻作出的直接反应。当外国需求恢复

292

㉓ J·C·恰拉蒙特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阿根廷经济，1860—18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

时，它们就不再坚持保护。到巴林危机对这套制度予以另一次更大的冲击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牧场主甚至更坚定地倒向国际主义，而且把多种经营变为生产更多品种的农产品，因而当某一种生产活动收缩时可以从扩大另一种生产活动来得到补偿。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保护主义者门庭下的另一群人更渴望对关税制度进行重大和长久的变革，可是没有得到地主们在政治上的支持。

阿根廷实业家们在19世纪第3个25年和以后的时间内始终一贯地鼓吹保护主义的好处。工业协会把它的成员说成是外来冲击的真正产物，受到占优势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威胁㉔。虽然工业和支持制造业的计划项目在19世纪70年代是风行一时的时髦东西，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并不多。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经济部门的调查中，腌制工场仍然占优势，虽然由于以畜牧为主的经济活动已从肉干和皮革生产转向羊毛和后来的上等家畜。谷类加工业是第二类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然后便是一大群与畜牧业经济直接有关的皮革、奶酪、肥皂和蜡烛等次要生产行业。这些经济活动主要由大型或中型的企业进行，同时还有大量其它行业，例如家用金属器皿、陶瓷、造纸、家具木工等㉕。虽然不是全部，多半也是由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的小血汗工厂经营的。只要从上述有些工厂雇用劳动力人数有限来看也许可以说当时早已使用新技术，

293 但大部分工厂没有机械装备，而且缺少资金。它们迎合市场上的最低层次，不会受到出口贸易繁荣或外来冲击的影响。它们对外部经济危机和进口贸易下降的反应可能是提高价格，而不是增加产量。只有那些增加资本的企业才能在1876年的关税修订中得到好处，并进口机器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不过由于出口部门收入下

㉔ 同上，第205页；J·C·尼古劳著《阿根廷工业和海关，1835—5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

㉕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统计年鉴》第371页。

降，国内需求总是踌躇不前。

虽然阿根廷国内市场始终不大，而且分散，但外来的冲击不会影响它的工业长期方向。对阿根廷社会一些主要经济部门来说，关于保护主义的争论本来是民族主义者临时作出的一种姿态，是外贸部门重新繁荣的时候抛出来的。畜牧业界早在羊毛盛衰周期初期就知道，当外国市场由于歧视阿根廷的半成品出口而可能调整税率时，或当外国主顾不承认阿根廷对原料商品加工或清洗能力而拒绝付给半成品货物补贴金时，即使从初期加工生产活动投资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当时拉丁美洲出口商品实际上大都是原材料或半成品，其余便是秘鲁的粗铜、玻利维亚的锡锗和砂糖。在技术迅速变化时期，拉丁美洲从加工和提炼的额外投资中多半没有获得多少利润，反而承担了商品过时的很大风险。

不过，在任何地方，外来冲击都可能导致工业化的突然兴起。智利对1873年经济危机的反映，无疑刺激了制造业的长期发展。当对外贸易徘徊不定因而影响政府收入时，如不愿缩减公营部门的规模，必然就要求助于扩大货币发行量的政策和增加关税，以赢得对国家财政的补偿。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智利工业化的论证十分重要。但国内制造业并不是因为战争本身的结果才发展起来的，而是因为战争导致外贸部门的深刻变化，才出现制造业的增长。在1914到1918年间，智利工业与拉丁美洲其它国家的情况大多一样，出口商品价格由于战事需求而急剧上涨。

天然硝酸盐是制造炸药的主要成分。失去了中欧国家的市场，损失很大，从协约国军火工业增长的需求量加上英美两国农民用于提高产量而增加的需求量都弥补不了这项损失。然而这场战争还促进了合成硝酸盐工业的发展。1914年以前，合成硝酸盐生产技术已经解决，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对它的投资由于大幅度减少了生产成本，要比智利工业的投资低得多。智利政府机构对效率不高的生产工艺漠不关心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天然硝酸盐工业惨遭厄运，多次恢复生产的机会都由于国外消费中心拥有

294

大量的硝酸盐库存，由于公司方面的十足无能，以及外国人开设的硝酸盐营业机构和智利政府之间严峻的关系而被搁下来了。智利政府对外贸部门不利的处境作出了反应，依靠既定的国家干预的传统做法，采取各种为国内市场设法刺激生产的措施，以便从1914年前已经形成的工业生产规模中得到好处。修订了主要为保护国内制造业的关税，并且通过货币贬值有效地加强了保护的范围；扩大了信贷机构，并在资本市场中呈现出以政府为主的形象；并几次努力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坚持以国内制造品来代替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结果，国内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比战争期间兴旺的出口贸易部门的增长速度快三倍，1919至1929年，与出口产品有关的工业产量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外资企业部门则不景气。1930年前制造业早已成为智利经济最有生气的部门，主要是由于政策对外部失衡作出反应的结果（根据历史先例），而不是由于不利的危机本身所起的作用。

智利的经验显然是特殊情况。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欧洲战争爆发最明显的直接影响便是打乱了对外贸易部门的正常秩序：海运不足引起出口和进口商品流量混乱。然而，到1915—16年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出口贸易已经恢复，而且生产不断上升，特别是战略原料和必要的食品，远远超过1914年的水平。重新上升的出口收益再次为国内工业创造了有利的市场条件。另一方 295 面，由于商品输入仍旧很少，国内市场同样常常吸引不少本国的供应厂商，有时他们的商品也在邻近的国外市场出现。不正常的大西洋两岸贸易格局，以及半瘫痪的商品输入引起了对进口程序的进一步调整，结果加强突出了对中间产品和某些资本货的进口——一种随着进口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同时也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的趋势。

拉丁美洲工业以扩大产品来响应国内需求和对外供应如此幸运的状况，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可以看到，已经建立的绝大多数

制造行业都增加了生产，尤其是非耐用品以及象纺织机械设备、车床、锅炉、发动机和压缩机等工业用品。由于充分利用了已投产的设备能力，时常采用两班制或甚至三班制工作，使第二产业的生产指数不断提高。过去专门从事修理进口机械和设备的一些企业，常常还被鼓励进行制造业生产——这是一次不必再投入多少额外资金和技术的飞跃。这种倾向在巴西、智利和秘鲁最为明显。

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尤其是巴西，第一次世界大战提高了工业企业家对国内市场潜在力量的认识，从而刺激了他们进行新的投资。到1917年，主要是那些已经拥有多种经营的制造业部门经济，即使规模很小，许多实业家都承担了大量固定资产的投资项目。虽然投资方案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定下来的，但在战后出现经济萧条时期，由于巴西制造业生产能力仍有潜力，在1918年之前没有多少项目得以完成。这些方案都保证从1915年到大战结束期内就能获得高额利润——从中可以筹措新的投资资金——而且还赢得了工业投资者们的信任。在欧洲战争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些项目表明，除了建设工业的发展条件，还要考虑资本投入的效益。企业对投资规划的设计通常都是过分庞大，因此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塞纳铸造工厂，由于战后需求收缩，以及据说部分因为国内货币增值而引起的输入日益高涨而吃了亏。但其它企业却都一直维持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出口业务重新扩大时为止，当世界货币市场恢复秩序时，才改善了国内的生产前景。

拉丁美洲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银行之间没有流动资金，是大战初期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可是，这是个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欧洲的银行收回放款和减少海外的承付款项使金融市场的银根趋紧。这种现象很快便从对外贸易部门波及拉丁美洲经济的其它领域。许多国家的政府便以减轻财政负担和扩大通货发行量的政策来应付上层集团对融资的不满，和对城市失业者提出的强烈抗议。在别的地方，通常采取的解决办法便是进行镇

296

压，以爱国主义进行号召，并向群众进行正统的说教。对务实的凯恩斯主义来说，抓住战时的机会那种经验是不容易学会的，而且经常只是片面的理解。如果说巴西是准备采取智利的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各个时期实行松动头寸的政策，那末阿根廷却不是这样做。因此在有些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来的遗产是政策的实用主义，和使官僚政治深深懂得要制定适合工业需要的计划。经济上通常正统的巧妙说法，则是受到的冲击太强烈了，以致无法抵制，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便是如此。

最最重要的是外来不利冲击的性质而不是与外界脱钩本身。出口繁荣时期和冲击对这个问题同样有关。外部危机不可能在一种没有工业能力或不能维持工厂基本生产结构的经济中促进制造业发展。重要的因素往往是政策的反应，也就是说，是否想到以恰当的办法去保护在出口发展周期刚刚建立起来的工业（与其说首先由于外国竞争，还不如说由于国内购买力衰退），还是去支持一个包罗万象的工业化计划。与外界脱钩可以提高已投产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但最珍贵的是增加工业投资的后果。只有在制造商确信经济危机以后的时期面临外国竞争仍可夺得国内市场的那些地区，投资才会源源不断流入制造业部门。

探求得当的政策

独立以来，经过很长时期的研究，关于使工业繁荣最恰当的环境的争论，几乎都一致认为，要以重新制订商业法规和实行关税保护为主要前提。现在主要谈政府较大的行动。讨论已经扩大转向包括诸如外汇贬值，劳工政策，信贷管理等主要课题，以及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更大的方面，例如社会改革和福利法规。关税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应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实行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促使工业发展？

707

整个19世纪，对外贸征税是政府收益的主要来源。海外贸易

的税收是政府日常工作经费的来源。海关收入为国家提供了金本位的外汇，一旦需要支付当时收入能力以外的开支时，便可用它来抵押以获得国外的贷款。课征外贸税是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提供国家收益的方法。对海外贸易征收关税比国内可能征得的货物税所得到的收入多，只须少量的办事机构，而不必在内地到处设卡，也不象征收直接税那样——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熟练的专业素养，政府官员难以胜任。向对外贸易部门征税还可以避免征收各种直接税时必然会发生的政治纠纷。因为征收直接税难免要冲撞拉丁美洲各国社会的统治阶层。由于主要是向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作为一种消费税课征，提供财政收入的负担便不成比例地落到了当地社会的穷苦人身上，而接受黄金或金本位外汇收入的出口商，也由于税款和收入结构中含有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受到损失。

有人主张依靠进口税，责成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实行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同时立刻采取最有效的促使工业发展的措施。这种国家收入和保护关税不能兼有的观点也许值得探讨。巴西于1844年随着与美国签订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期满之后，便提高了关税，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为国内制造业提供了适当的保护。1853年巴西虽然实行了自由化，在帝国时期它的关税法后来一再进行修改。不久在1889年之后建立了分散的行政机构，才把对财政政策的一些决定权移交给各个州，也许还制订了政治制度更好地满足制造业发展地区议员们提出的保护要求。到19世纪70年代，对纺织品进口税征收50％—80％被认为对当地工业最为有利[20]。修改关税条例是否意在促进制造业发展仍是有待争论的课题。在该世纪末决定大量增加关税的原因，最主要是考虑国家收入，即使在工业发展较早的最先进地区也是这种情况。短期的关税改革也许还被当作廉价的政治措施提出来，作为支持国内地位

[20] 1876年国会文件，第75卷，第36页。

受到威胁的政权或屈从外国压力的权宜之计。1835年阿根廷通过的保护措施便是在罗萨斯政府危机时刻实行的。1835年的关税和1837年进一步提高进口税受到各省农村和城市各行各业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本国工人的普遍欢迎；这些工人的生计不仅受到来自英国进口商品的威胁，而且还受到本国以工厂为单位的生产恶化的威胁。[27]外国观察家承认，这些措施可能刺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然而实行这些修改措施是由于1836—37年伦敦发生金融恐慌，那时贸易已经衰退；而且也因为阿根廷与外国列强的关系不断恶化。罗萨斯对乌拉圭进行干涉，以及疏远阿根廷与法国之间于1834年开始的交往，结果法国于1837年宣布封锁拉普拉塔河。巴西大肆鼓吹的1844年关税修改法，是否也仅仅不过象政治姿态那样，在重新施加压力反对大西洋彼岸的奴隶贸易时试图加强政府的实力地位以对付英国的一种谈判策略？事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影响也许有争议，但推测可以允许思索。

虽然如此，为巴西设计的一种有生气的关税修改模式，也许是一种较广泛使用的办法。在承认进口关税对国家收益起到很大作用的同时，这项分析还逐条列出了必须扩大财政基数的各种因素，指出只能以增加关税来予以满足。来自各地要求实行现代化的压力——改进社会基础结构，国家对生产企业的补贴——当时也被认为是加强中央政府势力的一种手段。国内的不稳定或在国外的投机活动同样需要额外开支。因海外贸易收缩外来的冲击使国家收入下降，所以不得不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如果国家财源需要增加，而国内或国外借债的可能性也有限，尤其是在财政不稳定时期，往往会更坚决地要求修改进口关税。通过提高关税增加收入不可避免地要调整进口商品价格和国内生产成本之间的差

[27] 尼古劳著《阿根廷工业》，恰拉蒙特著《民族主义》第13，15，21—22页；M·伯金著《阿根廷联邦制的经济状况，1820—1852年》（马萨诸塞州剑桥，1946），第237—245页；H·S·弗恩斯著《19世纪的英国和阿根廷》（牛津1960）第251—252页。

额。国内制造业便通过加强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份额或开始生产新品种来适应这种情况。这些行动增加了前工业集团的人数，使他们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保留最初提出的作为财政上权宜之计的一些措施。在以后的经济增长时期，新近扩大的制造业利益集团得到了巩固，他们在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划分关税种类或全面征收附加税的再次鼓动增加关税收入的受益者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种扩大和加强工业的模式承认财政部门对国家财源的支配地位也对国家财源的各种需求进行了分类，为周期性地修改关税作了说明。也许还有进口商感到不愉快倾向的原因，即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再进行关税调整。迫切要求尽量增加收入的愿望往往会产生在大幅度地提高关税以后，几次小幅度下调的情况（而有时也会上调）。这种说明为税收制度的“不稳定性”作出的解释比那些强调意识形态原因的解释——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和新重商主义支持者之间在发展哲学方面对抗的产物更加令人信服。

在抗议连续不断改变税率或重新对关税税则进行分类时，进口商自然不是孤立无援的。制造商也同样抱怨。但是，如果说前者是对阻碍贸易流通的非关税壁垒，诸如官僚主义的无能，更糟的是，海关办事人员的凶狠刁难和贪污受贿等情况感到担忧的话，那末后者所关心的是不加区别地征税办法会降低关税保护的效果。所以说，当寻找关税修正方案中偏袒工业的证据时，一定要特别注意进口商品的分类情况，以及对制成品，原料和机器施行的不同税率。在智利，1851年总法令中透露了要加强关税立法特殊性的趋向以后，1864年的新条例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对19世纪70年代末严重财政危机时期的税收进行了广泛的修改。在1878年进行彻底重新调整之前，1877年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实行了征收10％的关税附加费。1878年规定对税收普遍增加35％的法令，可以说，它既有财政上的目的，也是对保护主义者情绪作出的反响。免税进口商品种类明显扩大，而且实际上包括所有工业原料

300

和投入物资。新法律区别对待的原则在缩小的红字标题中便可看出，根据这一原则，机器进口税也许就得免征，15%的关税目前适用于车辆、发动机和金属器具的进口，因为这些货物在国内已经制造。纺织、制鞋、造纸、家具制造这些消费品工业和食品加工从1878年法令得到更多好处，那些资本货工业，最明显的是金属加工业也受益匪浅，它的半成品进口，如生铁、钢、锌、铁钉等都免税。1878年法令一直实施到1884年，使制造业得到发展。虽然制订该法令意图是增加财政收入，但却是对国内制造业的实际响应；制造业的代表性在那时政府已不能完全置之不顾。智利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里无疑是一种特殊情况。它的进口税占国家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少。1860年海关收入（主要是进口税）占政府收入总额的60%以上，到1878年仅占44%。太平洋战争后，硝石出口税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在1875年出口税仅占国库收入3%，到1920年则占71%[28]。进口税因此摆脱了唯一的财源的功能，而成为发展政策的一种有效手段。对提高硝石税款是否完全有利于关税政策，有不少争论。如果说保护主义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可行的政策选择，那末没有人同意这种政策选择是行之有效的。硝石时代的繁荣能否说国家和企业已经不重视制造业了？[29]

301

19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的税收政策有明显偏护工业的趋势。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口税约占巴西中央政府收入的60%，其中对棉纺织品的关税占很大一部分[30]。尽管关税偏重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但棉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其它工业也

---

[28] L·奥尔特加著《经济政策和智利从独立到太平战争期间的发展》，载埃布尔和路易斯合著《拉丁美洲》；马马拉基斯著《智利经济》第20页。

[29] 对此不同评论，请看马马拉基斯著《智利经济》，帕尔马著《外部的不平衡》，奥尔特加著《智利经济政策》，及基尔施著《工业发展》。

[30] F·R·贝尔西阿尼著《"出口"经济中的工业投资：1914年前的巴西经验》第20页（伦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文件第2号，1979）。

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向。例如，制鞋业，1914年的国内生产实际上已占国内消费的总量。对这种矛盾现象，有几种解释：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税法变得更加复杂和区别对待的程度也更高。对税标准进行较小的调整，以及对进口商品重新分类，符合发言权越来越大的工业集团的要求，也符合政府需要增加收入的要求。其次，就19世纪后期大部分时间来说，进口商品的名义价格普遍下降，恰恰使保护新生工业的呼声高涨，同时也扩大了增税的范围。随着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为了保持外国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必须提高税率。有些贫穷国家的政府难以应付这种局面，在使用免税商品表征税时，它们也允许有较大的灵活性在不使税款收益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机器和必需的投入物均可列入免税商品栏内。此外，将近19世纪末时，进口税开始受到较大的约束，因为各国政府都开始坚持要以黄金而不是纸币缴纳关税。在巴林危机期间提出来的阿根廷1890年关税条例，在把某些商品列入免税商品表的同时，还对生产性机器和设备降低税率5％－10％；但与国内产品竞争的各种工业制成品和食品的税率则提高60％。所有税款只能以黄金支付，19世纪80年代实施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31]。巴西在19世纪末前后也一再提高黄金支付限额（以黄金支付关税的比例）。[32]最后，许多共和国都实行了关税制度，从而对某些商品确定官方固定的黄金价值，而不按通行的税率征收。官方对进口商品到岸价值和名义价格之间的脱节现象，在19世纪70年代后不断扩大，由于运费降低和工业制成品离岸价格下跌，结果使保护的范围不断增加。 302

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不管是由于敏锐的关税政策，还是由于难以预测的世界价格变化，坚持实行贸易保护是提高商业信

---

[31] 弗恩斯著《英国和阿根廷》第457页；

[32] 贝尔西阿尼，《工业投资》；W·卡诺：《圣保罗工业集中的基础》（圣保罗，1981）149—150页。

心的重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征收关税使新生工业得到发展。当海关法发展了——差别对待程度更高时，后向带动作用使生产过程日益深化，因为企业家把制造过程的不同阶段纵向地结合在一起，或者因为受到工业投入需要的鼓励出现了新的供应厂商。巴西制鞋工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该工业在19世纪关税制度保护伞下因对进口制成品征收高额税而得到发展。到1907年国内产量已占全国消费总额96%，在本世纪初以前该工业已严重依赖进口投入物资——机器和原料。因为国内鞣革不能保证供应和质量不稳定，巴西的皮鞋工业主要从美国进口它们需要的原料。连缝鞋线也是进口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国内资源供应得上，该工业便转向本国的皮革供应商购买。但是在1908年，巴西的皮鞋就由美国综合性大企业设在巴西的联合制鞋公司制造的设备加工制作。联合制鞋公司对皮鞋生产厂家提供各种综合性服务：出租机器和对出租机器维修进行承包。该美国公司还对职工进行培训，供应零件，以及对安装提供咨询。在这段时期，据说该工业不再需要保护措施。[33]

巴西的经验是从对皮鞋工业方面，尤其是对纺织品生产试行的关税法得来的。这也许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影响较大的一次关税改革模式。棉纺织品的经验表明，如果本国的产量几年已达到国内市场谷底的话，不仅需要对机器和马上可以竞争的制成品等进口商品的关税认真调整，而且尤其需要对各种半成品投入物如线、纱、漂白剂和染料的关税认真调整。不注意这些细节，就不可能迅速发展多种经营，也不可能从国内得到供应来源，总之，不可能深化工业基础。到本世纪20年代，巴西和墨西哥的关税法大概可以说已达到相当老练的程度。在别的国家，关税制度

303

[33] W·苏齐甘著《巴西制造工业的投资，1869—1939年》（伦敦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1984）第152，154—155，156—158页。

仍不太成熟，不能完全适应国内制造商日益发展的需要。[34]

对工业生产的出现和巩固采取保护措施，显然十分重要。但对这个问题可能会被夸大：过份渲染保护主义的利益反映了不加鉴别地接受强调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比较顺理成章的是，把关税改革说成关系重大，但并未实现的替代过时的自由主义战略。把个别国家修改关税制度描述为孤立的例子，正好说明一种正确的发展战略由于普遍信奉自由贸易，不幸未被采纳。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而不是一成不变地坚持自由主义原则，可以说是谨慎对待关税的原因。有些工业并不需要保护，当政府对该部门的技术要求不太苛求或关税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时候，它就发展起来。1864年智利实行的关税条例，开创了负有盛誉的自由主义时代，并没有妨碍新兴工厂的成立。相反，企业家们积极响应1865—73年的迅速发展形势，出现了对加强本国工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时期。巴西的制帽商在19世纪60年代并没有要求保护，虽然得到政府补贴和准许免税进口原料。1888年南里奥格兰德工厂利用本地羊毛制作粗毛毯鞍子和毛绒布，因此使进口货降低；该行业并没有要保护，而且各公司声称分到高额红利。[35]

边际制造业，通常是与外界无关的经济部分，尤其在19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前容易适应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利用复杂设备（在资本匮乏的经济中，需要获得外国技术、可能要用进口投入物和相对大量的投资）的工厂生产则特别担风险。企业家，与牧场主不一样，不能退到只求生存。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和70 304

㉞ F·R·贝尔西阿尼著《经济萧条期之前：20世纪20年代的巴西工业》载R·索普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世界危机的外围作用》(伦敦，1984年)；苏齐甘著《巴西的投资》；R·米勒著《拉丁美洲制造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世界发展》9/8（1981）。

㉟ 1889年国会文件第77卷，第446页。

年代后期，那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尚不十分明显，生产技术只是刚刚起步，经营大规模农、牧业的庄园主在环境不利时可以把业务暂时搁下，把不易腐烂的商品堆积起来，同时使牛羊群进行繁殖，一旦经济或政治局势好转便重新进入市场。但对制造商来说，他们主要依靠商业服务和金融服务之间复杂的联系，这种选择是行不通的。正如现代其它经营活动一样，工业是国家建设过程的受益者，所以它是在向外扩张阶段产生的。政治上的日益稳定，公司合并成新的合法机构，行政机关的专业化，已经改善的通讯情况，日益增加的总需求，以及资金来源扩大都对投资和生产的业务决策环境产生影响。还有国家政策方面，也对制造业有直接影响。

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1930年，智利发展计划的费用（公共事业和教育）每年平均增加4%，大约占国家全部可分配资金的30%。还把大笔款项用于行政管理。在1910年以前，铁路建设占了大量公共事业支出份额，尔后，便是用于修建和改善公路和港口。在这期间，教育和办校款项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对中央山谷以外基础结构的现代化影响问题，如对教育事业的质量问题一样，都提出了疑问。肯定无疑的是，智利中央地区的统一市场得到巩固，而且在国内市场受到保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层层抵挡下的经济中劳动密集型经营活动在国内效益得到成倍增长。同样，国家用于公共事业的费用对重工业产生了直接和积极的影响，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有些后退。如果说绝大部分时期主要出口工业由外国资本控制，那末政府的收入几乎很大一部分来之于出口税，国家的政策保证了把从对外贸易部门得到的资金用在国内经济，并促使本国资本的形成。[35]此外，在硝石时代形成的干涉主义做法后来也被变成需求的监督和调节机制，设法使国内购买力适应于国内市场。

银行和货币管理是另一个明显的重要领域。对银行的作用和

㉟ 马马拉基斯著《智利经济》第73—74页。

政策抱什么态度反映在对经济政策的广泛争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如果把对该部门的稳定表示关心作为参数，在该范围内当时进行的讨论，对银行是否应该履行不偏不依或发展的职能，几乎都不同意，认为银行应该成为政府进行干预的代理人。然而，由于许多国家还存在大批外国银行，国家进行干预活动的可能性很有限，因此后来在许多其它方面出现了本国的银行实体。外国机构还往往排挤国内公司，以便限制官方银行各种业务活动，因为它们认为官方银行不会轻易失败或屈从于公开的政治控制。企业家当然可以使用非常规的金融方式，他们在其它情况下只能随利润决定资金的扩大。外侨企业可以向有关的社团借债，而有些制造商则利用出口部门赚钱。但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很普遍。许多自称是实业家的人都叫嚷要求通过金融机构融资。

在本文所研究的这段期间，由于外来危机加剧，缺少周转资金和投资来源，已普遍成为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重大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和不稳定造成的。同样重要的是，银行业务活动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部门以及贸易逆差的问题，后者引起了硬币外流的情况。19世纪50年代初期，是大西洋彼岸奴隶贸易结束之后的总清算时期，巴西成立了几家银行，这一时期已经开设许多商业和工业公司。但是巴西在金融部门继续实行非现金业务。由于1866年的危机，国家不得不行动起来并对各种建议进行讨论，以便满足日益发展的咖啡经济需要和巴拉圭战争的短期紧急应变。然而并未进行什么基本改革。1858年行市暴跌后实行的1860年商业法所确定的公司法仍具有极大的约束力。金融部门任何公司或其它部门公司都必须国家议会批准，只能在有限的责任制下从事经营。1860年商业法在二十多年里始终有效，这证明完全不打算放宽金融立法。只是在19世纪80年代，银行才陆续增加。没有几家银行（除了某些极突出的例外情况）能对当地工业提供充足的贷款。随着老共和国*的成立，灵活性才大一些。由于放松了货币政策，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初

306

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断断续续地实行第二次咖啡补贴价格计划期间，都扩大了国家信贷。

阿根廷的金融业务可能受到更多的限制，尽管这段时期不长。仿照美国的立法，1887年制订的全国担保银行法就是试图把银行的汇票和灵活兑现都注入这一体系中，这样便可以使银行业务与国内需要更加协调起来。在实行货币改革计划的同时，新法律仍试图加强政府的管理。1887年的改革对这方面的计划就是试图控制外国银行，并把贷款供本国工业使用。如果说这些确实是改革的目标的话，这种政策是失败的。巴林危机不仅使许多国家银行失去了自制能力，而且还揭露了担保银行采取的投机取巧（和非法）活动。由于对担保银行的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便逐渐形成非常保守的银行法。到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阿根廷尽管极其需要流动资金，但其金融部门却是拉丁美洲限制最严格的金融部门之一，不管有关担保银行业务的立法意图究竟是什么，反对1887年法令的反作用是妨碍了公共事业的出现或几十年没有发展银行业务。实业家对银行业务刻板僵硬的做法提出抗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最初的一、二十年，并且于2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据说那时因为国家银行拒绝再贴现，布宜诺斯艾里斯的金融市场濒临倒闭。

智利的情况显然不一样。在1860年前，只有硬币（金币、银币和铜币）才是智利的合法货币。这种货币制度完全不能适应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日益提高的经济活动水平。于是1848年在瓦尔帕莱索成立了第一家发行货币的银行。尽管官方反对，而且还受到商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仇视，1854年到1860年间又有四家银行开始经营。以前申请的这些临时安排，都已根据1860年7月的立法正规化，把钞票发行权正式授予这些银行。1860年的法令在立法上非常宽松，没有规定参加货币发行的银行必须要有最低限额

307

* 指1889年11月推翻帝制后建立的巴西合众国。——译者

的资本，不强迫银行一定要拥有硬币储备，也未给政府提供任何形式的检查，结果，银行急剧增加，市面上流通的钞票数量越来越多。[37]金融立法不过是说明智利政府态度比较灵活的一个方面；此外还成立了政府抵押银行，而且政府本身就是主要的顾主。那时国内和国外债务急剧增加，同时为了筹措资金发展公营部门，政府推行了普遍膨胀的货币政策。由于不愿意或不能提高征税基准，唯一的办法便是借债和发行钞票，并以此来维持已经增加的政府行政费用和社会基本项目开支，一直到开始有了硝石收入为止。这种做法付出了不少代价，例如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所暴露的问题。然而，这种制度也对国内的多种经营有明显贡献。通过智利中部和南部国有铁路，国家的作用及其对宏观经济有效的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并于20世纪20年代期间形成了国营的制造业，成立一批信贷机构。这些机构的效能以及政策的功效也许值得探讨，但对官方干预经济的规模和政府就周期性盛衰提出对应措施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

虽然就其业务范围的规模来说，智利政府与众不同，但圣地亚哥的做法和某些管理计划与南美大陆方式是一致的。出口部门日益不稳定使政府不得不随时作出应变计划。公共利益政策经常进行改进，有时还是改良主义的；但很少明确提出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工业发展，尽管这是当时盛行的词藻。智利成为过早发展的例子是因为在重要的危机时刻发生了不稳定。1873年经济萧条的突然袭击，对智利造成的影响也许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没有比它更厉害的。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中央政府的权力早日得到巩固，以及在受到国家积极支持的、以谷物和铜为基础的出口繁荣时期就已明朗化的各行各业的能力。在当时促成的干涉主义的做法在硝石时代便固定下来。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对出口部门不稳定的反应在巴西、墨西哥和其它国家也可以看到。乌拉圭的巴特列

308

[37] 奥尔特加著《智利的经济政策》。

主义可以说是社会结构日益复杂情况下产生的改良主义分配论的例子。在阿根廷，激进党选举获胜后一段时间内可能也采用了这种方案。不管怎么说，干涉主义政策有过受人称颂的先例。

在整个19世纪，给予补贴和免征进口税仍然是促使进行良好经济活动的最佳手段。以保证官方批准项目的资本投资利润率方式进行国家补助，十分普遍。利润保证是发展铁路系统，特别是东海岸铁路的一般方式，而且在巴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一直非常顺利地使用到20世纪。虽然铁路公司是主要的受益者，但并不是接受保证的唯一部门。对制造业来说，甚至更重要的是补贴和奖金。在巴西，中央政府和省（州）政府是工业补助金制度的主要支持者。最初设想帮助铁路公司，河流或沿海航线，后来对从事制造业的公司也实行开办奖励金和年度补贴。在资金不足的经济中如此明确的补助是很重要的。19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补贴和奖金的效果要比给予暂时的专利、免税或承包政府定货大得多。而且出口贸易扩大使国家收入增加，多少符合开拓者的愿望，使这些计划增添了更大的效益。

309

增加收益只是这种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正如上面指出的，在19世纪末，政府权限的扩大使已经安排就绪的那些领域里的政策得以协调一致，而且更有效地贯彻实行。在墨西哥非常重视更改商业法，和安排与登记注册有关的工作。1900年日益加强的官僚政治权限在某些国家里已使制度改革与政策需要完全协调一致。对兑换率变化的反应，说明各国政府都很老练。其中，货币对外比值的变化对国内收益影响很大，它直接影响进口商品（制造商非常需要的投人物的价格）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率以及关税保护的范围。制造商敏锐地意识到，兑换率和关税在决定保护程度上的相互关系。实业家知道，尽管关税保护保障进口的制造品价格不下跌或国内生产成本不上涨，但兑换率却对它们都会产生影响。据说，在阿根廷就倾向于执行有利于降低兑换率的外汇政策。在1864年，19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1899年，为了防止比索增值实

行固定平价。在其他各点都相同的条件下，货币贬值后，如果国内通货膨胀指数不随之上升，便追加少量的保护关税。巴西在外汇贬值期间（以及通货或信贷膨胀期间）工业投资趋势的增长速度就比外汇市场相对稳定时期更快些。1878年智利决定放弃自由兑换后，比索逐步贬值同样表明对实行需求国内化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而且，因为同时也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国内制造业得到发展。对秘鲁和墨西哥来说，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倾向。当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实行银本位时，本国白银的生产使它们可以扩大货币基数，同时降低索尔和比索的对外比值，这样国内的生产者就不致为进口价格普遍下跌而感到担心。与此不同的是，秘鲁于1897年实行金本位后使发展走向了反面。在阿根廷和巴西，制造商以不安的心情看着比索和银币（milreis）各自的对外比值在20世纪20年代间经常增值，往往担心会引起大量的“廉价”进口商品蜂涌而来。结果往往就象1922年和1924年间阿根廷工业联合会所做的那样，掀起一场关税保护运动。

政策上的变化，特别是在货币增值后对进口税的明显调整，引起了关于工业企业家政治力量和他们进入政府的争论。在有些容许延长货币贬值期限的国家里，由于低利贷款制度和不同集团的意愿各异，引起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方案是对制造商要求的自觉反应呢？还是由于其它集团的要求才实行这些政策因而仅仅使工业偶然得到好处？相反，有人也许会问，是否应该把货币量和兑换率的变化加上“政策”的桂冠。也许不须进行复杂的解释，这只不过是对国家施加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和市场无形的力量而已。建立管理机构，国家银行等诸如此类的原因可能就是追求高官厚禄而并不是想要促进发展或提高政策效率。官僚主义化的目标和唯一成就是提供职位而不是贯彻政策。

310

工业界和寡头统治

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工业企业家和其它受益者的社会出身是1930年以前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些人的出身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工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该部门发展中对工人的作用所持的态度。传统上都把拉丁美洲的制造商划分为手工业工人、小资本家和业务活动范围很广的生意人。但在他们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种分类法把两种相互有关的标准结合在一起，所以可以说是典型的两分法。它把将来的工业家团体分开，即按企业大小的不同和生产技术的不同来划分。有些企业很大，并且拥有先进的技术；另外一些企业，尽管规模较小，但也采用现代技术操作。这些工厂与使用手工业工人、工匠传统技术的工艺车间显然不同，与家庭制造业也不相同。这种类型所固有的高度社会多相性便是以早期的许多行业组织为特征，它们从地主、商业团体和其它资产较少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

另外一种可能划分的方法源出于移民所起的作用。阿根廷是典型的例子。在1914年，2/3的工厂主都是在国外出生的。除了纺织工业，几乎在每个制造业部门，移民都占绝对优势。这与农场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农场里几乎3/4的庄园主或经营者都是本国出生的人。在1935年工业依然是外国人的独占领域，60%以上的工业企业家出生在国外。1895年人数曾超过80%。[38]本国人只是在手工业中保持强大的势力，它们的生产过程与农业和位于联邦首都以外的一些企业有密切联系。从独立时期初期起，移民就占优势。阿根廷，尽管是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但它的突出之点只是移民在数量上占优势，而移民在智利工业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

[38] 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关于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的论文》第215页。

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的素质。对秘鲁来说，也有充分证据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乌拉圭，移民对建立大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作出了贡献，到1908年蒙得维的亚的制造业企业60％以上是他们开设的。开设的外国银行（主要是意大利银行）当然向为工业企业筹措资金的本国侨民提供贷款，而移民的小资本家则向他们的团体中创业更早的会员们借钱。对移民企业在制造业经营中异常活跃的巴西来说，有明显迹象和相当多的数据提醒我们必须慎重，这种概括不能轻易扩大，但对那里的民族首创精神则不该低估。

如果说移民企业家占优势标志着工业部门已分门别类地建立起来，那末由于不断出现跨国公司和地区割据局面仍在继续，从而进一步出现了分裂的倾向。然而，对前者的重要性不应该言过其实，后者的重要性或许也不可一概而论。正如前面所说的，在20世纪初公司资本已在许多出口加工工业中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和财政上的补偿已在都市经济中引起生产组织结构上的变化，与此有关的是世界运价下跌，使海外贸易不断扩大。1914年前，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制造业已经出现综合性大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里，它们的规模和经营范围都得到扩大。在1908—1912年的长期繁荣时期，英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始在阿根廷从事经营活动。到1930年美国汽车制造商实际上已经停止向阿根廷 312 （南美最大的汽车市场）出口现成的汽车，而改在那里进行装配。巴西的情况同样如此。1914年前，在当地生产制鞋机和纺织机的许多美国大制造业于20年代被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合并，成立了分厂，制造或装配小汽车、电器器械、农业设备和其它各种机器。到1929年，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厂已在圣保罗79家最大的制造业工厂中占了11家（约占14％），资本占17％。[39]尽管20世纪最初的30年内，圣保罗地区的工业增长很快，主要中心是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市，带来了远在

---

[39] 卡诺著《圣保罗》第224页。

南部生产能力的重大集中。但巴西在1930年制造业的地区分布仍然相当分散。在墨西哥，一定程度上由于革命的胜利，墨西哥城作为制造业的中心，变得日益重要，从而也遮盖了历史名城诸如普埃布拉和莱昂的完全衰落，和蒙特雷那样的边境地区的愈益偏僻。

根据以上所说的原因，便产生了一种突出反映工业部门分裂和工业资本不足的关于工业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这些特征正好说明制造业的“战略”缺乏一致性，远离了政治权力，在与出口业务活动相结合的本国经济中处于边际地位。而且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手工业工人生产在一些国家里仍旧是该部门最重要的特征。在制造商中间，手工业工人的残存显然在主张贵族政治的地主集团统治的国家里损害了工业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在自夸拥有大片土地或与大洋彼岸贸易有瓜葛的社会里，充满排外的西、葡文化习俗，对小规模的工业活动不会表示赞尝；它只尊重国家行政部门的职务或自由职业。实际上手艺工人阶级的残存，妨碍了工业社会中间对重要政策问题形成一致的意见。虽然从广义上说，对关税保护那种合乎需要的事情，大家都会同意，但一些特殊的措施，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正如19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纺织生产经验所证明的，由于对关税的争论，引起了剧烈的冲突。小手工业工人和那些从事家庭生产的人赞成不把制成品包括进去，而实际上，所有的商品都与服装生产有关。另一方面，工厂主到处活动进行游说对制成品实行禁止性关税，但支持对机器进口实行免税，因此与家庭工人发生抵触。织布工人要求对纱线进口减税，而纺织工人恰恰相反，不主张减税。无法得到原料供应的工厂赞成对进口商品不加限制，把原料生产与制造业联系在一起的地主却并不太同意这种观点。争论没完没了，但最重大的冲突还是发生在工厂与非工厂生产者之间。后期手工业工场的存在，和随之而来的该部门的分裂，无疑阻碍了制造业在许多领域一贯设想的更加活跃的计划。虽然阻碍工业

发展的因素远非是最重要的但在修正主义者急于把手工业生产当作走向完全成熟的制造工业的起点方面，后期手工业工人残存的消极意义却被低估了。如此顺利过渡的例子未必有几个。

同样，手工业工人过去对现今的影响不应该言过其实。到19世纪晚期，主要在移民的影响下，国内生产才被工厂作业取代，即使生产规模依然很小。在19世纪80年代，蒙得维的亚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手工艺的特征。虽然资料不能下最后结论，可以说在该世纪末已经转向机械动力。迟至1889年，1/3以上的“工业”能源需要仍靠传统手段提供。到1908年，不仅工业能源消费增加了几乎三倍，而且至少在蒙得维的亚，动力全部靠机械手段提供（3/4靠蒸汽，1/4靠电力）。改为机械动力可以说是对以现代工厂为基础的制造业的一种有利变化。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在制造业生产的多样化方面，都得到发展。在19世纪末以前，不到5%的企业雇用了几乎60%的工人，到1913年，14家企业，约占工厂总数的0.5%，拥有工人占26%以上。乌拉圭随着工业基础的扩大，进口变得多样化了。在19世纪80年代，进口商品表中主要都是非耐用消费品，如粮食、饮料和纺织品；1896—1900年的五年里，这些商品在进口贸易中只占56%，而机械和中间产品已占17%。在1906—1910年前者和后者分别占46%和25%。进口商品结构重新调整是国内制造业生产扩大造成的。[40]据说，智利的发展情况同样如此，不断增加的能源消费和使用机械动力标志着手工业生产的衰退和现代工厂的不断加强。正如上面提到的，较大规模的经济也影响了这一趋向。

314

如果说手工业者这一阶层的消失与移民队伍的扩大与气派更现代化的工业“联合企业”的出现有联系，但是，与制造业活动有联系的企业家们的社会声望却并不一定因此而提高。工业企业

---

[40] J·P·巴伦和B·内厄姆合著《巴特列，庄园主与大英帝国：19世纪的乌拉圭（蒙特维多，1979）第202—204页。

家步履艰难，很难有所作为。正象许多移民一样，因为仍保留出身国的国籍，而不是当地公民，所以他们缺乏政治基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制造业部门仍处于以中小型规模经营为特征的情况下，制造商们总是无法上升到超过他们小资本家社会地位低下的身份。企业家也处于与其它中等阶级集团不同的地位。出口贸易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根廷形成了一支拉丁美洲人数最多、最有发言权的中等阶级。教育改革，以及主要靠向对外贸易征税筹措资金建立的公营部门的发展，使专业集团和政治阶层的就业机会扩大。由于开设了商业、金融和公用事业公司，中等阶级队伍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公司都需要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和办事人员。阿根廷社会的阶级成分于1870年到1930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数众多的中等阶层同制造业并没有多少共同的抱负。律师、国家公务员、职业政治家构成了依附于出口部门利益的中等阶级。由于受到权贵习俗和价值观的威胁，阿根廷中等阶级的抱负和成就都在第三产业部门中被同化了，他们的文化素养，即使实际上不是反对的话，也是对工业漠不关心的。绝大多数专业人员都被关税“改革”运动吓坏了，因为它使中等阶级的消费结构受到威胁。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城市劳工阶层有共同的看法。

315

阿根廷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孤立和削弱了在政治上处于边际的工业企业家。像迪·特利亚和弗雷泽家族（他们是创建主要工业联合企业的移民）；或本赫和博恩家族（他们从商业和金融转向制造业并加入了寡头政治阶层）；或安乔雷纳家族（传统的地主家族，曾推动了工业界的发展）等等突出的例外情况却以他们不能代表普遍的发展进程，而倾向于被完全排除在外。这种有关缺乏政治代表性和把制造商排除在国家机器之外的论点，是过去的主要看法并被认为它在整个大陆带有普遍性。一些强调政策不恰当的分析显然也来自这种传统看法。工业分门别类地区划化，它脱离采矿和农业的主要生产活动，也造成了资金不足。因为制

造业是由另一个不同的社会集团组织起来的，无法从出口业务活动利润直接转让中得到好处。这些解释间接地支持了以下论点，即在1930年前，该部门是脆弱的、分裂的、孤立的，乃至没有多大影响。

这些评价之所以经久不变，说明有用的资料和数据都不够，以致至今还发生争论。因此，正如某些研究论文揭示的，需要有工业传记，同时对制造商的社会背景进行普遍调查。在这方面已经完成的工作表明另一种情况。在叙述巴西向正统观念挑战的同时，也说明民族精英受到外国人传入的现代化的影响，和出现生气勃勃的本国资本主义。“英雄的”巴西实业家都富于盎格鲁萨克逊的经济扩张观点，显示了对制造业活动的热情，和更喜欢开公司。[41]但几个“英雄的”现代主义者是否就能构成普遍的发展进程呢？从巴西在咖啡盛衰周期期间，制造业、农业和商业界之间密切接近的情况来看，说明他们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阶级关系看来是团结胜于敌对，从而形成了真正的本国资本主义。随着制造业中庄园主势力的发展，经济中同时也发生了总的结构性变化。在咖啡利润直接流向制造业的时候，还有其它渠道促使资金转向该部门：由咖啡种植者开设的银行，便是促使向农业外部投资的机制。[42]

316

圣保罗咖啡区内推广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现已确立，这一发展过程可以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奴隶劳动开始过渡到自由劳动时算起。当时，商业和工业的利润高涨，为了增加资金来源，不得不求助于正规化的方式。股份有限责任制和储蓄投资的制度化取代

㊶ 格拉姆著《英国和现代化的开始》。

㊷ 卡诺著《圣保罗》第129页；E·W·魏丁著《出口经济中阶级成分的一致性：19世纪巴西的情况》，载《西班牙语美州历史评论》58/3，（1978）；Z·M·卡多佐·德梅洛著《1845—1895年的圣保罗：财富的变化，对于从重商主义奴隶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出口经济的研究》（圣保罗大学1981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过时的向私人筹集资金的方式。19世纪工业的资本主义及其早期的特征在智利也得到承认。而且，如果说移民企业家的作用被承认的话，重要之处在于参加第二产业的内在性，和社会权贵从富有抱负的移民那里学到了他们的才华。现在有些新的研究文章与过去的解释不同把智利社会的上层集团说成是易于被社会地位不稳定的移民理解的人。承认智利社会不象过去所说的那么等级森严，而是比较和谐，承认企业家有可能在国家机器内部（当然也就对国家机器）施加了影响。移民企业的迅速本国化（不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可以同样这么解释。墨西哥能证实这种假说的证据有限。国内企业家在各地开始创业时，移民已经控制了诸如纺织厂等一些制造业主要部门。不过，墨西哥的制造商同其它国家的同行相比，似乎与主要寡头政治集团或政府的直接联系并不太大，至少在1930年前这段时期是如此。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前后，工业家协会会员不断增加，并得到大家的信任，也许是说明工业家社会地位提高和政治影响上升最好的例证，此后工业俱乐部和协会即在国家面前代表部门的利益。这些组织的成立和会员的增加，至少表明已认识到需要建立压力集团来维护制造业，并对当地有利于工业的社会舆论进行培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象秘鲁的工业总会或阿根廷工业联合会这样的组织都被认为是制造商诉苦的最好渠道。20世纪20年代期间，阿根廷工业联合会和巴西工业协会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这些国家经济上的缺陷，并对有些人害怕关税保护会对生活费用产生不利影响作出回答，多次组织了工业展览会，和发动了有利于关税改革的运动，强调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机会。即使进行的游说很少达到预期的目的，20世纪20年代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的工业协会都声称已赢得最高当局的注意。

1930年前当对工业的讨论引起大家对实业家的社会出身，国内主要集团的地位和政府的作用产生新的兴趣的时候，关于工人作用的争论也活跃起来了。这个主题是进一步对工人进行重新考

虑的组成部分，它导致了一种对社会结构较少绝对化的观点。分析建立在供应要素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不能忽视工人，这个中心是很有限的。有人认为，工业取决于合适的政治结构，而且需要具有各种特定的混合要素。工人只是诸要素中的一种。有工业必有企业家，也必有产业工人。但是城市工人被看作是一种不如市场或阶级重要的生产要素。学者们一直在刻苦探索作为工业资本家们实现现代化的骨干的无产者问题。要弄清1930年以前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因为它有别于制造业基础的扩大）就必须找出城市工人阶级，他们是结构变化更深一层的标志。这项工作不是容易做到的。

正如墨西哥的情况表明的，要找出以工厂为基础，依靠机器或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用产业工人群体，即使在独立时期初期也不难找到。众所周知，这些国家在独立以后还存在奴隶制度，工厂使用奴隶的情况很普遍。有人把这种状况说成是出现无产阶级的时期。对巴西、秘鲁和其它国家的农村包身契约工也提出过同样的说法。真正的重要意义无疑是，这些群体是一些孤立的例子，而且很难说明一种普遍的发展过程。工会活动也许对阶级特性和阶级的内聚力可以提供一种比较恰当的检验。社会（城市和农村）出现不满情绪加强镇压，和社会权贵对动乱的恐惧增长，都说明掌握了某种有效组织的工人的不满情绪正日益明朗。到1914年工会已不再是临时性的组织——那种为谈论一个特定问题或碰到某个问题而组织起来待问题解决后，或更可能的是当受到暴力镇压后，就解散的临时团体。如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一样，制造商把劳资关系视为治安问题，常常请求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来解决劳资的纠纷。然而智利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才有，阿根廷和乌拉圭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墨西哥的城市工人于20世纪初期也组织起来了。在巴西，政府于1930年后欣然接受增选城市工人为代表，或同他们和解，这都表明，在这段时期工人阶级的队伍已经很大，特点已很明显。但是产业工人当时

318

并不是这些运动中的核心人物。典型的是出口部门的工人，例如智利的硝石工会，是争取把工人组织起来的主要策划者。各国的公用事业工人，象阿根廷的铁路工会，或象乌拉圭银行职工那样的“白领工人”团体都是运动的先驱者。

1914年前，在拉丁美洲有些国家也许可以明显地找出企业家团体。现代学术文章指出这些团体和以前允许存在的团体极其相似。制造商或制造商之类的人（目前尚有争议），未必都处于边际地位。但是修正主义者的作品，其主要锋芒仍强调统治阶级整体性观念，和各种利益集团的一致性，不会同意把英雄的工业企业家的形象刻划成深化社会改革的代表，即使在经济多样化发展过程中，他们是最明显的人物。同样，城市工人和有些农村劳动者，在20世纪20年代也许已经较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其实城市工人，不论是自觉的行动，还是由于经济增长引起的共鸣，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有些国家就曾谋求增加福利（可能是分享较多地国民收人）。大家都承认，劳动者能够分享对生产利润的支配是发展制造业的结果，从而才能扩大第二产业的产品市场。劳动力成员在这个时期也许已成为最有发言权的人；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里，有组织的工人被许多其它生产活动雇用的工人所牵制，因此妨碍了组织有效的工会。而且如果以南美洲顶端较都市化的经济来观察城市无产阶级，很难说他们就是工业无产阶级。

319

工业还是工业化？

虽然这个主题的本意并不想轻易作出概括，但毫无疑问，在两次大战的经济萧条期以前的几十年所有国家的工业都在发展。18世纪出版的当时的报道，都说扩大了工业生产而且拥护促使制造业发展的各项政策。20世纪30年代以前进行的工业调查（通常是不全面的，而且往往以一些不可靠的假设为前提）也记载了工业活动的规模。从生产和组织上富有革新精神的趋向来看，证明

有些领域现代工业的起源可以追索到19世纪80年代，最明显的是智利和巴西。本国制造业性质上的变化，在阿根廷和墨西哥也可以看到：在某些特殊部门正日益增多地参与当地本国制成品消费的供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秘鲁和哥伦比亚也扩大了制造业生产活动。古巴是唯一没有受到因出口贸易在大陆普遍发展而导致工业发展的国家，那里总需求的增长和基础结构的现代化使市场得以巩固，同时由进口来供应制造业日益增长的需要。现代制造业最初出现的时间是否可以推回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这是值得讨论的。同样引起争论的是，独立时代初期“殖民地”式的国内制造业和血汗工厂本身是否有能力转变为现代工业的问题。家庭制作工场和手工业工厂揭示某些原始工业特征。然而发生在19世纪第二个三十多年期间的工业改组，是随着移民定居和制造业受到出口部门集团的大力渗透而来的——既有本国又有外国的因素。“殖民地”式工业的主要问题，不是转变为生产资料的机械化，而是强调任务专业化和现代工厂所固有的新的组织安排方式。

如果从工业增长来考虑这次讨论的大部分内容，能否说1930年前是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呢？对智利来说，如果没有争论的话，可以满怀信心地认为，由于19世纪后期提出了注重实效的促进工业计划，并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通过自觉的需求管理，的确出现了工业化。对巴西的情况更为慎重。巴西的现代工业进程可以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那时也是部门深化的过程——除非耐用消费品外的各种商品到包括固定设备在内的制造。制造业显然是在1930年建成的，国内生产在一些行业和某些领域已控制了全国市场，特别是圣保罗，该部分已被有效地并入区域经济。虽然没有几个作者把这些进展说成是工业化，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所说的工业深化和多种经营阶段是通向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在别的国家，就其现代化状况来说，使用“工业化”这个词就不太合适。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阿根廷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大、最高级

320

和最有生气的市场：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占的份额几乎比别的国家多一倍。在这个时期，第二产业产品的增长率也比采掘工业的增长率快。然而就阿根廷工业深化过程的深度来说，不如智利或巴西。哥伦比亚在20世纪20年代也许正是它经历的第一次制造业发展持续阶段，虽然从很低的基础起步。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在两次战争期间，墨西哥和秘鲁的工业发展进程一直徘徊不前。

虽然在总的论点方面仍然有分歧而且很不明确，关于细节的重要情况普遍一致。不能再把1930年说成是拉丁美洲现代制造业的起点了。虽然已经很清楚地确定了出口导向工业发展过程的期限，拉丁美洲的现代制造业应从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时期算起。这一点已被各国不同的《对外发展编年史》确认。1930年的外来不利冲击并未使制造业创建起来，虽然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许曾经引起工业的深化。由于有些国家第二产业生产活动水平已经提高，很可能有这一发展过程。在特殊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制造业构成的刺激作用，也许要比过去认识的意义更深远。这或者是因为1914年的破坏造成的后果相对来说比1930年更严重；或者就是因为试图克服战争带来的问题，和战后的困难所采取的各种特别措施，对30年代后来实行的计划起了示范作用。

关于工业的论战，同样也解决了其它方面的错误看法。就政府政策的讨论驳斥了简单化的论断：认为拉丁美洲大陆在19世纪期间是固执己见，空谈自由放任主义的地区。各种政权在19世纪或独立以后，多方面地试图向外国势力开放它们的经济：国家和地区都被赶到或推到正在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然而尽管与古典经济学家或社会概念有联系的意识形态的盛行都是以斯宾塞和孔德*的信条为基础，不能把拉丁美洲各国说成在进行近似教

*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6—1857）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译者

科书式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专题研究。在19世纪这种争论无疑十分激烈，甚至官方刊物和政治家的公开讲演中都普遍充斥这种自由主义言论。但是很少把自由的思想变为实际行动。不管由于固有的伊比利亚人重商主义的传统势力，还是迫于当时财政和政治上的考虑，政府的政策都是注重实效和主张进行干涉的。开辟工业资金来源强调该部门现有国内资金支持政策实用主义的假说，同时说明在本文所研究的时期内与制造业有关的政府工作的趋向。

不过，如果说一致认为官方采取行动促使工业发展的话，关于使用最合适的机制方面仍然发生争论。国家使经济环境普遍改善的间接行动也许比逐渐促使私人工业或公司发展所实行的各种特殊措施更加重要。关税保护引起了广泛重视：进口税对工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制造业的业务活动有很多例子都是在没有关税保护，或者在中立的财政税务制度下开展起来的。外汇兑换政策补充了关税，而且可以抵销由于官价偏差造成的实际保护税率的下降，据此实行税率和岸边价格。与关税制度相比，兑换率当然更有理由进行调整，重新制定关税制度必须经过广泛商量，而且可能还要同外国列强重新商议贸易条约。圣地亚哥政府和里约热内卢政府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定已经知道他们行动的后果：出口商当然知道，在所有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322 出口明显增加必定导致利用兑换补贴以稳定物价。

然而关税机制和兑换政策（也许只有缺乏训练的官僚才不能全面理解）大概没有重大的经济变革重要。促使工业企业合并的制度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促进金融立法，为制造业提供刺激和补贴，同时使国家服务事业从教育到管理普遍实行专业化。基础结构部门的现代化至关重要：发展了铁路，实行了电报一体化，使全国（或地区）的市场得到均匀分布。通过这些发展起来的服务部门和其它公用事业，降低了工业注册的成本，从而使企业从一开始便可以以较少的资本从事经营。改善港口设施减少了中间产品、资本货和燃料的费用。许多国家扩大公用事业意味着

国营经济成分的增长。收益增长——无论是扩大国营经济成分，实行自觉的需求管理的结果，还是替代性地由于增加出门业务规模的结果——可能是国内制造业发展的唯一最重要因素。

1930年以前，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经济中工业发展的盛衰显然是周期性的，也是很不完整的。根据较先进国家经济的经验来看，也许可以推行一种试验性的工业模式。出口贸易扩大时期创造了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尽管有漏洞，出口贸易使国内利润和收益增加。政府收入和公共事业活动的规模均有增长。除矿石外的所有出口经济中，随着出口贸易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工资部门的扩大意味着货币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大。对外贸易部门发生危机，显然使收入增长走向反面，而且也损害了对工业有用的各种资源。可是对外贸易的不平衡，虽然肯定使政府收入减少，却很可能提高公营部门的重要性，并对公营部门的需求增加。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不得不寻找补救财政危机的办 323 法，因此放弃了过份依靠仅仅以缩减经费为主的政策（虽然往往试图采用这种政策）。在正常的情况下，其结果便是提高关税。这样做或者对扩大国内制造业范围有利，或者便是使工业基础深化。危机在工业部门内部还引起了质的变化，因为它打击了弱者（经营单位资金不足或缺乏必要的进口商品），却为成功（往往是较大）的企业在日益缩小的市场上开辟了较大的天地。出口部门的恢复和重新发展，对巩固幸存下来的企业有利，因为国内需求增长，要求它们扩大生产能力（或接受减少市场占有率），并得到关税壁垒的保护。这样便建立了另一个周期，进入了制造业产量和生产能力投资交替增长的另一轮。制造业生气勃勃的大好机会引起本国的资本家、移民和外国资本的注意。由于这个部门发展起来，实业家——他们现在与国家有密切联系，或者已经纳入国家权贵的行列——能够赢得政府重视，而且与其它行业一样，施加压力采取直接措施去维持和促进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第 9 章

1880—1930年城市工人阶级和早期拉丁美洲工人运动

1880～1930年期间，虽然拉丁美洲人口的绝大多数仍为农业人口，但城市工人已成了大多数国家国民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拉丁美洲与世界经济密切结合这一特点又使该地区出现的城市工人运动在一些重要方面有别于欧洲和北美。

经济、资产阶级与政府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任务是输出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品。进入20世纪多年后，工业在拉丁美洲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当小的。拉丁美洲经济不但基本上大多取决于其他地区，和有时遭受世界市场猛烈波动的影响，而且劳动力往往极其分散。受雇于出口部门的工人虽然通常具有较大的集体谈判优势力量，但在各个部门的工人中有时相当孤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圣保罗或圣地亚哥的木匠以及纺织工人罢工时，可能会产生严重影响；但比起出口经济发生混乱的影响来就微不足道了。如果铁路工人不将阿根廷的小麦、巴西的咖啡或智利的硝石运到港口，如果这些产品不尽快装船、运往欧洲或北美市场，严重的危机就会立即威胁到有关国家的经济。

矿工和运输工人在出口经济中所占据的关键性地位使其通常

受到政府的全力控制，但他们拥有的集体谈判力量有时使自己赢得重大的经济利益、偶而也赢得了政治权益。例如，智利北部的硝石矿工冲破重重阻力，结果形成了团结战斗的作风，这往往是比较孤立的矿工团体的特点。在智利，最终推动后来工人运动发展的是矿工的政治、经济组织，而不是圣地亚哥小作坊中的工匠组织。几乎所有国家的铁路工人都是组织得最好的，然而他们强有力的集体谈判地位有时使他们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使他们的工会转向改良主义。被誉为“巴西巴塞罗那”的圣多斯港的装卸工和码头工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巴西工人运动中最具战斗精神、最有凝聚力的成员；而里约热内卢的港口工人却成了改良主义的堡垒。

出口经济部门以外的工人一般都分散在规模很小的企业里。这些企业提供各具特色的货物和服务，这些货物和服务即使从国外进口也不可能一应俱全。例如，大多数城市的早期工人运动一般都是在印刷工人和各类建筑工人中开展的；在受雇于食品加工业中的面包师和其他人员中也有开展。服装业工人（特别是成衣工和鞋帽工）以及金属加工、玻璃加工和家具制造这样一些行业中的手工艺工人同样很活跃。

这些行业中的工人并不一定就都是独立的工匠，即在严格意义上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具有技艺那样的小生产者。这种情况确实一直存在；这些工匠有时能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影响。由于机械化进程很慢，相当晚近的时期还保留了许多手工艺行业。在墨西哥，1895年仍在手工织机上干活的纺织工人约有4.1万人；1910年时纺织工业发展了，还有1.2万人在手工织机上劳动。不过，20世纪初，拉丁美洲城市里的建筑业和小作坊的工匠们（尽管他们中间有的人手艺很高）一般都成了雇佣劳动者，被追到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这些行业的人数有多少难以说清。墨西哥的工匠是个重要的群体，1910年人口普查统计出的“工匠和工人”为873,436人：

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约占经济自立人口的16%。① 19世纪末，拉丁美洲各国的城市手工行业已具有了重要地位；但由于许多经济部门的进口能力比较强，比起大多数规模相当的欧洲城市来，这些行业通常不算发达。再者，这些行业在经济中并不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从而又限制了工人的政治、经济力量。然而，尽管工作分散、不统一，尽管小作坊往往处于家长式的氛围之中，工匠们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成功地建立起了极富战斗性的组织。他们常常在劳动力市场上利用自身的技艺获取最大的收益；一般说来，他们一直到1930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工人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手工行业工人的政治行动并不一致。虽然某些运动（特别是19世纪的一些运动）主要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但总的说来，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雇佣劳动者的斗争战略和策略。

工业无产阶级——机械化大工厂的工人直到20世纪初才有引人注目的数量，而1930年前在各国经济中也并不占重要地位。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主要是纺织厂；而有些国家实际上只有纺织厂。其他大多数工业活动仍同出口经济部门紧密相关联，阿根廷的肉类包装厂和面粉加工厂就是这样。

严格说来，关于工厂工人数目的人口统计数字都不是可比数字，而分类又相当的不明确。据墨西哥1910年人口普查报告，全国人口为1,510万，其中产业工人有58,838 人，而 1895 年 只 有45,806人。墨西哥许多最大、最现代化的工厂是坐落在普埃布拉州和韦拉克鲁斯州纺织城的纺织厂。据巴西1920年工业调查统计，工厂工人为275,512人，当时全国人口为3,000万。那次调查

---

① 不包括“产业工人”。西罗·F.·S.·卡多索、弗朗西斯科·G.·埃尔莫西略和萨尔瓦多·埃尔南德斯：《从迪亚斯独裁统治到自由主义时期》（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主编《墨西哥历史上的工人阶级》，第3卷，墨西哥1980） 第47、54页。

没有将许多小作坊统计在内，计算出的结果表明：平均每个工厂也只有21名工人。工厂工人中约有半数生活在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而40%的人又都在纺织厂里劳动。阿根廷1914年的人口普查认为有24,203个“工业企业”具备了“正规工厂的特征”。当时全国人口为800万；这些”工业企业”雇佣了242,138人（其中包括管理人员）。然而，从雇佣劳动者的平均数（10人）来看，这些“工业企业”中有许多分明是小作坊。②

工厂同作坊之间事实上分不清；有所不同的只是极其个别的情况，例如墨西哥城的手工业工人和奥里萨巴附近的现代化纺织厂工人之间的政治行动的确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在1930年以前并未独立地起什么作用。例如，巴西纺织厂的工人多半是妇女和儿童，事实上难以组织起来。巴西工人运动中纺织厂工人的行为同小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早期出现的大量产业后备军也从一开始就是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巴西政府大规模引进移民到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劳动，却造成了人们大批拥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副作用；尽管做了大量工作，但工人运动从来就无法制止这种进程。阿根廷政府也积极鼓励移民，在欧洲进行招募活动；在一段时期里还资助航运公司，以降低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费。阿根廷的政策虽说同样主要是想为农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但也是为了限制城市工人集体谈判的力量。19世纪末，墨西哥人口迅猛增长，资本主义农业大发展；其结果同样是劳动力市场人满为患，工资一直很低。因此，工业化进程初期大量后备军的出现使拉丁美洲几个最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里的工人组织处于特别艰难的境地，尤其是罢工的手段大大失效，随时都有人用来顶替罢工者。

② 墨西哥，前引，第47页；巴西，全国统计局：《巴西1920年9月1日人口普查表》，第5卷。第1部分，第72、77页；阿根廷，《1914年6月1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第7卷，第35页。

此外，工人要对付的是个毫不妥协的资产阶级。工厂主们之所以不愿妥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往往在成本中占很高分额和许多工业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此，许多部门的企业主并不总是认为将高昂的劳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状况是早期资本主义竞争时期所特有的，不仅是存在着大批小企业和机械化水平低的条件下各部门所常有的，就是像巴西和墨西哥现代化大纺织厂的厂主也感到难以把握住竞争态势。再者，大多数企业是新近发展起来的；这就使企业主要公然采用严厉的高压手段，因为他们一时还没有能力对他们的工人施行其他诸如思想和法规这类形式的控制。早期资产阶级的复杂成分及其刚刚形成的这种状况，往往使各个部门之间难以进行广泛的合作。企业的规模各异，机械化程度及业主的国籍也都很不相同。然而，各企业主通常都竭力促使政府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组织停产、共同制订罢工对策、开列积极分子的黑名单；这些手段都是相当有效的。

企业往往是外国人开办的，这就在各方面影响了企业主同工人、同政府的关系。外国大企业，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企业，控制着出口经济部门最主要的行业，诸如采矿、肉类包装和铁路运输等。对外国企业主和经理人员所表现出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许多情况下——如在墨西哥和智利的矿工中——构成了工人阶级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国企业不仅仅控制着出口部门。法侨资本家在墨西哥拥有几家最大、最先进的纺织厂。利马最大的两家纺织厂控制在W．·R．·格雷斯公司手里。控制着大部分古巴贸易的西班牙商人经常由于其雇用工人时的歧视性做法及其赊销和价格政策而引起工人们的抗议。外侨拥有圣保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部分工业企业，而企业里的工人主要也是与他们似乎无甚区别的外国移民。

由于1930年以前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业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政府大多仍掌握在与出口经济部门关系十分密切而对大

规模发展工业全然不感兴趣的集团手里，所以工业资产阶级通常只得设法达到近期的主要目标，其中很大的一点就是使政府能随时镇压工人。例如，墨西哥的迪亚斯政权（1876～1911年）热衷于促进和维护外国资本的利益，只在消除对墨西哥铁路员工的歧视上作了一些姿态。迪亚斯政权最后几年里有关外国大企业的劳资纠纷十分引人注目，政府进行了彻头彻尾的、特别残暴的镇压。控制着阿根廷政府的土地集团一心想着的是出口经济部门中外国大企业的根本利益，很少关心移民企业主的利益。虽然阿根廷政府严厉地维持着秩序，并时常极其残酷地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工人，工人阶级组织还是争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但这多半是由于产业工人没有直接威胁到土地集团的利益。巴西的情况有点不同，因为许多大种植园主在19世纪90年代末咖啡危机发生后都转而从事了工、贸活动。他们同移民企业主结成了关系十分密切的集团，所以政府执行了一种相当全面的镇压工人阶级的政策。

从理论上讲，19世纪各国政府的政策是自由的；但实际上政府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干预。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最突出的是巴西政府）借助于移民政策控制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那么残暴而又十分有效的干预方式之一。货币政策也是一种维护工业利益的重要手段，例如阿根廷许多年里一直有效地使货币不断贬值，从而降低了实际工资。一般说来，政府在劳资冲突中的主要作用是镇压工人。这种镇压的残暴程度确实是非常之高的。例如，本世纪的头十年间，智利政府曾多次对工人进行大屠杀1903年在瓦尔帕莱索、1905年在圣地亚哥和1906年在安托法加斯塔的罢工示威游行中杀害了数百人。1907年，军队在伊基克向前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硝石矿工及其家属开枪，屠杀了一千多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墨西哥迪亚斯政府的行为同样野蛮。例如，1907年里奥布兰科纺织工人罢工期间被屠杀的工人到底有多少永远是个谜，大多数人估计被害者超过一百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一支行刑队显然是根据迪亚斯的指示，在里奥布兰科当众

处决了六名工人，以迫使其他人回厂上工。

还经常采用一些其他镇压方式（特别是那些旨在削弱或破坏工人阶级组织的方式），虽然还不是屠杀，但也是暴力方式。事实上，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都曾封闭过工会总部，搜查过报社，禁止或驱散过游行和集会，下达过拷打和监禁工人领袖的命令。此外，还经常收买工人运动里的内奸工贼和打入警探作为补充的手段。大多数政权都竭力保护工贼，有时甚至至用军队保护他们，并且在大规模逮捕镇压罢工工人的情况下也保护他们。政府的镇压凶残之极，甚至引起了通常根本不同情工人运动的外国保安人员的震惊；例如，在圣保罗的一位意大利保安人员认为，在巴西以暴力为特点的罢工事件中"挑起事端的大多是警察而不是罢工工人，只有少数情况例外。"③

阿根廷、巴西、智利、古巴和乌拉圭等国政府以日益高涨的工潮是"外国煽动分子"挑起来的为借口，纷纷颁布法令，即刻将外籍工人驱逐出境。时至1916年，阿根廷根据1902年制定的居留法已赶走了383人。到1921年，巴西根据类似的法律至少已驱逐了550人。两国政府采取的这类措施特别是针对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领袖们的，时时给工人运动造成危害，而在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对以外国移民为主要成员的工人阶级中所产生的威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政府经常把工会积极分子送进设在内地的拘留所，这实际上多半是等于被判处死刑。迪亚斯政权特别臭名昭著，它根据工人各自的活动情况，将其分别关进设在坎佩切、金塔纳罗奥和尤卡坦的集中营。关押在巴西亚马孙地区声名狼籍的克莱韦兰迪亚集中营里的人们日子也不好过，本世纪20年代里有好几位著名的工人领袖都死在那里。阿根廷政府也在火地岛上的乌斯怀亚设置了类似的机构。 332

③ 罗马，国家中央档案馆，公安总局，收藏室（1879～1912），13架，41类，13目，从切萨雷·阿利亚塔—布罗奈尔至路易吉·布鲁诺，1909年6月30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多数政府除直接镇压外，还试图采用其他一些方式控制工人阶级。例如，墨西哥的迪亚斯和巴西的埃尔梅斯·达·丰塞卡（1910～1914年任总统）都曾力图建立或支持驯服的工会组织，然而结果有得有失。1917年以前，除了偶尔有一些关于星期日休息、工作时间、工伤事故和妇女及儿童劳动条例等有限的规定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法规。而那些有关星期日休息、工作时间、工伤事故和妇女及儿童劳动条例等的规定又大多只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工种（通常为政府雇员）或某些地区（如首都）。驯服的状况只不过是一时的个别现象。圣保罗州州长在1917年总罢工期间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他根本记不起来该州法典中是否有童工劳动法规。早期仅有的一个例外是乌拉圭，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两度任总统期间（1903～1907年和1911～1915年）通过了一些法规，设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劳工部，确立了罢工权、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额、退休养老金和工伤事故抚恤金。而巴西当时则有一句名言：社会问题乃是“警察当局的事”。虽然某些政权（其中包括迪亚斯政权）偶尔也为解决一些具体争端做出仲裁；但多半是在1917年以后，特别是在1930年以后，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才为调节劳资关系和资本家自身内部的关系制定出较为全面的政策。

工人阶级的构成及其状况

早期工人阶级的种族构成情况各国、乃至各城市都很不相同。长期来，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的大多数工人一直是欧洲移民，多半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圣保罗还有大批葡萄牙人。外国人，特别是葡萄牙移民，在里约热内卢和圣多斯是劳动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还不占压倒优势。其他地方的欧洲移民就少得多，但西班牙人在古巴和智利的工人阶级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一些拉丁美洲的城市，特别是里约热内

卢和哈瓦那，以前的非洲黑奴及其后裔也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象墨西哥这样一些外国移民很少的国度里，国内移民所造成的影响同横渡大西洋前往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去的人们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南部工人阶级中的移民成分造成的一些影响最后也相当难以明辨。一些移民显然在来到之前就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少数领袖人物还在其母国的工人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积极分子中没有几个人认为，移民普遍具有高度的政治经验。实际上，有许多人强烈地抱怨移民缺乏革命传统、不问政治、不关心工人阶级组织。熟练工人和以前曾从事过工业劳动的人数比例似乎也不大；这也不奇怪，因为鼓励和组织移民是为出口农产品而服务。还有许多评论家认为，移民工人一般只顾眼前的经济收益，好尽快回国。因此，他们一心只想个人升迁的打算成了大规模组织发展的一种障碍。这些移民也不轻易投身以工人广泛参加选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战略。

种族杂多也令工人难以合作，雇主往往立即乘隙而入利用这种矛盾。敌对情绪不仅存在于各国别之间、外来者与当地人之间，也存在于来自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人（特别是意大利人）之间；这在许多情况下也妨碍了彼此的合作。这种种族敌对情绪干扰了工人运动数十年之久，由于工人之间存在着成见和文化的差异，致使罢工失败，组织被削弱、乃至遭到破坏。

然而，归咎于大量移民的存在而产生的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毕竟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才刚刚形成。各国工人在建立组织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困难更大；就是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中较之一般情况来得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困难也不小。种族敌对情绪和个人升迁的打算 334 对欧洲移民众多的地区工人运动所遇到的困难是有影响，但不是困难的成因。再说，类似的敌对情绪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国内移民中也有表现。虽然由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文

化和历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与此同时也由于缺乏将工人纳人现行社会秩序的习惯性历史制裁手段，工人阶级反抗和争取自主权所遇到的困难也就不那么大。移民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母国各地教士、地主和警察的控制；但在新世界要重新建立控制他们的类似形式就得花点时间，而且也就不那么严密了。

然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早期工人阶级来自移民出身，所以特别易于遭受某些形式的镇压。特别是1917年以后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发动的反对所谓外国颠覆的民族主义运动，削弱了这三个国家的工人运动。诸如巴西的民族主义同盟会和阿根廷的爱国者联盟这样一些组织大大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孤立了许多斗争最坚决的积极分子，普遍助长了驱逐出境和其他镇压方式的气势。在墨西哥民族主义的影响很不一样。那里只有少数外国工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工人；他们独占了铁路上和许多大型采矿企业中大多数工资优厚的岗位。再者，现代化纺织厂里的工头和其他管理人员一般也都是外国人；他们领取比大多数墨西哥工人高得多的工资，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迪亚斯政权同外国利益勾结，声誉扫地，无形中为一些反对派人士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武器。因此，外国工人和管理人员享有比较优惠的地位所引起的敌意大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

19世纪末以来，拉丁美洲大多数城市本来就不高的公益服务普遍水平远远赶不上人口的飞速增长。早期工人阶级遇到了居住拥挤、饮用水污染、卫生条件低下这样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弄得城市生活状况比刚刚来自南欧和拉丁美洲农村地区的大多数工人原来在家乡的生活状况并不见得优越。

绝大多数工人居住在简陋凄苦的贫民窟，各地的叫法不同：圣保罗称之为“科尔蒂索”(cortiços，直译为“蜂窝”)、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称之为“大杂院”(conventillos)、墨西哥

城称之为“客店”(mesones)。就是这些拥挤不堪的、卫生条件极差的住房，其租金还要花掉大多数工人很大一部分收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宜诺斯艾利斯大概有多至三分之一的工人居住在这种一间一套的简易楼里。在发展比较慢的城市里状况也好不了多少，1920年利马省42％的家庭只有一间住房。

恶劣的城市生活状况为城市公共卫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问题。1904～1912年期间，墨西哥城的死亡率(42.3‰)虽然比1890年代低，但仍比开罗（40.1‰）和马德拉斯（39.5‰）高。传染病时有发生，现有的卫生条件无法制止各种严重的疾病流行。

许多城市里工人集群同居一地，确实有助于促进某些形式的政治、社会团结。诸如圣保罗的布拉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拉博卡及巴拉卡斯这样一些住宅区成了很有名气的政治战斗堡垒，形成了某种工人阶级自治文化。随着有轨电车的发展，工人们居住得比较分散了，然而，1930年以前生活条件总体上并没有多大改善。

矿区和纺织城的工人受到了一些特殊形式的剥削。如果公司备有宿舍，企业主就可以用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恐吓手段，对那些不听话的工人及其家属作出即刻赶出宿舍的威胁。这种宿舍也可用作严格控制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1906年普埃布拉纺织工人罢工时提出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废除关于禁止居住在公司宿舍里的工人在未经公司允许的情况下接待来访者的规定；而这种不满情绪在别处是根本没有的。

公司内部商店（特别声名狼藉的是墨西哥和智利硝石矿区的公司内部商店）尤其令人憤恨。公司利用这些商店通过赊销的办法进一步控制工人和降低成本。欠条只能在这些商店使用，而这些商店又往往以高价盘剥：这样，企业主实际上就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赢利。这种极其明目张胆的剥削手段所引起的敌对情绪可能表现为十分狂暴的形式。1907年里奥布兰科罢工时工人们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放火烧了公司内部商店，不久该地其他纺织厂的内部商店也被焚毁。

336

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各行业的劳动条件差异很大，尽管熟练工人的生活大体上比非熟练工要好一些。然而，几乎没有一位严肃的评论家企图将20世纪初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工人的悲惨境地加以粉饰的。由于工会组织一般还很软弱，有些地方甚至还没有建立工会，而劳动力市场又没有订立什么规章，所以企业主大多竭力施行强制性十足的劳动管理制度。

大多数工厂都处于厂方独断专行的氛围下，管理人员滥用职权比比皆是；评论家们往往将这种情况比做监狱或奴隶制。企业主制订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竭尽全力驯服工人、控制劳动流程。这些规章规定了很高的、令人愤慨的罚款，就连小小的不当也要罚款，有些地方连上厕所这类事都要收费。这种蛮横的罚款轻易地掠夺了许多工人的很大一部分工钱。有些工厂还要工人赔偿损坏或磨损的零件和次品。此外，一天的工作时间又很长。1910年以前墨西哥工厂每周劳动六天，每天要劳动12～16小时。再者，企业主和工头还常常对工人（特别是对妇女和童工）进行各种形式的体罚，有时甚至[illegible]工。工人们经常抱怨拖欠工资或发放不定时和[illegible]

[illegible]

2[illegible] 和[illegible] 图 [illegible] 工[illegible]

减少到不足半数，20年代里雇工人数急剧下降，直到1930年代初硝石业最终崩溃。即使在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很多失去工作的工人也被遣返回西班牙和意大利，可见那里的失业率是很高的。统计数字零零星星，但估计1900～1914年间工资劳动者的失业人数有些时候达到1/5至1/4。就是在比较景气的时期和在经济动荡不那么激烈的情况下，整个拉丁美洲的失业威胁也是严重的。各地的工人几乎都是怨声载道，对经常随意解雇工人（那怕是对厂方的虐待稍作抗拒，就会遭到报复）深表不满。然而，在经济景气时期，工人们在难以采取集体行动时，往往大批转业他厂，以示抗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工人运动

工匠和其他工人起初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劳动条件而采用的集体组织形式是互助会。这种组织往往包括作坊主及其雇工。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几个大国大都有了这种组织。会员要定期交纳会费；互助会通常要在会员发生事故、生病或死亡时进行救济，有时也设法从事一些其他方面的福利事业。

墨西哥的手工业经济高度发达；互助会也特多，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里构成了工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员人数比拉丁美洲其他国家都多，活动范围也最广。在此期间，墨西哥城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里人数众多的小业主与雇佣工人分庭抗礼，实难携手组建共同的组织。但工人和老板尚能联合起来维护其行业的利益，而雇工晋升为作坊主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的。 338

在墨西哥的这种环境里兴起的运动主要体现了个体工匠和小业主的利益。这种运动持有平等、自由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指导着这一思想和策略的，通常是从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这一状态下产生的某种观点。各种无政府主义者（诸如出生于希腊的学校老师普洛蒂诺·罗达卡纳蒂及其集团）也在某些时期

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又一贯地特别反对与政府进合任何形式的合作。然而，在共和政府再建时期（1867～1876年）及迪亚斯政权初期，手工业者及其同情者的支持对各类政治人物非常重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反对进行合作，但这种合作的好处还是吸引了运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

1870年，"工人大同盟"开始在墨西哥进行活动。这一组织是个各自独立的组织（主要是各互助会）的全国协调机构。它发行了一份名为《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到1875年，它已在首都和一些州里拥有28个分部。无政府主义者起初控制着大同盟，但到1872年就失势了，该组织开始接受政府的资助。关于参加大选问题的争论和各政治派别之间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大同盟的分裂和衰落，70年代末完全停止了活动。该组织1876年还真召开了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而在1879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组成的继任机构却成了迪亚斯政权的工具。

19世纪70年代日趋频繁的罢工进一步分裂了运动。1872～1880年间，墨西哥至少有过21次罢工，有几次罢工是由某些互助会领导的其成员主要为雇佣劳动者。至少，这些组织已开始时断时续地执行了日后由工会承担的某些任务。大同盟曾在一些纠纷中试图在罢工工人与雇主之间进行调解。这种立场反映出了一个力图联络雇佣劳动者和个体工匠的运动本身所存在着的根本矛盾。由于许多个体工匠本人就是雇主，他们以一种不安心情注视着罢工斗争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

339

由于墨西哥在19世纪80年代里日益同世界经济相结合，早期工人运动解体了，再也不能协调小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相互矛盾着的利益。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态势下勉强生存下来的手工业者往往同迪亚斯政权达成妥协，而这种妥协不管怎么样对下层组织的参政没有什么好处。这样，独裁政权就将其主要的镇压力量用来对付相当孤立的雇佣劳动者，令其失去战斗力。初期工人运动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只是在墨西哥经济和政治制度的

某个特定的转变时刻才有所发展，没有留下什么直接影响。

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个体工匠和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比墨西哥少得多；一段时期里互助会几乎是唯一的工人组织形式。一些互助会的成员有时利用这种工人组织发动罢工；例如，1858年里约热内卢的排字工就利用互助会发动了一次罢工。大多数国家里明显超出纯互助功能的组织（当时通常称之为“抵抗团体”）的出现，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甚至更晚，即这些国家日益与世界经济的相结合和雇佣劳动力有所增长之际。（值得提一下的是，直到1888年巴西的奴隶制才废除。）19世纪70年代墨西哥曾一度出现过的全国性组织和全国性的工人代表大会等在其他国家通常已是20世纪的现象。

从19世纪40年代起，大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组织，不是在拉丁美洲的这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找到了支持者；傅利叶和其他人的欧洲信徒们还建立了几处试验性的垦殖区，然而，这类思潮在当地手工业者和工人（不管怎么说，当时工人阶级一般说来还是非常弱小的）中似乎仍未产生什么影响。

包括墨西哥、智利和巴西在内的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同第一国际建立了联系，尽管有的联系时间很短。然而，第一国际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分支组织在19世纪70年代初则开始了活动。流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巴黎公社社员1872年帮助建立了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紧跟着又成立了意大利支部和西班牙支部。1873年，各支部的人数总共约250人，但不久就分裂成了意见相左的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这些组织遭受了一定程度的迫害，到1880年代初也就销声匿迹了。 340

19世纪末开始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兴起的工人运动显然是吸收了世界其他国家工人的经验。然而，吸收外来的见解和学说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过程，这些见解和学说在拉丁美洲实践时有所变异和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些不同的政治集团。

无政府主义者差不多在拉丁美洲各国多少都有点影响，然而

其本身在战略和战术的应用上分歧却颇大。例如，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十分怀疑工会的力量；他们认为工会是个天生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组成志同道合的小组织进行活动，争取工人和其他人，以发动一次推翻政府、建设新社会的革命；但对新社会的概貌却有着不同的构想。另外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对工会的革命性表示怀疑，不过仍参加了这些组织；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提供了有用的宣传阵地，可以不时地对它们施加影响，将其斗争引向革命的道路。

广为人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起的作用更大。这一思潮19世纪末开始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因为，其支持者们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性质日益严重，而先前的无政府主义方式已失去作用。许多无政府主义思潮中突出的小生产者乌托邦无疑吸引着许多个体手工业者及其类似的社会集团，而无政府工团主义则是把某些无政府主义原则适应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条件。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有其策略上的软弱性（事实证明是非常软弱的），但是，拉丁美洲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基本上是个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学说。

虽然不同组织对接受和遵循无政府工团主义原则的看法很不一致，但中心问题通常是"直接行动"这一思想。激进分子认为"直接行动"就是工人阶级应该依靠罢工、破坏、抵制以及类似的方式作为武器，而不是通过包括各政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府机构谋求利益。例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工人参加大选只能强化资本主义秩序。他们坚决主张推翻政府，而不是控制政府。为此他们强调工会既是现阶段斗争的主要工具，又是新社会的核心。

341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本身对有关工会组织形式的一些问题认识差异很大。例如，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力主成立仅吸收少数富有战斗精神起作用的工会，批评那些打算置觉悟、信仰于不顾而要在本行业中吸收尽可能多的工人的人。还有许多人同他们的想法差不多；他们提出警告，不要成立那种可能削弱革命战斗性的工

会组织。他们打算成立不存在他们所说的那些诸如领薪水的行政人员、常设工作人员和罢工基金的官僚主义与极富改良主义特色的组织。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理论上往往主张成立产业工会组织，而不主张成立行业工会组织，后者则通常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这些工会必须在地方上组成联合会，以抵制“阶级合作主义”倾向，协调在那个地区的行动。这些联合会然后再组成省级和全国性组织。然而实体上，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里镇压非常严厉、组织内部分歧又很严重，那些设法生存下来的、相当复杂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通常只接受了上述一部分原则。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要求通过革命总罢工摧毁现行秩序。有时说这种罢工具有群众武装起义的特性；然而有时又说这种罢工是个比较和平的运动，这种运动非常广泛，政府镇压不了。然而，局限于经济目的而举行的罢工提出了一个有点复杂的战略问题。 342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虽然通常坚持，这种斗争保证不了工人经济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但实际上往往还是支持这类罢工的，他们把它看成是“革命演习”。他们认为，虽说所取得的经济利益不久就会失去，但工人在这类斗争过程中会逐渐了解到自身的力量，逐渐培养起团结战斗的精神。

即使许多工会和一些全国性的联合会确认了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也难以测定这些学说的实在影响。使用1917年以前世界许多地方革命者共同的思想和语言发表宣言和工人实践行动之间的距离往往是相当大的。激进分子们明确认为，参加赞成“直接行动”的工会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工人想要实践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的原则。再说，加入工会的工人只是全拉丁美洲工人阶级中的很少一部分。

例如，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工人运动史上不乏同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假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也不乏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的罢工。反之，典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行动事例也不少；无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一些总罢工和其他时刻里动员起了相当多的工

人。再说，无政府主义者的大量出版发行工作（包括日报和广泛的文化活动安排）在没有广大工人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是维持不下去的。虽然许多工人可能并不那么看重复杂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学说，但这一学说的各种理论和主张却几乎都是表达工人阶级意识及重大实践的主要方面的。

无政府工团主义决不是早期工人运动的唯一潮流；而实际上这一学说的革命色彩和无政府主义色彩有时淡化多了。非常明显，阿根廷出现了一股不同的工团主义思潮，里约热内卢和其他地方也兴起了大致相似的运动。工团主义者虽然受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某些基本原理（特别是工人至上思想和赋予工会最高权力）的影响，但还是非常注意着力于赢得眼前经济利益的。工团主义者虽然没有明确地放弃革命大罢工的观点，但实际上倾全力于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且他们在认为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显得非常愿意同政府谈判，甚至进行合作。

343

除少数情况外，社会主义相对说来并没有在拉丁美洲取得多大进展。社会民主党人的战略基础是工人参加大选；但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成分以及政府的性质使得这种战略在大多数国家毫无希望。阿根廷社会党最有影响，它从1896年成立起就遵循着一种非常温和的议会改良主义政策，但几年后同工会的关系就相当冷漠了。社会党在阿根廷1912年作了选举程序变革后的选举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对大多数工人的影响还是很小的。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912年，奠基人是老革命活动家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该党采取了一条改良主义色彩不浓的路线，虽说在选举中没有取得多大胜利，但赢得了大多数工人的支持，特别是在北方。智利社会党人在促使该国主要劳工联盟之一的智利工人联合会1919年以后走上反资本主义道路方面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许多国家的一些工会也声称不受任何政治学说制约。一些被其对立面称之为“黄色工会”的组织是公开打出保守派旗号进行活动的，它们往往得到教会或公司的赞助。特别是在1891年颁发

了《新事物》通谕以后，天主教会竭力抵制革命运动、甚至改良运动在工人中的开展。然而，总的说来这些政策和保守思潮在工人阶级中到底有多大影响仍不清楚。

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抵抗团体，而组织这些抵抗团体的工人通常是熟练工匠。他们组织的行业工会和此后不久成立的非熟练工人工会，活动的开展往往是一阵阵的，通常是在经济发展周期中顺利的时刻进行活动。经济发展时期，失业率比较低，工人往往能成功地得以组织工会，为改善物质条件而举行罢工。而在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时期，工人运动往往受到严厉的镇压，许多经济利益和组织权利亦得而复失。然而，集体的经验增长了，其他方面的目标和策略都有所获，工会组织往往在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工人中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到1920年，几个大国的城市各行业很少没有成立起工会的。

344

大多数国家中主要的工人阶级组织形式仍然是地方上的行业工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工人工会也越来越多了。但这两种类型的组织都不怎么着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更多地吸收为数不多的本行业工人入会；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劳工市场和政府的政策使工会处于相当虚弱的状态。工会会员人数大起大落，组织经常是成立了又解散。然而在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里，确实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全国性的、省级的和地方上的工会联合会。再者，工会动员工人的能量往往远远超出相对说来比较小的交纳会费的正式会员这个圈子。

力图成立不同于工会的其他形式的组织尝试没有获得什么成功。1917～1919年间，圣保罗引人注目地成立了包括各行业工人在内的街道联合会；但在那些年的总罢工之后政府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大多数这类联合会解散了。除阿根廷和乌拉圭外，政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一直到1917年以后仍然是很小的。

罢工成了工人反对其雇主和政府的最为强有力的武器。早期的罢工运动在其要求上往往多半是防卫性的，工人只是力图防止

降低工资或增加工作日。这些运动还常常反对一些特殊的工作条例、不按时发工资、工头为非作歹之类的事。这些早期罢工的特点是局限于很少的一部分工人，往往是在相当不利的情况下自发进行的。后来，防卫性的罢工虽然从未绝迹过，但罢工的范围日益广泛，组织得也更好，并逐渐提出诸如减少工时、增加实际工资和承认工会等要求。声援其他工人的罢工在大多数国家里也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

即使是非常温和的罢工要求也往往招致极其严厉的镇压；大345规模解雇罢工者在一些国家里也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强有力的工人运动要真正赢得罢工胜利，也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有关的统计资料很少；然而有报道表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1907～1913年期间举行罢工1,081次，获胜率为30％，取得部分胜利的占10％。

早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和其他一些城市就曾多次爆发过全市性或全地区的总罢工，并不只一次使这些城市陷于瘫痪。有几次总罢工的爆发按原订的计划往往是为了抗议镇压行动，抑或是为了利用出现的有利时机以争得更多的权益；然而许多次罢工运动超出起初的范畴，多少是带有自发性的。当时的总罢工虽然动员了许多人，但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几乎总是很少，而且十分短暂。

除了罢工，工人们还进行抵制、怠工，有时还进行破坏活动。消费者运动动员起了相当多的居民，有时还包括中等阶级人士，降低生活费用运动具体成果很少；1905年圣地亚哥发生的一次运动导致了一次对示威游行者的大屠杀。一些国家里要求降低房租的罢工曾取得过一些暂时性的胜利。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十多万人参加了一次规模最大的这类运动；然而此后不久，镇压和住房的奇缺又导致房租不断上涨。

各国工人运动专史描述了19世纪最后20年、特别是20世纪头10年里所采用的非常不同的策略和组织形式及其所取得的差异

悬殊的成果。阿根廷、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的工人运动值得分别论述。中美和南美北部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通常还很弱小并且四分五裂。

最为强劲的工人运动兴起于阿根廷；那里19世纪80年代末发生了首次大规模的运动浪潮。8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实际工资的下降使罢工次数增多（1889年至少发生了15次罢工）和诸多工会的成立。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些新组织中起了积极作用。实际上是1885～1889年间流亡在阿根廷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为面包工人工会与另外一些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会起草了章程。这时在工人运动中有重大影响的是社会党人；而同时也出现了别的思潮。例如，1887年火车司机及司炉组成的"兄弟会"从一开始就专门致力于为其会员争取眼前的经济改善。在美国铁路员工兄弟会的榜样影响下，这个工会在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成了阿根廷工人运动中的一支强大的、具有战斗力的队伍，然而它一点革命性也没有。工人中这些学说的分歧使得1880年代末两次谋求组成工会联合会的尝试归于失败，而1890年阿根廷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许多刚成立不久的工会土崩瓦解。然而19世纪90年代中期情况有了好转，到1896年至少有26个工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活动。罢工又大大开展。

346

20世纪头十年里，阿根廷的工人掀起了一股特大的工人运动浪潮。不仅许多部门首次团结一致成立了联合组织，而且罢工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例如，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发生了231次罢工事件，约75,000工人参加罢工。为了对付工人运动，政府在1902～1910年间下过四次戒严令，还颁布了两大镇压性法令：居留法（1902年）和维护社会法（1910年）。

尽管政府严厉镇压和工人运动内部严重分裂，布宜诺斯艾利斯、罗萨里奥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仍举行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总罢工。有些罢工（如1902年首都的总罢工）开始时只是工作条件方

面的纠纷，但不久就扩展到了其他行业的工人，致使全城陷于瘫痪。1904年和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人为声援罗萨里奥工人举行了两次总罢工。1909年，为了抗议警察屠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示威者，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举行了一周举世瞩目的大罢工，并迫使政府作出了一些让步。1910年纪念阿根廷独立一百周年期间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特别惨酷的镇压。

19世纪90年代里曾有过数次谋求成立全国性劳工联合会的尝试，但都失败了；然而在1901年终于成立了代表首都和内地27个工会的"阿根廷工人联合会"。可是，骨干分子间在新组织的战略和策略上的分歧一时难以弥合。社会党人和许多其他非无政府主义者1902年退出了"阿根廷工人联合会"，翌年另立一个组织"劳工总同盟"。据说，1903年"阿根廷工人联合会"有3.3万会员；"劳工总同盟"的成员是7,400人。

347

"阿根廷工人联合会（1904年改称"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断加深；与此同时，一般明显的工团主义思潮开始在"劳工总同盟"中形成。工团主义者对社会党人的稳健不满，又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手段无效，1909年另外成立了一个新组织"阿根廷区域工人联合会"。工团主义者在码头工人和其他重要出口经济部门中的势力特别强；他们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为争取眼前经济利益所举行的极富战斗性而规模又有限的罢工策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与"阿根廷区域工人联合会"曾多次谋求合并，但均未成功；到1914年才联合起来。然而，工团主义者在1915年举行的"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控制了这一新近联合起来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于是退会，另立名为"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五届派)"遵循1905年"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工团主义组织则因肇始于1915年的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而被称之为"阿根

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九届派）”。工团主义者继续吸引着追随者，但在伊里戈延政府时期（1916～1922年）则开始同政府进行暗中合作。这就是说，作为对大选中支持激进党的报偿，政府有条件地不让警察干涉罢工，有时还调解劳资纠纷。到1918年，“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九届派）”声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8万会员，占全市工人总数的1/5至1/4。

虽然内部分歧（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削弱了阿根廷的工人运动，但它在拉丁美洲仍然最最强大，并影响着乌拉圭、智利、秘鲁和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不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无政府主义日报《抗议》及其他出版物发行到了阿根廷以外很远的地方，而且“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的榜样于本世纪初在美洲大陆被当作衡量积极分子的标准。

20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智利的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时期。抵抗团体在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一些行业和码头工人中兴起来。1903年瓦尔帕莱索海员罢工采用直接行动斗争策略取得一些胜利——尽管这次罢工受到的特大的镇压，造成100多人死亡——使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新工会中已有的相当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05～1907年间发展到了顶点，涌现出了大批新的抵抗团体，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至少发生过65次罢工。

348

智利北部矿区的阶级结构特别单纯；在上述同一时期里那儿成立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联谊会”。这种团体是互助会和工会的混合体，是按地区、而不是按行业成立的组织。联谊会主要是由硝石矿工和运输工人组成的，将熟练工人和非熟炼工人团结在一道，使自己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和极富战斗性的组织。然而，在严厉镇压和严重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智利的抵抗团体和联谊会1907年以后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才恢复活动。

巴西虽然早期有过几次罢工和一些工会活动，但到19世纪90

年代工人运动才开始在比较大的规模上开展起来。20世纪初里约热内卢爆发的工人运动使巴西首次在1903年发生了全市性的总罢工。这次运动开始时是纺织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但罢工很快就扩展到了其他行业。运动高潮时，罢工人数达4万，使城市完全瘫痪了20天，最后取得了一些胜利。

圣保罗首次总罢工发生在1906年。圣保罗铁路雇员举行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资方滥用职权。其他行业的工人不久参加了罢工行列；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抗议镇压。结果是政府极其残暴地镇压了这次罢工。1907年，圣保罗各行业的熟练工人利用经济增长之机，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总罢工；许多行业工人在总罢工中赢得了一天工作八小时的权利。然而，在接着的经济萧条时期，雇主得以再次延长工时；而且大多数新近成立的工会也解散了。巴西工人运动尽管在1912～1913年期间有所复兴，但只是到1917年才开始再次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349 然而，工人已在组织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1906年召开了巴西工人首届全国代表大会，有全国各地28个组织的代表出席。大会决议采取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代表们选举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巴西工人联合会”。该组织1908年开始活动。“巴西工人联合会”促进全国范围的信息交流，并竭力协调行动，然而其自身的存在却一直很不稳定。1913年召开了第二届工人代表大会，有59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代表们在大会上重申了上次大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

在墨西哥，尽管迪亚斯政权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但1876～1910年期间至少发生了250次罢工。某些类型的工人阶级组织竭力谋求存在下去，铁路员工中的这些组织特别引人注目；但政府通常镇压那些表现出强烈战斗性和超越互助活动范围太远的组织。政府有时缓解了暴力行动，作出安抚的姿态，力图拉拢政府的特别调查委员会还对一些劳资纠纷作出仲裁。

然而，迪亚斯政府打击敌对力量毫不手软，对与里卡多·弗

洛雷斯·马贡有联系的激进分子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特别镇压行动。这批人1900年开始出版发行报纸《新生报》，后来组成了"墨西哥自由党"。他们遭到追害，大多数领导人流亡美国。虽然墨西哥继续搜捕和追害，但流亡者还是设法同国内各个工人阶级组织建立了联系。墨西哥自由党广泛地包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迪亚斯力量，其1906年党纲采取了一种相当自由、改良的立场。人们认为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以及他的一些同志受到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影响相当大；然而这一点在1910年以后他们的文章和行动中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墨西哥自由党在墨西哥工人中到底有多大影响还有争论，然而与该党关系密切的激进分子在迪亚斯政权后期两次影响最为巨大的劳资冲突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第一次冲突爆发在索诺拉州卡纳内阿一家美资大铜矿上。令工人们感到愤怒的是，他们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特别在工资方面，他们的工资比外国人少得多。1906年，工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墨西哥自由党组织者的影响，宣布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公司拒绝工人的要求，并采取暴力行动，至少枪杀了18名墨西哥人，还伤了许多人。公司为了控制局势，从边界那面的亚利桑那州调来了275名武装人员。卡纳内阿罢工成了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外国人杀害了墨西哥人，甚至使政府在一些保守的支持者中也丧失了信誉。 350

同年晚些时候，普埃布拉纺织工人举行了罢工，反对强制实行严厉的工厂新法规。罢工导致了全国纺织厂主都关厂停产，迪亚斯最后亲自出面仲裁这次纠纷。然而，许多工人拒绝仲裁决议，一些人还在1907年1月7日于奥里萨巴附近的里奥布兰科纺织厂实际发动了一次起义。同情墨西哥自由党的组织者头年就在奥里萨巴地区活动了，然而起义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被迫离开了那里。众所周知，政府极其残暴地镇压了里奥布兰科起义。

里奥布兰科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迪亚斯政府。同许多现代化的纺织厂一样，里奥布兰科工厂是家法国资本开办的工厂；而政府为了保护外国利益再次屠杀了墨西哥人。再者，政府想通过支持驯服的工会领导层来对付工人日益增强的战斗力这种并不太热心的尝试已越来越不可信了。政府虽然在采用加强迫害的手段使墨西哥自由党中比较积极的成员脱离工人阶级而陷于孤立的方面自1906～1907年以后做得很成功，但工潮在1911年迪亚斯垮台的整个过程中继续不断地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进行着。虽说产业工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对推翻迪亚斯政权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迪亚斯政权时期产业工人已大大发展，他们的不满削弱了这个政权。

墨西哥与受政府控制的工联主义之缘起

1910～1930年期间，墨西哥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在某些方面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不一样。在墨西哥1910年爆发的长期内战期间，城市工人是一支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工人运动虽然远非是统一的，但对于各种正在竞争的政治派别却是一种大有潜力的同盟者，对那些谋求掌握政权的派别又是一种威胁。工人运动与政府机构紧密相联这一最终结局，是1930年以后一些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所作的种种安排的前兆。

351

1911年，迪亚斯政权垮台，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政府掌权。在马德罗执政的短暂时期里，墨西哥自由党和其他党派继续受到迫害，而工会却广泛地组织了起来，还举行了罢工活动。1912年，墨西哥城的工人成立了“世界工人之家”，成为首都工人运动的活动中心。支持“世界工人之家”的主要是工匠、熟练工人和服务行业的工人，同产业工人的联系仍然很少。“世界工人之家”包括了一些不同思想的代表，然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似乎广泛些，特别是在该组织成立的最初几年里。

“世界工人之家”同墨西哥城整个工人阶级一样，饱尝了变幻莫测的武装斗争之苦。许多激进分子逐渐放弃了原先反对参与政治的立场；1915年2月，“世界工人之家”同由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和阿尔瓦罗·奥夫雷贡领导的立宪派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世界工人之家”组成几个战斗队（即著名的“红色大队”），同萨帕塔和比利亚的农民作战。而立宪派则允许“世界工人之家”的成员在其控制的地区组织工会，并保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地位，还保证支持工人在同其雇主发生矛盾时所提出的“合理要求”。

许多工人认为这一协议违背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原则而表示反对；另外一些工人则认为这一协议不过是个暂时的策略手法。但对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集团来说，这一协议却是迈向同当时在武装动乱中涌现出的新政权进行合作的重要的第一步。再者，立宪派的反教权主义、民族主义立场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张同“世界工人之家”主要成员的观点是一致的。虽说“红色大队”所起的军事作用并不大，但它们的合作却在关键时刻成了使立宪派合法化的一个重要支柱，为卡兰萨领导着一个广泛的多阶级同盟这一概念提供了支持。“世界工人之家”还利用立宪派军事指挥员给它提供的机会，成立了许多新工会，使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其发祥地首都的范围。

然而到1916年，立宪派基本上消除了来自敌对集团的严重军事威胁，但却面临着罢工运动的麻烦，所以开始限制工人运动的权利。卡兰萨1月份解散“红色大队”，过后不久即开始迫害并逮捕了“世界工人之家”的许多成员。在严重通货膨胀时期，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1916年7月动乱开始了。这时，“世界工人之家”号召首都总罢工，要求用黄金或其等值的纸币支付工资，因为立宪派发行的纸币不断急剧贬值。卡兰萨认为这次规模广泛的罢工是对其政权的直接威胁，竭力使用大规模暴力手段——戒严令和死刑威胁——进行镇压。1916年总罢工的失败表明了直接 352

行动主张的严重失误，这一严重的失误再加上卡兰萨政府的不断镇压，大大强化了工人运动中倾向于通过与政府进行政治交易和合作以求改善状况的那些思潮。

在1917年制宪大会上，代表们否决了卡兰萨关于劳工问题的保守提案，通过了替代的提案，即第123条中有关工人及其组织的一些规定。新宪法在其众多的条款中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工种作了限制，对雇主解雇工人权力加以某种的限制，并对最低工资、分红制和工伤事故赔偿等原则作出了保证。第123条还规定关闭公司内部商店和废除债务劳役制。此外，该条还宣布，即使在是非难以明辨的某种情况下，工会甚至罢工也是合法的；该条并为解决劳资冲突的仲裁和调解制度制订了主要原则。政府在确定工会和罢工的合法性及调解劳资纠纷上拥有从前没有过的广泛权力。事实上，1917年宪法中有关劳工的条款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甚或更晚才履行了一部分（例如，分红制到60年代才执行）。墨西哥各地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有些州政府试图执行第123条的规定，而有些则不然。

1917年宪法有关劳工的条款大体上保证了工人的某些最起码的物质条件，同时又取消或限制了工人赖以表达自己政治、经济意愿的自治的机构（如独立的工会）。第123条以及类似的措施企图通过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保证阶级合作、完成资本积累。这一政府机构竭力在劳资之间进行斡旋，并以此来抑制阶级斗争。拉丁美洲其他一些国家后来也规定了类似的政治、经济条例。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是墨西哥第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918年在萨尔蒂略召开的、由科阿韦拉州州长主持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新建组织从一开始就在以路易斯·N·莫罗内斯为首的一小批劳工领导人的控制之下，20世纪20年代里成了政府控制劳工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的一些人曾是“世界工人之家”的积极分子，但到1918年却开始执行政

治协商和温和改良的政策。1919年，莫罗内斯及其一伙组成一个政党“墨西哥工党”，支持奥夫雷贡将军竞选总统。在奥夫雷贡执政期间（1920～1924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为其许多成员争得了物质上的改善。这一组织同“墨西哥工党”一道成了奥夫雷贡政府中比较强大的力量之一。实际上，“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已经成了政府的得力助手，帮着维持秩序，制止未经许可的罢工，削弱、乃至摧毁对立的劳工组织。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日益增长的影响遇到了挑战。1921年，一大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见下文）以及其他一些反对“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政策的人组成了“劳工总联合会”。估计该组织成立时代表着全国1.2万～1.5万名工人，是个相当大的队伍。（应用对比是不可靠的，主要是因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人数被过份夸大了；该会1921年声称拥有15万会员，但其中有40%的人是其附属的农民组织的成员。）1922年以前，“劳工总联合会”宣称它基本上采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立场；而共产主义者主张直接行动，反对政治参与，不久就脱离了该组织。在“劳工总联合会”领导的纺织业和其他行业的罢工中，同“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冲突往往与同雇主的冲突一样激烈、一样狂暴。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对付其他工会所使用的伎俩包括在劳资纠纷期间派人到工厂破坏罢工和成立得到政府、甚至雇主支持的对立的分会。“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还继续保持了自己的武装小分队，用以袭击敌对集团。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武装小分队要对不止一次的政治暗杀负责。由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能够得到警察和政府机构其他部门的帮助，其用以削弱敌对组织的手段（可能还包括给予那些愿意合作的人以各种好处）都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354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权力在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担任总统期间（1924～1928年）达到了顶点。该组织在此

之前不久，即1923～1924年德·拉·韦尔塔叛乱时期，曾向韦尔塔政府提供军队和其他形式的支持，给了它决定性的帮助，从而加强了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在卡列斯竞选总统期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甚至宣布他为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卡列斯一上台就任命莫罗内斯为工业、贸易及劳工部长；"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及其"工党"的一些成员在政府和议会中担任了其他重要职务。"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发表声明，主张"劳资和谐团结"、形成"一种信任企业家和外国资本家的风气"。该组织发表这样的声明使其已经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腐败堕落和盗匪行径更加昭然若揭。"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一贯的反共立场以及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亲密联系进一步表明了它对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支持。1928年，该组织自称拥有200万会员。这是一个过分夸大了的数字。

然而，在挑选卡列斯的继任人的复杂斗争中，莫罗内斯及其一伙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一度想推出莫罗内斯亲自出任总统而且几乎直到最后的时刻仍反对再次选举奥夫雷贡为总统，尽管后者在联合会会员中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普通会员、甚至一些领袖人物对"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妥协让步、一味联合和缩手缩脚日益不满，发展到顶点，以致1928年7月企图谋杀奥夫雷贡。虽然一直没有查到证据，但许多人还是认为莫罗内斯本人可能插手了暗杀行动。

在埃米利奥·波尔特斯·希尔临时执政期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内部分裂，丧失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928年以后力量大大削弱。这时，不仅执行委员会反对莫罗内斯及其一伙，而且政府也逐渐采取了解决劳工问题的新政策，例如，1929年成立了一个新的执政党；1931年颁布了十分强调阶级合作的联邦劳工法。根据这一新法，"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1928年以前所拥有的许多职能从此以后就直接由政府机关承担了。政府机关开始控制工会的注册登记和劳动合同的性质，并决定罢工行动方针和进

行强制性仲裁。

战后的工潮（1917～1920年）

除墨西哥外，1917～1920年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爆发了空前未有过的工人运动。许多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许多地区和行业的工人首次开始组织工会，进行罢工和采取其他行动。这些年引人注目的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后斗争的进程。当阶级斗争日趋紧张，达到一个新高度时，工人运动、企业家和政府都开始根据其1917～1920年间的经验重新制订各自的战略。

大规模的罢工和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源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拉丁美洲工人阶级造成的苦难。国际贸易的崩溃和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随之发生的经济混乱一开始就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和生活费用急剧上涨。由于进口食品和原材料在本地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各地区不尽相同，由于提高农产品出口而导致供本地消费的粮食生产下降的程度各地区也不尽相同，所以战争对工人阶级的具体影响各地区也就有所不同了。一般说来，工业制成品进口的中断促进了拉丁美洲工业的发展，战争后期许多地区的生产已大幅度增长了。虽然企业家们利用垄断的机会获利甚丰，但工资仍远远低于不断上涨的生活费用。然而，1917年左右一些国家不正常的经济发展为工人运动提供了比战争爆发前所存在的更为有利的条件。

俄国革命的影响在1917～1920年间拉丁美洲的事件中也起了作用。虽然传自俄国的消息既零星又失真，但仅革命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大大鼓舞了激进分子，并使大多数统治集团始终惊恐不已。迪亚斯垮台的消息以及墨西哥随后的斗争产生了类似的影响。1918年以后，有关德国、匈牙利、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爆发革命的消息充满了劳工报刊。拉丁美洲这个时期的总罢工虽然还远远不是造反行动，但却是在充满着盼望及惧怕世界革命的氛围笼

356

罩下发生的。

257 1917年7月圣保罗爆发的总罢工肇始于一家大型纺织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举行的罢工。在那经济普遍艰难的环境里，罢工运动蔓延到了其他行业。警察枪杀了一名游行示威者，为他送葬的队伍穿城而过，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总罢工。约有4.5万人停止工作；政府有几天实际上失去了对圣保罗的控制；而许多事件的发生有可能使得警察和军队顾不上向罢工工人开枪。发生了一些抢劫事件，特别是抢劫面包店、货栈和至少一家大型面粉厂，人们指控这家面粉厂主囤积面粉不供应市场。

工人们组织了"保卫无产者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成，提出了一系列广泛而又相当温和的要求。有几项要求是敦促政府采取诸如降低房租和食品价格之类的行动。这类要求足以稳住一些中产阶级对运动的支持，但同无政府工团主义学说并不一致。"保卫无产者委员会"通过一记者委员会同州长进行谈判（以表明未同政府直接进行接触），最后商定普遍增加20％的工资、政府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改革一事很快就置诸高阁了）。增加20％的工资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却是罢工者的重大胜利；此后掀起了广泛成立劳工组织的浪潮。

这次罢工也扩展到了圣保罗州的内地，并触发了后来里约热内卢的七月总罢工。里约热内卢的工人赢得了一些胜利；许多行业普遍开始成立工会组织。不但是七月罢工的规模有点出乎巴西政府的意料，而且紧接着开展的大规模成立工会组织的运动也使企业家们及其一伙十分惊慌。

1917年9月，政府强化了镇压机器，开始关闭工会，采取大规模逮捕、流放行动。1918年期间，警察行动在戒严状态下一直没有中断；1919年巴西许多地方掀起罢工新浪潮时，工人运动遭到了格外残酷的迫害。

虽然1919年期间圣保罗和其他一些城市工人力图将赢得部分胜利的总罢工坚持下去，但大规模镇压的后果越来越明显。不光

是流放使工人运动失去了许多最有能力的积极分子，而且内部关于战略和策略日益加深的分歧使工人运动陷人很大混乱。右翼民团组织和强化了的反对所谓外国阴谋集团的运动又进一步削弱和孤立了工人及其组织。1920年总罢工的计划失败了；经济形势日益恶化时期的这一失败标志着巴西早期劳工史上篷勃发展时期的结束。

1917～1921年期间，阿根廷甚至发生了更大规模的运动。仅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每年就有10多万工人参加罢工；1919年是高峰年，有308,967名工人举行了367次罢工。

1919年1月发生了规模最大、最激烈的骚乱。这就是有名的“悲惨的一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金属制品厂工人罢工期间，纠察队同警察发生冲突，结果4名工人死亡。紧接着暴力行动扩大到了全市；警察向参加被害工人葬礼的群众开枪，打死了20个人。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总罢工。这是1910年以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第一次大罢工。军队、警察和民团组织同工人进行了巷战；据报道，至少打死了200人。一些主要的工人联合会都支持总罢工；但在它们发表声明支持之前，总罢工实际上已经展开。其实，并没有什么迹象说明工人阶级组织在“悲惨的一周”里的行动，是有计划或协调一致的，尽管有人散播布尔什维克的阴谋之类毫无根据的谣言。这种谣言只是真正要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工人阶级团体实行大屠杀的一种借口。工团主义者最后以释放全体被关押的工人和接受金属制品厂工人原先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为条件，通过谈判同意停止总罢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一谈判结果，但也难以使罢工继续下去。

右翼“爱国”团体在镇压工人运动的活动中表现积极，在1919 358 年的事件中显示了强大的实力。它们会同其军、民盟友，帮着阻挠伊里戈延同工团主义者建立密切联系的企图。1921年，政府在保守势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在码头工人罢工期间公开镇压工团主义者，工团主义者筹谋的总罢工计划归于失败。阿根廷工人运

动内部继续存在重大分歧；2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削弱了整个工人运动。

1917～1921年期间，智利的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至少发生过229次罢工，其中有92次发生在1919年。反对生活费用上涨的运动吸引了广大群众，1919年在圣地亚哥就动员了10万人。1919年，纳塔莱斯港的码头工人和包装厂工人举行了一次短时间的起义，一度占领了城市，后遭到军队镇压。

政府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特别是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智利分会进行了最残暴的镇压。“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智利分会在瓦尔帕莱索组织码头工人的工作方面很有成就。1921年，政府又在圣格雷戈里奥对硝石矿工进行大屠杀。1920年底智利开始的经济萧条大大加强了雇主的地位。1921年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关闭工厂行动，并力图取消工人在1917～1919年期间的罢工运动中赢得的权益。然而，雇主的胜利远不是决定性的。虽然许多组织削弱了，有些组织甚至解散了，但从总体上看，智利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增强，顶住了企图摧毁它的妄想，其成就大大超过了1905～1907年大发展以后遭到镇压和经济危机期间所取得的胜利。

1917～1920年间，在一些战前工人运动规模很有限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运动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1918和1919年间，古巴的码头、铁路、建筑以及一些其他行业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1918～1920年间，相当激烈的罢工浪潮席卷了哥伦比亚。1918年巴兰基亚和卡塔赫纳的码头工人罢工以及圣玛尔塔的铁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一些胜利。1919年，波哥大的一系列罢工发展成了11月份的总罢工。厄瓜多尔爆发了矿工和码头工人的罢工。1919年1月，秘鲁利马的工人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总罢工，许多工人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然而同年5月利马和卡亚俄爆发的另一次总罢工却失败了，约有100人被杀害。

359

20世纪20年代的工人运动与共产党的诞生

1920和1921年间，战后的经济萧条冲击着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致使长期开展的工人运动停顿下来。然而，在1917～1920年期间，工人阶级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是空前的。这使20年代期间劳资之间斗争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统治集团，至少在当时，对工人阶级骚动的范围之广感到震惊。此后，它们强化了镇压机器。镇压更有组织、更严厉了，使用了诸如开列黑名单一类更为有效的手段；同时还继续使用消灭肉体的野蛮暴行对付工人。让我们举个十分残暴的例子：1925年，智利当局在拉科鲁尼亚的一次劳资纠纷中就屠杀了数百名硝石矿工。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研究采用控制工人阶级的其他手段。体制革新通常至少包括某种程度部分的社会改革，企图以此与确立政府对劳工组织进行控制的新方式互相配合。这些方案绝大部分直到1930年以后才得到落实，但其根源主要还是肇始于1917～1920年期间的诸事件。

在20年代里已有几个国家开始试图，建立或支持那种替政府效劳的工会，但没有一个工会取得过像墨西哥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那样的成就。像阿根廷的伊里戈延（1916～1922年、1928～1930年）、巴西的贝纳尔德斯（1922～1926年）和智利的伊巴涅斯（1927～1931年）这样一些极不相同的政权都在不同的时刻为达到竞选或其他目的而设法拉拢工会。例如，智利劳工法典（1924年通过，但到1927年才开始执行）制订了一条战略措施；拉丁美洲其他许多国家1930年以后都采用了这条战略。智利劳工法典允许工会存在，但严格限制其自主权和发挥作用。禁止成立全产业工会联合会；并规定，罢工行动和对工会及其经费和选举的合法承认均须由政府控制。1930年以前，巴西和阿根廷打算采

360

用全国的劳工法这一企图没有成功；部分原因是由于保守派的抵制，但以阿根廷为例，也因为工人运动已扎实地动员了起来、反对采取这一措施。

20年代，大多数政府为了缓解工人骚动，有时是为要对付大选的压力，大都通过或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法规。雇主们往往反对通过社会法规，然而许多特别条款实际上有助于约束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有利于资本积累。通常规定的措施包括工作日的时限、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规则以及工伤事故的补贴。一些国家还通过了管理工厂劳动条件、养老金和节假日的法规。这个时期的社会法规尽管付诸实施的往往很有限，而且时断时续，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雇主们的一些最恶劣的专横行径。

20年代期间，很多工人运动也调整了战略和策略。虽然工人们从前赢得的权益并没有在20年代初不断失败和严厉镇压中完全丧失，但对工人运动现行战略、特别是对总罢工的不满的人越来越普遍。许多积极分子认为1917～1920年斗争有形的成果微不足道，特别是考虑到运动的规模和所付出的代价，更令人感到得不偿失。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严重危机时期。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的思潮在一些国家中盛行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所执行的政策引起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越来越促使这些工人运动争取政治目的。政治参与及谈判似乎提供了新的、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列宁主义政党也出来同1917年拉丁美洲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作斗争了。

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鼓舞着整个大陆的积极分子。然而，早期的共产党由于内部派别纷争、加上受迫害的影响，损失严重。除智利外，至少一直到20年代的后半期，共产党还是比较弱小，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有限。然而，20年代期间，共产党在某些方面361 的确做出了成绩，例如，在以前没有组织起来的集团中建立了工会或农会，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墨西哥、秘鲁和智利的一些地区成立了农会，在阿根廷和智利的白领工人中成立了工会。

与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反，共产党人力图在党的领导下将目的在于参加竞选和组织工会（包括注意眼前的经济利益）这两种战略结合起来。共产党人还强调帝国主义是主要障碍，工人阶级必须同它进行斗争。他们认为，工人运动可以利用本国资产阶级同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暂时的联合，推进长期的革命运动。因此，共产党人有时支持竭力制止外国对本国经济进行渗透的民族主义政府。反之，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则认为本国资本与外国资本没有什么区别，并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共产党的战略在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早期更是如此；但总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拉丁美洲社会是封建性质的，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历史阶段（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逐步前进，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时期里具有进步性。这种分析导致了旨在加速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工业化的战略。

20年代末期之前，除墨西哥外，共产国际很少注意拉丁美洲。但1928年以后，共产国际步入了众所周知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持续到1935年采用人民阵线的策略为止），并为坚持其新的、不妥协的"阶级对抗"路线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这一政策反对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以及其他一些行动；例如，这一政策在拉丁美洲的执行致使巴西的一个有所作为的选举阵线"工农集团"（见下文）归于解体，并使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脱离当时的工人组织，另立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联合会。1929年，共产党人在蒙得维的亚召开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拉丁美洲工会联合会"，打算使其成为全大陆性的工会联合会，此后不久，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首次联席会议，1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回顾了共产党在整个地区所起的作用，并决定使自己的工作同"第三阶段"的政策保持一致。 362

1919年，拉丁美洲第一个共产党在墨西哥从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团体中脱颖而出。印第安民族主义分子M.·N·罗伊

在布尔什维克党人迈克尔·鲍罗廷（当时他主要在驻墨西哥贸易使团工作）鼓励下组织了这一新党。该党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极其摇摆不定。其部分原因是变动频繁的领导层，并不那么熟悉墨西哥的具体情况。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何塞·阿伦原来是美国军事情报局的间谍。而罗伊本人在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逃离美国回到墨西哥，又于1920年离开墨西哥参加共产国际第二届代表大会，此后就一直没有再回墨西哥。在该党早年各时期起主要作用的是一些外国的积极分子：日本人片山潜、瑞士人阿尔弗雷德·施蒂纳（又名埃德加·伍格）、一些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1921年脱离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劳工总联合会”后（见上文），就难以同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了，但在组织农民方面（特别是在韦拉克鲁斯州）取得了不小的胜利。20年代中期，在美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伯特伦·沃尔夫的指导下，改组了墨西哥共产党，旨在消除一个时期曾使共产国际不安的、富有声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到1926～1927年，该党在铁路工人和一些矿工中已有很大影响。共产党的工会战略主要是通过“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进行工作，但1928年以后即同这一组织分裂，并根据共产国际“第三阶段”的政策另外成立了自己领导的工会组织。人所共知的新工会联合会“墨西哥统一工会联合会”在193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成了工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长期困扰着阿根廷工人运动的内部意见分歧在20年代里一直存在着。工团主义的“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九届派）”仍然是最强大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其主要的分会之一实际上控制了港口。1922年，“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九届派）”同共产党人合并，改名为“阿根廷工人联合会”。人数较少的“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五届派）”仍然代表着工人运动中有重要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有一些独立的组织，其中著名的是那些铁路工人组织；这些组织为1926年成立的另一全国性组织“阿根廷工会联合会”

363

奠定了基础。工团主义者和独立派为其成员争取实际利益，不断同政府进行各种形式的政治谈判。20年代的激进党政府因为想争得工人阶级的选票，往往宽容些，总之，看来比雇主们好商量。

20年代末，阿根廷工人运动仍然分裂为三家全国性的联合会（“阿根廷工人联合会”、“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和“阿根廷工会联合会”）、一些独立的组织和一家共产党领导的新工会组织“工人阶级团结委员会”。然而不久，除无政府主义的“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之外，几家主要的联合会都联合一道组成了“劳工总同盟”。1930年攫取政权的军人集团执行了一种非常敌视工人运动的政策；虽然“劳工总同盟”中有一部分人愿意同新政权合作，但妥协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失业率和政府的镇压，尽管肉类包装工人和石油工人进行了引人注目的斗争，但阿根廷工人运动在30年代初还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失去了20年代赢得的许多权益。

1917年，阿根廷社会党内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分裂出来的一批人组成了共产党。主张中立的社会党人最后在1918年另立一“国际社会党”，并于第二年一致同意参加共产国际。“国际社会党”遂于1920年12月正式成为共产党。社会党在其1921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以5,000票反对、3,600票同意，否决了支持共产国际的提案。然而，许多社会党员离开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党。1920年代，共产党挑选了候选人竞选一些城市的地方公职。新党内部左、右各派争论不休；直到20年代后期，由维多利奥·柯都维拉领导并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一派才竭力控制了局势。

智利工人运动竭力顶住了政府的镇压和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1920年12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并于1922年1月正式成为共产党。该组织在20年代末以前一直不大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人在1925年总统选举中热心支持一名联合竞选的候选人，后者赢得了28％以上的选票。共产党人还影 364

响着工会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织："智利工人联合会"。这一联合会控制着硝石矿区和煤矿区，1921年12月一致同意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组织。包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智利分会在内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仍旧领导着圣地亚哥和瓦尔帕莱索的主要工会，其中包括海员工会和建筑工人工会。然而，1927年以后，卡洛斯·伊巴涅斯政府的严厉镇压严重地削弱了左派政党和工会。

巴西1917～1920年罢工浪潮引起的镇压、逮捕和放逐使工人运动遭受了重大损失。1922至1926年一直实行戒严，助长了整个20年代持续不断的镇压。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政府支持的改良主义黄色工会仍然影响着工人阶级中相当多的人，特别是在里约热内卢和一些北方城市。工人运动由于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斗士摒弃了大部分运动早期的战略和受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获胜的影响，而进一步分裂，并开始支持建立一个既不反对政治参与、也不反对为眼前经济目的而举行罢工而纪律严明的先锋党这种观点。虽然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仍然是重要的思潮，而且在圣保罗还占主导地位；但其影响在大多数城市里是决定性地衰退了，在镇压和背弃的形势下减弱了。

巴西没有出现过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党，以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于1922年成立了共产党。新组织逐渐在里约热内卢的一些工会中占领了阵地，并于1926年组织了一个选举阵线：即后来众所周知的"工农集团"。1927年，"工农集团"支持一名非共产党议员候选人获得了胜利，第二年又选出两名党员进入里约热内卢市议会。20年代末共产党由于托洛茨基分子的背叛和反对"第三阶段"政策的党员的变节而遭到了严重损害，然而仍在工人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在1929年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工会联合会"劳 365 工总联合会"，但存在的时间不长。

共产党同青年军官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率领"普列斯特斯纵队"于1924～1927年期间穿越巴西腹地的英勇行为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崇敬。然而，他在20年代期间

所持的政治立场事实上与共产党人的立场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的。他到30年代才加入共产党，并领导了党40多年；但在此之前，他同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的。

结 论

19世纪末人数还很少的城市工人阶级到1930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拉丁美洲仍生产初级产品，经济基本上受制于欧洲和美国，但几个大国的工业却有重大发展。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人都成立了组织，维护自身权益，并都取得了斗争经验，有时还竭力争取改善自身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他们的斗争导致了相当大量社会法规的制订，并导致了政府在处理劳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结果却变成了可作多种解释的传统，它也成了将工人阶级控制在统治秩序内的工具。以往数十年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在大多数国家代表着一种能够影响国家生活走向的一种力量。然而，1930年以前指导运动的学说大体上已让位给了民众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1930年以后的数十年里，这些运动在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处于支配地位。而民众主义本身则是对阶级斗争和对真正的具有强大潜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一种反动。其根源可在早年的事件和政策中清楚地显现出来。

367

第 10 章

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

思想趋同时代的自由主义传统

有两件明显而常常不为人所了解的事实，一直影响着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这两件事实使得本地区同常用以与之进行比较的其他所谓“非西方”、“发展中”或“第三”世界的地方有所区别。第一、拉丁美洲统治阶层和知识界的精英，其文化是全盘西化的，也就是说它源出于西欧文化这个更大范围之内，当然，由于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而传播到其前殖民地的这种特殊性，而有所变化。第二、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以外，是在19世纪初期获得政治独立的。

现在通常把19世纪的拉丁美洲称为“新殖民地”，这指的是各国政治上独立而经济和文化上却处于依附地位的情况。这意味着独立是形式的、表面的，而依附情况则是本地区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经历。很明显，19世纪拉丁美洲的精英分子是紧跟乃至依附于欧洲的，而他们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经济利益形成了这种纽带关系的一部分。同样明显的是，同欧洲的结合在1870年以后随着拉丁美洲各国出口经济的发展得到加强。不如上面明显的是，早期政治独立的情况可以认为是拉丁美洲文化的表面因素。相反地，19世纪的思想意识、政治纲领和社会理论，虽属于“欧洲的”思想体系，却有其特色，是地道的“拉丁美洲的”东

西，这是部分地由于它们发生在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对这些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置之不顾和贬抑为“模仿的”或“派生的”，或认为只是为处于附庸地位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文过饰非，那就是把当时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情看作无足重轻，就是歪曲拉丁美洲历史。

368

因此，我们在本章从讨论自由主义入手。在新独立国家中，自由主义构成了为建立和巩固各国政府以及改革各国社会所需要的纲领和理论的基础。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经历与众不同是由于以下现实：拉美国家是多层次的社会和种族结构而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国家权力集中的传统根深蒂固，而自由主义思想的应用因这些条件而受到影响。总之，它们得到应用的环境是有阻力的、有敌意的，有时还产生强大的保守主义反对思想。从19世纪20年代到1870年这段期间同以后的年代形成对照，是思想冲突和政治混乱的时代。这段期间也是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在这种独特环境里经历了严重修改的时代，这种修改是随着欧洲思想本身的变化而发生的。①

正如拉丁美洲当时精英分子所理解的那样，1870年之后的两个十年是自由主义的实现时期。随着自由派势力于1867年战胜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帝国和佩德罗二世1880年在巴西的退位，旧世界君主制度的残余已为新世界的共和、立宪和代议制的体制所压倒。早年美洲“野蛮的”地区性考迪略现象终于为“文明的”、统一的合法政府所代替。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阿根廷，但在其他国家也不逊色。建立世俗国家的自由派在斗争中赢得了胜利，墨西哥内战结束后实行了“革新法”，而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则制订了比较温和的立法。殖民地社会愚民政策的束缚已经让位于教育和公民组织方面现代的非宗教准则。“精神解放”这个19世纪初期自由派的梦想此时成为现实。在自由个体经营原则的指引

① 参看萨福德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撰写的第9章。

下。拉丁美洲各国进入了文明世界的经济体系。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复杂的国际性城市中心的发展，对当时的人来讲正是进一步的迹象表明自由时代已经到来。

看来好象是自由主义的实现，其实这只是它的转变，由一种与传统殖民地秩序的各项制度和社会格局相矛盾的思想转变为趋于统一的信念。同独立后最初半世纪比较起来，1870年以后的年月属于政治趋同的时代。以自治的个体为基础的各种古典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那些认为个体是社会有机体的不可分割部分，认为个体受时空调节并随社会本身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理论。在古典的或教条的自由主义与新的概念（常被泛指为“实证主义”）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在一个舆论趋同的时代可以隐没不现。不管怎么转变，自由主义还是为1870年以后年月中的统治阶层的精英分子提供了差不多是普遍的传统。因此，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传统的主要因素。

共和主义与美洲“精神”

19世纪中叶数十年的西班牙语美洲自由派对欧洲怀有矛盾心理。大部分人具有阿根廷人胡安·包蒂斯塔·阿尔韦迪（1810—1884）的观点，认为他们的文明来自欧洲，而且“我们的革命”，就其思想而言，不过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一个侧面。然而新世界又提供了在自由制度下争取人类进步的希望，这种希望却在旧世界正不断受到挫折。总之，有一种独特的美洲“精神”使两个世界有所区别，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共和主义。除了在巴西，西半球的政治独立都必然导致废除君主政治。在整个世纪中，西语美洲的知识界对于君主制在自己大陆的复辟威胁和共和主义理想在欧洲的兴衰是很敏感的。随着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的失败以及拿破仑第三帝国的创立，这种共和主义理想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处于低潮。1864年至1867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短暂地登上墨西哥王位，以及1865-1866年西班牙王

国在南美洲西海岸更为短暂地挑起战争的行为，引起了美洲主义这个意味深长的措词；智利人何塞·维多利诺·拉斯塔里亚（1817—1888）和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1823—1865）对此特别大声疾呼。

拉斯塔里亚和毕尔巴鄂都曾在19世纪40年代发表著名的论文攻击西班牙在美洲的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拉斯塔里亚痛斥顽固的封建思想，赞美同智利业已采取的各项共和主义制度和谐一致的功利主义价值准则。毕尔巴鄂更为激进，要求智利实行“非西班牙化”甚至“非天主教化”。毕尔巴鄂被迫流亡，在法国度过1845年至1850年这段重要岁月。他接触了日益增长的共和主义运动，接触了关于教会在教育方面的作用的论战，最后还接触了1848年的大革命和它的后果。他同那个时代的自由派巨人费利西泰·德朗梅内、朱尔·米什莱和埃德加·基内建立起个人友谊。基内本人是拿破仑第三时期的法国流亡者，他在随后的十年中对这位年轻的智利人很感兴趣。他对遍布于毕尔巴鄂所著《美洲在危险中》（1862）和《美洲福音》（1864）这两篇论文中的共和主义和反天主教的（带有共济会纲领色彩的）神秘理性主义加以鼓励。

370

一年以后，毕尔巴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终年42岁，生前他曾在当地发表了这些小册子。他的青春年华，他的激进的自由思想观点，以及或许也因他独特的世界主义，使他的作品在后来的世代中得以广泛流传。毕尔巴鄂过去的导师，较为温和的拉斯塔里亚，所弹的主调与他相似，并在《美洲》（1865）一文中增加了别的内容。例如，他为共和主义的南北美洲的“自由体制”辩护，反对那种认为在欧洲和美洲存在一个享有共同命运的拉丁民族“荒谬的”新观念。据拉斯塔里亚看来，所谓“拉丁人的”美洲是一种打算在新世界复辟“专制主义”的拿破仑式的概念。

随着法国军队撤出墨西哥和第二帝国的瓦解，共和主义理想激动人心地得到了证明。继1867年6月迅速审判并处决马克西米

利安和两名墨西哥保守派将军之后，7月15日贝尼托·华雷斯这位久经战斗的共和主义领袖和美洲英雄立即宣布墨西哥的第二次独立。墨西哥的胜利在欧洲共和派中间唤起巨大热情，因而消除了许多拉丁美洲人前此曾经表现的对欧洲的矛盾心理。使自由的欧洲和美洲重新建立这种友好关系的一位重要人物，是西班牙的演说家兼共和主义宣传家埃米略·卡斯特拉、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时事评论员和政治家。虽然卡斯特拉如今已完全被人遗忘，可是1870年至1900年之间他在西班牙语美洲的声望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他是雄辩盛行时代西班牙伟大的演说家，他滔滔不绝、格调高雅的风格在会议室和演讲厅中广被仿效。由于在1867年以后只是偶尔涉足政界，卡斯特拉转而以新闻工作为业。他撰写的关于西班牙和欧洲政治双周评论文章遍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墨西哥城乃至纽约的各家报纸（常是头版通页）达25年之久。

作为一名泛西班牙主义者，卡斯特拉曾经对毕尔巴鄂的“非西班牙化”号召作出严厉的反击。但是现在他情绪变了。1867年7月4日多明戈·F·萨米恩托（1811—1888年）宣布充当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时，卡斯特拉出席一家巴黎的饭店举杯祝贺美洲民主政治和西班牙精神与美洲精神的结合，因为自由在欧美两个大陆都取得胜利。萨米恩托礼尚往来向卡斯特拉的自由主义致敬。后者1873年当上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总统时，在美洲的声望进一步提高。卡斯特拉在面对左翼或右翼的地区叛乱时采取强化中央政府的方针，这在1870年以后的舆论趋同时代里追求“保守-自由主义”的拉丁美洲政治领袖中间引起共鸣。

如果美洲精神意味着推进了共和主义的价值和各项制度，那么它也意味着“野蛮的”考迪略们猖獗蔓延。他们在独立后数十年中上台掌权，而且他们的地位有其领袖声望作为支持，有群众拥护，或是有地区利益集团作为后盾。1845年萨米恩托在其著名的《法昆多：文明与野蛮》一书中唤起高乔人首领追求土地的力量，甚至使它浪漫化。然而萨米恩托对这种美洲精神的发挥有着

矛盾心理，因为他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优势地位又视为文明的进展，而它却是一个面向欧洲的外向型城市。在高乔人暴君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主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战胜地方势力法昆多·基罗加以后，“暴君本身已成为多余”，由于自由体制向前发展于是在1852年而被推翻。② 萨米恩托在本质上是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心主义者，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因此他作为共和国总统（1868—1874年）会无情的追捕恩特雷里奥斯地方最后一名地区性考迪略里卡多·洛佩斯·霍尔丹也是合情合理的。萨米恩托在参议院中自豪地宣布“每一个考迪略都有我打上的印记”。

萨米恩托的同时代人，墨西哥的贝尼托·华雷斯和塞瓦斯蒂安·莱多·德·特哈达在十年的公开内部冲突（1857—1867年）之后，也积极干预地方事务，这场冲突使得格雷罗、圣路易斯波托西和尤卡坦等地区性权力中心地位加强。政府发起的粉碎地方首领的运动至1873年随着击败并处决哈利斯科州僻远的谢拉德阿利卡地方久负盛名的叛乱者和原始的土地改革者曼努埃尔·洛萨达而登峰造极。1870年以后，西班牙语美洲各国自由主义政府对于采取地区性和社会性形式向中央当局挑战的“美洲精神”不予宽容；到了1880年，阿根廷的胡利奥·A·罗加总统和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已经可以自信地宣称“和平施政”天下大治。

美洲精神和它与共和主义的结合这时也已进入巴西这个保有君主制度的拉美国家。它在1870年的共和宣言中被明确宣布，宣言是由一批对政府不满的自由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发表的。这个宣言是国内政治批评、派系斗争和由于巴拉圭战争引起的改革要求的产物，它孳生出许多共和主义的俱乐部和报纸。由于巴拉圭战争促使巴西同阿根廷和乌拉圭两个共和国结盟，于是使自由派深感巴西帝国在思想方面的孤立，这种孤立感是共和宣言的一项

---

② D、F·萨米恩托著《法昆多》，阿尔韦托·帕尔科斯编（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第265页。

主题。共和国在墨西哥的重建以及在美洲提倡君主政治的欧洲政权的垮台显然对巴西人产生影响。这个宣言（日期为12月3日）的发表是在拿破仑第三下台刚刚三个月之后。文件声称，“我们是美洲人”，“我们的君主政体在其本质和实践上是违反并敌视美洲国家权益的”。

可是，应当注意的是，与西班牙美洲形成对照，巴西共和主义运动的最突出特点，如宣言所重申的，是它同联邦主义的不可更改的联系。一个共和主义者总是意味着推翻压迫性的中央集权君主政治而建立地方自治。在西班牙美洲，必须提出联邦主义的挑战以反对已经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而不是反对君主政治。尽管有这种特征，巴西日益发展的共和主义事业，在1870年以后对于在整个大陆加强自由派的美洲团结意识很起作用。

373

古典立宪主义的衰落

拉丁美洲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立宪的筹备工作充满热情。政治独立是在西方立宪主义全盛时期获得的，它深具影响的说服力是：一部构想合理并编纂成文的法典可以有效地分配政治权力，因此能确保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则是社会和谐和进步的主要动力。立宪主义的自由派其特点是，谋求通过设立反对“专制主义”的法律屏障来限制政府权力；他们把“专制主义”同殖民政权联系在一起。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是受两种启蒙运动政治哲学的指引，即天赋人权和功利主义，两者在理论上是矛盾的，但它们共同强调个人自治。古典的立宪主义学说虽然还存留于拉美的某些地方，但早在19世纪30年代已经受到严重侵蚀，到19世纪70年代已趋于全面衰落。

阿根廷的“五月协会”作家们和智利的“1842年一代”作家们的主要思想方向来源于欧洲人对天赋人权和功利主义两种学说的正确性所进行的广泛抨击。这些学说现在被判定为没有实际意义、墨守法规、而且能否普遍应用是成问题的。萨米恩托承认法

国“社会科学”1830年以后所走的新方向。他在1845年写道，“我们于是开始学习一些有关民族癖性、习俗和种族以及有关历史先例的东西”，开始放弃边沁、卢梭和贡斯当而学习历史学家，放弃蒂埃里、米什莱和斯佐而学习西斯蒙第，最后还学习托克维尔。③埃斯特万·埃切韦里亚（1805—1851）在其著作《社会主义信条》（1839）中对马志尼在青年欧洲运动和勒鲁的社会主义“人性宗教”的箴言爱不忍释；阿尔韦迪在他的含蓄的论文《权利问题初探》（1837）引用了莱米尼耶的话，后者是把萨维尼的用比较的和历史法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推广的法国人。阿尔韦迪说，法学不应看作是“书面文件的汇辑”，而应看作是“活的、不断进步的社会组成部分。”④

374

在智利，拉斯塔里亚也提到莱米尼耶，但特别引用基内为自己所译赫尔德历史哲学著作而写的引言。拉斯塔里亚写道，人类进步与堕落的法则只能从历史中发现，不能从自然界发现。⑤象毕尔巴鄂的《智利人的社会性》（1844）一书所用的“社会性”一词成了风行一时的字眼。自由主义改革派和立宪派必然是受一个国家由历史调节的社会关系特点的指引，而不是受抽象原则的指引。在墨西哥，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这种侵蚀，革新运动以前只出现在马里亚诺·奥特罗这位次要人物的文章中。同阿根廷和智利的自由派比较起来，墨西哥人在1870年以前特别抵制来自欧洲的新思想。

拉美的社会法律思想的新方向在1853年的阿根廷宪法中有明显的反映。尽管人们公认文件在形式上有北美模式的影响，它的

---

③ 萨米恩托著《法昆多》第118页。

④ J·B·阿尔韦迪著《权利问题初探》见《全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886）第1卷第105页。

⑤ J·V·拉斯塔里亚著《关于征服与智利的西班牙制度对社会影响的调查研究》（1844），《全集》，第7卷（圣地亚哥，1909）第25页。

精神实质却来自阿尔韦迪的《基础》(1852)一文，那是他在流亡智利时为立宪派写作的。他发挥自己1837年《初探》一书的主要观点，要求宪法应有独创性，应当反映人民的现实状况。1826年宪法的墨守法规精神必须放弃，因为同“阿根廷进步的现代化要求”不相协调。⑥自由仍然是宪法的主要目标，但新的时代要求多讲实际少谈理论。宪法制订者应当精通经济学而不是仅通“精神科学”。⑦刚刚巩固起来的阿根廷国家的宪法必须保证商业得到发展、外国资本能够进入、尤其重要的是可以从国外移民入境。由圣菲会议产生的文件在第25条和第67条考虑了这些着重点并作了具体规定。因此，1870年至1914年之间对物质进步的崇拜席卷了统治阶层和知识界的精英，这同宪法的这种务实精神协调一致。

变化中的法律哲学内容也对19世纪阿根廷主要宪法问题，即地方组织问题的解决起了作用。五月协会的作家们曾经谋求克服联邦主义者与中央集权主义者之间徒劳无益的冲突。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集权主义传统的理想和各省的地方利益必须加以调和。实际上这种调和意味着在1853年采取联邦制组织形式，同时重新承担义务将该城作为联邦地区因而作为共和国的首都。对联邦化的反对主要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它垄断了独立得来的经济利益已有半个世纪。当1880年联邦地区终于产生时，阿尔韦迪看到了“专横的进化力量”和“文明的自然进步”在起作用。⑧在他看来，殖民地终于已为共和国所代替。但是中央集权美梦的实现也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所处的对各省有效支配的地位得到巩固。宪法中理论上的联邦主义为中央集权的现实所取代。

375

⑥ J·B·阿尔韦迪著《阿根廷共和国政治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布宜诺斯艾利斯，1953)第14页。

⑦ 同上，第23页。

⑧ J·B·阿尔韦迪著《1880年业已巩固的阿根廷共和国》(布宜诺斯艾利斯，1881)，第xiii页。

阿尔韦迪在1852年概括评述美洲各国宪法时，挑出智利的1833年法典（以及美国的法典）作为创造性的典范。这个绝妙的文件其执笔者之一是马里亚诺·埃加尼亚，他是一位贵族统治论者和粗率的政治保守派，曾于1824—1829年在欧洲生活，吸收了埃德蒙·伯克以及法国的传统主义者博纳尔德和德迈斯特的思想。宪法的定稿本修改了埃加尼亚的某些极端建议，如总统可以无限期连选连任和参议院席位可以世袭之类。此外还插入了提到人民主权的话。然而总统仍然成了穿着共和国服装的君主，与寡头统治的参议院一唱一和，却有更大的权力。订出了条款以便重新确立教会特权和不动产的限定继承权，两者在1828年的宪法中原都已经受到限制。象阿尔韦迪这样一个政治上自由主义者居然赞扬这个保守主义的文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由于欧洲思想的巨大反响，反对天赋人权的哲学和反对法国革命的激进平均主义。哲学依据方面的这种变化可以既吸引政治上自由派又吸引政治上保守派。阿尔韦迪的称赞也可以理解为是承认智利宪法的稳定性所享有的声誉。对于经过一个世代内战的阿根廷，“智利的和平”似乎是个值得羡慕的模式。

1833年的宪法的确在19世纪中叶的智利引起许多争论；但是争论逐渐减少，1891年以后让位于舆论趋同。各派批评者，包括拉斯塔里亚、历史学家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和一位未来的总统费德里科·埃拉苏里斯，都认为这个文件含有“殖民地的反应”，它是由主张权力主义的部长迭戈·波塔莱斯领头，反对“独立革命”的自由主义精神。⑨他们的样板是1828年宪法，这部宪法本可落实“社会复兴这个伟大原则”和“民主代议制的共和

376

⑨ J·V·拉斯塔里亚著《唐·迭戈，波特莱斯，‘历史的判断’》（1861），《全集》第9卷，第203页；B·比库尼亚·麦肯纳著《唐·迭戈·波特莱斯》（圣地亚哥，1937）第135—137页（第一版，1883）；F·埃拉苏里斯，《1828年宪法统治下的智利》（圣地亚哥，1861）。

国”。可是，由于1833年宪法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拒绝以对社会的“机械论”观点代替“有机论”观点，[10]而且两者都选定历史主义的法律哲学，所以他们的立场注定要结合到一起。况且双方都是同一范围狭小的精英人物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国家的和平经济发展和太平洋战争（1879—1883年）智利的胜利都感到自豪。自由派对1871—1874年的一系列改革可以感到满意，特别是总统职位限为一任。正如一位评论家在1887年所说，“1833年孱弱多病的植株”已经“成长为树龄五十年的庞大树木”。[11]1891年革命之后，随着权力由总统转移到立法机关，出现了温和的自由党解释。保守主义的宪法被迭戈·巴罗斯·阿拉纳和路易斯·加尔达梅斯等人看作是智利独有的繁荣和和平演进的不可分割部分。

在墨西哥，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冲动比在阿根廷和智利更强有力，更为持久。1856—1857年的立宪大会尖锐地反对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1853—1855年）的最后一届政府，称他为保守主义的中央集权独裁者。由这个大会产生的文件不但重申联邦主义，而且规定建立一个以一院制立法机关和权力受到限制的行政部门为基础的议会政府。1857年宪法在随后十年中成了自由派和共和派事业的旗帜。虽然如此，它只是短暂地实行过一时——1857年有几个月，还有1861年至1864年。华雷斯在1864年被授予正式的专政权力来领导反对马克西米利安和法国人的斗争。当这个政府在1867年8月发出选举号召时，这个号召包括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总统否决权和增设参议院，旨在恢复“宪法上的平衡”。这句话出自莱多·德·特哈达，他是华雷斯的首席部长和战争时期的代表，改革措施大概出自他的主意。他

377

[10] 此处词句是拉斯塔里亚原话，见《智利宪法评释》（1856），《全集》第193—196页，第202—205页。

[11] 引文见西蒙·科利埃著《智利“波塔莱斯”时期（1830—1891）的历史编纂工作》，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7（1977），第666页。

们甘愿接受政府提出的公民投票，这引起了宪法保卫者的强烈反对，认为这种做法是武断的。此后十年中，反对华雷斯政府和莱多政府的造反行动可以算在保卫宪法的名下，并以1876年波菲里奥·迪亚斯造反成功而达到顶点。

由于墨西哥1857年宪法一直是反对外来干涉和保卫国家的旗帜，它获得了在拉美堪称独步的神圣光辉。然而到1880年，保卫宪法的纯洁性已遭到决定性的破坏。历史法学派的影响，通过萨维尼的信徒法国人爱德华·拉布莱，在成功地重建参议院的官方运动中显然可见。墨西哥参议院就象1833年至1871年的智利参议院，其宗旨不但是作为防止过分民主的台柱，也是作为推进中央集权的代理人。因此波菲里奥·迪亚斯一旦掌权就保留参议院（1874年通过），任凭他的极端立宪主义拥护者喊叫要废除它也徒劳无益。1878年至1880年有一派自封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人发起一场运动要求进一步改革宪法走向“更强大的”政府。他们在胡斯托·谢拉（1848—1912）领导下把历史的法律哲学同各种新“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为其后历时35年的权力主义政权提供有力的支持。墨西哥的教条主义的（或古典的）立宪主义虽然决不能说已经死亡，可是在经济进步和政治稳定的新时代要求面前已经黯然无光。

世俗国家至高无上

拉丁美州古典的自由主义纲领中，使自由派有别于保守派的突出之处乃是关于世俗国家的理想。[22]世俗化和改革的目标在理论上是同立宪自由主义的目标相矛盾的，因为它们带来的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不是削弱。然而古典立宪主义到19世纪90年代的衰落使得这一传统矛盾不那么明显了，而对于知识界和统治阶层的

---

[22] 参看林奇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12章。

精英来说，自由主义的胜利成了“世俗国家”取得进步的同义语。

378

一个现代化的世俗国家是由自由的个人组成，他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追求文明的个人利益方面不受限制。他们首先是这样的公民：他们最基本地是效忠于国家而不是效忠于教会或其他属于殖民地社会残余的社团。作为公民，他们的国民身份必须由国家加以控制和管理。人口统计、财务手续、司法程序、教育、甚至于历法以及出生、婚嫁和死亡等事都应不受教会的控制。教会财产，不论是农产品什一税的收入、不动产还是抵押财产，教会都不应再享有“永远管业权”而应变成个体企业的刺激因素。独立后数十年中的自由主义作家和政策制订者们都对世俗化的这些目标作了阐明。例如，早期的改革政府，其中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政府（1822—1823）和墨西哥的巴伦廷·戈麦斯·法里亚斯政府（1833－1834）。萨米恩托将科尔多瓦的殖民地思想状况与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对照的描述、何塞·马里亚·路易斯·莫拉（1794－1850）对墨西哥的社团精神所作的分析、以及拉斯塔里亚和毕尔巴鄂要求在智利实现精神解放的号召，都是典型的早期言论，它们后来成为1870年之后时期普遍的设想。

在墨西哥，自由派极为明确地制订了，要求世俗化和反对社团的改革纲领。它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引发了对立的保守主义思想；1849年诞生了一个保守主义政党，1854年至1867年发生了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内战。随着保守派反对的加剧，自由派的纲领更加激进。温和的1856年《莱多法》（强迫教会将地产售给佃户）于1859年被代以直截了当地对所有不重要的教会财产实行国有化。信仰自由作为宪法条款于1856年遭到否决，并在1860年12月（即在另一个使政教分离的法令颁布之后一年）由华雷斯政府用法令加以宣布。这些主要是战时措施，一起宣布的还有公墓、结婚、人口统计和医院不受教会控制，并查封了修道院。总称为“革新运动”的这些法令在1873年订人宪法，成为崇高的自

由主义传统的持久不变部分。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世俗化行动比起墨西哥出现较晚，而且较为渐进式，然而或许是更有决定性的。经过了相对和平的50年，在这期间天主教会享有法定的地位。此后1870年至1890年这段期间的特征是教会与政府之间不断斗争，立法机关和新闻界展 379 开全国性辩论，标准的改革措施成功地得到通过。这个运动在方式和时机选择方面，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的经历相似。在那些国家里，由于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对现代世界的不妥协态度，世俗自由主义气氛激昂。在1864年发表《错误批判大纲》和1870年宣布《教皇永无谬误》之后，教皇极权主义者开始在各国教士中间实行新生活；于是在阿根廷、智利和巴西，就象在欧洲，教会与政府的对立成为不可避免。

在这三个国家里，潜在的冲突都由于一椿涉及某个有代表性问题的事件而激化起来。在智利，问题是关于教会对公墓的管理。1871年由于康塞普西翁的主教拒绝为曼努埃尔·萨尼亚图举行公葬（他是一位著名军官，曾多年与一位情妇公然同居），而使问题公开化了。在巴西，公开的问题是共济会的地位问题。共济会曾广泛侵入最高权力阶层并得到教会统治集团的宽容，虽然当时它受到教皇的谴责。在共济会问题背后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政治性问题，即巴西教会与巴西帝国的沆瀣一气。1872年，里约热内卢主教因为一名教士在一个共济会分会布道而停止他的职务，于是弄得两个问题都公诸于众。随后伯南布哥主教维塔尔和帕拉主教马塞多·科斯塔发起一场强烈的反对共济会的运动。十年之后在阿根廷对国家管理教育的权限问题上产生对立，问题的背景在于自1870年以来国家对教育的管理已有迅速的发展。1884年，科尔多瓦代理主教禁止天主教徒父母送女儿到一家校董为新教徒的当地公立师范学校上学，这个事件导致阿根廷政府与教廷之间关系破裂16年。

世俗国家的基础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比在墨西哥奠立得较

为平和、较为牢固，因为改革者遇到的阻力较少。那里的教会势力比较薄弱；人口较为稀少，不像墨西哥农村那样潜藏着一股宗教激情的力量，外来的思想影响和社会影响都比较普及。例如，在瓦尔帕莱索一个势力很大的新教徒商人社会的影响下智利通过一项法律对宪法第五条作出“解释”迫使政府在1865年实际放弃不容纳不同信仰的态度。在阿根廷和巴西，信仰自由几乎不成为问题。阿根廷1884年实行非宗教婚礼和民事登记制度时，所持的无可辩驳的论据之一是，教会的办事机构无法应付大量涌入的移民。在这三个国家，不必没收教会产业就能达到世俗化的主要目的；在墨西哥，教会产业却是剧烈矛盾的根源。在智利和阿根廷，不必在法律上使教会与政府分离就能达到世俗化的主要目的。在智利，政教分离最终在1925年实现，但在阿根廷则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而阿根廷却可能是整个拉美世俗化最彻底的国家。在巴西，政教分离连同其他自由化改革措施被纳入共和运动，它得到实证主义给予的思想上的支持，并在1889年帝国被推翻一年内坚决地得到实行。

而后到1890年，自由派，或如他们在阿根廷所得的称呼“政权还俗派”已占压倒优势。教皇势力、民族统治集团以及他们的保守派俗人拥护者在世俗国家大大发展的气氛下暂时默不作声。有关教会的问题已成为过去，这进一步表明拉美精英分子之间已达到政治趋同的局面。

农村资产阶级社会理想的消逝

自由主义遗产的一个畸形事物就是政治方面的中央集权制与社会经济方面的个人主义制度同时并存。自由主义立宪派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的反对削弱了，而对自由放任经济的支持仍然强大有力。自由社会的核心是文明的个人，他们在法律上彼此平等，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以财产为基础，财产权

被认为是个人生存权利本身的外延。因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天赋人权论和功利论都加以坚持，而成为实际是公认的自由主义假设。

在拉美，就象在其它农业社会，自由派把他们对社会和谐和经济进步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小地产持有者。1870年以后，自由主义由一种改革思想转化为一种追求统一的信念，这可以认为部分地是因为在由大庄园主和依附地位的农村各色人等（不论是奴隶、雇工、世袭佃户还是印第安部落的村民）组成的国家中，小地产持有者缺乏适当的理想。在以出口经济恢复活力为特征的时代，精英分子可以而且的确是毫无困难地坚持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一套形式而忽略它的早期精神。 381

改革派的努力由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以及拉美社会的现实而遭到削弱。自由主义者区分法人或法律上限定继承人的财产与个人的财产。前者是社会的产物，可由立法者加以限制；后者先社会而存在，立法者不能加以限制。受18世纪"经济学派"，特别是加斯帕尔·梅尔乔·德·霍韦利亚诺斯的影响（他的《土地法情况》〔1795〕在整个西语美洲地区深受重视），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中心问题是铲除殖民主义的法律和司法特权。他们认为这些特权是实现"自然的"经济秩序的障碍。自由主义者虽然常把大革命以后法国的农村资产阶级或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自耕农奉为理想，他们的理论却不能提供基础作为依据来阻挡个人对土地进行不适当的积累。

在墨西哥，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末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对教会财产的限定继承。在智利，改革的主要目标则针对无比强大的俗人（长子继承制的）庄园的限定继承，长子继承制于1852年在法律上予以废除。"享有特权的"印第安人村社地产在墨西哥也受到打击，在1857年的宪法中处于易受侵占的地位。1870年以前的自由派，步霍韦利亚诺斯后尘，哀叹私人持有的土地过多，特别是那些未耕地。可是他们的后继者，如阿根廷的

“1880年一代”或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派精英分子，对于随商品农业发展而来的私人持有土地的迅速积累则默不作声，事实上他们自己还常常从中得益。

因此，曾由伦理著作加以传播的自由派对农村资产阶级社会的梦想，在1870年以后衰退了。这不但使鼓励限定继承权的地产进入流通领域的努力毫无效果，就连欧洲农场主心爱的拓殖计划也沦为泡影。诚然，阿尔韦迪在1852年所作的名言“统治就是殖民”唤起了阿根廷的许多殖民努力，开始是由胡斯托·何塞·德·乌尔基萨政府在圣菲省引进繁荣的瑞士人拓居点。在智利，在延基韦地区南部建起总共约有3,000人的农业社区，这是与文森特·佩雷斯·罗萨莱斯（1854）和本哈明·比库尼亚·麦肯纳（1865）所写的著名的开拓殖民地的文章相携俱来。

殖民热情在墨西哥也很强烈，虽然失去得克萨斯州以及同美国进行的战争使其活动中心由边远地区转向“共和国人口业已繁殖之地”。1849年，莫拉竭力主张“所有的人不分种族和肤色联合起来”，作为一种手段以防止未来发生象尤卡坦和瓦斯特卡刚刚经历的那种印第安人叛乱。[13]在整个世纪中，殖民思想在墨西哥持续存在，但比起在南美洲则更少导致明确的结果。在阿根廷，当垂老的萨米恩托在1883年发出著名的呼吁：“让我们成为〔象〕美国那样”[14]的时候，他仍然在想望有一个由欧洲农场主来加以改造的社会。

巴西的废奴运动领袖们也把小土地持有者理想化了。安德雷·雷布萨斯在其《国民农业》（1883）一书中认为，奴隶解放并由于拥有土地而获得新生，会产生“农村民主”。[15]雷布萨斯出

382

---

⑬ 原话引自莫拉致墨西哥外交部函（1849年7月31日）载路易斯·查韦斯·奥罗斯科编《莫拉博士外交书信集》，墨西哥外交档案第35卷（墨西哥1931），第151—152页。

⑭ “Seamos Estados Unidos”，原文是《美洲诸民族的冲突与和谐》一书1915年版的最后一句。这里的译文是根据原话上下文译成。

⑮ 引文见理查德·格雷厄姆著《土地占有者与帝国之倾覆》，《葡萄牙—巴西评论》，第1卷（1970），第48页。

身于一个穷苦的黑白混血种人家庭，而若阿金·纳布科(1849—1910）出身于伯南布哥洲一个贵族地主家庭。他们都认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腐朽大庄园社会阻碍了国家经济进步和道德进步。纳布科在他的《废奴主义》（1883）小册子中，论证了奴隶制度对巴西生活各方面的恶劣影响。他说，“它使得空气都奴隶化了”。农业复兴在他想象中的自由巴西占有中心地位。究竟是通过土地改革——它将随之带来解放，产生一个一部分由过去的奴隶一部分由欧洲移民，一部分由过去的土地业主等小土地持有者组成的新阶级——来实现这种农业复兴呢？还是，依靠现有的地主阶级——等他们一旦摆脱了奴隶制的腐败羁绊——来振兴农业呢？纳布科1888年以前在这点上还存在着矛盾心理。解放以后，君主政体垮台了，他开始越来越象晚近西班牙语美洲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那样，也承认了农村的现状。

实证主义得势

19世纪后期的政治趋同得到一整套宣称科学在拉美获得胜利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的支持。这套思想通常称为实证主义，虽然这个名词并无公认的定义。就哲学意义来说，实证主义是一种认识论，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人类唯一的认识手段。这种方法的要素是：第一，强调观察和实验，因而否认一切先验的知识；第二，探求各种现象的规律，或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是各种现象，亦即“事实”，和它们的规律，而不是它们的本质特性或终极原因。这种认识论并非19世纪新创，新的地方在于对它加以系统阐述并提出实证主义这个名词，两者都是奥古斯特·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一书中创立的。作为一套社会思想，实证主义与现代观点有共同之处，认为社会是发展中的有机体而不是个体的集合，并且认为唯一正确的研究社会的方法是通过历史。孔德哲学的这些特色，正如约翰·斯图

383

尔特·穆勒在1865年所说，是"现代的普遍财产"，这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名词一直被如此广泛使用而定义都含糊不清。⑯

如果人们认为实证主义是孔德的哲学体系，那么它的独创的构想就是"科学等级"和"三阶段规律"。孔德提出，"实证哲学"是各种"观察科学"的相互关系，认为它们"受共同方法的支配并构成调查研究总方案的各个部分"。⑰这种相互关系在形式上是分等级的。对各种科学（乃至于某种特定的科学）进行研究并加以分类时，人们必然从比较简单、比较一般、比较抽象和比较互不关连走向比较复杂而更多互相关连。例如，人们从天体物理走向地球物理（从天文学走向力学和化学），或者从物理学走向生理学，而最后走向社会物理学或社会学——各种科学中最不完善和最复杂的。这一过程是自然的，因为在概念形成的每一步骤，人类思想陆续经过三个阶段，即神学的（虚构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和科学的（实证的）三个阶段。由此引申，社会自身也经过这些阶段。孔德认为，现代知识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处理自然现象时神学方法和形而上学方法大部分已经不使用了，而"在有关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却恰恰相反，仍然完全在使用这些方法……"。⑱

新精英分子的教育

在拉丁美洲，孔德哲学主要的直接影响是促使人们努力改变高等教育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步的现代化经济和稳定、高效率的政府需要领导者充分地系统掌握现代科学。传统的大学、学院和职业学校，已不足以担当这个任务。然而在这种舆论趋同的时代，人们无意于废除乃至更新现有的机构，除了在墨西哥的独特

---

⑯ J·S·穆勒著《奥古斯特·孔德与实证主义》，（安阿伯，1961），第8页。
⑰ A·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巴黎，1830—1842），第1卷，第xiv页。
⑱ 同上，第12页。

环境以外。替代的办法是设立新的实体，设立一些最终能影响老牌学校的科学预备中心。

在墨西哥，正规大学机构是19世纪中叶革新运动的受害者；教育复兴的中心是国立预备学校，它是1867年随共和国的光复而建立的。[19]它出自加维诺·巴雷达（1818—1881）的主意，他是一位医学教授，曾在1848—1851年上过孔德的课并把实证主义推荐给华雷斯总统的教育改革委员会。这所新学校由巴雷达领导到1878年，它取代了古老而深受尊重的圣伊尔德方索学院，负担起后者的任务成为墨西哥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精英分子的主要培养园地。

阿根廷的实证主义教育机构是巴拉那师范学院，那是萨米恩托总统1870年创立的。这个学校远远超过了它作为模范的省级师资训练机构的预期任务。在诸如何塞·马里亚·托雷斯、佩德罗·斯卡拉布里尼和J·阿尔弗雷多·费雷拉这样一些灵感丰富的教师—哲学家的教导下，该校的毕业生在成为全国性领袖人物中占有非常大的比例。巴西与这些机构相当的学校是军事学院，它在1874年成为与众不同的实体。本雅明·康斯坦特（1836—1891）为这个学校定下了实证主义的（和共和主义的）方向，他是这个学校的数学教师，后来在共和国第一届政府中任教育部长。智利的类似机构，智利大学的教育学院，直到1889年方才建立。早在1868年，实证主义的教育哲学就受到自由主义者拉斯塔里亚和巴罗斯·阿拉纳的欢迎，但是它的主要倡导者则是阿拉纳的学生巴伦廷·莱特列尔（1852—1919）。莱特列尔于1879年开始他的改革运动。1882年至1886年到德国考察教育以后，他回国

385

⑲ 墨西哥皇家和教廷大学在1834年以后几度闭而复开，最后由马克西米利安于1865年11月30日下令停办。这个敕令确认了早几年1857年和1861年的自由派措施。现在的大学创立于1910年，系由胡斯托·谢拉于1881年首先倡议的。

创办这个学院并成为此后30年智利的主要思想和教育领袖。

拉丁美洲的实证主义研究很大部分是集中在努力建设人道宗教和实证主义教会，念念不忘1848年以后孔德提倡的“第二职业”。孔德的法国门徒分裂为皮埃尔·拉斐特领导下的宗教的或正统的实证主义者，或抛弃孔德宗教计划追随埃米尔·利特雷的哲学的或异端的实证主义者。异端实证主义者就其性质而言，是众说纷纭而难以归纳的；而正统实证主义却是由一群人数不多但结合紧密、志同道合的孔德“真正”门徒倡导的，如智利的拉加里格兄弟、豪尔赫和胡安·恩里克，巴西的米格尔·莱莫斯和雷蒙多·特谢拉·门德斯，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墨西哥的奥古斯丁·阿拉贡等。因此，正统实证主义作为一个新宗教、新教会和作为一群复杂的狂热崇拜者是很出名的，可是它对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影响很小。作为拉美一种教育哲学的实证主义显然属于异端派，像巴雷达、康斯坦特和莱特列尔之流领袖人物对“人道宗教”则退避三舍。

从这个时代教育理论的三个普遍特征可以看出实证主义的影响：第一，按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排列强调“百科全书式”学习课目；第二，越来越侧重于与人文学科相对立的科学和实用的学科；第三、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和国家对教育的管理。实证主义的教育家认为，以系统研究各门科学为基础的规格一致的课程，可以促进精神健康和社会秩序，并纠正“18世纪各种分裂学说”的无政府主义影响。[20]在孔德的“普及教育”的规范中，人们将按由浅入深的次序学习几门科学，从而晓得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21]数学是基础，象康士坦特令军事学院历代学生牢记的那样，386 社会学是拱顶石。研究社会的科学能使人了解发展规律，它是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可以代替被莱特列尔谴责为缺乏意识的罗列人

⑳ 原话是巴雷达所说，见《论道德教育》（1863），《小品、讨论与演说文集》（墨西哥，1877），第117页。

㉑ 参看保罗·阿尔布斯·巴斯蒂德著《孔德哲学的普及教育理论》（巴黎，1957）

名和事件的方法。㉓

传统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高等教育方针继续存在，但是到1900年实证主义的高等教育方针的革新已有所进展。在智利，莱特列尔和其他一些人成功地推行运动，在必修课程中取消了拉丁文，这种做法与巴拉那师范学院发生的情形相似。在墨西哥，1880年开始，国立预科学校在逻辑学教材的选定问题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1896年课程改革以后实证主义者才终于占了上风，随后1903年出版了波菲里奥·帕拉写的《逻辑学新体系》，它标志着墨西哥实证主义教育思想的最高峰。一种追求专业技术和实利主义的学科的新热情，尽管同孔德对百科全书式学习的偏好有矛盾，却成为实证主义时代的永久遗产。虽然如此，拉美受实证主义鼓舞的教育学保持了尊师思想的高度系统性乃至于命令主义的性质，这或许已经阻碍了自由的和创造性的科学探讨。

尽管1848年以后孔德越来越同情天主教，而且尽管孔德呼吁学校不受政府控制，实证主义者所鼓舞的高等教育并没有离开脱离教会和实行国家管理这两个传统的自由主义目标。实证主义学说可以作各种的解释以适应当地的情况。在墨西哥，强调之点似乎是妥协，始于巴雷达1867年激动人心的《市政演说集》。革新运动结束以后，反教权主义寂然无声；虽然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有路易斯·佩雷拉·巴雷托、康斯坦特和莱特列尔等实证主义教育家比较公开地表达了反教权主义。可是差别之处更多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拉美各地的异端实证主义者，如法国人利特雷和米尔·费里，对孔德晚年特异的宗教观点和社会观点置之不顾。

㉓ 莱特列尔著《新中学方案与实证主义哲学》（1879），载《为文化而斗争》（圣地亚哥，1895），第301页。实证主义对科学教育的偏好实际是对孔德教育理论的曲解。孔德本意是15岁以后才讲授科学课目；15岁以前应在家由母亲指导学习文科和语言。但实证主义对小学教育影响很小，于是孔德教育思想的协调性遭到忽视。

“科学政治”与权力主义

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直截了当的政治理论，它的教导却为拉美统治阶层精英分子提供了重要的臆说。“科学政治”的概念，在墨西哥和智利得到正式的表达，在阿根廷和巴西则表达得不如那么正式。这个概念带来一种信念，确信各种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于国家问题。政治被看作是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实验科学”。政治家不应再受空洞理论和法律惯用词句的指导，它们只是徒然导致革命和混乱。新的指导必须是观察。耐心的调查研究和体验。必须对经济事物、具体事物和实际事物赋予新的价值。

尽管他们反对政治空谈（他们认为政治空谈是“形而上学”思想的标志），科学政治的鼓吹者却重视理论。理论是寻求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出发点，它对观察到的事实起协调作用。孔德说过，在实证阶段，人类思想不再关心宇宙的起源和命运，也不关心探求本质，其活动却是要“通过理解与观察的美妙结合发现〔关于现象的〕有效法则”。㉓这些法则是人类思想因而也是社会的越来越科学的特性（孔德的三个阶段），是“进步的根本概念”和各种制度的历史相对性。

科学政治的一项根本原则是社会应由选举出来的代表进行管理而不是进行统治。首先表达这种思想的是孔德的前辈和早期合作者亨利·德·圣西门，他和孔德一样为被“玄学家和法律学家”以及被法国大革命的教条搞乱了的欧洲探寻一种恢复秩序的原理。新社会在性质上应是工业化的；圣西门声称，实业家（那些谙晓财政、会编制预算的干实务的人）应当成为新的行政官员。孔德也指望精英分子（学者们）的介入，他们明了科学分析与政治分析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为社会复兴提供领导。这种思想以其经过修改的拉丁美洲形式加强了专家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极端保守派。

㉓ 孔德著《教程》，第1卷，第3页。

科学政治与拉美的政治自由主义（此时由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一种神话）有一种矛盾的关系。它的戒律主要是否定古典的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在孔德的表述里人们可以将“形而上学的”改为“自由主义的”作为历史的第二阶段。到1870年，古典自由主义对立宪工作的信仰已由于近似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涌入而受到侵蚀。科学政治的权力主义倾向和专家政治倾向加深了这种侵蚀。可是鼓吹科学政治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偶尔也自视为“新自由派”或“保守的自由派”。理论上互相矛盾的说法时而混淆不清，时而妥协调和，是这个舆论趋同时代的一个特点。

在墨西哥，胡斯托·谢拉和他的合作者在他们的报纸“自由派”（1878—1884）上对科学政治的概念作了发挥。他们说，在科学指导下，国家领导人必须否定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行动和无政府状态、调解互相冲突的各方和加强统治以满足工业时代的需要。加维诺·巴雷达在十年以前已经简略地提出过这种看法，用孔德的说法解释墨西哥的历史。巴雷达说，“社会建设的一切条件现在都具备了，一切障碍都克服了”。独立已为事实所证明，《改革法》和《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今以后我们的座右铭将是“自由、秩序和进步”。[24]但是巴雷达明白地说，自由是过去的成就，秩序和进步则是未来的任务。在他同何塞·马里亚·比希尔进行的著名辩论中，谢拉谴责革新运动的“老”自由派方面无法无天的行为。他把他们比作法国“1793年的人”，他们相信必要时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暴力和革命来改造社会使之符合人权的要求。[25]特莱斯福罗·加西亚（1844—1918）（谢拉的同事，一位出生于西班牙的企业家），在他畅销的小册子《科学政

[24] 巴雷达《市政演说》（1867），载《小品》，第105页。

[25] 《自由报》，1878年8月30日（又J·谢拉《全集》〔墨西哥，1948〕）第4卷，第158页。比希尔的文章，载《共和主义镜报》。

治与玄学政治》（1887）中对这场辩论的主要论题作了概括。㉖

科学政治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自由报》坦率地呼吁实行独裁主义政治。特别著名的是弗朗西斯科·G·科斯梅斯（1850—1907）的激烈言论。他说，社会现在为了“面包……安全、秩序和和平”而拒绝“权利”。权利只是带来不幸。“现在让我们尝一点儿专制（可这是高尚的专制），看看它带来的是什么效果。”㉗谢拉的语言比较柔和，但论点相似。《自由报》开始称自己是“保守派—自由主义的报纸”；它赞扬当时欧洲“保守共和主义者”胡莱斯·西蒙和埃米略·卡斯特拉；它刊登利特雷写的文章。它要求宪法改革，特别是要求延长总统任期和中止否决权，“以加强行政的权力”。目标是一部“实用的”宪法而不是一部“乌托邦式”、助长超法律独裁政治的宪法。我们已经知道，实行宪法改革以加强政府是华雷斯和莱多在1867年引进的思想；1878年，它由于得到科学方面的论据而增添了力量。到19世纪80年代末，这些论据以及构成科学政治的其他论据成了迪亚斯政权半官方的看法。

作为政治思想方面一个新起点，智利的科学政治概念不如墨西哥那么明确。智利没有“革新运动”也没有法国干涉；它没有19世纪中叶引人注目的内战来指引政治思想。因此，对于变化中的欧洲思想潮流，智利知识界比起墨西哥知识界有更大的开放性，而新思想同旧思想的嫁接来得比较自然、比较微妙不易觉察。何塞·维多利诺·拉斯塔里亚的思想业绩是智利与墨西哥差别的典型。人们还对这位“1842年一代”的自由派领袖，在1868年引进孔德的实证主义并在其《实证主义政治讲演集》（1875年）一书中首先把它应用于政治表示赞许。所以智利的科学政治并不是内

㉖ 这个小册子重刊了《自由报》1880年10月12日开始发表的一系列文章，1881年第一版时用了另外的书名。该书虽为1880年教育问题辩论所促成，却也讨论了一般政治问题。

㉗ 《自由报》，1878年9月4日。

战以后一代人激动人心的言辞，而它同自由主义传统的关系也不象墨西哥那样界限分明。[28]

拉斯塔里亚的《讲演集》虽是一本旨在为一门政治科学奠立基础的长篇大论，它里面很多地方使人想起他的早先著作。他对先验知识的批判，他所说的个体被社会所塑造，以及法律是历史环境的反映等等，都不是新的东西。此外，他保持对个人自由的信仰，不顾实证主义的反个人主义偏向而作出结论，认为自由注定会随着社会进步而增进。拉斯塔里亚在把拉美国家比作欧洲那些接受"法国冲动"的国家时，更加是一个孔德派。他认为它们处在形而上学思想和实证主义思想之间"痛苦而混乱的转变"过程，因为有一种缠绵不已的倾向要把关于权利和平等的"革命的"理论强加给一个尚未准备好同它们结合的社会。拉斯塔里亚是一个彻头彻尾亲英派，他极力称赞起源于英国、现在在北美实行的"实证主义精神"。[29]拉斯塔里亚认为这种精神表现为自治。对他来说，自治具有社会法则的地位，指导着他长期以来为各城市争取自治的运动，争取得到被1833年中央集权主义宪法所否决的自治权。

拉斯塔里亚的思想和实践（例如1876—1877年担任内务部长）显示出政治自由主义内部在限制或加强国家权力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传统紧张关系。拉斯塔里亚可能既是市政自由的鼓吹者又是一个反教权的改革家。虽然他接受科学政治，使他对强大的革新政府的同情增加了，但他的《讲演集》却没有象《自由报》上的文章那样为权力主义公然辩护。从理论高度上看，他比1878年的墨西哥人或者他的年轻同事巴伦廷·莱特列尔（与他志同道合的科学政治鼓吹者）都更加明确地主张限制国家权力。

---

[28] 拉斯塔里亚1868年对实证主义的发现或许可与加维诺·巴雷达在1867年对它的首次介绍相比。他们都属于"老"一代，年龄只差一岁。可是巴雷达无论1867年以前或以后都不是着重于政治。

[29] 拉斯塔里亚《讲演集》，《全集》第2卷，第51—59页。

社会进化是莱特列尔的最高法则。对他来说，政治科学证明了“社会是怎样地受不断的变化所制约，这种变化使它保持现状或是前进，这时如果改革而不是阻止已成为合理合法，那么，这就是对一切政治家（不管他们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必然起指导作用的准则。”例如，“科学的政治家”（与一个仅是经验主义者相对立）对一场反对思想自由的狂热分子引起的骚乱与对一场要求提高工资的工人引起的骚乱，反应将是不同的。前者涉及的是不能容纳异己，是社会中垂死的倾向；后者则是涉及新近开始说话的阶级所提出的要求。前者属于过去，后者属于未来。[30]莱特列尔把自由和权力看作是相对的原则，而不是看作是波塔莱斯时代以来支配着政治的绝对事物。他在1889年一次激进党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同事们说，虽然在当时这个历史阶段，自由是我们“科学化哲学”的“有机原则”，而且虽然各项具体自由必须加以坚持，我们却应毫不踌躇地提倡国家对教育、童工、卖淫、社会保险和教会财产行使权力。政治的目的不是推进诸如自由和权力这样的抽象概念，而是“满足社会需要以获得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31]莱特列尔对“负责任的”权力主义制度表示明显的称赞常举俾斯麦作为范例。还有，应当提到的是，他在大学里教授的是法律和政府理论。

自由派内部的破裂

正当自由主义的实现看来成为现实，政治趋同局面似已形成之时，拉美四个大国——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的自由派内部却发生重大破裂。科学概念的注入，促进了政治趋同；然而古典自由主义与科学政治之间在理论上存在的冲突必然是要出现的。这种冲突在1889—1893年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可以看出

---

[30] 莱特列尔著《论智利的科学政治》（圣地亚哥，1886）第3卷，第81—84页。

[31] 莱特列尔著《他们与我们也就是自由主义者与权力主义者之别》，载《为文化而斗争》，第11页，第30—31页。

来，这些事件在四个国家中都揭示了极为类似的迹象。这些年中汹涌的事件同经济和财政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这种混乱状况如今确是解释这些事件的标准出发点。然而政治混乱也可以作为拉美思想上一个重要关头来加以考察。

1895年若阿金·纳布科发表一篇关于何塞·巴尔马塞达（智利总统，1891年被议会和海军的起义推翻）的文章，他在文中含蓄地将智利的动乱与同时代在巴西发生的事件相比拟。[22]整个1890年和1891年两国都经历了一场日益加剧的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冲突。在巴西，1889年11月15日共和国建立之后，两位军人总统（曼努埃尔·德奥多罗·达·丰塞卡和弗洛里亚诺·佩绍托）同1889—1891年的立宪议会以及它的继任者发生冲突。德奥多罗在1891年11月解散议会，过后三个星期他辞职而让位于弗洛里亚诺。1894年，经过一场内战，军人终于退出政权，于是参议院领袖普鲁登特·若泽·德莫赖斯—巴罗斯当选为巴西第一位文官总统。在智利，议会谴责巴尔马塞达“干涉选举”特别是谴责他以强行指定一名亲信作为其接班人相威胁的行动，并谴责他不经议议会批准就颁布预算。总统于1860年两度关闭议会，并曾几度改组内阁，但无济于事。1891年初内战开始，以巴尔马塞达辞职继之在9月19日自杀告终。 392

阿根廷1890年引人注目的一系列重大事件（“1890年事变”）也涉及对总统权力的挑战，但这种挑战产生在立法机关以外。7月26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爆发一场“革命”，在莱安德罗·阿莱姆领导下成立一个短暂的“临时政府”。他在一年前曾是青年公民联盟的一个创始人，这个联盟是一个政治团体，旨在“合作起来在国内重新建立宪法惯例和对现有事物秩序进行斗争”。

---

[22] J·纳布科著《巴尔马塞达》（圣地亚哥，1914），第7页。这本著作最初作为连载的报纸文章发表（1895年1—5月），旨在批判胡利奥·巴尼亚多斯·埃斯波诺萨那本颂扬的作品《巴尔马塞达，他的政府与1981年革命》（巴黎，1894）。西班牙文第1版于同年在瓦尔帕莱索出版。

现有事物秩序是针对米格尔·华雷斯·塞尔曼担任总统一事而言的。起义遭到镇压，但华雷斯·塞尔曼也在议会压力下于8月6日辞职，由副总统卡洛斯·佩列格里尼接替。在墨西哥，事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和为人所周知。它们不表现为政府部门之间的冲突，而是在议院内部（以及新闻界）就晦涩不明的宪法修改问题进行争论。争论扩大到包括总统的权限问题，于1893年11月、12月达到高潮。它的前奏曲是胡斯托·谢拉在《全国自由联盟宣言》里披着薄薄的面纱对波菲尼奥·迪亚斯进行的挑战。《宣言》发表在1892年4月23日，公然提倡第三次改选总统。这次未得成功的对迪亚斯的挑战来自"科学派"，它是同政府接近的一个不大的集团。

在所有这四个国家，冲突结果都带来了以宪法原则的名义对独裁领导的反抗。而且，除了阿根廷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例外，这种反抗都来自统治阶层精英内部，甚至有一些来自当部长的人。由于科学政治的假设同历史立宪主义的趋向纠缠到一起，这些挑战者尽管不惜进行公开冲突却不摈弃强大权力的原则。智利的莱特列尔从1889年的矛盾心态转而在1890年反对巴尔马塞达。他一度遭到监禁，随后支持这场获得胜利的"革命"。他说，"革命"的目的，不是树立议会寡头政治，而是恢复符合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政府"，在巴尔马塞达的个人暴政之下，后者已同"政治斗争"混淆起来。[33]

393

在巴西，共和国建立时到处弥漫的实证主义思想导致了权力主义与立宪主义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例如，正统的实证主义者莱莫斯和特谢拉·门德斯，在表示了孔德式的对宪法自由的藐视时，要求实行"共和主义独裁"，就象孔德当年欢迎路易·拿破仑的1851年政变。[34]然而，非正统派的本雅明·康斯坦特在1891年去世以前同德奥多罗发生冲突。临时总统的另一名反对者是他的

[33] V·莱特列尔著《从前后事态看政府同政治的关系》（圣地亚哥，1891）。这是莱特列尔1891年行政法课程的第一讲。

财政部长鲁伊·巴尔博扎（1849—1923），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执笔者。巴尔博扎对弗洛里亚诺的攻击尤为尖锐，不论是在国内或是流亡国外的言论，如在《英国书信集》（1896）中所持的态度，一贯如此。巴西内部的矛盾在佩德罗二世被推翻之后更复杂化了。立宪派的热情高涨，政治调停也无济于事，这从共和国各部最初成立时组成的人员政治面貌形形色色可见一斑。而且由于德奥多罗和弗洛里亚诺越来越“独裁”，人们开始怀念帝国时期取得的所谓宪法平衡。正是这种怀旧之情激发纳布科写出篇幅巨大的他父亲的传记（他是一位自由党领袖）和关于智利问题的文章。他写道，巴西和智利都是“〔在1889年以前〕有着相同的绵延不断的秩序”议会政府、公民自由、〔和〕为政清廉。”现在只有由开明人士组成的“自由联盟”才能拯救拉美免于进一步的混乱。[35]

莱特列尔对待中央集权控制的暧昧态度可以同墨西哥的谢拉相比。大体上说，谢拉的1892年纲领似乎集中体现了社会保守主义、技术统治和面向经济这些科学政治的原则。可是在《宣言》的末了他说，如果“有效的和平〔自1867年以来〕已由于**权力的加强**而取得，确切的和平将由于它与自由同化而取得，”[36]他继而提出几点宪法修改主张，特别是法官不能撤职这一点，那就是说，法官由总统任命终身，面不是民主选举受群众心血来潮的影响，或是受总统的操纵。1893年就这项措施进行辩论时，谢拉拥护这个主张，他以“科学”作为论据，就象1878年曾以此来拥护强大的政府那样。在这中间几年，面对迪亚斯取得的独裁权力，谢拉已变成立宪派，希望限制这种权力。在这场复杂的三方面的争论

[34] 智利的实证主义者胡安·恩里克·拉加里格同样拥护巴尔马塞达。他的兄弟豪尔赫在法国时曾于1888年将一本小册子献给另一位未来的共和主义独裁者布朗热。

[35] 纳布科著《巴尔马塞达》，第14页，第219页。

[36] 《19世纪》报，1892年4月26日。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中，他既受到总统辩护者的反对，又受到“雅各宾派”，亦即“纯正的”或“民主的”宪法辩护者的反对。这些反对派称谢拉和他的集团为“科学家派”。对这个称呼他们泰然处之，感到自豪。[37]

阿根廷的矛盾同其他国家的矛盾相似，但也有独特的本国特点。科学政治不象在智利和墨西哥那样被正式提出来，虽然它的许多设想（溯源于阿尔韦迪和萨米恩托）成了自由派共同的信条。[38]从自由主义思想向实证主义思想的转变比在智利更为微妙不易觉察，到19世纪80年代两者更加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随着罗加和华雷斯·塞尔曼担任总统，独裁主义政府即便不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上站稳了脚跟，并且通过政教分离政策、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以及旧日各政党合并成为单一的民族自治党（PAN）而增强了地位。总统成了唯一政党的唯一领导人，被反对派称为“独一无二的职务”（unicato）。

1889—1890年的反对核心不象巴西或智利那样是议会，也不象墨西哥“科学家派”那样有明显的核心集团。公民联盟包括阿莱姆、阿里斯托武洛·德尔·巴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以及对过去外省人主张的新中央集权主义心怀不满的老牌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派罗加和华雷斯·塞尔曼。于是他们无疑地使阿根廷特有的宪法问题保存下来。公民联盟还吸收了前总统巴托洛梅·米特雷，他是一位有原则的老牌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政权腐化。公民联盟运动措词含糊的语言是立宪主义的，但它也有别处所没有

---

[37] “科学家派”（Los cientificos）一词的首次出现大概是在《19世纪》报1893年11月25日。

[38] 由于萨米恩托和阿尔韦迪很早就对教条式自由主义提出疑问，以及1870年以后精英分子们为物质进步和功利主义价值所困扰，所以阿根廷人中间一直有一种倾向认为实证主义是“土生土长的”，例如，亚历格德罗·科恩著《阿根廷的哲学》（1927），《文集》第3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40年），第261页。

的民主色彩的弦外之音。

卡洛斯·佩列格里尼（1846—1906）的成就是弥缝裂痕。他的事业和思想充分体现了立宪主义与科学政治的实际融合。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学家和国会议员，同时也是一位重视专业精于管理的人。他成了一位财政专家，在1890—1892年担任总统期间创建了国民银行。佩列格里尼担任这个“独一无二的职务”时并不自在。他是阿莱姆和德尔·巴列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老乡，即便在1890年事变时期也同他们保持接触。然而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中的一员，曾在1881年参加创建赛马俱乐部。他主要关心的是政府的连续性，因此曾在1892年成功地提议路易斯·萨恩斯·培尼亚作为民族自治党的总统候选人，从而使公民联盟受到挫折。路易斯·萨恩斯·培尼亚是公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罗克的父亲，他被提名，罗克·萨恩斯·培尼亚即退出竞选。

在所有这四个国家，政治和平很快得到恢复，由于对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方面的困难减少了。民族自治党在阿根廷一直执政到1916年，迪亚斯在墨西哥一直执政到1911年。智利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维持到1924年。在巴西（确立于1894年），宪法的“平衡”持续到1930年。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妥协情绪得势。在智利，针对巴尔马塞达的拥护者而采取的惩罚措施从未付诸实行。1894年8月宣布大赦，到1895年，巴尔马塞达派已在重新上台。墨西哥的“科学家派”被迪亚斯政府吸收为它的成员。胡斯托·谢拉于1894年被晋升到最高法院。这一任命对于司法独立的辩护士们本来几乎是一种侮辱。最知名的科学家派何塞·伊维斯·利曼图尔担任迪亚斯的财政部长直到1911年。[39]在阿根廷，公民联盟运动的米特雷支部同执政民族自治党彻底妥协。事实上，前者在1892年准备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罗克·萨恩斯·培

[39] 利曼图尔是1892年4月《自由同盟宣言》最初11名签名者之一。他于1893年3月被任命为部长，因此没有参加这场论战。

尼亚于1912年才当选为总统。

然而冲突遗留下一些重要的东西。科学政治中的权力主义冲动虽由于"立宪主义"寡头政治的复活而暂时受挫（墨西哥除外），总统权力却获得可用于未来战斗的新武器。在墨西哥的论战中，有一种见解出于原始民众主义的论据为强大的政府辩护，认为迪亚斯是努力打击农村中的奴役状况和上层阶级的暴虐行为的，然而，两者都只会由于法官不能撤换而加剧。[40]把巴尔马塞达说成是一位坚强的受人民拥戴的民族主义领袖，这种说法即使在1891年并不存在也是在那以后不久就发展起来，对20世纪的智利政治有巨大影响。民主思想也出现了，在阿根廷特别显著，那里的公民联盟在1892年发生分裂，产生激进党。在墨西哥的论战中，第三个集团是雅各宾派或教条主义立宪派。他们在1893年活动没什么成效，但确实为1900—1906年间许多地下自由主义俱乐部，最后又为1910年的革命运动创下先例。雅各宾派一词也出现于巴西，虽然它的民主含义颇有问题。[41]自由主义集团的破裂得到弥缝，政治统一得到恢复，但是新思想表明舆论趋同局面将不会不经未来的挑战而持续下去。

社会进化、种族和民族特性

经过数十年的充分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作为一整套社会思想，在拉美达到全盛时期。精英分子中间很少不同意见，他们确信社会是一个类似自然的有机体，随时间而变革。在众多的社会进化理论家中，拉美人最常引述的是赫伯特·

[40] 这个见解在《19世纪》报提出，主张者主要是弗朗西斯科·科斯梅斯，他于1893年12月14—30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同过去的同事谢拉分道扬镳。法官不得撤换这个措施虽经众议院通过，却被参议院搁置下来。

[41] 里约热内卢雅各宾俱乐部和一家雅各宾派报纸在1893年支持弗洛里亚诺，拥护极端共和主义（反君主政治）和仇外（反葡萄人）的立场。

斯宾塞。他成了时代的象征，虽然其实际影响或许不及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两大柱石”的另一个）。尽管斯宾塞的进化规律和他的系统使用生物学作为社会理论的模式具有吸引力，他的关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些设想比不上孔德的见解那样同伊比利亚人的传统习惯气味相投。斯宾塞一生坚持自由放任和功利主义，如在他的第一本著作《社会静态学》（1850）和最后一本著作《人与国家》（1854）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想象中的“工业社会”（人类进化的顶点）是个人主义的、自由的和没有国家的（理想化的19世纪英格兰），虽然他认为这些特点是习惯和本能经过好多世纪与自然相适应的产物，而不是人类理性选择的产物。[42]孔德的理想是一种按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非竞争性的集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和社会合而为一。

尽管斯宾塞的思想对各派政治纲领影响有限，它们比起孔德的思想更是1890年至1914年之间知识界对拉丁美洲社会强烈关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斯宾塞的进化系统是以具体社会的发展为基础，他的著作充满了大量的有关具体的习俗、信仰、礼仪和种族特征的比较资料。因此，一般说来，斯宾塞帮助拉美人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普遍系统中自已社会的特点。他的思想有孔德思想所缺少的人类学方面的性质。孔德的体系是假设人类进步（按照几乎是18世纪的意义）就是欧洲白种人的进步。[43]他在《三阶段规律》中把社会比作人类智慧，而斯宾塞在“进化规律”中则把社会完全比作自然。

斯宾塞进化系统的一个因素（虽然不是主要因素）是种族，

---

[42] J·W·伯罗著《进化与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理论的研究》（剑桥，1966），第222—223页。

[43] 约翰·C·格林著《19世纪的生物学与社会理论：奥古斯特·孔德和赫伯特·斯宾塞》，载马歇尔·克拉格特主编《科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麦迪逊，1959），第427页。

它成了拉美社会思想全神贯注的事物。现代欧洲种族主义似乎产生于至少两个来源，它们都同拉美的理论建立有关，但到19世纪90年代两者很难分开。第一个来源是寻找民族的起源和特点，如浪漫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文学和语言学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个"种族"只不过是长时间中发展着的民族，它在语言、宗教或地理方面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这主要是一种欧洲式集团划分或是它的前身，例如中亚的"亚利安种族"。在拉美，1870年以前我们有时遇到这种意义的种族，例如在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书中。法国人阿蒂尔·德·戈比诺伯爵臭名远扬的种族主义观点部分地就是由此产生，加上贵族式的对民主政治、早期的群众社会和民族混合的反感，这种种族主义观点就更加强烈了。[44]再有一个而且更有影响的对种族的历史意义进行阐述的人是伊波利特·泰纳，他为自己的《英国文学史》(1864)所写的著名导言在拉美广被阅读。

19世纪种族主义的第二个来源来自经验主义和人类学方面，亦即，由于接触增多，欧洲人对待原始的黑色皮肤诸民族的态度发生变化。"高尚的野人"和"文明"到处都有的开明思想，让位于关于穷乡僻壤的原始民族实际贫穷落后的科学的证据，让位于由此得出的概念，认为只有某些"种族"，也就是由于具有永远遗传的体质差异而与众不同的某些人类集团才可能开化。[45]在体质人类学这个学科的发展中相似的思想是"多元发生说"(各种族

[44] 迈克尔·D·比迪斯著《戈比诺和欧洲种族主义的起源》，载《种族》杂志，第7卷(1966)，第225—270页。戈比诺的主要著作是《论人类种族不平等》(1853—1855)。作者这里使用"种族主义"一词指的是那些理论，它们把社会的变革、心理和行为，不管表现得多么明确，一概认为是由于种族原因。因此，一种理论可以算是种族主义的，它不必一定假设非白种人天生永远低劣，虽然多数理论包含有这种假设。

[45] 小乔治·W·斯托金著《种族、文化和进化》，载《人类学史论文集》(纽约，1968)，第13—41页。

分别诞生），它与出于《圣经》的上帝造物的传统“一元发生说”，或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物种原始》(1859)和《人类起源》(1871)的科学的一元发生说相对立。多元发生说内在的种族主义即使不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中证明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并存不悖，亦即最能适应生活竞争的民族（或种族）能够生存。因此，拉美人对种族的偏见由于斯宾塞思想具有的达尔文主义观点以及其他有影响的进化论者如路德维希·贡普洛维奇和恩斯特·海克尔等人具有的这种观点而进一步加深。

方兴未艾的心理学学科为19世纪的种族意识提供另一方面内容；拉美的种族主义思想有许多是采取探究社会心理学的方式。泰纳大概是这一流派的最早倡导者，虽然到1900年拉美人更直接地受居斯塔夫·勒邦的指引，勒邦是“他那一代科学通俗化的最大鼓吹者”和读者最多的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家。[46]泰纳在1864年说，作为科学家，历史学家必须探索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状态”或“心理”，它存在于肉眼可见的人工制品、文学创作或政治文献的表面事物下面。历史上有形的人或外在的人显示出无形的人或内在的人。这种心理产生于三种“原始力量”——种族、环境和时机——的作用。[47]在泰纳的历史体制中，种族只是一种决定因素（种族的定义是“天生的或遗传的倾向”通常与“气质和体格构造方面的明显差异”联在一起），可是在勒邦的《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1894)一书中，种族成了主要的决定因素。在这本书里，种族的历史学概念和人类学概念聚集到一起同19世纪社会科学的其他许多论题结合起来。

399

---

[46] 罗伯特·A·奈著《大众心理学的起源：居斯塔夫·勒邦与第三共和国群众民主的危机》（伦敦，1975），第3页。

[47] H·A·泰纳著《英国文学史》（第6版，巴黎，1924），第1卷，第22—23页。拉美的思想家大概很为泰纳所吸引，这是部分地由于他似乎是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完美结合。继《英国文学史》之后，他发表了《论智慧》（1870），那是科学心理学发展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

“种族是关键，然后是气候，继之是历史。这一切互相补充，但血统（心理遗产）是事态的主要动力……”。这是阿根廷人卡洛斯·O·本赫（1875—1918）在所著《我们的美洲》一书中写的，那本书是典型的勒邦派作品，在西班牙美洲各地受到欢呼。[48]勒邦强调种族或民族的“心灵”。他说，“心灵”就是一个种族或民族的“心理素质”，或决定其进化的精神和智力的特征。他认为这些特征实际上是不可改变的，不断地由遗传加以复制。“一个种族的缔造是由于它的死者〔而不是由于它的生者〕”，这是他的名言。[49]他进而从心理学方面对各种族进行分类，分出高低等级，强调性格比智力更关紧要。在他的四种类别中，只有印欧种族属于优等，而盎格鲁撒克逊亚种显然高于拉丁亚种。性格来自渗透于种族心灵的思想，成为永久的无意识情绪，诸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责任感与拉丁人的对平等和对倚靠国家的追求相对立。他提出美洲各地作为他的心理规律证据。北方的进步和安定与南方的“流血的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的独裁统治”在他看来显然是由于欧洲种族性格差别的结果。[50]此外，南美洲只是勒邦认为为普遍存在的拉丁民族颓废作风的一例。

勒邦早年行医，他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是诊断学方式的，这是同样也渗透在拉美人思想的特点。许多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大陆病夫的诊断医生”[51]。他们的悲观主义不仅来自勒邦的结论，认为拉丁种族是颓废的，而且也来自科学方面流行的对种族混合的责难。勒邦的确承认新种族的形式，如同在欧洲，只能来自通婚。混合在开始是破坏种族的心灵，导至一个“内部斗争和盛衰交替时期”，逐渐地从中出现一个新的心理品种。勒邦写道，

[48] C·O·本赫著《我们的美洲》（巴塞罗那，1903），第20页。第二版加上副标题《社会心理学论文集》。

[49] G·勒邦著《民族进化的心理规律》（第3版，巴黎，1898），第13页。

[50] 同上。第111—116页。

[51] 此说法来自马丁·S·斯塔布《追求特性》（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州，1967）的第二章。

结果可以是积极的，只要符合某些条件：杂交的种族必须不是人数太不均等；他们的性格必须不是太不相似；他们必须在同样环境条件支配之下。这些条件在欧洲和北美虽然一般存在，而在拉美则显然不存在，结果产生心理上不稳定。[32]对一个既是拉丁人的又是梅斯蒂索人的大陆来说，前景则是暗淡的。发表拉美种族悲观主义言论的人物超越国界遍布整个半球。举3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即：本赫写《我们的美洲》（1930）；玻利维亚人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1878—1946）写《病态的民族》（1909）和秘鲁人弗朗西斯哥·加西亚·卡尔德隆写《美洲的拉丁民主政治》（1912）。这三本著作都是最初在欧洲出版，有欧洲知识界杰出人士写的颂扬备至的引言。[33]阿格达斯和加西亚·卡尔德隆生平大部在法国度过；后者有些著作实际还是用法文写的。这几本著作中有两本通盘考察了拉美的情况，作者们的民族倾向不太明显，第三本书《病态的民族》虽是一本有强烈的玻利维亚意识的著作，其意图却是（而且常被认为）普遍适用于拉美。[34]这三本著作都以夸张的形式揭示拉美思想的倾向——接受那些有损于地区或国家自尊的欧洲学说。这是实证主义时代达到顶峰的自我贬抑。

本赫写道，西班牙语美洲是一个种族的"空中楼阁"。不象美国人，美洲的西班牙人不是纯种，而是"梅斯蒂索化、印第安化的和穆拉托化的欧洲人"。每个族群有它自己遗传的心理特点，而各共和国的"民族心理"因各自特有的种族混合情况而有差别。可是，构成"种族精神"的是三个基本特征：傲慢（源自西班牙人，可追溯到西哥特人）、忧悒（源自印第安人）和懒惰。

[32] 勒邦著《心理规律》，第43—50页。他说，混血儿比例过大的国家，"完全由于这个原因陷于不断的无政府状态，除非以铁腕进行统治。"他举巴西为例，并且（在第35页）引用了路易斯·阿加西斯的著作。

[33] 头两种在巴塞罗那出版，第三种在巴黎出版；引言分别为拉斐尔·阿尔塔米拉、拉米罗·德·马埃斯图和雷蒙·普安卡雷所写。

[34] 参看作者的本书第2版（1910）前言，包括何塞·E·罗多的评语（第8页）。本书头两版的副标题是，《西语美洲诸民族对心理学的贡献》。

从科学上分析，傲慢和懒惰出自同一根源。“在动物界，傲慢是无力自卫者的保护性本能；在人类，它是懒惰者的保护本能”。懒惰（克里奥尔人的懒散）在本赫看来是一种“受之父母的品质，”他认为精英分子中间缺乏想象力、权贵政治（caciquismo）的倾向、以及最常见的对工作不屑一顾的态度，原因都在于此。本赫说，“工作是进步，懒惰是堕落。”[55]本赫种族特征论的单调的悲观主义为加西亚·卡尔德隆理论的矛盾情绪所代替。这两本书出版间隔十年，其间经历的景象是，哲学上对实证主义的反对越来越多，对拉丁精神有了新的评价。我们将看到，虽然加西亚·卡尔德隆是新理想主义的主要发言人，《拉丁民主政治》一书却是追随本赫和勒邦。对加西亚来说，种族问题是“解决使〔拉丁〕美洲陷于四分五裂无可救药的混乱情况之关键。”他想象着“才气焕发而又懒惰的“克里奥尔人是未来真正的美洲人，然而他似乎排除了统一的可能，因为缺少勒邦所谓的进行建设性混血的条件。[56]

自我贬抑大概随阿格达斯达到顶点。然而他的《病态的民族》一书比起本赫或加西亚·卡尔德隆那种流畅的种族理论又有超过的地方。它也是对玻利维亚的地区文化作了引人思考却又令人沮丧的描述。这种描述展示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另一倾向，即趋向于描写真实情况的冲动。在阿格达斯看来，地区心理似乎更多地是由地理决定而不是由种族决定。他把艾马拉人的性格严酷说是象他们居住的高原环境，恰象“喜欢幻想、胆怯、而深有是非感”的克丘亚人反映了科恰班巴谷地的“地中海型”环境。[57]可是，当阿格达斯从地区转向国家，从印第安人转向梅斯蒂索人

[55] 本赫著《我们的美洲》，第77页。该文集后半部更是特别从种族方面解释政治。对此，下文将加讨论。

[56] F·加西亚·卡尔德隆著《拉丁民主政治》，第337页。勒邦是加西亚·卡尔德隆著作在其中发表的一套丛书的主编。

[57] A·阿格达斯著《病态的民族》（1909），第38页、第79页。重要的是，在谈到地区心理本身时，阿格达斯求教于泰纳（第68页）。

（乔洛人）时，种族就成了性格的主要决定因素。他对境况可怜、营养不良和受剥削的印第安人表示某种同情，但对乔洛人只是看不起。[illegible]虽然他把国民心理中许多缺点——欺骗行为、好作空论、缺乏事业心、思想贫乏等等——归咎于印第安人血液的大量注入，[illegible]他却不把这些缺点等同于印第安人特征本身。因此，阿格达斯的社会学透露出种族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紧张关系，这在以民族特性为主要关心事物的其他实证主义者身上就更加突出了。 402

虽然种族悲观论者没有强调解救西班牙语美洲社会困境有何良策，他们却的确趋向于把传统的自由主义万应药方（欧洲人的移民）视为永远灵验。本赫极力主张"通过工作"实现欧洲化。加西亚，卡尔德隆强调巴斯克人*的作用，特别强调已经在改变阿根廷面貌的意大利人的作用。阿格达斯论断说，玻利维亚国民性格的深刻缺点只有通过激烈方法才能改变，好象园艺学中的嫁接那样。他还提议进行"有选择的"移民。[illegible]

种族决定论的论断使巴西人特别不安，因为巴西居民到1890年约有15%是黑人，40%是梅斯蒂索人或穆拉托种人。许多巴西作者（例如西尔维奥·罗梅罗和雷蒙多·尼娜·罗德里格斯）承

[illegible] 阿格达斯还写有一本屈辱印第安人的小说《瓦塔·瓦拉》（1904）和后来的改写本《黑色皮肤的种族》（1919）。参看马丁、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11章。应注意的是，他对梅斯蒂索人的反感在作了许多更动的《病态的民族》第3版（1937）中尤为突出。例如，在那里梅斯蒂索人的心理这个题目被加以扩充，专设一章。他的态度变化可能反映了他自己在政治经历上备受挫折。他（一个贵族）声称政治上受乔洛人统治。

[illegible] 阿格达斯书中《民族性格》一章一开头（第91—92页）就引用本赫的话。

* 巴斯克人（Basques）是居住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比斯开湾边界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西麓的一个民族，有很多移民在南美洲——译者。

[illegible] 本赫《我们的美洲》，第98页；加西亚·卡尔德隆，《拉丁民主政治》，第339—340页；阿格达斯，《病态的民族》，第244页。

认进化论思想中对人种混合的控诉，忍受访问学者如戈比诺和美国博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之流提出的严厉的社会指责。然而到1900年，其他社会理论家中间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倾向于对巴西的多种族社会作出合理解释，借以对抗极端的种族悲观论。他们开始表达那种信仰，认为人种混合和欧洲人移民是在不可避免地导致"白人化"，因之是在导致进步。

这种乐观派之一是一名青年记者、军事工程师和热情的共和主义者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他在19世纪90年代主张的温文尔雅的实证主义，由于巴伊亚州卡努杜斯地方的内地人（sertanejos）的一场据信是亲君主主义的和笃信宗教的反叛遭到了考验。达·库尼亚于1897年受他的报纸《圣保罗州报》的派遣，目击种族混合的反叛者进行的激烈抵抗，随后政府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现代化炮兵支援下把他们彻底消灭。他的记者之行产生了《腹地》（1902）这本描写这场冲突的巨著，书前有一篇正规的科学论文论述这片腹地的"各个亚种"以及他们成功地与不适于居住的、干旱频仍的环境互相作用的情况。达·库尼亚的叙述揭示出承认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同经验主义的认识之间存在着矛盾。后者认为有适应能力的腹地居民（内地人）可能是"我们民族特性的核心，我们种族的基础"。[㊸]他提出理论，认为梅斯蒂索人心理不稳定、颓废、退化，总是趋向于成为原始的种族，是"生物学法则宿命论的牺牲品"。卡努杜斯是一场长期斗争的"第一次攻击"，"强大种族不可避免地压垮弱小种族"。达·库尼亚（引证波兰社会学家贡普洛维奇）把这个过程同文明的前进等量齐观。可是他又说，内地人是"业已形成的种族小分支，它是有历史意义的未来亚种"。它同沿海隔绝了三个世纪，一直未曾蒙受争取种族生存之苦，因此可以自由地适应环境。于是达·库尼亚对沿海"患佝偻病的"梅斯蒂索人和腹

403

㊸ E·达·库尼亚著《腹地反叛记》〔《腹地》英译本〕（芝加哥，1944）第464页；又第481页的作者注（1905年本），他在注释中对基础这个比喻作了解释。

地“强壮的”梅斯蒂索人加以区别。[62]然而他似乎是打破了自己的理论，因为在描写战到最后的卡努杜斯捍卫者的非凡胆量、英勇行为和从容安详时，又说他们是“位于我们种族阶梯最低层的人”。[63]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没有放弃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种族主义，他给社会思想带来一个新问题——对民族特性怀有种族偏见。

达·库尼亚提出的问题在19世纪的墨西哥受到热烈讨论，这是部分地由于墨西哥晚近历史的独有特点。两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独立革命”和“革新运动”——引起广大群众参与和社会冲突。许多爱国英雄（包括莫雷洛斯和华雷斯）是梅斯蒂索人或印第安人。在“革新运动”之前，知识界精英曾试图不顾印第安人而支持克里奥尔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一篇不同寻常的19世纪中叶文章中，墨西哥学者弗朗西斯科·皮门特尔（1832—1893、描绘了一幅印第安人堕落退化的凄凉图景，而他的救治办法仍然是克里奥尔自由派的那一套：外来移民、人口白种化和“在事实上以及在法律上”取消种族这个字。[64]1870年以后，进化论思想的注入带来了新的种族意识，但结论一般是乐观主义的。例如胡斯托·谢拉的历史著作，主题是墨西哥民族作为一个“自治人格”的成长，其中一个要素就是种族混合。他说，我们墨西哥人是两个种族的子孙，是征服所诞生的，是西班牙和土著居民土地上的产物。“这一实情支配着我们全部历史，我们的灵魂归功于它”。[65]

---

[62] 达·库尼亚，《反叛记》，第84—89页，第xxix页。贡普洛维奇是一位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种族斗争是“历史的动力”。

[63] 同上书，第440—441页，有他对一名黑人俘虏的动人描写，这个俘虏走向行刑时，由“形容枯槁象一个患病的猩猩”变成古希腊大力神“泰坦”形象的“雕塑杰作”。

[64] F·皮门特尔著《墨西哥土著居民现状产生原因见闻与救治办法》（1864），《全集》，第3卷（墨西哥，1903），第148页。

谢拉特别驳斥勒邦关于人种混合造成衰弱后果的理论，他证明梅斯蒂索人口在19世纪增长了两倍，他们是“我们历史中〔政治上〕动力要素。”[66]虽然他有时主张以外来移民和教育作为社会补救办法，他的理论并非种族白人化。对他说来，民族特性寓于梅斯蒂索人。

对墨西哥社会种族混合的另一种实证主义评价出现在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1866—1940）所写《墨西哥社会学》这本严肃的著作里。他是一名州法官，不属于波菲里奥派精英分子圈内。墨西哥社会大变动的前夕1909年出版的《巨大的民族问题》一书强调土地问题和土地分配的不合理，因而使这本书成为闻名的革命先锋（虽然读者寥寥）。莫利纳是一个环境决定论者，他引证海克尔的有机体与无机体有统一性的理论，认为生物体的选择与适应是源自“生命氧化”的内部力量与自然界的外部力量之间斗争的结果。一个种族只不过是一群人，他们（通过上述过程）适应于相同的环境条件因而“获得了结构的统一性，表现为某种统一的型别”。莫利纳虽然进而对墨西哥各种族进行科学分类，他却承认这种分类无论如何都有缺陷——主要由于墨西哥历史的实际情况。他对梅斯蒂索人的描述并非总是说好话，但整个说来，他承认人种混合是不可避免的和积极的力量。例如，他认为“共和体制”的最大好处是国民平等，“它大大有助于各种族的接触、混合和融合，导致形成一个单一的种族。[67]

---

[65] J·谢拉著《墨西哥民族的政治演变》，《全集》第12卷，第56页（1900—1902，第1版）。应当注意的是，梅斯蒂索人在谢拉只是指印第安人和白人的混合种，而在巴西的达·库尼亚则是指黑白人混血种或印第安人—黑人—白人混血种。

[66] 谢拉著《墨西哥的社会与政治。一本书的笔记。》（1889），《文集》，第9卷，第128—131页。他引证了勒邦在前一年发表在《科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

[67] A·莫利纳·恩里克斯著《巨大的问题》，第34—37页。莫利纳还从进化论观点对财产权进行分类，印第安人的村社财产权被列为低于欧洲式个人拥有的财产权形态。他的观点影响了1910年以后的两种假设：（1）一切财产权向较高级形态演变；（2）实用性要求暂时承认村社财产权并使之合法化。

由于不存在大量的印第安人居民或黑人居民，阿根廷社会思想的主要问题不是种族混合对国民特性的影响，不象在玻利维亚、墨西哥或甚至巴西那样。在1879年对“荒漠地带”（即印第安人边远地区）的军事征服以后，阿根廷的印第安人在南部和西北部陷于地区性孤立，为实证主义时代的知识界和决策者所大大忽略。社会思想的焦点更确切地说是汹涌而来的欧洲移民对稀少的克里奥尔人居民的影响。统计数字本身是引人注目的。到1914年已有约240万外来移民（其中四分之三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永久定居在阿根廷，而总人口的30％是外国出生的。集中程度最高的是沿海诸省，特别是联邦地区。“新”阿根廷，就象乌拉圭和巴西南部，在种族上是一个南欧省分。虽然拉美各地的精英分子长期以来主张由欧洲人在农村殖民，阿根廷对城市移民浪潮的现实所作的反应充其量只是忧喜参半。

对新社会性质的关心，成为在现代拉美至今仍是最突出的1900年至1915年之间科学与文化高潮的一部分。实证主义思想似乎在“高雅风流年代”*的阿根廷找到自己的理想环境。当时阿根廷之臻于兴盛是由于出口经济空前繁荣，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展成为复杂的世界性城市，和统治阶层中间有着持续的舆论趋同局面。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人”上层人物的文化抱负在纪念碑式的哥伦布大剧院中得到充分表现，它设计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1908年最后完成。1905年国立拉普拉塔大学的创建，特别是它的法学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创建表明社会科学在知识界生活中占有的特别地位。一系列重要杂志，从《法律、历史和文学评论》(1898年创刊）开始，到《哲学评论》(1915年创刊）殿后，使人想起19世纪末法国知识界《两个世界评论》及其他重要的杂志的盛况。重要的科学家、社会理论家和他们的大量著作，引人注目。

---

* 高雅风流年代（belle époque），指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文学艺术大繁荣的时期。这里借用以喻阿根廷当时的繁荣局面。——译者

阿根廷实证主义时代的“典型学者”是弗洛伦蒂诺·阿梅吉诺（1854—1911）。他是一位地质古生物学家。对拉普拉塔河地区人类考古的大量研究使他闻名世界。在他的著名宣言《我的信条》（1906）中，他对科学和人的可完善性抱有绝对信念。他说，追求真理将成为“未来的信仰”。何塞·因赫涅罗斯称他是“现代圣人”。阿梅吉诺的唯科学主义是极端的，可是它鼓舞了许多人追求把科学应用于社会。[68]在实证主义的灿烂群星中另一颗明星是何塞·马里亚·拉莫斯·梅希亚（1849—1914年）。他是医学（特别是精神病学）方面的先驱者，创立了从医学研究社会问题的国民传统。继《神经病和精神病临床研究》（1893）之后，他发表了《阿根廷的群众》（1899），那是一本勒邦式的群众心理学的应用。随后又继以它的续篇《罗萨斯和他的时代》（1907），把考迪略说成是源于群众的事物。[69]胡安·阿古斯丁·加西亚（1862—1923）在他的《阿根廷社会科学研究导论》（1899）一书中支持法学和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严密性。他在《印第安人城市》（1900）一书应用了他的方案，那本书是本有持久价值的著作，强调经济利益和社会结构在殖民制度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已经谈过，阿根廷社会思想对形形色色不断变化的欧洲思想极为敏感。实证主义时代的另一特点是以几乎过度的努力来创立“阿根廷的”社会学，把它建立在19世纪思想家们的思想之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亦即趋向世界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

[68] F·阿梅吉诺的著作分成24卷对开本出版（拉普拉塔，1913—1936）。《我的信条》在第15卷第687—719页，因赫涅罗斯的颂词在第1卷第33—35页。又参看里卡多·罗哈斯的演讲词，《文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22）第2卷，《典范人物》），第197—237页（《学者阿梅吉诺》）。

[69] 参看J·因赫涅罗斯《何塞·M·拉莫斯·梅希亚的思想品格》，载《哲学评论》，第2卷（1915），第103—153页。因赫涅罗斯是在拉莫斯·梅希亚指导下接受精神病学训练的。

双重阿根廷倾向，集中体现在最著名的阿根廷实证主义者何塞·因赫涅罗斯（1877—1925）的著作里。除了全神贯注于阿根廷社会以外，因赫涅罗斯（至少直到1915年）渴望成为一名“科学家”。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犯罪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他在欧洲得到广泛承认。1915年以后，他转向哲学和伦理学。他的著作是一个真正的美洲大陆作者及其思想的百科全书。他游历广泛，比起同时代的学者毫无逊色。然而他关于阿根廷社会问题演变的研究是以埃切韦里亚、萨米恩托和阿尔韦迪的前提为基础，并且写了关于他们思想的大量论文。⑩他还编辑了一部阿根廷古典著作丛书，叫做《阿根廷文化》，其中收入萨米恩托的未完成著作《冲突与和谐》，该书自1883年发表后已被人遗忘。

在《阿根廷社会学》（1913）一书中，因赫涅罗斯试图把“生物的”社会学和“经济的”社会学“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历史经济主义）——特别是意大利理论家阿基莱·洛里亚所拥护的那一种——结合到一起。虽然洛里亚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那是鼓吹杰出人物统治，是自由放任主义，因赫涅罗斯却采取折衷态度，对这种矛盾漠然无动于中。⑪他把阿根廷历史描写为各社会集合体之间一场生存竞争，同时又是一种经济决定的进化过程，从本地的野蛮状态走向西班牙封建统治，走向农牧业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国家管理下有巨大集体功能的进步的社会化”。阿根廷同其他白种人国家共

407

⑩ 最初发表在1915—1916年。这些论文由因赫涅罗斯收进1918年出版的《阿根廷社会学》，重印为《全集》第8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第214—304页。

⑪ 参看A·洛里亚《现代社会问题》（伦敦，1910），第104页，第118页（1894年第1版）。因赫涅罗斯显然常常引证洛里亚作品；重要的是他忽然无视洛里亚的重要主题——自由土地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殖民地地区的作用。洛里亚的理论对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很重要。参看李·本森，《阿基莱·洛里亚对美洲经济思想的影响：包括他对边境地区假说的贡献》，载《特纳和比尔德》（纽约，1960），第2～40页。

同享有这种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过渡。因赫涅罗斯是一个先驱社会主义者，直到1903年他在政治上很活跃；然而逐渐地他放弃了自己对阿根廷社会所作的带有社会主义观点倾向的解释。[72]

因赫涅罗斯积极看待晚近欧洲人的汹涌到来。这或许是部分地由于他自己父母是意大利移民的缘故。对1883年的萨来恩托来说，国民的大弊是西班牙人遗产和梅斯蒂索人气质；他的补救办法是民众教育和外来移民。因赫涅罗斯要人们永远记着这种观点，他在《一个阿根廷民族的形成》(1915)一文中说，虽然第一批（殖民主义的）移民没有什么结果，第二批移民却在使民族特性巩固起来。他写道，温带地区一直有着“由白色外来移民种族代替土著有色种族的进步行动，从中产生新的社会来代替本地的社会”。这个过程只不过是物种在既定环境中的一场生存竞争，适者可以生存。当物种混合时“更能适应自然和社会双重环境”的品种占居优势。他对种族下的定义是“有共同习俗和理想的同一性群体”。这是历史学的概念而不是人类学的概念。因赫涅特罗把阿根廷人描写为一个由“劳动的、受过教育的人”构成的种族，眼下受到“欧洲的尊重”。他断言确有阿根廷传统的存在。它与国家地位生而俱来，得到“我国思想家们”的理想的滋育。它是一种指向未来而不是指向过去的传统。[73]

408

1915年时，没有几个大知识分子与因赫涅罗斯所持的对外来移民的实证主义观点有共同的看法。相反，他们同情日益增长的

---

[72] 在1913年马德里版的《阿根廷社会学》(第8页）序言中出现的“进步的社会化”这句话，在1918年版本中被删去。因赫涅罗斯的作品大有编列文献目录的需要，因为他热衷于发表，所以往往在后来的出版物中重印早年著作（小作修订)。他的“阿根廷社会学”以许多修订本出版，但其主要论点最初发表至1898年在1910年的一系列论文中。

[73] 《一个阿根廷民族的形成》一文首见于因赫涅罗斯的主要杂志《哲学评论》第2卷（1915）第464—483页，然后又见于《社会学》一书的1918年版。

仇外情绪，这种情绪部分地是精英分子对成群结队的欧洲人农民和工人作出的反应，这些农民和工人有的在城市商业和在各种行业中发家致富。外来移民成为城市社会问题的替罪羔羊，当时的心理学家认定外来移民比下等的克里奥尔人更容易犯罪。由于社会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随着外来移民而发展，1900—1910年这十年的工潮遂被归咎于外来的极端主义分子。第一个限制移民的法律于1902年通过，随之发生一场影响很大的总罢工。另一个法律于1910年在哥伦布大剧院发生炸弹爆破事件之后通过。一位众议员认为这个罪行是由于“怯懦的、可鄙的、外来的思想”。1910年社会保卫法的拥护者当中有拉莫斯·梅希亚，他对外来移民的敌视早在1899年就见于他的《阿根廷的群众》一书。还有本赫，他对外来移民的好处所作的评价在《我们的美洲》一书问世后的几年中就有了急剧的变化。

“世界主义”一词有了新的用法，不再指精英分子的欧洲文化影响，而是指唯物主义和晚近外来移民的政治激进主义。它所引起的反应是民族主义的。里卡多·罗哈斯（1882—1957）在他的《恢复民族特性》（1909）一书中鼓吹在阿根廷的历史和价值准则方面进行新的教育以作为一种手段引导未来世代的人躲开那种“会使他们把进步与文明混为一谈的卑鄙的唯物主义”。⑭他同时代的人曼努埃尔·加尔韦斯（1882—1963）在《加夫列尔·基罗加日记》（1910）一书中令人想起克里奥尔人省份的传统习惯，而在《种族的太阳》（1913）一书中令人想起西班牙的传统习惯。虽然加尔韦斯的论断后来变得极端化了，可是在这个阶段他的持论还是调和主义的。他写道，“现代的阿根廷〔虽然〕建立在外来移民或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上，〔却〕可以而且必须保持阿根廷特性的基础”。⑮罗哈斯和加尔韦斯都强调复兴人道主义和精神

⑭ R．罗哈斯著、《教育方面恢复民族特性的情形》（布宜诺斯艾利斯，(1901）第64页。

⑮ M．加尔韦斯著《种族的太阳》（第5版，马德里1920），第17页至18页注。

文明的价值。他们强调反对外来移民势力，从新理想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挑战中汲取力量，这点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409 外来移民在智利社会思想中不是大问题，主要因为涌来的外国人为数很少，一般是中等阶级，他们主要来到居民稀少的北方而不是来到中部谷地。精英分子（例如莱特列尔）的反应一般是宽厚的，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1854—1911）。他的极为流行的著作《智利的民族》（1904）象勒邦那样拥护生物学的种族主义（他经常引用勒邦作品），并以之得出关于种族混合在国民特性中的作用的独特论断。他说，真正的智利民族是梅斯蒂索人，他兼有西班牙征服者（溯源于斯塔的纳维亚的"哥特人"血统和凶猛不羁的阿劳科族印第安人的优秀品质。晚近劣等的"拉丁种族"的到来是有害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意大利人）应予削减。帕拉西奥斯所拥护的别具一格的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在智利有着持久的影响。

社会决定论与考迪略的统治

1890年至1914年社会思想中内在的种族和环境决定论，至少使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展的那种对拉美政治的诊断更加犀利、更为扎实。随着法律开始被认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发挥，早年那种对立宪工作的功效寄于的信心消失了。随着孔德实证主义的到来，自由主义学说和立宪方案被打上"形而上学"的烙印。1870年以后，见解趋同的精英分子向科学政治寻求救治混乱的办法，寻找一种可以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加强统治（常是通过宪法改革）和保证经济进步的纲领。纲领性的科学政治和诊断性的社会思想并不互相冲突。它们只不过是19世纪实证主义内部的不同变种，前者主要来自孔德，后者更多来自达尔文和斯宾塞。虽然后者往往比前者更悲观、更往自己身上抹黑，它们都为拉美政治行为立下了老框框，今天仍为一般人所接受，特别是在外国人中间。

卡洛斯·O·本赫争辩说，一个国家的政体应该解释为它的种族和心理遗产的“有机的”自然产物，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抽象概念”。阿格达斯赞许地引用勒邦的话说，“政治制度……是一个民族文明阶段的表现。它们随文明阶段而演变”。本赫写道，如果一个国家的有机结构是君主制或共和制的，“它的车间，它的实验室、它的艺术以及它的书籍就会是君主政治化或共和政治化”。在拉美，地方权贵*政权是个有机体，那里的全部生活都是“地方权贵操纵”。[76]悲观主义者认为，独立是不成熟的，一方面是外来思想的产物，一方面是地方政治首领或考迪略的个人创造。缺乏制度平衡的任何有机的原则，结果只是在无政府状态与专制主义，即本赫所谓“美洲病”的两个方面之间的轮流交替。因此考迪略是一种自然现象。按加西亚·卡尔德隆看来，大考迪略，如罗萨斯、波瑞莱斯和迪亚斯之流是那些由于“阐明〔他们的〕种族的内在声音”，能够以强力实现政治统一和推进物质进步的人。本赫随声附和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称波菲里奥·迪亚斯是“进步的地方政治首领”，是19世纪伟大政治家之一，“他统治墨西哥当之无愧”。[77]

410

愈来愈多的人承认考迪略是一种社会决定的、自然的政治现象，这不但出现在通俗文章中，也出现在比较精心写作的历史书籍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例是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统治，他的1831年至1852年的联邦主义政权，由阿道弗·萨尔迪亚斯（1847—1914）、何塞·马里亚和弗朗西斯科·拉莫斯·梅希

---

[76] 本赫著《我们的美洲》，第158页，阿格达斯著《病态的民族》，第207页

* 地方权贵（caciques），“cacique”一词原意是印第安部落的酋长，转义指地方权贵、豪门或地方政治首领。——译者

[77] 这种阐释的另一重要例子是《阿根廷无政府状态与考迪略制度：阿根廷起源的心理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1904），该书是由医生变成社会论文写作者的卢卡斯·阿亚拉加赖（1861—1944）所著。虽然本赫认为考迪略制度是一种“畸形的”地方首领政治，其他作者，包括阿亚拉加赖对两者并不加区别。

亚（1847—1893）两兄弟以及埃内斯托·克萨达（1858—1934）各人所写的著作大力加以重新解释。这些作者声称要科学地研究罗萨斯和联邦主义，从而超越前此曾经导致在1852年以后的岁月中中央集权派对“暴君”进行半官方的谴责那种党派情绪。何塞·马里亚·拉莫斯·梅希亚声称只受“冷静的好奇心”指引；他的研究方法将是“一个昆虫学家研究一种新昆虫”的方法。萨尔迪亚斯心目中想象自己在对“社会躯体“进行”尸体剖检“以便发现”胎儿的性质，那胎儿就是罗萨斯”。[78]对罗萨斯时代的修正看法也是阿根廷特定政治情况一个比较具体的产物，特别是由于各省对中央集权的反对越来越严重，以及公民联盟内的民主冲动。在《阿根廷联邦制》（1889）一书中，弗朗西斯科·拉莫斯·梅希亚认为那种现象是殖民地历史的天然遗产，而不是独立时期人为的移植。萨尔迪亚斯探求了解何以群众当时会拥护罗萨斯，企图由此发现他们在罗萨斯时代以后所走的道路。他得出结论说，这位独裁者是“阿根廷乡村地区的感情、思想和愿望的化身”。[79]

411

修正主义运动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克萨达文体明晰的论文《罗萨斯与我们时代》（1898），那是综合了他在1893年以后发表的许多专著的作品。克萨达曾就学德国，给他的国民带来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标准和前提。在克萨达看来，罗萨斯只不过是他的时代产物，“不多也不少”；他的“专横”并不比许多“中央集权派”地方首领的专横更厉害。由于阿根廷的民众缺乏“政治教育”，自由制度无法起作用；结果就是无政府状态和小型的独裁。

---

[78] 何塞·马里亚·拉莫斯·梅希亚，《我们时代的罗萨斯》（第3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27）第1卷，第xxxiii页（第1版，1907）；A·萨尔迪亚斯《阿根廷联邦史：罗萨斯与我们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51），第3卷，第497页（第1版，1881—1887）

[79] 萨尔迪亚斯著《阿根廷联邦史》第3卷，第487页。萨尔迪亚斯和弗朗西斯科·拉莫斯·梅希亚在公民联盟内部都很活跃，萨尔迪亚斯在1892年将著作加以扩充重新发行。

罗萨斯提供了民众所要求的"专制的"领导。他的联邦主义不是地方主义；相反，它使混乱出现统一和秩序。克萨达说，"到1852年，他的历史使命已告结束"。[⑲]克萨达虽然避免了他许多同时代人的公然从心理和种族方面立论，可是他的学术观点所引起的后果却是促使人们从思想上接受考迪略领导方式。[⑳]

前面说过，一种对古典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的逆反意识渗进了決定论的社会思想。到1890年，"雅各宾派"的标签越来越多地被贴到那些认为社会可以通过施行理性原则加以改造的人们身上，它代替了19世纪70年代与之相当的"形而上学派"一词。新的标签是由伊波利特·泰纳对雅各宾派思想所作的有力指控引起的。这个指控最初发表在1881年，随后由勒邦等人加以普及。泰纳认为，雅各宾派"心理状态"是法国政治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的祸根。他写道，它的牢不可破的根源是"过分的自尊心"和"教条式的推理"，它们存在于社会表面之下。当社会的枷锁解除了（如1790年的法国），雅各宾派迅速生长"有如腐熟堆肥上的蘑菇"。他们的原则，诸如人权、社会契约和社会平等之类，都是简单化的"政治几何学"公理，为青年人和无所成就者所拥护，然后又被"空谈哲学的议员"强加给复杂的社会。但是，泰纳又肯定地说，它们被强加于社会是徒劳的，因为社会"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㉑]泰纳对法国政治的

412

---

⑲ E·克萨达著《罗萨斯与我们时代》（布宜诺斯艾利斯1923）第63页，参见克萨达所引证的萨米恩托对罗萨斯的解释。

⑳ 克萨达对罗萨斯和波塔莱斯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比较（前引书，第149—153页），引证了保守派智利历史学家拉蒙·索托马约尔以及巴尔德斯和卡洛斯·瓦尔克·马丁内斯。

㉑ H·泰纳著《雅各宾派心理状态》，《两个世界评论》，第44卷（1881），第530、559页，同年转载于《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第2卷，〔雅各宾派的胜利果实〕，第3—39页）。拉丁美洲情形，参看例如J·E·罗多著《自由主义与雅各宾主义》（蒙得维的亚，1906），第72—78页。罗多强调雅各宾派"不能容人"。

诊断在拉美社会学家中间引起反响，在他们的著作中被普遍引用。

对古典自由主义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攻击，在代表实证主义思想内微妙而重要的变种的两本著作里达到了高潮。第一本，墨西哥法学家埃米利奥·拉瓦萨（1856－1930）所著《宪法与独裁》（1912），标志着科学政治（这在1878年经《自由报》加以阐明并在1893年由“科学家派”反复重申）达到登峰造极地步。拉瓦萨的著作对1857年宪法的缺点作了慎重的分析。他写道，“我们寄希望于成文法，而它表现了无可救药的弱点”。1856年的雅各宾派议员不顾“社会学法则”而对总统权力严加限制。照拉瓦萨看来，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出现了贝尼托·华雷斯和波菲里奥·迪亚斯两个独裁政权。它们得到普遍的认可，因为它们能“满足国民发展的需要”。拉瓦萨的著作曾受到攻击，被认为在迪亚斯于1911年被推翻之后为他辩护。[83]然而拉瓦萨坚持他对历史上著名的立宪主义的信仰——对开明的寡头政治的支持。他作出结论说，“独裁者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宪政阶段必然随之到来”。拉瓦萨的目标就象谢拉的那样，是要使成文的宪法和实际的宪法互相协调，使各项政治制度和政治自由的统治地位得到巩固并与强大而有效率的中央政府配合一致。[84]这是拉美各地自由派人士所共有的乐观主义的目标。

第二本书《民主的专制政治》（1919），系委内瑞拉人劳雷亚诺·巴列尼利亚·兰斯（1870—1936）所著，它使得按照本赫、

---

[83] 最新的攻击来自达尼埃尔·科西奥·比列加斯（1898—1976）在所著《1857年宪法及其评论》（墨西哥，1957），科西奥对宪法的热情捍卫既是针对谢拉也是针对拉瓦萨，但特别是针对拉瓦萨著作在1917年宪法中重新建立专制的总统制度方面的巨大影响，

[84] 参照E·拉瓦萨《宪法与独裁》（第3版，墨西哥，1956），第244—246页，以及谢拉《政治进化》，第395—396页，（写于1900年）。

阿格达斯、加西亚·卡尔德隆和罗萨斯的修正主义派的传统对政治所作的悲观诊断持久不衰。巴列尼利亚的焦点是委内瑞拉独立革命所引起的内乱，他认为其特点（借用泰纳的话）是“自发的无政府状态”。他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辨认出一种“平均主义的和一切拉平的民主政治”，它作为一种自然的美洲现象，必然需要强大的政府随之而来。巴列尼利亚痛责成文宪法所固有的难以实行的雅各宾主义抽象原则”，并且说，委内瑞拉只能由一个对“我们人民大众的心理”作出反应的独裁者有效地进行统治，这些民众是内地平原（llanos）的混血人种，巴列尼利亚挑出的两位独裁者都是平原地区的首领，即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和西蒙·玻利瓦尔。前者运用的“个人权力是我们实际宪法政治天性的具体表现”。后者“作为社会学家的卓越的直觉能力”自然地把他引向终生独裁者的概念，即“玻利瓦尔原则*（ley Boliviana)”[15]因此巴列尼利亚可以举出伟大的玻利瓦尔作为当代独裁者胡安·比森特·戈麦斯（1908—1935）的先驱。巴列尼利亚曾担任后者的部长并担任过官方报纸的主编。

晚期的实证主义对政治的解释，如拉瓦萨和巴列尼利亚·兰斯所代表的，是根据一种看法，深信拉丁美洲各国听从历史、种族和社会心理的支配，没有办法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原则如在欧洲的“先进”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所实行的那样。拉丁美洲的实证主义者认识到，他们的社会有独一无二的特点，但是进化论的局限性迫使他们把那个社会看成在分阶段发展的文明尺度上属于

---

[15] L·巴列尼利亚·兰斯著《民主的专制政治关于委内瑞拉现行宪法的社会学基础的研究》(第2版，加拉加斯，1919)第281页，214页，该书由最初早在1911年发表的几篇论文编成。虽然·巴列尼利亚承认委内瑞拉社会的独特性，但他明白地表示他的论点适用于整个拉丁美洲。参看他提到阿格达斯、本赫和加西亚·卡尔德隆的地方（第229—235页）。

* 英语译文是“Bolivian principle”，后面的西语括注是作者原来就加上的。——译者

低级阶段。拉瓦萨对开明的统治阶段和强大的中央政府能带来安定和进步这一点始终抱着希望，巴列尼利亚则认为唯一解决办法在于具备一个有魅力的领袖能够对难于驾驭的民众的天性作出反应。拉瓦萨对于自由制度仍然抱有一点信心，而巴列尼利亚则对它们完全丧失信心。两种实证主义的结论，一种得自有纲领的科学政治，另一种得自社会决定论的判断，它们的影响尽管都持续存在，但是，向它们所依据的思想假设提出根本性的挑战是在所难免的。

414

新理想主义、社会激进主义和专制传统的持续存在

1900年，一位乌拉圭文学家何塞·E·罗多（1871—1917）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对西班牙美洲知识界发生巨大影响达20年，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象征。罗多的《爱丽儿》*（奉献给'美洲青年'）成了号召复活理想主义的嘹亮号角。通过唤起拉丁美洲"精神"并认为就是经过修正的种族感。这篇短文激起了重申拉美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和抵制社会思想中的悲观主义潮流。此外，《爱丽儿》含有对美国的功利主义和民主的平庸成就的贬抑，因此为知识界提供一个方便的基础以便区别出"自己的"美洲而加以保卫。知识界对罗多的号召作出迅速反应，他的号召是：拒绝据他说自阿尔韦迪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的"北方癖（nordomania）"和放弃"美洲自动非拉丁化的想法"。罗多还说，"强大的联盟正给我们带来一种精神上的征服"。罗多虽未具体指西班牙美国战争，他的文章却清楚不过地是对于因西班牙1898年惨败而产生的震荡作出反应。总之，人们说，"自从《爱丽儿》

* 爱丽儿（Ariel），原为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一个角色——听从主人普罗斯佩罗召唤的"空气般的精灵"。——译者

一经问世”，它就成为：“首次有明确定义的拉丁美洲主义的象征”。[illegible]

《爱丽儿》的号召力在于它的及时性，或者也在于它那激扬而抽象的调子。因为它缺少史学的创造性，哲学的深度和具体的社会或政治的分析。罗多对北美文化的看法，虽然有其洞察之处，却是第二手材料，根据的是保罗·格鲁萨所著《从拉普拉塔到尼亚加拉》（1897）和把法国旅行家的记载用于宣传目的。罗多的象征主义显然可见是来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虽然其论文本身更多地是模仿埃内斯特·勒南的富于哲理的剧本，《卡利班*——“暴风雨”续篇》（1878）。《爱丽儿》采取的形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师（“普罗斯佩罗”）对一群学生作年终讲课，讲课是在一座备受珍爱的“爱丽儿”塑象旁进行，它是性灵、优雅和才智的象征。“爱丽儿”的对立面是“卡利班”，它象征唯物主义；“耽于肉欲和麻木不仁”。在勒南的剧本中，卡利班压倒了爱丽儿，普罗斯佩罗只好任它胜利。罗多不愿接受这种结局，他从勒南停止的地方开始。

罗多虽被欢呼为新理想主义的预言家。《爱丽儿》的许多内容却出自实证主义的模子。实际上，直接受他启发的知识分子（他们常被称作“爱丽儿派”）其作品也是这样。罗多的“过渡”性质反映了对19世纪法国思想中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至上主义）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一种看法。奥古斯特·孔德和维克托·库赞（以及他们的某些追随者）助长了对两种尖锐对立的哲学看法。然而他们夸大了分歧，这些分歧的依据部分地是个人和学术方面的对立。勒南和泰纳（罗多的两位良师益友，通常被认为是实证主义者）在科学与玄学之间经常处于紧张

[illegible] A.苏舞贵尔德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检索评论：杂文作者》（墨西哥，1954）第292页。

* 卡利班（Caliban），原系莎士比亚剧本《暴风雨》中一个角色——半兽半人怪物。——译者

状态。勒南毕生为宗教渴望所困扰，泰纳则苦恼于迫切要求从经验中抽取原因和本质，以便克服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87]

在《爱丽儿》中，罗多的主要思想领路人恐怕是阿尔弗雷德·富耶，他的多产作品具体指向使哲学唯心论的价值（尤其是自由和自由意志）同科学决定论相调和。[88]富耶的中心概念“思想力”（idée-force）是把科学上力的概念应用到心理状态。力是意识的实际；反过来说，每个思想就是可在行动中实现的力。罗多的关于北美价值与拉美价值最后调和起来的乐观主义（而常被忽视）的看法中，富耶的影响最为明显。罗多说，“一切历史清楚地表明功利主义活动的进展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指出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为例。虽然罗多看到缺乏当前的证据，他坚信“北美实证主义的作用最终将服务于爱丽儿的事业”。美国的能量将转化成更高的价值。

416

罗多在《爱丽儿》中说，“我们拉丁美洲人有民族的继承，有需加保持的伟大传统”。十年以后，他进而认为“民族的思想与感情”等同于“公共的祖先意识（血统、宗族、历史祖先的共同性）”。[89]罗多是在脱离人类学的或科学的种族主义而恢复了历史学的种族观。他的“种族遗产”是指民族的传统呢还是指西班牙的往昔？它包括本地的和黑人的文化吗？或者，它属于更广泛的

---

[87] W·H·西蒙著《19世纪法国的“两种文化”：维克托·库赞和奥古斯特·孔德》，载《思想史杂志》第26卷（1963）第45—58页；D·G·查尔顿著《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法国的实证主义思想》(牛津,1959)。查尔顿认为勒南和泰纳，以及孔德本人的特色是“实证主义的假朋友”，就是说是作为认识论的实证主义的假朋友。

[88] A·富耶的主要有关著作是《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现代法学思想》(1878)和《理想主义运动与实验科学的反响》(1896)。

[89] J·E·罗多著《新方向》，载《繁荣展望》(蒙得维的亚，1958〔第1版1913〕，第26页)对哥伦比亚的“爱丽儿派”(卡洛斯，阿图罗、托雷斯的《Idola Fori》〔1910年〕所作的评论）罗多还〔在第30页〕赞扬罗哈斯的《民族主义的复兴》(1909)，称之为促进了新的“民族觉醒”。

“拉丁”，是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明中人文主义和唯美主义理想的产物？《爱丽儿》的寓意是极为含糊的，因此成了20世纪不同思想倾向的出发点。罗多对美洲青年发出的号召，其社会和政治含义也是不明确的。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腔调，它唤来唯美主义（一种“闲情逸致”）和“勒南的贵族式哲理”以反对民众的暴行。罗多显然对城市移民的后果感到不安。然而他承认民主（和科学一道）是“我们文明所倚仗的两根支柱”之一，并且同意富耶（反对勒南）的看法，认为自然淘汰法则在社会中起作用趋向于削弱等级制度而扩大自由。[90]

新的遍及全大陆的理想主义采取的形式因国而异，它在阿根廷、秘鲁和墨西哥的经验可作例证。阿根廷1900年至1920年的思想生活不仅丰富而且异常复杂。这些年份虽是实证主义的顶峰，却也有知识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特点。促成的原因是由于不断变化的欧洲思想，由于1890年事变余波所引起的各种政治问题，以及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而激起的全国性的对精神力量的探索。来自拉普拉塔河彼岸的罗多的声音有助于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形形色色民族忧虑。一位早期对实证主义持不同意见者是法国出生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保罗·格鲁萨（1848—1929）。作为泰纳和勒南的终身信徒，他把“科学的”学问同功利主义的强烈批评结合在一起，在北美社会和在阿根廷社会都是如此。外来移民的价值观使他感到惊慌，他警告说，“一心追求物质可能逐渐地使阿根廷精神失去纯洁的愿望，而没有了它，民族的昌盛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91]1910年独立100周年纪念助长了这种情

---

[90] 罗多著《爱丽儿》，第6—7页，第64—66页。罗多驳斥尼采的“反对平均主义”，认为是“恶劣的反动心理”的产物。

[91] A·科恩在《民族进化中的哲学影响》（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第205页所引P·格鲁萨克的一段话。格鲁萨克是在一个关于中等教育的报告中为拉丁文教学辩护的。

绪，产生了前面说过的加尔韦斯所写的一些文章，还有罗哈斯的《普拉塔的纹章》（1912）[30]继此之后有《阿根廷特性》（1916）最后又有《印欧》（1924），后两本书都试图从信手拈来的但并非确切明辨的（欧洲的）“外来特性”和“印第安特性”相互作用中寻找阿根廷的文化特性。然而，阿根廷的新理想主义不仅表现在文字方面；它还采取在政治和教育方面推出重要方案的方式，这点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罗多的启示最公开的影响莫过于在秘鲁。在那里1905年在圣马科斯大学产生著名的“爱丽儿派一代”或《新潮一代》。它的领袖有维克托·安德烈斯·贝朗德（1883—1966）和何塞·德·拉·里瓦—阿圭罗（1885—1944），以及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见上文）。作为学生，他们先是吸收圣马科斯占支配地位的实证主义，但不久就信奉罗多（贝朗德称之为我们“真正的精神指导”）同时也接受埃米尔·布特鲁和亨利·柏格森的理想主义，如哲学上持不同意见者阿历杭德罗·德乌斯图亚所教导他们的那样。这三个人都是贵族。里瓦—阿圭罗出身于利马的一个大家族；贝朗德来自省会阿雷基帕，他思乡怀旧每每忆起那里存在的尊严的“名门世家的民主政治”。[31]年纪较长的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也出生于阿雷基帕）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学家并在1879年任共和国临时总统。

这三个人的生涯和思想，最终所走的道路很不相同，但开始时都是向强大的立宪总统制（辅以进步开明的寡头政治）去寻求民族革新。科学政治的这种理想在他们看来体现在尼古拉斯·彼

---

[30] “爱丽儿派”强调种族就是祖先。罗哈斯一书的副标题表现得更为明显，它是《对阿根廷人祖先的……深思和追忆》。

[31] V·A·贝朗德著《民族的实际》（巴黎，1931），第189—190页）《我童年时的阿雷基帕》（1960年），引文见F·布尔里科《现代秘鲁的权力与社会》（纽约，1970年），第54—56，家庭的庄园和白兰地酒企业为铁路所破坏，于是贝朗德父亲成了羊毛商人。

罗拉总统（1895—1899）和何塞·帕尔多总统（1904—1908）的文官主义党。然而，“爱丽儿派”对待经济迅速发展的矛盾情绪和他们那个时代新“财阀政治”的唯物主义，使得他们拥护道德和精神的价值，主张由知识分子承担起政治监护的作用。[84]加西亚·卡尔德隆出版了《现代秘鲁》（1907），那是一本抱负不凡的（却不受人欣赏）的社会学著作。里瓦—阿圭罗和贝朗德在1915年创立了短命的国家民主党（未来派），然后又转向保守派和天主教。贝朗德坚持传统的立宪主义，尽管遭受迫害过着流亡生活，他从事的是非同寻常的职业，当过法学教授，是天主教大学的创始人（1917），并且最后还担任过联合国大会主席（1959）。里瓦—阿圭罗的理想主义把他拉向殖民时代和西班牙的过去；从《历史上的秘鲁》（1910）这本书开始，他成为这个历史的主要解释者和辩护人。他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到20世纪30年代甚至拥护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418

加西亚·卡尔德隆在23岁时同他的三个兄弟一起由秘鲁去巴黎担任外交界的挂名差事，40年没有回国。他初次参加社会活动就以在法国文学界和哲学界深得布特鲁的眷顾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是“美洲精神”和拉丁各民族团结的主要提倡者。除所著许多书籍和论文以外，加西亚·卡尔德隆创办《美洲杂志》（1912—1914），他说那“属于来自海洋彼岸的知识界精英。”[85]虽然他的目标是美洲的思想和文学实现自

[84] 参看F·加西亚·卡尔德隆著《秘鲁新一代知识分子》（1905），《我们时代的人物和思想》（巴伦西亚，1907），第206—207页）该书对科学政治表述明白然而充满矛盾情绪。

[85] 《美洲杂志》（巴黎）第1期（1917年6月），第2页；又《一个大陆的开辟》是对“美洲精神”的全面说明，第20期的《美洲杂志》，撰稿人包括阿格达斯（玻利维亚），因赫涅罗斯和加尔韦斯（阿根廷）、恩里克·佩雷斯（哥伦比亚）、曼努埃尔·奥利韦拉·利马和何塞·维里西莫（巴西）、阿方索·雷耶斯（墨西哥）以及弗朗西斯科的兄弟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

治，可是他写道，首先我们必须吸收“我们的〔拉丁的〕遗产”。“模仿将为发明创造铺平道路”；他的意思或许是指，拉丁的领导地位最终将传到美洲。连著名的普安卡雷也为之感动，把加西亚·卡尔德隆的《拉丁民主政治》（1912）介绍给“所有关心拉丁精神前途的法国人”。[96]可是加西亚·卡尔德隆的“美洲精神”，如前面所讲，也有其悲观的方面，根源于勒邦的科学种族主义；因此，它强调社会混乱和独裁的根源是“抑郁的”伊比利亚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遗产。随着他的兴趣从社会学转向文学，从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秘鲁转向无国家偏见的拉丁精英分子，加西亚·卡尔德隆克服了这种悲观情绪。到1916年他已注意到“生物学的种族观念声誉在下降”，然而“种族观念作为一种明确的文明所具有的种种因素的综合物”则顽固存在。[97]1912年，他对两种概念都坚持。因此，杰出人物统治的泛拉丁理想和泛美理想，如加西亚·卡尔隆隆所拥护的，有过它的短暂的重要时光，不久就为世界大战和社会革命所淹没。

在墨西哥，新理想主义的论坛是青年协会，它是1909年由一群关心哲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学习和讲演和社团。青年协会领导人有安东尼奥·卡索（1883—1946），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和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等人；他们后来在1910年至1925年之间领导了一场墨西哥生活中深刻的文化革新。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出生于多米尼加，于1906年定居墨西哥；他是这个团体富有感染力的人

---

[96] R·普安卡雷为《拉丁民主政治》一书撰写的序言。加西亚·卡尔德隆说，普安卡雷在1911年12月刚刚交来这篇序言之后不久即出任法国上议院主席和外交部长。

[97] F·加西亚·卡尔德隆，《泛美主义：过去和未来》，载《西班牙评论》，第37期（1916年6月），第1页。

物，给它带来无国家偏见和美洲主义的方针。[illegible]“青年协会派”的批评指向国立预备学校的实证主义课程——它们是迪亚斯政府长期以来制定的。然而有反叛精神的“新一代”，从1905年以来一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胡斯托·谢拉那里得到含蓄的鼓励。1908年，谢拉为国立预备学校的创建人加維诺·巴雷达讲话辩护，驳斥“拒绝调解的”天主教徒的攻击。他的大部分讲话是支持这个学校受国家监督的课程和巴雷达的工作，称他为“革新运动的能手，心灵解放工作的华雷斯”。可是谢拉说的“让我们怀疑”那几段话，承认在许多科学领域里概念正在起变化。他按照巴雷达的本意对正统的观念（意思指不论是经院哲学派还是实证主义派）不断提出疑问。谢拉在1910年更进一步宣布新的国立大学的高级学院将强调哲学，探求宇宙（形而上学方面）的“为什么”，而不是仅问（实证主义方面的）“怎么样”。此外，他还（缪述宗耶的话）补充说，必须将思想变成行动，“只有如此它们才叫做力量”。[illegible]

“青年协会派”为摆脱实证主义而动脑筋的范围很广泛。他们从康德和叔本华那里找到促进哲学思索和美学体验的动力。尼采鼓舞个人起来造反，反对奴隶般地信奉任何理论。象他们的良师益友谢拉一样，他们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所吸引，对他所说的“生活的直接经验，足以解决最令纯粹思想感到烦恼

420

[illegible] 自1907年至1911年墨里克斯·乌雷尼亚主编重要的《现代杂志》（墨西哥）。在这个杂志上，他于1908年11月，登载了他的朋友加西亚·卡尔德隆撰写的7篇稿子和后者《拉丁美洲哲学思潮》一文有注释的西班牙文本，时为该文在法国发表后一个月。他还对罗多作品进行评论，并在1910年8月在青年协会作一次关于罗多的讲演。

[illegible] J·谢拉，《在阿布雷乌剧场纪念加維诺·巴雷达大师的讲话》（1908年3月22日），《文集》第5卷，第387—396页；《墨西哥国立大学落成典礼会上讲话》（1910年9月22日），同上第448—462页。

的种种问题”[18]这番话，感到兴趣。就象罗多和格鲁萨克那样，他们也求助于古典作品。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一位较年轻的“青年协会派”，号召恢复拉丁语，认为那是掌握文学的关键，而拉丁语和文学都随反对教会的“自由派反应”而被实证主义者铲除掉了。[19]

“青年协会派”和他们同时代的“爱丽儿派”所受到最直接的引导，来自巴斯孔塞洛斯称做“新法国哲学”的布特鲁，尤其是来自他的学生柏格森。[20]布特鲁强调进化过程中的偶然性，因而削弱了决定论的基础。柏格森对作为空间的经过精密测定的科学时间与作为体验到的绵延式持续期限的“真正”时间加以区分，对美洲人来说是一个解放的概念。时间作为持续期限是永恒的运动，为生命本身所固存，它只能通过“智力共鸣”或“直觉”才能在体内感觉到。而直觉又是万物“生命冲动”的基础，是引导人类克服一切障碍，“或者甚至〔克服〕死亡”的创造力量。加西亚·卡尔德隆把柏格森主义叫做《青年种族的哲学》因为它肯定精神自由和斗争的价值。[21]在接受进化论时，柏格森对它作新的、乐观的解释，这对于美洲的新理想主义有很大吸引力。

墨西哥的戏剧性事件决定了“青年协会派”领袖们的思想和生涯，虽然他们也可以看作是有共同关心的事，甚至有某种个人联系的一帮西班牙美洲知识分子的一部分。[22]1910年9月华而不

[18] 谢拉所引的话，同上书。

[19] A·雷耶斯，《我们》，《美洲杂志》，第20期（1914年），第111页，雷耶斯于1913年在他父亲贝尔纳多（前陆军部长和州长）去世后离开墨西哥。

[20] J·巴斯孔塞洛斯《唐·加维诺·巴雷达与现代思想》(1910年9月12日)、《青年协会会议录》(第2版，墨西哥，1962) 第111页。

[21] F·加西亚·卡尔德隆著《柏格森主义的危机》(1912—1913)，载《概念和印象》（马德里，1919)，第237页。这是一篇明晰易懂而富有洞察力的论文，所谓“危机”指柏格森在发表《创造性进化论》(1907）之后声誉鹊起，面对着职业哲学家，特别是朱利安·本达的敌视，《美洲杂志》也刊载了论柏格森的文章。

[22] 应注意的是，罗哈斯、加尔韦斯·贝朗德加西亚·卡尔德隆，卡索、巴斯孔塞洛斯和恩里克斯·乌雷尼亚都出生在1882年至1884年之间。

实的百年纪念庆典之后两个月，正是青年协会演讲和墨西哥大学落成典礼的时刻，全国为革命所淹没。到1911年6月，波菲里奥·迪亚斯辞职了，弗朗西斯科·I·马德罗被胜利地宣布为总统，人民起义笼罩着各地区。“青年协会派”之中，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和雷耶斯离开墨西哥，前者后来于20年代初回国，后者到1938年才结束其久居国外的生活。不问政治的卡索则留下来。在1913年至1916年的纷乱年月中，墨西哥大学秩序荡然无存，他实际上是新一代学生唯一的主要教师，但他成功地设法把青年协会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灌输给这一代人。巴斯孔塞洛斯成为一个忠诚赞助马德罗和拥护1914—1915年会议的革命者，而后开始漫游海外做一个新的尤利西斯。*在利马，他将拉丁美洲各民族比拟为分散各地的希腊人，需要寻求一位米涅瓦女神来“塑造未来伟大民族的灵魂”。他告诉秘鲁人，我们美洲“是梅斯蒂索人开辟的，就血统而言是两三个种族的创造，就精神而言是所有文化的创造”。[49]巴斯孔塞洛斯是在把谢拉的墨西哥精神（以梅斯蒂索人气质作为民族特性的基础）同罗多和加西亚·卡尔德隆不分国别的美洲精神结合起来。他在本世纪20年代更完整地发展这个问题，从而使革命的墨西哥在意识形态上同秘鲁的社会觉醒新浪潮联系起来（参看后文）。

新理想主义1900年至1915年之间在巴西有某些进展，但这个国家所遵循的格调基本上不同于西班牙语美洲。旧共和国（1889—1930）的政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在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将要遇见的那种民主浪潮。1898年以后盛行“州长政治”，总统选举决定于圣保罗和米纳斯吉拉斯两州的协议；达不成协议

---

* 尤利西斯（ulysses），希腊神话中传说的英雄，即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主人翁奥德修斯，智勇双全，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城。以后在海外漂泊了10年才回到故乡。——译者。

[49] J·巴斯孔塞洛斯，《墨西哥现代知识分子运动》（1916）《会议录》第120页。

就决定于中间人，如外围的南里奥格兰德的介入。在两次选举之间时期，支配一切的是地方头头控制（coronelismo）和宪法认可的地区自治。全国范围有效的自由制度的理想则由一批年长的过去拥护君主制度者和“历史上著名的”共和派持续下去，其中突出的有若阿金·纳布科和鲁伊·巴尔博扎。但是这个集团在1910年随着巴尔博扎竞选总统失利而告消亡，尽管事实上他以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出口成章和1907年在海牙担任国际法庭法官而受到崇拜，但竞选仍遭到失败。

422 在比较年青的知识分子中间，到1910年在世界主义的多数派与民族主义的少数派——分别以两个同龄人曼努埃尔·奥利维拉·利马（1865—1928）和阿尔贝托·托雷斯（1865—1917）为代表——分歧越来越大。奥利维拉·利马出身于伯南布哥的一个古老的家庭并在葡萄牙接受教育，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1892年至1913年巴西的主要外交官。他是种族意识很浓的巴西面向世界的“文明的”面孔。他坚持对种族进步理想加以美化的乐观说法，和以南北平等为基础的美洲精神；他还提出拉丁团结的理想。⑯

奥利维拉·利马在海外充当“知识分子大使”，托雷斯在国内则是功成名就的议员、部长、省长和最高法院法官。他在1909年辞去职务，对政治制度感到幻灭，并于1914年出版论文集《论民族问题》和《巴西民族组织》。托雷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恐怕是受柏格森的感染，但他在分析中总是自觉地站在土著人一边。他在驳斥科学种族主义方面比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走得更远；对他说来，种族对于国家进步无关紧要。他寻求一个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有机社会，他还提到“原始本能”的觉醒。他

⑯ M·奥利维拉·利马著《为了人道的美洲》载《美洲杂志》第9—10期（1913），第181—190页、第257—275页该文博得年轻得多的主编加西亚·卡尔德隆的称赞，它是1912年秋季他们访问美国许多小学之行所作最后一次讲演《巴西的发展与西班牙美洲及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发展的比较》的葡萄牙文版本，英文本：（斯坦福，1914）第112—119页。

争辩说，巴西的精英分子由于爱好口头文化、欧洲思想和行不通的体制方案而同现实脱节。他主张用“巴西办法”来代替，也就是提高中央的权力和设立一个“协调性权力机构”包括设立一个由终身任命的委员组成的国家委员会来制定政策目标和解决地区对立问题。虽然托雷斯一生不为人所知，他却成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精神至上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这一代人探索新的政治解决办法的领路人。

西班牙语美洲的民主和立宪的浪潮

在西班牙语美洲，1910—1920这十年自由民主政治有一阵猛烈可是短暂的高涨。在阿根廷，它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危机，具体表现为依波利托·伊里戈延领导的激进党（UCR）。激进党人在城市和农村得到中等阶级的强有力支持，但在选举中弃权。弃权行动被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是准备革命，其反应就是，1900年以后在执政的民族自治党（PAN）内进行一场运动，通过选举改革以扩大选举权（从而扩大对民族自治党的支持）。卡洛斯·佩列格里尼说，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恢复代议制政治”，它“使我们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为本身的利益斗争”。[⑳]1904年有由内政部长华金·V·冈萨雷斯（1863—1923）发起的一项改革措施，继之是1912年的《萨恩斯·培尼亚法》。后者规定本地出生的阿根廷人实行强制性选举并实行“不完全名册”——任何管辖区的代表人数将在大选中名列第一和第二的政党之间按二比一进行分配。现代政党制度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与萨恩斯·培尼亚总统的期待相反，伊里戈延赢得了1916年的选举。一旦掌了权，激进党人同民族自治党“开明的”一翼差别很少。激进主义主要是政治上的；在口头上和全国公众打成一片，却忽视外来移民大

⑳ 《致米格尔·卡内的信》（1905年，3月24日），引文见戴维·罗克著《阿根廷政治，1890—1930年：激进主义的兴衰》（剑桥，1975），第34页。佩列格里尼于一年后去世。

423

众，支持拥有土地的精英分子的经济利益。

政治民主由于哲学上理想主义和由于探求阿根廷特性——民族文化的根源和本质——而得到加强。这种探索的一个方面是重申自由主义传统，即探索马里亚诺·莫雷诺（1810—1813）、里瓦达维亚和“五月协会”思想家们的民主的、立宪的、世俗的和世界主义的思想和纲领。自由派的阐述带有一种中央集权派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人的偏见，它批判罗萨斯修正主义派——后者曾为有领导魅力的权力政治提供理论基础。有一本态度高傲、东拉西扯的解释自由主义的著作，那就是华金·冈萨雷斯所写的《世纪的判断：阿根廷历史一百年》（1910），他得出结论说，阿根廷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国家，它是最使人类灵魂增光的那些品质和理想的家园和圣地”。㊽较有说服力的是亚历杭德罗·科恩（1860—1936）所写关于阿根廷哲学发展的各篇论文，他们充满了对康德形而上学新的鉴赏，而结论是对“1880年一代人”狭隘实证主义的尖锐批评。科恩说，后者追求一种“纯属经济的理想”，从而破坏了阿尔韦迪的自由主义原则。㊾在这十年中阿根廷自由主义最有影响的阐述者是因赫涅罗斯；见于他评论各思想家的文章（见前文），见于他主张“以经验为基础的新理想主义”的提法，最后还见于《阿根廷思想的发展》（1918）一书，它被作为一本“公民道德手册”献给社会。这本详尽的著作把阿根廷历史描绘成权力主义与意志自由之间，亦即源自“旧政权”和源自“革命”的“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他的

424

㊽ J·冈萨雷斯著《世纪的判断》，《全集》，第21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第216页。

㊾ A·科恩在1912—1914年发表了三篇论文；1919年他写第四篇论文《关于实证主义》。第四篇论文成为《民族发展中的哲学影响》（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一书的一些章节。

意思是指阿根廷的经验与法国的经验可以类比。[18]

阿根廷政治方面的自由民主和思想方面的新理想主义在争取大学改革的运动中汇合到一起，这个运动于1918年3月在科尔多瓦开始，发展到全国各地，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它的主要目的，虽然常常自相矛盾，是学生参加大学管理、课程改革（把现代科学和人文主义的思想编入教材）以及调整大学方针面向社会变革。这个运动是学生领导的，虽然它从事对抗性的政治活动和进行富有闯劲的全国性组织（阿根廷大学联合会）活动，却得到伊里戈延政府和一些大知识分子，如冈萨雷斯、科恩和因赫涅罗斯等人的支持。在科尔多瓦持续发生的学生集会、抗议和罢课先是招来政府同情性的干预，继之为安抚教师中保守派作出调和努力，最后（在学生占领了大学校舍以后），1918年10月总统同意了改革者的要求。这个过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大学重演，混乱没那么厉害。阿根廷学生联合会不久就建立海外联系；到1920年类似的改革性质组织已在智利和秘鲁出现。1921年，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学生大会。

大学改革的思想掺有新理想主义的许多意义含糊的观点。这个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因赫涅罗斯和学生历次宣言所清楚表达的主题是工具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大学应成为“社会行动的工具”，它的使命是把“高级文化”的理想变成“科学的训练”以服务于社会。第一个科尔多瓦宣言使用了“科学自由主义”这个词。改革运动要求入学开放和扩大就学面等；“民众大学”在阿根廷出现，传播到秘鲁。[19]对学生来说，科尔多瓦就象它在1845年对萨米恩托来说那样，象征着“殖民地思想”的阴森堡垒；“作为修道院 425

[18] J·因赫涅罗斯，《为了一种哲学》，载《哲学杂志》，第1期（1915），第5页；《阿根廷思想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18）第1页，作者前言。

[19] 类似的一所“墨西哥民众大学”于1913年由“青年协会”领袖们创立。

的大学”必须让位于“作为实验室的大学”。[41]

第二个改革主题是人道主义的和精英分子统治论的。伊里戈延说，职业和技术教育的发展已经使旧大学死亡了；剩下来的只是“简单的行政机制（engranaje），是专业化学院的寄生虫”。他继续说，专科学院可以造就专业人员；但是未来大学的核心是哲学，它必须陶冶人。科恩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极力为这点争辩，他在那里于1918年10月成为大学的院长。历次科尔多瓦宣言有一种“爱丽儿派色彩”，强调“青年人的英雄命运”。[42]在富有战斗精神的科尔多瓦人所宣称的“未来大学共和国”中，唯一的教授队伍将是“真正的灵魂缔造者，真、善、美的创造者”。最为人们喜爱的学生读物是因赫涅罗斯所写的《平庸的人》（1913）（类似罗多的《爱丽儿》的作品），它号召青年应成为“锻造理想的人”，并主张“卓有成就的佼佼人物”来抵消社会的平庸。这个主题在1916年遭到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的抨击，当年他对阿根廷的访问深具影响。[43]科尔多瓦运动的内部矛盾，民主政治与精英分子统治论之间，社会改革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不限于阿根廷；它们也出现在墨西哥和秘鲁。

在阿根廷，实现民主政治的工具是在灵活而“成熟的”政党

---

[41] J·因赫涅罗斯，《大学团体中的科学哲学》，载《哲学杂志》，第3期（1916），第285—306页，经过修改（加重了语气）成为《未来的大学》（1920）。两篇主要的科尔多瓦宣言（1918年3月3日和6月21日）见加夫列尔·德尔·马索主编《大学革新运动》第3版，利马，1967），第1卷，第1—8页。

[42] F·布尔里科著《爱丽儿的冒险》，载《代达罗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101期（1972），第124页。这儿所大学（例如古老的科尔多瓦大学和20世纪的拉普拉塔大学）的不同历史和特点必然对改良主义思想的各种分歧产生影响。

[43] 《平庸的人》有一部分以《锻造理想的人》为题，载F·加西亚·卡尔德隆的《美洲杂志》，第1卷（1912），第105—119页，第243—267页。该书到1918年出了4版。关于J·奥尔特加的想法，参看《一个旅客的印象》（1916），全集，第8卷（马德里，1962）第361—371页。

体制下采取立法行动、选举政治和大学改革；而在墨西哥，它的工具则是采取革命行动反对僵化的独裁政治。在阿根廷，自由主义寡头势力产生于1889—1892年的危机，靠牺牲行政部门得到壮大，它向民主政治做出让步；而在墨西哥，科学家派则未能限制波菲里奥·迪亚斯的权力。而且，1892—1893年论战中出现的民主主义主张又遭到镇压。民主主义在1900年以后重新抬头，以1910年马德罗向迪亚斯挑战的选举失败而达到顶峰，继之是他成功地公开造反。鼓舞这个运动的源泉是墨西哥在革新运动时代反对本地保守主义者、教会和法国人的人民斗争的自由主义遗产；它的象征是贝尼托·华雷斯和他的旗帜1857年宪法。马德罗的纲领"实行有效投票，不得重新当选"，就象伊里戈延的纲领那样，勉勉强强算是政治性的。然而他的热烈的理想主义却激起了广泛的支持（包括如巴斯孔塞洛斯这样知识分子的支持）。1913年他被刺身亡使他成了为互相争斗的革命派别而献身民主政治的殉道者。胜利的派别，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领导下的立宪派，保持马德罗的有限政治中心而没有达到他那种程度的民主政治理想主义。1917年宪法，除了那些不为卡兰萨所赞成的重要的社会条款以外，重申了1857年自由主义那一套东西。然而，即便后者也由于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加强权力的6年总统任期而作了修改。[45] 1917年以后诞生的是一个基础广泛但却是致力于调整社会和国民发展的半独裁主义革命国家。自由民主主义在短暂复活之后，它在20世纪的墨西哥却成为幻影一般不可捉摸。

426

智利也经历了一场民主和宪法的运动，但它发生在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环境里。智利的哲学和文学在1905—1920年之间很少有"爱丽儿思想"或法国理想主义的痕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高等教育和文化方面德国的影响强大，这种影响始于莱特列尔的赴德考察，结果是在1889年创办教育学院（见前文）。有20年，这

---

[45] 参看前文对拉瓦萨的讨论。

个学院主要由德国教授任教，莱特列尔和其他人认为这些德国教授最能指导智利教育走向科学的目标。⑯这个学院不但训练教师，而且象早先阿根廷的巴拉那师范学校那样，也训练知识界和政府部门的精英。该学院培养成果之一是恩里克·莫利纳（1871—1964），他是那一代人中重要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莫利纳一直依恋于实证主义而抵制柏格森，甚至比因赫涅罗斯抵制的时间更久。⑰“爱丽儿尔思想”也许也受到了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的种族民族主义的阻抑，这说明了智利的欧化源泉是条顿风格而不是拉丁风格。帕拉西奥斯博得阿曼多·多诺索（1886—1946）的高度赞扬，后者是智利国内主要的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而在其他国家则是爱丽儿派一代人物得势。多诺索曾跟莫利纳学习过，后来求学德国。他反对罗多的不分国别的美洲主义，欢迎以德国文化影响代替法国文化影响，并且敦促年轻作家去追寻民族的题材。⑱总之，吹捧“拉丁精神”对于智利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政治民主产生于多党议会制度，这种制度在巴尔马塞达以后由来自中部谷地的范围极其狭小的寡头势力统治达30年。民主政治的工具是“自由同盟”，那是来自激进党、自由党和民主党的年轻一代持不同政见者的联合组织，这些人对由于城市化迅速发展和由于硝石工业的周期性衰退引起的社会混乱十分敏感。1915年“自由同盟”把阿图罗·亚历山德里（来自塔拉帕卡区北部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律师）安置在参议院。于是亚历山德里领导“自由同盟”于1918年赢得议会胜利，1920年担任总统。这次胜利按标准的说法是一场“选民造反”，但这是中等阶级的选民。由于识字条件的

---

⑯ 对德国教授有一种反对意见，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多·德拉·巴拉在1899年所写的关于“德国迷”的一系列论文。莱特列尔自1906年至1913年任这所大学的校长。

⑰ 莫利纳在《20世纪初叶的智利哲学》一文中回忆他对柏格森的“没什么道理的”反对，尽管曾在1912年得到德国的柏格森热心拥护者格奥尔格·西梅尔的鼓励。

⑱ A·多诺索著《新人，智利的文学青年》（巴伦西亚·1912）第xi—xxiii页。

限制，只有8%的居民参加投票。

然而，亚历山德里得到群众的拥护。他的胜利“使豪富和权力阶层呆若木鸡”（部分地是由于它带来了新的政治风格），甚至比在这以前伊里戈延在阿根廷的胜利更加引人注目。⑫政治被迫走出达官贵人的俱乐部而进入街头；“自由同盟”的游行、口号和煽动性的讲演代替了熟人知已之间高贵的谈话和政治交易。对上流社会的中部谷地政治家来说，亚历山德里是个钻营幸进的外来户，一个追求权力的意大利冒险家。⑬作为总统，他面对一个有敌意的参议院，但他在军人支持下终于占了上风并在1925年制定新宪法。这个文件废除议会制度，支持能控制自己内阁的任期六年经过直接选举的总统。它还使教会与政府分离，不再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并且提出财产的社会职能概念。民主政治在智利的高涨打破了旧日寡头势力的政治垄断，但它也加固了中央国家权力，就象在阿根廷和墨西哥那样。

428

社会主义、土地运动和土著主义

伴随着民主冲动的是另一个更根本性的对19世纪90年代重建起来的政治和社会舆论趋同的挑战——社会主义和土地问题激进主义。这些意识形态虽在19世纪没有多少进展，可是1900年以后却突然强有力地出现在好几个国家。它们是社会经济变革加快的步伐激发起来的，这些变革是：出口经济的发展和它们被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工业和城市劳动力的适度增长，以及在某些地区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到1920年，这些激进思想最重要的是阿根廷和智利的社会主义，墨西哥的本地平均地权论以及秘鲁独有的

⑫ 以上说法来自里卡多·多诺索著《亚历山德里：鼓动者和破坏者》（墨西哥，1952）第1页、第243页。

⑬ 里卡多·多诺索（生于1896年），是阿尔曼多的兄弟，毕业于教育学院，他使这种反拉丁的特性令人历久不忘；同上书，第7—10页。亚历山德里是一位在19世纪20年代初定居智利的意大利“木偶戏艺人”的后裔。

包括上述两者要素的意识形态。

由于发展的环境不一样，社会主义的领导作用和意识形态在阿根廷和智利差别很大。[21]路易斯·E.雷卡瓦伦（1876—1924）于1912年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智利社会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贫穷的、自学成材的印刷工人，全心全意从事教育他的同伴。他虽然越来越激进，他的纲领却始终如一。私人财产应予废除，或变成集体或社会公有。无产阶级斗争应同时追求两种目的——通过工会组织获得经济利益和取得政治权力。[22]他亲身从事这两种追求，到20世纪20年代初不但领导第三国际所属的智利共产党和智利工人联合会（FOCH）而且被选为硝石地区的代表。

429

雷卡瓦伦从未成为世界主义者；尽管他到阿根廷、西班牙和俄国游历并加入一些团体，但他一直是个道德严肃和禁欲主义的人物，最后自杀身亡。

与雷卡瓦伦对比，1894年同何塞·因赫涅罗斯共同创建阿根廷社会党的胡安·B·胡斯托（1865—1928）是出身中等阶级的外科医生，由于临床接触人类痛苦而为社会主义所吸引。他很晚才求教于马克思，是在对实证主义有了完善的准备之后。他象因赫涅罗斯那样坚信生物进化论，并且象巴拉那大学的教授们那样，他从孔德那里懂得"社会主义"的含义。[23]他通过公民联盟进入政界，又是象因赫涅罗斯那样受民族自由主义传统的指引。科恩在提到胡斯托时说他是第一个超出"阿尔韦迪思想"的人；由于添进社会正义的观点，他刷新了"阿根廷思想的内容"。[24]胡

---

[21] 参看霍尔和斯波尔丁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9章。

[22] 雷卡瓦伦思想的最详细说明见于伊基克硝石矿区的《劳动者的觉醒》刊物所载的一系列文章（1912年，10—11月）：《社会主义：它是什么？如何去实现？》，载《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的思想》（圣地亚哥，1971），第1卷，第7—96页。

[23] 胡斯托的主要作品是《历史的理论与实践》（1909）。

[24] 参看1928年胡斯托去世时科恩的颂词，《全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第506—507页。科恩自1915年左右是一个社会主义同情者，但直到1931年不曾参加社会党。

斯托投身于通过非暴力的议会手段以实现社会主义，观点与让·饶勒斯很相似；后者是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应胡斯托邀请于1909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讲学。到1920年，社会主义在知识界和政界有了巩固的虽然是次要的地位。胡斯托和阿尔弗雷多·L·帕拉西奥斯（1880—1965）以零敲碎打的办法使社会性立法在议会通过，但社会党的纲领始终是温和的。[29]它接近工人把他们作为消费者而不是作为生产者；它坚持自由贸易；它对外国资本和本地资本不加区别；它对取消私有财产犹豫不决。[30]由于社会党从来不提到工人的有效控制（他们大部分是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在1920年以后的年月中踯躅不前。

我们已经看到，墨西哥的思想与这个国家社会动乱和持久的国内冲突这种独特的经历不可分割。它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1910年，它以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出现，但它总是不如更具本地特色，成为革命运动激进中心的土地改革思想那么有影响。无政府主义的领袖是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1874—1922），他是《复兴报》（1900）的创办者和墨西哥自由党(PLM)（1905）的创始人。弗洛雷斯·马贡集团遭到墨西哥当局和美国当局的迫害但得到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赞助，这个集团从大众民主政治转向无政府主义而同马德罗的1908—1910年反对重新当选运动决裂。1906年，墨西哥自由党纲领的社会内容限于8小时工作日、1比索最低工资和分配未开发的土地。到1911年，纲领的中心条款是废除“所有权原则”，因为它是教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源泉。墨西

430

[29] 华而不实和世界主义的帕拉西奥斯1904—1908年和1912—1913年是阿根廷社会党代表，他是一位拉普拉塔大学法学教授和院长，大学革新运动的主要发言人和多产的时事评论员。

[30] 参看胡斯托同意大利社会学家恩里科·费里进行的财产权问题论战（1908—1909），《全集》第4卷（布宜诺斯艾利斯，1947），第236—249页。费里称阿根廷社会主义为“人工的花朵”。

哥自由党宣言还指出，工人必须“将土地和生产机器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便可以“调节财富的生产以符合他们自己的需要”。[12] 1911年以后墨西哥自由党衰退了。弗洛雷斯·马贡一直流亡在外，最后死于堪萨斯狱中。然而他的几个早年信徒带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参加那十年革命中的土地运动和城市劳工运动。

这种运动之一是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在莫雷诺斯州领导进行的。经过十年对墨西哥城的反抗和对他们的“阿亚拉计划”（1911年11月）死抱不放，萨帕塔一伙比所有其他派别对全国土地改革都有更多的影响。“阿亚拉计划”之具有土著性质在于它是萨帕塔派农民首领舆论趋同的产物，它出自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奥蒂略·蒙塔尼奥）的手笔，并且以华雷斯国有化法令作为先例（第9条）。然而这个“计划”的无政府主义形象和它要求立即接管财产用于公共福利（第6条）来自广为传播的墨西哥自由党9月宣言。[13]在莫雷洛斯州内，萨帕塔派纲领自1914年至1917年，越来越反对中央集权下统制经济，反对自由主义，和主张集体主义，它得到前墨西哥自由党的知识分子安东尼奥·迪亚斯·索托一加马的煽动性支持。1917年宪法第27条（主要是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的创作）使村社（ejido）合法化并规定它的土地不得转让。但这个条文也承认“小规模的〔个人〕财产”，反映了宪法制订者的自由主义设想和莫利纳·恩里克斯对于村社财产权在渐进体制中的地位存在着矛盾心理。1920年萨帕塔派同阿尔瓦罗·奥夫雷贡政府的和解，给予激进的平均地权论以法定地位，但是也为补充队伍提供基础。 431

---

[12] 纲领全文于1906年7月1日在圣路易斯发表，见于阿诺尔多·科尔多瓦著《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墨西哥，1973），第405—421页；1911年9月23日在洛杉矶发表的宣言见胡安·戈麦斯·基尼奥内斯著《播种人：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和墨西哥自由党》（纽约，1969），第393—403页。

[13] 《阿亚拉计划》的全文和对它的明确分析参看小约翰·沃马克，《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纽约，1969），第393—403页。

1930年以前对激进思想最具特色的明确表述是在秘鲁这个拉美另一个主要的“印第安人国家”。可是秘鲁并没有经历革命；所以激进思想从未达到它们在墨西哥达到的被官方正式承认的地位（也没有经历随后发生的修改）。在秘鲁，新的激进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成熟昌盛起来，反映了那里迟到的却是引人注目的出口经济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新思想，特别是如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4—1930）和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所表达的，特色在于它们既有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来自文学和哲学唯心主义的。此外，秘鲁的大学革新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促进因素，有着别处所没有的作用。秘鲁的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是，它受到了拉美实证主义时代独一无二的攻击传统观念者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的启发鼓舞。墨西哥的造反派追思华雷斯和“革新派”，阿根廷社会主义者追思埃切韦里亚和阿尔韦迪，智利的雷卡瓦论派则（程度较轻地）追思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可是这些先驱者没有一个象冈萨雷斯·普拉达那样激进，那样直截了当。

冈萨雷斯出身于一个虔奉宗教的贵族家庭，他从深刻的个人角度以及政治和文学的角度，反对秘鲁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出于个人的经历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青年时曾逃离天主教神学院，他的姊姊显然由于过度的宗教斋戒和忏悔（他说由于“狂热”）而死亡——强烈反对教权主义，这是部分地由于毕尔巴鄂思想的影响。可是他的反教权主义成为更广泛的对秘鲁精英分子进行控诉的一部分，这些精英分子在同智利的战争中缺乏国民凝聚力亦即爱国主义，无视国内受压抑的印第安人居民，并且欢迎外国经济剥削。通过他从80年代末期起发表的讲演和文章——它们有许多发表在《自由篇章》（1894）和《战斗时刻》（1908）——冈萨雷斯·普拉达成了秘鲁激进思想传统的灵感源泉。他在1918年去世以前的年月中从激进的自由主义转向鼓吹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有些评论者强调冈萨雷斯·普拉

达的思想与阿亚和马里亚特吉的思想之间有直接联系甚至达到了夸张的地步。[29]

秘鲁激进主义的关键年份是1919年。那年1月，阿亚·德拉托雷（秘鲁学生联合会的一位领导人）成功地把圣马科斯的革新运动焦点转向支持纺织工人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而举行的总罢工。由这次工人一学生联合产生了“民众大学”（1921），3年以后又产生“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它是阿亚在墨西哥创立的。[30]1919年7月，奥古斯托·B·莱吉亚举行的一场政变，结束了文官主义党寡头势力的25年统治，开创了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10年独裁政治。10月，莱吉亚促使同情罢工的记者马里亚特吉流亡到欧洲，后者在那里浸沉于战后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知识界思想骚动之中达3年。他回国后决心在秘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虽然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只是在后者自身被流放（1923—1931）以前相逢几个月，两人一直合作到1927年，那一年他们因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应成为一个政党还是应保持为一种同盟问题而分道扬镳。这次分裂加强了两人间的根本分歧。阿亚主要是一个20世纪20年代时期的政治组织者，而马里亚特吉则主要是一个理论家。[31]

马里亚特吉1923年至1930年的作品把对于秘鲁的历史和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分析同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复兴的虔诚想象结合起来。他的主要著作证实了三个经济阶段的复杂共存——本地的或村社的经济阶段，封建的或殖民地的经济阶段和资产阶级的或资本主义的经济阶段。随着政治独立“封建经济逐渐变成资产阶级经济，但在世界局势范围没有失去它的殖民地特

---

[29] 参看马丁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11章。

[30] 冈萨雷斯·普拉达曾在1905年《知识分子与工人》一文中号召工人与学生联合，载《无政府状态》（第4版，利马，1948）第49—56页。1922年他的名字被联系到《民众大学》上去。

[31] 有讽刺意义的是，阿亚认为自己主要是一个理论家，而马里亚特吉则在1928年协助组织秘鲁社会党（PSP）并在1929年协助组织“秘鲁劳工总联合会”（CGTP）。

点”。“殖民地的”一词照马里亚特吉的用法意味着经济上既倚赖外国资本，文化上又倚赖传统的西班牙价值准则（与“城镇精神”对立的“采邑精神”）。[12]他认为受压迫阶级是印第安人而不是无产阶级或工人。他解释得很空洞，并认为对印第安人进行补偿是国家复兴的关键。他反对用传统的“西方化”办法解决“印第安人问题”。他说，这一切改革努力都遭到了并且将继续遭到“酋长制”*（那是遍布各地的大庄园地产带来的地方控制制度）的破坏，直到这种现象本身被根除掉为止。“印第安人的心灵”只能靠“神话—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来唤起。他们必须依靠回顾过去，依靠印加人的“高度发达而和谐融洽的共产主义的制度”求得新生。“印第安人无产阶级等待着他们的列宁”。[13]

433

胡斯托从医学走上社会主义，雷卡瓦伦从工会组织工作走上社会主义，而弗洛雷斯·马贡是从法律，马里亚特吉是从先锋派文学和艺术走上社会主义的。在1919年“成为激进派”以前，马里亚特吉是一位花花公子派头的专栏作家。[14]在欧洲，他特别为

---

[12] I·C·马里亚特吉，《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利马，1928年）引自英文版（奥斯汀，1971）第6页，第21页。马里亚特吉较长篇的著作都是过去已发表的短文和讲演词的汇编。《七篇论文》各篇大部分发表在1923—1926年。

* 酋长制（gamonalismo），这是马里亚特吉原作中的用语，以强调其封建性。“gamonal”一词原意是印第安部落的酋长，20世纪初时，在秘鲁用以指印第安人山区的大地主。“gamonalismo”则与“caciquismo”同义，亦可译为“权贵政治”。——译者

[13] 为富有战斗性的土著主义者丹尼尔·巴尔卡塞尔所著《安第斯山的风暴》(1925)一书作的序言，被插入《七篇论文》一书作为一个注释（英文版，第29页）。马里亚特吉从巴尔卡塞尔书中引述列宁的词句。

[14] 马里亚特吉的后人在他的《全集》(1959)中删去他在1919年以前的“石器时代”作品，因为“无补于他作为秘鲁社会觉醒的引路人和先驱者的事业”（每卷前言）。然而应加注意的是，马里亚特吉终身一直爱好欧洲文学，例如在他所办公开的土著主义派观点杂志《阿毛塔》**（1926—1930）的内容所显示的那样。

** 阿毛塔（Amauta），克丘亚语，指古印加帝国的智者和导师，马里亚特吉创办的杂志以此命名。——译者

小说家亨利·巴比斯*和工团主义理论家乔治·索雷尔**的思想所感动。由于对大战感到幻灭，巴比斯当时刚刚创建"思想国际"和"光明"运动。他认为大战是失去人性的和颓废的资产阶级文明的产物。马里亚特吉在谈到巴比斯时候写道，"如今政治是唯一伟大的创造性活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必须把穷人引向革命，"引向征服美、艺术和思想"以及引向"征服面包"。索雷尔让马里亚特吉懂得社会主义的"虔诚、神秘和形而上学性质"，以及人类如何会受"神话"的驱使，不论是宗教的还是革命的。[15] 索雷尔又把柏格森偶象化了，他说柏格森证明了实证主义者所宣传的"科学真理只是幻想"。[16]在某种意义上，马里亚特吉是把对秘鲁1905年"爱丽儿派"一代深有影响的理想主义带到极端反实证主义的结论。他之为巴比斯和索雷尔所吸引正如加西亚·卡尔德隆当年之为布特鲁和柏格森所吸引。[17]因此马里亚特吉曾被

* 亨利·巴比斯（Henri Barbusse 1874—1935），法国小说家。1919年发表长篇小说《光明》，同年创办"光明社"，主编《光明》杂志，1923年加入法共。——译者

** 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法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译者

[15] J·C·马里亚特吉著《当代舞台》（利马，1925）第201—202页（论巴比斯）；《人与神话》（1925），载《清晨的心灵》（利马，1950），第28—29页（论索雷尔）。马里亚特吉本人认识巴比斯，他去世时，巴比斯对他大事赞扬。他在意大利被灌输索雷尔思想。

[16] G·索雷尔著《对暴力的思索》（格伦科，1950），第162页（第1版，1908）。

[17] 马里亚特吉和其他《1919年一代》的激进派反对"爱丽儿派"（或"未来派"），而代之以拥护冈萨雷斯·普拉达，尽管后者是无神论者和反教权主义；马里亚特吉《七篇论文》（英文版），第184—185，第221—225页；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生于1900年）著《我们美洲有自己的大师吗？20世纪的动摇与灭亡》（第2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第10—21页。（答案自然是"否"）

人们正确地称为“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和土著主义派民族主义者。

马里亚特吉对民族复兴的看法是土著主义（或印第安主义）的一种极端的表述，它到1920年流行于墨西哥和秘鲁。作为民族特性的起源，阿兹特克人文明和印加人文明必须为人们所更好了解，而这种了解必须同对今日的多数印第安人进行补偿联系起来。在莱吉亚时代的秘鲁与奥夫雷贡时代的墨西哥一样，土著主义已为“官方”公认，然而宪法上宣称对秘鲁印第安人的保护，却由于政府追求公路建设和高地地带实现商业化而遭到破坏。在墨西哥，抬高农村的一个产物是政府设立人类学部（1917），由曼努埃尔·加米奥负责，他是一位专业人员，把有关文化相对性和文化独立于种族的各种新理论付诸实践。他极力主张“一种民族特性的形成”必须从对墨西哥的形形色色印第安人集团进行科学研究开始，从对土著艺术和文学的新认识开始，和从扭转19世纪的“致命的崇奉外国的方向”开始。在他举办的在特奥蒂瓦坎金字塔遗址的示范规划中，他试着把考古学同本地居民教育结合起来，始终着眼于复兴和保存土著的艺术和文化。[⑩]他的努力同全国范围的壁画艺术和农村教育得到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提倡，后者作为奥夫雷贡的教育部长（1922—1924）是新墨西哥伟大的“文化考迪略”。

然而，巴斯孔塞洛斯不是一个土著主义者，他超出对地权平均论的同情，超出认为印第安人必须真正并入墨西哥人社会。对巴斯孔塞洛斯来说，民族特性，不论是墨西哥人的或范围更广的拉丁美洲人的，存在于种族和文化的梅斯蒂索特性。马里亚特吉反对过去的和现在的使印第安人西方化的努力，巴斯孔塞洛斯则

---

⑩ M·加米奥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弗朗茨·博亚斯指导下于1921年得博士学位。关于他的思想，参看《建设祖国》（墨西哥，1916）和他的大部头著作《特奥蒂瓦坎山村的居民》，2卷本，第3页（墨西哥，1922）。

主张“印第安人走向未来的唯一门户是现代文化，他们的唯一途径是拉丁文明所开辟的道路”。[⑩]巴斯孔塞洛斯的教育纲领包括广泛发行欧洲古典作品。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教师是20世纪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修道士。虽然他容忍加米奥解决农村教育的“整体”办法，他却不认为印第安人应首先用他们本地语言进行教学。然而无论是巴斯孔塞洛斯还是他同时代的加米奥的思想，尽管彼此不同，却都保有进化论的乐观设想，与马里亚特吉激进的和存在主义的关于印第安人复兴的观念形成对照。巴斯孔塞洛斯写道“历史从不回头，因为一切都在变化、刷新。”他把1916年对秘鲁人的讲话加以扩充，展望美洲是一个“宇宙民族”的摇篮。在阿亚·德拉托雷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极为重要的印第安—美洲概念中，巴斯孔塞洛斯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事实上，阿亚的实用主义的土著主义和地权平均论很多地方可能带有墨西哥的烙印。

435

组合主义*的出现

本章结束之际我们来讨论一下1930年以前岁月中权力主义或组合主义的政治思想。“组合主义”这个词一向主要用作一种分

---

⑩ J·巴斯孔塞洛斯著《宇宙民族。拉丁美洲民族的使命》(巴黎，1925)，第13页。参看贝朗德对马里亚特吉的土著主义所作的批评：马里亚特吉认为它是“至高无上的终极价值”，我则认为它“是走向某种更高事物，走向完整的秘鲁特性的一步”。参看《民族现实》，第198页。

* 组合主义（Corporatism)，20世纪初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派关于国家组织形式的一种主张。该派的主要代表，法国法学家狄骥(León Duguit，1859—1928）认为，随着按照行业把雇主和雇工联合在一起的工团日益发展，最终将导致一种组成为工团的各个阶级的联盟，并主张在此基础上建立组合国家（corporate state)。这种主张为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所采用，该国于1927年按行业成立组合（corporations)，1934年成立中央组合会议，1938年建立“法西斯组合院”，解散国会，遂形成极权的组合国（亦称“总体国家”)。——译者

析性构想，“一种学术工具”用来阐明当代（1930年以后）拉美的政体与众不同的结构。因此组合主义有别于“多元论”，它的定义是分等级的，非竞争性的各集团组成的利益代表制度，得到国家的承认和由国家进行管理（即使不是由国家创立）。组合主义作为一种正式的意识形态，与作为一种制度的组合主义有区别，前者在拉美并不常见。然而形形色色的组合主义设想开始以某种频繁程度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和政策之中。

组合主义既是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应而又常常同它们纠缠在一起；因此它主要出现在我们已经考察过的政治环境中。现代欧洲模式虽然重要，新兴的组合主义却更多地汲取实证主义遗产，既有科学政治又有决定论的社会思想。组合主义就象实证主义那样，是建筑在与政治组织中的思想作用相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它的拥护者常认为自己是观念论者。有的时候，组合主义的表述明显地使人想起西班牙殖民地制度下的先例。某些著名的20年代的组合主义运动，例如在墨西哥和秘鲁（美洲革命人民联盟），在方向上是民众主义的，亦即致力于社会改革和群众参政。其他的组合主义运动，如在巴西和智利，则社会意义并不明确。20年代态度最不明朗的组合主义运动（在阿根廷）在社会方面是镇压性质的。 436

在墨西哥1917年宪法第27条（地产权）和第123条（劳工）对农民和劳工的要求在法律上予以承认，但它们也为控制权，为使这些富有战斗性的集团参加革命提供基础。宪法的理论基础是由安德烈斯·莫利纳·恩里克斯提供的。它在1922年对两种指责作出反应：一种指责说，第27条是“激进共产主义的”，另一种指责说，这个宪法给了行政部门过大的权力。莫利纳虽然承认这部宪法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的”，与1857年宪法的“个人主义的“精神”相对立，却声称这种变化只不过反映了孔德的概念（1857年时尚不为人所知）认为社会是“活的有机体”。况且，地产权原本属国家所有，国家又可以把地产权给予个人，这个原

理并非新发现，只不过是西班牙君主权利在现代的重申。至于行政部门权力问题，莫利纳主张，面对着地主和实业家，农民社会和工人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官方不可避免地应作出有利于他们的行动以便平衡双方的力量”而促进公平，就象殖民地时代的法庭的作用那样。㊵

革命政府对待城市劳工态度矛盾。1912年设立劳工部以调停劳资冲突和鼓励并指导各种工人组织。不顾卡兰萨的反对，劳工部领导人宽容无政府一工团主义的“世界工人议会”，甚至在1915年劝说这个“工人议会”派遣“红色大队”同比利亚及萨帕塔派作战。劳工部还鼓励纺织工人的组织，公然命名为“抵抗团体”而不是称为“工会”，它们由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在政府面前代表劳工利益。根据一项1915年劳工部的备忘录，“抵抗团体”的方针可以是“终止各独立劳工团体的权力和取消它们策划反对司法当局的能力”。㊶在1916年一场总罢工之后，卡兰萨取消“工人议会”这个著名的独立团体，然后在1918年发起组织广泛的墨西哥工人区域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显然一开始就在政府监护之下，1920年时号称拥有会员30万人。它对待农民和工人的方针其必然结果是最终导致他们并入国民革命党成为三个职能“部门”中的两个部门。

437

顺便应该提一下，显然未被合并进来的一个集团是教会，它强烈反对宪法第3条和第130条对教会的教育作用和它的地产权利

㊵ A·莫利纳·恩里克斯著《联邦宪法第27条》《政府秘书处公报》，第1卷(1922)，第1—12页。他说工人和农民象是“次要人物”参看前文注（40）科斯梅斯的论点。

㊶ 见拉蒙·E·鲁伊斯著《劳工与态度矛盾的革命派：墨西哥，1911—1923》(巴尔的摩，1976)，第57页。1916年设立新的工商业和劳工部由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领导，他后来成为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的赞助人，并且是1929年创立的国民革命党的主要缔造人和主席。

所作的严格限制。30年代后期教会—国家的紧张冲突——包括西部农民教徒（基督派）的群众性起义——是墨西哥的独特现象，是19世纪中叶革新运动的重演。

秘鲁流亡者阿亚·德拉托雷在1928年写道，“墨西哥革命是我们的革命”。美洲革命人民联盟的早期思想可以部分地解释为阿亚对于蕴藏在他所谓墨西哥的“自发运动”中各种假想所作的教条式阐述。阿亚想象着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一个所有受外国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别是受北美资本主义剥削的人的联盟。由于基本上是封建的结构，在拉美的帝国主义，与列宁的理论相反，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而不是最后阶段。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将自一个单一政党（美洲革命人民联盟）产生，它被“科学地”组织起来，不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而是作为“功能性或经济的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各个阶级将“按照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享有代表权”。[48]对阿亚来说关键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有时他说他们属于被剥削者，有时又说他们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不当权的理论家和组织者，阿亚受到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挑战，他必须面对中等阶级这个理论问题，这是个在墨西哥可以方便地予以忽视的问题。阿亚提出阿普拉主义*作为不受“精神殖民主义”和“欧洲主义”影响的土生土长的理论，以此来掩饰其窘态。[49]

---

[48] V.R.阿亚·德拉托雷著《反帝国主义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第2版，圣地亚哥，1936），第82页，第149页（写于1928年，然而直到1935年方才出版）。阿亚的多阶级政党概念是他早年工人和学生联盟的扩大。

[49] 参看布尔里科所引阿亚的话（1928），见《权力与社会》，第156页。阿亚明显是指马里亚特吉，后者回答说，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似乎太象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 阿普拉主义（Aprismo），指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指导思想。阿普拉（APRA）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简称，后者常被称为阿普拉党。阿普拉主义则指该党的指导思想，亦即“印第安美洲主义”。——译者

在巴西20年代的政治思想中组合主义的主题特别明显。老共和国的实力和寿命有着相似的双重效果，既阻抑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却又招致对共和制度的批评。虽然实证主义在教育方面和社会思想方面持续存在，它却导致越来越强调研究社会问题向思想方面的世界主义发出挑战并且探求适合于巴西社会和传统的各项制度。有十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公开赞赏阿尔韦托·托雷斯，他们作为“跟共和国一起诞生的一代”在1924年著书立说。他们发出强大的声音号召“新的建设工作”，于是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结合。[49]最有影响的是弗朗西斯科·若泽·奥利维拉·维亚纳（1885—1951）的言论，他是一位法学教授和读者众多的社会分析家，他用实证主义惯用的术语攻击1890年宪法的“观念论”。然后他进而哀叹缺乏“舆论制度”，亦即缺少那种深存于象英国人那种“真正种族”中间的“集体利益的思想感情”。巴西宪法的中心必须是经济或社会性质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在一个90％的人倚赖农村生活的国家，宪法中心必须对土地改革作出反应，它必须对“社会团结的体制”作出反应，就象公正的法官和坚强的市政官员那样，使地方头头不能任所欲为；还必须对“组合主义精神”的传播作出反应。奥利维拉·维亚纳有预见性地暗示，改革和“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关键在于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能同各集团的利益密切配合。[50]

智利的组合主义思想显然不同：它们在劳工政策方面有似墨西哥；在对政治自由主义进行重大历史批判方面，有似巴西；在军人和教会统治集团分子所显示的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钦羡方

---

[49] 《共和国历史的空白》（里约热内卢，1924）一书序言。这部通力协作的论著是受到独立百周年纪念激励的有感之作，是在1922年圣保罗举行的著名的“现代艺术周”期间迸发的有关文化方面的自我检查，但它的出版推迟了。参见马丁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11章。

[50] 奥利维拉·维亚纳，《论宪法的观念论》，同上，第137—160页。奥利维拉·维亚纳是西尔维奥·罗梅罗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坚持科学种族主义。

面，则有似阿根廷。1924年的劳工法规承认各种工人组织，但把它们置于政府的严密管理之下。这个法规于1924年在军人压力下仓促地一致通过，它是在亚历山德里政府时期使议会发生分裂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方案的混合物。它的灵感主要来源是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大学教授的社会主义”）经巴伦廷·莱特列尔和曼努埃尔·里瓦斯·比库尼亚加以吸收，后者是一位重要的自由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同亚历山德里很接近。早在1906年，莱特列尔曾向一次激进党代表大会的多数人作过劝说，他指出对社会福利和组织工作进行立法是“阻止革命社会主义扩张”的必要措施”。[47]

439

对2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骚动的另一个反应是阿尔韦托·爱德华兹·比韦斯（1874—1932）所写的《贵族集团》（1928）。爱德华兹象奥利维拉·维亚纳那样攻击自由主义的理想，但他也攻击贵族统治，说贵族统治随着“波塔莱斯体制”（1831—1891）的垮台而恢复了它天然的宗派活动倾向。那个体制的基础是在等级观念和社会纪律方面对贵族统治加以限制的中央集权和如今遭到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破坏的道德和精神力量。总之，它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制度，爱德华兹从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那里借用了这个措词。这种体制之得以存在靠的是“活的有组织的因素”而不是靠成文的宪法。“自由和有组织是不相容的字眼”。[48]爱德华兹预言，除非出现某个新的波塔莱斯，智利文明将没落下

---

[47] 引文见路易斯·加尔达梅斯著《巴伦廷和他的事业》（圣地亚哥，1937），第378页。关于“大学教授的社会主义”（或“讲座式社会主义”），包括他认为国家是一种精神团结机体的概念，参看夏文·吉德和夏文·里斯特合著《经济学说史》（第2版，英文版，伦敦，1948），第436—446页。

[48] A.爱德华兹·比韦斯，《智利的贵族集团》（第6版，圣地亚哥，1966），第272页。爱德华兹的著作也表现出帕拉西奥斯的种族民族主义的痕迹。他和帕拉西奥斯都对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韦朗西斯科A.恩西纳有强烈影响。

* 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译者

去。这本书是含蓄地为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辩护。后者是智利的军人总统(1927—1931)，他的独裁主义政策直到1929年经济崩溃为止得到广泛支持。爱德华兹曾短暂地在伊瓦涅斯政府里担任部长。

在墨西哥和智利，1930年以前组合主义在官方政策，特别在对待劳工的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在阿根廷它主要限于持不同政见的右翼运动。1910年以后克里奥尔人精英分子越来越把工人阶级的团体和意识形态打上“外来的”标记，而历届激进党政府很少作出努力来眷顾、选拔或管理劳工。相反，一些特别团体在政府怂恿下，纷纷出现（特别是在1919年大罢工期间）。它们保护财产权和肆无忌惮地攻击工人阶级住区，造成了人们后来称为“悲惨的一周”事件。这些团体中最著名的是《阿根廷爱国者联盟》，它在准军事镇压行动之后紧接着出笼一项意义欠明确的“实用人道主义”纲领以求达到阶级调和。它制订了一些工人教育和福利的计划，甚至对把社会全体生产成员组成按职能划分的组合也作了某种讨论。然而这个联盟纲领的前提基础是“如实地了解世界”，换言之，即承认智力、文化和财富有天然的等级制
440
度。[49]

1923年以后，相对地比较温和的“爱国者联盟”被恶毒的“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反犹太人的一些团体所取代，它们吸收大知识分子，在1927—1930年这个时期喧嚣一时。这类知识分子之一是诗人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1874—1939)。他由无政府主义变为法西斯主义，1923年宣讲莫索里尼思想。1924年在秘鲁所作的《高举宝剑的时刻》讲演中颂扬军人美德并在《和平组织》（1925）一文攻击选举政治和自由主义民主。另一个新加入者是曼努埃尔·加尔韦斯，他在1910年对“世界主义”的怀疑到1929年变成了乞求于权力、统治集团和天主教的“灵性”。他甚

---

[49] “爱国者联盟”的长期领导人是曼努埃尔·卡莱斯（1872—1946)，他从前当过教师是一位保守派议员。

至主张“根据同激发法国革命及其派生物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相反的原则”。进行“一场新的革命”。[64]加尔韦斯和卢戈内斯都同《新 共和国》双月刊（1927—1931年）有联系。这个双月刊号召以“社 会 的 生 命 力”为基础的实用性民主政治，并且支持何塞·F·乌里武鲁将军在1930年试验的短暂的组合国家。“爱国者联盟”曾作过一些努力以求扩大基础把工人和中等阶级的下层分子包括进来，新的民族主义则是斗志昂扬的杰出 人 物 统 治论，这预示在阿根廷未来的权力主义运动存在根本的冲突。

组合主义在20年代的出现，暴露出政治方面有权力主义传统持续存在，它在19世纪末年，由于科学派主张强大的政府和实证主义者强调社会等级制度和有组织的发展而增强力量。这个政治传统先是受1889—1893年的立宪主义运动的挑战，接着受到1910—1920年民主浪潮的挑战，最后又受到社会主义和土著主义派激进主义的挑战。可是到19世纪80年代末执政的和知识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趋同方面形成的强大局面足以经受住 这 些 挑 战。事实上，这种趋同得到了自由主义遗产的支援，它突出地强调强大的世俗国家与经济不干涉主义。自由主义对中央集权加以宪法限制的理想逐渐受到在本世纪初实证主义思潮达到顶峰时期的社会、历史和种族的理论的侵蚀。精英分子中间的趋同局面也能经受住观念论者对实证主义哲学设想所进行的攻击，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新观念论本身在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有许多不能明确解释的地方。虽然权力主义趋势在1870—1930年这段期间可能一直大大占着上风，可是我们不应由于这种情况而模糊了认识，而不看到这个时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丰富多采。

---

[64] 加尔韦斯在1929年6月13日天主教杂志《规范》上对“独裁政治”的讨论，引文见桑德拉·麦吉《阿根廷反革命行动的社会根源，1900—1932年》，博士论文未刊本，佛罗里达大学，1979年，第257页。

第 11 章

1870—1930年 拉丁美洲的文学、音乐和艺术

导　言

当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68年成为阿根廷总统时，不可抗拒的变化席卷着拉美，这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中得到反映，不过首先反映在文学中。①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当时的多数作品似乎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但是已出现了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程度和出现的早晚主要依作品产生的城市或地区而定。某些变化纯粹起因于内部因素，但是1870年前后的时期也是国际劳动分工开始深化和拉美经济，包括许多内陆地区更加全面地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时期。拉美的人口在19世纪下半叶增长了一倍，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到190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100万居民，里约热内卢75万，墨西哥城50多万，许多其他城市，包括圣保罗——它在1850年只有15,000居民——已超过25万。到1930年，在某些发展最快的城市，人口的30—50％是欧洲移民，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或者是欧洲移民的子女。如果说1830—70年的时期主要是内省和内部纷争的时期，特别是在西班牙语美洲，那么1870—1914年时期拉美大陆则再次面向外界，不过，对于因经历数十年内部纷争的涤荡头脑已清醒的人们

① 本章实际上是马丁为《剑桥拉美史》第3卷撰写的第18章《从独立到1870年前后拉丁美洲的文学、音乐和艺术》的续篇。读者请参阅该章作为本篇的背景材料。

来说，当拉美国家相互掀起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战争时，如巴拉圭战争（1864—1870）和太平洋战争（1879—1883），又增加了一层幻灭感。在这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新时期，大多数人开始更清楚地看待事物，然而其他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具有讽刺意味地自称为“现代主义者”——则很快决定他们宁愿不看任何事物，并试图投入幻想和逃避现实。 444

正如所有殖民地和新殖民地与宗主国关系中常见的复杂的反应一样，拉美文化与欧洲文化模式的关系往往具有同样的复杂性。对1870—1930年期间这种关系作一回顾，揭示了极为多样化的混杂和断裂，融合和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最基本的形式和内容的问题变得成问题了。总之，这些问题与美学史上理智与感情的关系这种不朽的主题相重叠，它们在19世纪的艺术表现方法中表现为首先是新古典主义，然后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互相敌对地同时并存。总的说来，拉美艺术家倾向于选择激情、自发性和直观性，这说明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持久影响和20世纪超现实主义的特别重要性。此外，在总的拉美艺术中，对知识和自我认识的寻求（这是早在拉美被欧洲探险家们“发现”之时，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一切艺术即已具备的特征）——不论是由理智，感情或感觉所进行的探索——自19世纪初起与对民族特性和大陆特性，以及自我表现的追求相结合起来。正如在其他前殖民地发生的一样。

本章将穿过拉美文化的迷宫，追溯拉美作家，艺术家，建筑家和音乐家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不仅要涉及文学，而且要涉及所有艺术，并将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的文化历程进行比较对照。这要求具备一种精心设计的方法，并且意味着要在坚实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复杂的建筑结构，然后用电影手法把镜头从大厦的一部分转向另一部分，直至得到完整的图象。在艺术方面，作为拉美历史上也许是最具决定意义的1870—1930年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1870年至1900年和1900年至1930年，

可是由于拉美的新殖民地的命运，它在文化活动领域是一个迟到的发展地区，因此，1900—1914年期间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也是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同时，在这些阶段，艺术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同时在两个方面发展的，即广义的本土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条道路仅在这个时期初期最突出的事例中统一起来，但在1920年以后分离越来越频繁。欧洲艺术在浪漫主义之后，在“现实主义”和可以笼统地称之为所谓“印象主义”之间，或在用以体验的客观和主观的方法之间（自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可以在拉美文学中最鲜明地看到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全面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在拉美则延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地方主义与先锋主义（在巴西被混淆地称为现代主义）之间出现的对比。总的说来，只有那些可以克服或超越因这些完全不同的艺术态度所引起的困境的人，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我们总的战略是把艺术看作完全不可分割的，依次考察每个主要的艺术形式，指出它们的主要趋势，并以主要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加以说明；我们将把拉美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尽管这种说法在任何时候都是矛盾的），然而同时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给予充分和恰当的注意。因为实证主义是那个时代统一性的思想，[②] 我们将从它在艺术上反映最直接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记叙体开始，同时对同一时代的拉美戏剧作一简要的评述。随后对不同的世界主义运动——在诗歌中尤为丰富多采——作一探讨，这种运动在西语美洲称为现代主义，在巴西称为高蹈派—象征主义。对于通常在我们这类史书中不列为重点的音乐和绘画，我们将作简要的回顾，就此结束这一时期第一阶段和本章的前半部分。当时间转到20世纪初，我们将对建筑作一回顾和展望，追述它在19世纪的经历和展示随着大城市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拉美

② 见黑尔为《剑桥拉美史》第4卷撰写的第10章。

建筑是如何突然迅速繁荣和成为拉美赶上现代化浪潮高峰的象征。然后，我们将再回过头来讨论绘画和音乐，追随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潮流，从而为记叙体和诗歌发展的结果布局，因为它们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极为有赖于音乐，造型艺术和建筑上的发现。关于20世纪20年代，基本上是从现实主义形式通过地方主义而延续的角度来探讨的，并以随着本世纪而出生的新一代人中出现的年轻先锋主义团体所提出的革命新美学，作为恰当的结束，我们将回顾所有艺术中最现代和最具视觉性的电影其最初几十年的情况。 446

19 世 纪 末

小　　说

实证主义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影响十分巨大，文学要么是反其道而行之，如现代主义，要么是完全追随，如自然主义。尽管浪漫主义将是拉美自我形象永久的特征，因为它与独立具有同一性，但是它的成分现在将被不同地吸收，精简或重新解释；虽然小说和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各自都将保存前一运动的某些延续性，但是它们与前者的差异更为明显。在欧洲，左拉和莫泊桑的自然主义之前有巴尔扎克和司汤达的现实主义；但是在1830到1860年期间，拉美并没有产生巴尔扎克，因为完全不存在产生他的条件。拉美大多数现实主义流派的小说家此后退步为司各特式的混乱的浪漫派，或蜕变为不那么敏锐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毕竟是形成民族国家后，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产物。它要求具有社会学的复杂性，心理的敏锐性和稳固地把握住历史进程的能力；而粗俗的自然主义者只要相信科学，集中于污秽和令人震惊的事物，和确保他的人物是由遗传和环境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就够了。当时主要是白人的精英分子指责他们各自国家

文化上的落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幸要与之共为一民族的某些种族，在所谓生物学的角度上讲是劣等种族。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有什么形式更适合于包含这些矛盾呢？然而，与第一印象相反，自然主义在许多方面是一个乐观的运动。它希望引起震动的愿望，在肤浅或保守的作家手里只不过是怪诞地倒退回情节剧或哥特式小说体的手段，但实际上它是要激励人们，而不是使人灰心。仅存的浪漫主义者仍然相信在意识里存在某种灵性的王国，天主教徒们则继续幻想真理是先验的，而自然主义对肮脏事物的兴趣，实际上正是希望瓦解这些残存的思想。在自然主义看来，人完全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是一个动物：当明白了这一点，进步就是可能的了。

考虑到19世纪对来自欧洲的影响能够比较顺畅的吸收，以及同一时期巴西与法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毫不奇怪自然主义在巴西比在别处有更蓬勃的繁荣兴盛。特别是东北部在1870至1920年期间产生出杰出的自然主义作家，而同样也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出地方主义运动。产生地方主义一自然主义运动的部分推动力来自奴隶制，废奴和从糖厂向工厂过渡时期的严酷现实。这一过程与在欧洲促使自然主义登上中心舞台的劳资冲突并不完全相等，但它肯定比西语美洲当时大多数的劳工冲突具有更明显的戏剧性，而且它还涉及种族问题。黑人在浪漫主义小说中是没有地位的，只有一部小说，贝尔纳多·若阿金·达·席尔瓦·吉马良斯（1825—1884）所著《女奴伊佐拉》（1875），和在卡斯特罗·阿尔韦斯（1847—1871）的诗歌中才对黑人表示同情。[3]吉马良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第一个认真地对待内陆地区的民间传说，如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传说，他还涉及盗匪活动，内陆地区和现实的社会主题（例如在作品《探金者》（1872）中）。不幸的是，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放荡不羁，他的文学风格却是毫无色彩的。

---

③ 见马丁为《剑桥拉美史》第3卷撰写的第18章。

自然主义流派真正的先驱是东北部的辩论文作家富兰克林·达·西尔韦拉·塔沃拉（1842—1888），他是早期的历史小说《雅瓜里贝的印第安人》（1861）的作者，随后又写作了更具社会学特性的作品，如《郊外的婚姻》（1869），《头发》（1876）和《乡民》（1878）。塔沃拉第一个在巴西小说中系统地采用历史和民间传说，而不是仅仅为了寻求浪漫和地方色彩。他对强调人物与环境关系的记实材料过于注重，使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受到削弱和缺乏生活气息。塔沃拉是一位自由派人道主义者和积极的共和主义者，他因对何塞·德·阿伦卡尔贵族式地脱离现实的行为作了辛辣的抨击而特别受到铭记。④ 作为一个北方人，他对阿伦卡尔在咖啡开始改变国民经济主导格局时试图把文学中心转向南方的努力表示不满。正如在象征派小说中，阿根廷作家对大草原的捍卫，委内瑞拉作家后来对平原以及秘鲁作家对山区的颂扬，塔沃拉作为1926年地方主义运动的真正先驱，认为巴西的灵魂位于东北部，而南部则是外来的世界主义影响的入口港。 448

阿卢伊西奥·德·阿泽韦多（1857－1913）是第一位真正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是第一位以写作为生的巴西作家。他曾读过左拉和埃萨·德·凯罗斯的作品。他的文学立场比同时代的任何西语美洲小说家都更自觉和不妥协。他的第一部小说《女人的眼泪》（1880）仍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是阿泽韦多的发展惊人地迅速，指出有明确纲领的自然主义是曾经受宠若惊却又失意沮丧的浪漫主义的反面。《穆拉托》（1881）引起了轰动，但比起描写女性性歇斯底里的《男人》（1887）所引起的诽谤，却是温和的。其他重要的作品还有《寄宿舍》（1884）和《经济公寓》（1890），一部描写都市的自然主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的标题本身显示了巴西自然主义运动更具理论性，几乎是社会学的意义。阿泽韦多的书引起激烈争议，在教会和地主阶级中引起骚动，正如克洛林达·

④ 同上。

马托·德·图内尔（见下文）在19世纪80年代末在保守的秘鲁遭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出现这些情况，或者说正是因为如此，阿泽韦多获得极大成功。

阿泽韦多决不是一花独放。有些评论家认为埃库拉诺·马科斯·因格莱斯·德·索萨（1853—1918）的《受伤的上校》（1877）是巴西第一部真正的自然主义小说。今天更为著名的是《传教士》，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位传教士在亚马孙荒野爱上了一位印第安姑娘，这是自然主义派所喜爱的一个主题。最具左拉风格的是儒利奥·塞萨尔·里贝罗（1845—1890），他卷入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重大事件。他的小说《肉欲》（1888）获得极大成功，尽管在现代读者看来，只有性和性虐待狂场面是令人信服的。类似的作家还有阿道弗·费雷拉·卡米尼亚（1867—1897），他与一位有夫之妇充满丑闻的关系和他的小说一样出名。《女师范生》（1893）描写了小镇的偏见，《善良的土生仔》（1895）描写海军里的同性恋，两部小说都被当局指责为不道德。作为回报，他又写了另一部同样猥亵的小说《引诱》（1896）。

449

对于试图改变巴西上流社会所喜欢的看待自己方式的自然主义作家，对文体的雕凿似乎是不适宜的。然而在法国，自然主义散文和高踏派诗歌在福楼拜，戈蒂埃和莫泊桑作品中的汇合，开创了最终产生普鲁斯特、乔伊斯、弗吉尼亚·沃尔芙和新浪漫主义的风气。巴西产生了两位与这种类型而不是左拉相似的小说家。第一位是劳尔·达维拉·庞佩亚（1863—1895）。他曾写过《亚马孙的悲剧》（1880），但最为著名的是《书院》（1888），一部以讽刺手法描写他少年时期寄宿学校经历的小说。有时他在题材和观点的某些古怪方面都被比做狄更斯，庞佩亚通常被认为是一位象征主义作家，因为他鲜明的优美笔调介于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之间，而同时显示出罕见的心理学洞察力。另一位是有些人认为是拉美最伟大的小说家，若阿金·马里亚·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1908），这位“近视、癫痫的黑白小杂种”被认为是“弗

型的巴西人”。[5] 马查多出生于贫苦家庭，后来当过排字工和校对员，然后成为一名记者和评论家，是他于1897年建立了巴西文学院。他献身于自己的国家，然而又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渴望得到社会的充分承认，并对穆拉托人的待遇极为不满。他与庞佩亚一样，在小说中擅于描写内心活动，他的作品以社会结构为背景，但更侧重于心理方面，而不是社会学方面。马查多在美学上是高蹈派，在哲学上是决定论者，他对第二帝国时期的巴西作了间接但却是准确的描写。在早期诗歌阶段之后，他创作了第一部杰出的小说《布拉兹·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小说以主人公的死（使人想起英国小说家斯特恩）为开头，以他的话：“我没有后代，无人继承我们的苦难”为结束。另两部模仿滑稽作品的杰作为《金卡斯·博尔巴》(1891)和《堂卡斯穆罗》(1899)，作品具有精确、恰到好处的冷嘲，怀疑一切的幽默和充满了忧郁的特点。其风格精巧细腻，具有讥讽和深刻的自觉性；但同样也具有尖锐的社会性，甚至老于世故，再现了当时学者们所熟知的各种决定因素所造成的世界；最后，它还意识到想象本身及其创作有其自己相对的自主性，使作品成为拉美第一部真正具有自我 450 参考价值的小说（尽管本世纪初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小说《癞皮鹦鹉》显示了最初的迹象），并预示了20世纪的发展。马查多还写作诗歌，戏剧，评论和报刊文章，并总是努力通过完善艺术形式将现实与戏剧性的事件保持距离。他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一位类似斯威夫特、斯特恩、卡夫卡或博尔赫斯式的作家。塞缪尔·帕特南1948年断言，没有一位美国作家——甚至亨利·詹姆斯——可以与马查多相比，而威廉·格罗斯曼则把他称为“西方文学中最彻底醒悟的作家”。[6]

---

⑤ 见M·西摩—史密斯著《现代世界文学入门》（四卷集，伦敦，1975），第3卷，第152页。

⑥ 塞缪尔·帕特南著《美妙的历程，巴西文学400年概述》（纽约，1948）第48页。威廉·格罗斯曼的话转引自西摩—史密斯著《现代世界文学入门》第3卷第152页。

西语美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巴西丰富的自然主义相比，但自然主义很快也盛行起来。乌拉圭的爱德华多·阿塞韦多·迪亚斯（1851—1921）是一位典型的先驱，他的历史小说的中心与浪漫主义的作品完全不同。乌拉圭最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是哈维尔·德·比亚纳（1868—1926），他曾受阿塞韦多的影响。他所著称的是描写农村残酷生活的短篇小说，如《乡间》（1896），或模仿西班牙善辩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风格、感情夸张的小说，如《高乔姑娘》（1899）。卡洛斯·雷伊莱斯（1868—1938）创作了《贝巴》（1894）和《故乡》（1916），随后又创作了更具印象主义风格的《塞维利亚的魅力》（1922）和他的杰作《高乔牧民弗洛里多》（1932）。雷伊莱斯是一位富有的地主；他将傲慢的权力主义与奇特敏感的唯美主义相结合，揭示了现代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密切关系，正如一枚硬币不同的两面。

在这一期间，拉美没有一个国家象阿根廷那样，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辨证关系表现的更为复杂，富有戏剧性和持续不断。在经过20年以印第安人、高乔人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原始风尚的幽灵似乎消失之后，阿根廷1880年重要的一代“绅士作家”发扬了萨米恩托的精神。卢西奥·曼西利亚（1831—1913）创作的生动的经典性记实小说《兰克尔印第安人征战记事》（1870），通过一位极为仁慈的士兵的眼睛，描叙了罗加进行臭名昭著的远征前十年，欧洲文明与游牧印第安人之间的边疆状态。而爱德华多·古铁雷斯（1851—1889）在小说《胡安·莫雷拉》（1879）中描写了传奇性的高乔匪徒。这部作品尽管技巧不高，但却显示了高乔人在经历了马丁·菲耶罗时代后，正在走向城市的最初迹象。这些作品的完成先于1880年一代本身的创作，这些人是有闲之士，有时间享受由其他人，如萨米恩托所创造的成果。萨米恩托临死之前毫无抱怨地说道，他曾“进行奋斗，为了所有人都能参加到生活的宴席中去，而我只能悄悄地享用”。⑦结果是一种没有战斗精神的自然主义，卢西奥·V·洛佩斯（1848—1894）的

《伟大的村落》（1884）体现了这一点。该作品描绘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第一次移民浪潮中所发生的变化。米格尔·卡内（1851—1905）回忆童年的作品《青年时代》（1884）与萨米恩托的《外省回忆》连接起来读则很有启发性。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旅游*时代新出现的世界主义精英分子不断增长的意识，他们一心想把自己过去成长的经历神话化，和希望得到现在和未来。他们认定自己与印第安人和高乔人是不同的，现在他们又将认定自己与不断涌入他们国家的一批批移民也是不同的。因此，阿根廷式的自然主义具有某种选择性。

某些移民是可以接受的。爱德华多·维尔德（1844—1913）是一个英国贵族的儿子，他是新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精英阶层的典型例子；半自传式的回忆录《禁果》（1884）的作者，具有一半法国血统的保罗·格鲁萨（1848—1929）从1885到1929年期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甚至在西语美洲第一位真正的自然主义作家（这一点还有争论）欧亨尼奥·坎巴塞雷斯（1843—1888）更为引起骚动的小说中，也包括许多自传的成份，尽管这些回忆不那么亲切和自我放纵。坎巴塞雷斯的作品带有刚从浪漫主义转化过来的那种强烈的痛苦：《感伤的音乐》（1884）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巴黎的关系；《没有目的》（1885）则描写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外省的关系，作品中出现了到那时为止阿根廷文学中最令人震惊的性和暴力场面；《在血中》（1887）是一部关于遗传、环境和移民历险的主题小说。后来有关变化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作品有胡利安·马特尔（原名何塞·米罗，1867—1896）的《钱袋》（1891），戏剧性地描写了那个时代四处蔓延的物质主义，以及弗赖·莫乔（原名何塞·S·阿尔瓦雷斯，1858—1903）的短篇

⑦ 见P·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语美洲文学流派》（墨西哥，1949）第140页。

* 指到欧洲各大城市的旅游。——译者

小说，作者是米特列主办的《国民报》的记者，他的书，如《一个警卫的回忆》（1897）显露了一个比文学绅士们笔下更为破旧和更具暴力的城市，并预示了探戈时代的到来。

452 智利的阿尔韦托·布莱斯特·加纳（1830—1920）一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他是19世纪拉美仿效巴尔扎克或佩雷斯·加尔多斯大概最成功的作家。他的小说结合了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特点，艺术风格的喜剧因素和对生活的自然主义态度，但都统一于主要的现实主义目的之下。最为杰出的作品是以他所了解的圣地亚哥为背景的《马丁·里瓦斯》（1862），虽然最流行的是以独立战争时代为背景的《在光复时期》（1897）。

玻利维亚作家纳塔涅尔·阿吉雷（1843—1888）风格相似但却不那么著名，他的作品《胡安·德拉罗萨》（1885）同样也再现了独立战争。作品受人欢迎的真正的美洲主义观点使它成为自由主义时代最具可读性的小说之一。

秘鲁在太平洋战争中遭惨败后，涌现了两位具有战争精神的女小说家。梅塞德斯·卡韦略·德·卡沃内拉（1845—1909）在其作品《密谋者》（1892）、《布兰卡·索尔》（1889）和《结局》（1889）中对腐化和社会腐朽作了猛烈的攻击，这引起了利马寡头阶级的文学界帮凶的反击，最终逼得她进了市办收容所。另一位是克洛林达·马托·德·图内尔（1854—1909），她的小说《没有窝的鸟》（1889）被普遍认为是拉美作家所创作的第一部真正的本土小说。这部小说是献给冈萨雷斯·普拉达的（见下述），它引起了诽谤，使作者被开除教籍和自动放逐。她仿效里卡多·帕尔马，《秘鲁的传说》[8]的作者，创作了一系列《库斯科的传说》（1884—1886），她的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感情夸张的色彩，尽管是真正的反教会和反寡头统治的。她主编一份报纸《秘鲁画报》（1892—1895），一个社会批判的论坛，并创作了另一部关于移

---

⑧ 见马丁为《剑桥拉美史》第5卷撰写的第18章。

民和遗传的自然主义小说《遗产》(1893)。有趣的是，玻利维亚最早的本土主义作家中的一位也是女性，林道拉·安索瓦特吉·德·坎佩罗(1846—1898)，表明不同的受压迫社会团体之间的直觉移情作用。当许多自然主义小说以妓院为背景时，有妇女以批判的洞察力和目的把眼光放在其他方面令人耳目一新。

这个时代哥伦比亚杰出的小说家是托马斯·卡拉斯基利亚(1858—1940)，他是一位早期的本地主义者，但不仅仅是一位风俗派，因为他对民间传说，社会类型和对话的掌握总是能深刻地与上下文融为一体。他对自然主义特殊的不同表达方式，如从《故乡的果实》(1896)到《约隆波侯爵夫人》(1926)预兆了他后来所能看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地方主义风格。由于更好地掌握了可以表达他的观察和娴熟的语言技巧，他最终成为一名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与之适成对比的是，何塞·马里亚·巴尔加斯·比拉(1860—1933)巧妙地使用自然主义老一套的主题，以妖娆的后期浪漫主义的、几乎是现代主义的风格，创作了具有颓废的魅力和对大众有吸引力的作品，包括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和反帝的色彩，以及用诸如《微风—紫罗兰》(1886)和《污泥中的鲜花》(1895)此类标题创作令人迷醉的作品，这些作品使他可以例外地以这些不道德的收入为生。

墨西哥19世纪的小说令人奇怪地停滞了，其作品一直是单一情节，风俗派的叙事体，外省式的、而非地方主义的风格。由于墨美战争以及法国入侵的影响，使浪漫主义的风格和主题延长了，这种局面直到伊格纳西奥·阿尔塔米拉诺时代之后才有转变。⑨何塞·洛佩斯·波蒂略(1850—1923)以他的《土地》(1898)预兆了革命时期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转向农村去寻求一种民族主义文学。同时期的小说家还有拉斐尔·德尔加多(1853—1914)，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百灵鸟》(1891)，和埃米利奥·拉瓦萨

⑨ 同上。

(1856—1930)，他在作品《乌合之众》(1887) 中展示了真正的现代批判现实主义的观点。费德里科·甘博亚 (1864—1939) 是左拉在西语美洲最忠实的信徒：《写生》(1888)和《至高无上的法律》(1896) 的主角是梅毒和酒(同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品更喜欢表现结核病和鸦片)，而人物只是随主题而定，因而是依典型活动的附属，这是人物从属于主题的范例，拉美迄今为止的小说都有这种特征。《变态》(1899) 是一部关于修女的小说，修女从修道院被诱拐出来，最终沉溺于淫欲；《圣女》(1903) 在墨西哥就如同左拉的《娜娜》，它是另一部实验室式的作品，描写了一位乡村姑娘受到一名士兵的勾引，成了墨西哥城的妓女的悲惨生活。

戏　剧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拉美大多数国家的戏剧是萧条的。在独立后的时期，尽管创作和演出的质量并不高，但是戏剧性的历史感本身促进了形式的发展。此后，根据公众的需要，大多数作家都是在他们的小说或诗歌出名后，才感到有把握转向舞台。这些被看作次要创作的作品很少流传下来。然而，还没有成为小说家的剧作家很难上演他们的作品，因为剧院老板都宁愿稳妥些。因此，外国戏剧、歌剧、演员和歌唱家占了上风。例如，萨拉·伯恩哈特和杰出的女高音阿德利娜·帕蒂对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城等城市进行了广为宣传的访问。

454

与此同时，其他娱乐得到发展，与戏剧相竞争。19世纪70年代，康康舞传到了拉美，它使许多人感到厌恶，但更多的人则喜爱它。当更为严肃的剧作不景气时，康康舞可以保证满座。70年代引进了法国喜歌剧，比才表现“口说法语，跳着古巴舞蹈的西班牙香烟女郎”的歌剧《卡门》大为轰动。为了不让外来的高卢人独占鳌头，西班牙的小歌剧，特别是萨尔瑞拉 (Zarzuela)* 同

* 一种说唱剧——译者

样越来越流行，使当地的戏剧活动遭受损害，同时它更容易美洲化，特别是在墨西哥，到19世纪末象《墨西哥万岁》这样的演出已很普通。第一部真正的墨西哥萨尔瑞拉是由胡安·德·迪奥斯·佩萨（1852—1910）和路易斯·阿尔卡拉斯创作的《圣阿尼塔的节日》（1886），它在群众中引起轰动。各大都市中花花公子、生活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所经常光顾，而又令上流社会悲叹的跳舞咖啡厅和夜间餐馆，变得很时髦。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等收入阶层的大多数人排起长队去当地剧院聆听最早的唱片。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歌舞杂耍表演传到了拉美，同时最早的电影也传入了，并得到令人吃惊的飞速发展，这在那些从未形成真正民族传统的国家对戏剧的未来发展是个不详之兆。

因而，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尽管戏剧从未达到美学的高度，但在民众中流行的程度却开始出现了相对的衰落。然而，自然主义的戏剧慢慢获得势头。易卜生的《群鬼》1896年才传到墨西哥，并受到冷落，但是早在1894年顽强的费德里科·甘博亚已试图努力赶上他的成就。正是甘博亚在1905年创作了《土地的复仇》，这是墨西哥第一部谴责封建土地制度的戏剧，尽管其特征是更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伤感，而不是革命的激情。墨西哥的整个情况如此之糟，以至在1906年当时的教育部长胡斯托·谢拉发起了一次戏剧比赛，以拯救墨西哥不致于被音乐厅所窒息。60部戏剧参加了比赛，但都被遗忘了。在大多数西语美洲主要国家和巴西，情况大体相似。

455

所有这一切使得拉普拉塔河流域地区在现代主义高峰时期出现的令人吃惊的戏剧复兴更为显著。这一现象不仅可以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的迅速发展加以解释，也可以由乡村向城市过渡的特定性质，和在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和移民大量涌入时期需要一种统一的民族神话来加以解释。乌拉圭的一位班主何塞·波德斯塔（1857—1937）在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主持的马戏演出中将哑剧和戏剧表演结合起来，使用高乔主题和特技骑术，类似

美国的威廉·科迪的疯狂西部马戏团。波德斯塔在1884年的第一部演出是以古铁雷斯的《胡安·莫雷拉》为剧本，最初是哑剧演出，后来在1886年改为吟诵。他的家庭组成流动演出团在阿根廷和乌拉圭巡回表演，最后在1901年从郊区迁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高乔主题开始被其他戏剧取代，吸引了社会基础更为广泛的观众。这时涌现了更为雄心勃勃的作家，填补这种上演农村题材的本地大众化剧场和城市中上流地区由外国剧团上演的欧洲古典戏剧之间的空白。1902 年，马丁尼亚诺·莱吉萨蒙（1858—1935)以《卡兰德里亚》，马丁·科罗纳多（1850—1919）以易卜生风格的《祸端》一下子获得成功。对严肃戏剧的一位重要促进人物是评论家胡安·巴勃罗·埃查圭（1877—1950），他博学的评论文章收集在《观点》（1905）和《阿根廷戏剧》（1917）中。但是，那个时期的关键人物是乌拉圭的弗洛伦西奥·桑切斯（1875—1910），他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20部话剧，独幕喜剧和喜剧。他的作品清楚地表明阿根廷戏剧是如何迅速从表现高乔亡命之徒引起轰动的神话性活动转到表现当时农村地区中地主和剥削的现实冲突。他最著名的作品都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反映了他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破败的城郊和周围农村地区的深入了解，如《我的博士儿子》（1903），《外国姑娘》（1904），他的忧郁性的杰作《每况愈下》（1905）和《死者》（1905）。最后一部作品是两天内写成的关于酗酒的自然主义主题戏剧。恰恰是酗酒以及肺结核和贫困使这位伟大的剧作家早逝。

456

诗　歌

19世纪末在西语美洲和巴西，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形式和内容与散文体发生了重大冲突，散文坚定地向自然主义方向发展，诗歌向现代主义方向发展，广义地说来它们是当时欧洲流行的文学运动的混合体，因而与印象主义处于同一时期。在巴西，诗人

仅仅是仿效法国的文学运动——高蹈派（勒孔特·德·李勒、戈蒂埃）和象征主义（马拉梅、魏尔伦）——并使用同样的名称。难以出现重大的巴西化进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在巴西才出现了庞佩亚式马查多式的作家，把高蹈派诗歌精湛的形式和自然主义小说的社会性结合起来，创造出那个时代的叙事体杰作。西语美洲没有任何小说家获得相近的成就，因为诗歌（包括"诗化的"短小散文体）与叙事体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分离。

有时我们可以认为巴西人是正确的：对于从1870年到大约1920年期间席卷整个拉美大陆的文学运动，高蹈派大概是最恰的名称，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先锋派潮流，最好称为现代派，如在巴西。（对欧洲和北美的评论家，这样就不那么混乱）。确实，乍看之下，一群自视超尘绝俗、自命贵族，动辄歌颂天鹅、公主，似乎在怀古的装腔作势文人，看来好象一点都不"现代"。然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呼声（达里奥总是以大写字母写艺术一词）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而非叛逆性的，因为这些年轻的诗人大多数是新闻记者，他们与文学生产方式的关系从他们发表的诗作中是无法推测的，那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此外，更深入的研究一下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并不象某些评论家所制造的神话那样对政治漠不关心。与浪漫主义时期形成对照的是，政治被排除在诗歌自身之外。但是，大多数现代派诗人都与主要的思想家保持密切的联系；许多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党人；几乎所有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分子。

"现代主义"或所宣称的现代性应首先被理解为诗歌的现代化。这比不熟悉情况的人所以为的更重要的多，因为一百年前西班牙语诗歌的华而不实和修辞上的毛病现在是难以恢复的。拉美诗歌在现代主义末期并非真正现代的，但已完全快要成为现代的了。现代主义运动就形式和主题所作的创新的范围是非同寻常的。诗歌尽管在气氛和基调方面是极为有限的，但在主题的时间和空间方面却是广泛的。以拉美的人或事为主题在浪漫主义时期

457

被认为是最基本的，现在却被大多数诗人所忽视。拉美毕竟不那么现代，而且从帕尔纳索斯山或奥林匹斯山看来，几乎不是美学探索的合适题材。只有当诗人们本身现代化后才会重新把拉美作为题材。

在争论西语美洲的现代主义何时开始，谁是它的开拓者和先锋方面，评论家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篇幅，但是没人否认是鲁文·达里奥在1888年发表了诗文集《蓝》使它脱颖而出。被公认为"先驱者"的一位诗人是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不过他比达里奥活的长。他早期的作品以极其多样的试验性形式和韵律，显示了与当时西班牙语诗歌完全不同的精确性和艺术特色（贝克尔例外）。象他同时代的人马蒂一样，冈萨雷斯·普拉达把文学看作一般是高等市民的爱好，但却认为诗歌是纯粹的和自发的。这样一种观点今天对于具有他这种倾向的人看起来是令人惊异的，但却反映了当时在区别诗歌和散文方面的复古倾向。然而，冈萨雷斯·普拉达从未费心去传播自己的诗歌，在秘鲁之外只有有限的影响。[10]

现代主义的另一位"先驱"是古巴的何塞·马蒂（1853—1895）。作为诗人，他是西班牙语系所有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杰出地将简洁、独创性和魄力溶为一体，甚至他的诗歌实际上是复杂的和创新的却仍显示出古典性。在散文方面，他是那个时期最伟大的文体家之一，与他齐名的还有胡安·蒙塔尔沃（厄瓜多尔，1832—1889），[11] 马蒂因1875年独裁者加西亚·莫雷诺遭到暗杀时曾发出的有名的自夸"是我的笔杀了他"而著称。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记者，马蒂对遣词造句的造诣很高，他新创的

---

⑩ 见黑尔为《剑桥拉美史》第4卷撰写的第10章。

⑪ 胡安·蒙塔尔沃最著名的文章刊登在《世界报》（1866）和《再生者》（1872）中。1873年接着发表了《被塞万提斯遗忘的篇章》。1883年，开始发表《论著七篇》，1866年流亡巴拿马期间发表了著名的《卡蒂利纳里亚斯》，随后以《目击者》（巴黎，1886—1889）为标题发表四组系列杂文。

词句成为西语美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被关押入狱一年之后，马蒂16岁被流放，他把整个成年生命贡献给古巴革命事业。在无法返回古巴的日子里；他对所到之国（特别是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文学和市民文化都作出贡献，并在美国生活了14年。在这一方面，他的生涯与同时代的波多黎各作家欧亨尼奥·马里亚·德·奥斯托斯（1839—1903）相似。奥斯托斯也献身于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并象达里奥一样，游历了整个拉美地区，所到之处都从事活动，写作和教学。马蒂创作了第一部现代主义小说《不祥的友谊》（1885），他的儿童故事《黄金时代》（1889）成为这一体裁的经典之作。他大部分诗作，如《自由的诗》（约1883）和《远方的花》是死后发表的。他在世时出版的集子有《伊斯马埃利约》（1882），这是因思念不在身边的幼子有感而作的愉快、短小诗歌杰作，以及《纯朴的诗》（1891），所收作品就象诗人本人一样诚恳直爽。1895年，他在率领一次抗击西班牙人的军事行动中在古巴阵亡。他所树立的战士和文人，诗人和爱国者的榜样，对拉美历史的影响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

由于马蒂和冈萨雷斯·普拉达的人格比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更伟大，评论家们很容易因他们的勇气、他们英勇的个人主义和政治坚定性而把他们看作是浪漫主义作家；但是如果要把那些具有政治内容的作品或者作家完全从现代主义运动中排除出去，或者认为那些早逝的（席尔瓦、卡萨尔，见下文）或光荣去世的（马蒂）作家实际上是后期浪漫主义作家，就是对现代主义运动的曲解。相反，给予这个运动统一力量和使它有别于同时代巴西发展的，恰恰是因为现代主义不仅仅是只在形式上有所改进的西语美洲式高蹈派—象征主义，而且是对浪漫主义的全部哲学影响的延迟了的吸收（由于政治和历史潮流的重点各异，浪漫主义的影响在西语美洲一直不是全面的），以及对欧洲浪漫主义第2阶段即颓废的阶段——“浪漫的苦闷”——的混合。达里奥（我们将随后涉及）的天才在于只有在他的诗歌和人格中，19世纪诗歌全部经历

的积累的三个阶段才真正达到和谐。因而，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流派，而是对1888年以后所有重要诗人都产生影响的广泛的历史运动；这一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达里奥1896年发表《亵渎的散文》之前和之后，当时出现了首先在拉美北部获得发展的势头向南部转移的情况。许多诗人似乎是，或者实际上是苦恼的浪漫主义者，或者甚至是活动家（迪亚斯·米龙、戈麦斯·卡里略、乔卡诺，见下文），但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已不可挽回地改变了。

马蒂和冈萨雷斯·普拉达当时是现代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但是两人都超越了其更为局限、纯粹装饰性的地位。在达里奥之前一位完全的现代主义诗人是在墨西哥城创办了著名的《蓝色杂志》(1894—1896)的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1859－1895)。奇怪的是，他出身卑微，但却成为新作家中最为贵族化的（他的笔名是“霍布公爵”）；此外，几乎独一无二的是，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城市，但由于具有独特的直觉，他的行为和作品使他看起来就象是作家中游历最广，阅历最深的。他早期以浪漫主义者（缪塞、贝克尔）为楷模但已融会自己的风格而得到提练；随着每一位新的诗人——勒孔特·德·李勒、魏尔伦、波德莱尔、爱伦·坡——流行起来，古铁雷斯·纳赫拉就吸取他们的特点，并融合到他琐屑的，精致的但却异常成功的和音乐性的诗歌和报刊写作中去。他的一首诗歌，动人的《霍布女公爵》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这位作家的诗作受到极大喜爱，为人也象他的诗句一样雅致，他36岁去世。好象是为了显示现代主义诗人可以有很大差别，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墨西哥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1853—1928年）则被称作“文人好斗之士”。[12]米龙曾因在枪战中射死敌手而两次入狱，曾被波菲里奥·迪亚斯流放，他的生活充满动荡，只有马蒂和乔卡诺可与之相比。他著名的诗句“有些

⑫ L·A·桑切斯《美洲比较文学史》（四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第3卷第111页。

鸟儿穿过了沼泽 可还是纯洁的：我即如此”，不仅显示了他赋有挑衅性的气质，还表明他坚持认为新诗不必避开一切严肃的和真实的内容去达到“纯粹的”和美，因为这一诗句还具有文学的涵义。只有冈萨雷斯·普拉达与他具有同样的决心进行创新和避免任何轻薄，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迪亚斯·米龙的第一部诗集《诗》（1886）到《石头碴》（1901）中追溯美洲浪漫主义——他最初的崇拜对象是拜伦和雨果——从修辞性的、实质上是外部冲动性的，由于更为仔细的内在化，而转变为更有节制特征的发展过程。

与古铁雷斯·纳赫拉相似的是古巴的胡利安·德尔·卡萨尔（1863—1893）。由于健康不佳，个人不幸和古巴的悲剧，他这种世纪病* 颓废的内心苦闷使他产生了渴望逃到欧洲的愿望（“我对城市不纯洁的爱恋 太阳永远高悬在上 我却更喜欢煤气灯闪烁的光芒”）。卡萨尔神经过敏、悲观、忧郁，并受到戈蒂埃、波德莱尔和他的同胞——有一半法国血统的何塞·马里亚·德·埃雷迪亚（1842—1895）的影响。埃雷迪亚是一位主要的高蹈派诗人，在卡萨尔去世当年发表了《锦幡集》。与卡萨尔类似，但却更具真正悲剧性的是哥伦比亚诗人何塞·阿松森·席尔瓦（1865—1896）的生活与死亡，他的人生经历可以与50年前的济慈或雪莱相比美。象他的朋友豪尔赫·伊萨克斯[13]和卡萨尔一样，席尔瓦也经历了家境衰落的逆境；他所深深热爱着的姐妹埃尔维拉21岁时去世（伊萨克斯写了一首著名的哀歌）；他在一次船难中损失了大部分文稿；经历了也许比同时代人更强的因浪漫主义与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冲突所引起的绝望；最后终于开枪自杀。他深深受到爱伦·坡、贝克尔和波德莱尔的影响，他的《夜曲》（“夜充满微风的夜”）是西语美洲最著名的诗歌之一，他的小说《茶余

460

* 世纪病（mal-de-siécle），指19世纪初叶法国文艺界部分人对法国大革命后社会动荡感到彷徨、悲观和矛盾的病态心理。此处系借用。——译者

[13] 见前引马丁文。

饭后》是最具世纪末思想特点的散文作品之一。西尔瓦受到波哥大狭隘的外省环境的折磨，并典型地表现了大部分现代主义诗歌所具有的受排挤和异化感。实证主义将艺术家排斥在中心地位之外，甚至否认艺术的重要性；相反，它按照工具论的观点，认为艺术与其他事物一样是作为娱乐、装饰、点缀和消遣的；而大多数诗人悲观地渴望前资本主义那种托庇于保护人的方式，退避到似乎基本上是非超验的、逃避现实的和乍看起来与拉美实际需求无关的诗歌中去从而应验了实证主义分子的观点。

形成了整个现代主义运动，并为之命名的一位人物是鲁文·达里奥（1867—1916）。这位出生于尼加拉瓜小镇的神童成为自贡戈拉以后西班牙语系最有影响的诗人。评论家现在一般都否定他的诗歌的美学质量，但任何东西都不可动摇他在历史中的地位，正如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正确地指出那样，“面对任何一首以西班牙语创作的诗歌，人们可以明确地说出它是写于达里奥之前，还是之后”。⑭ 他曾很长时间摆脱了使卡萨尔和席尔瓦早逝的对生活的悲剧意识，但是最终他也遭受同样的痛苦（“不知我们将往何方 也不知我们从何处来……”）并且健康同样受到损害。达里奥典型的生活轨迹（“纵令象雨果那样坚强和有魏尔伦那样的抱负”）从整个看来，证实了在丰富的外表下面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欧洲浪漫主义（“又有谁不是浪漫派呢？”）和高踏派一象征主义尚未吸取的方面的同时吸收，这些都同属拉美长存的巴罗克风格倾向中的一个方面。现代主义恰恰在格律和韵文所有传统手法，象所有其他艺术传统手法一样将要解体的时候——也就是说恰好是时候，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必然性——使西班牙语诗歌自克维多和贡戈拉之后第一次在形式上达到完美。然而，达里奥的姿态更为具有扩张性。现代主义也是对一直上溯到文艺复兴的整个欧洲传统的赞扬和吸收，对于这个传统以及浪漫主义本身，西

⑭ 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文学流派》，第173页。

班牙基本上是拒绝接受或抵制的，而对浪漫主义西班牙一直无法完全吸收，拉美曾部分地拒绝接受。因此，现代主义不能象有人所断言的那样，理解为“用西班牙语创作的法国诗歌”，而应理解为是对仍然发挥作用的西班牙中世纪传统的深刻否定，它既在普遍的意义上象征着解放，又在具体和特定的情况下象征着波多黎各和古巴的解放。同时，由于拉美浪漫主义出于明显原因基本上排斥了作为欧洲浪漫主义特征的古典的，圣经的和中世纪主题，现代主义现在则吸收了这些主题，而又排斥了任何具有西班牙内容的主题：也就是说，西班牙现已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中一个新的选择对象，一种文化关系的正常化，这一现象很能说明那一代诗人的成熟。由于从此一举摆脱了西班牙的文化遗产——确实，由于开始影响宗主国而转变了进程——他们为拉美文学完全现代化铺设了道路，随着20世纪20年代维多夫罗、巴列霍和聂鲁达这些诗人，以及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和博尔赫斯这些叙事体作家的出现，这一进程立即显而易见。北美诗歌通过两个人物，爱伦·坡和惠特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法国，它不仅以明显的积极原因吸引拉美人，如启蒙运动、大革命，可以不断产生具有精确哲学和实践的艺术流派，而且还因为同样有反面的原因：它既是拉丁的，而又非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它既是现代的，而又非盎格鲁撒克逊的。

达里奥不仅从流畅、灵活和音乐性方面来说是最伟大的现代主义诗人，他不仅以他兼收并蓄的、道德上晦暗而美学上却透明的诗歌从整体综合了现代主义运动，他还是主要诗人中游历最广的，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游遍了整个拉美。是他在智利发表的《牛蒡》（1887）和《蓝》（1888），在阿根廷发表了《奇异》和《亵渎的散文》（1896）；但是他不论走到那里都鼓起年青和年老一辈诗人的热情，激励了诗社和协会的成立，在他所到的每一个国家都为报纸撰写难以胜数的文章。在欧洲，他在新事物的产生地巴黎和旧传统的产生地西班牙居住了很长时间，1905年他在西

班牙发表了《生命与希望之歌》。作为对异国风光感兴趣的人，他的作品包含了在那个新出现的热衷于旅行的时代中他所到过或梦想去到的浪漫之地；他是一个怀旧者，对具有贵族倾向的美洲人渴望成为其后嗣的历史时代，特别是对希腊和罗马，怀有思古之情；象拉美精英分子的整个一代人一样，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希望把拉美转到一个以巴黎为中心，但却是受凡尔赛启发的“世界性”文化中去（凡尔赛本身作为经典性古风的继承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新建雄伟华丽的城市中心的灵感源泉）；最后，作为一个美学观念轻薄兼有新大陆享乐主义和在世故的“高雅风流年代”* 中天真好色之徒，达里奥包罗并统一了现代主义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诗人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宗教的新替代品；达里奥自称为艺术而生，但艺术在他中年时却无法使他得到慰藉，而性的享乐仅仅反映了生活的稍纵即逝。他晚年的诗歌不论多么精巧和令人喜爱，已不再仅仅是如画的和音乐性的作品，或刻意求新；按照安德森·因贝特的说法，“他以无可比拟的优雅，用诗表达了生活的欢乐和死亡的恐惧”。[15]但是，他却从未能具有精确的思想，而只以最模糊的词语——象征派的，印象派的——表达他自己（如桑切斯所说的）“热情追求自由与美的运动”。他对现代西语美洲文化中世界主义因素的贡献就象马蒂对其中特殊的美洲主义这一面所作的贡献一样伟大：马蒂将一切美洲的事物普遍化；达里奥将一切普遍的事物美洲化。他们有效地共同将现代主义运动和那个时代体系化了。然而，只有达里奥可以使其统一，部分地是因为他的艺术才能，部分地是因为他的兼收并蓄态度，除了艺术本身他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为思想

463

* 高雅风流年代（la belle époque）指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文学艺术大繁荣的时期。——译者

[15] E·安德森·因贝特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两卷集，墨西哥，第3版，1966）第1卷第407页。

的电车上被一个精神分裂者杀害。他也许是那个时代的诗人中最不现代主义的。但丁、拜伦、雨果和惠特曼是他的偶象，美洲的景色和人民，以及动物是他的主题，包括从《美洲魂》（1906）到《要有光》（1908）。他发起了称作新世界主义的运动（“我是美洲的歌手，土生土长又野蛮……”），并且是第一位正面处理以土著人和梅斯蒂索人为主题的重要诗人。然而，他的文学人物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夸张的，他的诗歌在本质上是煽动性的，西班牙式的和演说式的（他的公开演说在整个拉美十分著名）。他的成就是将浪漫主义未完成的重大题材一直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到那时又与新的地方主义，土生主义和克里奥尔主义运动相溶合。

464

其他重要的现代派诗人，有达里奥的终生挚友弗朗西斯科·加维迪亚（萨尔瓦多，1863—1950）以及阿基莱奥·丁·埃切韦利亚（哥斯达黎加，1866—1909）、达里奥·埃雷拉（巴拿马，1870—1914）、里卡多·米罗（巴拿马，1883—1940）、法维奥·菲亚略（圣多明各，1866—1942）、路易斯·略伦斯·托雷斯（波多黎哥，1878—1944）；墨西哥有曼努埃尔·何塞·奥顿（1858—1906）、弗朗西斯科·A·德·伊卡萨（1863—1925）、路易斯·G·乌尔维纳（1869—1934）、埃弗伦·雷沃列多·伊达尔戈（1877—1929）和何塞·胡安·塔夫拉达（1871—1945）；委内瑞拉有鲁菲诺·布兰科·丰博纳（1874—1944），他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以及他的宿敌安德列斯·马塔（1870—1931）；哥伦比亚有吉列尔莫·巴伦西亚（1873—1943），他是《典礼》（1899）的作者，一位富有的诗人，大概是现代主义诗人中最“古典的”；何塞·马里亚·埃古伦（秘鲁，1874—1942），他所特别具有的个人想象力使他超越了现代主义运动典型的平庸；玻利维亚有里卡多·海梅斯·弗雷雷（1868—1933），他在阿根廷生活了很多年，政治上很激进却创作了《蛮荒的源泉》（1899），这部诗集充满了奇特的北欧神话；以及他的同胞弗兰斯·塔马约（1879—1956）。

在达里奥1916年去世之前，现代主义运动正在衰落。1911年，恩里克·冈萨雷斯·马丁内斯（1871—1952）在游历了外省后带着他的诗作《隐蔽的小径》到了墨西哥城，其中一首是这样开头的："扭断天鹅的脖子，他那骗人的羽衣　尽管在泉水的蓝色上他投上了自己白色的身影　他炫耀着苍白的美，但却无法暗示　大地的声音，和它吐露的灵气"。因为天鹅是达里奥所特有的形象之一，很明确这位墨西哥人正在预告现代主义的终结。然而，达里奥是否在创作《生命与希望之歌》时已完全开始进行冈萨雷斯·马丁内斯所要求的那种从形式的复杂化向纯粹的单纯化的转变，是可以争辩的。不用说，如果没有现代主义已经达到的对风格和技巧的成熟，这种转变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卢戈内斯在创作了《伤感的月历》（1909）之后改变了阿根廷诗歌的方向（预示着阿列塔、卡列戈、费尔南德斯·莫雷诺、班奇斯，卡普德维拉、门德斯、早期的博尔赫斯的出现），冈萨雷斯·马丁内斯，本质上是保守的，为墨西哥的诗人洛佩斯·贝拉尔德、佩利塞尔、托雷斯·博德特、比利亚乌鲁蒂亚开辟了道路，他们用诗歌表现日常生活。这种新方向的动力来自一种地方主义的激情，并因此预示了1918年之后在小说中的发展。阿马多·内尔沃（墨西哥，1870—1919）是继达里奥之后最受欢迎的现代派诗人，特别是由于他使用了老一套的神秘主义，拥有中产阶级的女性读者，尽管他是最不经久的一位诗人，他采取了更为简洁的表现手法。他的成功本身显示了现代主义在读者中激起反应的能力已经因人而异了，或者说，现代主义改变诗歌形式的能力实际上已到尽头。他最著名的诗集的名称《静静的情人》（1920年在他死后出版）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

465

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大城市生活的压力，旅行的发展和社会以及地理性的新的流动性，报纸的发展及其本身的篇幅有限，这一切都导致鼓励短小精悍的文风，能给人以耳目一新和开门见山的印象。19世纪末，掌权的资产阶级创办了拉美影响巨大

的报纸，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民报》、圣地亚哥的《时代报》（报主马克克卢雷是达里奥的资产阶级国王）以及加拉加斯的《国民舆论报》，以便满足新近致富的读者们对那个"高雅风流年代"欧洲上流社会和文化活动消息的需求。所有这些情况加起来促进了现代派文学创作中特殊的发展：短小的抒情诗（叙事诗非常少），包括俳句；散文诗；短篇小说，有时篇幅不足一栏（秘鲁的里卡多·帕尔马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先驱，尽管拉美短篇小说的辉煌时代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以及最有特点的记事。

记事是一种各样体裁的混合物：白话诗、艺术报道、根据采访创作的叙事文、想象的或文学随笔、作家生平、书评、展览、音乐演出或文学晚会、自传短文、匿名叙事小品或游记，等等。达里奥是这种形式的创新者之一，但是创作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艺术的永恒和生活的短暂之间这种杂烩的公认高手是危地马拉的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1873—1927）。他年青时在其工作的女内衣店为法国大使夫人服务后，与她建立短暂的热烈关系时，看到了未来的前景。他随后的生活充满了一连串这类心理震颤，这一切都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素材，直到他与西班牙当时最受欢迎的歌唱家和电影明星拉克尔·梅列尔结婚，当时谣传他曾与玛塔·阿里有过一段热烈关系，后将她出卖给法国当局。他可以非常巧妙地操纵报纸业主和政治家们（他曾多年担任埃斯特拉达·卡夫雷拉独裁政府驻欧洲的代表）。戈麦斯·卡里略的全部成年生活是在巴黎度过的，他没有就危地马拉写过一个字，但却在旧大陆广泛旅行为他的读者寻找"引起轰动的消息"：

"对于我所感兴趣的国家，我在游记中所要寻找的不是它们的灵魂。我寻找某种更为轻松，更为微妙，更为生动，更有诗意和更实在的东西：感觉……大自然象女人一样敏感和易变……旅行的乐趣在于旅程本身……"[17] 没有什么能象记事文体，如戈麦斯·

[17] 《旅行心理》（1919），引自M·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现代主义简史》（墨西哥，1954）第395—396页。

卡里略所创作的那样更能清楚地表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在商人时代一群绝俗厌世的精神贵族对历史上没有地位的拉丁美洲跻身于国际经济和文化网的无言支持。记事体实际上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不存在，到1930年已消亡的一种体裁。戈麦斯·卡里略作为一位写作令人稍许陶醉和兴奋，但却时髦的文学闲话墨客，没有那一位现代派作家象他那样拥有更多的热心读者，也没有那一位象他更快地被人遗忘。

也许我们应该谈一下戈麦斯·卡里略逗留的“高雅风流年代”的巴黎，拉美的文化首都和具有社会和艺术抱负的人们的圣地。许多富有的家庭在巴黎度过冬季，或在某个时刻全家搬到巴黎居住多年。巴黎毕竟是艺术之乡，一个人如果可以“征服”它，就可以戴上桂冠，不仅如此，而且是带着功成名就的奖状荣归故里。拉美作家在巴黎发表了大量短命的评论，如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秘鲁，1887—1959）、贡萨洛·萨尔多比德（厄瓜多尔，1884—1962）、乌戈·巴尔赫拉塔（乌拉圭，1887年出生）、无处不在的委内瑞拉作家阿尔韦托·塞雷加·韦博纳、伊西多罗·法韦拉（墨西哥，1882—1964）和阿尔韦托·吉拉尔多（阿根廷，1874—1947），《野蛮的杨基荒原》的作者。象戈麦斯·卡里略一样，许多这些作家显得比他们实际上更为显赫，因为巴黎给了他们威望和出名的物质条件。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巴黎和欧洲已过了旺盛期，但却没有敏锐地意识到他们自己也过了旺盛期：他们为拉美文化的现代化做了准备，但自身却不现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统治阶级的附庸风雅之士不得不为小资产阶级中产生的新一代艺术家让道，尽管是前者继续提供社会联系和为杂志提供资金。

467

象通常一样，在西语美洲现代主义中迅猛剧烈、动荡不平衡发生的那种变化，在巴西却是更为有机的发展进程——更紧密地遵循着欧洲的模式。在浪漫主义逐渐消散之后，巴西的文学活动

继续按与法国相同的名称加以组织，因此在西语美洲文学中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的名称，高踏派和象征派，却成为巴西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头20年文学发展的流派名称。大多数评论家同意自然主义和高踏派实质上都具有叛逆浪漫主义的科学精神，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早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这一现象就已出现了，如马查多的《蝶蛹》和《灯蛾》。他与路易斯·吉马良斯（1845—1898）是一种新的精神——有条理的、正确的，谨严的——的先驱。预兆着这种风格的辩论1878年开始于《里约热内卢日报》，后来被称为“帕尔纳索斯*之战”。辩论的高峰是马查多1879年发表在《巴西评论》上的著名文章《新的一代》。然而，此时还没有人谈到高踏派——这个名称1886年才采用——而是谈论诸如现实主义，社会性和科学精神这类实证主义的观念，对于肯定熟悉达里奥时代西语美洲诗歌的现代读者，尽管这些主题可能会令他们吃惊，但这个运动是反对浪漫主义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正是为什么马查多自己的散文作品似乎可以包括在所谓高踏—现实主义范围内的缘故。

埃里科·维里西莫指出高踏派的诗歌“具有希腊神殿冷静安宁之美，”[18] 恰恰是勒孔特·德·李勒、戈蒂埃、蒲鲁东和埃雷迪亚的精神伙伴。巴西早期的代表有富有哲理性和悲观的赖蒙多·科雷亚（1859—1911）（“只有痛苦……”）；和阿尔贝托·德·奥利维拉（1859—1937），一位高明、冷静的技巧高手，复杂的文学谜语的创造者，曾一度被称为巴西诗人的王子。然而，两位诗人都沉缅于诗的破格，摒绝语法精确性和在诗中采用法国风格。从帕尔纳索斯山的崇高山颠看来，这却得不到赞许，它反对

---

* 帕尔纳索斯（Parnassus），希腊山名，相传是阿波罗和缪斯诸神居住的神山。1866—1876年期间法国高踏派诗人的诗刊曾以《当代帕尔纳斯》（帕尔纳斯是该山的法语音译）为刊名，这派诗人因而被称为帕尔纳斯派（又译巴那斯派），“高踏派”是前者的意译也是传统的译法。——译者

⑱ E·维里西莫著《巴西文学纲要》（纽约，1945）第76页。

任何的格律松散，含糊不清和感伤，因为巴西的诗歌也不能逃避制约了当时所有艺术的学院风气。该运动实际在奥拉沃·比拉克（1865—1918）于1888年发表《诗集》，达里奥发表《蓝》的当年，达到成熟。比拉克是一位受人欢迎的，好色的和诗文流畅的诗人，他还是一位文学巧匠，能够把他最喜爱的二种事物——巴西风景和巴西妇女——变成精心雕凿的形象（“推敲，完善，提高和润饰 你的诗句；最后 把韵律镶在每首金色的诗上 象一颗红宝石”）。比拉克仍然是高踏派中最有可读性的诗人，因为只有他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了。然而，该运动最终沉沦于为艺术而艺术，并实际因此而消亡。

高踏派刚刚问世和得名，就出现象征主义取代了它。在某种意义上说，象征主义以其含糊不清和感觉性，其暗示性和悦耳性，以及倦怠的颓废显现了浪漫主义的复活。也许把它比做文学上的印象主义是最好理解的，按照罗纳尔德·德·卡瓦略的观点，它的目的是“通过诗句自发的韵律，直觉地唤起旧有的诗歌流派试图通过对事物的精确表现所要表达的东西”。[19]埃里科·维里西莫宣称“它在我们国家的追随者很少，我们国家鲜有色彩的浓淡变化和薄雾……我们的文学中内省的例子不多”。[20]但是，这言过其辞了。例如，该流派的追随者之一若昂·达·克鲁斯—索萨（1861—1898）必须被列入巴西伟大诗人之列，他的《盾》（1893）标志着象征派的出现。克鲁斯—索萨被称为巴西象征主义的“黑天鹅”，他因父母是黑人而生为奴隶，一生充满了冲突，怨恨和绝望。他的诗歌曾先后是辛酸、怀疑和忧郁的，具有一种颓废的魔鬼似的调子而被许多人看作具有波德莱尔风格。同时他是一位积极的支持废除奴隶制的记者，然而他从未找到适合他才能的职业，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铁路上当职员，最后死于肺结核。

---

[19] R·德·卡瓦略著《巴西文学简史》（里约热内卢，第7版，1944）第348页。

[20] 前引E·维里西莫书第81—82页。

他最著名的著作有《比喻与幻想》(1885)、《盾》、《灯塔》(1900)，和《最后的十四行诗》(1905)，所有这些都象他才华横溢的散文诗一样具有铿锵悦耳的特征。其他重要的象征派诗人有来自米纳斯吉拉斯的神秘主义者阿方萨斯·德·吉马良斯(1870—1921)，他刻意拟古的诗歌其主要题材是贞洁、处女的爱情；以及奥古斯托·多斯·安若斯(1884—1914)，他的作品受他对科学和哲学书籍阅读的影响，充满了对人类精神在一个机械、宿命的世界中被毁灭感到绝望的观点。他最著名的诗歌以诸如《痛苦的赞歌》或《血的迷念》为标题，表达了一种对生存的自然主义式的恐怖、无限的悲观。

音 乐

文学无疑是拉美19世纪主要的文化表现形式，它制约着所有其他艺术的形式和表现。这种情况只不过加强了19世纪所特有的学院风格，对于抛弃了伊比利亚非理性的巴罗克艺术形式传统，着手建立新的政治、文化体系，以便使拉美结合到自己认定是其组成部分的大欧洲秩序中去的这个新兴国家的大陆来说，情况势必更是如此。文学的影响没有比在音乐中更为明显的了，音乐到1870年时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大多数的主要首都城市出现了大量剧院和音乐学院。

梅莱西奥·莫拉莱斯(1838—1908)在墨西哥1866年成立了国家音乐学院后，领导了音乐的发展。他创作了8部歌剧，其中的《伊尔德贡达》1868年首演于意大利，这是一种最高的奖赏，他还为墨西哥城—普埃布拉铁路1869年的通车创作了著名的标题音乐作品《火车头》。塞诺维奥·帕尼亚瓜(1822—1882)1858年在国家剧院上演了他首创性的歌剧《卡塔利娜·德吉萨》(作于1845年)，有些评论家尖刻地指出该剧的唯一墨西哥特征就是它的作者；1871年，阿尼塞托·奥尔特加(1823—1875)创作了表

现阿兹特克末期的一幕歌剧《瓜蒂莫特辛》，由夸特莫克担任男高音，科尔特斯担任男低音，著名的墨西哥女高音安赫拉·佩拉尔塔（1845—1883）扮演主角。古巴的劳雷亚诺·富恩特斯·马顿斯（1825—1898）创作了同样具有印第安风格的《赫福德的女儿》(1875)，作为哈巴涅拉舞曲热心传播者之一的加斯帕尔·比利亚特（1851—1891)在1871年至1888年之间有3部歌剧在欧洲上演。委内瑞拉的第一部歌剧是何塞·安赫尔·蒙特罗（1839—1881）创作的《比希尼娅》(1873)；哥伦比亚的第一部歌剧是何塞·马里亚·庞塞·德·莱昂（1846—1882）的《埃斯特尔》（1874年)。浪漫的名称说明了一切。第一部"秘鲁"歌剧《阿塔瓦尔帕》是由意大利人卡洛·恩里克·帕斯塔（1855—1898）where作曲的，1877年上演于利马。弗朗西斯科·A·哈格里夫斯作曲，1875年首演于意大利的《双面猫》一般被认为是阿根廷的第一部歌剧。然而，是在巴西出现了最重要的发展，以安东尼奥·卡洛斯·戈麦斯的作品达到高峰，他曾深受威尔地的影响，从1864年起居住于意大利。取材于阿伦卡尔小说的《瓜拉尼》1870年在斯卡拉歌剧院大获成功，并为庆祝皇帝的生日在里约热内卢上演。一个美洲的主题，崇高的野蛮在歌剧之乡以最为豪华抒情的方式加以表现。至今它仍然是国际上的保留剧目。1880年，戈麦斯受人劝告创作当时更为危险的主题奴隶制，但是当《奴婢》(其中包括著名的"塔莫约斯之舞")于1889年上演时，歌剧词作者却象变魔术似地把黑人变成了印第安人。戈麦斯一直受到民族主义评论家的否定，但他的作品毫无疑问包含了某些民族的，甚至是大众化的成份。

470

欧洲歌剧的风格和惯例是极为难以改变的。拉美作曲家除了加入这个潮流，仅仅在民族表现方面做些姿态，别无他法。尽管在1850年至1880年期间，拉美作曲家为了掌握形式和创作拉美的歌剧曾进行不懈的努力，但是物质和文化的局限往往促使人们把精力花在别处。浪漫主义时期是钢琴演奏家，独唱歌曲和交响诗

的全盛时期，每个形式都十分理想地适合于拉美的条件，诸如委内瑞拉钢琴家、作曲家和歌唱家特雷莎·卡雷尼奥(1853—1917)，古巴小提琴演奏家何塞·怀特（1836—1918）和墨西哥女高音安赫拉·佩拉尔塔这些音乐家都赢得了国际声誉。因此，作为浪漫主义影响第二阶段的音乐民族主义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谨慎小心地开始起步，19世纪末加速发展，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在其实质上充满感情的表现力方面，它同时吸收了地方性，或是本土性以及民族性，大大发展了当时所具有的节奏，曲调和和声表达方式（尽管起初拉美很少有人认为可能进行更为激进的发展）并为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先锋派开辟了道路。

471

戈特沙尔克1869年在拉美的成功巡回演出使民族主题和风格进一步为人们接受，只要它们形象化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还不是过于浓厚。作曲家越来越多地仿效欧洲的格林卡或鲍罗廷、阿尔贝尼斯或格拉那多斯、斯美塔那或德沃夏克，吸收广为流行的民族歌曲和舞曲，附带地创作出“热带华尔兹”或“巴拉圭波尔卡舞曲”这种美洲化的欧洲形式。直到20世纪20年代拉美作曲家才确实掌握了发自内心地创作民族风格的艺术，恰恰是这个时候国际先锋派否定甚至是最成熟的音乐民族主义。在巴西，布拉济利奥·伊蒂贝雷·达·库尼亚（1846—1913）创作的《内地人》(1869)是一部早期的本地主义作品，但是亚历山大·莱维(1864—1892)创作的著名钢琴曲《巴西探戈》(1890)才首先使本土主义潮流获得积极的承认。他的《巴西利亚组曲》(1890)后来成为巴西受人欢迎的保留作品的一部分，特别是它的最后一个乐章“桑巴”不是受到个人经历的启发，而是受到里贝罗早两年创作的小说《肉欲》的启发。哈格里夫斯（1849—1900）是阿根廷第一位经常吸收民间音乐的作曲家，他从钢琴波尔卡《大草原》开始，继而在《民族曲调》(1880)中也使得典型的农村形式(谢利托舞曲、加托舞曲、埃斯蒂洛舞曲、德西马舞曲）别具一格。哥伦比亚的何塞·马里亚·庞塞·德·莱昂曾在巴黎师从古诺，他创作了最

早的本土主义作品，如《美丽的大草原》和《哥伦比亚旋律交响乐》（1881），对班布科、帕西略和托贝利诺这些民间舞曲作了浪漫的改编。

古巴也许在拉美具有最丰富的音乐遗产，尼古拉斯·鲁伊斯·埃斯帕德罗（1832—1890）创作了一部钢琴曲《瓜希罗之歌》，副标题是“典型的古巴景色”，作品却完全表明，浪漫的浮夸几乎窒息了自然的节奏感。20世纪20年代古巴非洲风格更令人信服的先驱有“对舞舞曲之父”曼努埃尔·绍梅利（1817—1870），和号称“古巴之格林卡”的伊格纳西奥·塞万提斯（1847—1905），他曾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他的优美的《古巴舞曲》（1871—1895）是古巴对19世纪艺术音乐最重要的贡献。墨西哥在发展民族风格中的重要作品有托马斯·莱昂（1826—1893）创作的《民族哈拉维舞曲》（1860）和胡利奥·伊图阿尔特（1845—1905）创作的《墨西哥回声》（1880）。最重要的钢琴作曲家是奥托米印第安人胡文蒂诺·罗萨斯（1868—1894），他是安赫拉·佩拉尔塔巡回演出团的成员，他创作的法国风格华尔兹组曲《波浪曲》十分受欢迎，常常被当作是施特劳斯的作品。钢琴演奏家里卡多·卡斯特罗（1864—1907）的《鲁德儿传奇》（1906）在欧洲上演并受赞扬，使他夙愿得偿。卡斯特罗成功的代价是，作品基本上是模仿性的，尽管他也改编地方舞曲，如哈拉维和墨西哥乡村舞曲。

巴西的音乐民族主义之父是阿尔贝托·内波穆塞诺（1864—1920），格里格教导他如何创作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性的音乐。1887年他创作了《黑人舞曲》，1897年创作了《巴西组曲》，这是第一部根据巴西乡土主题谱写的管弦乐组曲，使用了大量各种不同的形式和节奏，至今仍然十分流行。阿根廷的中心人物是作品甚丰的阿尔韦托·威廉斯（1862—1952），他1882年在巴黎音乐学院师从塞萨尔·弗兰克，最终创作了一百多部重大作品，包括9部交响乐。1889年，他游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在故乡的音乐中充实自己”，此后他的创作“不仅仅包括改编的作品，还有充

472

满本土气氛，色彩和精髓的艺术音乐”。[21]最初的成果是哀歌式的《荒弃的牧场》（1890）；但是当他1893年创作了《大草原之曲》时，他已发展到创作自己的米隆加、加托、谢利托和桑巴等舞曲。与创作了《阿根廷交响乐》（1890），歌剧《大草原》（1897）和《尤潘基》（1899）的同时代的阿图罗·贝鲁蒂（1862—1938）一样，尽管威廉斯的作品对现代听众说来既是执著的学院风格又极为伤感，但他对地区性和民族性音乐的结合的确作出了杰出贡献，特别是在1890年到1910年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代。然而，现代评论家更赞赏不那么具有雄心的克里奥尔派的胡利安·阿吉雷（1869—1924），他是阿尔贝尼斯的朋友，他的钢琴改编曲《韦亚》和《加托》仍然是国际保留乐曲目。另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是1910年至1935年任哥伦比亚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的吉列尔莫·乌里韦·奥尔金（1880—1971），他根据民间舞曲为钢琴创作的三百余首《流行伤感小曲》是不朽的遗产。

这一时期墨西哥最突出的人物是曼努埃尔·庞塞（1882—1948），他因创作了轰动一时极为动听的中产阶段情调的《星光灿烂》（1914）而享誉世界。在巴黎和柏林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仔细研究并重新精心改编了墨西哥的科利多、桑、哈拉维和瓦潘戈等舞曲。与查韦斯晚期作品相比，人们对庞塞这类作品往往并不那么赞赏，评论家认为他属于“民歌风格”仅仅引用印第安或梅斯蒂索素材，而没有把它们当作结构要素。然而，他仍然是墨西哥作曲家中唯一作品得到在世界各地演奏的人，最近人们了解到他曾为塞戈维亚匿名创作了许多吉他曲。正如内波穆塞诺，乌里韦·奥尔金和威廉斯一样，庞塞为本土主义从浪漫主义向先锋派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桥梁。

473

绘　画

19世纪的绘画甚至比音乐更严重地受到学院派和社会因袭的

[21] 见G·贝阿格著《拉丁美洲音乐入门》（新泽西，1979）108—110页。该书非常重要，在撰写本章时曾大量参考。

控制。直到本世纪拉美还不知何为外光绘画，印象画派在其完结后才传入拉美，比文学上的印象派一现代主义晚了20多年，比欧洲的印象派晚了几乎半个世纪。尽管这种延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法吸收印象派却是特别不幸的，因为19世纪的最后30年欧洲绘画走在艺术观念变化的前列。考虑到造型艺术的特性，它不象音乐那样有现成大量的流行风格可以援引；如果说，在19世纪绘画的第一阶段中对本土主题的描绘是从为寻求如画的景色的欧洲旅行家那儿学来的，那么，在1870年后的第二阶段，访问欧洲的拉美画家在返回故乡时都只带回了学院派绘画的最新形式，而对那些实际上早已将学院派新古典主义令人窒息的影响抛在身后的莫奈、雷诺阿、马奈、毕沙罗或塞尚等新的观念却视而不见。20世纪初，当印象画派真的传入时，其影响是有限的，恰恰是它的姗姗来迟使它变成新的学院派，尽管公众对它仍普遍持有敌意。正如音乐的情况一样，直到20世纪20年代拉美画家才终于，以及更加突然地加入国际先锋派行列。

巴西君主制和帝国的延续鼓励了一种固执的宏大风格，一种以法国战争绘画流派为基础，介于古典和浪漫主义之间的风格，而风景画则如费尔南多·德·阿泽韦多所指出的，一般“只不过是一个山峦的背景，森林的一个角落或一条河的弯道，是一小段神圣的、古典的或民族历史的附属品”。㉒这一时期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最受欢迎的画家是维托尔·梅雷莱斯（1832—1903）和他的朋友佩德罗·阿梅里科（1843—1905）。两位画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在巴黎度过具有意义的时期。梅雷莱斯创作的《第一巴西弥撒曲》（1861）是巴黎沙龙展出的第一幅巴西绘画，而他两幅最著名的绘画作品是《瓜拉拉皮斯战役》（1869）和《里亚舒埃卢海战》（1872）。他的两个门徒都出生于葡萄牙，创作的作品具有典型的晚期浪漫主义风格，一位是奥古斯托·罗德里格

474

㉒ F·德·阿泽韦多著《巴西的文化》（纽约，1950）第294页。

斯·杜阿尔特（1848—1888），他根据夏多勃里昂的小说创作了《阿达拉的葬礼》，另一位是若泽·马里亚·德·马德罗斯(1849—1926)，他创作的《伊拉塞玛》是受到阿伦卡尔小说的启发。佩德罗·阿梅里科创作的意大利风格的裸体画《里约热内卢女子》（1864）是他最早获得成功的油画之一，但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阿瓦伊战役》（1877），该画曾在佛罗伦萨在巴西皇帝御前展出过，以及巨幅绘画《不独立勿宁死》（1886）。罗多尔福·阿莫埃多（1857—1941）也曾在巴黎学习，并在那儿创作了他最优秀的作品，他的创作从圣经绘画和浪漫风格，如裸体画《马拉巴》（1883）以及著名的《最后的塔莫约人》（1883），发展到自然主义时期马奈风格的《还有消息》（1888）。相比之下，小若泽·费拉兹·德·阿尔梅达（1850—1899）在形式和主题方面是巴西第一位真正的民族主义画家，许多人认为他是19世纪巴西最伟大的画家。在印象主义争论处于高潮时，他访问了巴黎，但是他对圣保罗农村的描绘，如《巴西的破坏者》，《正在休息的混血儿》、《被出卖的乡下人》和《嚼烟》，却既非记录性的也不仅仅是绚丽的景象，而是显示了“一种明确的巴西精神，无意中流露出野蛮和丰富多采的特性，这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是必然的结果，但外国艺术家是无法表现的”。[23]在这些画家之后出现了衰落。在随后的过渡时期，最典型的是一股颓废的浪漫主义潮流，它往往伪装成羞羞答答的印象主义或新艺术风格。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安东尼奥·帕雷拉斯（1864—1937）的作品中，他的绘画中有历史题材，如《征服亚马孙》，或“巴黎风格”的裸体画，虽然意在挑逗情欲，效果却并不激动人心，如《恶之花》（1922）。埃利泽乌·维斯孔蒂（1864年出生）虽然在艺术概念方面是肤浅的，但从纯绘画角度看他也许是最有成就的，他实验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形式，从学院派（《母爱》）到几乎是前拉斐尔风格的《女山神的舞

---

[23] 同上，第296页。

路》（1900），然后直到现代派。

象在巴西一样，拉普拉塔流域国家在绘画的主观方法和客观方法（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之间也出现了巨大的鸿沟，此后所有艺术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乌拉圭画家胡安·曼努埃尔·布拉内斯（1830—1901）将两种方法有效地结合了起来，尽管基本上是从风俗派的角度出发的，他成功地将欧洲大师们在形式上取得的经验运用到美洲的题材上。他描绘高乔人和乡村的绘画，如《女俘虏》或《套索》，历史画如《33位乌拉圭人的誓言》，战争画如《萨兰迪战役》，著名的人道主义作品《最后的乌拉圭人》，表现社会的作品《两条道路》和《黄热病》等等，使他成为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画家。他是一位光的交响乐师，与普里利迪亚诺·普埃雷东，[24] 小阿尔梅达或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见下文）齐名，是19世纪拉美毫无疑问的伟大艺术家之一。然而，对绘画的购买资助和鉴赏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他们的学院派主要倾向可以专横跋扈。1887年，以前曾主要倾全力于描绘传统的题材如《草原上的暴风雨》和《故居》的爱德华多·西沃里（1847—1918）创作了《仆人的觉醒》，这幅画尽管在巴黎的展出获得成功，但是，却因被认为过于“色情”而未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出，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是按库尔贝的方式创作的一幅毫不妥协的自然主义裸体画，然而，无疑也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毫不含糊的社会批判命题所致。对于城市问题迅速取代高乔主题的阿根廷，更具有挑战性的绘画作品有雷纳尔多·朱迪奇（1853—1921）的《穷人的面色》（1883），社会主义画家埃内斯托·德·拉·卡科瓦（1866—1927）的《没有面包，没有工作》（1894），和皮奥·科利瓦迪诺（1869—1945）的《宁静的时刻》（1903），所有这些绘画都以刚出现的社会现实主义处理城市劳工主题。甚至这些画家的自然主义作品，不伦其意图是资产阶级

475

[24] 见前引马丁文。

的或是社会主义的，都比那些采用印象派风格的作品更为容易被公众所接受。自然主义派至少是描述性的画家，对于这一点具有文学倾向的评论家总是可以理解的。马丁·A·马利亚罗（1865—1911）在访问过欧洲后抛弃了浪漫主义，并创作了诸如《大自然》和《谷堆》这种充满色彩和其振动性的作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他的全部目的是使人们开始见识见识，他在1902年的首次画展却受到残酷的嘲笑，他去世时实际上被抛弃了。而费尔南多·法德尔（1882—1935），一位实际上与他的德国导师冯·齐济尔一样的自然主义画家，仅仅用减弱了的印象派虚饰使自己的绘画显出活力，就在1905年立即得到评论界的接受，并通过连锁集团发挥了长久的影响，以至于1914年以前他的“印象派”金字招牌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评论家把法德尔对科尔多瓦农村风景所作的本质上是充满对美洲本土热爱的描绘，如《无花果树上的晨曦》，《牧场上》和《秋天的午后》解释为印象派，而实际上这些作品只是对阿根廷的孤独寂静所作的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表现。

19世纪末墨西哥最伟大的画家是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40—1912），他的风格经历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派的边缘，后者他在1889年才首次接触到。他最著名的绘画是以《墨西哥谷地》为主题的八幅组画（1894—1905），其中包括宏大的《从瓜达卢佩山丘所见到的墨西哥谷地》（1894）和著名的铁路画《锡特拉尔特佩特》（1897）。贝拉斯科综合了感情、美学激情和视觉的高超技巧，象小阿尔梅达和布拉内斯一样，在当时高谈世界性的伪装下充满了奴性十足的学院派模仿风气的那个世纪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个性。他们的历史成就就象内波穆塞诺，威廉斯和庞塞在音乐中所达到的那样，是在一片荒漠上不得不白手起家的开拓者。

20 世 纪 初

拉美跨入20世纪后是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大混乱的时期。

思想家和艺术家无法跟上迅速的经济、社会变化。在西语美洲，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1917)发表了划时代的散文《爱丽儿》(1900)来迎接20世纪，此时正是现代主义发展的高峰，西班牙在古巴失败后的两年，也正是美国开始其锐不可挡的崛起的时刻，它首先在西半球然后在全球赢得霸权。尽管罗多强调社会性(他在其经典的散文中指出，天生是精英分子的达里奥"不是美洲之诗人")，罗多在散文方面的风格实际上正是达里奥在诗歌方面的风格一样：优雅，肤浅的自信，和从根本上讲是唯美主义的。他对北美怪物的文化野蛮性所作的抨击，典型地表明了拉美当时的思潮，执拗的唯意志论和唯心论。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墨西哥和俄国革命，以及1918年科尔多瓦学生暴动之后，这种精神上的反帝思想既被对社会和经济斗争更为敏锐的认识所取代，艺术也带上了阶级的特征。尽管《爱丽儿》通常被认为是掀起20世纪辩论的起点，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面临现代主义的挑战，为了振兴解放时代的新古典主义事业所作的绝望的最后挣扎，而它现已淹没在一片支离杂乱、相互矛盾的哲学和风格中。然而，罗多宁静的散文，以其特有的希腊神殿般的清晰线条，为后来的辩论打下了基础，并为被实证主义哲学所贬低的艺术重新确立了尊严。㉕ 477

建 筑

如果说建筑表明了19世纪文化较为抽象和从根本上说是学院派的方向，它同样也戏剧性地体现了20世纪初混乱的局面。尽管殖民时期的风格基本上已中断了，但是由于缺乏有经验的建筑师，工匠和材料来源，虽然政治家们有着宏大的梦想，1870年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建筑一般都是平庸的。甚至在条件最优越的巴

㉕ 见前引黑尔文。

西，由于缺乏连贯的规划，“最好的建筑仍然是最老的建筑”，[23]城市的外观现在十分不匀称。布宜诺斯艾利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方针比大多数城市都发展得更有连贯性，在大战前的20年它经历了一次建筑繁荣，形成了它现在的形象，成为拉美19世纪最伟大的城市。大多数其他城市在布局上仍然是殖民时期的风格，尽管在可能的地方都强加上了奥斯曼式布局（墨西哥的改革大道，圣地亚哥的林荫大道，里约热内卢的里奥布朗库大道和海滨大道）。19世纪末，国家寡头统治者建立了庄严的大厦和纪念碑，以便造成实证主义哲学所要求的那种平衡感，分寸和稳定感，象征着普遍化的繁荣和官方文化。

此时出现了“高雅风流年代”的曙光，一个建筑宏伟的政府办公大厦、立法机关大厦、豪华的剧院、庞大的私人住宅的时代，这恰恰是面对着一种混乱的浪漫主义复兴，连带着新殖民时期和新本地风格成份、新艺术和其他“现代主义”早期先兆的挑战，新古典主义终于动摇了的时刻。所有的规划都消失了，建筑师开始不加区别地模仿外国新的风格和历史建筑。唯一主要的例外是哈瓦那，它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在基本上是殖民地时期的格局上加上了比较连贯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实际上排斥了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外来影响。在其他地方，大量风格各异移殖来的形式在城市中心发展起来，破坏了现存的殖民地时期建筑的效果，但却精确地反映了拉美文化当时普遍的兼收并蓄状况。较为杰出的建筑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哥伦布大剧院，由维克托·梅亚诺规划，由胡利奥·多马尔（1846—1924）于1908年建造；圣马丁大厦，由亚历抗德罗·克里斯托弗松（1846—1946）建造；而墨西哥城名噪一时的多种风格混杂的美术馆（1903—1934）是由阿达莫·博阿里开始兴建的。巴西评论家蒙特罗·洛巴托把这种浮华的低级趣味的得势称之为“建筑狂欢节”。

现代建筑通过机能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拉美，但它充其

[23] 前引阿泽韦多书第309页。

量只是清扫了以往的建筑风格。但它又是一个新的人为强加的风格，一种从北方发达国家输入热带和主要是农业国家的产物。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优势正是通过建筑材料的工业化——钢铁和水泥，使拉美人感受到的，它采取的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方式，简便，灵活和迅速。在欧洲和北美，机能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中产阶级郊外住宅区的发展，而在拉美则不同，它所需要解决的是突然出现的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而中产阶级本身则常常回到殖民时期风格去，虽然已经“机能化”了，许多建筑师仍认为这种风格更能适应拉美的气候和社会。㉗

墨西哥的机能主义运动兴起于何塞·比利亚格兰·加西亚（1901年出生），象同时代的许多壁画家一样，他毕业于圣卡洛斯学院。他采纳了勒科比西耶理论中最不入道的部分（“一所房子是居住的机器”），鼓吹技术先进，具有社会性的建筑。作为公共卫生部的建筑师，他建造了维普尔科卫生研究所和疗养院（1925），以及塔席瓦的卫生疗养院（1926），后来于1932年担任新成立的国立建筑学校的校长。他的门徒胡安·奥戈尔曼（1905年出生）也是一位画家兼雕塑家，他是那些即将进行体制化革命的理论家们所追求的那种能把视觉和空间艺术相结合的一位理想的合格人选。奥戈尔曼认为，这种结合兼有前哥伦布和巴罗克技术的特点。然而，奥戈尔曼强烈的机能主义观点认为（他很晚才放弃这种观点，最终加入了体现结合主义观点的大学城的建设），美学是毫不相干的；建筑应该严格地是功利的，仅仅是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应该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收效。他建筑了最早的机能主义风格的学校和私人住宅，包括迭戈·里韦拉的一座住宅，1932年后组建了建筑学校。

479

实际上，墨西哥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宏大的公共工程能够得

㉗ 见R·巴尔加斯·萨尔兹多与R·洛佩斯·兰赫尔著《拉美建筑的现实危机》，载R·赛格雷主编《从建筑看拉美》（墨西哥—巴黎，1975）第186—203页。

到尽快的完成，但是却受到了群众性盲目抬高印第安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而造成的难以摆脱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的建筑师、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无论多么头脑清醒和意图良好，在1930年以前已完全被这种情况所支配。阿根廷的情况完全不同。法国的美术传统当时最为强烈，时髦讲究的邸宅作为城市宅第是富裕的阿根廷人的理想。保守的官僚政治并没有鼓励现代建筑：在现代主义运动第一阶段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莱昂·杜尔赫、普列维什和比拉尔这些开拓者并没有象墨西哥和巴西的那些同时代人那样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庇隆时代以前他们一直是接受私人委托。

正如墨西哥一样，在巴西机能主义铲除了传统的废墟，并为新观念开辟了道路。在1922年现代艺术周之后，格雷戈里·瓦哈夫希克(1896—1972)发表了他的《机能建筑宣言》(1925)，很明显他受到勒科比西耶的影响(勒科比西耶1929年访问了巴西，并于1936年再度访问，后一次访问具有极大的决定性意义：他的范例最终导致巴西利亚的建设)。然而，在巴西现代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宏大的调子，也许是因为不用象墨西哥那样掩盖私人资本将作为国家的伙伴的作用。巴西的新建筑表现为明显的多阶级运动，把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与勒科比西耶雅致的欧洲美学和奇异想象相结合。其结果经常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任何梦想几乎都可以实现的巴西，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头10年中一跃进入现代建筑的前列。作为国立美术学校校长的卢西奥·科斯塔(1902年出生)与瓦哈夫希克密切合作，影响了伟大的奥斯卡·尼迈尔（1902年出生）的一代人。

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这些国家在19世纪曾因过于混乱或贫困而无法开展重大的公共工程，现在却毫无困难地从殖民风格迅猛地发展到现代建筑，因为格罗皮乌斯、勒科比西耶和米斯·范德罗厄的新运动代表了与过去彻底决裂。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跨国石油公司开始开采新的油田，卡洛斯·劳尔·比利亚努埃瓦(1901

480

年出生）从巴黎返回委内瑞拉在公共工程部任职。在20多年里，通过在建筑和设计中结合传统的和现代的方法，他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并最终建造了新的中央大学，使他本人和委内瑞拉建筑著称于世。

绘　画

20世纪20年代是拉美建筑、绘画和音乐终于开始进入与国际发展相同的中心的10年，并且各个门类都有几个主要的代表人物获得国际声誉。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本世纪初造型艺术的情况特别令人失望。拉美式的印象派表现得缩手缩脚和踌躇不决，结果是一场不科学的，仅仅是与拉美社会和经济基础相脱节的出于直觉的运动。然而，尽管印象派在欧洲早已过时，它却决定了所有观察现实和理解艺术的新方法，使艺术家可以进行试验并为先锋派1910年后的急剧发展和它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高度成就铺平了道路，在这一时期拉美本身在自我发现的航程中取得了第一次重大收获。

在墨西哥，著名的“阿特尔博士”(赫拉尔多·穆里略，1875—1964）是将伟大的版画家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1851—1913）——善长处理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一位关键人物——与穆里略曾在圣卡洛斯学院教授过的一代世界著名的壁画家之间连接起来的人物。阿特尔博士实际是属于前一个时代——他最喜爱的题材是墨西哥的地貌，典型地表现在他的《谷地的早晨》中——但是他对技巧以及色彩运用的戏剧性手法却有着持久的影响。阿特尔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他最初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又成为社会主义者，在1910年创建了艺术中心后，他鼓励年青画家如奥罗斯科和西凯罗斯在艺术中心的墙面上绘制壁画。尽管其发展被墨西哥革命打断（这场革命最重要的形象记录者是弗朗西斯科·戈伊蒂亚，创作的绘画包括《被处绞刑的人》(1916)，教育部长巴斯孔塞洛斯在1921年后使该运动获

得新的力量，他展开了广泛的文化革新活动，其明确目的是使美术和大众工艺和谐发展。这一活动以1921年的展览为起端，阿特尔为之撰写了画展指南。

481

这一运动最著名的画家是迭戈·里韦拉（1886—1957)。他在逗留欧洲的关键年月里（1907—1921)，连续吸收了许多影响（在巴黎如毕加索、格里斯、莫底格里安尼；在马德里如苏洛阿加和索罗利亚），最后由墨西哥革命本身铸成定形的综合风格。在他的80幅立方派绘画，如《觉醒者》(1914)和《皮盖伊的风景》(1918)，为他建立了坚实的声望后，1920年他对锡耶纳的访问促进了他形成一种引起争议的综合风格，这种风格融会了文艺复兴时期壁画法技巧(一直受到他早期导师阿特尔的赞美)、前哥伦布的一体化艺术、墨西哥当代大众文化的风格和形象（主要通过波萨达的作品）和苏联式的社会现实主义。他认为先锋派的态度与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不协调的，他放弃了画架而成为一个壁画家。在深入研究了自己的国家后，他将自己的心得绘制在教育部的墙上（1923—28)，以及查平戈农业学校（1923—27，特别见《解放的土地》)和国家宫（1930—1935）的墙壁上。里韦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范例，可以与巴勃罗·聂鲁达发展到后来写作《诗歌总汇》相比拟：记录性(《送谷物去磨房的人》，1926)；解说性，其间充满了老一套的形象和宣传；民俗性(《女孩肖象》1928）和夸张，但却无可否认地宏大。里韦拉和西凯罗斯的有时受到鄙夷的壁画观预兆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及本世纪其他许多政治绘画的产生，更不用说北美的行为绘画（产生于里韦拉30年代访问美国所引起的政治和美学骚动之后）和一般的大众艺术了。任何有关第三世界艺术可能发生的辩论都无法忽视他们的壁画。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曾在圣卡洛斯学院从师于阿特尔和奥罗斯科，随后5年他成为一名年青的革命战士，这明确地塑造了他的世界观。象里韦拉和弗里达·卡洛一样，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1921年，他在巴塞罗那发表了著名的《致

美洲造型艺术家宣言》，呼唤“一种公众艺术，一种纪念碑式和英雄艺术，一种有人性的艺术……在灵感上是前哥伦布式的，在方向上是工人式的”。1922年，他参与创建了艺术家和技工联合会，在一篇同样著名的宣言中，他们宣布联合会的目的是要“肃清现代艺术的颓废……使艺术表现社会化，并摧毁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联合会的主要报刊是现今传奇性的杂志《砍刀》。西凯罗斯从未停止卷入论战（例如，曾预谋暗杀托洛茨基），尽管他终于又重操画架绘画并受到墨西哥公众的广泛欢迎，开始的绘画有《农民母亲》(1929)、《死去的女孩》(1931) 和《萨帕塔》(1931)。

大多数评论家现在认为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1883—1949）是墨西哥三大壁画家中最伟大的，也许是因为他最少受到政治考虑的限制。他1922年至1923年在堪称综合杰作的国立预科学校创作的壁画丝毫没有表现出里韦拉所热衷的浮夸和装饰，而象《战壕》(1922—1923)、《士兵们》(1922—1927) 和《萨帕塔战士们》(1931) 这些用色强烈的画幅，或者彻底的表现主义的《普罗米修斯》(1930) 和《基督摧毁十字架》(1934) 都是以在广泛的政治概念形成中能完美地融合观念和可塑性而著称，而这种政治概念形成与其说是狭隘的墨西哥式的不如说是美洲主义的。在他最早创作的那些充满对迪亚斯时期墨西哥的厌恶的作品中，奥罗斯科表现出在一个实利主义横行的世界中对艺术形式和精神内容的同一性的渴望，不论为实现这种同一性要付出多么痛苦的代价。 482

鲁菲诺·塔马约（生于1899）是摆脱壁画家们重大影响的第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作为深深扎根于壁画运动基础的本土主义的艺术家，他也曾经历了一个早期的政治阶段，但是后来坚持认为艺术主要是造型的和诗意，并且可以“撇开政治或意识形态宣言”。他20世纪20年代受到毕加索和布拉克的影响，在效仿这些画家时，他总是可以溶进某种个人的神话意识，他创作的《照片肖象》(1928) 或《漂亮的女孩》(1932) 就是例证。尽管他反对记录性写实主义和狭隘的解说性艺术，他也曾寻求可表达他的，特

别是墨西哥经验的形式而又同时参与世界潮流。甚至在此以前，危地马拉的卡洛斯·梅里达（1891年出生）成为也许是第一位拉美本土派艺术中超越纯粹民间传说的艺术家。他早期访问巴黎时（1910—1914）曾受到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影响，梅里达回国寻求某种结合民间传说、考古和现代造型观念的美洲主义综合艺术。《危地马拉印象》(1914—1927）显示了他从程式化的人物造型向半抽象的演变，而同时一贯忠于他的玛雅灵感呈波浪式发展的精神。尽管在墨西哥从1919年起，在壁画运动甚至还没有展开时，他就放弃了一切浪漫的，追求绚丽画面的或借重轶事趣闻的手法，并开始以布拉克和毕加索在处理他们的新原始艺术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自由来对待本土题材。(在本土派作家中，他的危地马拉同胞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受到他1930年创作的《危地马拉传说》中的从根本上说更富有想象的方法的影响，而其他人则遵循里韦拉记录性的方法)。1927年，梅里达重返巴黎进行超现实主义和音乐模拟创作，从半几何式的本土派程式化作品，如《侧面象》(1928)，到创作《假面舞会》(1932）时，发展到几乎是完全的抽象。他的成就可以与塔马约或托雷斯·加西亚(见下文）在绘画上，查维斯或维拉——洛博斯在音乐上，巴列霍或聂鲁达在诗歌上的成就相比拟。

483

在加勒比地区，古巴艺术由阿梅莉亚·佩莱斯(1897—1968）使它摆脱外省风气，并在20世纪20年代使它卷入巴黎式的完全相反的艺术潮流中去，而同时又保持其鲜明的克里奥尔特性，例如《女人像》(1928)或她创作的大量的由蓝色的热带水果组成的《静物》。古巴在国外最著名的画家是维尔弗雷多·拉姆(1902年出生)，他著名的《热带丛林》是晚些时候创作的（1943)，但却典型地表现出他对热带繁茂的盲目崇拜，这种影响来自马蒂斯，拉姆通过其挚友毕加索而受到马蒂斯的影响。海地艺术只是在1930年以后才进入现代阶段，但却受到早些时候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展开的加勒比黑人运动的影响。在更南边的地方，描绘热带美洲的伟大画

家之一是怪诞不经的委内瑞拉遁世者阿曼多·雷韦龙（1889—1954），他实际上在去世以前一直没有受到注意。雷韦龙后来精神错乱，带着妻子，女管家和填着锯末用作模特儿的布娃娃隐居在马库托。他最早的优秀作品有《山洞里的女子们》（1919），《椰子树》（1920），《卖葡萄的矮人》（1920）和《三脚桌边的胡安尼塔》（1921）。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裸体画和令人难以忘怀的生气勃勃的海岸风景画。游历了欧洲后，他于1921年返回委内瑞拉，随后他对光线着了迷，先后经过了蓝色，深棕色和白色时期，直到他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极度地受其困扰。他最具特色的创作方法的代表作有《卡拉巴耶达的节日》（1924），《树》（1926）和《金色的马库托》（1931）。尽管他描绘的都是当地题材，但他决不是一位外省习气的或风俗派画家。

在安第斯地区，本土主义风靡一时，尽管实际上它只是对墨西哥的无力仿效。总的说来，秘鲁艺术严重地分裂为以帕尔马和里瓦·阿圭罗为代表表现在文学中的反动的西班牙化的潮流，和由冈萨雷斯·普拉达、巴尔卡塞尔、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见下文）所主张的新本土主义两派。马里亚特吉创办的杂志《阿毛塔》即便不是艺术上的先锋，也是政治上的先锋，他指出未来派，达达派，立方派以及其他流派“只不过是颓废的资产阶级的花样”，完全不适合秘鲁及其现实需要。不幸的是，在潘乔·菲耶罗（1803—1879）之后，秘鲁的绘画一直是顽固的学院派及其派生的风格，没有可以借以发展的纯粹的成熟的绘画传统。新的运动是由来自卡哈班巴的何塞·萨沃加尔（1888—1956）领导的，他最初是一位介于学院派和美景画风格之间的平凡的风景画家。他1919年访问欧洲时认识了苏洛阿加——一位将本地色彩与精湛技巧溶为一体的西班牙大师；然后1922年在墨西哥，壁画家们对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使他大受震动，返回秘鲁后他成为一个强烈的土著主义者和教条主义的美学民族主义者。尽管他自己的绘画是墨西哥社会现实主义对西班牙风俗派相当拙劣的嫁接

581

（因而与他的同胞西罗·阿莱格里亚1930年创作的小说相似），萨沃加尔在随后30年领导了土著主义运动，而且他对秘鲁人对本土工艺美术的理解产生了毫无疑问持久的影响。他的理论可以按他的话总结为“艺术是对人和自然的解释”。不幸的是，这个解说者常常置身于他试图表达的世界之外。直到费尔南多·德·希什洛（1925年出生），秘鲁艺术才找到不仅仅是靠比喻或社会经济反映方法表现前哥伦布世界的方法。同时，类似墨西哥的土著主义运动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在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发展起来。今天的呼声是要“印第安的”而不是土著风俗文化或土著主义艺术。

在南锥国家，这类曾经出现的本土运动习惯于被称为克里奥尔派，而且完全可以说甚至本土文化都倾向于欧化。乌拉圭律师佩德罗·菲加里（1861—1938），一位名符其实的美洲艺术家而且是无可辩驳的最优秀的艺术家，在60岁后才认真地从事绘画。他首先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21），然后去了巴黎（1925—1934），他充满决心地实验了各种各样的现代派技法去寻找他所需要的风格，这些努力最后结晶为一种个人独特的后印象派方式，类似于勃纳尔的风格。菲加里创作了历史画，如《阿森西奥的呼声》或《暗杀基罗加》，以及人们熟悉的本地派作品，如《猫》、《驯服》、《草原上的小马》、《长鼓》、《马戏》、《亲爱的，别走》、《追忆死者》和《堂塞贡多·松勃拉》等，他经主观想象和艺术的再创作所描绘的拉普拉塔河流域风景、历史事件和家庭生活，使他成为乌拉圭最受欢迎的画家。最有影响的是华金·托雷斯·加西亚（1874—1949）。他1891年携家人返回祖籍加泰罗尼亚。在家乡，他曾先后受到高迪、土鲁斯·劳特累克和毕加索的影响。他逐渐成为拉美艺术的风格特异的理论家，在受到巴黎的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这些抽象派思想家的吸引后，他试图通过立体派、野兽派和新造型派在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将具象与抽象相融合，从而经过独一无二的个人综合最终达到同时包含古典主义、人道主义

485

和世界主义。他创作的立体派的《纽约画集》(1920)、野兽派的《玛丽娜·德·维勒弗朗什》(1924)以及典型的个人风格的《构成主义》(1929)使我们了解到他向几何美学发展中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他最为出名的是后一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画面上做长方形的分割，其思想基础是他特有的神秘人道主义哲学“构成派世界主义”(后来，1939年发表的《印第安美洲史前玄学》和1944年发表的《构成世界主义》对此做了总结)。在想象力和理论的复杂性方面，很少有美洲艺术家可以与他匹敌。

阿根廷艺术界在20世纪20年代仍然完全受巴黎的影响，而当时这个法国首府尽管还是伟大的文化之乡，但已不再是现代性本身的大本营。由于受到法德尔的伪印象主义的误导，在阿根廷绘画中出现于立体派之后的所谓后印象派艺术所引起的混乱，一直持续到30年代。埃米利奥·佩托鲁蒂（1892—1971）在意大利时曾经是一位早期的未来派画家，而随后追循了布拉克和毕加索的立体派道路，作品有《课桌》(1917)、《哲学家》(1918)、《潘谢罗莎》(1920)、《卡罗利塔》(1925)，以及《五重奏》(1927)。有人把他称为拉美第一位以个人的艺术想象、结构感和对色彩的高超技艺，吸收了欧洲先锋派风格的艺术家；但是当地1924年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非加里正红得发紫，他的作品却被学院派和社会现实主义都看作是“肤浅的”和“装饰性的”而不受欢迎。然而他是一位形式严谨的大师，在他对平面杰出的重新组合中决不允许任何即兴，并有效地将构成派几何抽象方法引进拉美，他以此创作的作品形式是对光的构成而不是反射，这体现在他引起争议的经典之作《即兴表演者》(1937）中。佩托鲁蒂的唯一支持者是先锋派马丁·菲耶罗运动的青年们。1924年是这个运动的播种之年，与运动同名的杂志《马丁·菲耶罗》创刊了，富有影响的协会“艺术之友”成立了，佩托鲁蒂的第一个画展举办了，此外胡尔·索拉尔(1887—1963)返回了阿根廷。索拉尔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人物，是一位迷恋于唯灵论，神话和占星术的故弄玄虚的世界旅行家，

486

生活神秘多变，曾先后是容格* 主义者、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者，并且是一位决不出售自己绘画的生活豪放不羁的艺术家。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位以其几何式但是充满活力的作品，完全抛弃文艺复兴式空间概念的阿根廷艺术家。他的绘画中——典型表现在《人体与蛇》以及《胡斯格》(1923) 中——的那种浮动特性，看起来更类似克莱。

总是充满活力的阿根廷艺术环境中的年青知识分子当时分裂为臭名昭著的弗洛里达派和伯多派。聚集在最时髦区的弗洛里达派艺术家们是世界主义的和实验性的，并和欧洲的先锋派直接交流，尽管他们的杂志《马丁·菲耶罗》采用了一个令人误解的民族主义名称。这一派别包括作家奥利韦里奥·希龙多、爱德华多·冈萨雷斯·拉努萨、埃内斯托·帕拉西奥、贝尔纳多·卡纳尔·费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以及美术家，如佩托鲁蒂、索拉尔、菲加里、戈麦斯·科尔内和拉克尔·福尔内。伯多派的风格是社会现实主义的，仅仅在其政治义务方面是国际性的，偶尔加入表现主义手法以示战斗性和活力。这一派别有作家莱昂尼达斯·巴莱塔、埃利亚斯·卡斯特尔诺沃、阿尔瓦罗·云克、阿贝尔·罗德里格斯、恩里克和劳尔·图尼翁兄弟，以及美术家，特别是雕刻家，如何塞·阿拉托、阿道弗·贝略克、吉列尔莫·法西奥·埃韦克尔和阿夫拉姆·比戈。这种分裂为相互敌对集团的状况使政治与艺术先锋派之间的分离突出化和持久化，而这种分离在阿根廷一直是十分尖锐和难以解决的。安东尼奥·贝尔尼（1905年出生）是一位设法通过先锋派技巧表达社会主义思想的画家，他利用自己20年代中在巴黎的经验发展了一种带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成份的"新现实主义"，例如《空闲的人们》(1934)、《示威》(1934) 以及《小庄园主》(1935)。贝尔

* 容格 (Carl G·Jung, 1875—1961)，又译容或荣格，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译者

尼指出，拉美有良心的美术家对题材的选择只能是受奴役的人们：先锋派的形式主义者们“象愚蠢的孩子一样”迷失于一个“想象的、抽象的和装饰的世界”，置身于历史之外，对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毫无意识。然而，当好炫耀的墨西哥画家西凯罗斯1933年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和贝尔尼之间出现了分歧。尽管贝尔尼喜好大画幅，但他却认为在象阿根廷这样一个由资产阶级支配的国家壁画是不适宜的，而当西凯罗斯所仅能找到的墙面是处于一位报纸董事长的乡村别墅时，他感到自己的话得到了证实。尽管胡安·德尔·普雷特（1897年出生）在1926年就介绍了完全的抽象艺术，阿根廷只是到了40年代才在绘画以及音乐中最终发展了具有自己鲜明独创性的运动，并且是按照普遍的世界主义的现代主义观念实行的，这时，阿根廷成为拉美先锋派无可争议的领袖。

巴西与拉美其他国家在大的方面总是相似，但在具体的重点又总是有区别的，它在20年代发现了自己的艺术特性（受到30年代建筑的迅猛发展的历史性肯定），这场复杂而又多彩的运动是包含了所有都聚集在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它是由圣保罗1922年的现代艺术周正式展开的。主要的人物有表现主义画家拉萨尔·泽加尔（1891—1957），一位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他创作的社会题材有《移民船》，《战争》以及《黑人母亲》(1930)；阿妮塔·马尔法蒂（1896—1964），她曾在巴黎学习并在纽约会见了马塞尔·杜尚，随后她于1917年举办了拉美第一个先锋派画展而使圣保罗艺术界大为震惊；以及塔尔西拉·多·阿马拉尔（1886—1973），她在巴黎的画室在20年代是先锋派的聚会中心。她的新原始主义绘画，如《果树》(1925）以及《同类相食者》(1928）启发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先是开创了“巴西木”风格，然后在1927年又掀起了“同类相食”运动，这种巴西形式的土著主义，带有典型的幽默和自信，其基础是一种美学同类相食理论。到了30年代，阿马拉尔本人转向了社会现实主义，创作了《山上的贫民窟》和《2a等级》(1933）等作品。

由泽加尔推广的德国表现主义方法，被“革命浪漫派的”弗拉维奥·德·雷曾德·卡瓦略（1899－1973）加以发展。卡瓦略也是一位杰出的雕塑家，他以擅长将半抽象的肖像、大胆生动的色彩和富有活力的构图，结合为一种希奇古怪抒情的再现主义而著称。然而，那一代人中杰出的先锋派画家是埃米利亚诺·迪·卡瓦尔坎蒂（1897－1976），他把毕加索艺术大师新古典时期的风格变得适合于描绘热带事物，正如我们在他1927年对坐着的裸体人物所做的精心描绘中所能看到的。就象土鲁斯—劳特累克一样，他把注意力放在女子身上——就他而言，是黑人——这些女子甚至在受压迫时仍是优美的，他保持清醒的社会观察点。他具有显著的多方面才能，包括卓越的富于变化的石版画和蚀刻画，他创作的表现巴西的题材极为丰富多采，包括人和自然的作品，将鲜明的色彩、自如的形式和丰富动人的感情融为一体。然而即使如此，他的成就也不如坎迪多·波尔蒂纳里（1903—1962）。波尔蒂纳里在绘画上的成就犹如维拉——洛博斯在音乐上的成就一样，他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艺术民族主义的伟大代表人物，在吸收了立体派，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布拉克、毕加索和里韦拉的榜样后，概括并发展了墨西哥壁画运动的经验。他最为人知的作品有《印第安酋长》、《足球》（1931—1932）、《农村劳动者》(1934)和《咖啡厅》(1935）等。他是拉美在墨西哥之外唯一创作了大量民族史诗绘画的画家，最终为科斯塔和尼迈尔设计的教育部大厦绘制了一套壁画，“巴西史诗”，自如地结合了抒情性、现实主义和传统主义。有些评论家认为他太“社会学化”；有人认为他是“古典艺术家中最现代的”；然而大多数人承认，他对巴西历史和景观所做的宏大记录是巴西最重要的文化划时代创举之一。

488

雕　塑

现代雕塑在拉美发展缓慢，考虑到拉美富有活力的宗教和大众传统，这也许是令人惊奇的。19世纪的大多数雕塑家都例行地

接受委托从事半身雕塑象和小型的新古典主义雕象制作。少数几个由本地自行制作的大型纪念碑之一是诺雷尼亚1889年为墨西哥城雕塑的夸特莫克青铜雕象。1910年在举办国际博览会当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揭幕的萨米恩托雕象则是由罗丹雕塑的。法国雕塑家罗丹和布尔德尔在拉美处于过渡时期时，具有绝对的影响。阿根廷的繁荣为越来越雄心勃勃的艺术家创作纪念碑式的作品提供了机会，罗赫略·伊鲁蒂亚（1879—1950）创作了令人注目的多雷戈雕象和里瓦达维亚纪念碑，阿尔弗雷多·比加蒂（1898—1964）和何塞·菲奥拉万蒂（1896—1977）随后接受委托创作了大量的纪念性作品，包括竖立在罗萨里奥的国旗纪念碑。乌拉圭的贝尔纳韦·米切莱纳（1888年出生）也是一位具有影响的纪念碑作品雕塑家。20世纪20年代，拉美雕塑终于开始取得与绘画相似的重大进展，尽管不如绘画那么突出。在阿根廷，安东尼奥·西韦利诺（1891年出生）创作的《形体构图》(1926）被普遍认为是拉美人创作的第一件抽象雕塑；其他创新者有巴勃罗·库拉特利亚·马内斯（1891—1962）和索索斯特里斯·比图略（1899—1953）。智利极为丰富的现代雕塑发展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巴西雕塑在19世纪并没有取得比传统形式更高的成就，但是作为现代艺术周有影响的参加者，意大利移民维托尔·布雷谢雷特（1894—1955）也许是自阿莱然迪尼奥以来最伟大的雕塑家。 489
然而一般说来，只有到了20世纪20年代，土著派运动，尽管基本上是具象的，显示了前哥伦布传统的历史潜力之后，这种风格才真正得到发展。一位主要的先驱是伊格纳西奥·亚松索洛(1890—1965),这位墨西哥雕塑家融合了欧洲如罗丹的风格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风格。他创作的十座纪念碑(主要是诗人和政治家的纪念碑)竖立在墨西哥城。甚至在那些很少具有前哥伦布遗风的国家，也采用了这个题材，有时采取梅里达或托雷斯·加西亚在绘画中的解决办法。雕塑随着建筑，绘画和雕塑三者相结合的新潮流（基本上起源于墨西哥），终于在各国完全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音　乐

1900年至1930年之间拉美的音乐明确地显示了艺术中心是如何迅速地转移和交替的。意大利作曲家基亚法雷利在1906年评论道，巴西只不过仍然是“意大利音乐的一个外省”，甚至在1916年圣—桑还毫不含糊地把布宜诺斯艾利斯称为“音乐学院市”；然而，他们所看到的盲从模仿或缺乏生机的学院派影响只是过去的痕迹，而不是未来的象征。尽管浪漫主义仍有影响，特别是在地方音乐和城市流行音乐中，但它已失去活力；然而那些同样流行的形式，以其原始的状态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并且非常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比才而开始赢得世界听众。古巴音乐家爱德华多·桑切斯·德富恩特斯（1874—1944）创作的《你》（1894）和庞塞创作的《星光灿烂》等哈巴涅拉歌曲风行整个拉美，而哈巴涅拉、对舞舞曲和探戈在1890年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先后传遍了欧洲。同时在艺术音乐中，当时的倾向是以德彪西和拉威尔的法国印象主义对浪漫主义做精细的发展，这也许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音乐有机进化的最后阶段。

卡洛斯·查韦斯（1899—1978）也许是最有资格同维拉—洛博斯（拉美20世纪音乐界最伟大的人物）齐名并列的人，他们同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声望的那一代人，当时许多艺术问题突然变得终于可以解决了。确实，查韦斯是一位正在把过去的事物去粗取精以形成自己风格的典型人物，他使历史精华与现实民族主义需要相结合，同时，又纳入国际发展。说他试图实行“阿兹特克复兴”是将他的目的简单化了，他不是要重现前哥伦布的音乐模式或技巧本身，而是——正如他在1928年所宣称的那样——要将它们内涵化和进而发掘“墨西哥心灵中最深邃的层次之一”。他的调式或五声音阶的旋律表明了他的土著主义热忱，但却并不是重现印第安人过去或现在的现实；更确切地说，他所运用的方法使过去终于与现在相沟通，并因此迫使过去与现在相融合。

尽管他在青年时期创作了革命歌曲，如《阿德利塔》和《蟑螂》的钢琴改编曲，查韦斯对流行歌曲向来是谨慎的，他主要侧重于古典的印第安形式，他三分之二的作品并未包含任何内在的墨西哥内容。他对民间或流行材料的使用经过大量的筛选和综合，远比科普兰、伏昂·威廉斯、法里雅都仔细得多，甚至比维拉一洛博斯更加仔细。最典型的作品结合了现代主义和原始主义的成份，其方式与斯特拉文斯基早期相似，如充满青春活力的芭蕾舞曲《新火》(1921)。后来查韦斯在作品中加入了土著乐器，乐曲有意避免任何浪漫的和弦并舍弃和声，而使用诸如反复、对位、频繁变换速度和节奏，以及五声音阶和全音音阶调式的旋律等手法。1925年，他创作了另一部芭蕾舞曲《四个太阳》，随后又创作了《七首钢琴曲》(1926—1930)。1932年，他的反帝芭蕾舞《马力(H.P.)》由斯托科夫斯基指挥，里韦拉设计布景，在费城上演。这是查韦斯最富有战斗性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他组织了工人音乐会，创作了民众主义的作品。如《号角：无产阶级交响曲》(1934)。正如其他土著主义艺术家一样，他认为前哥伦布文化主题、当代本土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前进之间存在着联系。1935年，《印第安交响曲》上演了，他因这部作品而国际驰名。

正如20世纪20年代是国家美术馆发展的第一个重大的形成阶段，它也是交响乐团的时代。查韦斯领导下的墨西哥国家交响乐团对墨西哥音乐生活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首演了大量民族主义作品。在这整个时期，查韦斯的助手是西尔韦斯特雷·雷韦尔塔斯(1899—1949)，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作曲家。查韦斯是严肃，甚至是威严傲慢的，而雷韦尔塔斯则是极为民众主义的，他主要吸取当代民间和流行音乐，并创作电影音乐。他第一部大乐队谱交响乐作品是《夸那瓦克》(1930)，最受欢迎的大概是政府委托创作的电影音乐《哈尼齐奥岛》(1933)。后来他创作了颂扬洛尔卡的乐曲，1938年创作了《森西马亚》，一部令人想起尼古拉斯·纪廉的古巴诗歌的充满活力的作品。

并非所有墨西哥作曲家都投身于民族主义探索。胡利安·卡里略（1875—1965）尽管具有印第安人血统，却与迪亚斯政权关系密切，并在欧洲侨居多年。1920年，他第二次被任命为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并参加了巴斯孔塞罗斯的印第安主义民族主义和（卡里略本人所热衷的）新古典复兴主义充满矛盾的运动。随后，在经历了学院派和浪漫印象主义时期之后，他提出了著名的微分音理论，称为"十三音"（根据斯洛尼姆斯基的解释，象征着"比平均律的十二个半音更小的音"），㉘自1895年以来他一直研究这种理论。他以这种理论以及一套新的记谱体系而获得国际声誉，虽然这种理论没有广泛运用。他对这个体系的首次展示是创作于1922年的《哥伦布前奏曲》。

古巴流行音乐如此富有活力和西班牙的学院派遗产如此死气沉沉，以致于严肃的作曲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个新近解放的岛国难以找到一个自己风格的立足点。是由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组成的"无名社"自1923年起为复兴古巴音乐文化提供了理性基础。费尔南多·奥尔蒂斯（1881—1969）是一位伟大的民俗学家和民族音乐理论家，他在1909至1918年期间在哈瓦那任大学教师时具有巨大影响，部分地受他启发产生的古巴黑人派运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倡导者是混血儿作曲家阿马德奥·罗尔丹（1900—1939）。罗尔丹创作了开拓性《古巴主题序曲》（1925）、《小诗三首》（1926）和《雷班巴拉姆巴》（1928），后者是根据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创作的。卡彭铁尔不仅成为世界著名的小说家，而且象巴西的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一样，是民族音乐的一位主要权威。罗尔丹根据卡彭铁尔的另一篇小说创作了第二部芭蕾舞《阿纳基叶的奇迹》（1929），1930年他根据纪廉的诗创作了《松舞的动机》，完善了他对本土民间成份（包括切分音）与复杂的世界主义的管弦乐谱的融合，以及本土与欧洲乐器的混和。亚历杭德罗·加西亚

㉘ 见N·斯洛尼姆斯基著《拉丁美洲音乐》（纽约，1945）第229页。

卡图尔拉（1906—1940）的创作同样是引人注目的。在巴黎他受到斯特拉文斯基、萨蒂和米约的极大吸引，但他们保持了与黑人文化的认同感，改编了孔加、松、孔帕尔萨和伦巴舞曲；他创作的《古巴舞曲三首》(1928）和《本贝》组曲（1929）显示了他对两种传统娴熟的技艺。象罗尔丹一样，他与卡彭铁尔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如《古巴黑人诗歌二首》(1929）以及充满祭祀仪式感的交响诗《扬巴-奥》(1928—1931)，并且根据尼古拉斯·纪廉的各种诗歌进行了创作。尽管他基本的模式是松舞曲基本的五声音阶旋律，1933年他谱写了一首题为《伦巴》的管弦乐曲。 392

总的说来，秘鲁博学的文化没能象拉美其他地方那样实现艺术混血。这显然是由于排斥土著文化的态度根深蒂固，但是就其前哥伦布工艺美术或就其当代民间音乐异常优越的特质而言，这倒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奥多罗·巴尔卡塞尔（1902—1942）创作了土著派的作品《萨克萨瓦曼》(1928）和《印加组曲》，但他却无法在本国使自己的作品满意地配写为管弦乐，而玻利维亚作曲家何塞·马里亚·贝拉斯科（1899年出生）为了颂扬“明天的新印第安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创作了芭蕾舞剧音乐《美洲印第安》、但却不得不等到1938年在德国宣传部长的支持下在柏林上演。

本土主义在智利是个例外，但是卡洛斯·伊萨米特（1887—1974）和佩德罗·温贝托·阿连德(1885—1959)开创了在马普切人中间展开的研究。阿连德还在交响组曲《智利乡村风光》(1914)、交响音诗《街头之声》(1920）和《智利民间风格歌谣》(1922）中引用了主流梅斯蒂索民间音乐。另一位土著派作曲家卡洛斯·拉温（1883—1962）为女低音和管弦乐队创作了《阿劳科神话》和《维利切人的哀歌》（1928)以及钢琴曲《安第斯组曲》(1929)。多明戈·圣克鲁斯（1899年出生）倾向极为不同，他于1928年创作了新古典风格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四首》。

1918年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情况极为复杂。民族主义的农村——高乔传统在1940年之后仍然富有活力，也得到正在兴起的安

第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潮流的补充。意大利移民特别有影响，1908年哥伦布剧院的启用既确定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上演意大利歌剧的一个世界中心，也促进了一阵以威廉斯和阿吉雷（见上述）传统的本土主义歌剧浪潮。费利佩·波埃罗（1884—1958）创作了大量歌剧，例如《狡猾》(1929)，一部意大利风格的民间传说体裁的作品，正如胡安·包蒂斯塔·马萨（1885—1938)，他成熟的歌剧风格以交响诗《印加之死》(1932）达到顶峰。另一位以意大利风格创作阿根廷民间传说题材的作曲家是康斯坦丁诺·盖托（1878—1945)，他创作了《雪花》(1922)、《奥扬泰》(1926）和交响诗《昂布树》(1925)，这部作品使人想起代表阿根廷荒漠的象征。

493

卡洛斯·洛佩斯·布查多（1881—1948）是一位更为真正的地方主义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诗《阿根廷风光》(1922）是那个时期最受欢迎的克里奥尔派作品之一。弗洛罗·M·乌加特(1884—1975）的《我的故乡》(1923)，是一部以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的高乔诗创作的交响音诗，而奥诺里奥·西卡迪(1897年出生)创作了《关于马丁·菲耶罗的诗三首》。然而，最有成绩的克里奥尔派作曲家还是路易斯·贾内奥（1897—1968)，他是富有影响的复兴社的成员，作品有《草原之歌》(1924)、《民谣》(1929)，两部以流行诗歌谱写的作品，以及土著派交响诗《图雷图雷》(1928）和《盛开的万恩曼》(1930)。乌拉圭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作品是爱德华多·法维尼（1882—1950）创作的《田野》(1909)。这部作品1922年才得到首演。弗朗西斯科·库尔特·朗格（1903年出生）1923年移居乌拉圭，他后来成为拉美最重要的音乐研究家之一。

然而，在拉普拉塔流域国家，对地方主义一直存在某种怀疑，在拥护者中，后来又放弃他们在青年时期支持热忱的，也不乏其人，正如博尔赫斯抛弃他“狂热青年时期”的诗歌一样。复兴社的胡安·卡洛斯·帕斯(1901—1972)坚决和愤怒地反对把一切民族主义音乐当作标题音乐作品的又一种形式，如同“文学”解说一样，这也是他所鄙视的。帕斯最初采用新古典主义的风格，但

后来提倡勋伯格的系列技巧和其他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如韦伯、瓦雷兹和贝尔格。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恰恰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民族主义开始动摇而世界主义再次盛行时，阿根廷音乐，如同其绘画一样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巴西的音乐领域由埃托尔·维拉—洛博斯（1887—1959）巨大的身影支配着，他是“拉美音乐的拉伯雷”，是拉美所涌现出的唯一最受欢迎的严肃作曲家。他为各种乐器和以各种风格创作了一千多首作品，将葡萄牙，黑人和印第安人传统融合为一个广泛的综合体，容纳了过去和现在巴西所有的地区和社会阶层。难怪他夸口说：“我就是民俗；我的曲调与那些发自人民心灵中的曲调一样真实”。他也曾是一位受人欢迎的演奏家，他花了8年游遍了巴西，通过直觉学习巴西音乐，而又不断地拒绝接受学院派训练。他早期作品已经根据民间素材进行创作，有《乡村曲调组曲》（1910）、《亚马逊女人》(1917)、《一个农民的传奇》(1920)和《九重奏》(“对整个巴西的迅速印象”，1923)。1916年，他在里约热内卢会见了米约，并且是1922年圣保罗现代艺术周的重要参加者。从1923年起，他以其天生博得观众欢欣的演出主持人的本能使他的“原始风格”得到夸张，在巴黎确保了成功。法国作曲家佛罗朗·施米特称他为“四分之三为神，长着发亮的眼睛和鳄鱼的牙齿”。[39] 维拉—洛博斯本能地适应了——确实，他已预先适应了——将形式创新与原始内容相结合的潮流。他根本不迷恋自己的形象，经历了一个极有创新性的时期。他在巴黎完成的、献给鲁宾斯坦的《粗陋的诗篇》是本世纪最为复杂的钢琴曲之一，而同时他又创作儿童歌曲和最重要的民族主义作品《16首乔罗》，这些作品包括相对抽象的到完全标题式的，以及甚至拟声表现巴西风光的曲目。9首《巴西的巴赫风格曲》(1930—1935)将巴罗克对位法运用于巴西流行音乐，包括一首对民歌的结构探索。20世纪30年

434

[39] 贝阿格著《拉丁美洲音乐》第186页。

代，也许是适逢其会，巨人维拉—洛博斯参与了热图里奥·瓦加斯巨大的教育计划，曾组织人数多达4万人的音乐集会。

在维拉—洛博斯的影响下另有建树是困难的，但是奥斯卡·洛伦佐·费尔南德斯（1897—1948）创作了一部《内地人之歌》（1924），一部美洲印第安音诗《印巴帕拉》（1929），以及一部根据格拉萨·阿拉尼亚写的关于巴西民间英雄的话剧改编的歌剧剧本所谱写的歌剧《玛拉查特》（1933）。费尔南德斯经常与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合作，后者具有影响的《巴西音乐浅论》于1928年出版。正是安德拉德与卢内亚诺·加莱（1893—1931）一道开创了对巴西民间音乐的研究。加莱于1924年发表了《巴西民歌》，1927年发表了钢琴曲《巴西黑人舞》。其他值得一提的与安德拉德合作过的人还有卡马戈·瓜尔涅里（1907年出生）和弗朗西斯科·米尼奥内（1897年出生）。

小　说

文学现代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广泛的文化运动中曾同时形成互相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局面。然而，各种因素使19世纪末的普遍稳定受到威胁，加上大量移民和工人运动兴起，其与日俱增的影响也非同小可，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时刻，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这场广泛的文化运动明显失去了活力。一旦现代化的速度开始加快，以及真正的现代性出现在地平线上时，西班牙语美洲的现代主义就厄运来临，并必将以惊人的速度被战后的先锋派所取代；当阶级斗争的概念压倒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和种族的观念时，自然主义必然得以重新发展，为诸如地方主义（包括在激情上通常保守的克里奥尔本土主义以及通常进步的土著主义和美洲黑人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等“现实主义”激情创造出新的形式。

西班牙1898年的失败不仅为19世纪，也为一个旧世界划了句号，尽管拉美人不舒服地意识到他们是那个世界的人，而且，那个

495

世界已被另一些技术和经济上更为先进的美洲人压倒了；欧洲的新思想，特别是巴枯宁和马克思的思想传到拉美向旧的思想挑战，并得到新的一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传播。随着最早的社会党的建立，以及随后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的建立，仍然鼓吹循序渐进的实证主义在经过了革命思想在拉美几乎是空白时期的几代人之后，让位于更为明确的政治思想。[30] 然而，回想起来更令人惊奇的是，罗多的《爱丽儿》以其根据居荣、卡莱尔、爱默生和勒南的思想提出的真理与美和灵性的启示亦同样影响了两代的艺术家和政治家时（如乌拉圭的巴特列和阿根廷的伊里戈延），而新的一代，特别是学生，在新世纪暗淡的黎明时，几乎是急切地寻求某些希望的启示。尽管罗多的希腊罗马风格散文的师长式庄严似乎现在过去了80多年，它却激励了想成为教育工人农民而不是孩子们的教育者的那些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1914年以前，文学发展是逐步演进的，但到了1920年却似乎突然完成了。特别是诗歌在形式和功能上都经历了一场革命，从耳朵转移到眼睛，并打破格律，韵脚和修辞。要么成为奥妙的先锋派，要么蓄意故作常态和平凡。一向受历史本身重压的散文，反应较慢，但自然主义小说迅速变得更具历史性，政治性和经济性，而不那么生物性和社会学性；或者，正如雷伊莱斯（见上述）或吉拉尔德斯（见下述）通过与现代主义小说融合逐渐向诗化的格局发展。1910年以前，现实主义小说家以一种在结构方面几乎是完全自由的世界观，一直可以对“文明”、“进步”或“正义”表示含糊抽象的义务；1918年之后，这种政治清白丧失了，那些不过问政治或试图隐瞒自己政治态度的作家将不得不回避或混淆这个问题。1900年以前，进步作家的态度是反对西班牙，然后是反对美国；1918年之后，他还要反对庄园主，可能甚至还要反对资本主义。墨西哥革命、俄国革命、 496

[30] 见前引黑尔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科尔多瓦的大学改革运动等共同掀起了一个综合的浪潮，这个浪潮的有些影响是即时的，有些是短期的，有的是长期的，但它至今仍有影响。1900年，拉美的知识分子仍在吸收达尔文、斯宾塞、尼采和巴枯宁；现在，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弗洛伊德、柏格森和爱因斯坦迅速先后传到拉美，更不用说转移人的注意力的怪人，如施本格勒和凯泽林，这加速了现实主义记叙体摆脱生物决定论向着以新出现的阶级觉悟和冈萨雷斯·普拉达所鼓吹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盟（例如，他在1905年“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演说中所提出的）为基础的更为公开的政治观点发展。

最早体现这一变化的是智利作家巴尔多梅罗·利略（1867—1923），他的短篇小说集《土地下》（1904）和《太阳下》（1907）被认为是后期自然主义或地方主义的而通常不被重视，当时他是最早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工人而不是社会“下层”成员的人士之一。利略本人出生于南方一个穷苦家庭，并多年在一个矿区杂货店当雇员。《土地下》有关矿区的故事包括“第12号闸门”和“魔鬼的坑道”二篇作品，它们以彻底的毫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和明显的自然的结构逻辑成为这种风格的早期杰作。利略对工人自身的产业劳动经历的集中描写，显示了从机械自然主义向以经济和政治为基础的现实主义新形式的过渡，从而引向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拉美社会小说的伟大时代。

在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1879—1946）尽管创作了悲观的《病态的民族》（1903），但他是把拉美土著主义小说更引向社会学方向的第一位作家。《瓦塔·瓦拉》（1904）叙述了受一位酋长残酷虐待的一对印第安恋人的故事。这部作品不是把它表现为通常的伤感浪漫故事或残酷的自然主义描写，而是考察了印第安人真实的社会状况，甚至还以他的正义的复仇来作结尾。这部作品实际上没有受到重视，阿格达斯在15年的期间里对该书精心做了重新修改，使它更加全景化和具有史诗性，最终成书定名

497

为《青铜的种族》(1919)，这些小说是随后20年所有伟大的土著主义作品的先驱，并开创了“金山上的乞丐”的主题，这一主题把安第斯山雄伟、壮丽的景色与其居民所陷入的悲惨，不公正状况做了含蓄的对比。[31]

第三位伟大的先驱者是乌拉圭的奥拉西奥·基罗加（1878—1937），他一生屡遭磨难。爱伦·坡、莫泊桑、契科夫和吉卜林是他的主要榜样，而他作品中所描写的无数令人恐怖的事物在拉美小说中几乎是无可比拟的。他的第一部诗集《珊瑚礁》(1901）是献给阿根廷现代主义作家卢戈内斯的，他曾参加卢戈内斯组织的米西昂奈斯大森林的探险。基罗加注定要在远离都市文明的米西昂奈斯大森林中度过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他在森林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集，如《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1917)、《林莽故事》(1918)、《野蛮人》(1920)、《阿纳孔达》(1921)、《荒野》(1924）和《被放逐的人们》(1926)。基罗加是拉美最接近康拉德的作家。他的小说描写普通的、未受过教育的人，与两个同样野蛮的世界——原始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做斗争，往往都以令人恐怖的失败而告终。批评家们发现要将基罗加归类并非易事；有些人联想到爱伦·坡，把他称为“哥特式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出现在阿尔特之前的“表现派”。他们所遇到的难题是，尽管毫无疑问基罗加综合了20世纪早期小说中的许多潮流，他自己凄凉的、几乎是幻觉的想象力完全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也是社会现实主义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蜚声国际的第一代拉美新浪潮地方主义作家中最早的一位，也是这些作家中最伟大的几位之一。

拉美吸引世界视线的历史现象是墨西哥革命(1910—1920)。在墨西哥本国，自19世纪初利萨尔迪以来的叙述体传统一直是有 498 地位和活跃的，但却有些不太出色，而墨西哥革命促进了那种著名的地区性分支流派“墨西哥革命小说”。这一标签加深了一种误

[31] 见前引黑尔文。

解，例如以为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和马丁·路易斯·古斯曼（1887—1976）是革命小说家。实际上，阿苏埃拉对革命极为怀疑，古斯曼所持观点差不多是保守的。关键的问题是二者都经历了这场冲突：正如利略对矿山了如指掌，正如阿格达斯是在一座半封建的庄园上长大的，或者象基罗加曾有过在丛林中生活和受难的经历一样。如果说，这些革命的文学编年史者确实超越了阶级、种族和亲身经历的巨大差距设法再现了小说中人物的生活，那是不正确的；但它毫无疑问是这样一个时代，即每个国家中的中等阶层小说家都开始扩展题材和描写当时仍不属于同一阶层的和大体上仍然没有文化的同胞们的生活，并为他们代言的时代，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这样的时代。1945年之后，随着小说家展开对自己阶级的评价，社会现实主义潮流再次陷入少数派地位。这种对自己阶级评价的欧洲小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完成，但在拉美只有马查多·德·阿西斯才能够把它提高到艺术境界。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里亚诺·阿苏埃拉抓住了墨西哥革命提供的历史机会。他赞同马德罗的思想，是他的支持者，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马德罗主义者安德列斯·佩雷斯》(1911)。阿苏埃拉本人的政治雄心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受到挫折，小说表述了他的幻灭感。然而，使他在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是《在底层的人们》(1915)。该书部分写于战火正酣之际（阿苏埃拉在潘乔·比利亚军队中任军医），部分写于幻灭之后。作为实际上西班牙语美洲的第一部现代小说，这部作品以迅疾多变、令人兴奋和错综紊乱的革命内容创造了一种简洁紧张的印象主义文法和结构，似乎驱使读者与书中人物一同感到他的幻灭和书中人物的厄运。小说以其清新活泼、对大众语言和民族幽默的开拓性笔法，以及对劳力者和劳心者之间鸿沟的坦率描写，为革命时代做了令人难以忘怀、几乎是电影记录式的刻划。

《在底层的人们》，实际上1924年才问世，而其余所谓的革命

小说出版于1926年（同年古斯曼的《鹰与蛇》出版）和1939年之间，因此，它与革命之后的墨西哥电影黄金时代，而不是与同时代的壁画运动更加巧合。古斯曼著名的小说实际上是对自身经历戏剧性的记录。古斯曼也曾经是一位马德罗主义者，后来无法赞同潘乔·比利亚（然而却对他一生着迷）、卡兰萨、奥夫雷贡或卡列斯的立场。古斯曼的作品在意识形态上是怀疑论的，在表现上则选择了几乎古典的手法，同时代的艺术作品没有哪一部使后来的人们对革命的认识能比他的作品产生更长久的影响。古斯曼的兴趣在于"上面的人们"，农民革命者恰如隔着巨大的社会鸿沟观察似的，只被当作群体看待。精心编排却也栩栩如生，然而，我们对古斯曼的经历仍能得到一个清澈的（我们不想说"真实的"）印象；对这位中等阶层小说家与他所描写的农民或无产阶级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即便是不知不觉的也是启发性的深入了解。他的下一部小说《考迪略的阴影》(1929）对卡列斯政权做了激烈批评，尽管很少受到引述，却是拉美文学对独裁行径所做的最重要探究。第三位小说家格雷戈里奥·洛佩斯一富恩特斯(1897—1967）尽管不如阿苏埃拉和古斯曼那么有才华，但却以《营地》(1931）成为革命小说和其他流派之间的重要链环。《营地》是一部简短的叙述体小说，它发展了表达那个时代典型的群众心理的技巧；《土地》(1932）描写了由萨帕塔发动的土地斗争；《印第安人》(1935）谴责了冲突时期和其后虐待印第安人村社的行为。

再者，总的说来墨西哥革命使小说自马莫尔的《阿玛利亚》(1851）[㉜] 问世以来第一次改变了对历史的态度：不再把历史视为某种遥远过去的事物，如殖民地时期或独立时期的事物，而是把历史看作是可以立即形成和确定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事件的认识的一种现实和概念。因而，这种历史意识可以明显地在普遍的现实主义运动中将社会现实主义与比较自鸣得意的克里奥尔派

㉜ 见前引马丁文。

500

现实主义区分开来。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韦拉（1888—1928）创作的拉美最著名的丛林小说《旋涡》(1924）体现了这个趋势，里韦拉的声誉理所当然地正在不断增长。小说描写了一位波哥大诗人与情人私奔到亚马孙，并陷入一系列社会、经济和自然灾难的旋涡中。主人公是一位戏剧性、与时代不合拍和生性浪漫的人物，他的第一人称叙述再现了自己的气质。这导致大多数评论家得出结论，认为这部小说是一篇毫无节制的热带式夸张作品，这实际上微妙地中伤了叙述者的道德水平，并逐渐使小说成为揭露原始积累过程中亚马孙割胶工受剥削的半记录性作品。作为曾经在亚马孙地区担任边界特派员的里韦拉，是又一位再现自己经历的作家。他对几乎是无法抵达的丛林中被束缚在包身契约工制度下的工人状况所写的新闻报道，以及小说的影响，促使政府改变劳工政策。

评论家讽刺性地用《旋涡》的最后一行，“密林吞没了他们”，来说明这部小说本质上仍然是宿命论的，小说中的人物因广阔的自然风景而相形见绌和被淹没。这些评论有其道理，但却忽略了作家创作的来龙去脉。拉美小说尚未探索，更不用说占据那些巨大的空白，因为它们实际上仍未得到充分发展。毫不令人惊奇的是，正如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所说的，拉美仍然大体上是一部“没有小说家的小说”。[53] 另一方面，评论家批评了这部小说对人物的集体性形象塑造和人物明显的消极状态；但是同样，拉美发展的不平衡性意味着在拉美小说还没有经历欧洲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古典”阶段之时，工人运动正出现了，而在另一方面，鉴于早期工人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状况，对他们的觉悟和成就做任何胜利色彩的解释必然会出现严重的曲解。

---

[53] 这是他有影响的著作《美洲，没有小说家的小说》（智利，圣地亚哥，1933）的标题。当桑切斯1945年发表了题为《存在拉丁美洲吗？》的作品时，他的困惑变得更为玄奥。

有一个国家是大自然确实已经基本上被征服和那个重要阶段已经过去了的国家，那就阿根廷。阿根廷20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地方主义小说是里卡多·吉拉尔德斯（1886—1927）的《堂塞贡多·松勃拉》（1926）。作者是一位富有的庄园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拥有一座庄园，并在巴黎拥有公寓。他在高乔牧民的黄金时代早已成为传奇之后出版的有关高乔牧民的杰作，创造了一个神话，以激励阿根廷青年正直诚实地成长。象杰克·舍费尔的《沙恩》（1954）一样，这部小说所采用的技巧是通过一个年青人的眼睛观察牛仔英雄，它怀旧的力量因小说细腻的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形式和经常是残酷的、总是粗糙的主题之间的强烈对比而得到突出。然而，没有几本小说比它更不诚实的了：试图赞扬大草原上的牛仔，但却是由一个庄园主写作的（此外，作者父亲雇佣的人是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它哀悼高乔牧民失去了自由，而当时正是象作者一样的家庭用栅栏将广阔的牧场隔开，并迫使游牧的高乔牧民从草原的骑士沦为雇工；它对大男子价值观表示了虚伪的抱歉，而这些价值观却不可避免地又被看作是持久的最高行为准则，它们不仅支配着大草原也支配着阿根廷统治阶级的家长制世界；总而言之，它惋惜地为一个尚未被外来移民、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和工业化弄得复杂化的世界招魂，而在这个世界中土地所有者和高乔牧民都被说成具有同样的个人主义、禁欲主义和重大传奇意义的人生哲学，而同样热爱土地。当堂塞贡多骑着马奔向催人泪下的暮色时，他使其他大部分描写大草原的作品黯然失色，但是这类作品很多，如卢戈内斯的《高乔战争》（1905）和《民歌手》（1916）；俄国移民阿尔韦托·赫尔丘诺夫（1883—1950）的《犹太高乔牧民》（1910）；曼努埃尔·加尔韦斯（1882—1962）创作的一些小说，这位爱辩论的作家写了著名小说《师范学校女教师》（1914）；贝尼托·林奇（1885—1951）的《挖骨头的英国人》（1924）和《一个高乔人的罗曼史》（1933）；雷伊莱斯的《高乔牧民弗洛里多》（1932），和另一位乌拉圭作家恩里

501

克·阿莫里姆(1900—1960)的《农民阿吉拉尔》(1934)。阿根廷思想家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1895—1964)才华横溢的文章《潘帕斯草原的爱克斯光片》(1933),为参照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历史来阅读这些小说作品提供了言简意赅的诠释。

人们普遍认为,委内瑞拉的罗慕洛·加列戈斯(1883—1969)即使不是西班牙语美洲最伟大的地方主义作家,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主义作家,他创作了著名的《堂娜芭芭拉》(1929)和其他许多小说。这位作家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受了欺骗。玻利瓦尔的祖国忍受了19世纪最不幸的考迪略主义苦难,而又因胡安·比森特·戈麦斯的独裁统治(1908—1935)延续到当代时期,这显然使加列戈斯有理由重新采取萨米恩托在《法昆多》一书中支持文明反对野蛮的立场。没有那个作家更能显示这个时期的成就和局限。他对重大主题的选择在当时是无可比拟的,后来的小说家中只有巴尔加斯·略萨表现出康拉德式的雄心。不幸的是,他的思想和论点对小说以外的事物也同样感兴趣,而他塑造的那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几个不碰壁的。象罗多一样,加列戈斯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反复地对经济问题提出文化的解决办法,显现了他对国家政治比对他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具有更大的洞察力。(象萨米恩托一样,他后来成为总统,但迅速即被废黜。)面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文明和野蛮做简单化的区分无济于事。这种幻想在《堂娜芭芭拉》一书中到达高潮,加列戈斯多少说服他自己和一代读者,他小说中取名为桑托斯·卢萨多那位被理想化的主人公是文明的代表,因为他用一种组织良好但却同样是家长式统治的制度取代一种无政府的、低效率的半封建农业。然而,他首先用文学表现了其他作家将在后来加以发挥的神话,也没有哪位作家象他那样头脑清醒和雄心勃勃地着手通过小说来探索和开拓拉美的自然天地,因而,正如阿莱霍·卡彭铁尔所比喻的,加列戈斯象亚当一样承担了挥手指点并为万物命名的任务。没有加列戈斯,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显然不可能成为此后小说发

502

展的基础。

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汇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厄瓜多尔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派于1931年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汇编《出走的人们》。涉及的作家有德梅特里奥·阿吉莱拉·马尔塔（1908—1981），华金·加列戈斯·拉腊（1911—1947）和恩里克·希尔·希尔韦特（1912—1975），后两位是共产党员，此外还有阿尔弗雷多·帕雷哈·迭斯坎塞科（1908年出生）和何塞·德·拉·夸德拉（1904—1941），后者是西班牙语美洲一位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和长篇小说《桑古里马斯》(1933)的作者。然而，马尔塔因创作了《堂戈约》（1933）和《运河区》（1935）而最为著名。这个目标坚定、新现实主义的和异常团结的文学团体也许是与墨西哥壁画运动最为旗鼓相当的文学组织。本世纪厄瓜多尔最著名的作家是来自基多的豪尔赫·伊卡萨（1906—1978），他冷峻的地方主义小说《瓦西蓬戈》（1934）是社会现实主义潮流的顶点，适逢其会的是，它出版的时候正好是日丹诺夫在苏联强行贯彻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时刻。它将剥削的链条一直从芝加哥追踪到厄瓜多尔山脉。没有哪本小说受到如此的咒骂，因为它语言和技巧粗俗，描写了印第安人被教士和庄园主降到非人的地位，但也没有哪本小说如此难以被淘汰。然而，在伊卡萨对地方主义小说做了最后的处理后，它开始失去活力，尽管这一流派一位公认的大师，西罗·阿莱格里亚（秘鲁，1906—1967）1935年才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金蛇》，1941年才创作了世界著名的作品《广漠的世界》。

尽管大部分城市小说的发展出现于我们所讨论的时期之后，但在20年代已开始在西班牙语美洲展开，并反映社会重要的阶层面对迅速变化的环境所产生的迷惑。早期的例子有智利作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1884—1963）创作的《不可救药的人》(1917)。这部作品对30年前坎巴塞雷斯通过《没有目的》（见前述）中贵族主人公所表现的城市异化题材增加了小资产阶级光彩。罗伯托·

阿尔特（阿根廷，1900—1942）是这种题材的优秀代表，他创作的《狂暴玩偶》（1926），《七个疯子》（1929），《喷火器》（1931）和《妖术的爱》（1932）表达了痛苦的，肮脏的然而古怪的世界的几乎是表现主义的恐怖，第一部作品使人联想起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塞里纳晚期的作品，预兆着马雷查尔、马列亚和萨瓦托这些典型的阿根廷小说家的出现。阿尔特与伯多派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有密切关系，他的风格打破了所有局限：他不是象莱昂尼达斯·巴莱塔（1902—1975）在《皇家马戏团》（1927）中所做的那样对工人进行类型学式的个别研究，而是把拉皮条的人、妓女、贪污者、杀人犯和疯子当作奇异的隐喻，来说明资本主义作为城市恶梦的制造者所产生的影响。他的声誉仍在增长。阿尔特与巴莱塔、萨穆埃尔·艾歌尔鲍姆（1894—1967）、阿曼多·迪斯塞波洛（1887—1971）和弗朗西斯科·德菲利皮斯·诺沃亚（1891—1930）一道，也为阿根廷戏剧在20年代持续的活力做出了贡献。

在巴西，20世纪戏剧性地以《腹地》和《伽南》开始。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曾在军队服役并在里约热内卢任工程师，1896年他受一家报社派遣前往卡努杜斯报道镇压内地人的自救起义的战役。结果，他创作了《腹地》（1902），这部作品是对历史，地理和社会学有力的综合，并以惊人的力量和说服力对人和环境的关系做了卓越的阐述。尽管达·库尼亚也部分地因受机械的实证主义种族思想影响而产生盲目性，但他热烈呼吁东北部的发展和充分纳入国家经济、政治和教育体系，这促进了把混血人，特别是内地人看作是巴西民族特性基础的自我精神分析和公开辩论的进程。这一进程直接导致20年代的现代主义和吉尔贝托·弗雷雷1926年之后发起的地方主义运动（见下述）。[39] 若泽·佩雷拉·达·格拉萨·阿拉尼亚（1868—1931）本人来自东

504

[39] 见前引黑尔文。

北部，但却将小说《伽南》的背景放在南部，南部是大多数移民向往的地方和未来经济发展之所在。小说描写了两位德国移民不同的态度。格拉萨·阿拉尼亚对巴西现存的种族抱悲观态度，寄希望于新的人种混合。然而大体上，1918年之前小说家们令人失望地没有写出与巴西民族问题相关的作品。尽管巴西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比西班牙语美洲的更为完整和更为"欧化"，较晚实行的废奴和较迟成立的共和国意味着其他地方已完成的许多历史任务，巴西艺术家尚未进行。这些艺术家绝大多数居住在沿海地带，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仍有一些拉美最为令人生畏的疆域有待探索，例如内地或亚马孙。当巴西继续开展连贯而极为可敬的高蹈派和象征主义运动时，西班牙语美洲通过大陆性的现代主义运动已走上了真正现代性的道路；虽然巴西产生的真正的自然主义小说比西班牙语美洲所有共和国加起来还要多，而这些小说仍处于社会生物学案例研究的水平，不是把人物看作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产物，而是把他们当作具有重大"品格"缺陷（往往是出于种族原因的缺陷）的标本，因而在塑造人物方面差距很大。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打破了这种错误观念，但是过了许多年其影响才在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恩里克·科埃略·内托（1864—1934），这位巴西最多产的作家，创作了大量关于内地相当优美的作品，若昂·西蒙斯·洛佩斯·内托（1865—1916）发表地方主义作品，如《高乔牧民的故事》（1912）和《南方的传说》（1913）；阿丰索·阿里诺斯（1868—1916）是一位与时代不合的作家，他发表的《巴西传奇和传说》（1917）几乎都是别开生面的短篇作品。更令人感兴趣的是阿丰索·恩里克斯·德·利马·巴雷托（1881—1922），这位黑白混血作家的作品描写里约热内卢郊区倍受挫折的居民，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激烈地攻击，他的风格与马查多相似，尽管布局和比例的协调逊色一些。他最优秀的小说是《波利卡尔波·夸雷斯马的悲惨下场》（1915）。

若泽·本托·蒙特罗·洛巴托（1882—1948）是一位不安份

的作家，他开始结束混乱的局面并开创该地区一个新的局面。后来，1922年现代主义运动的领袖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和1926年地方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吉尔贝托·弗雷雷，都把洛巴托看作是先驱。洛巴托呼吁在所有流派中实现一种民族主义的、本质 505 上是巴西的艺术，而对当代大多数作品的模仿性表示了轻蔑。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蔺》(1918) 以故乡圣保罗为背景，不仅创新了文学语言，而且通过亲切而批判性刻划的人物“杰卡·塔图”表达了对内地混血人新的态度，杰卡·塔图这位懒散而没文化的乡下佬是巴西人民未被表现过的灵魂。

1928年，三部重大作品出版了。第一部是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马库奈伊玛》，这部以小说对文化特征做纲要性表现的作品使人想起维拉一洛博斯，它恰恰属于我们所讨论的先锋派(见下述)。第二部是保罗·普拉多 (1869—1943) 的《巴西写照》，它是良心自我反省和民族性格论时期典型的作品，它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观点，认为巴西人民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种族，三个令人悲哀种族混合的产物”，把巴西人看作是忧郁、肉欲和妒忌的，这部作品被称为“巴西从它的儿子之一所得到的一幅最丑恶的描写”。[39] 第三部是赛过当时西班牙语美洲所出现的同类作品的第一部真正地方主义小说，若泽·阿梅里科·德·阿尔梅达 (1887年出生) 创作的《垃圾堆》。这部作品与加列戈斯的委内瑞拉经典小说《堂娜芭芭拉》(1929) 一样，表现了思想体系上的分裂，它追溯了老甘蔗种植园家长式世界向新的资本主义大工厂的过渡，对其所表现的矛盾心理与吉尔贝托·弗莱雷的《大房子与黑人小屋》(1933) 或林斯·多·雷戈的小说中所表现的一样(见下述)。

阿尔梅达的作品为地方主义小说的极大繁荣奏响了序曲，这一繁荣以典型的辨证飞跃使巴西的地方主义小说仅在数年之内达

---

[39] 引自阿泽韦多著《巴西的文化》第118页。

到了远远超过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世界性水平，而西班牙语美洲的小说只不过前不久才达到如此水平。其原因不仅在于巴西文学发展的内在节奏不同，而且也在于历史紧要关头的特殊性质：现代主义（其本身在巴西也更为美洲化：以圣保罗而非巴黎为大本营）和地方主义之间复杂但却连贯的相互关系，考虑到巴西的幅员辽阔，这种关系也使以东北部为基地的本土主义运动与以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为基地的先锋派运动之间形成对照；此外，其原因还在于虽然起步晚于墨西哥或阿根廷，地方主义小说却积累了20世纪20年代的所有经验。30年代初，涌现出一小批精悍的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主要以东北部为基地，可以与厄瓜多尔作家相比拟，但却更有成就。第一部作品是拉谢尔·德·克罗斯（1910年出生）的《1915年》（1930），作者是一位种植园主的女儿，她在作品中再现了1915年悲惨的干旱和农村穷苦人，特别是妇女所遭受的苦难。1931年，来自巴伊亚的若热·亚马多（1912年出生）发表了《狂欢节之国》，这是一部表现在一个腐败、肤浅和不公正的社会中，年轻一代寻求民族价值观和个人意义的重要作品。亚马多后来成为拉美最著名的共产主义作家，他当时写了二部编成小册子的小说，《可可》（1933）描写了可可种植园的生活，《汗珠》（1934）描写了城市穷人状况和工人的斗争。1935年，他出版了《儒比亚巴》，一部有关巴伊亚黑人文化的作品，1942年出版了杰作《无地的土地》，历史地再现了可可庄园的兴衰。

506

若泽·林斯·多·雷戈（1901—1957）是帕拉依巴一个种植园主的儿子，他把家族的历史变成了巴西最伟大的纪念碑或小说之一，即“甘蔗小说集”，其中包括《机伶的男孩》（1932），《古怪的孩子》（1933），《班格》（1934），《小黑人里卡多》（1934）和《工厂》（1936）。小说以其充满热情的复杂性，谴责了种植园制度的不公正，同时本身对它的结束表示悲伤。它是有关巴西社会历史最引人注目的记录之一。小说中的人物若泽·保利

诺是年迈的老太爷，卡洛斯，其孙（基本上是自传式的描述）和里卡多，一个到城里去寻找出路的黑人男孩。《美丽的宝石》（1938）是一部主题与《腹地》相似的小说，而他的杰作《死火》（1943）则又回到他早现作品的题材上。

同时期另外一位伟大的东北部作家是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1892—1953），他是一位农村法官的儿子，是自马查多·德·阿西斯之后巴西文体最优美的作家。他的散文带有悲观色彩，极具讽刺意味，但却简朴，创作了一种观察东北部居民世界观的全新方法，与后来的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的方法相似。拉美地区还没有一个小说家能象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那样，将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如此完美地在作品中融为一体：如《卡埃特斯》（1933）、《圣贝尔纳多》（1934）、《苦楚》（1936）和《枯竭的生命》（1938）。

诗　　歌

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的叙述体散文简朴至极，反映了作品中沉默无语的人物的极度痛苦，也使读者无法从文字上得到“文学性”的满足去逃避主题的暗淡现实。象惯常一样，诗歌比小说更早地开始了这个进程——总是更加关注外面的世界胜于表达的手段。拉美诗歌向散文化，口语化的转变（分别称为简朴化，散文化，外表化或反诗化）通常被认为是很晚出现的现象；因而当它确实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或甚至更晚些时候出现时，它是对现代主义所做出的一种已延误的反应，因对新先锋派的反应而更显得突出，并与之相巧合。然而，更确切地说，应把它看作是传统的小音节诗歌的延伸和再现，这使人想起贝克尔对现代主义本身的贡献，何塞·亚松森·西尔瓦深思熟虑而又天真无邪的童年回忆，马蒂的《纯朴的诗》，冈萨雷斯·普拉达的《秘鲁民谣》，或者甚至阿马多·内尔沃相当平淡的诗歌风格。因此可以认为这一诗歌风格是地方主义流派的一部分，而先锋派则是占统治地位

507

的现代主义的辨证的继续。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潮流使所有其他流派黯然失色，而自己则蓬勃发展，更加证明它多么紧凑，无所不包和具有历史意义。然而，甚至在冈萨雷斯·马丁内斯呼吁诗人们拧断现代主义天鹅的脖子之前，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达里奥在1905年发表《生命与希望之歌》之后，从他早期的技巧性和逃避现实文学转向（“我即昨日话已说尽之人”）更为简朴和清新的风格时，正以其世纪末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厌倦。因此，有些人把散文化看作是一种反现代主义的反应，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现代主义本身的第二个或者是第三个过渡阶段，而忽视了20世纪初那些以创新、口语化方法开创了一个创作流派的所有诗人，这个越来越重要的流派不可避免地与近代农村民间传说、城市流行音乐和政治歌曲运动结合起来。

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生于萨卡特卡斯，1888—1921）是墨西哥这一诗歌流派的创始人。象卢戈内斯一样，他熟练地将欧洲在诗歌中达到艺术纯净的创新手法运用于表现外省生活、天主教信仰对一个不仅多愁善感而且沉溺于声色之好的人带来的痛苦、家庭生活、爱情与死亡。它是一种新型的外省风格。以前的诗人偏居在他们地方的世界里，因为外界无知而受到局限；而现在有些诗人尽管曾遨游他乡，却特别选择创作地方的、甚至限于狭小地域的诗歌，犹如安东尼奥·马查多当时在西班牙所进行的创作。洛佩斯·贝拉尔德的诗集有《虔诚的血》（1916）和《忧伤》（1919），虽然他有许多诗歌是在死后发表的，包括他热情歌颂墨西哥面貌的作品《可爱的祖国》，这首诗写成于他去世前不久，现在是墨西哥最受人喜爱的诗作之一，它使人感到好像置身于一个小镇酒吧走廊早上九、十点钟的阳光下。

508

哥伦比亚的路易斯·卡洛斯·洛佩斯（1883—1950）更为自然的口语化，他是又一位不断摆脱现代主义的阴影声誉增长的诗人。《我的小村庄》（1908）、《古怪的姿势》（1909）、《形形色色》（1910）和《捷径》（1920）等诗集收集了有关卡塔赫纳日常生

活的明显的纯朴诗作，这些诗以梦想与现实，往日的荣耀与今日的无聊之间具有讽刺意义的对比为基础。在阿根廷，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883—1912）也许是受阿根廷早期城市民间传说的探戈文化影响最为典型的严肃诗人，代表作诗集《异教徒的弥撒》（1908），以及标题为《郊区的花》和《城区之歌》两本汇编（死后出版，1913）。类似的诗人还有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莫雷诺（1886—1950），以及政治性更为明确的伯多派诗人阿尔瓦罗·方克（1889年出生），古斯塔沃·里奇奥（1900—1927）和塞萨尔·廷波（1906—1980），廷波还使用克拉拉*·贝特尔的笔名，以便使自己有关卖淫题材的诗更为令人信服。

20世纪初，有些女诗人十分引人注目，并在男性统治的文学世界中注入新的令人关注的题材。这些女诗人与其说是社会诗歌的创作者，不如说她们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第一位女诗人是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她以当时令人吃惊的坦率和勇气表现了人类爱情的激情、性欲和各个方面。在她出版了《空杯》（1913）之后不久就遭到丈夫的杀害，她丈夫随后也自杀了。阿根廷女权主义作家阿方西娜·斯托尼（1892—1938）生活和创作的戏剧性也毫不逊色，她的诗涉及一个具有正常性欲但却不满于屈从于一个男性世界社会习俗的女子所遇到的问题。斯托尔尼是一位演员，教师和记者，她的《玫瑰园的骚动》和《赭石》（1925）中的诗同样令妇女和男性读者感到不舒服。她发现自己患有不治之症后自杀了。相比之下，胡安娜·德·伊瓦尔沃罗（1895年生于阿根廷）与一位乌拉圭陆军上尉结婚，婚后生活有些枯燥无味，丈夫早逝。她是一位貌美的女子，她的诗含蓄地向男子诉说，在公开承认天主教上流社会传统习俗的同时却又使他们动情。在她生活的每个阶段，她都创作出清新坦率的诗，这些诗完美地结合了拉丁妻子和母亲世俗和精神的世界。也许因

* 系女子名——译者

为没有人象她那样，可以从强加于她的社会条件中得到满足而创作出优美的诗歌，伊瓦尔沃罗在1929年以后被称作“美洲的胡安娜”。这个时期另一位伟大的女性诗人是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889—1957），她是一位教师，1945年成为拉美第一位 509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米斯特拉尔年轻时，未婚夫自杀，致使她再也不想结婚，虽然她渴望有孩子。她早期的作品《孤寂》(1922)和《温柔》（1924)表达了她母性遭受挫折的感情，并徒然在大自然和宗教默祷中寻求安慰。她后来担任过外事工作，并成为一位关心世界儿童哺育和教育的巡回文化大使。米斯特拉尔是一位强烈的美洲主义者，特别赞同玻利瓦尔和马蒂，她认为自己本质上是印第安的，虽然她具有巴斯克的血统，但是她所创作的诗歌却是简朴和清醒的，丝毫没有华丽辞藻和冷嘲，因此与更单纯，不尚矫揉造作的诗歌潮流相吻合，这一潮流由于巴列霍、班德拉、帕拉和卡尔德纳尔的创作逐渐在拉美成为主流。

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

在现代主义之后，诗歌要么变得更为单纯，更为口语化以及甚至散文化，要么在欧洲先锋派的影响下变得更为玩世不恭，然而却是复杂的、奥妙的和试验性的。这种分道扬镳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从前还可以看出散文与诗歌、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离，突出了由浪漫主义所引发但却决非由它完成的一种趋势，而现在出现的则是同样的分流，它不仅仅是诗歌和散文之间的分流，而且是这两种文学表现形式各自内部出现的分流；散文诗和诗化叙述体现在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正如现代主义在诗歌中（诗歌总是更为灵活和更有适应性的）而不是在散文中（记事体，有时还有短篇小说，都是灵活性和适应性差得多的体裁）首先得到发展的情况一样，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先锋派小说比先锋派诗歌的发展要慢的多。在这个时代，有少数先锋派拉美诗人，如维多夫罗、班德拉、巴列霍、聂鲁达和纪廉赢得了国

际声誉；而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转变时期产物的先锋派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如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和马雷查尔，这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和卡夫卡的作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久才产生国际影响。如果 510 不了解这一点，那么20世纪20年代就会令人误解地变得一片混乱和毫无条理，因为这个时期涌现出几乎是令人眩晕的大量作家和运动，比从前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与其他艺术保持了相应的齐头并进的发展势头。

为了理解拉美的先锋派，必须追溯到巴黎。在巴黎，新的一代以自己的青春体现新世纪的来临，以诗歌，音乐和造型艺术中的美学革命表现自己的现代性，并认为他们的反叛与墨西哥和苏联的社会革命是一致的。现代主义现在似乎被视为如同黄昏、秋天和假贵族主义一样，上述说法是那些对这个兴起于纽约、莫斯科、柏林、巴黎和墨西哥的革命变革新时代持反对态度的老朽们的诡辩。另一些老朽们曾使成百万的欧洲青年在战争中丧命，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摧毁了他们自己家长式的世界。现在，在这个电影、无线电广播、录音音乐、汽车、飞机、横渡大西洋航班、好莱坞电影和无产阶级文化普及的时代，属于年青艺术家、运动员或革命学生等青年人的时刻来临了。在一个世纪里，青年人第一次成为产生主要的思想和思想方式的人。

很显然，尽管现在受到排斥，现代主义曾有助于为拉美吸收这些发展的成果而奠定基础。现代主义作为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流派，它在西语美洲各主要城市产生大量的文学团体、座谈会和晚会，使拉美作家几代人以来第一次有了经常性的接触，在美洲的每个首都与它们共同的首都巴黎之间建立了文化网络，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当时的先锋派运动，预示了未来的世界；它犹如作诗一般地完成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个漫长进程，这一进程使先锋派可以第一次将思想、情感和感觉融进同一件艺术作品中，使所有艺术可以进行卓有成效的沟通，因而可以对每种艺术的特性有个

清楚的理解，因此才可能把它们进行结合（在墨西哥和巴西表现的最清楚）；并且开始吸收西方文化，而不仅仅是模仿，这项吸收西方文化的任务将由先锋派完成，与此同时并结合各种不同的原始艺术和文化，以及美洲的生活方式。由于旅行和交通的发展，甚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可以梦想仿效达里奥和戈麦斯·卡里略前往巴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们得益于有利的外汇兑换率而使其成为可能，直到经济萧条结束了这些令人入迷的岁月，并把他们这些可怜的灰姑娘从光明之都送回了30年代独裁统治的黑暗中去。

511

墨西哥在20年代成为，并一直保持了西班牙语美洲最具代表性的共和国，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和拉美主义的发祥地，它具有一种第三世界意识倾向，甚至在这种概念被人提出之前就早已存在。只有西班牙内战和古巴革命才可以与墨西哥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此后对拉美艺术、文化和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相比拟。墨西哥革命爆发之前，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成立了“青年协会”（1909），其倾向实质上是反实证主义的，其时恰逢柏格森的新唯心主义将决定论思想扫荡一清。这个运动包括许多在革命后的时期建立墨西哥新的民族文化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如安东尼奥·卡索、阿方索·雷耶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恩里克·冈萨雷斯·马丁内斯、马丁·路易斯·古斯曼、迭戈·里韦拉、赫苏斯·席尔瓦·埃尔佐格、以及多米尼加伟大的文学史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36]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作家们在革命时期尽其所能使自己得以生存。随后，许多青年作家毫不犹豫地拜倒在世界主义的先锋派旗帜之下。当时出现了集西班牙极端派、意大利未来派和模糊不清的革命理论于一身的尖锐派，这一充满创新力的流派的倡导者有曼努埃尔·马普莱斯·阿尔塞（1898—1981）、赫尔曼·利斯

---

[36] 见前引黑尔文。

特·阿苏维德（1898年出生）和危地马拉作家阿克莱斯·贝拉（1899—1977），他创作了《无人的咖啡馆》（1926）。接二连三走马灯似地出现了许多小型刊物，最显著的有《尤利西斯》*（1926—1928）和《当代人》（1928—1931），这些刊物在那个美学和政治普遍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沸腾时代把年轻的先锋派份子聚集为一些相对一致的群体。其中的作家包括：海梅·托雷斯·博德特（1902—1974），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以及重要的诗人和评论家；萨尔瓦多·诺沃（1904—1974），一位才华横溢、怪诞的诗人，他以在大量报纸和刊物上孜孜不倦地撰写社会和文学评论而著称，他也是一位报道体的革新者，一位诙谐地通过引进美国文化促进墨西哥文化现代化的人；希尔韦托·欧文·埃斯特拉达（1905—1952），《尤利西斯》的创办人，他是一位深谙乔伊斯、普鲁斯特、艾略特、庞德和欧洲现代主义其他"神圣的怪物们"的鉴赏家；豪尔赫·奎斯塔（1903—1942），以及两位杰出的诗人哈维尔·比利亚乌鲁蒂亚（1903—1950）和何塞·戈罗斯蒂萨（1901—1973）；以及《当代人》的主编贝尔纳多·奥尔蒂斯·德·蒙特利亚诺（1899—1949），他认为他有责任在革命后保持文学对墨西哥精神教育和文化智力的贡献，他创办的刊物是先锋派时期最深奥微妙、意趣横溢和富有创新的刊物之一。

512

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人物是何塞·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他曾于1919年任国立大学校长，1921年任教育部长，他是文化运动和壁画运动的推动者，创作了《宇宙人》（1925）、《印度斯坦研究》（1926）和《克里奥约人尤利西斯》（1935）；然而这位梅斯蒂索文化的倡导者在30年代极度转向反动的西班牙化。[37] 同时，萨穆埃尔·拉莫斯（1897—1959）创作的《墨西哥人与文化的特征》（1934）则成为后来所有对墨西哥化探索的起

---

* 这份杂志以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1882—1941）同名小说的标题命名。"尤利西斯"原是希腊神话中传说的英雄，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主人翁。——译者

[37] 见前引黑尔文。

点。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这位也许是拉美最完备的文人，当时在巴黎成为本国的代表人物，他是拉美、法国和西班牙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网中的一位中心人物，这种联系在随后的30年变得十分重要。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体作家和文化评论家之一的雷耶斯，他本人的文学创作尽管决不欠于优美雅致和敏锐智慧，却没有象他的杂文那样取得巨大反响。使人回想起墨西哥本身的《阿那瓦克的幻想》（1917）和《残忍的伊菲赫尼亚》（1924）大概是最令人难忘的。

古巴的悲惨命运先后造就了许多伟大的道德家和爱国者，最终涌现了"领路人"马蒂和"美洲的导师"恩里克·何塞·巴罗纳（1849—1933），他们在数十年间对古巴的民族生活和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道德和思想影响，他们1898年后对古巴教育的改革为培养出20世纪20年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开辟了道路，而西班牙殖民主义却被普拉特修正案和大棒政策所取代。20世纪前30年里，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对墨西哥、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等国先后或长或短地进行了入侵，20年代整个加勒比地区被置于美国资本和当地独裁者之间结成的邪恶同盟的控制下，路易斯·帕拉基斯塔因的《安的列斯群岛的痛苦》（1928）和古巴作家卡洛斯·洛韦拉（1882—1928）的《将军和博士》（1920）都对此作了谴责。古巴在20年代经历了极度的政治和文化骚动。阿亚·德拉托雷1923年从秘鲁抵达古巴，这鼓舞了以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1905—1929）为首的古巴学生建立何塞·马蒂人民大学，与此同时，马里亚诺·布鲁尔（1891—1956）也建立了以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无名社"，展开革新民族文化的运动。它的主要成员有豪尔赫·马尼亚奇（1898—1961）、何塞·塔列特（1893年出生）、胡安·马里内略（1898—1977）、雷蒙多·拉索（1904—1976）、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欧亨尼奥·弗洛里特（1903年出生）、埃米利奥·巴利亚加斯（1908—1954）和鲁文·马丁内斯·比列纳（1899

513

—1934)。尽管他们的思想各不相同，但是一致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使他们求同存异凝为一体，然而古巴严峻险恶的形势最终还是使他们之间产生了重大分裂。他们的主要刊物是《前进评论》(1927—1930)，一份具有全拉美特性的先锋派评论杂志，它可以与哥斯达黎加的华金·加西亚·蒙赫(1881—1958)编的《美洲文集》(1920—1958)相比美。美国的威胁在古巴激发了西语文化的复兴，贡戈拉地位的恢复也特别热烈，但是在20年代的文化中古巴黑人精神是主导线，从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突破性的民族学著作到塔列特的诗歌《伦巴》，巴利亚加斯的《黑孩子的催眠曲》，和以尼古拉斯·纪廉(1902年出生)的作品达到高峰，他创作的《松舞的动机》(1930)、《松戈罗·科松戈》(1931)和《西印度有限公司》(1934)是把黑人主题与具有西班牙色彩的格律(类似加西亚·洛尔卡的《吉卜赛谣曲》)相结合之写作风格的经典之作，并具有强烈的反帝精神。卡彭铁尔的第一部著名作品《埃古-扬巴-奥》(1933)也是对黑人文化的探索。除了纪廉，大多数"黑人"文学的作者是白人，包括波多黎各的路易斯·帕莱斯·马托斯(1898—1959)。

在秘鲁，知识与文化界同样十分活跃。秘鲁的先驱人物是冈萨雷斯·普拉达，以及难以划入任何流派的人物阿夫拉姆·巴尔德洛马尔(1888—1919)，后者是一位穆拉托人，自称为"莱莫斯伯爵"。巴尔德洛马尔塑造的人物以王尔德和邓南遮作品为蓝本，当秘鲁依依不舍地告别"高雅风流年代"的时候，他在1916年创办《科洛尼达》杂志指导和聚集了青年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公开谈论同性恋、可卡因、海洛因和革命，使利马敏感的资产阶级大为愤慨但却极大地吸引外省的知识分子。冈萨雷斯·普拉达的接班人是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1895—1980)和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4—1930)，传奇性的《阿毛塔》

* 阿毛塔(Amauta)，克丘亚语，指古印加帝国的智者和导师。1926年马里亚特吉创办的杂志即以此命名，他本人以后也被人尊称为"阿毛塔"。——译者

（1926—1930）杂志主编。马里亚特吉最初为一名科洛尼达分子，或文学唯美主义者，在访问欧洲期间决心投身政治，1923年接替阿亚成为《光明》杂志的编辑。阿亚于一年后建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普拉党）。1928年，马里亚特吉发表了《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这是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以及至今仍在争论的对秘鲁历史和文化的一个根本性阐述。《阿毛塔》最初在立场上接近阿普拉党，随后转向共产主义，但是一直发表来源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材料，并且，至今仍然是了解秘鲁有关民族主义、美洲主义、阿普拉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本土主义等悬而未决的争论的基础读物。[49] 太多数现代的知识分子都为该杂志撰稿，包括阿亚和马里亚特吉本人，以及：十分有影响的土著主义《安第斯风暴》（1927）的作者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1893年出生）；《五种韵律的诗篇》（1929）的作者卡洛斯·奥肯多·德·阿马特（1909—1936）；以《混血人群像》（1930）和城市小说《公爵》（1934）而著称的何塞·迪埃斯·坎塞科（1904—1949）；小说《纸板房》（1928）的作者马丁·阿丹（1908年出生）；秘鲁杰出的文学史学家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1900年出生）和土著派画家何塞·萨沃加尔与胡利娅·科德西多（1892年出生）。

与此同时，出生于北部山区的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正在欧洲创作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了他不断追求共产主义所遇到的艰难，而由于他童年时期所接触到的传统天主教提出的无法回答的精神问题，他的追求至死都没有结果。尽管受到现代派的影响，《黑色的使者》（1918）已经与从前所有的作品都不相同，而部分在狱中完成的《特里尔塞》（1922），对于他这种背景、甚至从未离开过秘鲁的人来说，是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无比成就。这些作品把超现实的形

[49] 见前引黑尔文。

象、印刷术和语言的革新、残缺和不全的句法、对生活现实的厌恶以及对未来团结的向往融为一体，列入了现代诗歌中最痛苦、最令人迷惑和最动人的作品行列。他对拉美随后的诗歌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1923年，他前往巴黎一去不复返，并访问了苏联和内战时期的西班牙。他去世后，《人类的诗篇》和关于西班牙内战争的伟大诗作才发表。1931年，他出版了《钨矿》，这是一部描写秘鲁矿山中遭受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掠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

在智利，最突出的文学和知识分子运动是造型艺术中的“帕尔纳斯山社”和文学界中的“十人派”。自传体小说《阿尔西诺》（1920）的作者佩德罗·普拉多（1886—1952）为“十人派”提供了市中心一所古老的殖民地时期住宅。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和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与这一团体也有联系。与现在一样，智利当时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在那个时代里涌现出雷卡瓦伦和亚历山德里*，1907至1918年间发生了海港和硝石工人罢工，以及诗人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1896—1920）的政治殉难。“十人派”实际上是试图阻止左倾的、客观主义潮流。奥古斯托·达马尔（1880—1950）和爱德华多·巴里奥斯等作家曾创作了早期的自然主义小说，但是当现实主义流派创作变得带有政治色彩时，例如华金·爱德华兹·贝略（1887—1968）创作的描写圣地亚哥流氓无产者的著名小说《贫民》（1920）所体现的那样，他们脱离了该运动。

515

智利在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许多西语美洲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杰出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也许是他那个时代拉美最重要的诗人，尽管评论家对他的卓越性和影响仍然存在分歧。他根据他1914年的宣言《反奴役》发展出一套“创造主义”

* 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Luis Emilio Recabarren，1876—1924），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12年成立）创始人；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Arturo Alessandri Palma，1868—1950），智利总统（1920—1924，1925，1932—1938）。——译者

理论，反对任何对艺术的反映论式的解释，他认为艺术不应该模仿现实而应该创造现实。与达里奥一样，他从圣地亚哥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1916），尔后又前往巴黎和马德里，一路上赢得了支持者和仿效者，尽管当时及此后他毫无顾忌的执拗令人不满，他的影响也不断遭到否认。他加入了阿波利奈尔的《北方一南方》杂志社，与勒韦尔迪、查拉和雅科布共事*。他大多数诗歌是以法文写的，包括第一部重要的诗集《方形的天际》（1917）。这部作品以其稀奇古怪的联想，别出心裁的形象，以及用诗歌表现现代性和当时正在飞速发展的新事物的惊人能力，而立即引人注目。《乘降落伞旅行》也许是他最伟大的成就，其中写道："这里躺着阿尔泰索，被天空高度击败的天鹰。 这里躺着比森特，一位反诗派诗人和男巫"。半小说半怪诞杂文体的杰作《勇士熙德》（1929）是献给美国影星道格拉斯·范朋克的，而卓别林则是另一位对象。维多夫罗对西班牙1921年后的极端派的影响，以及后来对巴西50年代的具体诗歌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历史影响的真正性质和程度仍然有待于阐明。

智利20年代另一位崭露头角的诗人是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他后来成为拉美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诗人。他1924年出版的《二十首情诗》就象他本人一样清新和富有青春活力，而且一直广受欢迎。1927年，他开始了在远东的6年生活，经历了似乎只有作诗才能平息的生存痛苦和持久的虚无主义。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接近于天生的超现实主义，是如此的具有直觉性，令读者感到正在目堵一个心灵演变的历程。1933年后在西班牙的经历使他产生了明确向政治人道主义诗歌发展的彻底转变，尽管在世界大萧条期间他仍然逗留在亚洲，却为欧洲殖民主义末期的黑暗年代异国生活的悲惨景象所惊呆。 516

* 前述4人均为法国诗人，其中，勒韦尔迪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驱，查拉曾在1916年时开始倡导"达达主义"。——译者

在安第斯山脉另一面的阿根廷，散文作家占据主导位置，而诗歌传统上就处于次要的地位。布宜诺斯艾利斯20年代正处于辉煌和历史发展前景的高峰，是那个时期艺术活动最丰富的中心之一，吸引了一批批国外著名人物，如奥尔特加-加塞特、凯泽林和沃尔多·弗兰克。阿根廷当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并不那么感到是帝国主义的牺牲品；其人民基本上是来自欧洲的，因此，其文化也基本上是欧洲式的；它似乎已经结束了前60年的考迪略和独裁者的时代；尽管表面上总是动荡不安和充满了争论，但是其文学发展自《法昆多》以来不象其他地方那样骤起剧变，而是更为循序渐进；它具有拉美大陆最有生气的活动天地，以及现成的大草原上高乔牧民中形成一致的民族神话。它以《国民报》和《新闻报》等大报为文化活动提供了大量赞助，拥有一系列读者广泛的文化评论刊物，如《我们》，以及繁荣的音乐会、展览会和歌剧演出活动。这里的民族文化似乎不需要寻求目标和探索，而是象美国一样，前途是明确的。

先进青年作家们合作出版了现在可以称为传奇性的两份刊物，《船头》(1922—1926年)和《马丁·菲耶罗》(1924—1927)，这些刊物的名称突出体现了两个典型的潮流：以先锋派、未来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其形式，以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为其内容。此外，还有公开采取社会现实主义态度的伯多派作家。许多作家曾先后采取所有这三种态度。《船头》的创办人之一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年出生），他作为一名极端派人物从欧洲返回阿根廷后参与了创刊活动，并参与了那个时期大部分的创新工作。他回国的重要性与埃切维利亚1825年的回国具有同样的意义。阿根廷当时的大文豪是卢戈内斯，而青年一代认为他不符合时代，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一场较量。年青的反对偶像崇拜者们的一位秘密导师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1874—1952）。他著作不多，但却抽烟，弹吉他和讲述哲理，象胡尔·索拉尔或西班牙的戈麦斯·德·拉·塞尔纳一样，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为

榜样影响青年同伴。他20年代发表的唯一重要作品是《睁着眼睛的并不都在守夜》（1928）。正如他的直接传人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他实际上是在咖啡馆生活方式大行其道时的一位“口头作家”。博尔赫斯也许是受到马塞多尼奥的荒诞不经的鼓舞而摒弃了自己在20年代狂热的活动，在30年代末和后来成为行为古怪的人。非常奇怪的是，尽管博尔赫斯的文学形式是实验性的，他20年代的作品基本上是地方主义的，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23）、《面前的月光》（1925）和《圣马丁的手册》（1929）。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放弃那种早期的手法，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虚构”小说和“调查报告”式杂文体的作者；但是甚至在20年代我们就看到了幻想与现实、几何图形与反句法结构的奇特混合写法，这使他成为本世纪拉美最有影响的作家。他的故作严肃，他对一本正经和经院风气的一本正经地摧毁，他对哲学严密的严密攻击，实际上是拉美抵挡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种策略，尽管博尔赫斯本人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无论怎样评价拉美文学从地方主义—世界主义的二极性演变为一种令人信服的世界性特性，他都是一位主要人物，没有他，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的新小说作家就不可能出现。他也是维多利亚·奥坎波（1890—1979）主编的文化杂志《南方》（1931—1970）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两位与《船头》和《马丁·菲耶罗》有联系的作家是奥利韦里奥·希龙多（1891—1965），一位爱开玩笑的、富有挑衅性作家，他的作品《在电车上阅读的廿首诗》（1922）和《贴花纸》（1925）兼有极端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另一位是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1900—1970），他后来成为一位天主教徒和庇隆主义者，创作了宏大的小说《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但在20年创作的却是先锋派的《鹰雏》（1922）、《时光似箭》（1926）和《男人与女人的颂歌》（1929）。

巴西现代主义的顶峰并没有象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随

着1922年2月在圣保罗举行的现代艺术周的7天而消失。但是这一事件确实造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化爆炸，其深度和广度只有同时期墨西哥的活动可以与之比拟。现代主义的先驱有达·库尼亚和洛巴托，他们是新的土著主义的先声，还有格拉萨·阿拉尼亚，他从国外返回巴西加以支持，当巴西文学院对新浪潮表示反对时，他1924年毅然退出文学院。当西语美洲通过它较早开展的现代主义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文化综合体时（尽管不是自然而然的，还有一些虚假的成分），巴西仍有待于完成这个任务。这次伟大的具有统一作用的现代艺术周的参加者有：马里奥·德·安德拉德（1893—1945）、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1890—1954），罗纳尔德·德·卡瓦略（1893—1935）、吉列尔梅·德·阿尔梅达（1890—1969）、梅诺蒂·德尔·皮克西亚（1892年出生）、塞尔吉奥·米列（1898—1966）、劳尔·博普（1898年出生）、曼努埃尔·班德拉（1886—1968）、里贝罗·科托（1898—1963）、画家迪·卡瓦尔坎蒂、马尔法蒂、阿马拉尔和泽加尔、雕塑家布雷谢雷特、作曲家维拉-洛博斯及其他许多人。现代艺术周在圣保罗举办决非偶然，因为它是巴西热带地区的纽约，是拉美最具有未来性的城市；这一事件着手探索和综合现代艺术，并同时探索和综合巴西。

518

就象在墨西哥一样，是造型艺术促使巴西开始领悟现代性的性质和意义。马尔法蒂于1917年举办的那次著名的画展和布雷谢雷特的雕塑在青年艺术家们还未耳闻过塞尚之前，将他们领入了立体派、未来派和表现主义的世界，这两位艺术家象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和曼努埃尔·班德拉一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从欧洲返回巴西，他们就象是从圣地刚刚归来的宗教朝圣者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大概马里奥·德·安德拉德也曾经这样说过。1922年时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已成为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与别人不一样，从未离开过巴西，因此更使人感到他才华出众。他以惊人的洞察力认识到巴西文化的实际情况和所该做

的事。当时没有哪个拉美思想家像这位卓越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音乐学家、民俗学家和以艺术为专业的反对偶像崇拜者那样具有远见；没有哪一位象他一样做出更大的贡献，使幽默成为适应于拉美艺术文化的基本成份，即使是象他说的，这往往象“在火山口上跳舞”。然而，尽管他经常承认现代主义更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运动；但是，他坚持认为，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所做出的精神反应，而这次大战却使他成为一位诗人。他最早的诗作是《一首诗里一滴血》（1917），接着发表了《充满幻觉的保利塞娅》（1922），后者是描写圣保罗的作品，受启发于维尔哈伦的《触手般扩展的城市》。在“不再要新流派”的口号下，他着手“拯救巴西，创造世界”。他的小说《马库奈伊玛》是现在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拉美第一个范例，这部小说是一种神秘的叙事体，同时又兼有史诗和幽默的素质。在作品中，这位巴西文化英雄马库奈依玛以自己的旅行和冒险将巴西不同时期和地方的各不相同的事件跨时空地串连在一起。这部早于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传说集》（1930）两年，早于卡彭铁尔更为谨慎的《埃古一扬巴一奥》（1933）五年的小说，是努力把欧洲先锋派形式和拉美原始主义内容相结合的范例，这种努力只有在20世纪20年代才有可能去实行，因为其先决条件是所有艺术形式的结合，并且首先依赖于一种经过培养而获得的那种意识，才有可能把地方主义的民间传说与普遍性的神话和人类学联系在一起。

519

巴西20年代是宣言大行其道的时期。马里奥为1922年现代艺术周之后在圣保罗出版的现代主义杂志《号角》创刊号撰写前言而开其先河。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对现代运动的巨大贡献比马里奥毫不逊色，在塔尔西拉·多·阿马拉尔的绘画的启发下，他于1924年发表了《巴西木宣言》，呼吁一种“通过自由的眼睛所观察到的”清新自发的艺术，它是以森林猴子般的敏捷创作的，而且象巴西木本身一样仅供出口。象马里奥一样，奥斯瓦

尔德敦促结束学院和流派，宣称电影是所有艺术中最有意义的，并且断言"所在的所有一切将在报纸上得到体现"。在塔尔西拉的绘画《食人者》的启发下，他于1928年发表了著名的《食同类者宣言》，除了那句"图皮还是非图皮*，这是一个问题"的名言外（这种对本土主义的轻浮态度当时在墨西哥或秘鲁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宣称这个新运动将吞食欧洲文化并永远把"禁忌转变为图腾"，这表明弗洛伊德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作用多么重要，自此时起拉美人已开始承认他们本土的"野蛮状态"。

当这对可怕的孪生儿（他们相互并没有联系）正把巴西文化转化为欧洲文化和把欧洲文化转化为巴西文化时（正如奥斯瓦尔德认为的是进出口业务），其他知识分子致力于围绕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轴心与地区间的对话，因为这一时期也正是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问题终于明确地浮现出来的时期。1926年，吉尔贝托·弗雷雷发表了他历史性的《地方主义宣言》并在1929年发表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涅恩加苏*绿黄宣言》，它的标题意味着巴西国旗的颜色。尽管马里奥·德·安德拉德认为这种运动是倒退的，但是他后来承认他和其他现代主义者归根到底是"弃权者"，因为政治恰恰是现代性的基础。与他们所想象的不同，他们与其说是新潮流的先锋，倒不如说是赶了旧潮流的末班车，是"一群垂死文明的孩子"。也许他对自己过于苛刻，作为真正反学院风的现代主义，首先真正把巴西和欧洲的各种形式和内容融为一体，在博学的与大众的文化之间进行了艺术对话，正如西语美洲的阿斯图里亚

---

* 图皮(Tupi)，指图皮人，是巴西境内分布最广的主要印第安土著民族。这里借喻本土主义。原文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著名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谐音，一语双关，有强调其关键性之意。——译者

* 涅恩加苏（Nheengaçu），指过去居住在亚马孙河口马拉若岛上的印第安土著民族涅恩盖巴人，骁勇善战，直到17世纪时仍多次抵抗了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译者

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巴列霍、聂鲁达和纪廉所做的那样。然而，与西语美洲大多数的作品相比，巴西的现代主义运动还更加流于仅仅是异国情调，有时候马里奥和奥斯瓦尔德、维拉-洛博斯和卡瓦尔坎蒂看起来象是富有同情心的开明外国人注视着他们的国家。

然而，对巴西诗歌和语言的影响是显著的。一切文学因袭都被剔除了：美，宁静与伤感被分离、暴力和直截了当所取代。最为坚决地反诗化的是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他的《巴西木》（1925）和《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诗歌习作第一卷》（1927）曾一度照例被评论家们所冷落，现在却是革命性的。象博尔赫斯、查拉、乔伊斯和列宁一样，曼努埃尔·班德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苏黎世度过的，他即使不是最典型的现代主义诗人，也是一直最普遍受到敬仰的。他的《狂欢节》（1919）以其既亲切又讽刺的情绪和态度于民族文化中领风气之先。到30年代，他变得越来越现实主义和反诗化。罗纳尔德·德·卡瓦略短暂的一生未来得及使他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1935年去世时，年仅42岁），但是他早期的作品《诗歌与十四行诗》（1919）、《讽刺与伤感小诗》（1922）和《献给美洲》（1926）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尊重。他比同时期其他巴西作家更加熟悉西语美洲。劳尔·博普（1898年出生）创作了极端原始主义的《诺拉托蛇》（1931）。这位出生于南里奥格兰德的作家在访问了亚马孙丛林后写下了这部作品。维拉一洛博斯已经在音乐中追寻求过地方性文化，而在马里奥电影式的小说和博普交响乐式的诗歌之后，巴西地方文化的体系在文学中现在也实际完成了。到1930年，巴西象整个拉美一样也已经置身于20世纪之内，而非其外。无论好坏，现代性已经实现了。

早期的电影

20世纪的头30年恰巧是电影的初创时期和无声电影的时代。

这种新艺术形式的诞生，使拉美有了在开头就参加进来的机会，拉美非常迅速地发展了繁荣的民族电影工业，并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观众群之一。1895年，吕米埃兄弟摄制的影片在巴黎首映后仅数月就出现在墨西哥城、哈瓦那、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墨西哥诗人路易斯·乌尔维纳尽管十分着魔，但却极为婉惜 521 这种新发明没有色彩和声音。1914年前的20年间，新闻纪录片不可避免占主要地位。这些影片反映欧洲和南美的各大首都和国家庆典的场面，这在初创时期是十分典型的。拉美的某些历史镜头，如西班牙美国战争或者马德罗抵达墨西哥城的模糊镜头，都是学习电影的学生十分熟悉的电影初创时期的情景。最早的例子是一部瓜那巴拉湾简短镜头的影片，它是非常恰当地在法国邮轮《巴西号》1898年7月驶入里约热内卢时在该船甲板上拍摄的。的确，是法国与拉美早期生产和发行有着最紧密的联系。1914年以前，拉美市场的外国影片主要由帕泰公司发行的，它在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哈瓦那都设有分公司。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欧洲制片商的努力。1914年以后，美国逐渐控制了拉美市场的95%，这对拉美文化发展产生了长远影响。

在战前各主要拉美国家已开始拍摄应时的故事片。在墨西哥，最早拍摄原始的故事片的是萨尔瓦多·托斯卡诺·巴拉甘（1872—1947）。1898年，他第一个拍摄了后来一再被搬上银幕的19世纪浪漫故事《浪荡公子唐璜》。1908年，费利佩·德·赫苏斯·阿罗拍摄了第一部墨西哥剧本的故事片《多洛雷斯的呼声》，1910年拍摄了第二部，《夸乌特莫克的苦难》。同样，阿根廷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是一个19世纪的历史题材《枪决多雷戈》（1908），它是由意大利人马克斯·加洛导演的。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加洛原本是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歌剧的。1915年，两部有关罗萨时期影片的上映在阿根廷首都引起了强烈的争议，一部是好莱坞的《阿尔瓦莱斯上尉还是罗萨斯暴政》，它荒唐地

歪曲历史，说美国大使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另一部是马克斯·格卢克斯曼拍摄的《马里亚诺·莫雷诺和五月革命》。这两部同时出现的影片引起了拉美对"好莱坞"版的南美国家历史提出抗议，而这仅仅是早期这类抗议事件之一。这两部影片的片名表明电影仍然深深地陷于浪漫主义戏剧的陈规陋习，而这种戏剧观念本身至少已过时70年了。不用说，对情节剧的追求更因电影缺乏声音而更加突出，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技术上的局限具有风格上的和题材方面的意义，总的说来它促进了异国情调题材的流行，特别是涉及到"拉丁"激情的题材。阿道弗·乌尔苏亚·罗萨斯拍摄了智利第一部故事片《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1910)。巴西的第一部真正的故事片具有社会学性的特点而非历史性的。《阿纳斯塔西奥先生旅行记》(1908)描写一位乡下佬第一次到里约热内卢。几年以后，在阿根廷由马丁内斯-贡切·夏拍摄另一部农村题材的影片《崇高的高乔牧民》(1916)取得了阿根廷在那个时期电影上最大的成功。在智利，拉美的第一位女性制片人加夫列拉·布塞尼乌斯拍摄了《阿劳科的痛苦》(1917)，一部表现无情的资本家剥削印第安人的影片。1908年，在《阿纳斯塔西奥先生旅行记》发行的同年，在巴西还拍摄了《扼杀犯》，这是那个时期众多的模仿美国风格描写"富有刺激的"犯罪活动的影片的第一部。巴西最主要的制片人是博特略兄弟。1916年，阿根廷的萨尔瓦多·詹巴斯蒂安尼在智利拍摄了引起争议的影片《死亡的游戏》，该片表现当地社会的一起凶杀案，而1919年，墨西哥伟大的创业者恩里克·罗萨斯和阿尔瓦兄弟拍摄了《灰色汽车团伙》，它被公认为无声电影时期墨西哥拍摄的优秀盗匪影片。

巴西这一时期的电影也许是最有意味的，因为在那儿最有生气的土生土长的电影得到了发展。在巴西，人们还可以最清楚地看到电影如何乐于以最浓缩的时间方式再现民族独立以后时期小说的历史发展。确实，巴西的许多早期影片实际是改编的小说，特别是陶奈的《因诺森西娅》(1914) 和阿伦卡尔的《青年寡妇》

522

(1914),《伊拉塞玛》(1917)、《乌比拉雅拉》(1919)等这些备受欢迎的浪漫主义小说，都被路易斯·德·巴罗斯搬上了银幕。阿伦卡尔最著名的《瓜拉尼人》1920年被安东尼奥·博特略拍成电影。随后，根据自然主义作品，如阿泽韦多的《穆拉托》等改编的影片也得到了拍摄，接着，类似的社会戏剧，如《复活的例证》(1919)、《邪恶》(1921)、《他人之罪》(1922)和杰作《生活碎片》(1929)都被意大利移民吉尔贝托·罗西和他的合伙人若泽·梅迪纳拍成电影。然而，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巴西电影制作人、来自米纳斯吉拉斯的温贝托·毛罗，就象波尔蒂纳里、林斯·多·雷戈或维拉-洛博斯(曾与他合作创作《巴西之发现》)一样，是那个时代巴西的伟大艺术大师之一和巴西电影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先驱。他导演了许多影片，从表现米纳斯吉拉斯匪帮的 523 《洪流》(1925)、《失去的财宝》(1927)和《矿工血泪》(1933)到他的杰作、无声电影的经典《原矿》(1933)，这部影片杰出地综合了表现主义、抒情浪漫主义和纪录写实主义技法，与格拉西里亚诺·拉穆斯后来的小说《苦楚》(1936)相似。1934年，毛罗拍摄了更为感伤的《我情人的陋居》，此后就象同时代其他巴西和墨西哥艺术家们一样，由于萦身于行政事务而无所建树。这一时期其他著名的电影有阿达尔贝托·凯梅尼和罗多尔福·勒斯蒂格拍摄的《圣保罗，都市交响曲》(1929)和马里奥·佩绍托拍摄的、现在可以称为传奇性的先锋派影片《限度》，一部表现限制人类自由的环境的影片，可以与《一只安达露西亚狗》相比美。

恰恰是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生产和放映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成立于1919年的艺术家联合公司在拉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推销渗透。[39] 电影所到之处，贸易随之即来，而其他东西也接踵而

[39] 见G·S·德·乌萨贝尔著《美国电影在拉丁美洲的盛行》(安阿伯，1982)更为全面的分析。

至。电影杂志大量出现，周末特刊充斥着好莱坞明星的消息和照片。随着拉美文化的美国化和对拉美现实的粉饰浮夸迅速发展，说唱剧和斗牛等西班牙文化形式突然变得过时并衰落下去。示范效应开始搅得甚至最小的城镇不得安宁，据说，首先是模仿从美国电影上看来的犯罪和性习俗。

这种影响没有哪个地方象在墨西哥那样突出，也更引起反感。在革命时期，1910年以前的历史影片戏剧传统继续发展。1914年，一部表现萨帕塔战士的重要纪录片《亲如兄弟》广为放映，1916年，一家尤卡坦公司拍摄了《1810年和墨西哥解放者们》，墨西哥的第一部大型影片。象在巴西一样，许多受欢迎的19世纪小说被拍成电影，例如仅1918年，浪漫主义经典作品《玛丽亚》和《塔瓦雷》，以及自然主义小说《圣女》都被拍成电影，到30年代末，墨西哥的许多最著名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剧本。但是在20年代初，当墨西哥每年大概生产10部影片的时候，好莱坞每年拍摄的500部影片正充斥着国际市场，并且极为碰巧地和更为污辱性地照例把墨西哥人描画为“下等人”，或者是危险的、难以控制的狂热革命分子。（当发明了有声电影后，又增加了伤害性污辱，墨西哥角色操着马德里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口音讲话。）恰恰在这个时候，面对着这种外界表现形象的影响，一种同样被丑化的墨西哥人的自我形象开始形成。20年代的墨西哥政府尽管对污辱性影片经常采取审查制度和没收手段，但并没有象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那样认识到电影的政治潜力。那个时代的主要制片人实际上是相当不易激动的米格尔·孔特雷拉斯·托雷斯，他曾在部队服役，并确实认识到以革命传奇故事为基础建立新历史传统的重要性。他为此拍摄的影片有《排长的梦想》（1922）、《阿兹特克族的后代》（1922）、《种族的光芒》（1922）、《热带灵魂》（1923）、或《返祖》（1923）。所有这些影片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富有追求团结的激情，这预示了墨西哥30年代伟大的民族主义电影。其他主要的制片人有豪尔赫和卡洛斯·斯托尔，他们自

524

1925年以《第欧根尼的地界》开始，拍摄了一系列影片。甘博亚的《圣女》在1918年已被拍成电影，而在1931年成为第一部有声电影，卢皮塔·托瓦尔在片中扮演沦为城市妓女的乡村姑娘。这部影片成为墨西哥的一部神话。与此同时，墨西哥演员如安东尼奥·莫雷诺、拉蒙·诺瓦罗以及首先是多洛雷斯·德尔·里奥开始在瓦伦蒂诺和《佐罗》时代在好莱坞影片中扮演令人激动的角色。与此相应的是，艾森斯坦于1930年抵达墨西哥开始拍摄《墨西哥万岁！》。他极其神圣和极其细致的"表现现实主义"风格对墨西哥电影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种风格被绰号叫做"印第安人"埃米利奥的费尔南德斯和他的合作者、杰出的摄影师加夫列尔·菲格罗亚等民众主义制片人借用来在一系列纪念碑式的影片中表现突出的"民族性"。[40]

象巴西一样，墨西哥在1933年开始找到自己明确的民族风格。阿尔卡迪·博伊特勒根据莫泊桑一篇小说改编，而且在许多方面与毛罗的《矿》相似的《港口女子》是墨西哥第一部真正杰出的电影作品。然而，从历史上说更为重要的是同年发行的《教父门多萨》，这部由费尔南多·德·富恩特斯拍摄的影片对土地占有者阶级如何设法在革命中生存下来和建立新的联盟作了敏锐的讽刺，表达了一种与小说家马丁·路易斯·古斯曼有所类似的观点，并包含了对革命后秩序的批评。由于已达到富有特点的精湛水平，墨西哥政府受到鼓舞，开始资助这种新风格的电影。1934年，津内曼的《雷德斯》和纳瓦罗的《哈尼齐奥岛》这两部按剧本拍摄的小说化纪录片得到教育部的资助，查弗斯和雷韦尔塔斯为影片配乐，电影技法本身是艾森斯坦，默瑙和弗莱厄蒂的混合体，埃米利奥·费尔南德斯在片中扮演角色。1935年，卡德纳斯政府资助了费尔南多·德·富恩特斯本人，他拍摄了严肃的、幻

---

[40] 见J·阿亚拉·布兰科著《墨西哥电影的奇遇》(第3版，墨西哥，1985)第34—42页。

灭的而又有含蓄谴责性的《我们跟着潘乔·比利亚》。矛盾而又凑巧的是，他随后又在1936年拍摄了著名的《格兰德牧场》，美国人最喜欢的墨西哥演员蒂托·吉萨尔扮演主角。这部影片画面绚丽、情节夸张和豪放不羁，但却为许多民族主义矛盾提供了解决办法，并成为后来许多实质上是保守的牧场喜剧的典范：把墨西哥人表现为能歌善舞的形象以促进旅游事业，开创了一种既为了吸引外国游客也为了向拉美其他国家出口的新型拉丁电影。

结　　论

作一回顾，可以清楚地发现作为先锋派和现代艺术时代的20年代和30年代初，与其说是开端不如说是结束，这不仅仅是对拉美而言。尽管这个时期的艺术创作既震动了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也震动了普通人（其本身就是一个“现代”现象），似乎使他们面临某种崭新的甚至令人可畏的陌生事物，但它确实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发展的高潮时刻。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现代性不是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不言而喻地可能永久持续下去（“就是它了”，“我们到达了”）——而是前一个阶段的结束，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高潮，一个尾声。从那个时刻起，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或者该对此说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会创造了后现代这类词，也许就是要表明目前想象力消失的感觉，或者不如说要表明承认一个幻想的感觉。

在30年代，继大萧条之后，当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突起向共产主义挑战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时，先锋派本身迅速失去势头，并让位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客观主义、纪录性和社会学性）占统治地位的运动。结果，在西班牙语美洲30年代出现的唯一普遍得到承认的历史性叙事作品例证是伊卡萨的《瓦西蓬戈》。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而并非诗的时代。

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期间（然而到1930年时最为激

526
烈)，拉美文化变得比以前更为复杂同时又更具有凝聚力。恰恰是在拉美大陆的邻居美国取得经济、文化和最终是政治霸权的时刻，拉美主要的艺术家和大城市终于赶上了欧洲的潮流、方式和规范。拉美步入现代之时便成为“美洲式的”，但是它的新美洲特性是一种全大陆式的，这种特性同时将拉美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然而又吸收了使新民族文化与美国的模式相结合的概念。矛盾的是，在这种意义上拉美比欧洲大国更早地成为真正现代的，而同时当然又仍然是极为不发达的。由这种历史矛盾所决定的戏剧性压力和反差开始赋予拉美艺术家们（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如此难以看清他们自己国家的现实）一种同时兼有世界性的、大陆性的和民族的眼光，此后即成为拉美艺术的特点。画家如里韦拉、托雷斯·加西亚或波尔蒂纳里、音乐家如查韦斯和维拉-洛博斯、建筑家如科斯塔、尼迈耶和比利亚努埃瓦、小说家和诗人如巴列霍、维多夫罗、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博尔赫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和聂鲁达，可以在大众文化的时代，利用现代城市与“传统的”——节奏缓慢的——农村之间和他们自己的美洲现实和欧洲模式之间富有活力的关系，发展与本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并驾齐驱的独特形式的艺术。

第 12 章

1830—1930年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

导言：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教会

独立以后拉丁美洲的教会仍带有昔日伊比利亚和殖民地时代教会的特征。拉美教会继承了西班牙天主教徒强烈的信仰传统、基本的教义知识和持久的虔诚性。仪式本身就是传播知识的媒介，人们通过做弥撒，读启应祷文和念珠祈祷即学习了天主教教义、圣经和玄义。葡萄牙也传播了正统的天主教信条，但不那么强调教义知识，举行仪式也不太隆重。拉美各地的宗教是人民的宗教，天主教会继续得到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和其他民众阶层的拥护和尊敬。统治集团并不那么虔诚，19世纪时天主教教会主要担心的，是上层分子的背教，而不是群众的背教。伊比利亚的宗教传统主张建立一个享有特权、由国家控制的教会。然而，获得独立之后的新国家则认为教会的财富、影响力及各种特权是不忠于政府的对抗中心，是有可能取代政府的一种权力并且是岁收的一个来源。国家控制的威胁以新的形式出现。教会必须指望它本身的资金，而在19世纪初叶这些资金在逐渐减少。

拉美国家获得独立使教会受到巨大震动。许多人认为，独立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整个世界的崩溃，是理性战胜信仰。如果伊比利亚的权力被解除了，天主教会还能够幸存吗？独立揭露了

教会的殖民地根源，揭示了教会发端于外国。独立还使教会发生分裂。有些教士是保皇派，但也有许多是共和派，少数是造反派，而且，一旦最后一战赢得胜利时，大部分教士在鼓励群众支持建立新秩序方面是有影响力的。教会统治集团并未因独立而分裂，但教会统治集团的统一却不足以成为力量的源泉。少数主教接受了革命，大多数主教反对革命，仍然忠于王室。从宗教角度上说，他们可能有道理，但他们不能隐瞒这一事实，即他们是西班牙人，同西班牙人有认同感。事实上，他们背弃了美洲教会。他们没有从罗马获得什么指导。在西班牙和圣神同盟的压力下，教皇拒不承认拉丁美洲的独立。这是一个政治错误，是凡人判断而不是教义的产物。但这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而且当独立已成为不可变更的事实以及填补空缺教区的需要迫使教皇从1835年起承认拉美新的政府时，这一错误已造成了重大损失。①

19世纪，天主教会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移至罗马，由伊比利亚宗教变成了世界性宗教。尽管这防止了各国自立教会的出现，但并未消除各国对教会实行控制的威胁。当时各国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享有“神职人选推荐权”(Patronato,在巴西称Padroado)，即过去王室享有的举荐有俸神职人选的权利，而且将这一权利置于自由派和不可知论的从政者手中。这个问题已争执多年。在墨西哥，经过旷日持久的相持不下的辩论后，这个问题在1835年后就平静下来，可是政府继续坚持它的要求。在阿根廷，19世纪20年代，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几乎建立了国家对教会人员和财产的完全控制。这一传统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继续下去并传给后几届政府。世俗国家只是逐步地开始认识到坚持“神职人选推荐权”是不合乎时宜的，并通过教会和国家分离的办法使这个问题就此结束。

① 有关天主教会与拉美独立问题的简短探讨，见贝瑟尔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第1部分撰写的简论。有关独立后西语美洲的教会情况，散见萨福德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3卷撰写的第9章。

1820年之后的年代，自独立以来教会的一些基本结构遭到削弱的情况已变得很清楚了。许多主教擅离主教辖区并返回西班牙。其他主教被驱逐出教会，还有一些主教死亡，而并没有人顶替。空缺的主教辖区由罗马和自由派政府共同负责。罗马在承认问题上故意拖延，自由派政府往往只会接受它们自己提名的人选，或者什么都不接受。在墨西哥，1829年4月普埃布拉主教去世之后，没有一名长驻主教留在那里。1822至1840年间，墨西哥大主教辖区空缺。洪都拉斯有43年没有一名长驻主教。独立年代 529 的玻利维亚不曾有一名主教，而不得不依赖遥远的秘鲁，而秘鲁当时在库斯科和阿雷基帕也只有2名主教。鉴于教会统治集团已经离去，没有留下任何人为教会辩护了。没有主教，意味着主教辖区失去讲道权威，意味着缺乏治理以及授圣职礼和坚信礼的衰落。主教的短缺必然伴之以教士和修士的短缺。到1830年，由于处决起义者，驱逐西班牙教士和当地教士的逐渐减少，墨西哥教士的总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许多教区没有人管，不再举行弥撒和圣礼了，布道和讲教义的活动中止了。在玻利维亚，在独立年代有80个教区空缺着。在委内瑞拉，1837年教士人数比1810年少200人。

天主教会的经济资产也在缩减。在争取独立的战争年代教区什一税减少了，在独立后的年代就不再征收了，例如，阿根廷在1821，秘鲁在1856年，已经停止。1833—1834年，墨西哥自由派政府终止了政府对征收教区什一税的认可*，试图限制教会社团的财政独立性。新的统治者，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一样觊觎教会的财产和收入，而未必是将它们作为福利或开发的再投资，而是将它们视为国家的合法岁收。新的统治者不仅想要获得主教辖区的财产，还想获取教团的财产，它们当时在阿根廷（1824）、玻利维亚（1826）和尼加拉瓜（1830）受到了侵占。这些措施使19世纪教

* 这里指将缴纳什一税的义务改为自愿奉献。——译者

会财产开始逐步受到侵蚀，欠教会的借款和年金也被勾销。主教、教士和宗教组织的收入不是依靠教会的独立收入，而是依靠信徒的捐献或国家的津贴。

但是教会还是生存下来了。教会的传道活动虽然有气无力，但受到保护；教会的财产虽然减少了，但还有不少不动产；教会的机构虽未满员，但未受触动。教会并没有衰落，如果说，教会一时受到削弱，那么政府就更虚弱了。这是自相矛盾的，是个费解的问题。独立后的年代，教会比政府更稳定，更孚众望而且显然更为富有。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力图控制教会，并向教会征税，以便恢复平衡使自己取得优势。从1830至1850年，西班牙美洲在经过一段比较保守的政府执政时期以后，出现了自由派的政府。这预兆着与昔日和教会将实行更根本的决裂。自由化政策所依据的原则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个人从昔日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从总体的约束和特权中解放出来，拉丁美洲新国家才能取得进步。(教会的特权是随不动产和年金收入的财富而来)。这些财富使教会获得了政治权力，使经济停滞，防碍了社会变革。因此，教会被认为是政府的劲敌，而作为主权中心的政府应当完全隶属于国家。这些论断未必正确，但却是当时自由派的想法。比如说，在墨西哥，19世纪中叶典型的自由派，是上升的年轻自由职业者。他们认为教会不仅是国家建设的主要障碍，而且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抱负的主要障碍。

530

因此，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教会遭到它过去从未经历过的特定社会集团的敌视。在1850—1880年这个时期，拉美教会破天荒地遇到了怀有天生破坏信念仇视教会的敌人。的确，并非所有的自由派都同意这一信念。有些自由派只是设法改革国家，为所有的人制定法规，并使经济现代化。这些目标未必都威胁到宗教。但是，更激进的自由派的企图则不仅限于建立适当的国家自主，他们主张对教会的财富，特权和体制进行全面攻击。因为他们认为，不破坏教会的权力及其信条，则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因

此，19世纪的世俗化采取了各种形式并引起多方面反应，有些反应是很强烈的。挑起的争论是关于主教任命权，财产所有权，对宗教的法律和政治制裁以及教育问题。而且，世俗论在上层分子或立志要成为上层分子的人们当中拥有社会基础。看起来群众更喜爱他们的古老信仰。

教会作出反应，尽可能到处寻找盟友。在整个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政治思想在19世纪中期变得更加保守。教会人士与文职的保守派结成联盟，他们认为需要在政治上捍卫宗教。而天主教 531 教义是保守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天主教教义认为，人的所谓非理性产生了建立由教会支持的强大政府和实行宗教制裁的必要性。保守的政治哲学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一种利害关系和意识形态。保守分子认为，如果没有宗教的束缚，人们就会骚动，变得无法无天。保护宗教不是基于宗教的真理，而是基于宗教的社会效用。这一联盟对教会是有害的，因为，自由派和进步人士认为，这一联盟使教会置身于阻碍变革的利益集团之中，而且同它的倒行逆施的盟友们沆瀣一气。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教会逐步地摆脱特权和遭受迫害的年代，使自己适应于世俗国家，并开始一个独立发展的进程。它采取了革新教会体制和资源，增加教士人数和改进教士培训工作以及要求在俗人员作出更多参与的形式。内部改革运动可以追溯到大约1870年，持续到1930年和1930年以后。宗教复新之后，社会觉悟有了提高，因为移民和经济增长给教会提出了新的问题，并迫使教会走出它的小天地。面向社会的天主教并不是完全与教会改革运动同时出现的，而是有一段过程的，在这段过程中，传统看法仍旧存在，教会的宗教传道与保守主义思想形影不离。但是，从大约1890年起，在许多国家，可以观察到天主教会采取的面向社会的行动，到1930年，教会已开始更加明确地大声谈论资本的职责，劳工权利和国家的任务。

教士、高级教士和人民

天主教会的结构部分地反映了世俗社会的结构。主教和高级教士同地主、官员和商人一起，是属于上层人物。许多下层教士则属于穷苦人民而不是富人，但是一旦步入教会和社会，他们就承认教会和社会，设法予以改进而不是改造。教会内并没有阶级斗争；教会既是一个宗教团体，也是一个社会团体，它包含各种见解和利益集团，但它最终仍然团结在它的领导人周围。教士的传统收入来自于捐赠的基金（Capella ias），来自作弥撒、洗礼、婚丧的费用，以及教区什一税和初次收获税。什一税的降低和取消使教会的收入减少，教士就更加依靠作弥撒等服务费用，也许更热衷于从事他们经济领域中的工作。但是上层教士和下层教士之间，在城市富裕的教区和农村贫穷的教区之间，收入严重不均。在农村社会，教士往往是一些没有多大指望继承土地而把教会作为另一条就业出路的年轻子弟。这为招募教士积蓄了后备力量，是教会的一笔资产，虽然教会本身并未提供良好的职业，也保证不了教士们信守他们的誓言。

秘鲁刚独立时，全国人口约为200万人，其中教士约3,000人，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比率，但后来这一比率不断下降。大部分秘鲁教士出身中等阶层，通常来自自由职业者家庭，并同学院或大学里的其他上层分子一起接受教育。有些教士上神学院读神学，如利马的圣托里维奥神学院，阿雷基帕的圣赫罗尼莫神学院，或特鲁希略的神学院，而其他教士则去利马的圣卡洛斯大学，还有许多教士根本未接受神学院的教育。这一制度培养了一支松懈的，有点世俗思想的教士，他们的性格进一步受到当时的教士习俗的影响。许多教士不驻在他们的教区，而是任命一名代理教士，付给他一部分教区收入，但其任职资格通常未经审定。此外，独身生活经常受到忽视。在利马有许多教士与妇女同居；

在山区，与妇女同居的教士则可能更多。这一做法已为社会所认可，但不为教会当局所承认。可是秘鲁教会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独特的，这大概在19世纪前半叶未曾实行宗教改革的教会中是典型的。这就是1869—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上拉美主教如此关注提高教士标准的原因之所在。秘鲁主教曼努埃尔·特奥多罗·德尔·巴列指出，那些脱去黑袍法衣的教士“是为了进入商业界或更容易地抛头露面和逛妓院”。② 教士制度改革早就该实行了，但必须等待下一代人作出努力。同时，在秘鲁获得神职人员职务的人大大减少了。到19世纪中期，新加入教士行列的极其罕见。教士人数下降的原因不是经济方面的，因为教团的基金很充足，而是因为缺乏投身宗教的高度事业心，当时，教区拥有足够的世俗教士，教团不再拥有印第安人教区或边疆传道区。

在墨西哥，统计数字说明教会更加有力地生存和成长的过程。教士人数在独立时期有所减少，此后，在整个19世纪，其人数仍大体保持不变。1826年有3,463名教士，1851年有3,232名教士，1895年有3,576名教士，1910年有4,533名教士。如果设想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人数同居民人数几乎同步增长的话，这就意味着1895年（总人口为1260万）每一万个居民中有教士不足 3 人，在1910年（总人口为1510万）则每一万居民中有教士 3 人以上。教堂的数目从1895年的9,580座增加到1900年的12,225座和 1910 年的12,413座。同一时期，为教士提供的培训工作也有了发展。教区神学院从1826年的9所增加到1851年的10所和1910年的29所。墨西哥城的教士会议神学院于1896年被提升为教廷大学，有权授予神学、教会法和哲学等学科的学位。1907年，昔日的帕拉福克斯神学院发展成为天主教大学，设有神学、哲学、教会法和民法、医学和工程等学科。这些变化是1880—1910年这个时期所特有

② 引自C·J·贝尔尼著《1869—1870年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的拉丁美洲主教》，载《美洲》杂志25/1（1968）第273页。

的，经过一个时期的冲突和收缩之后，那些年是墨西哥教会成长和更新的年代。

除了列举的统计资料外，教会的生活素质和教士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在独立后的头几十年，墨西哥教士象秘鲁教士一样，成为被诽谤的对象而不是圣洁的来源。1850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委任米却肯州主教改革教士制度，特别是修道士制度。在从1860—1910年的50年时间里，可以观察到改革和恢复福音宣讲的过程。在墨西哥农村，在米却肯州、瓜纳华托州和哈利斯科州，这种更生现象最为强烈。正是在这些地方，新教士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典型的墨西哥教士是农村教士，但由于16世纪特拉特尔科科学院的失败教训，这些教士通常不是从印第安人居住区招募来的。大部分教士来自中等阶层，在兴旺的牧场区和店铺老板家庭中，可以找到许多从事教士职业的人。这些教士是当地教区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他们在神学院学习了拉丁文、经院哲学和神学，他们被灌输了严格的道德价值观和对自由主义的深刻敌意。他们以其新的神学理想开始了教士的工作，勉励其教区居民正常地参加弥撒和圣礼*，组织教义问答班，鼓励参加四旬斋仪典，当地人民被反复灌输“深刻的原罪感、高度的羞耻感和防止婚外性交”。③新教士在已经很牢固的宗教基础上树立了更加强烈的天主教思想，而且他们成为墨西哥农村精神和道德更新的领导者。534 教士生活在农民和乡村贫苦人中间。在许多地方，教士是农民和贫苦人生活的中心，是弥撒和圣礼的主持者，是信息的来源和传播农村文化的媒介。

墨西哥教团经历了其余教会的盛衰变迁——独立之后的衰退，19世纪中期反教权活动和最终的更新。1851年，墨西哥只有

---

* 圣礼（Sacraments），一译“圣事”，在天主教指洗礼、坚振、告解、圣体（圣餐）、终傅、神品和婚配七件事。——译者

③ 路易斯·冈萨雷斯著《不稳定的人民：圣何塞·德·格拉西亚简史》（墨西哥，1968）第164页。

8个教团。到1910年增加到18个。在较老的教团中，以耶稣会最为有生气，从遭受迫害以来恢复得最快。1910年，耶稣会拥有338个会员，13座教堂，14个供中等阶层新会员学习的学院和30所供贫穷儿童读书的学校；此外，耶稣会还从事一些传道活动。妇女教团也在发展，从1851年的9个增加到1910年的23个。这一增长主要归因于19世纪新城市教学教团的出现，如果没有这些教团，墨西哥教会就不可能保持它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例如，1900年耶稣会拥有30所小学校，主母会拥有35所小学校；而工人阶级子弟职业学校的发展几乎完全归功于教学教团。

在墨西哥和秘鲁，独立之后的教会继承了它后来可以赖以建立的独特的基础结构。另一方面，在阿根廷，教会没有什么发展，教士危机也相应严重一些。在独立年代，标准开始下降，当时主教辖区，如1812—183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810—1831年科尔多瓦，1812—1860年萨尔塔的主教辖区都空缺着。在西班牙教士大批离去之后，有一个时期教会必须依赖于地方上低质量的新教士。当时神学培训工作几乎取消了。这个受到削弱的教会充当罗萨斯政府心甘情愿的牺牲品，很快沦为一伙唯命是从的职员和宣传员。罗萨斯之后，教会的地位继续下降。186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庞大教区只有35名世俗教士，这些教士所受的神学培训、灵感形成（且不提普通教育）是和当时的要求不相称的。由于西班牙爆发了共和革命，1868—1874年间大约有200名西班牙教士移居阿根廷，但是阿根廷最需要的还是本地教士。阿根廷在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并没有一个“全国性”教士层。教会在结构、道德和成长上落后于国家。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领域，教会甚至销声匿迹。诸如弥撒、布道和圣礼这些基本服务，在许多城镇中心十分缺乏，在乡村地区几乎不存在。教会虽然长期受到忽视，老百姓还是笃信宗教，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外的地方。由于对宗教的无知和冷漠态度迅速遍及整个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危机迹象，特别是在受过教育的上层集团当中。这就是随后

535

一百年对宗教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

教会以国家为榜样，及时地开始了本身的现代化。大约从1860年起，建立了一些新的神学院，得到政府一些支持。186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学院只有42名学生，1872年则有45名学生，他们当中并不都是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1873年有6名学生获得神职，当时这个数字是异常高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12个教区以及其余的主教辖区（当时包括沿岸地区和巴塔哥尼亚高原）的54个教区，1880年仅有84名教士。萨尔塔主教辖区统辖整个西北地区，则教士更嫌不足。但是成效慢慢开始显示出来。1880—1914年教士人数有所增加（因为人口本身也有了增加），这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教士会议神学院。1874年耶稣会接管了教士会议神学院。更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教团有了增长，在接近19世纪末时，许多宗教教团第一次从欧洲和美国进入阿根廷，其中有受难会（1883）、赎罪派（1883）、圣父会（1894）、卡普秦修会（1897）、基督兄弟会（1889）和马利亚会（1903）。还有各种妇女教团，其中有圣心修女会（1880）、圣者联合会（1883）、基督姊妹会（1885）、马利亚辅助会（1887）和儿童基督之女（1893）。许多这些教团不仅致力于默祷生活，而且还从事福利和教育事业，它们帮助填补保守的共和国在社会供应方面的空白。

1880—1914年间，在一个大规模移民和经济增长的年代里，天主教教义在阿根廷经历了重大发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00年有19个教区，而1857年仅有7个。农村也实现了基督教化。何塞·加夫列尔·布罗切罗是个高尚的农村教士，是传统的克里奥尔神父。他在科尔多瓦附近的山上建造了教堂、小教堂和学校，而且在整个科尔多瓦省传授了圣灵修行的做法。据报道，做弥撒的人不断增加，甚至在男性中也是如此。1901年，在卢汉*有5,000

536

*卢汉（Luján），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中北部城市，濒临卢汉河。盛传圣母尝停驻于此。每年5月21日圣体圣事吸引大批朝圣者。——译者

男人名参加了每年举行的朝圣。

巴西的教会也经历了拉美其他地区特有的发展。在巴西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旧政权留下的教士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政府对教会的权力是从殖民地政权继承下来的，而且从1822—1889年受到巴西君主制的严密保护。政府的这种权力豢养了一批"政治教士"。他们据有的高位应归功于政客们，实际上他们成为政府的仆从和社会寄生虫。这类教士对罗马教皇往往是敌视的，鼓吹时兴的自由主义和詹森主义*，充当上层人物的仆从，而且也并不总是忠于他们自己的誓言。在巴西帝国统治期间，大约仅有700名世俗教士，他们几乎全是在国家控制的神学院受的教育，他们为1,400万人民主持圣事。至于教团，它们实际上被一个敌视默祷生活思想的政府所镇压；1855年司法部长若泽·托马斯·纳布科·德·阿劳若在一份通报中，明令禁止新信徒进入教团，并以最终取缔相威胁。君主制的衰落和崩溃，给予了教会以摆脱直接政治影响和指望它本身实行更新的机会。建立了主教辖区，成立了神学院，一支新的更富有献身精神的教士阶级出现了，他们热衷于天主教教义，效忠于主教和罗马教皇，他们的信仰和道德是正统的。

信徒们依靠教士来做弥撒和圣礼，教士则依靠主教挑选和任命神职，而教会则依靠他们当教师和管理者。根据教会法和天主教传统，主教对其主教辖区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只受教皇管辖。当然，主教如何使用这一权力，则因主教而异。拉丁美洲主教制

---

* 詹森主义（Jansenism），因荷兰天主教反正统派神学家詹森（Cornelius Jansonius，1585—1638）所创的学说而得名。詹森生前反对耶稣会的主张，著有《奥古斯丁书》。死后，其门徒传其学说并以《奥古斯丁书》为基础加以发展的神学主张被称为"詹森主义"。詹森派认为，上帝若赐给人恩宠，人的自由意志便不能抗拒；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皇而属于公会议。该派的主张后被教皇斥为异端，下谕禁止。——译者

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也不尽相同。大部分主教来自社会的同一个中等阶层。这个中等阶层从墨西哥和秘鲁的传统天主教家庭，从现代阿根廷的移民家庭中选拔人才向教会输送教士。他们通过他们的优越身份、道德品质和在基督教的领导地位，而不是通过社会或政治利益集团，在教会中发迹起来。在政府仍保有某种神职推荐权的地方，如在阿根廷，主教的任职往往是政府和罗马之间妥协的结果，而且按惯例产生的主教职位也不大可能对教会或政府有什么干扰。拉美主教制度在19世纪经历了537 重大变化。从殖民地和早期国家政权承袭下来的王权至上论和自满情绪让位于一种更加坚定不移的正统派观念，是改良主义型和罗马型的。这往往被说成是"教皇至上定义"。据说，19世纪巴西仅有的5名主教全是"教皇至上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欧洲受过教育或访问过欧洲，因此，在有些情况下，这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文化背景而已。但是，这个词带有贬意和争论性，表明与自由派或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它对历史学家的价值有限。拉美主教制当时的确指望得到罗马教皇的领导和指导。而这对教会大多意味着改革和独立，而且使天主教规范化而不是走向极端。

一般说，主教们走慎重的中间道路，更倾向于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更倾向于妥协而不是斗争。但是在危机时刻，主教们表现不一，要么拒不妥协，要么同社会与政府寻求一致。在墨西哥，一方面有像瓦哈卡州大主教欧洛希奥·希略（1887—1922）和圣路易斯波托西州主教伊格纳西奥·蒙特斯·德·奥卡（1884—1921）这样的人，他们两人均出身于富裕家庭，都在国外受过教育，希略受教育于英国，蒙特斯·德·奥卡受教育于罗马，两人不折不扣都是教廷封的红衣主教，可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并不具有那么明显的主教特性。另一方面，塔毛利帕斯地方的主教爱德华多·桑切斯·卡马乔在墨西哥天主教徒中引起巨大愤慨，因为他试图协调教会法和自由派的新教法，以及因为他反对崇拜瓜

达卢佩圣母。他被罗马解除教职，而且死后未举行圣礼。墨西哥大主教佩拉希奥·安东尼奥·德·拉瓦斯蒂达-达瓦洛斯是1861年支持法国干涉和主张迁就波菲里奥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后来于1892年由普罗斯佩罗·马里亚·阿拉尔孔继任，据传，阿拉尔孔是个自由派，尽管这一谣传并不正确。

哥伦比亚主教们的政治思想几乎完全是保守的。高级教士对自由派政策作出反应，承认他们有义务顺从世俗权威，但有一个限定条件。1852年8月，波哥大大主教曼努埃尔·何塞·莫斯克拉因反对自由派法律而离开当地前往流放地的前夕，发表了一封致教友的信，他在这封牧函中叮嘱信徒们：宗教命令他们服从民法和尊敬、热爱地方长官，正如教皇在1846年11月9日通谕中所说的，"凡抵制权威者即抵制神意并将受到谴责，因此，在不违犯教规的情况下，服从权威的原则不得违背，除非有要求违背圣法和教会法的规定"。④因此，当自由派措施有损于教会固有的神权时，就有抵制的权利。像墨西哥主教一样，哥伦比亚主教认为，非不动产让与是同教会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教会拥有财产占有权和收入的法定权力相违背的。 538

许多拉美主教参加的与自由派政府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冲突，往往模糊了他们所承担的宗教和传道职能，尽管这些职能是教会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各主教辖区的主教们不得不对他们管辖下的教区进行教务巡视，这样至少每隔5年就得对整个教区进行视察。其目的是保持信仰和道德，促进宗教生活，鼓励教区教士及检查当地教会的组织、建筑和帐目。教士的访问是教会权威、教区管理和人民生活之间的汇合点，教士的访问是当地宗教活动日程的高潮。正是在这个时候，教士们汇报他们教区的宗教生活。有些教士将注意力集中在礼仪标准、祈祷的虔诚、对四旬斋的虔

---

④ 引自罗伯特J·诺尔顿著《19世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没收教会财产的比较》，载《美洲》杂志，25/1（1968）第395页。

诚和访问病人上。还有些教士强调教区的主要邪恶通常是酗酒和性问题。一般说，特别是在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更新时期，主教们认真履行教务巡视的义务，尽管距离远，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主教们正是通过这些视察对所有的主教辖区的宗教状况有了直接了解。而且，"教区访查卷"，如果有的话，是研究拉美宗教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19世纪教会的平信徒包括众多的圣徒和尚未醒悟之人，他们宗教信仰虔诚的程度和参加宗教活动的程度差别很大，从每星期日做弥撒并定期接受圣礼的人们直到只是出生，首次圣体圣事、婚丧时才和宗教有联系的人们，以及主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接受天主教教义的人们。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教义，这种教义不是从外部仪式上可加以判断的，而是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539 俗人把教区视为教会，他们同宗教组织的最直接的接触是通过他们教区的教士。教会在拉美古老城市和省辖城镇拥有强大的宗教影响力。拉美这类城镇的众多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满足了城市居民各种宗教需要。在农村，宗教机构分布比较稀松，而且往往比较单薄，而教会提供的各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别教士。可是农民献身教会的坚定性是绝无问题的。墨西哥印第安人虽然过去曾被教会所忽视并受到教会一定程度的剥削，但他们倾向于接受教士层权威的正统性，而不接受文职官员和政客权威的正统性。几乎所有农民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徒，但看来他们很少有人与新的共和国抱有任何认同感，抱有民族认同感的人甚至就更少了。墨西哥中部的农民，如同教会一样，是自由派政策的牺牲品，他们对公社土地遭到侵袭和实现现代化造成的其它威胁表示不满。他们是教会的天然盟友，虽然不能说，教会特地努力谋求农民的支持或者为遥远的公社提供教士和资金。墨西哥中部的一些印第安人村社是为宗教，为反对其自由派的敌人而战，或者是在整个遭受迫害的年代提供间接的支持。这些村社并不是

自发地支持一切保守事业，但是它们会采取行动保护诸如朝圣和礼仪列队这些传统仪式，或者响应某一教士或考迪略的呼吁而诉诸行动。

秘鲁印第安人一贯遭受许多剥削者的侵害，包括传道士的剥削，这些剥削者的敲诈勒索行为通常大大超出了征收教会服务费用的正当范围。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象掠夺者而不象神父。可是，19世纪后期在安第斯山中部和南部爆发的印第安人起义中，普诺主教辖区及其他地方的主教辖区的教会领袖们保护印第安人的利益，或至少充当起义者和政府的调解人。印第安人对教会领袖们的主动精神作出反应，重申他们对宗教的情感和对传教士的尊敬。当然，教士在安抚印第安人时，常常是为政府而不是为起义者的利益效劳的，对山区教会采取行动的常态很难予以评定。印第安人居住区的大多数教士是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尽管他们许多人讲克丘亚语或艾马拉语。教会并未认真在印第安人本身当中设法培养教士。但是，印第安人对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很忠诚，甚至在革命年代也继续如此。还没有迹象表明，在印第安人长期反对虐待的斗争中宗教被用来作为一种缓解剂或成为一种抑制因素。 540

因此，集居在教区和主教辖区的俗人已成为教会结构的组成部分，然而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在西班牙语美洲，从传统上说，这些组织中最为重要的是教友会（Cofradias）。这些友爱会社或俗人修会是从西班牙承袭下来的，是由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教堂和教区里建立起来的，组织一些社区宗教活动，诸如对某圣人表示敬重，举办节庆活动，或维修教堂等。成立友爱会社不仅仅是为了上层分子。城市的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阶层也拥有他们的友爱会社。有些会社包括了不同的社会阶级，以团结他们从事团体活动，并强调社会内部纵向联系；还有些会社加强阶级层次化和社会等级制度。在巴西，黑人和穆拉托人的“兄弟会”(irmandades) 成为在以白人为主的社会里的一个庇护所，

成为宗教仪式和宗教教导的来源，成为某种福利体系和团体认同感的中心。在西语美洲，这些会社也赋有经济任务；它们往往是一些互助会，拥有资本和财产，成为教区教士就业和收入的一种来源。

教区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这种社会经济体制运行的。友爱会社的管家（mayordomo）是社区内的小财主，为人不那么正直。管家的职责是组织节庆活动和对圣母玛利亚或由管家照管的圣徒的崇拜活动，看守崇拜活动所用的物资，诸如衣服、珠宝、花及钱币，监督列队行式，划拨有关这些活动的经费和与此活动有关的饮食经费。会社办事处经常与市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在这一政治和宗教层次的社区中有这一层的教阶集团活动。它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网络。管家们由其妻子和子女给予协助，所有亲属之间生活在竞相夸耀而扬扬自得的气氛之中，在节庆日和列队游行时，尤其如此。

友爱会社主要是俗人组织，是由俗人自行管理的。会社的组织结构和财政是自主的，其事务不准主教或教士进行干预；当会社需要教士服务，比如说举行弥撒时，就向教士提出请求并付给教士报酬。这种独立性造成了同教会当局的紧张关系，因为教会当局认为它们拥有最终的管辖权；后来19世纪的改革派教会，试图以整肃宗教纪律为由来管理会社。提出的批评主要针对财产管理不当，忽视宗教以及对文娱活动的偏爱。友爱会社的许多宗教节庆举办成粗俗的节庆活动；有些教区教士认为，列队游行和祝祷仪式实行偶象崇拜，做得太过份了；遇到这种场合，经常通宵饮酒、跳舞。所以教会当局设法审查帐单，任命官员，监督友爱会社的活动，虽然并未完全成功。总之，事态的发展不利于会社并贬低了会社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19世纪后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改造了教会必须赖以生存的世界，使得这些传统的会社同当时的社会需要不那么合拍，如果不是格格不入的话；当时教会需要走向更加外向型的组织，以应付日益世俗化的世界。

541

罗马、改革与再生

拉美天主教教义的遗产同其他教会的天主教教义的遗产并无二致。主教和教士接受并传播传统的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不管经院哲学过去在协调信仰与理智上如何有益于宗教，经院哲学已经变得毫无生气、千篇一律了。经院哲学对启蒙运动未能作出反应，19世纪拉美天主教教义不具有对付功利主义者、自由派和实证论者的理智工具，结果是，基督教的论证遭到否定。玻利维亚教士马丁·卡斯特罗抱怨神学院的教育，抱怨被“现代文明所正确禁止”的经院哲学仍属于统治地位，⑤教会不是依据新的宗教教条哲学的表述，而是依据对古老信仰教条的重述。

19世纪拉美天主教会的教义启示来自于罗马，并由教皇庇护九世（1846—1878）规定标准，1864年庇护九世颁发了“告所有教区神父的通谕”及其附录“错误批判大纲”。“大纲”谴责自由主义、世俗主义、思想自由和对上述思想的容忍。它特别谴责俗人教育以及国立学校应不受教会当局控制的想法。谴责“在我们时代，认为将天主教视为国家唯一宗教而排斥其他宗教的看法不再得当”的那种主张，以及“罗马教皇可以而且应当使自己与进步、自由主义思想和近代文明和解与协调起来”的主张。当然，教皇的态度有其哲学和历史背景。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被认为是主张摆脱上帝的人类解放，是蓄意拒不承认超自然主义现象的最高权力。由于罗马一定会拒不接受关于人的理性主义和纯人道主义观念，因此它反对自由派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此外，教廷本身受到意大利皮耶迪蒙特政府的围攻，皮耶迪蒙特政府吞并了一些教廷国家，蓄意采用世俗政权并监禁反对世俗政权的教士和主教。

542

⑤ 约瑟夫M·巴纳达斯著《马丁·卡斯特罗。玻利维亚战斗的教士》，载《玻利维亚纪念贡纳尔·门多萨研究论文集》，（拉巴斯，1978）第189页。

“大纲”是一种防御的反映。即使如此，它仍是一个粗暴的不妥协纲领。

“大纲”是套在宗教颈上枷锁，破坏了它在拉美和平成长的前景。寻求中间道路的天主教温和派由于“大纲”的不妥协性而感到为难。保守的天主教徒可以求助于“大纲”来反对温和派。自由派可以援引“大纲”，以证明危险来自天主教会。至于应用到拉美，庇护九世的政策可以从他对秘鲁自由派教士冈萨雷斯·比希尔的反应中看出。比希尔攻击教皇权势，主张给教会建立一个新的全国性自由组织。庇护九世宣布比希尔的书为禁书，并且因为作者拒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是唯一真正的信仰，宣告宗教容忍精神以及主张教士可以结婚不必独身而将作者革除教门。其中有些观点，在任何教会年代都会被当作是异端，可能代表不了天主教的意见的。因此，庇护九世的政策并未将一种新的或“罗马化”的信念和道德观引进拉丁美洲，而是在过了王权至上及松弛的年代之后，庇护九世的政策如实地更加明确地确立了教义和教规，重申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新颖的是教皇的明确立论，而不是教皇的权威。

教皇在拉美施加影响的手段是什么呢？这最终取决于天主教徒对教皇继任者尊敬的程度。但是，教皇拥有许多比较世俗的机构。首先，罗马试图保有对主教的任命权或坚信权，给予考虑的，只是那些指望罗马授予权力的主教。在这一背景下，有人议论说，罗马并不总是得到它所喜爱的主教，但罗马绝不答应它所不同意的主教。⑥第二个施加影响的手段，是天主教在拉美的媒介物；天主教报刊以及个别作家和教士对教皇的地位作了宣扬。第三个权力基础是神学院——正统派教义的堡垒，是教会未来领袖信仰和道德观形成的地方。1858年，庇护九世在罗马建立了拉丁美洲学院，从教廷大学出来的未来毕业生将返回拉美，成为教会的上层人物。第四，新的教团（许多来自欧洲）是罗马的主要代理者，它们尽可能地将现代天主教教义传播到次大陆。最后，

543

罗马教廷在拉美拥有它自己的代表，虽然罗马教廷的外交影响并不是一贯很强大的。比如说，从1865－1896年，罗马在墨西哥并无代表，尽管墨西哥教会向罗马提出过此要求，因为墨西哥政府不会建立外交关系。1896年，罗马教皇利奥八世派遣一名罗马教皇巡察员去墨西哥，在作出两项这类任命之后，开始派遣教皇代表。

同时，在1869—1870年举行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上，拉美主教们直接接触到新的天主教思想。700名高级教士出席了那次会议，其中48名是拉美主教。那次会议讨论教士的教规，计划举行一次普及的初级教义问答测验，澄清信仰和理智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确立教皇永无谬误论。拉美的主教们在信仰和道德观问题上采取了相当保守的立场。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支持教皇永无谬误论的确立。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固然极力主张实行地方自主，但他们维护罗马教廷的权威，这，部分是出于原则考虑，部分是将罗马教廷作为反对中央政府的杠杆。

30年之后，罗马教皇利奥八世召集第一届拉美主教理事会会会时，拉美主教团进一步有机会确认他们对罗马教廷的效忠。会议是1899在罗马召开的，在总数为104名主教中，有13名大主教和41名主教出席了会议，但未要求地方的神学家们参加。理事会商讨了信奉异教、迷信、对宗教之无知、社会主义、共济会、报刊以及对现代世界宗教造成的其他明显危险。当时发表了998篇文章，主张改组拉美教会，大部分文章是受罗马神学和教会法的启迪，而不是根据拉美传统写成的，这些文章更多地旨在保存和辩护，而不是增加和创新内容。但是人们强调这次会议的一个方面是“拉美主教社团意识的再生，将来它必然产生结果”。⑦这 544

⑥ 弗雷德里克B·派克著《真正和所谓的异教：1830—1875年秘鲁保守派—自由派斗争的一个方面》，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47/1（1967）第50—74页。

⑦ 恩里克D·迪塞尔著《拉丁美洲教会史。殖民地时期与解放（1492—1973）》（巴塞罗那，1974第三版）第175—176页。

次会议采取了特别指令的形式，敦促主教大会在拉美教会强大的省份每三年举行一次。

在拉美地区内，区域性理事会和宗教会议正在筹划改革。省为理事会在各国指导并推动教会的工作，地方教会正是从这些会议获得有关信仰，道德和天主教仪式的信息及教导。宗教会议为主教辖区一级的教士和人民的特殊需要制定立法。1892—1897年间，在罗马的鼓励下，墨西哥教会举行了五次省一级的理事会，上述会议也是为拉美主教理事会全体会议作准备。1882—1910年间，在墨西哥召开了七次宗教会议。

因此，1870—1910年这个期间宗教组织获得改进和发展。拉美教会当时已更加紧密地与世界性教会合为一体，拉美教会从世界性教会接受指导，接受它们的许多人员。应当说，罗马教廷在进入各国中央政府和教会无法填补的教会权力真空时，并未大力接管拉美教会。在这一进程中，拉美教会统治集团和教士开始放弃昔日的王权至上论和松弛状态，更加严格遵奉罗马以宗教为天职的理想。正统教派和改革教派往往联合行动。主教辖区的神学院开始更加谨慎地选择候选人，并以道义品德和正统教义对他们进行培训；有些人被派往罗马和巴黎深造，他们往往就是未来的主教。新的教士不久即成为整个拉美教会改革的动力。

在巴西可以观察到这一进程。尽管佩得罗二世抱有王权至上的想法，尽管他反对罗马，对天主教教义持冷漠态度，但他不得不承认，改革派教士和正统派教士是应得到晋升的最佳候选人。于是，新的主教最初不得不面对自由派政客们的敌视，1870年后又面对对罗马怀有疑虑并想使教会得不到国家支持的共和派分子的敌视。1890—1891年政教分离（见下文）是伪装的赐福，因为教会当时必须自筹资金。最初，注意力集中于通过建立新的主教辖区来改组教会结构。1891年，巴西教会仅包括12个主教辖区。到1900年，有17个，1910年有30个，1928年增加到58个。被选定担任新的主教职务的主教们是由罗马挑选的，最初他们集中精力

于两项任务，一是恢复教会的有形结构，诸如教堂、小礼拜堂和其它宗教殿堂，二是通过建立培训优秀教士的神学院，以及通过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建立和重新开放寺院和女修道院以恢复教会的宗教传道活动。罗马教廷鼓励欧洲教团派遣教士、修女和修士加强修道院或从事教区工作，因为中等阶层家庭不愿意让其子女进入教士行业，这随之引起巴西缺乏宗教职业者的现象。这说明为什么从那时起巴西有许多外国教士。

在1870—1930年这个时期，所谓官僚的或有组织的教会的增长，被说成是采用了一种同巴西生活大体无关的欧洲模式。按照这一解释，创办招收中等阶层子弟的教会学校，建立宗教组织和协会以及举行礼拜仪式和其他改革的因素，更适合于城市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并不适合巴西的需要，因为巴西仍然是农村占优势的不发达社会，⑧在这一过程中，巴西教会成为中等阶层的和欧洲式的，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而起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人民"民众天主教教义"当时则受到改革派教会的"正统"天主教教义的排斥。然而，这种分析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改革运动并非专门针对中等阶层，而也是面向民众阶层的。来自欧洲的新教士并非全部留在城镇；有些教士深入乡村，帮助组织农村教区，以主持农民和劳工的圣事。一个边疆型网络已定形；两名或更多的教士往往以某一座教堂为聚集地，他们不时从这一教堂出访座落在某一市郊区的若干小礼拜堂。这一制度由教团实行时更行之有效，因为教团团员习惯于从社区基地开展工作，但是世俗教士在农村也有影响。经常由修女提供的初等教育也能触及到比当地中等阶层更为广泛的社会集团。这些发展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因为在欧洲本身，如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教会拥有 546

⑧ 托马斯C·布吕诺著《巴西教会。宗教政治》，（奥斯丁1982）第18、31页；另见罗杰·巴斯蒂德著《巴西的非洲宗教，走向文明相互渗透的社会学》（巴尔的摩，1978）。

农村社会的经验，如果教会确实输出某一“模式”到巴西，那么这一“模式”也并不全然是城市型的或发达型的。总之，如同拉美其他地区一样，巴西当时正经历移民和城市化进程，教会必须对新的环境，而不一定是对上层社会的环境作出反应。

在阿根廷，大约从1880年起可以观察到天主教信仰的复兴。在一些卓有成效的主教的领导下，教会开始摆脱它的不景气状况，采用现代的组织、布道和传教方法。首先，宗教教育有了改进和发展。从1870年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辅助主教的莱昂·费德里科·阿内罗斯阁下，致力于改进讲道和教导，增加有关教士的新闻报道，创办了天主教报纸及定期刊物，如《宗教》、《教团》、《阿根廷天主教》、《联盟》和《教会之声》。可以看到神学院在改进和扩展方面的成果，特别是从1858年以来更是如此，当时公认每个主教辖区应有一个神学院，政府答应资助贫穷的神学院。1860年，德基总统请求庇护九世和耶稣会修道会会长派耶稣会传教士到阿根廷。1862年，他们返回圣菲，1868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办萨尔瓦多学院，在它成立的早期成为某种争议的对象，1875年达到了顶峰，当时该学院遭到一群反耶稣会暴徒袭击并被焚毁。与此同时，应阿内罗斯主教的要求，1875年慈幼会创始人圣约翰·鲍斯高派遣了他的10名会士去阿根廷。这些慈幼会会士在圣尼古拉斯开办了它们的第一所学院，1877年创办了第一所技术讲习学校，即后来的庇护九世学院。

教育成为拉美教会与政府之间激烈争议的一个根源。天主教的扩展主义思想同自由派和实证论者使教育不受任何宗教内容影响并使教育置于世俗政府控制之下的那种决心发生了矛盾。19世纪后半叶，世俗化运动在几乎整个拉美赢得了胜利，但各国发生变化的速度和程度不一。在阿根廷，1884年世俗教育法看来解决了这一问题，取消了学校的天主教宗教课程，但这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关于教育的宗教方面问题不时地在阿根廷和其他各地出现。在有些国家，国立学校恢复了宗教教学，但只是选修课。但

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教会丧失了它在公共教育领域中发挥影响的战场，而不得不依靠另一种可以替代它自己的学校体系，这一体系往往是（虽然，也并不总是）为付得起学费的人们提供的。教会也试图在大学一级同政府竞争，天主教大学与国立大学平起平坐地建立起来。成立这类大学是1930年以后一个时期才更为明显的特点，但是，在阿根廷，成立天主教大学的想法，主教们和一些天主教大会上早已多次提出讨论过了。最后，看来是正当其时，19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天主教大学成立了；校长是路易斯·迪普拉阁下，大学开设法律和社会科学学科方面的课程；该大学着手寻求官方对大学课程和学位的承认；但这一建议遭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强烈反对，这一着是致命性的，因为如果它不提供实际学位，就无法吸引学生，1920年学校停办了。作为一个替代办法，1922年建立了所谓天主教文化课程班，这个班旨在向大学生、研究生和其他人提供有关天主教教义的正式课程，这说明天主教担心失去上层分子，而不是办高等教育的经验。

一个有生命力的教会企图发展，说明其发展的标准是，除了改变人的信仰外，是否能成功地将福音传播到新的传教领域。在殖民地传教任务结束和独立之后的真空年代，教会需要有一定时间才能恢复势头。但是，从19世纪后半叶起，拉美教会开始再度扩充其边疆，第一阶段是逐步恢复修士。西语美洲方济各会会长安德雷斯·埃雷罗于1834年成立了一个由12名各方济各会修士组成的布道团在玻利维亚印第安人中从事福音传道工作。不久，还有另83名修士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秘鲁、智利和玻利维亚开办了学院。1843年，多明我会修士们返回了秘鲁。

庇护九世年轻时曾作为一名教士团团员访问过拉美，他对扩大拉美传教活动特别有兴趣，是他商定了使这一任务有可能完成的政治体制，他签署了一系列宗教事务协定——1851年与玻利维亚、1852年与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1861年与洪都拉斯、1862年与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国订立的协定。教会设法 548

从一些国家的政府获得物质帮助，以落实国外传道总会的工作。1848年，12名卡普秦修会修士被指派对智利的阿劳科印第安人宣传福音。1855年，有24名方济各会修士，1856年，有另外14名方济各会修士前往阿根廷建立相似的传教区。可以断言，阿内罗斯主教在给南方印第安人传道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这是一个完全不依靠政府的纯教会事业。他成立一个教士与俗人委员会以提供支持，并请求遣使会教士担当起这一任务。这些教士在阿苏尔、巴塔哥尼亚、布拉加多等地建立了传教站，将分散的印第安人群体集中于较易于达到的地区。1878—1884年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任大主教马里亚诺·安东尼奥·埃斯皮诺萨在第一批慈幼会传教士的陪同下，走遍南方大部分地区。从1879年起，正是他们负责整个巴塔哥尼亚地区、阿劳科人和火地岛印第安人以及智利南部的传播福音工作。其他教会不是那么富有生机。在罗马的眼里，秘鲁落后了，1895年教皇利奥八世要求秘鲁主教在印第安人中间作出更大努力，印第安人占该国人口的57%。1900年，第一批奥古斯丁会传教士到达秘鲁。20世纪初，墨西哥的传教活动有了扩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托塔蒂契的马加良斯修士同维乔莱斯印第安人重订了18世纪以来破裂的合同，在洛伦索·普拉森西亚神父领导下，在阿兹克尔坦设置了一个传教站，将基督福音传到山区。

在哥伦比亚，认真的传教工作受到耽误，直到19世纪最后10年才得到恢复。1890年奥古斯丁会教士，1903年蒙福尔特教派教士、1905年遣使会教士、1908年克雷特教派教士、1918年加尔默罗会教士和耶稣会教士抵达哥伦比亚。在哥伦比亚南部取得最引人注目的进展的，是卡普秦会传教团。这一传教团主要在印加和西本多伊印第安人中间开展工作。19世纪90年代，全国制定立法，特别是1902年重订“传教协约”，授予（包括卡普秦会在内的）传教团体以绝对权威，对内陆印第安人施行治理、整顿、教育及一般管理；因此，约75%的全国领土置于传教士统治之下。

1906—1930年间，一批在菲德尔·德·蒙特克拉尔修士指导下的卡塔兰地方卡普秦会传教士，使自己在西本多伊地区建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经济权势集团，并努力争取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和发挥影响。不久，卡普秦会传教团的地盘在执行一项经济发展计划和开化印第安人计划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扩张。传教团占有广阔的土地，它们除了建立强制印第安人定居的城镇外，还建立了通商和进出道路和劳务的基础设施。在这一进程中，卡普秦会传教士成为教士、地方长官和企业家的综合体。 549

人们指责哥伦比亚的卡普秦会传教团是国中之国，是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并剥夺其自由以换取假文明的神权独裁统治。这些是有价值的判断，使人们回想起18世纪对巴拉圭耶稣会教士的控诉，这些卡普秦会传教士和耶稣会教士一样，不能正当对待传教士的信仰动机和他们要求建立保护性体制的需要。他们也不能够同商人、地主、官吏、人类学家建立（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联系形式，而不问这些联系形式是否优于传教士的联系形式，或者能否为印第安人提供较好的物质前景。在整个拉美，传播基督福音所使用的方法和获得的结果，可能是成败参半；很清楚，是犯了错误，而且失败率很高。对已皈依的印第安人是否真正信仰基督这一点有人表示怀疑。有一种倾向，即仅仅看到皈依者的各种信仰之融合和“圣坛后面的偶像”。但是，这些是表面的判断。有许多印第安人是真正的天主教徒，而另一些印第安人则不是。但这是各种不同宗教体系的兼收并蓄，而不是诸信仰低劣的融合。

人民的宗教

拉丁美洲人民笃信天主教的程度究竟如何？信仰个人内心的上帝是个人良心的问题，是不易作出判断或者用数量来表示的。但是某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可以从外表仪式加以检验的，如做礼

拜弥撒、接受圣礼、履行复活节职责，这一切是可以衡量的，正如社会学家为欧洲部分地区所进行的那样，虽然对拉美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根据对巴西参加弥撒情况所作的现代调查，教会可以声称仅拥有少数信徒，也许仅占10—15%，最多20%。这些信徒是正统的天主教徒。大多数巴西人是非正式的天主教徒，他们

550 可以向圣徒祷告，但不去做弥撒。然而，造成这一宗教仪式衰落的一些历史阶段还不得而知，这一衰落的原有基础也不得而知。根据20世纪60年代拉美其他地区的现有统计资料，在墨西哥，95%的居民受过洗礼，参加复活节圣餐仪式的人平均占50%。在委内瑞拉，做礼拜弥撒的，平均为13%；哥伦比亚为15%；秘鲁为12%。但是这些当代数字并不是了解过去、也不是说明宗教仪式衰落的速度、地理分布和社会学分析的可靠指南。比如说，秘鲁参加仪式者从独立时期的最高参加人数跌到20世纪60年代最低参加人数，秘鲁天主教思想开始衰退的程度究竟如何？

对拉美宗教作一番社会学方面分析，就能说明若干重要变化情况。在印第安居民中，参加礼拜弥撒和接受圣礼的人很多，但参差不齐，可是他们十分尊重教士、圣徒和宗教礼仪以及朝圣。黑人并不具有明显的天主教特性，可是他们对自己的信仰方式是虔诚的，而广大的巴西、委内瑞拉和加勒比地区的穆拉托人（黑白混血种人）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基本上不感兴趣。梅斯蒂索人是正统天主教的真正基础，正是在梅斯蒂索人居住区，教会的全部精神生活获得最完备的遵循。在另一方面，上层人物产生了自19世纪已偏离正道的天主教徒，这些人向宗教自由主义、共济会思想和实证论思想移动，虽然在许多这类家庭中既有虔诚的妻子也有不可知论的丈夫，这种现象很普遍。当代拉美自由职业者和学术界阶层是这部分人公认的后裔。在经济集团中，小业主和佃农很可能比农场主和牧场主虔诚。在宗教地图上，看来也出现了地区差异，有些地区经常上教堂的人占优势，有些地区天主教徒上教堂则有季节性。因此，门多萨比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比特鲁希

略，波帕扬比卡塔赫纳，梅里达比平原，米却肯和哈利斯科比墨西哥北部的宗教色彩浓厚。但是表面的遵奉不表明全部真情，也不能从信仰程度上来鉴别究竟是狂热的天主教徒或显然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未表明政治和社会压力对信仰所施加的影响。此外，由于19世纪天主教徒对教会从毫无生气发展到改革这一进步作出了反应，天主教徒们逐年有了发展和更新。在有些地方，这一运动从非正式的笃信宗教转向正式的笃信宗教。

19世纪60和70年代，米却肯高原尽管缺乏宗教教育，甚至缺乏公众礼拜，但这并未阻止人民照旧效忠于教权政府，忠实于宗教惯例。"大部分人可以从头至尾地背诵主祷文、教义、万福玛利亚、十诫、圣母颂、启应祈文以及其他许多祷文。没有人怀疑宗教信条中的任何一条。对这些乡下人来说，天堂、地狱和涤罪所就象白天和黑夜一样真实可信"。⑨少数的见闻广博天主教徒心里记住和承认教义问答集，并实践于生活之中。他们相信三位一体之奥秘，对生命及命运抱有末世论的观点。大多数人也同样抱有天主教信仰，抱有更为朴实和十分隐私之信仰。他们同基督和圣人直接讲话，而且经常违背诫条，特别是十诫中的第6条和第9条。原始宗教的残余固然很久就被基督教化了，但仍保留昔日的一些迷信色彩。

551

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天主教教士对其教区的信徒们的信仰并不表示担忧，只是对教区居民的道德表示忧虑。据萨尔瓦多的教区教士报道说，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酗酒和纳妾姘居问题。在一些教区，三分之二的性交是非正当的，是教会或政府都不允许的。教士将此归咎于人们，特别是男人，对宗教的日益淡漠。这些男人不参加弥撒或履行他们的复活节职责。"可是尽管如此，信仰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信仰宗教之热情依然很高"。⑩在一些特别场合，诸如节庆日，教士视察期间或个人遭到不幸之时，教堂

⑨ 见前引冈萨雷斯著《不稳定的人民》一书，第110页。

里挤满了人，忏悔室聚集了悔罪者。因此，教士对道德和虔诚作了区别，即他们的人民很虔诚，但不道德，他们最终依靠忏悔，指望教堂作为罪人的避难所。信仰和道德之间的这一差距，对非天主教舆论和那些抱有宗教只不过是为社会效劳的道德标准这种想法的人们来说，是进行诋毁的重大根据。但是归根结底，这一差距只不过代表天国和尘世之间终年不断的紧张关系。曼努埃尔在《桑切斯的孩子们》(1961) 一书中对此作了乖张的表述，他为北美新教思想及其严格的道德价值观和守法行为所诱惑，但他自己承认，"我仍然是个天主教徒，因为我认为我不够强大，还不足以服从十诫和贯彻福音传教者的严格规则。从此我再也不能够享受抽烟、赌博或通奸之乐了……。⑪

552

改革派教会大约于1870年之后更加目不转睛地盯着教徒们。教士人数增加了，据说，由于教士们变得更加热衷于传导福音，变得更加渴望灵魂，性格也发生了变化。教区教士们不再消极地接受宗教的惰性，而是积极努力传播信仰和虔敬。萨尔瓦多某一教区教士的传教活动，典型地说明教会作风的变化。1855年当这位教士抵达阿伦塔斯时，那里"没有教区的迹象"，仅有一座既无装饰又无弥撒书的老教堂和一个圣餐杯。他经过23年的努力，为这一地区建造了5座新教堂，可以说在提高信仰和道德方面取得一些成功，而且他表白"尽管还有罪恶和不当的行为，但是必须承认这些东西是我们周围世界的必然后果"。⑫

改革培育了某种严肃性，产生了一种模范教区。在那里，规定了迄今比较接近的定义和比较严格的教规。教区教士们念弥撒经，在主日和圣日念给聚集的会众听，在平日则念给一小群妇女听。这位教士讲道，数十年如一日的念珠祈祷，为年轻人举办教

⑩ 引自鲁道夫·卡德纳尔著《萨尔瓦多教会的权力》，(圣萨尔瓦多 1980) 第163页。

⑪ 奥斯卡·刘易斯著《桑切斯的孩子们》(纽约1961) 第332—333页。

⑫ 贝卡德纳尔著《萨尔瓦多教会的权力》一书，第167页。

义问答班，听取妇女儿童的忏悔，给人主持最后圣礼。这是1900年左右拉美教区的情况。但是大多数男人避开教堂，人们往往称那些上教堂的人是“修女”。由于改革对宗教规定了较严格的限制，进入教堂之门变窄了，许多人的确不进教堂。20世纪初确实出现了突然复兴的迹象，圣体圣礼和圣心奉献盛行，但这一切仍在这一模式之内。感恩祈祷本来旨在抵偿自由派、共济会会员等对耶稣基督之侮辱，却导致了更经常举行圣体圣事仪式，并导致力图使政府本身皈依。个人、家庭、教区、整个国家都投身于圣洁之心的奉献，承认耶稣是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6月是奉献圣心的特定月份。同时，还恢复了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在5月和10月这些特定月份，则向圣母马利亚祈祷。四旬斋、复活节前一周是在3月和4月，因此整个一年的崇拜仪式展开了，古老惯例之外还有新的祈祷活动。

来自主教辖区和讲道坛讲道的新宗教热，是企图使人民回到基督和教堂的一种尝试，广大天主教徒对此作出反应。教区教士 553 仍然称，人民对宗教很虔诚，但易于产生邪恶。这是改革的限度。教会不能征服邪恶或使人民从善。社会的世俗化完成了大自然所开始的工作，原罪之后果显而易见。教士们从讲道坛上攻击现代世界及其诱惑，并敦促经常求助于圣礼。可是，教士们只得满足于正式的仪式，个人的虔诚和个人道德。这是赎罪派传教团传教的目的。从本世纪初始，传教团在整个拉美变得很孚众望；传教团当然也是教会使人民恢复个人圣洁这个任务的组成部分；可是出现了一种教会转向自我和脱离现代世界的意识。从教士或人民这方面看，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有公共良知或社会意识。这还必须有待于后一代人。

宗教未必跨越社会壁垒使人民联合起来。正如萨尔瓦多的圣米格尔教区教士1878年所报道的，“上层家庭和普通百姓之间界限分明，是一个制造仇恨和不满的界限”。[13]可是教堂里有社会的统

[13] 同上，第163页。

一以及信仰的统一。天主教不仅仅是在沿海，而且在高原地区，不仅仅在城镇，而且在乡村，在农民、矿工和手艺人中间进行灌输。有人这样谈到秘鲁："从西班牙城市到荒凉高原上的最原始的印第安人公社，同样的基督信念符号和象征得到承认和尊敬，跨越了经济、社会和语言方面的严峻障碍走向宗教信仰的统一"。⑭

554 历史学家可以再现拉美宗教的概貌以及经济概貌，并观察到当地世界的形象和遗迹、守护神、誓约、寺庙和奇迹，以及这些城乡社会为对付瘟疫、地震、干旱和饥饿而祈求的精神援助。人民的宗教有各种表现形式，如对圣母马利亚和圣徒发誓，遗物崇拜和赦罪，特别是神庙和地方宗教生活圣地。这些是奇人、奇迹、幻想、诵读和聆听祷文的圣地，仪仗列队和朝圣的对象，人民概貌的组成部分。日常生活充满了宗教，宗教以形而上学的真理和物质形式向人民展现；宗教回答人民的问题，满足大自然本身不能满足的需要。壮观的宗教仪仗行列，利马的基督奇迹，阿雷基帕的查皮圣母马利亚，瓦拉的孤独耶稣基督，玻利维亚的科帕卡巴纳圣母，阿根廷的卢汉圣母，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圣母，这一切验证了教会的群众基础和大众笃信宗教的力量。

当谈到"民众"宗教区别于另一种宗教以及民众教会区别于官方教会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正确性？是否有一种独立于传统教会的宗教次文化，是否有贫困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是否有与主教和教士的正统宗教并驾齐驱，也许与之相对立的宗教？渴望在遥远的将来能看到解放迹象的现代神学家和历史学家赞同民众宗教这一概念。但是，民众宗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首先，民众天主教思想并未发明新的宗教。这一思想特有的做法体现在教堂关于圣徒、赦罪、圣灵、为死者祈祷、对遗迹的尊崇、勋章佩带的教导上；这一切是正统的做法，显然不是"自主的"做法。此

⑭ 耶苏会会士杰弗里L·克莱伯著《1824—1976年秘鲁宗教与革命》，（圣母大学1977）第2页。

外，19世纪末期新的“官方”宗教热，特别是圣马利亚祈祷和念珠祈祷，很容易同昔日流行的仪式相融合。这些流行仪式已经包含了对圣母马利亚的传统崇拜。这是世界性教会统一的例证，因为这类祈祷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证明了拉美宗教的天主教本性。比如说，念珠祈祷是教导世界性信仰的一种手段，它鼓励对宗教的重大奥秘进行冥想。念珠祈祷使心灵与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相通，但是拉美祈祷之圣母是世界性的圣母马利亚，对瓜达卢佩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从教义上说，就如同对沃尔辛厄姆*圣母马利亚或琴斯托霍瓦**圣母马利亚的崇拜。

555

民众宗教热和俗人组织不是天生就反教权的。上述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教士，而不是反对教士。的确，改革派教会对传统会社持怀疑态度，设法要么控制这些会社，要么建立替代组织，诸如建立在教会监护之下的宗教慈善组织或资金筹措组织。这些会社已经衰退，丧失作用，行将退出教区生活中心。它们从来不是民众阶层独有的，也不是局限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的民众宗教。它们既是城市的，又是乡村性的，既是手艺人的，又是农民的，既是俗人的，又是教士的。教会显然存在于现行社会结构之内，在这一结构内，穷困者比富人更易患病、挨饿，更有可能乞灵于特殊圣人。但是拉美教会远非单纯划一的，似乎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和运动。拉美教会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所谓两层次宗教，即民众宗教和官方宗教，地方宗教和世界性宗教，当代宗教的和过时宗教。归根结底，民众天主教的信仰和仪式只不过代表人民使抽象变得具体，从人民所生活的自然环境这个角度重新确立起自然的一些尝试。

---

* 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英国英格兰诺福克郡北诺福克区一地区名。该地圣母堂从中世纪起吸引了欧洲各地的朝觐者，遂成为朝圣中心。——译者

** 琴斯托霍瓦（Czçstochowa），波兰中南部城市名。市内的亚斯纳古拉隐修院存有著名绘画“琴斯托霍瓦的圣母”，为天主教圣地。——译者

在巴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宗教经历，巴西教会是纯天主教、半天主教和离经叛道几乎脱离正轨的一种结合体。纯天主教体现在教义、弥撒、圣礼和对圣母马利亚的正统崇拜上。半天主教往往包括对圣人的祈祷、仪仗列队、偶像和对亡灵的祈祷。这些做法在没有教士和教区的情况下满足了许多宗教的需要。这种宗教次文化长期以来获得教会的容忍，因为它可以使宗教保持活跃而又毋需众多的教士和复杂的体制。这真正反映了基础的薄弱，而不是信仰上的缺陷。在另一方面，唯灵论的影响却不那么正统，而唯灵论的更加极端的形式是和天主教基本上不可调和的。巴西的非洲诸宗教未保存它们原来的形式，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和适应的进程。例如，坎东布莱（Candomblé）是一种流行的唯灵论形式，它借用天主教的祈祷和礼仪，但发展成为一种天主教会对它无法控制的信仰体系。人类学家把它说成是诸宗教融合的进程，甚至说是巴西宗教的非洲化进程，虽然教会正在目睹的是，在人民中间除天主教以外还发展了一种不同的宗教体系，而人民首先仅仅在表面上皈依基督教。

救世主精神是巴西宗教历程中的另一类别。在这段期间，这一精神在巴西东北部的卡努杜斯和若阿塞罗的两个宗教运动中有所体现，每个运动都簇拥着一名救世主领袖，期望天国之城免遭劫难。现在这些已不再被看作是内陆地区孤立的现象，而被视为较广泛的全国性教会问题的组成部分，巴西东北部的人民同时是行为者又是受害者。这一地区是19世纪60年代起教会进行全面改革的地区，这一现象的典型产物是建立了众多的慈善院、部分孤儿院、部分学校，由俗人兄弟会和姐妹会的成员任职。从经济上说，东北地区是一个衰落地区，劳动力丧失了，跑到了那些咖啡和橡胶繁荣的其他地区去了，而且农业日益衰落。新救世主有能力将朝圣者吸引到朝圣者仍充当工人的东北地区，这种能力给予朝圣者一定的政治势力。同时，这也意味着朝圣者能够投票。因此，他们终于得到当地政治权贵们的栽培。

556

被称为"卡努杜斯"的运动是由神秘的安东尼奥顾问领导。他那大约有8,000名内地人的"圣城"，从1893年起在巴伊亚州的城镇卡努杜斯繁华起来，直到4年后被巴西联邦部队所摧毁。安东尼奥顾问是俗人，但是一名"居家修士"，是"教会的放荡不羁的仆人"，他帮助地方教士并组织教堂的重建。⑮但是他也在教堂讲道坛上讲道，这就使他和巴伊亚的大主教发生冲突，因为巴伊亚大主教的教士制度改革计划没有给业余讲道者以立足之地。他的辩护人声称他是一名正统天主教徒，不怀疑教会的教义，也不自封为教士。诚然，他对共和国的批评是从传统的天主教立场出发的，而且是针对刚刚实行政教分离、奉行宗教宽容并取消教会对婚丧的管辖权的世俗国家。但是，共和国得到主教们的支持；主教们自己在政治压力下，敦促巴西东北地区的教士们取销顾问的职务，因此安东尼奥失去了他的宗教基地。但是，他因为对劳工有影响而得到当地的一些政治支持。1893年，他发动反对共和国税收政策的运动，他及其追随者在同警察进行小规模战斗后撤退到卡努杜斯山地。这类救世主运动极易受到地方势力的政治操纵，不论受到支持或敌视，都会遭到损害。1897年，卡努杜斯终于被联邦军队摧毁。

救世主运动的起源进一步追溯到若阿塞罗运动。西塞罗·罗芒·巴蒂斯塔是名教士，是福塔莱萨神学院培养的第一批人才之一，当他被调往塞阿拉州若阿塞罗就职时，他是内陆地区新教士的样板。他是正统派，为人热诚，是倡导成立圣文森特·德·保罗学会的发起人。他是各界男女信徒的好友。1889年3月，他在若阿塞罗主礼时分给一名女信徒的圣饼变成了血，被认为是耶稣基督之血。教士和民众声称出现了奇迹，不久朝圣者涌往若阿塞罗，一种民众的崇拜兴起了，包括内陆地区的教士、地主和中等阶层以及天主教群众。另一方面，主教们拒不承认奇迹，将西塞

557

⑮ 拉尔夫·德利亚·卡瓦著《巴西救世主运动与国家体制，对卡努杜斯和若阿塞罗的重新评价》，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48/3（1968）第407页。

罗神父除名；西塞罗的支持者求助于罗马，1894年这一奇迹也遭到罗马的谴责。西塞罗神父于是设法同当地士绅达成一项政治交易，要求给予支持以换取西塞罗的中立。虽然他想使若阿塞罗保持为天国，但正如类似的情况那样，奇迹往往导致财富和发展，他无法抗拒地被卷入了社会活动。不久，他得到巴伊亚医生弗洛罗·巴托洛梅乌博士作为一名政治顾问，争取若阿塞罗实行自治，并于1914年使若阿塞罗升为市级。西塞罗神父的下一步骤，是支持武装行动以保卫他的圣城，然后参予全国政治活动。救世主运动中有一种倾向，即放弃神明而争取俗众。

新教、实证主义和天主教的反应

民众的宗教热、边缘天主教思想、救世主运动，以及宗教热情的其他各种表现，或多或少是在天主教信念这一界限范围内出现的。但是，19世纪在拉美却发展了另一种宗教。这一宗教不接受天主教会的管辖，也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拉美第一批新教徒是外国外交官、商人以及独立早期在次大陆首府和港口定居的居民。这些居民受到英国同新独立国家签订的贸易条约的直接或间接保护。圣公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教会会社和教堂都是以这一方式建立的。这些是信仰自由的飞地，并不代表传教活动的扩展。下一个阶段是圣经会的代表们到达了拉美。他们设法越出外国人的范围扩展到天主教居民。拉美天主教徒不是不了解圣经，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做弥撒时听到的使徒书和福音书有关章节中接触到了圣经。但是，圣经会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这导致了下一个阶段，即由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以及包括今圣公会和浸礼会传教士在天主教徒和未改变信仰的印第安人中进行传道的阶段。教士及追随者的人数有了增加，特别是像阿根廷和巴西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19世纪末接受了大批移民，而且天主教会对这些移民的存在未立即作出反应。新的教会

558

和教派要获得生存，就必须有赖于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实行政教分离。自由主义和新教思想之间的关系密切，这进一步告诫天主教会，使天主教会更加倚仗保护和特权，下决心控制出生、婚姻和死亡的登记。在天主教徒的眼里，新教思想等于世俗化，这也说明容忍宗教自由的危险性；新教思想还促使天主教会同保守派加强了联盟，加深了对罗马教廷和各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宗教事务协约的依赖。根据协议，对教会圣职的控制往往成为天主教会在国家中赢得特殊地位的交换条件。同时，不断的大规模移民促使移民的教会进一步扩展。从20世纪初，特别是从1914年起，美国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取得重大进展，随之而来的是加强了政治、有时甚至军事的影响力。美国新教思想也有了发展的机会，出现了新的组织，如公谊会、救世军、安息日会，以及新的传教运动，诸如自由教会传道团和南美福音联盟，这一切加强了新教的影响，更激起了天主教的愤慨。可是，新教思想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发展之后，在拉美却仍是一个罕有的外来现象。天主教会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有了一个更加富有潜力的对手。

对天主教会的主要意识形态挑战，不是来自新教思想，而是来自实证主义。在早期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之后，实证主义成功地控制了19世纪最后10年拉美上层分子的思想。[19]奥古斯特·孔德哲学就是依据“实证”知识，即可以科学论证的知识。他建立了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原则，代替了天启教。这些原则产生一种可以从中拟定社会计划制度的社会结构和变革理论。这一理论的政治框架是基以民众所同意的独裁者，在专家治国论的上层分子的援助下实行终身统治，并在一个有条不紊的社会中推动社会进步。实证主义思想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是它在欧洲已经不受欢迎的时候才传到拉美的。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一思想就扎根并在19世纪的其余年代和以后，终于在许多国家发挥重要影

⑲ 另见黑尔为《剑桥拉丁美洲史》第4卷撰写的第10章。

响。那些正在探求如何解释拉美政治和经济落后性的人们，以及那些对实证论主张复新和现代化并向天主教在群众思想中的影响提出挑战表示欢迎的人们，立即对实证论作出反应。实证主义思想为政府上层人物和专家治国论者采纳盛行的经济模式及其权力主义结构提供了合法性。对中等阶层来说，实证论是一种使人们恢复信心的改良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混合体，它主张物质进步而不危及社会结构。凡有志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进步的学者、教师、军人和其他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均吸收了实证主义哲学，并对宗教和天主教会进行了指责。

实证论是作为宗教的替代物提出的，实证论的科学方法在巴西、智利和墨西哥这些国家受到热烈欢迎，被认为是打开进步之门的钥匙。在巴西，在中央政府以及在各州州长中，已感受到实证论的影响。在墨西哥，在1867年恢复共和国之后，教育部部长加维诺·巴雷达设法改革高等教育，并根据孔德的科学分类法使高等教育有统一的课程。在智利，实证主义者也认为教育应当改革，天主教权势应予摧毁。在各处，实证论看来都是言简意赅，对前途充满信心。正如巴西天主教政治家杰克逊·德·菲格雷多所说的，“在这种思想极其混乱的气氛中，实证论知道如何表达它为普遍福利想要说的话”。[17]

在秘鲁，学术性的论战甚至更为激烈。无神论者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1848—1918）带头攻击秘鲁的宗教和天主教会。普拉达在太平洋战争（1879—1883）之后的几十年，对天主教及其一切主张发动了冷酷的口诛笔伐。他谴责天主教，认为它是阻碍秘鲁进步的最严重障碍之一；他主张把天主教会从一切社会生活中消除掉，而代之以科学，认为它是“未来的唯一上帝”。[18]冈萨雷斯·普拉达的观点超出了实证主义。他企图通过

---

⑰ 引自罗伯特G. 纳奇曼著《实证论、现代化与巴西中等阶层》，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7，1（1977）第22页。

⑱ 见克莱伯著《1824—1976年秘鲁宗教[illegible]》一书，第34页。

知识分子和工人建立联盟的办法，推翻天主教会、西班牙传统和秘鲁保守主义，在秘鲁实现革命变革。他拥护无政府主义，这就进一步为他提供了思想库，他的目标除针对教会外，还指向政府："在秘鲁，有两大谎言：共和国和基督教"。[19]根据冈萨雷斯·普拉达的说法，在秘鲁，有压迫印第安人并使其保持愚昧和贫困的教士、官吏和地主三重联盟。这一联盟向印第安人提供的是宗教礼仪而不是物质进步。普拉达不希望将印第安人融合到秘鲁社会中去，而是希望恢复印第安人独有的特性，避开西班牙和天主教文化。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不同意冈萨雷斯·普拉达赤裸裸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马里亚特吉在从他青年时代的传统天主教思想到他成为秘鲁马克思主义的创建人这一旅程中，走了一段更加心灵化的道路。1917年马里亚特吉23岁时还是个天主教信徒，他写道，"我首先是相信上帝，在上帝的圣名下，我虔诚而热心地从事一切事业"。他尊敬秘鲁天主教思想的大众化表现。但他从欧洲回国时就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深信有组织的宗教的末日已接近。

天主教会如何对实证论作出反应呢？教会在讲道坛上和报刊上驳斥这种新哲学，拒不承认宗教已成为往事，要求天主教在公共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在墨西哥，人们攻击实证论的教育和政治内容违反信仰自由，与墨西哥的宗教传统不合。在智利，天主教作家在庇护九世谴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与进步的启迪下，挺身而出捍卫天主教。在巴西，杰克逊·德·菲格雷多（1891—1928）被实证论征服了有文化的阶层以及后者对宗教全然冷漠的态度所吓倒，转而采取攻势。在此之前，他曾放弃了他青年时代信仰的天主教会而赞成不可知论，然后又经历了一个重新信仰的转变。菲格雷多在其《教团》一书中，阐述天主教在当今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并试图鼓动天主教会脱离它毫无生气的精神状态，领导一次反对唯物主义的伟大十字军运动。天主教徒与保守集团

561

[19] 同上，第40页。

结盟，也在政治上反对实证论，以便力争各国政府接受其影响，阻挠通过敌视宗教的立法，总之，要维护天主教会的社会地位。例如，在智利，天主教徒通过其政治俱乐部“国家之友”进行工作，为天主教事业、特别是天主教教育事业进行游说（天主教教育通常是改革者的首批目标之一，）他们成功地迫使实证主义者迭戈·巴罗斯·阿拉纳辞去“国家学会”的领导职务。简言之，天主教会反对实证论将它作为一场双方对社会生活影响孰大孰小进行较量的政治仗，天主教会采取的方法是论战的新闻工作与压力集团战术的一种混合体，其结果不一：在哥伦比亚，受挫后，取得圆满成功；在智利，吃了败仗；在墨西哥，几乎全部败北。在各处，依靠社会特权和政府制裁以确保天主教会在反对实证主义攻击时得以生存这种手法，从长远来看是有害的。

天主教会没有在学术上对实证主义作出反应，学术性辩论从未结合进行，至少是在孔德哲学这一水平上是如此。最终对拉美实证论作出了学术性的反应，但是这一反应的启示不具有特别的天主教性质。一些天主教作家的确证明他们自己是有力的护教专家，使宗教问题的讨论走出教堂而进入宣传媒介。在巴西，杰克逊·德·菲格雷多和阿尔塞乌·阿莫罗佐·利马扩大并提高了政治一宗教辩论的条件和质量。但是，他们的著述给人的印象是重论战内容，轻哲学内容。此外，菲格雷多，特别是阿莫罗索·利马，在错误的道路上接受了巴西天主教思想。他们寻求建立政治、社会和思想上的“秩序”，是向实证论本身的一次倒退，从而使实证论增添了一层新的天主教道德基础。他们从诸如约瑟夫·德·迈斯特、查尔斯·毛拉斯和多诺索·科尔特斯等反动的天主教思想家吸取的其它思想使他们披上巴西民族主义外衣，产生了一种不仅对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且对民主制度持批判态度的政治思想，可是，如果说，天主教会失去上层分子和输掉一些论据，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教会输掉了同实证主义的斗争，那就不正确了。孔德哲学在拉美受到欢迎，是作为一种行为体系而不是社会学理论。借

助于孔德哲学使之合法化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到一定的时候因遇到批评、变革和崩溃而被取代，而实证主义本身也变得信誉扫地。实证主义模式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仍有待于解决，而就在这时，社会天主教思想出现了，将这一论点更推进了一步，并赋予宗教以新的重要意义。学术性论战曾经是争取上层人物而不是群众之心 562 的一场斗争。如后文所述，20世纪教会从未失去它在民众阶层中的基础，教会仍然存在，但实证主义失败了，教会可以更直接地同民众讲话。但是，在此种情况发生之前，天主教会必须重新确立它同政府的关系。

世俗时代的教会与政府

天主教会一贯反对政教分离，要求把自己确立为官方的国教；19世纪，这被认为是抵制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和其他世俗敌人的唯一防卫。天主教会为了维护其特权，在各国政府中纵横捭阖并与保守的上层人物联合，而保守的上层人物又利用天主教会以获得政治或财政利益。这就使得教会的反对派进一步下定决心限制天主教会的权力，甚至限制天主教会的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做法甚至在天主教会内部也遭到批评。在法国，在1830年前后，朗梅内神父力争使天主教会独立于政府，以反对高卢派*的传统，并力图说服天主教会自动放弃它从政府获得的妥协性保护。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作出反应(Mirarivos, 1832)，谴责自由主义、新闻自由、政教分离，特别是信仰自由应得到保证的观念。这些观点获得教皇庇护九世的确认和充实，而且即使不是作为信仰守则，也是作为天主教会权威性教导被传播到拉美天主教中去。

* 高卢派（Gallicans）。15世纪后，法国天主教内形成王权派和教权派两派。王权派支持法王加强对法国教会的控制，主张限制教皇的权力，被称为高卢派。——译者

这促使天主教会采取专制主义立场，推迟了教会进入现代世界。同样，自由派也变得不能容纳反对意见，甚至保守派也利用教会的困难乘机得利；因此，两个权力集团相互反唇相讥，关系恶化。

拉美天主教会由于敌人的攻击和朋友们的帮倒忙，在19世纪下半叶不得不承认它已丧失了世俗权力和特权和世俗国家胜利这一事实。但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各国不一。在有些国家，反教权思想如此强烈，以致不仅天主教会与政府分离，而且还对天主教会的宗教职能施加了限制。在其它一些国家，达成了妥协，天主教会继续得到国家津贴，同时从属于国家。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天主教会或多或少仍成为国教，但是在主教任职方面必须接受国家的控制。我们如何说明拉美不同的国家在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一个因素是各国历史和传统不同，在19世纪建立国家的经历差异明显。另一个因素，是某些政府或考迪略的特性，及其信仰的本质。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天主教会拥有相对的权势和财富。在天主教会在教士和资金方面势力大的地方，更有可能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激起反教权活动和忌妒；而天主教会在自卫方面也是处于较强的地位。随后的冲突很可能是严峻和剧烈的，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都是带有决定性的。在天主教会贫困和薄弱的地方，教会并未激起明显的敌视；但教会也无法实行自卫，教会逐渐地、在未出现引人注目的冲突的情况下，发现它们的特权已销蚀。有时，也出现了势均力敌的情况。

563

巴西天主教会的经历也许是最悲惨的，因为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教会同时经历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从天主教国家向世俗国家过渡、从国教到非国教过渡的进程。巴西获得了政治上独立，但未给天主教会带来独立。葡萄牙王室对殖民地天主教会几乎享有专制权力，这是从帝国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的。佩德罗二世仍保有充分的圣职推荐权以及在罗马和巴西天主教会之间进行干预的权利。在此之前，他对宗教持纯政治性态度。他任命主教，

征收什一税，支付教士的经费。但是这个问题超出了皇帝的个人政策。1868年保守派大臣的掌权标志着国家权力和开支有了增长。政客们当时贪婪地觊觎天主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天主教会进一步受到压力。因此，宗教能否取得进展最终取决于人们是喜爱还是害怕君主政体，而不取决于天主教会的内部资金。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天主教会开始的所作所为真正象是天主教会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的话，那么天主教会迅速自取其咎。

所谓的"宗教问题"始于1872年3月，当时里约的一名教士因拒不发誓弃绝共济会而被停职。共济会渗入宗教体制无疑有损于天主教会，这是天主教会领袖所正当关注的事。1872年12月，奥林达主教弗雷·维塔尔·M·贡萨尔维斯·德·奥利维拉下令所有是共济会会员的天主教徒退出会社。后来，帕拉主教安东尼奥·德·马塞多·科斯塔也参与了此事。为共济会会员所实际控制的会社拒不遵从，当他们受到停止教权的命令时，他们求助于皇帝，要求以帝国圣职推荐权对主教施加限制。主教们祈求的教皇通谕从未获得政府批准，因此在巴西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所以这不仅仅是天主教会和君主制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是君主制和罗马教皇之间的矛盾。在巴西政府进行干预之后，教皇庇护九世从他早期支持主教的立场退缩了。但是，政府却不愿罢休，政府于1874年将两名主教交付审判，以侵犯政府执行权力的罪名被判刑4年，但随后就对他们实行大赦。这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使得当时后几届政府对天主教会所施加的比较平淡然而毫不放松的压力往往也就不太显眼了，1878年自由派上台时，开始不间断地攻击教会体制，他们当中的激进派则深信，天主教会同奴隶制一样，是巴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障碍。许多预算条款限制天主教会占有乡村和城市地产的权利；这些条款还企图设置民事登记制，少让天主教会有机会在教育领域"助长无知"。

天主教会从这一经验中并没有吸取多少教训。尽管有"宗教问题"和随后通过的开明立法，但天主教继续支持君主制，反对

564

共和制，想靠圣坛和王权建立联盟以反对上帝和皇帝的敌人。但是君主制垮台了，共和派上台了。对天主教会来说，这使它陷入困境，因没有熟悉的支持者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天主教会对新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影响力，从这些政治领导人方面来说，他们并不急于看到1874年的“宗教问题”重演。他们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1890年，天主教会与政府实行政教分离，这一进程宣告结束并获得1891年宪法的批准。信仰自由，婚姻不必举行宗教仪式，实行世俗教育，当时对这一切都作了规定；还禁止政府津贴宗教教育，一年之后，撤销了政府对教士的财政支援。天主教会不得不接受的世俗化是势在必行，可是，天主教会怀疑共和派的动机，而且是不无原因的，因为共和派对宗教无故地排斥，当时共和派政府曾发布命令，凡顺从誓言约束的宗教教团成员须予剥夺公民权。

565

但1891年在巴西天主教会历史上是重大的一年，是巴西天主教会独立的一年。这并不完全是教权统治集团如何看待此事的问题，他们并不了解政教分离的长远好处；他们深信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已接管巴西，因此渴望得到国家支持，而且仍然通过政治权势以追求公众的影响。但是天主教会当时是得不到这些的，天主教会不得不指望罗马给予领导，依靠自身的资金以求生存。结果，1889—1930年这个时期，是天主教会体制发展的一个时期，因为天主教会从政教分离这一冲击下慢慢恢复过来，逐步使自己适应第一共和国的世态。建立了新的主教辖区，招募了更多的教士，鼓励成立教团。到了1930年，天主教会由于获得外国教士和新的基金而得到加强，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完善的机构，甚至现在它们可以随时声称它们在全国享有法定的以及道德上的盛名。

这些年代巴西天主教会就是塞巴斯蒂昂·莱梅·达·西尔维拉·辛特拉(1882—1942)的化身。西尔维拉·辛特拉曾任奥林达的教士、大主教，里约热内卢的大主教，天主教会红衣主教，并

且是一位政治家。他受到两个目标的启迪：改进教士和人民的宗教生活，力争提高天主教会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他不能接受所谓像在巴西这样的'主要是天主教的国家'，天主教会的影响力竟如此之小的说法，1916年他曾在一封著名牧函中，以叹息的口吻写道："我们是多数，但却分文不值"。[29]莱梅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反对唯灵论、世俗论和实证论。他企图通过引进欧洲教士和欧洲传道的办法以及宗教的进一步公开化使巴西人的信仰更加正统，使巴西人更加见多识广。当时是五十年节、宗教节日，感恩祈祷大会的时代，1931年是耶稣基督教世主在里约热内卢升华的时代。同时，莱梅还正在施加政治压力以争取实现国立学校恢复宗教教育，阻挠任何使离婚合法化的行动，以及确保同情天主教会的政客们能当选。最后，他设法使巴西上层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重新皈依基督教，然后使他们成为俗人使徒的积极分子。已经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先驱，如儒利奥·塞萨尔·德·莫赖斯·卡内罗和若阿金·纳布科。卡内罗成为赎罪派的一名教士，他在最后的布道时呼吁"我们必须使巴西人成为天主教徒"，而纳布科则受到约翰·亨利·纽曼和英国天主教思想的影响。1917年，年轻作家杰克逊·德·菲格雷多跟天主教会讲和，开始同教会的对手和诬蔑者开战。他问道，大多数天主教徒能够允许少数人将其意见强加于全国吗？唯物主义和世俗主义从宗教的无知中吸取力量，因为天主教徒自己对宗教的无知负有责任；因此，菲格雷多开始主办刊物"教团"，建立维塔尔中心，研究天主教教义并动员天主教知识分子。莱梅认为菲格雷多新吸收的成员是俗人信徒的典型，并支持他的全部工作直到1928年他英年早逝为止。同时，莱梅本人于1922年创建了天主教同盟（后来的巴西天主教行动会的原型），以形成一支为天主教会服务的、有战斗性的俗人队伍。对后一代的 566

[29] 伊尔马·马里亚·雷吉纳·多·桑托·罗萨里奥著《红衣主教莱梅（1882—1942）》（1962年，里约热内卢）第66、68页。

巴西天主教徒来说，莱梅无疑已成为天主教会凯旋传统的范例，确实他宁可寻求世俗的力量以捍卫宗教而不是重新考虑天主教会在世界上的地位。他使巴西天主教会摆脱了政教分离的危机，加强了巴西天主教会的组织，使整个民族为之瞩目。

阿根廷天主教会拥有悠久的王权至上传统，尽管其经历不同于巴西。1853年阿根廷宪法规定国家"支持"天主教而不是全国"信仰"天主教。这一支持实实在在，但也可被视为干预，虽然如此，双方实际上相互尊重。关键问题是授予政府控制重要的圣职人员任命权。总统被赋予主教座堂主教圣职推荐权，主教从参议院提名的人中挑选3名。罗马教皇不承认这些权利，但实际上对这一过程听之任之，而且任命由总统提出的人员。所以，阿根廷国家在历史上从一开始就牢固地控制圣职推荐权并一直保留下来，对国家自办教会有偏爱，尽管形式上承认罗马教皇。还有另一种解决政教关系的办法，即通过分离使天主教获得自由，正如巴西天主教会那样获得自由，但是在阿根廷，这主要是少数人的观点。总之，天主教会在这种制度下享有好处，尽管这些好处为时短暂。

567 阿根廷曾享有信仰自由的传统，1853年宪法规定了信仰自由和做礼拜的自由。但是，这种信仰自由是权宜之计而不是一项原则。这并不意味着天主教会已经真正变得宽容了。虽然保证享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显然不都是平等的。天主教被认为是国家的传统宗教，这些年来通过大批欧洲天主教移民到来使得天主教会多数派立场得到加强。此外，尽管天主教徒也赞同思想、言论和信仰的基本自由，但宪法的偏向对天主教徒有利。天主教徒不愿意同非天主教徒分享权利。而且宪法的立场并不十分明确。难道支持天主教，国家就一定要在学校开设宗教课或批准天主教婚姻法吗？

1884年这些问题逼近严重关头，当时已经遭到天主教教权阶层攻击的罗加政府的世俗倾向，由于制定一项新的教育法而达到

高峰。接着在职业教师的压力下，阿根廷政府取消了国立学校正规课程中的宗教课。接着进行一场全国大辩论。阿根廷政府批评天主教徒想要将他们自己的信仰强加于每个人；政府还持如下观点，即主教是国家官员，因此他们不得攻击政府的政策。某些主教们因为反对政府而受到法定诉讼的威胁；使徒代表团被撵走；而且采取措施免去一名主教的职权。为天主教立场辩护的俗人发言人是学者兼政治家何塞·曼努埃尔·埃斯特拉达。他在1884年8月动员舆论的天主教大会上质问道："政府的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普遍的愿望，主要是天主教徒的愿望？"[21]他当时争辩说，对阿根廷绝大多数天主教居民来说，讲授宗教是教育的传统组成部分。不需要强加这种教育，但应当向需要宗教教育的人提供。政府并未被所动，埃斯特拉达却因反对政府的政策而被解除了一切学术职务。 568

在婚姻法问题上，发生了另一场意见冲突。1888年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法并不禁止宗教礼仪的婚礼，但要求在举行婚礼前举行非宗教仪式，这对所有婚姻都是强制性的。这个新立法像宗教教育法一样，是罗加政府和华雷斯·塞尔曼政府(1880—1890)为了保障人身自由而推行的世俗化政策的组成部分。这一政策在阿根廷得到大力支持，但是天主教却认为这一政策是对宗教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全面攻击。继上述两届政府之后的佩列格里尼政府、萨恩斯·培尼亚政府和乌里武鲁政府对天主教徒更加宽容，因为当时已经赢得了这一基本立场。到了19世纪末，世俗化已基本完成，阿根廷成为一个世俗国家。这一结果是在未发生暴力或内部骚乱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结果也为那些切望表白天主教和世俗国家并非水火不相容的天主教徒们所承认，尽管在阿根

---

[21] 引自耶稣会会士吉列尔莫·富尔隆著《1860—1930年阿根廷天主教》，全国历史学会，《1862—1930年，阿根廷现代史》第2卷、第1部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第273页。

廷正如在巴西一样，还有一支为昔日事业而战的保守派。但是天主教会和政府实现和解的基本原因是，阿根廷天主教会既不富裕又不强大，处于一种既不能煽动又无法防卫的地位。

乌拉圭的天主教会拥有的权势甚至还不及阿根廷，而乌拉圭的教会统治集团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甚至更小。1984年，全国300万人口中，只有3.8%信仰天主教，每4,300人中仅有一名教士。在现代，这种非基督教化究竟发生于何时，现在还很难说。但是，显然是有其历史根源。在19和20世纪，乌拉圭放弃宗教而转向世俗论。

1838年，乌拉圭教会和政府之间开始出现了矛盾，当时弗鲁克托索·里韦拉镇压方济各会修女院，没收它们的财产。在随后几年，耶稣会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接着又一度重新获准入境，后来又被撵走了，据说是因为干预了国家大事，但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受政府管辖，而当时政府正试图建立它的权势和权威，以反对一切敌对的组织。当1860年贝尔纳多·贝罗上台时，乌拉圭政府变得甚至更加敌对了，而且还采取若干还俗措施。贝罗是共济会会员，他发表意见说，基督教是一种统治和压迫的手段，他利用他的权势以削弱天主教会并贬低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在贝罗的继位者贝南西奥·弗洛雷斯领导下，作出了反应，弗洛雷斯首先重新接纳耶稣会传教士到乌拉圭。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乌拉圭天主教会特别是在教育和婚姻问题上仍不断受到压力，而在当时，这两个问题在整个拉美都存在着。1885年，乌拉圭通过一项新法律，使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成为强制性的，而且使之成为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婚姻形式。况且，国家对天主教会的津贴也逐渐减少。从1904年起，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对官方的教会与政府关系给予最后一击。他是共济会会员，是积极反对教权的，毫不隐瞒他对宗教的藐视。他消除了社会生活中和建筑物上的一切宗教符号。他制定了全国第一个离婚法，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教育；1909年，禁止在国立学校开设宗教课。政府甚至

569

以世俗节日代替宗教节日，以儿童节取代主显节，以旅游周取代复活节之前的一周，以海滩节取代圣灵纯洁节，以家庭团聚节取代圣诞节，无疑这是某种自由意识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这个事例有助于说明天主教对拉美自由主义思想的反应。到那时，来自乌拉圭天主教徒（真正天主教徒如此寥寥无几）的反对如此之小，以致政府在完成1919年3月1日新宪法规定的世俗化工作方面没有什么困难，当时，对天主教会实行政教分离，而且成为正式的政教分离。这就使宗教获得自由，而且使得教会在一个基本上是冷漠的社会里依靠本身的资金以求生存。天主教会的资金是引人注目的；在20世纪20年代，乌拉圭仅有85座教堂和200名教士。但是，乌拉圭天主教会固然弱小，却比邻国巴拉圭的教会强大，巴拉圭的教会是从1870年战争恐怖中恢复过来的，比起全国其余居民，教会的规模几乎未缩小，士气几乎未受挫。而在此后几十年，巴拉圭教会却筋疲力尽地倒下了，通常保持沉默；受到保守派的轻视，偶尔受到自由派的攻击，基本上为历史所抹煞。

智利天主教会不同于其它南端诸国的教会，它曾在国家事务中拥有重要发言权，可是它未成为造成该国严重分裂的一个原因。19世纪，天主教会特权不断削弱，而不是全面的对抗。事实上存在着宗教信仰自由，尽管宪法上并未明文规定；鉴于智利的商业利益和外国人的流入，几乎不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1865年，法律允许所有的教派做礼拜和建立学校。后来，当自由派和激进派控制着政府时，天主教会丧失了许多其它阵地。1874年取消了对教士的豁免权；1883年，墓地不受教会的管理，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已成为强制性的了，1884年，一切民事记录均由国家掌握。虽然天主教会对所有这些步骤采取后卫行动，但世俗政府的进展并没有停止；在以后的40年，两大权力集团共存，政府继续津贴天主教会。 570

智利天主教会的土地或财产并不富裕，因此智利天主教会不可能被自由派确定为经济进步的障碍。但是，在19世纪晚期，天

主教会结交了一些有争议的政治盟友，而且与他们的保护者（剥削者和分裂派）——保守党站在一起。为了获得保守派的支持，天主教会必须在选举中以资助、许诺和选票付出代价。这一联盟促成天主教会内的分裂，造成主教和教士，教士和俗人以及俗人中间的分裂。教会眼光十分短浅。1891—1920年间，智利是由一个以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的联盟为基础的强大议会制政府所统治。这个政权对工商业界新的中等阶层和北部矿区产业工人阶级的增长无动于衷，对变革的要求置之不理。天主教会的教训应当很清楚，那就是保守思想的社会基础正在缩小，政治结构已作好变革的准备。虽然教会未曾察觉时代的预兆，却不能不看到保守派联盟中的破裂。

因此，当时与政府取得最后谅解的情势是正当的。阿图曼·亚历山德里是个激进分子和主张改革的总统，1920年他第一次上台。他要求政教分离：这是他的党的一贯政策，这个政策也可能产生使教会脱离保守派并加强中间阵地的政治效益。大主教克雷森特·埃拉苏里斯也要求教会独立于政府，不受保守党剥削。虽然不是所有的主教都同意，但教会里的许多人跟随大主教，认为实行政教分离会使教会的行动自由，有助于一支公正的教士队伍的形成。罗马教皇看来也同意这些观点。亚历山德里同教皇庇护十一世及其国务卿加斯帕里红衣主教磋商，并附有某些条件地接受了他的提议。罗马在处理教会与政府矛盾方面有了经验，认识到这是一场只能有损于天主教会的败仗，如同在墨西哥那样。另一方面，和平磋商的政教分离给了智利教会以自由，罗马则对圣职推荐权加以控制。这种经和平磋商达成的分离，远远优于在胁迫条件下接受的分离。因此，梵蒂岗指示智利教会统治集团接受这种分离。 571

1925年的智利宪法规定政教分离，规定一切宗教可以自由开展活动，但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法人资格，而且如同所有宗教一样，确保罗马天主教会有权占有财产而免征赋税。取消了政府对

教会圣职的任命权以及对罗马教皇通讯的否决权。许可天主教会建立主教辖区、神学院和宗教社团而毋需经国会的批准，而且允许保持天主教会自己的教育体系。停止了国家对教士支付薪俸以及对教会的其他津贴，但在这一过渡中采取减缓措施，付给教会每年总额250万比索，为期5年。教会内部教士和俗人的意见相衡，主张政教分离的占优势。无疑，智利仍有支持保守派联盟或甚至进一步沿反动道路走的右翼天主教徒。但是，天主教会享有特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秘鲁采取了一条与南端诸国不同的道路，它倾向于教会与政府密切联合，一个具有合法特权的另一种官方天主教的联合。在秘鲁，自由派的反教权思想比较温和，从未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上层分子中西班牙文化和传统的持久存在和广大群众中的宗教热情，使反教权思想无法实现。就教会的财富和影响而言，秘鲁在同类型的天主教会中占有中间地位，这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不会激起矛盾。在秘鲁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自由派打算关闭许多修道院和减少教士和修女的人数；根据1856年的自由派宪法，教会审判权和什一税被取消了。此举看来使大部分秘鲁人感到满意。1860年，拉蒙·卡斯蒂利亚总统推出一部旨在调和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宪法。新宪法宣布国家保护罗马天主教，不许公众有任何其它修行；宪法保护天主教会的财富和财产；确保天主教会实行自主，不受政治控制。但是，新宪法禁止教会（和军人）行使审判权，取消由政府征收什一税，代之以政府每年给予津贴。新宪法还规定一种公共教育制度，从而结束天主教会的垄断。因此，这部宪法使天主教会和自由派都有所获，除了1867年一个短暂的"纯"自由派间隔外，这部宪法一直持续到1920年。天主教会接受这部宪法，认为它是一个良好的安排，确实也是如此，因为教会得到安全、权威和财富。天主教会从这一基础出发，改善教会结构，确定面向罗马的方针，并成为全国生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572

但是这不是一个持久的胜利。从19世纪70年代起，秘鲁天主

教会失去了在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的影响，因为世俗价值观开始盛行，实证主义和更激进的影响开始取代上层分子心目中的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天主教会在特权人士中失去的东西，则设法在穷苦人中得到补偿。它在山区印第安人和乔洛人中的影响继续发展未受干扰，但是当时它还在城市工人中寻求一批新的选民。刚兴起的工业化和产业工人阶级的出现，将工人权利问题纳入政治辩论中，并在劳工组织中进行了初步尝试。在秘鲁，天主教会也谋求起一定作用。例如，在阿雷基帕，天主教会在确立早期的工会制度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地互助会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1896年成立的天主教工人社团。但是，天主教会并不是替印第安人，农民和工人说话的唯一代言人，在秘鲁，天主教会发现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阿普拉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教会和宗教的敌人，于20世纪20年代焕发了生命力，只是后来才乞灵于《福音中》的社会启迪和作为改革者的耶稣基督的作用，这是为了抢先争得官方宗教的地位，并将下层阶层的宗教热情转向它自己的政党。阿普拉党对天主教会的政治同伙也是敌视的。奥古斯托·B·莱吉亚总统（1919—1930年任职）所主张的发展模式（即不受限制的外国投资和初级产品出口经济）遭到阿普拉党而不是天主教会的批评，因为天主教会曾经同秘鲁政权保持紧密而和解的关系。大主教埃米利奥·利松1923年4月25日在一封牧函上宣布，他正准备在利马阿马斯广场的一次仪式上将秘鲁献祭给耶稣的圣心。他还邀请莱吉亚作为"天主教堂守护神"主持仪式。这个提议是个很虔诚的、但却是有争论的想法，因为它使许多天主教徒很难堪，又激怒了世俗论者，对独裁统治却是一份厚礼；它被指责是对政教合一的滥用，是对信仰自由的冒犯，赞成这一提议的见解也不是很有说服力的。阿普拉党未来领袖领导的抗议运动获得了势头，大主教面对街头的暴力，中止了仪式，他声称这一仪式已经变为一场"反对合法建立的政府和社会体制"的运动。[22] 教会与

573

[22] 引自克莱伯《1824—1976年秘鲁宗教与革命》一书，第133页。

国家的关系有各种模式，这个事件树立了一个典型，也是一个说明。

对玻利维亚教会与政府的历史关系进行分门别类是不容易的。19世纪，梵蒂冈和玻利维亚政府在控制教会圣职推荐权方面长期有争议，1851和1884年通过宗教事务协约加以解决的尝试失败了。玻利维亚中央政府继续任命主教，而梵蒂冈却不愿予以确认。玻利维亚天主教会从政府各项政策和目前资金中获得的力量已不如往昔，它在该国的影响有数世纪之久并且在已经基督教化了的印第安人中仍有力量，他们继续不定期地要求教士主持圣礼。在19世纪，天主教会从国家那里获得自相矛盾的信号。如果说自由派通常是敌视的，那么保守派则是无法预言的，而且不是天主教会的天然盟友。1880年，天主教失去什一教区税和初次收获税，而只由国家给予津贴；与此同时，对教会财产实行免税。在经过20年的保守派统治之后，1898年自由党重新上台，1906年发布信仰自由的命令，这一着使天主教徒为之惊慌，但并未使新教教徒人数大幅度增加。天主教会还丧失了它对墓地的控制，1908年使墓地改作俗用。1911年，制定一项新婚姻法，只承认依民法登记的婚姻才具有约束力，但随后可以举行宗教仪式。由于自由派的下台，天主教会恢复了它已经失去的一些阵地。1920年，根据教士和印第安人的共同要求，允许印第安人的宗教婚姻履行民法规定的必要条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会经历了体制上的发展，1928年它恢复了在国立学校讲授宗教的地位。

有人认为，政府组合、政治信念和教会权势的规律性使三者有可能汇合起来在政教关系中产生紧张和矛盾，并促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哥伦比亚，那里的矛盾在极大苦难和偶尔诉诸暴力的气氛中有了发展，最终获胜的是哥伦比亚教会而不是政府。自 574
由派采取了主动。有些自由派仅仅希望获得信仰自由，另一些自由派则决心建立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控制，以防止教会卷土重来。托马斯·西普里亚诺·德·莫斯克拉总统（1845—1849，1866—

1868）即上述自由派人物之一。他对19世纪中可能最激烈的反天主教会政策和所谓政府对天主教会享有“教诲”权的主张负有责任。莫斯克拉的自由党制定了里奥内格罗宪法（1863），这一宪法可以视为自由派教会政策高潮的标志。自由党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不准教士担任联邦官员，禁止天主教会干预政治事务，这些事情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但却可应用于反教权活动。此外，在墨西哥通过类似立法之后（见下文），自由党禁止教会社团获取并占有不动产。而且，1861年9月9日的法令规定法人财产不得转让，并强制实行公共拍卖。政府希望使财产进入市场，以便个人更容易获得。这些措施的结果只不过是使财产进一步集中，而且往往是由贪得无厌的个人作为地主和债权人取代天主教会。教会本身拒绝合作。教会维护财产占有权，谴责拒不承认这一权利的人，惩罚对这一权利持妥协态度的教士。信徒被告诫要提防自由主义思想，不得对1863年宪法宣誓效忠除非将反教权部分删除。而且罗马支持哥伦比亚天主教会。庇护九世1863年在给哥伦比亚主教的通谕中，谴责自由党政府在反对天主教教义和权利方面犯有“渎圣罪”。

从1870年起，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人了另一个危机时期，当时哥伦比亚政府实行早就该实行的教育改革。1870年11月1日的初级教育法，规定在哥伦比亚全国实施免费义务初级教育；国家将不提供宗教讲课，但教士可以在学校内讲授。教会统治集团中的有些成员，特别是温和的哥伦比亚大主教比森特·阿韦拉埃斯，愿意承认世俗学校，确实愿意同政府达成普遍和解。但保守的天主教徒拒不妥协。在考卡省，教士们是不妥协的反对派，自由派谴责该省出现了“新天主教狂热”。在帕斯托，天主教徒纠集力量保卫宗教，反对无神论和自由主义。波帕扬主教卡洛斯·贝穆德斯阁下禁止家长将其子女送往国立小学，违者革除教籍，他援引“错误批判大纲”并坚持天主教对学校的控制。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反宗教狂也在部署他们的战线，出现的政治歇斯府里有他

575

们的一份。介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温和派教会人士未能够建立中间阵地，理智让路于反动。因此，反对教育改革促成了1876年的保守派天主教革命和1876—1877年的内战。

在考卡省爆发了革命。革命呈现宗教十字军以及政治斗争的局面。保守派利用宗教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众所周知的。据报道，一名被俘的保守派陆军上校说，“假如我们不曾拿宗教作为借口，我们甚至连一半的人民都不能武装起来”。[23]这种态度对天主教的反对派起了加倍的煽动作用。战后，自由派国会决定一劳永逸地停止教权对政治的干预，办法是制定立法以完成哥伦比亚的世俗化，以防止教士反对联邦法和州法；有4名高级教士因所谓煽动革命罪被流放10年。

矛盾的进一步周而复始，导致了1885年保守派革命。1886年颁布了一部中央集权主义的权力主义宪法，以及同梵蒂冈达成一项新的宗教事务协议，这一切使天主教会树立了最高权力和特权地位。这一新秩序，一方面保证教会“自己的独立性”，一方面授权采取对教会今后多年有利的若干特别措施，特别是在大学、学院和学校宗教教育的管理与实施方面；承认天主教婚姻仪式对天主教徒具有法律效力；并发表声明，承认教廷有权为空缺的主教职务提名，但对哥伦比亚总统的意见给予优先考虑。拉斐尔·努涅斯总统原先曾带头主张教会不动产不得转让，后来却成为亲教权的保守派，他恢复了天主教会实际上未予转让的一切财产，并同意支付天主教会一笔年补助金，相当于财产出售的价值。保守天主教徒（占哥伦比亚天主教徒的大多数）对于他们因取得胜利而证实合法合理采取的政治干涉和军事行动感到满意。正如帕斯托主教埃塞基耶尔·莫雷诺阁下1900年在一封牧函中所说的，“教士可以而且应当干预政治和支持本质上是天主教的政党以反

[23] 简·迈耶·洛伊著《哥伦比亚联邦时期的初等教育，19世纪70年代学校改革》，载《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51/2（1971）第275—294页。

576 对自由派政党”。尽管教皇禁止教士参加内战(1900年7月12日)，但莫雷诺主教坚持认为教士可以勉励天主教徒“拿起武器进行一场正义战争，现在发动的反对自由派和共济会革命者的战争就是一场正义战争”。[24] 这位主教在遗嘱中提出，在为他举行葬礼时应立一巨型标语牌，上书：“自由主义是罪恶”。

从1886至1930年，哥伦比亚天主教会巩固了它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维护权力和施加权力方面提出一个可作教训的实例。首先，哥伦比亚天主教会支持政府并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作为交换条件，天主教会赢得了一些重要特权。第二，教士们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行政管理方面的专门知识，这就使得他们在政府影响力薄弱的地区行使地方政府职能时，成为必不可少的了。第三，教会控制了教育，因而也控制了许多哥伦比亚人的职业前途。最后，教会握有开办和关闭报刊的权力，从而提供教会对宣传媒介施加影响和堵住敌人嘴巴的手段，而且使它在争取公共舆论的斗争中得到特殊的好处。哥伦比亚教会获得这一成就，部分是通过它本身固有的实力，部分是因为政府的软弱。类似的提法也可适用于厄瓜多尔，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越过了政治上可能允许的界限。

1860—1875年，天主教会在厄瓜多尔的影响达到了高潮。当时，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已经是一名炽热的罗马天主教徒，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与牺牲品。他维护耶稣会教士，钦慕庇护九世，使自己成为厄瓜多尔的独裁者，并使他的政府置于天主教会的监护之下。加西亚·莫雷诺相信宗教是真理，但他同时也重视宗教的真理，因为这一真理具有可以看得见的政治与社会功利，可以作为稳定政府、建立社会秩序的一支力量。他认为，天主教会是政府的高级合伙人，通过天主教会是治理厄瓜多尔的唯一办法。他雇用一批改革派教士以宣扬对政府以及对上帝的效忠。根

㉔ 费尔南·E·冈萨雷斯·G·著《政党与教会的权力》(波哥大1977)第161—162页。

据厄瓜多尔的政治选择和拉美其他地区政府建设的经验，他可以声称他的经验具有一定的正统性。第一步是与罗马教皇(1863)达成宗教事务协约。该协约承认罗马教廷行使教会圣职任命权，将大学到小学的整个教育体系置于天主教会完全控制之下，确认教会有权获得什一税，保证教会占有和获取财产权，规定厄瓜多尔政府必须宣传天主教教义并援助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传教团。在签订宗教事务协约之后，厄瓜多尔在1869年按“错误批判大纲”模式制定了宪法。根据宪法，只有教会的权力才能超越总统的权力。宣布罗马天主教是国教，信奉天主教教义成为取得公民资格的一个必备条件。必须予以指出的是，加西亚·莫雷诺关于教会的理想是改革派教会的理想，在他的政权统治之下，教会组织、神学培训和教士纪律方面有了具体改进。此外，他认为，“宗教是留给我们这个国家的唯一纽带，因党派、种族和信仰的利益而造成了纽带的破裂”。[25]然而，归根结底，这个小小的教权国家只不过是世俗的天堂。天主教会充满了权利、特权、权力，但这一切取决于教会的恩主，并未导致自主的发展。独裁统治是强调个人作用的，是有限度的。加西亚·莫雷诺于1875年8月6日在基多广场被暗杀。

厄瓜多尔天主教会并未因丧失其庇护者而立即遭殃。在那以后的20年，保守结构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1895—1896年一场自由派革命扬言要推翻教士联盟而将乔洛人埃洛伊·阿尔法罗推上台时，天主教会号召拿起武器。舒马赫主教带领一小支部队反对阿尔法罗，呼喊“要上帝就不要撒旦”的战斗口号。基多大主教谴责自由主义是“巴比伦的巨大邪神”，并敦促天主教徒为宗教而战。并非所有教士均同意上述观点。也并非所有自由派都是反宗教狂。1897年的新宪法确认罗马天主教是国教，排斥所有其它宗教。但是相互对立使辩论更趋激昂，在新的反教权主义浪

[25] 引自丁·劳埃德·米查姆著《拉丁美洲的教会与政府》，（查珀尔希尔，1966，修订版）第151页。

潮中，教会为它的不妥协精神付出了代价。1899年，一项新的圣职任命法赋予国家举荐大主教和主教的权利，于是梵蒂冈断绝了 578 外交关系。1902年，实行依民法规定办理的婚姻制和离婚制。1904年，提出了保障宗教自由，中止什一税，禁止建立新的教团，对教会使用它自己的收入加以限制。1906年，在另一部宪法中，规定教会和国家实行分离，国立学校取消宗教课，但未阻止教会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至于教会的财产，1908年规定教会的土地不得转让并被收归国有。这样，自由派将厄瓜多尔推进到了20世纪，使国家世俗化，并剥夺了教会的世俗权力。这就是现代世界的准则，义无反顾。但这是精英政治，尽管广大群众无疑是天主教徒，但没有人找他们磋商。

委内瑞拉也是由代表地主、商人和官吏的精英人物的考迪略所统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只是在1935年之后，才逐渐扩及民众阶层。因此，过去历届政府制定的教会政策也并不是全国辩论与协商的结果，而只是得到某一联合阵线支持的个别独裁者的决定。可是，如果将委内瑞拉天主教会的衰落归因于诸如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等考迪略执行的反教权政策，那将是错误的。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看来有所不同。1830年之后的年代，委内瑞拉天主教会是从一个低的基线**开始**的。而且，这是天主教会在结构、人员和资金方面固有的弱点，这些弱点可以使国家随心所欲地处理天主教会问题。委内瑞拉过去处于西班牙帝国和天主教会的边缘，委内瑞拉大部分地区几乎尚未实现基督教化。当时，使教团遭到破坏，平原地区则无教士。甚至在中北部地区，也缺乏主教指导、教区教士和新的人员，而基金短缺对教会传教活动是一个根本限制。然而尽管天主教会无权，但它仍有发言权，教士们表示他们对一方或另一方的政治倾向，并不总是倾向一方，而且很少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因为教士们被卷入委内瑞拉19世纪特有的考迪略政治和主从关系中。教士们如若介入这一类的党派偏见，将会受到严惩。

天主教会是在委内瑞拉共和国最初几十年脱颖而出的，它保持相对的完整性。1834年，宣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取消什一税，教会圣职任命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教会每年从国家获得一笔预算。何塞·安东尼奥·派斯总统在1863年倒台之前不久，还接受了罗马的亲教权的宗教事务协约。随着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1870—1888)的出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布兰科是自由派的全国领导人，是推行“秩序与进步”方针的独裁者，是共济会会员和反教权主义者。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他不会 579 容忍教士们在报刊上和布道中支持保守派。加拉加斯大主教西尔韦斯特雷·格瓦拉接受挑战，拒绝为古斯曼·布兰科安排赞美诗班，并拒绝按照党的政见任命教士的授意。他立即被流放到特立尼达，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他根据庇护九世的建议辞职才结束这一僵局时为止。在这种表面上不同意志的琐屑冲突的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专断的考迪略古斯曼·布兰科绝不允许向别的任何人效忠，不允许有敌对的领袖。他以此自恃，通过一系列反教权的立法。1873年，天主教会的教士豁免权被剥夺了，出生、婚姻和死亡注册以及对墓地的管辖权被剥夺了；依民法登记的婚姻成为唯一合法形式，并优先于宗教仪式。1874年，这位独裁者取消了所有的男女修道院，学院以及其它宗教机构，取消神学院，没收教会财产，中止对教会的津贴，颁布俗人教育法。从古斯曼·布兰科的所作所为，以及从他想要办、但遭到失败的事情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状态。他试图使教士的婚姻合法化，甚至建立摆脱罗马控制的国家教会。但是他不允许任何人阻止他在加拉加斯建立共济会寺庙。到他的政权告终时，所制定的立法几乎已经排除了天主教会的存在。1881年在整个委内瑞拉，拥有教区居民总人数超过200万的639个教区仅有241名教士。

在随后几位考迪略统治下，委内瑞拉天主教会恢复了一些已失去的阵地。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1899—1908年执政)专横独断，不屈服于任何人，但他对天主教会却比较仁慈，并未实施所

有的反教权立法。许多教团开始恢复活动，神学院重新开办。1904年宪法宣布罗马天主教为国教，国家对教会给予支持。胡安·比森特·戈麦斯(1908—1935年执政)对教会当局是适度容忍的，但任何教会人士胆敢批评，则很快会因冒犯独裁者而招惹是非。因此，到了这个时期结束时，委内瑞拉天主教会已按照考迪略的意愿至少公开地进行了一些更新，虽然教会的福音渗透到社会有多么深还是个疑问。在上层人物中，有许多人为实证论和独裁统治的社会学分析所诱惑。在下层阶层中，对玛丽亚·利昂萨、黑人普里梅罗和女黑人马特亚以及对20世纪民间医生何塞·格雷戈里奥·埃尔南德斯的崇拜的残存现象，证明了天主教会尚未开始填补的人民生活中所缺乏的宗教信仰。

580 在中美洲，天主教会在适应19世纪自由派政府方面有所不同的经历。在危地马拉，1825—1838年期间出现的第一次突然掀起的自由派狂热中，开始了对教会世俗权力的攻击，当时偏激的反教权措施使广大天主教徒产生反感。紧接着，从1839年直到1865年，在拉斐尔·卡雷拉统治下，保守派作出了反应。卡雷拉决不仅仅是教士的工具，而且还是一名领导印第安人起义的民众主义考迪略，他领导的起义深孚众望，取得成功，推翻了欧洲型的自由派政府。卡雷拉是印欧混血儿，但印第安人血统多于白人血统。他了解印第安人社会，承认村社，保护印第安人的土地，减少印第安人的税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恢复了天主教会的传统影响和特权，并和罗马保持良好关系；至今还没有迹象表明人民群众当时还希望什么别的东西。但是教士们同1871年之后保守派企图夺回权力一事有牵连，这就把自由派内部更激进的分子推到了重要的地位上。1873年，这些激进分子坚持彻底的反教权纲领。同年，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出任总统。他镇压教团，消除教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宣布依民法登记的婚姻为合法，教育实行世俗化。1879年宪法确认了这些措施，完成了世俗政府和教会的相互分离。一方面，天主教会就这样丧失了它的世俗权力，另

一方面，许多教士被撵走了，这就减少了教会在危地马拉的实际影响，而教会的种种活动很难不受政府的干预。

危地马拉在中美洲教会的经历中具有典型意义。中美洲有处理此问题的标准模式，独立后年代出现了狂热的自由主义思想，接着是到大约1870年，保守派作出了反应，后来由强制推行古典世俗主义的自由派政权所接替。在洪都拉斯，自由派从1880年开始执政。同年，实行政教分离，对教会财产征税，教会财产被减少到现用的教堂和教士住房。在尼加拉瓜，1857—1893年的保守派政权允许天主教会存在而未触动其特权，直到1893—1904年在何塞·桑托斯·塞拉亚统治下才实行政教分离，教团受到镇压，主教和教士被流放。在萨尔瓦多，自由党从1871—1945年居于统治地位，该党制定了一部规定政教分离，实行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以及关于离婚和推行俗人教育的新宪法；在萨尔瓦多，教团也遭到禁止。在哥斯达黎加，从1864年起就有了宗教信仰自由，1884年自由派政府下令驱逐耶稣会教士和圣何塞的主教；推行俗人教育以及其他具有自由主义特色的措施，但并未严重损害教会或教会与政府的关系。 581

在墨西哥，天主教会比政府强大，教士比政客们享有更大的特权。两个权力集团之间的关系通过战争加以解决，仅仅一次战争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古典的自由派政策以1856—1857年的改革法达到了高峰。1855年11月23日的华雷斯法取消了教士的豁免权。莱多法，或称1856年1月28日不动产非转让法，下令教会社团处理其不动产，将其售予佃户或公开拍卖。1857年2月5日，立宪大会颁布一部新宪法，立宪大会是由自由职业的自由派和不能代表天主教舆论的人士所控制。这部宪法规定出版和言论自由；禁止教士参加国会选举；政府可以干预信仰；华雷斯法和莱多法获得确认。莱多法未剥夺教会；它只不过将教会的土地和财产转移为资本和抵押品。抵制这一法律，也许是出于判断上的错误，罗马教皇对此错误也负有责任。其结果是，使墨西哥陷入一场“宗

教与法典”和“宪法与改革”之间的内战。这场内战从1858年持续到1860年，教会卷入了这场内战成为交战的一方。

因为交战各方倾其财富投入这场战争，天主教会因战争而蒙受的损失甚至更大。1859年，自由派政府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使政教分离，镇压一切男性修会。随后，通过了不举行宗教仪式的婚姻法和民事注册法；1960年确定了宗教信仰自由。随着1861年的胜利，自由派开始实施改革法，使教会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脱离教会。最引人注目的胜利，是有关教会财产事宜。可征用的教会财富约1亿至1.5亿美元，大大低于政客们和公众所想象的。㉘对墨西哥造成的最大损失，可能是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失去了收入，从而使社会服务方面在今后许多年留下空白。苦难并不就此结束。教会对自由派的胜利作出了反应，鼓动法国进行干涉，期望从一名信奉天主教的皇族那里重新获得被墨西哥自由派夺去的东西。但是这一幻想很快破灭。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无意取消改革法或恢复教会财产；当1867年法国撤退时，天主教会比以前更加脆弱了。

582

恢复的共和国对天主教徒来说不是幸福的时代。在宽容的华雷斯政府(1867—1872)之后，塞瓦斯蒂安·莱多·德·特哈达政府(1872—1876)是强烈反教权的。天主教们曾经常预言，自由派不会满足于政教分离，而是会着手攻击教会的宗教职能。莱多当政时那些预言应验了。1873年，反对教团的运动加剧，许多教团人士被撵出他们的住房，其他人则遭监禁；10名耶稣会教士，6名受难会修士，2名世俗教士和1名保禄会神父以及所有外国人，均被驱逐出墨西哥；教士团因主持事前未进行民事注册的圣礼而被检举。这些事件仅仅是反教权运动的开始，反教权运动包括官员立誓忠于宪法，驱逐慈善姐妹会，将所有改革法编入宪法(1873年9月25日)，最后，制定机构改革法(1874年12月14日)，重申对财产、

㉘ 见罗伯特J·诺尔顿著《1856—1910年的教会财产与墨西哥改革》(德卡尔伯，1976)第121页。

教育、教士服装以及教堂以外的宗教活动所用的土地实施反教权法。

天主教徒对这些残酷措施究竟反应如何呢？主教们提出强烈抗议，对遵守反教权法的人们加以责难，但在另一方面则建议天主教徒对该法持听之任之的态度，最多是“消极抵抗”，劝诫天主教徒虔敬和祈祷，劝告他们为圣比森特·德·保罗会社和其他慈善机构工作。但是，保守的天主教徒在莱多政府偏执政策的刺激下，向周围寻求政治替代办法，要么同自由党的持不同政见派别结盟，要么在1874—1875年发动小规模武装起义，即所谓“宗教起义”（Religioneros），有少数当地教士和天主教农民参加了这一起义。当所有其他均告失败时，只有一条生命线，即求救于波菲里奥政府。从波菲里奥·迪亚斯这方面说，他认为实行和平治理需要得到天主教徒们的支持。

波菲里奥·迪亚斯认为他自己“私下是天主教徒，是家长”，但作为“政府首脑”，他不表明信仰任何宗教，因为法律禁止。他的政权是建立在和解基础之上的，他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他尽管忠于宪法，但同时也提出一项容忍政策，即“个人信仰即使有偏差，也应得到尊重”。[27]这也就富有政治含义了，因为他认识到，敌对的天主教会可能破坏政权的稳定。所以他与主教们培植良好的个人关系，当天主教徒开始胆敢从地下冒出来的话，他也就视而不见。这不是说，在波菲里奥统治时期，反教权主义思想已消失。在报刊上，在国会里，以及在一些官员中，这一思想还是很活跃的。看来只有迪亚斯是站在天主教徒及其敌人二者之间。

583

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一举仍在继续，接近于完成；在政治上和实践上，这已不可能逆转，对业已转让的财产，也不可能归还了。在另一方面，迪亚斯允许教会再次以并非法律严加禁止的形式获

---

[27] 引自森尔赫·阿达梅·戈达尔德著《1867—1914年墨西哥天主教徒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墨西哥，1981）第101页。

得财产，诸如对铁路、矿山、电报系统、制造业的财产所有权，据说，甚至包括改革前抵押与不动产方面的所有权。这往往是通过可靠的俗人和律师经办或通过其他手段实现的。这些费用有许多用于宣传，人们可能永远不了解其真相。但是教会在财富以外的其他方面也利用了迪亚斯时代的良机。可以在教堂之外举行了列队仪式，可以公开穿着教士服装，并可举行天主教婚礼。这正是复兴时期。教团默默重建起来，若干新的墨西哥教团成立了，这些教团往往专长于慈善事业。耶稣会传教士以及西班牙和其他外国教士返回墨西哥。由于耶稣会传教士吸引墨西哥人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威信提高了。教会开办自己的学校，提供各种各样社会服务。建立了新的主教辖区，天主教堂从1878年的4,893座增加到1895年的9,580座。天主教会在波菲里奥时代取得的新地位，集中体现在1895年瓜达卢佩圣母的加冕礼上。当时，组织了有主教、教士和俗人参加的大规模集会，以象征墨西哥团结在墨西哥基督选民崇高道德之理想周围。

尽管教会取得进展，但它已不能恢复1856年以前的年代享有的权势与影响力。1895年，每1万居民中，教士不足3人；1886年，有140,000名儿童上天主教学校，却有477,000名儿童上世俗学校。1896年，第五届墨西哥州议会下令教士在所有事关教会享有舆论自由的问题上仍不得涉及政治问题。至于保守的天主教徒，他们为参加1877年选举作出无效努力之后退出政治活动。和解政策尽管尚未满足天主教会的全部要求，但却为1910年后的革命者留下了攻击教会、再次没收教会财产并恢复教会改革工作的借口。

584

1870—1930年这个时期，大部分拉美天主教会失去了政府的支持，它们不再依靠法律和政治制裁来促进和保护宗教了。天主教徒最初不欢迎他们的新地位，对宗教信仰自由、社会多元论和政治独立也未作出积极反应，而是继续反顾，指望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和政教合作的教会，并作为理想用以评判当代与此相悖的世俗趋势。但是逐步地进行了调整，天主教会以内部更新换取外

部的支持。由于政府拥有对民事注册的专属管辖权，只给教会留下纯粹主持圣礼——洗礼和婚礼——的任务，而教会当时对此只得接受。国家教育的世俗化迫使天主教徒改进他们自己的学校，或是制定讲授基督教教义的其他办法。这使信教者和非信教者的差别更加明显，使宗教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习惯。结果是，天主教徒的实际人数减少了，但天主教会的精神生活有了加强。此外，与政府分离是采取独立的社会行动的先决条件，这是事态发展给教会提出的一项新任务。

宗教、改革与革命

与此同时，即1870—1930年，天主教会实现了独立和改革，因为在大规模移民、外国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下，社会本身经历了深刻变化。但是，1870年左右开始的教会改革和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天主教社会意识之间仍有一段时间上的差距。这一差距要求社会环境施加引人注目的影响，要求罗马给予紧急推动，使教会觉察到实行变革的必要性。移民问题严重地考验了许多国家的教会组织。与此同时，刚刚兴起的工业化产生了一支基本上不为教会所了解的城市工人阶级。经济变革和人口的增长，对有组织的宗教的影响在大城市里最为明显。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利马和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870—1930年这段时期有了迅速增长。新的移民不断涌入，乡村居民移居到日益扩张的首都，向教会提出了它们不熟悉的教务问题。而且这正是教会面临无法再 585 依靠昔日经济来源的时期。教会如何同挤满了工人阶级郊区和棚户区的那些与世隔绝的贫苦大众建立联系呢？尽管城市中心有得天独厚的老教区和教团的礼拜服务，而边远地区可能在几英里范围内都没有一座教堂。拉美的大城市逐渐有了改观，而且往往具有非基督教化的气氛。

这就是半工业化、半异教的新工人阶级出生的社会。不能

"赢得"工人阶级的，不单单是教会。社会主义也只具有有限的影响，但它未能成为群众性运动。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在体力劳动者和熟练劳动者当中拥有一定影响，但这是外来的运动，受到政府的迫害，而且由于未能使工人革命化而遭受挫折。教会如果抓紧时机，它如同任何其他运动一样，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这要求它同对手竞争时在新社会里具有显著的影响。20世纪初，在拉美，人们对19世纪的思想，特别是实证主义思想有反应。㉘并非所有反应都具有基督灵感，这一反应对宗教生活观比较有利，而且它意味着天主教思想不再只靠单一的正统教义孤军奋战，因为柏格森*、乌纳穆诺的影响以及通过乌纳穆诺还有克尔恺郭尔和胡塞尔的影响同新托马斯主义**的影响汇合起来，在取代大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

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早期通谕敦促天主教神学院和大学恢复讲授托马斯主义哲学。天主教徒在反对现代哲学和革命解决办法时，回忆起圣徒托马斯·阿奎那关于自由本质、权威、法律、服从和慈善事业之起源的教导。20世纪初，经院哲学在拉美开始重

㉘ 见黑尔为本卷撰写的第10章。

* 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1864—1936）西班牙作家、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φren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现代哲学流派存在主义的创始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6）德国哲学家，现代现象学的创始人，其学说也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译者

**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欧洲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历任教廷神学教授。他认为信仰高于理性，神学高于哲学，主张哲学服务于神学，断言教权高于政权，宣称教皇位居于世俗君王之上，是"基督的全权代表"。死后于1323年被教廷尊为圣徒。其神学和哲学体系后被称为"托马斯主义"，1879年由教皇利奥十三世正式定为天主教官方神学和哲学。此后在利奥十三世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以托马斯的神学和经院哲学为基础在新的形势下加以发展而形成的神学和哲学体系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译者

新振作起来，并为传统天主教和社会天主教之间提供了联系环节。天主教思想未必都是进步的。有些天主教思想（也许是教皇通谕本身）仍主要归功于西班牙，归功于海梅·巴尔梅斯和多诺索·科尔特斯，部分归功于组合主义结构和垂直的社会组织。这些思想与其说是想促进改革倒不如说是更渴望防止革命。但是进一步的影响来自欧洲。工业革命曾推动法国和德国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德国主教威廉·凯特勒开创了一种新观点。在天主教传统中，对行会组织或工业中的组合主义思想带有偏向。但是，德国人给天主教思想增添了新成份，明确赞同政府进行干预，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各种后果，并为有效的工会主义思想提供了论据。 586

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的《新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汇集了这些影响力。它是在现代背景下面对实际问题对天主教社会思想作出的新阐述。与其说它是一种创议，倒不如说是一种反应，而害怕社会主义争取群众支持而提出的与之竞争的对策，显然已成为教皇当时的主要担忧。但宣告工人应拥有权利和自由制度的不公正，对教皇来说还是新鲜的。《新事物》承认雇主和工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源出于工业的增长、财富的集中和群众的贫困化。《新事物》不同于社会主义，它保护私人财产权，极力主张工人也可以从中获利和节余的公正工资概念，并认为通过和平和公正可以弥合贫富的差距。但是通谕也主张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以利保障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利奥十三世发出了采取行动的号召。他敦促天主教徒开展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特别是组织代表大会，兴办报刊和建立工人协会。

在拉美，《新事物》获得的反应不一。在有些国家，反应很迅速而认真；在另一些国家，则反应迟钝而缩手缩脚，下层教士相当热情，教权统治集团则较差。在墨西哥，反应积极。在萨尔瓦多，30年后才学习和应用通谕。可是，如果说，通谕所描述的原始资本主义已不再流行于欧洲，那么却正存在于拉美。许多天

主教徒承认这一点。大部分国家的耶稣会教士对教皇的创议反应积极，认为天主教社会行动是抢先争取工人阶级组织和建立天主教在工厂和工会中的影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战略。

可以看出，天主教社会行动在阿根廷的目标和局限性。1900年左右，天主教压力集团全神贯注政治上事务的同时，还参加一种关心社会工作重于公共政策的新型活动，这一活动在态度上是务实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性的。1892年，德国赎罪派传道士弗里德里希·格罗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工人社团，吸取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办工人俱乐部的经验。1892至1922年间，成立了77个组织，有会员22,930名，有21幢自己的建筑，100万比索资本。1898年，工人社团组织第一届天主教工人大会，开始向国民大会送交改良主义类型的劳工立法提案。这些提案与一些社会主义提案是一致的，并在事实上已被制定成法律。格罗特神父对一家天主教日报《人民报》(1900)和1902年《基督教民主》周刊的建立也起了作用。如果要将这一行动列为当时阿根廷天主教会的典型，那么也会使人误解的。固然格罗特神父的创议正好符合《新事物》的社会教义，但包括教权统治集团在内的许多天主教徒阻挠格罗特工作，谴责他的工作是颠复性的。但是其他人继承了他业已开创的事业。埃米利奥·拉马尔卡博士设计了阿根廷社会联盟的基础，这是以他第一手研究的德国模式为依据的。1907年，这一联盟获得阿根廷天主教大会的批准。到了1914年，该联盟拥有盟员5,743名，184个中心，出版《社会周刊》等许多小册子，对天主教工人的教育和组织作出重大贡献。这些天主教大会本身是一种新的事态发展。它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社会行动，产生了诸如天主教青年大会和天主教学生中心等更多的组织。

587

天主教组织的增多促使主教们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同时也施加一定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天主教组织主持成立了阿根廷天主教民众联盟(1928年，联盟为天主教行动所取代)。阿根廷天主教民众联盟是一个试图培养天主教社会意识的俗人组

织，它号召雇主和其他统治集团改进工人阶级的境况；它在这方面带有明显的家长式说教，虽然它也设法鼓励劳工组织，并为工人提供住宅建筑计划。该联盟的主要发言人是米格尔·德·安德烈亚主教。在1919年"悲惨的一周"事件后的年代，他在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中起了作用，而且在许多方面是进步的作用，包括组织女工和提供低成本的住房。但是，针对这些积极成就，必须指出阿根廷天主教社会思想的另一特色。许多诸如安德烈亚主教这样的天主教人士在寻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某种道路时，选择了组合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背景看，这种思想会为主张法西斯主义解决方案的人们所利用。

588

墨西哥的天主教社会运动起始于19世纪90年代。《新事物》是1891年5月在墨西哥发表的。最初，它未引起人们多少议论，只是到1895年3月当新闻工作者特立尼达·桑切斯·桑托斯公布此文献时，天主教领袖才开始作出反应，并要求采取行动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和建立天主教工会。在主教中，对社会天主教思想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有：何塞·莫拉一德尔·里奥、拉蒙、伊瓦拉·冈萨雷斯、何塞·奥顿·努涅斯、弗朗西斯科·塞罗斯科·希门尼斯。他们都就读于罗马拉美神学院，并毕业于格列高利大学。教士当中有3人是耶稣会会士。他们是贝尔纳多·贝尔戈恩、阿尔弗雷多·门德斯·梅迪纳和卡洛斯·马里亚·埃雷迪亚，有1名教士何塞·卡斯蒂略一皮尼亚就读于格列高利大学。门德斯·梅迪纳在布尔戈斯、卢万和巴黎学习过，出访过英国、荷兰和德国，因此他在宗教社会学方面接受过最系统的培训。但总的来说，墨西哥天主教徒培养了积极分子而不是理论家。门德斯神父的《墨西哥社会问题》(1913)一书，实际上是天主教方面可以与世俗论者的著述相媲美的唯一一部严肃学术著述。但是，天主教的新闻事业是很得力的，是现实主义的。它对波菲里奥时期，特别是1906年以后的所谓繁荣与进步持批判观点；它唤起人们注意大众阶层的贫困和饥饿，工资落后于物价的差距，中等阶层缺

乏机会，而“铁路、工业和贸易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29]

1903年，墨西哥第一届天主教大会在普埃布拉举行。代表们建议成立工人组织以及制定宗教和技术培训计划。哈利斯科州年轻的律师米格尔·帕洛马尔—比斯卡拉经历了一段自由派的插曲后，再度皈依天主教，提出建立信贷合作社，随后在各地区试办这类合作社。天主教大会作出决定，土地拥有者应当为农村劳工提供学校、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1904年在莫雷利亚举行的第二届墨西哥天主教大会上，代表们要求建立工人阶级的初等教育，成立技术学校，工人、雇主和手工业同业公会，结束压迫性的劳工合同。1908年在瓜达拉哈拉举行的第三届天主教大会上，重申了过去的提议，此外，还要求建立工人子弟学校，付给劳工以公正工资，应付给现金而不是公司的代价券。这些大会并不是革命的集会；这些大会基本上是宗教性质的，但富有新的社会意识。589 像《新事物》一样，墨西哥天主教思想反对阶级斗争，痛恨革命变革，但确实主张国家干预，以保护社会上最脆弱的阶层。为工业部门提出的改革相当全面。那么，天主教会是否曾制定一项极其重要的土地问题的政策呢？

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大会。大会集中讨论实际问题而非结构问题。出席大会的有庄园主，也有农村劳动者。大会的目标是寻求改进农村劳工的道德和物质条件的办法。大会讨论了包括工资在内的事宜，但尚未讨论土地分配问题。门德斯·梅迪纳试图建立天主教工会以“维护工资和劳动条件，力争就业，代表工人阶级讲话”，然而，甚至梅迪纳神父在土地问题上也持家长式态度，仅仅主张尽可能地保证“那些勤劳而高尚的农民占有或充分使用土地以便维持其家庭体面的生活”。[30] 1913年成立的农业社会联盟以及莫拉—德尔·里奥大主教的祝福，不是旨在拟定土地改革的

[29] 《墨西哥之音》，1906年11月10日，载阿达梅·戈达尔德著《1867—1914年墨西哥天主教徒的政治与社会思想》，第205页。

[30] 同上，第244页。

手段，而是为了使农业取得进展和增长，联盟是由大大小小的土地拥有者所控制的。尽管如此，这指明了教会如何看待土地改革，这一土改是建立在减少庄园以利小地产的基础之上。

因此，到了1910年，天主教社会运动开始产生具体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大概是成立了天主教工人中心。到1911年，超过了43个支部，会员总数为12,332人。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的成立使这一运动得到加强。1913年1月举行全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第2届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50个支部代表1.5万名会员的代表。大会决定组织一个独立的天主教工人运动。门德斯·梅迪纳同年在墨西哥城成立了墨西哥第一个工会。天主教当时为争取在工人中的影响，已准备好向它的对手挑战。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特别是在农村劳工中同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展开了竞争。 590

墨西哥革命的发动，改变了天主教会的境况。天主教徒对马德罗是抱有希望的，但对他又是小心翼翼的，有些天主教徒怀疑他的资历中带有的自由主义色彩太浓厚了，其他天主教徒则怀疑他不是社会改革者。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天主教政党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了。在大主教的祝福下，1911年5月参照德国中央党*的模式，成立了国家天主教党。成立这一政党不是为了参加旧的政权，也不是给予马德罗以无条件支持，而是在新的民主条件下能够支持教会，特别是促进天主教社会改革以利农村穷人和工业贫民。1911—1913年，该党表现良好，赢得了选举，29人当选为联邦众议员，4人为参议员，4人为州长。在哈利斯科，该党在通过重大社会和劳工立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波菲里奥执政的最后几年以及马德罗短暂的执政时期，是墨西哥天主教思想复兴时期，当时天主教会恢复了它的实

* 中央党（Zentrums Partei），1870年在德国魏玛共和国建立的天主教政党。——译者

力、信任和目标。随后，灾难突然来临。从1913年起，天主教会经受了它在自由主义统治时期所从未经历过的严重迫害，对教会的进程和结果根本无法预测。我们何以说明这奇怪的逆转呢？首先，教会的成功也正是教会的毁灭。教会不仅仅开始了它自身的改革，而且实际上已恢复了一些政治地盘，看来有信心甚至进一步得益。同时，政府也在日益发展，变得更为强大；1910年之后的年代，革命者继承了波菲里奥权力主义的世俗政府，开始消除一切对手。革命政府不是与一个低三下四的教会，而是与一个具有战斗性的改革派教会发生冲突。这个有战斗性的教会有它自己的劳工组织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实际上它提供了一个取代墨西哥革命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可能对许多墨西哥人具有吸引力，而一个独揽一切的政府对它是不能容忍的。此外，革命者和自由派人士不是一回事。革命者偏狭，专制，而且设法破坏教会，消灭宗教。革命者看到了他们的机会，并且抓住这一机会。马德罗的倒台导致了两个极端派别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韦尔塔领导昔日的军人，卡兰萨则领导革命派。天主教会陷进了圈套。教会的传统声誉和新的颇孚众望的号召力，使它成为卡兰萨和立宪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他们对天主教教士及其财产的猛烈攻击，驱使教会更加靠拢韦尔塔。于是教会被指控支持反革命。随着1913—1914年革命的扩展，主教、教士和修女被监禁或被流放，教会财产被剥夺，天主教徒被作为革命的敌人而遭到地方考迪略的攻击。

591

因此，天主教会成为它自己获得成功的牺牲品，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和1913—1914年非常时期的牺牲品。从那时以后，天主教会成为革命的敌人，革命折磨着教会。在旷日持久的宗教冲突中，出现了若干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17年宪法的制定。该宪法重复了禁止立宗教誓言及禁止教会占有不动产的早期改革法。但该宪法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教会被剥夺了任何法律地位。禁止在教堂建筑之外的地方举行公共祈祷，需要多少教堂及多少教士，将由

政府决定。教士不得享有投票权，禁止宗教刊物评论国家大事。一切初级教育必须是非宗教性的。墨西哥主教们提出了抗议。墨西哥政府态度坚定。当时简直处于战争状态。

天主教会的反应远非一致。年轻的积极分子采取了最偏激的立场。他们受到耶稣会教士的启迪，组成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他们最初集中注意于形成共同的信仰，接着集中于使社会天主教化，在最后阶段则侧重于采取政治行动、甚至武装行动。这一倾向是反革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反民主的。墨西哥主教们占领了中间阵地，他们联合起来反对革命，但分裂成不妥协派和温和派。后者指望与革命调解，期望从卡兰萨、继而从奥夫雷贡那里获得和平。罗马本身的反应，大概是所有反应中“天主教色彩”最少的了。罗马教廷企图缓和紧张关系并与奥夫雷贡达成谅解，任命不带政治色彩的主教，鼓励单纯信仰性的传道，因此也许放弃了墨西哥社会和政治天主教思想。但是革命派未作出反应，而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及其他战斗争性强的组织则加强反对活动，指责墨西哥政府是天主教会的敌人。当1924年12月1日，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继任总统职任时，他们的观点看来已经应验了。

卡列斯拥护一种新的民族主义，主张清一色的政府和不间断的革命。在这一革命中，不允许向别的任何机构——尤其是教会——效忠；事实上，他决心“排除群众的狂热性”，消灭宗教，以利国家政权和民族进步。他的政府开始对宗教实行新的清洗，甚至企图另立国家自办的教会，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这些最初的行动令诸如帕洛马尔—比斯卡拉这样的天主教活动家有了警觉，并于1925年3月促使他们从不同的集团联合起来，组成全国保卫宗教自由联盟，通过“宪法”以及“公共道德所要求”的手段，以争取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这很快成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成为一个地下组织。因为，在1925—1926年的进程中，该政权蓄意使冲突升级。10月，塔巴斯科州停止了天主教礼拜；恰帕斯、伊达尔

592

戈、哈利斯科和科利马等州加强反宗教措施。2月，墨西哥政府开始关闭首都的教堂，接着发生了街头抗议。事态的发展以1826年7月通过“卡列斯法”而达到了顶峰。该法规定全国严格实施有关宗教的法律，违者严惩。对天主教激进分子来说，这是忍耐的极限。主教们也认为它是一场危机，因为法令规定对教士实行强制登记，这就剥夺了主教们的任命权，而将任命与罢免教士的权利交给政府。因此，经梵蒂冈批准，墨西哥主教们停止了所有公共礼拜仪式，并从教堂撤出教士。1926年8月1日星期日，在墨西哥各教区教堂里，教士们都不做弥撒。卡列斯并未受到感动。他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黑暗反对光明的斗争”，决定战斗下去。

全国保卫宗教自由联盟的斗士们还有另一选择，即举行起义。8月1日后，不断地发出采取行动的号召，在有些州，当地天主教徒大概深受卡列斯法具体实施之害，并为终止举行仪式一事所震动。他们越过了祈祷和苦行的界限，采取了武装行动。9月底，联盟决定领导这一刚刚萌发的起义。11月，对抵制暴政造反有理的论据作出反应，主教们对起义给予非正式的批准。1927年1月1日，发动了后来被称为“反对取缔教会派”*的起义，全国许多地方发生暴乱。起义设法扎根于哈利斯科、瓜纳华托、米却肯、克雷诺雷和科利马等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起义发展成为一支有力的抵抗运动。

上述起义对天主教原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联盟的支持以593 及主教最初的默认，据说是基于传统学说和新托马斯主义思想：如果所有其他办法均告失败而还有成功的可能的话，则有权抵制暴政。这些未必是从经院哲学中得出的有效推论，大部分主教们感到疑惧，对运动仍保持疏远态度。有些人不承认“反对取缔教会派”有权造反，而支持“反对取缔教会派”的为数不多的人，则受到罗马的谴责。许多天主教徒为何塞·德·莱昂·托拉尔于

* 反对取缔教会派（Cristeros），一译“基督派”。——译者

1928年7月杀害重新当选的前总统奥夫雷贡一事进行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杀死暴君是合法的。随后，耶稣会地下教士米格尔·普罗神父未经审判而被处决使他们的观点进一步得到加强。有些“反对取缔教会派”组织是受既充当战士又担任随军教士的神父们的领导，它们深信武装抵抗有理。至于“反对取缔教会派”本身，它们认为基督王和圣母瓜达卢佩的事业天经地义就是公正的，其性质和目标决定这一事业的合法性。罗马不同意这些观点，一如既往地深信武装分子不会成功，而且将来会与教会妥协。所以，罗马下令墨西哥主教同起义保持距离，力争达成磋商的解决办法。主教们通过美国的调解，于1929年1月与墨西哥革命派达成妥协，教会正式退出冲突。他们的行动被说成是玩世不恭的，是机会主义的，但他们面临实际困难：他们有广泛的教会需要治理，其前途需要加以思考，20世纪的主教们都不会愿意带头打一场宗教战争。但达成的解决办法对天主教会是毫无价值的。由于起义者已被遣散，所以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天主教徒们获得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未获得其他权利。政府将此说成是教会的投降，而且的确是这样。墨西哥革命最终压服了天主教思想，并将这一思想撵回教堂内部，而且一直停留在教堂内部，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仍受到摧残。

“反对取缔教会派”为之沮丧，但是他们放下武器，不妨暂时接受了大赦。帕洛马尔—比斯卡拉回忆说，“它是一场悲剧”，“使我们全然手足无措，这是墨西哥天主教徒给予罗马教廷证明他们坚决拥护教皇最重要的证据，尽管此举是对他们的希望的沉重打击”。[40]这是中等阶层政治领导层的意见。在农村，“反对取缔教会派”除了是一股天主教抵抗运动的力量外，还是一股农民运动的力量。战争结束时，手无寸铁的反叛者遭到屠杀，在这场战 594

[40] 米格尔·帕洛马尔—比斯卡拉访问记，载詹姆斯·W·威尔基和埃德娜·蒙松·德·威尔基合著《20世纪的墨西哥：口碑史》（墨西哥1969）第447页。

争中有9万名战士丧生。“反对取缔教会派”从未受到教会的谴责，而且它们在天主教历史上终将占有一席光荣位置。但是，如果这些事态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能使天主教徒们区分什么是改良主义，什么是革命，以及说明天主教会不能批准以暴力方法夺权。

1930年的教会：传统与现代化

1870—1930年对拉丁美洲教会是决定性的年代。在这期间，拉美教会赢得了独立，同罗马建立了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联盟，并且从事本身的现代化。在这些年代，教会的确变成了被许多同时代的人物所抵制、并为后来的天主教徒们所藐视的“体制化了的”和“扬扬得意的”教会。将1870—1930年天主教取得的进步同当时世俗体制的进步作出过于细致的比较是不合适的，用最近几十年宗教和社会准则来衡量教会的进步也不是历史的态度。对教会如同对其他体制一样，必须从时代背景以及从教会的性质和目的加以判断。人们对教会下的定义可能不一。波舒哀主教认为，教会是耶稣基督在时间和空间的扩展。在基督教教义问答中，拉美人了解到，天主教会是一个头头领导下的所有信徒的联合。对不可知论者来说，教会似乎是集神话、特权、建筑和金钱之大成，教会的权力一度曾被清洗，但教会在社会中仍可能起着道德伦理的作用。但是，历史学家如何制定客观的准则以判断教会的进步，估量教会的任务和评价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呢？上教堂的人数是可以估量的，组织方面和社会行动的变化是可以描述的，但这类指标只提供一个概数。

从上述准则来判断，1900年左右天主教会有些衰落了。教会最初在上层人物中，后来在城市工人阶级中失去了许多拥护者，因为许多拥护者不知不觉地趋向世俗论或持冷漠态度。农村天主教思想却较为牢固，尽管教会的服务也许并不那么周到，它在城

外的阵地也很薄弱。有许多拉美人则不仅对宗教冷淡，而且确实很憎恨它并企图消灭它，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使它心力交瘁的经历。传统的天主教徒将这些不幸归咎于政府撤销支持和资源，他们并不总是利用这种种机会来争取宗教革新，他们弄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世俗政府的胜利者，还是牺牲品。天主教会尚未发掘其内部资源诉诸良知而非权力在一个多元论社会来同其它哲学进行竞争。天主教徒可能接受宗教信仰自由，把它作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作为适应现代世界的机会主义做法，而不是作为一种学说或一项原则。

然而，拉美天主教会已适应了变革。19世纪初，拉美教会是依附于宗主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教会。一个世纪之后，拉美教会成为真正独立的教会，是与民族国家相容并存的，然而是世界性教会的一部分。拉美教会仍然履行教会的基本职责，引导人民信仰上帝，它原封不动地维护基督教教义和宗教仪式，以便传播给以后的几代人。对凡提出“上帝，你在哪里?”的人，红衣主教莱梅给予充满信心的答复。此外，祭坛和王权，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解联盟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主要归功于自由派而不是天主教徒，但无论如何要使教会自主地决定未来，因为教会理解到，它对尼禄的恐惧不如对君士坦丁*。这种新独立有若干含义。它使教会可以更加明确地对穷人和被压迫者说话。这种新独立使宗教家和世俗论者的界限更加分明，因为天主教徒必须做天主教徒，而天主教会必须同其他信仰竞争。同时，教会在物质上有了发展，使教会本身的收人增加，使教会本身的体制得到加强。这些体制，或后来被人们称为“结构”，成为引起后来的神学家们愤慨的一个起因，这些神学家谴责这些体制妨碍了真正的宗教信仰，但是他

* 尼禄（Nero），古罗马皇帝（公元54—68在位），后期以暴虐著称，公元64—68年曾对基督教进行大迫害，终因众叛亲离，途穷自杀；君士坦丁（Constantine），指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公元306—337在位），在位时全面控制基督教，使之成为罗马帝国统治的工具。——译者

们忘记——也许轻易地忘记了——教会除了是神，还是人，就如同社会本身一样也需要体制。到了1930年，种种体制各得其所，主教们在他们的教区，教士们在祭坛，信徒们在祈祷。但是，有许多局外人会永远不进去，许多人只会回归死亡。这个问题仍很中肯而且切题，答案仍然未确定。拉美的天主教色彩究竟有多浓？

书 目 评 论

缩写全称对照表

本卷书目评论中反复出现的书籍和杂志在行文中使用下列缩写：

缩写	全称
CHLA	《剑桥拉丁美洲史》
HAHR	《西班牙语美洲历史评论》
HM	《墨西哥历史》杂志
JIAS	《美洲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
JLAS	《拉丁美洲研究杂志》
LARR	《拉丁美洲研究评论》
L-BR	《葡萄牙—巴西评论》
TA	《美洲》月刊

1.1870—1914年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

研究1870年到1914年时期拉美经济史的学者们十分幸运，他们所需要的书目大部分已汇集于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和斯坦利·J·斯坦合编的《拉丁美洲：1830—1930年经济史指南》（伯克利，1977）一书中。编者在绪言中对问题和争论点提出了有益的概括，而关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各国经高手诠释的分国书目提要，也都分别由一位著名学者撰写了述评性的前言。由于此类最有价值的资料目录提要已有四千五百多条，本文将集中研究最近几年来涉及拉丁美洲地区发展

的国际渊源，就此也偶尔谈到早些的著作，但不包括前述的综合书目。重点将特别放在博士论文方面。其它的一些书目提要是涉及个别国家的。例如，恩里克·弗诺雷斯卡诺等人编的《1500—1976年，墨西哥经济发展总书目》（墨西哥，1980）是一部优秀之作。

598

通过比较全面地论述拉丁美洲参加国际经济活动的著作是着手了解这一时期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帕斯卡尔·阿尔瑙德著《拉丁美洲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墨西哥与阿根廷实例》（墨西哥，1981），代表了一种观点；试图以1820—1910年期间两个大国的经历为基础勾画出一幅全面的，也许是过于概括的，拉丁美洲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图景。比较令人满意的是普拉特编《商业帝国主义，1840—1930年：以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历为基础的调查》（纽约，1977）一书中的11篇研究论文，它们更有根据。还可参阅欧文·斯通著《1865—1913年英国在拉美投资的结构和分布》（1962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未出版）。

直截了当地着重论述外国渗透的其他著作，通常以一个国家为重点，有：约瑟夫·B·罗姆尼著《美国在墨西哥的利益：1876—1911年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的发展与影响》（博士论文，犹他，1969）；B·W·阿斯顿著《何塞·伊维斯·利芒图尔的公职生涯》（博士论文，得克萨斯技术学院，1972）；肯尼特·S·科特著《波菲里奥的投资政策，1876—1910年》（博士论文，新墨西哥，1979）；小罗伯特·J·德格著《波菲里奥的对外政策与墨西哥的民族主义：1884—1904年墨美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的研究》（博士论文，印第安纳，1979）；罗伯特·H·拉文达著《第一个现代化的尝试：1870—1908年加拉加斯的现代化与改革》（博士论文，印第安纳，1977）；查尔斯·E·卡里拉斯著《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经济渗透及其在外交上的影响》（博士论文，北卡罗来纳，1971）；本杰明·A·弗兰克尔著《1810—1888年委内瑞拉与美国》（博士论文，伯克利，1964）。乔治·E·卡尔

著《同辈中的第一批：1810—1910年英国和委内瑞拉》（安阿伯，1980）一书阐述了在一个主要出口飞地兴起以前，外国势力是如何集中当地进口市场和运输业以及银行业与公共事业的。维拉·B·雷伯著《1810—188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行》（马萨诸塞，剑桥，1979）一书刚刚进入了本卷回顾的年代，但它对19世纪末发展前的准备阶段提出了独到的明确见解。还可参阅埃拉克利奥·博尼利亚著《大不列颠和秘鲁：经济控制的各种机制》V（利马，1977）；戴尔·W·彼得森著《1883—1918年美国与秘鲁之间的外交和商务关系》（博士论文，明尼苏达，1969）； 599 查尔斯·G·普雷格—罗曼著《19世纪智利的依附性发展》（博士论文，拉特格斯大学，1975）；小詹姆斯·费勒著《1900—1910年美国—阿根廷经济关系》（博士论文，伯克利，1964）；丹尼尔·W·齐默尔曼著《1860—1914年英国在智利现代化中的影响》（博士论文，新墨西哥，1977）。史蒂文·托皮克著《自由派政权的国家干预：1889—1930年的巴西》，载HAHR60/4（1980）第593—616页），是一篇权威性正本清源的文章，它指出在这个普遍被人们视为自由派时代中，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状况。劳拉·兰德尔著四卷本的《拉丁美洲比较经济史》（安阿伯，1977）中列举了与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及秘鲁有关的国际经济方面有用的统计和说明。以下材料可以作为前者的补充，关于哥伦比亚有：米涅尔·乌鲁蒂亚和马里奥·阿鲁布拉合编《哥伦比亚统计简史》（波哥大，1977）；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著《19世纪出口业的发展与哥伦比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发展与社会》1979，第139—144页）和《19世纪哥伦比亚的出口业》载《发展与社会》（1980）第165—226页；弗兰克·萨福德著《19世纪哥伦比亚概况》（麦德林，1977），以及《务实的思想》（奥斯汀，1976），两文均强调了哥伦比亚对外来刺激的反响。关于阿根廷请特别参阅罗伯托·科尔特斯·孔德著《1880—1914年期间阿根廷的进步》（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关于秘鲁

则请参阅罗斯玛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合著《1890—1977年的秘鲁：在开放经济中的发展与政策》（伦敦，1978）。

尽管大国往往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些小国的经历也得到了考察。例如，关于中美洲共和国的有：托马斯·L·卡恩斯著《热带企业：拉丁美洲的标准果品和轮船公司》（巴吞鲁日，1978），主要研究洪都拉斯1923年以后几年的情况；本杰明·特普利兹著《尼加拉瓜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基础：1893—1909年的何塞·桑托斯·塞拉亚政府》（博士论文，霍华德大学，1973）；肯尼思·V·芬尼著《罗萨里奥和1887年的选举：洪都拉斯采矿业的政治经济学》，载HAHR 59/1（1979）第81—107页；托马斯·R·赫里克著《1871—1885年巴里奥斯时期危地马拉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博士论文，芝加哥，1968）；戴维·J·麦克克里里著《1871—1885年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部，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博士论文，路易斯安那图兰大学，1972）；查尔斯·A·布兰德著《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背景：1913年前的洪都拉斯》（博士论文，匹兹堡，1972）；爱德华·D·埃尔南德斯著《19世纪80年代期间哥斯达黎加的现代化与依附性》（博士论文，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1975）；和米切尔·A·塞利格森著《哥斯达黎加的农民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麦迪逊，1980）。

在运输方面，特别是铁路，吸引了许多外资和资本家，无疑是许多研究课题的中心。例如，见托马斯·K·奥霍罗著《美国对外投资与对外政策：1865—1898年铁路的情况》（博士论文，拉特格斯大学，1976）；詹姆斯·H·尼尔著《哥伦比亚进入太平洋时代：1854—1882年卡利—布埃纳文图拉线的建立》（博士论文，范德比尔特大学，1971）；德尔默·G·罗斯著《中美洲的铁路建设》（博士论文，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大学，1970）；雨果·德克勒科著《1850—1914年阿根廷较发达经济的通讯和运输基础结构的发展》（博士论文，佛罗里达，1973）；小威廉·J·弗莱明著《阿根廷的地区发展与运输：1885—1914年门多萨和阿

根廷大西铁路》（博士论文，印第安纳，1976）；保罗·B·古德温著《1854—1881年阿根廷中部铁路与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载HAHR 57/4（1977）第613—632页；科林·刘易斯著：《1857—1914年阿根廷的英资铁路》（伦敦，1983）；罗伯特·B·奥本海默著《智利的运输发展：1840—1885年中部峡谷的铁路与社会经济变革》（博士论文，洛杉机加利福尼亚大学，1976）；道恩·A·怀尔斯著《1822—1954年厄瓜多尔境内的陆地运输》（博士论文，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1971）；小罗伯特·H·马通著《铁路、咖啡、和巴西圣保罗的大企业的增长》，载HAHR57/（1977）第273—295页；约翰·G·查普曼著《蒸汽、企业和政治：1837—1880年韦拉克鲁斯—墨西哥城铁路的建设》（哲学博士论文，得克萨斯，1971）；阿瑟·P·施米特著《1867—1911年墨西哥普埃布拉和韦拉克鲁斯铁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博士论文，印第安纳，1974）；最突出的是，约翰·H·科茨沃斯著《不利于发展的增长：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墨西哥铁路对经济的影响》（迪卡布，1981）。

其他方面，特别是出口业也吸引着学者们的注意：例如，见沃尔特·戈麦斯—丹吉洛著《1900—1970年玻利维亚经济发展中的采矿业》（博士论文，范德比尔特大学，1977），和小戴维·A·登斯洛著《1858—1908年巴西东北部和古巴的糖业生产》（博士论文，耶鲁，1974），其他矿业方面的研究有肯尼恩·V·芬尼著《贵金属矿开采业与洪都拉斯的现代化：埃尔多拉多的探索（1880—1900年）》（博士论文，路易斯安那图兰大学，1973）；乔安妮·F·普尔泽沃尔斯基著《1870—1916年智利铜矿业的衰落与北美资本的输入》（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1978）；约翰·P·奥林杰著《德赖弗斯·弗雷雷斯，鸟粪与秘鲁政府的财政：1869—1880年经济帝国主义的篇章》（博士论文，宾厄姆顿纽约州立大学，1973）论述了秘鲁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出口繁荣这一有争论的问题；查尔斯·H·麦卡阿维著《采矿业与外交：

601

1876—1930年美国在秘鲁塞罗德帕斯科的势力》（博士论文，北卡罗莱纳，1977）。智利的硝石历史是学者们特别喜爱的研究课题。例如，较早的研究，见约瑟夫·R·布朗著《19世纪智利的硝石业》（博士论文，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1954）；马科斯·J·马马拉基斯著《政府在资源转让和资源分配进程中的作用：1880—1930年智利的硝石》（载久斯塔夫·兰斯编《政府与经济发展》，纽黑文，1971）；小托马斯·F·奥布赖恩著《1870—1891年硝石业与智利决定性的转变》（纽约，1982），《安托法加斯塔公司：外国帝国主义专题研究》，载HAHR 60/1（1980）第1—31页，以及《智利的权贵与外国投资者：1880—1882年智利的硝石政策》载JLAS 11/1（1979）第101—121页；迈克尔·蒙特翁著《硝石时代的智利—1880—1930年经济依附性的演变》（麦迪逊，1982）；迈克尔·A·米罗波著《智利硝石飞地的渊源》（博士论文，威斯康星，1973）；和哈罗德·布莱克莫尔著《1886—1896年英资硝石与智利的政治》（伦敦，1974）。皮埃尔·瓦西埃尔著《1830—1930年智利，资本主义采矿业的一百年》（巴黎，1980）是一篇范围较广但涉及到一些同样课题的论文。

关于农产品出口方面，查尔斯·W·伯奎斯特著《1886—191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与冲突》（达勒姆，1978）考察了本国占有出口业后产生的紧张局面。马科·帕拉西奥斯著《1850—197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经济、社会与政治史》（剑桥，1980）一文说明同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各种土地所有制对咖啡繁荣的影响分类分析常常是很有用的。对拉丁美洲农业的其他探讨有杰弗里·A·拉米阿著《1852—1900年货币、绵羊与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博士论文，纽约大学，1979）；罗尔夫·斯顿伯格著《1856—1914年在一个庄园世界中的农场与农民：在潮湿的南美草原上商业性谷物种植业的起源与扩展》（博士论文，锡拉丘兹，1971）；诺埃米·M·希瓦尔·德布拉查著《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农业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威廉·A·斯维克著

602

《1852—1914年现代阿根廷庄园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博士论文，得克萨斯，1966)；理查德·D·韦勒著《1893—1903年夏威夷和古巴的制糖业与美国的外交》(博士论文，耶鲁，1939)；毛里西奥·多明格斯著《1830—1930年危地马拉科技咖啡业的发展》(博士论文，路易斯安那图兰大学，1970)；戴维·J·麦克克里里著《咖啡与阶级：自由派时代的危地马拉的发展结构》载HAHR56/3 (1976) 第438—460页；托马斯·H·霍洛韦著《1906年以各种补助形式维持的巴西咖啡价格：地区政治与经济依附性》(麦迪逊，1975)；像霍洛韦一样，尤金·W·赖丁斯的文章：《出口经济的阶级成分统一体：19世纪巴西情况》，载HAHR58/3 (1978) 第432—450页，也试图将经济现象同社会现象连结在一起。伊瓦尔·厄恩霍尔姆著《南美洲的可可生产：历史发展与目前地理分布》(哥德堡，1948) 一书也很有用。

许多地区史有时也差不多像部门研究一样，但往往包括的范围更为复杂，它们阐述了出口发展理论中的经验主义问题——而且对不成熟的或不合格的概括提出了告诫。这类书籍中与巴西有关的有三本研究著作：罗伯特·M·莱文著《1889—1937年巴西联邦的伯南布哥》(斯坦福大学，1978)；和约瑟夫·L·洛夫著《1889—1937年巴西联邦的圣保罗》(斯坦福大学，1980) 以及约翰·D·沃思著《1889—1937年巴西联邦的米纳斯吉拉斯》(斯坦福大学，1977)。它们是一套按计划周密安排的丛书。像上述这种地区一级的比较分析著作涉及拉丁美洲别处的，至今还没有，但是有关本大陆别的地区的富有洞察力的地方史或地区史则有：马克·沃塞曼著《资本家、印第安酋长与革命：1854—1911年奇瓦瓦的权贵与外国企业》(查珀尔希尔，1984)；亚历山大·M·萨拉戈扎著《墨西哥权贵的形成：1880—1920年新莱昂，蒙特雷的工业化》(博士论文，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1978)；艾伦·韦尔斯著《兴衰经济中的权贵家族：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的墨西哥的作坊与雇工》，载HAHR 62/2 (1982) 第

224—253页；哈里·E·克罗斯著《19世纪墨西哥萨卡特卡斯的矿业经济》（博士论文，伯克利，1976）；肯尼思·A·哈迪著《接近与区别：1880—1914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情况》（博士论文，北卡罗莱纳，1978）；唐娜·J·盖伊著《1870—1900年阿根廷图库曼的政治与制糖业》（博士论文，印第安纳，1975），阿瑟·利布斯切尔著《商业发展与政治变革：1897—1916年的圣菲省》（博士论文，印第安纳，1975）；戴维·C·约翰逊著《哥伦比亚19世纪桑坦德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博士论文，伯克利，1975）；以及理查德·P·海兰著《脆弱的繁荣：1851—1887年哥伦比亚考卡河谷的信贷与土地结构》，载HAHR 62/3（1982）第369—406页。

还有另外一批著作有关劳工和工作条件的普遍变化，这些变化一部分由于移民的影响，一部分归因于经济活动的新模式性质。弗里德里克·卡茨著《在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的农奴》（墨西哥，1977）和《在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大庄园上的劳工状况》载HAHR 54/1(1974) 第1—47页。关于西班牙语美洲这个时期农村劳工的书目提要的更具体的讨论，见本卷书目评论第5节。关于巴西，特别见迈克尔·M·霍尔著《1871—1914年巴西大批移民的渊源》（博士论文，哥伦比亚，1969）和托马斯·H·霍洛韦著《陆地上的移民。1886—1934年圣保罗的咖啡与社会》（查珀尔希尔，1980）。肯尼思·邓肯和伊恩·拉特利奇合编的《拉丁美洲的土地与劳工：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文集》（剑桥，1977）一书中有重要的贡献。在这个时期关于农村劳工的书目提要讨论，见本卷书目评论第9节。

2.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拉丁美洲与国际经济

本节集中于有关拉丁美洲整体的综述资料，以及某些专著中

从比较观点论述的资料。本阶段的分国资料，见CHLA第5卷 书目评论。这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是拉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增长的时期。因此，大多数当代最丰富的资料来源于外国，而且用英文出版，这是不足为奇的。并且，从典型的意义方面来说只有外国人才把“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两个因素在二次文献的评论中都有所反映；只要对来龙去脉心中有数，来源于外国的资料是很有价值的。

在此时期有关美国扩张的突出著作，其中既有数据又有定性分析的资料，有C·刘易斯著《美国在国际投资中的股本》（华盛顿，1938）；重要的还有M·温克勒著《美国资本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波士顿，1929），J·F·诺曼诺著《为南美洲而斗争》（波斯顿，1931），H·菲斯著《美元外交》（巴尔的摩，1950）和M·威尔金斯著《正在成熟的多国企业，从1914—1970年以来美国在国外的商业》（马萨诸塞，剑桥，1974）。一本优秀的比较研究资料是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的外国资本》（纽约，1955）。关于银行业的发展，有C·W·费尔普斯著《美国银行的对外扩张》（纽约，1927）和戴维·乔斯林著《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银行业》（伦敦，1963）都是二次资料的佼佼者。关于论述凯默勒在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作用的优秀资料有R·N·塞德尔著《美国在外国的改革者：1923—1931年凯默勒使团在南美洲》，载《经济史杂志》32/2（1972）和P·德雷克的即将问世的书，其中一章已出版：《美国在南美洲的经济霸权的渊源：1923—1933年哥伦比亚百万人的跳舞》（威尔逊中心工作文件，第40号，1979）。M·马什著《在玻利维亚的银行家》（纽约，1928）是一篇值得一提而有特殊影响的佳作，尽管它论述的仅仅是一个国家。

提高国内人士对外国的兴趣是美国商务部情报业务中的一大发展。这个时期有无数的手册和专题研究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往往由一位作者研究几个不同的国家，这类著作在做比较时是很有

604

用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商业和工业手册》中应特别推荐C·M·麦奎因在贸易丛书中发表的分国研究，例如《秘鲁的国家财政》（华盛顿，1926），继之还有各种《关税手册》。20世纪20年代的《商业报告》虽不如30年代丰富，但也比较有用。在英国方面，（《……经济情况》）是分国经济情况资料和大量丰富统计资料的最好来源之一。在许多驻在国里讲英语的社区兴办商业期刊盛极一时，有些值得推荐（如《拉普拉塔评论，西海岸导报》）。伦敦出版的《南美洲杂志》是金融和商业资料的宝贵来源。

605

有两部综述整个拉丁美洲的开拓性经济通史，其中包括这一时期的一些讨论：W·P·格拉德著《拉丁美洲经济》（纽约，1969）和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剑桥，1970）。F·H·卡多佐和E·法莱托合著《拉丁美洲的依附性与发展》（墨西哥，1971）及其英译本（伯克利，1979），该书兼有概念性的结构、跨学科的特点和以经验为根据的内容，仍是一本难得的著作。以类似方法论作比较研究的一套有用的丛书是联合国编的《分析与计划》，在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出版了分国研究并包含极好的统计附录。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编的《1949年拉丁美洲经济概览》一卷特别有用，因为它是长期的历史丛书。J·W·威尔基著《统计与国家政策》，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编《拉丁美洲统计辑要》附录3，（1974），也提供了有益的和规格一致的资料来源。关于工业化专论有：联合国编《拉丁美洲工业化进程》（1966）；G·威思著《拉丁美洲的工业》第2版，纽约，1949）；D·M·费尔普斯著《迁往南美洲的工业》（纽约，1936）和F·S·韦弗著《阶级、国家、与工业结构：南美洲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韦斯特波特，1980）。R·索普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世界危机中外围的作用》（伦敦，1984）是一本研究1929年大萧条影响的新著作，书中包括经济危机前二十年的许多资料，并力图把详尽的分国研究与比较分

析结合起来，关于墨西哥由恩里克·卡德纳斯和E·V·K·菲茨杰拉德撰写，关于中美洲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撰写，关于巴西由弗拉维奥·维西亚尼和马塞洛·德·派瓦·阿布雷乌撰写，关于阿根廷由阿图罗·奥康奈尔撰写，关于哥伦比亚与秘鲁由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罗斯玛丽·索普和卡洛勒·陈多尼奥撰写，关于智利由加夫列尔·帕尔马撰写。

许多分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是以各国与国际经济的关系为着眼点的，并对这一段期间有足够的重视，这些著述对于比较分析特别有用。

关于巴西，见W·迪安著《1880—1945年圣保罗的工业化》（奥斯汀，1969）；塞尔索·富尔塔多著《巴西的经济构成》（里约热内卢，1959）；英译本《巴西的经济增长》（伯克利，1963）。斯坦利·J·斯坦著《巴西的纺织业》（马萨诸塞，剑桥，1957）；A·V·维莱拉和W·苏济甘合著《1889—1945年巴西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里约热内卢，1973）；英译本载《巴西经济研究》第3期，应用经济调查协会（里约热内卢，1975）；C·M·帕莱兹著《1906—1945年巴西咖啡补贴计划的经济分析：理论、政策和衡量》，载C·M·帕莱兹编《咖啡与经济发展》（圣保罗，1973）；N·维莱拉·卢斯著《为巴西工业化而奋斗》（圣保罗，1961）；F·R·维西亚尼和M·T·R·O·维西亚尼合著《1930年以前巴西的工业化：一个贡献》，载《经济研究》，5/1（1975）；F·R·维西亚尼著《"出口"经济中的工业投资：1914年前巴西的经验》，载《发展研究杂志》7/3（1980）；A·费希洛著《巴西进口替代的起源与后果》，载L·迪·马尔科编《国际经济与发展：纪念劳尔·普雷维什文集》（纽约，1974）；威尔逊·卡诺著《圣保罗工业集中的起源》（圣保罗，1977）。

关于阿根廷，见C·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纽黑文，1970）；G·迪特利亚和M·齐默尔曼著《论阿根廷经济发展阶段》（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J·福尔多和A·

606

奥康奈尔著《20世纪上半叶的阿根廷与大西洋经济》，载《经济发展》13（1973）第13—66页；E·加略著《1880—1930年阿根廷的土地开发和工业发展》；雷蒙德·卡尔编《拉丁美洲事务》，载《圣安东尼论文集》22（牛津，1970）。

关于墨西哥，有J·沃马克著《1910—1920年墨西哥革命时期的经济：史料编纂和分析》载《马克思主义展望》1/14（1978冬季号），这是一本篇幅很大的综合评述优秀文献；C·W·雷诺著《墨西哥经济：20世纪结构与发展》（纽黑文，1970）和L·索利斯著《墨西哥的现实》（墨西哥，1970）都是论述这一时期经济史的最佳著作。并见洛伦索·梅耶尔著《1917—1942年在石油冲突中的墨西哥与美国》（墨西哥，1972）；英译本（奥斯汀，1977）。

关于智利，见穆尼奥斯著《1914—1965年智利的工业发展》（圣地亚哥，1968），J·G·帕尔马著《1830—1935年智利制造业的增长与结构》（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1979）；H·W·基尔希著《传统社会中的工业发展：智利企业家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盖恩维尔，1977）。

关于哥伦比亚，见L·奥斯皮纳·巴斯克斯著《1810—1930年哥伦比亚的工业与保护》（麦德林，1955），M·帕拉西奥斯著《1850—197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业：经济社会与政治史》（波哥大，1979）；英译本（剑桥，1980）；J·A·奥坎波和S·蒙特内格罗著《30年代世界危机时期的哥伦比亚》，载《发展与社会》8（1982）；S·蒙特内格罗著《1900—1945年哥伦比亚纺织工业史》（未发表的硕士论文，波哥大，安第斯大学，1982）；J·A·贝哈拉诺著《出口经济的结束与土地问题的开始》，载《哥伦比亚季刊》6，7，8（麦德林，1975）；W·麦格里维伊著《1845—1930年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

关于委内瑞拉，见B·S·麦克贝恩著《1908—1935年：胡安·比森特·戈麦斯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剑桥，1983）。

关于秘鲁，见R·索普和G·伯特伦著《1890—1977年的秘鲁：出口经济的增长和政策》（伦敦，1978）；P·克拉伦著《现代化、混乱和阿普拉主义：秘鲁阿普拉党的起源》（奥斯汀，1973）；C·博洛尼亚著《1880—1980年秘鲁的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牛津，1981）；和R·米列尔著《1883—1930年在秘鲁的英国商业》（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剑桥，1979）。

关于古巴，见H·C·瓦利奇著《出口经济的货币问题—1914—1947年的古巴经验》（马萨诸塞，剑桥，1950）。

关于玻利维亚，见L·怀特里德著《经济大萧条对玻利维亚的影响》，载《经济发展》(1972)。

关于乌拉圭，见M·H·芬奇著《1870年以来的乌拉圭政治经济》(伦敦，1981）。以及关于中美洲，见西罗·F·S·卡多索和H·佩雷斯·布里尼奥利合著《中美洲与西方经济（1520—1930)》（圣何塞，1977)。

一个尚未充分研究的领域是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但是，关于巴西，见例如，史蒂文·托皮克著《1889—1930年巴西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JLAS11/2（1979）和《在自由派政府时期的国家干预：1889—1930年的巴西》，载HAHR60/4(1980)，以及S·施瓦茨曼著《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政策和企业家》，载《经济发展》(1973)。有关国内经济一切问题的文章不足也同样带有普遍性：以比较或以本大陆为基础的资料实际上没有——部分原因在于有关这一时期分国的二次资料基础还很薄弱。然而，正如在CHLA第5卷书目评论中表明的，优秀的分国专题研究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最后，关于国际经济本身有丰富的二次文献。例如，关于这个时期的有G·哈达赫著《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1977)；D·H·阿尔德克罗夫特著《从凡尔赛到华尔街——1919—1929年》（伦敦，1977）；和C·P·金德尔伯克著

《1929—1939年世界大萧条》（伦敦，1973）。每一条书目提要参考都是早期研究著作最好的资料来源。做出重大贡献的标准书籍有M·T·科普兰著《原始商品革命》（哈佛商业杂志，第19期，马萨诸塞，剑桥，1938）；H·B·拉里著《在世界经济中的美国》（美国商业部，华盛顿，1943）；J·F·罗著《在国际贸易中的初级产品》（剑桥，1965）；和P·L·耶茨著《对外贸易40年：初级产品和不发达国家专题资料统计手册》（伦敦，1959）。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很有价值的老研究论文是W·A·刘易斯著《1919—1939年经济概览》（伦敦，1949）。

3．1830—1930年的拉丁美洲、美国与欧洲列强

一部非常宝贵的拥有11000篇论文目录指南是戴维·F·特拉斯克、迈克尔·C·迈耶和罗杰·R·特拉斯克合编的《自1810年以来美国—拉丁美洲关系书目提要》（内布拉斯加，林肯，1979）。有些国家其外交史的二次文献也有书目指南。最好的几篇之一是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著《墨西哥的国际问题》（墨西哥，1966）。哈罗德·尤金·戴维斯、约翰·J·菲南和F·泰勒·佩克合著《拉丁美洲外交史概论》（巴吞鲁日，1977）是一部全面介绍拉丁美洲国际关系史佳作。莱奥波尔多·塞拉著《拉丁美洲与世界》（已由弗朗西斯·亨德里克斯和比阿特丽斯·伯勒合译为英译本〔俄克拉何马，诺曼，1969〕）是一部阐述拉丁美洲国际困境的较有理论性分析的著述。前者可与另一本运用传统解释的著述，即阿瑟·P·惠特克著《西半球思想：它的兴衰》（纽约州，伊萨卡，1954）一起阅读。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问题可查阅约翰·C·德赖尔等著《西半球的国际组织》（纽约州，锡拉丘兹，1968），和G·尼尔·朗宁著《在美洲国家外交中的法律和政策》（纽约，1963）。

关于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较为详尽的论述，见格雷厄姆·斯

图尔特和詹姆斯·蒂涅合著《拉丁美洲与美国》(第6版，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5)。并见戈登·康内尔一史密斯著《美国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国家关系历史分析》(伦敦，1974)，此外，从不同观点较为综合的论述有，劳埃德·C·加德纳、沃尔特·拉费布尔和T·麦考密克合著《现代美洲帝国的产生：美国外交史》(伦敦，1973)，以及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的各种著作。威尔弗里德·哈迪·考尔科特著《西半球：及其对美国在二次大战结束前夕的政策之影响》(奥斯汀，1968)，恰如其分地对西半球关系和国际情况作出了分析。门罗主义的基础研究仍属德克斯特·珀金斯著《门罗主义史》(波士顿，1955)。关于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关系的专题研究，见弗雷德里克·派克著《1880—1962年智利与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1963)和《美国和安第斯国家：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马萨诸塞，剑桥，1977)；卡尔·施尼特著《1821—1973年墨西哥和美国：冲突与共处》(纽约，1974)；和谢尔登·利斯著《外交与依附：委内瑞拉、美国和美洲》(北达科达州，索尔兹伯里，1978)。约瑟夫·图利钦著《战争的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纽约，1971)，为世界权力关系发生变化后的美国政策提供了有益分析。弗里德里克·卡茨著《在墨西哥的秘密战争：欧洲、美国和墨西哥革命》(芝加哥，1981)一书中对墨西哥革命时期权力竞争作了杰出的分析。

莱斯特·兰利著《为美洲地中海而斗争：1776—1904年美欧在海湾—加勒比的竞争》(佐治亚，阿森斯，1976)和《20世纪的美国与加勒比》(佐治亚，阿森斯，1982)对于在加勒比地区的权力竞争作了极广泛的研究。R·A·汉弗莱斯著《拉丁美洲的传统与反抗及其他论文》(伦敦，1969)对19世纪英国的地位作了极好的概括。可作为这一主题的读物有，约瑟夫·史密斯著《冲突的幻想：1865—1896年英美对拉丁美洲的外交》(匹兹堡，1979)；和沃伦·尼尔著《1901—1913年大不列颠与加勒比》(密歇根，东兰辛，1975)。关于20世纪欧洲属地的简况见哈罗德·米切尔爵士著

《欧洲在加勒比：20世纪英国、法国和荷兰对它们的西印度领地的政策》(斯坦福，1965)。侧重阐明美国在加勒比政策的战略意图详情的研究有，达纳·芒罗著《1900—1921年在加勒比的干涉与美元外交》(普林斯顿，1964)，和《1921—1933年美国与加勒比国家》(普林斯顿，1974)。汉斯·施米特著《1915—1934年美国对海地的占领》(新泽西，不伦瑞克，1971)，强调种族歧视和文化的因素并对美国提出最激烈的批评。并可见戴维·希利著《威尔逊时代的炮舰外交：1915—1916年美国在海地》(威斯康星，麦迪逊，1976)，本书作了恰如其分的论述。关于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对古巴政策的经济方面可见，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著《美国与古巴：1917—1960年商业与外交》(纽约，1960)。朱尔斯·本杰明著《美国与古巴：1880—1934年霸权与依附的发展》(匹兹堡，1974)是一本运用依附论的研究著述。莱斯特·兰利在其《香蕉战争：1900—1934年美洲帝国内部史》(肯塔基，列克星敦，1983)一书中以"殖民主义战争"为论题。关于巴拿马与美国，见W·拉费布尔著《巴拿马运河》(纽约，1978)。

610

D·C·M·普拉特著《1860—1914年拉丁美洲与英国贸易》(伦敦，1972)，和《1840—1930年期间的商业帝国主义：以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经历为基础的调查》(纽约，1977)两书对英国的经济卷入作了极好的研究。关于这一时期美国投资的经典研究是，克里奥纳·刘易斯著《美国在国际投资中的股本》(纽约，1938)。近期的重要研究有米拉·威尔金斯著《多国企业的出现：从殖民地时期到1914年美国在国外的商业》(马萨诸塞，剑桥，1974)和《多国企业的成熟：从1914到1970年美国在国外的商业》(马萨诸塞，剑桥，1974)。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著《互惠性》一文，载亚历山大·德康德编《美国对外政策百科：主要运动和思想研究》第3卷(纽约，1978)，分析了作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两大因素的开放世界思想和互惠性外交观的影响。在马文·伯恩斯坦编《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专题与看法》(纽约，1966)一书中论述用不

同的方法得出的各种不同的专题研究。罗伯特·弗里曼·史密斯著《1916—1932年美国与墨西哥的民族主义革命》(芝加哥,1972)一书概括了美国对这次革命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应。并见洛伦佐·迈耶著《1917—1942年墨西哥与美国的石油争端》(奥斯汀,1977)。斯蒂芬·J·兰德尔著《现代化外交:1920—1940年哥伦比亚—美国关系》(多伦多,1977)一书对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与哥伦比亚经济关系作了很好的探讨。关于美欧在航空方面的竞争,见韦斯利·菲利普斯·牛顿著《危险的天空:1919—1931年美国的航空外交与拉丁美洲》(佛罗里达,迈阿密,1978)。

罗利·E·波皮诺著《1917—1963年拉丁美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伊利诺斯,格伦科,1964)是一本很好的概述。斯蒂芬·克利索尔德编的详尽文件集《1918—1968年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文件概览》(伦敦,1970),可作为前者的补充。

4. 1850—1930年拉丁美洲人口情况

除了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洛斯著《拉丁美洲的人口:历史》(伯克利,1974),和现有最新的西班牙文版《拉丁美洲的人口:自哥伦布到达前起直到2000年》(马德里,1977)两本涉及人口的有关章节外,缺少总的分析,所以读者必须注意从1870—1930年以来,有关这一时期的分国书籍和文章中收集有关拉丁美洲的人口发展。关于阿根廷,有拉丁美洲人口统计中心(CELADE)编《阿根廷人口论文集:人口方面》(智利圣地亚哥,1973)和苏尔玛·雷奇尼·德·拉特斯和阿尔弗雷多·E·拉斯特合编《阿根廷的人口》(国家人口调查统计局,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两书汇集了类似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提供了自从1889年以来人口主要变化的全貌。《古巴的人口》(人口统计研究中心,哈瓦那,1976)也是按同样方式表达的,但缺乏对过去情况如此详尽研究的基础。关于巴西1880年以来的情况有,T·W·梅里克和D·H·格雷

厄姆合著《1800年至今巴西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巴尔的摩，1979)，该书力求在按年代论述和探讨不同主题的年序变化之间相辅相成。利马的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秘鲁的人口统计报告：1970年》(利马，1974)一书中令人瞩目地试图再现历史。然而，在1876和1940年之间秘鲁却没有一次统计报告，这就是说该研究材料的用途只能是有限的。关于墨西哥，莫伊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墨西哥的人口与社会(1900—1970)》两卷集(墨西哥，1974)，尽管有大量文件，但缺乏上述其他书籍中人口统计学家们使用的分析技术。

关于智利和乌拉圭的人口统计史资料汇编，可见M·马马拉基斯著《智利历史统计》第2卷(康涅狄格，韦斯特波特，1980)和J·里亚尔著《1850—1930年乌拉圭历史统计》(乌拉圭情报研究中心，季刊第4期，蒙得维的亚，1980)，前两书须以后者做为补充即，J·J·佩雷拉和R·特拉伊滕贝格著《1908—1957年乌拉圭总人口与自立人口的发展》(经济研究所，学报第26期，蒙得维的亚，1966)。J·里亚尔和J·克拉奇科合著《乌拉圭：城市地区》(蒙得维的亚，1981)，尽管它集中于城市化的进程，但这是当前我们仍然缺少的乌拉圭人口史最佳选择。拉丁美洲国家中编写第一部人口史的是萨尔瓦多，早在1942年写成：即R·巴顿·卡斯特罗著《萨尔瓦多的人口：关于自哥伦布到达前至今的人口发展的研究》(马德里，1942；中美洲西梅翁·卡尼亚斯大学1978年再版)，此书虽旧但尚无其他著作可代替。巴拿马现有一本综合的研究，即O·哈恩·苏亚雷斯著《16世纪至20世纪巴拿马地峡的人口：关于人口及其社会经济组织状况和地理分布的研究》(巴拿马，1978)。至于其他中美洲国家，见西罗·F·S·卡多索和H·佩雷斯·布里尼奥利合著《中美洲与西方经济(1520—1930)》(圣何塞，1977)。关于委内瑞拉，见J·派斯·塞利斯著《关于委内瑞拉经济人口统计的论文》(国家统计与人口普查总局，加拉加斯，1974)，虽然文章专门论述近期情况，但其中包括某些回溯过去的

612

参考材料。F·莫亚·庞斯著《关于多米尼加人口史的新看法：曲线、标准和问题》，载《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人口问题杂志》(圣多明各，1975)，第37—68页，简述了圣多明各人口增长情况，还有A·阿韦兰加·莫利内多著《玻利维亚人口总况》(拉巴斯，1974)对玻利维亚也作了简述。D·M·里瓦罗拉等著《巴拉圭的人口》(巴拉圭社会学研究中心，亚松森，1974)为巴拉圭提供了准确的资料，但不太系统。

下列的研究著作对过去公布的1850、1900和1930年拉丁美洲的人口统计数字做了各种不同的修正：R·巴龙·卡斯特罗著《西班牙美洲的人口发展（1492—1950）》，载《世界史杂志》5（1959）第325—343页；C·A·米罗著《20世纪拉丁美洲人口》(拉丁美洲人口统计中心，智利圣地亚哥，1965)；拉丁美洲人口统计中心编《拉丁美洲：按地区分类的人口总况：1970年》，载《人口统计公报》6（1970)；并见《人口统计公报》32（1983)。

在人口构成变化中，国际移民因素吸引着大量的研究。这类文献有许多是纪念性文章，大多令人不太感兴趣。有关移民流动的规模见，W·F·威尔科克斯著《国际移民》(全国经济研究局，纽约，1929)，本书虽已过时，但仍有用，然而，可用近期的研究加以补充，诸如，关于阿根廷有，Z·L·雷奇尼·德·拉特斯和A·E·拉特斯合著《阿根廷的人口》，关于巴西还有M·S·费雷拉·莱维著《巴西人口的发展中的国际移民（1872—1972)》，载《公共卫生杂志》第8期增刊（1974）第49—90页。关于移民对拉丁美洲人口数字的各种影响在下列著述中均有探讨，如乔治·莫尔塔拉著《关于美洲人口的探索》，载《巴西人口统计研究》1(1947)第1—227页；吉诺·赫尔马尼著《大规模移民与阿根廷的现代化》，载I·L·霍罗威茨编《拉丁美洲的群众》(纽约，1970)第289—330页，等。以下著述还探讨了促进欧洲移民的社会经济情况，如《阿根廷和巴西的移民、生产结构和劳动力市场（1876—1914)》，载《路易吉·埃伊瑙迪基金会年鉴》10（1975)第197—216页和《大

613

庄园的雇工：移民和“乡下佬”在圣保罗劳动市场形成中的作用（1850—1930）》（米兰，1982），以及R·科尔特斯·孔德著《1880—1914年阿根廷的进步》（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虽然两位作家只是依靠意大利的情报资料，但是其目的是共同的。托马斯·H·霍洛韦著《大陆的移民。1886—1934年圣保罗的咖啡与社会》（北卡罗来纳，查珀尔希尔，1980），考察了圣保罗移民特殊的状况。

关于少数民族集团移民情况的研究材料很多，但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却很少。没有关于意大利、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移民的详细历史，但是，关于德国人去智利的移民，见G·F·W·扬著《德国人在智利：移民与居留地》（移民研究中心，纽约，1974）；关于去南里约格兰德的移民，见J·罗奇著《南里约格兰德的德国移民居留地》（共2卷，阿雷格里港，1969）；关于从威尔士到巴塔哥尼亚的移民，见G·威廉斯著《从威尔士到巴塔哥尼亚的移民结构与进程》，载《威尔士历史评论》8（1976）第42—74页；关于从爱尔兰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移民，见J·C·科罗尔和萨瓦托著《“志同道合伙伴们”：1870—189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爱尔兰移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关于法国人去乌拉圭的移民，见M·马雷纳莱斯·罗西和G·布代著《乌拉圭的法国移民和居留地（1830—1860）》，载《拉丁美洲手册》16（1977）第7—32页。

在非欧洲人的移民中，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关于日本人的，首先是在巴西的日本移民：斋藤广志著《在巴西的日本人：对移民和定居的研究》（圣保罗，1961），铃木贞一著《在巴西的日本移民》（2卷集，东京，1969），J·T·辛特拉著《在巴西的日本移民（1908—1958）》（墨西哥，1971），和A。罗沙·诺盖拉著《去圣保罗咖啡园的日本移民（1908—1922）》（里约热内卢，1973）。中国人在拉美的居留地也是一些文章的主题如，罗德里格斯·张著《19世纪移居拉丁美洲的中国劳工》载《美洲历史评论》45—46（1958）第375—397页，和J·佩雷斯·德·拉·里瓦著《在古巴的中国苦力人口统计（1853—1874）》，载《何塞·马蒂全国人口

614

统计杂志》57（1966)第3—32页。何塞·德尔·卡斯特罗著《1900—1930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制糖业的移民劳工》(圣多明各，1978)，尽管集中谈圣多明各，但是为本世纪初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情况提供了总貌。关于古巴，可以后者作为补充即H·佩雷斯·德·拉·里瓦著《20世纪初的三十多年在古巴的安的列斯群岛移民状况》，载《何塞·马蒂国家图书馆评论》66（1975)第75—88页。

关于上一世纪非洲移民见，菲利普·D·柯廷著《非洲的奴隶贸易：统计数字》(麦迪逊，1969)；此外，关于古巴见，弗兰克林·W·奈特著《19世纪古巴的奴隶社会》(麦迪逊，1970)；关于巴西的有，罗伯特·康拉德著《1850—1888年巴西奴隶制的废除》(伯克利，1972)；关于委内瑞拉有，J·V·隆巴尔迪著《1820—1854年委内瑞拉黑奴制的衰落与废除》(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1971)。此外，R·W·斯伦斯著《巴西奴隶制的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1850—1888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斯坦福大学，1976)对巴西国内移民和巴西的黑奴人口特点做了研究。

关于墨西哥去美国的移民的各种不同的著述中，对1930年前这段时期的最详细的研究见，劳伦斯·A·卡多索著《1897—1931年墨西哥去美国的移民：社会—经济模式》(图森，1980)。

由于国内移民缺乏象目前国际移民流动那样的精确数字，学者们需要重新推算国内流量。人们不是从人口普查表格记录中的出生地和居住地之间的差异来着手调查，就是以现存人口登记表格作为起点，或者，最后就是把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出身率作出比较。所有这些方法要求有人口普查报告，而这种普查未必都举行过。迄今，使用过这些方法的只有阿根廷和巴西两国；见Z·L·雷奇尼·德·拉特斯和A·E·拉特斯合著《阿根廷的移民：1869—1960年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对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研究》(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利亚研究所，1969)以及D·H·格雷厄姆和S·小布瓦克·德·奥兰达著《巴西的移民、地区和城市增长与发展：1872—1970年历史记录抽样分析》(经济调查研究所，圣

保罗，1971)。若热·巴兰则从比较观点来研究国内移民，其文章有《巴西国内移民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比较试析》，载J·巴兰编《关于历史发展的中心与外围》(圣保罗，1974)，第109—184页；关于一个地区见，《阿根廷图库曼的移民、劳动力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式，1870—1914年》载《人口统计与经济》10/2（1976)第201—234页。关于智利见，安·里格曼·约翰逊著《1920年以前的智利国内移民：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关系》(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戴维斯，1978)。M·E·卡斯特利亚诺斯·德·舍斯特兰德著《委内瑞拉的人口：1908～1935年国内移民与地区分布》，载《历史半年刊》(1975)1第5－62页，研究了与委内瑞拉有关的问题。

就探索自然增长率的决定因素问题而言，由于对平均寿命的研究有所发展，使爱德华多·A·阿里亚加得以首先同金斯利·戴维合作继而单独研究分析拉美死亡率的趋势，见E·A·阿里亚加和K·戴维斯合著《拉美的死亡率形式的变化》，载《人口统计》6（1969)第223—242页；以及E·A·阿里亚加著《拉丁美洲死亡率下降及其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伯克利，1970)。豪尔赫·L·索摩查用同一方法研究了阿根廷的问题，见《1869－1960年之间阿根廷的死亡率》(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利亚研究所，1971)。关于霍乱和黄热病广泛流行的问题，见J·S·沃德著《拉丁美洲的黄热病：地理研究》(利物浦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专题论文丛刊，第3期，1972)，和D·B·库珀著《1849—1917年巴西对以黄热病为重点的流行病的长期斗争》，载《纽约医药科学公报》，51（1975）第672—696页。关于农作物的变异和营养，以及常见疾病和医药卫生的发展都缺乏详尽的研究。在生育方面，有O·安德鲁·科尔弗著《拉丁美洲的出生率：历史趋势与起伏的新估计》（国际研究中心，伯克利，1965)，本书阐述了20世纪总的情况，但未涉及19世纪。马里亚·S·米勒关于阿根廷的著作：《在1855—1960年之间布宜诺斯艾利

616

斯的死亡率》(布宜诺斯艾利斯，1974)，就全国的范围而言，并无价值。

关于几种人口变化在某一特定地区的相互影响问题尚未作任何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哥斯达黎加利蒙地区可见J·凯西·加斯帕尔著《利蒙：1880—1940年哥斯达黎加香蕉业研究》(圣何塞，1979)；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可见Z·L·雷奇尼·德·拉特斯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1855和1960年之间人口构成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托尔夸托·迪·特利亚研究所，1971)。

5. 1870—1930年西班牙语美洲农村状况

对西班牙语美洲农村历史的研究，在本世纪30年代短暂期间曾一度涌现过大量著作后，实际上是被人忽视了，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却有显著发展。首先，这是由于探索现代化进程的热忱，而最近则是由于要查明依附性的根基和机制。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殖民地时代一向是杰出的学者们最关心的时代，而第二次大战后的时期则是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集中研究的时期。对这两者之间，即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农村史的了解虽有改善，但相对而言，进展仍嫌不足；然而，现已具备坚实的基础足以进行讨论。

有三次国际学术会议将论文汇集成册。《拉丁美洲的土地问题》(巴黎，1967)；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编《拉丁美洲的庄园、大庄园和种植园》(墨西哥，1975)；肯尼思·邓肯和伊恩·拉特利奇合编《拉丁美洲的土地与劳工》(剑桥，1977)。在这些论文集中除少量试图综述整个地区的论文外，试图进行广泛而比较性分析的学者为数极少，其原因无疑是由于拉美各国差别太大和悬殊的突变性而受到影响，难以概括。C·凯著《欧洲庄园制与拉丁美洲庄园制的发展比较》(未发表的博士论文，萨塞克斯大学，1971)，沙恩·亨特著《拉丁美洲大庄园和种植园的经济学》(未发表的手

617

籍，1972），以及埃里克·沃尔夫和西德尼·明茨的名作：《中美洲与安的列斯群岛的大庄园和种植园》，载《社会与经济研究》6/1（1957）第380—412页，都是作者们力争概括水平超过专题研究的一些著述。马格纳斯·默纳一直从事宏观研究，所著《西语美洲的大庄园：近期研究与讨论概况》，载HAHR 53/2(1973）第183－216页，和《1700－1900年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佃农比较研究》，载LARR 5/2（1970）第3－15页，都是杰出的起点。A·J·鲍尔著《西语美洲的农村工人：债役制与压迫问题》，载HAHR 59/1（1979）第34－63页，以及同期论坛专栏后面刊载的讨论情况，载HAHR 59/3（1979）第478－489页，对一些问题和近期的著述作了评论。阿拉因·德·詹弗里著《拉丁美洲土地问题与改良主义》（巴尔的摩，1981），涉及近几年来比较广泛的问题，其著述对1870－1930年时期有理论性的结论。

在墨西哥，当前最好的农村史研究工作以墨西哥城历史研究所（INAH）为学术中心。该所的《综合情况通报》是有关期刊的一份很好的检索指南。《墨西哥政治和社会学评论》第91卷（1978年1月－3月）集中论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墨西哥的大庄园制；《墨西哥历史》杂志内载有大量论述该主题的文章。此外，定期举行的墨西哥和北美洲历史学家联谊会会议录汇编也是最近的著作。《墨西哥历史中的劳动制度和劳动者》（墨西哥与图森，1979），特别是该卷内由小约翰·沃马克和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撰写的文章，很有价值。D·A·布雷丁编《在墨西哥革命中的考迪略和农民》（剑桥，1980）是一部重要的贡献；以下专论都是从大量近期文献中挑选出来的杰出著述：阿图罗·沃曼著《面临矛盾：莫洛雷斯的农民和民族国家》（墨西哥，1976）；简·巴赞特著《墨西哥的五大庄园》（墨西哥，1975）；小约翰·沃马克著《萨帕塔与墨西哥革命》（纽约，1969）；让·梅耶著《基督教》3卷集，（墨西哥，1974）；路易斯·冈萨雷斯著《游民》（墨西哥，1968）；保罗·弗里德里希著《一个墨西哥村庄的土地叛乱》（恩格尔伍德克利夫

斯，1970）；弗兰斯·J·斯赫弗著《皮萨弗洛雷斯的牧场主》（多伦多，1980）；以及莫伊萨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社会生活》，载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著《墨西哥现代史：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墨西哥，1957）。弗里德里希·卡茨著《墨西哥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大庄园的劳工状况：一些动向和趋势》，载HAHR54/1（1974）第1—47页，是篇重要文章。

关于危地马拉和中美洲的学术著作往往数量不多是可以想见的。塞韦罗·马丁内斯·佩莱斯著《克里奥尔人的祖国》（危地马拉，1971）一书有些19世纪的资料。有用的著作还有戴维·布朗宁著《萨尔瓦多，景观与社会》（牛津，1971）；西罗·F·S·卡多索著《19世纪哥斯达黎加咖啡园的形成》，载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编《庄园、大庄园与种植园》；以及戴维·J·麦克里里著《咖啡与阶级：自由派时期危地马拉的结构与发展》，载HAHR 56/3（1976）。胡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坎布拉内斯的研究著作正在付印。

618

秘鲁的研究工作得益于在利马最近创办的土地法档案资料馆（AFA）（这是一个汇集在1969年土改期间被没收的庄园和种植园的档案资料的文库）以及圣马科斯大学的巴勃罗·马塞拉和秘鲁研究所的何塞·马托斯·马尔等人在学术方面的领导。因为AFA中最好的档案资料是北部海岸的蔗糖种植园所保存的，研究著作往往集中于那个区域；但来自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学者，以及秘鲁新的一辈学者正在填补农村史的空白。其中最有用的有：亨利·法夫尔、科兰·德拉瓦、何塞·马托斯·马尔合著《秘鲁的庄园》（利马，1967）；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著《庄园、种植园与集体农庄》（伦敦，1977）；本杰明·奥洛夫和G·卡斯特雷德合编《拉丁美洲的土地与权力：安第斯的农业经济与社会过程》（纽约，1980）；让·皮尔著《论20世纪初叶秘鲁农村的一次起义：托克罗约克（1921）》，载《近代史和现代史评论》，14（1967）；维尔弗雷多·卡普索利著《1880—1963年塞罗德帕斯科的农民运动》

（利马，1972）。关于北部海岸的种植园，见巴勃罗·马塞拉著《1875—1920年的卡亚尔蒂：秘鲁一个蔗糖种植园的劳工组织》（利马，1975）；比尔·艾伯特著《1880—1920年秘鲁的蔗糖业》（诺威奇，1976）；彼得·克拉伦著《1870—1930年社会经济现代化在秘鲁蔗糖业中的影响》，载邓肯和拉特利奇合编》土地与劳工》一书中；彼得·布兰查德著《20世纪初秘鲁山区募工制：包身契约工》，载《美洲经济事务季刊》33/3（1980）；迈克尔·J·冈萨雷斯著《1875—1933年秘鲁北部农业种植园与社会控制》（奥斯汀，1984）。也可参见C·马伦著《秘鲁中部高原公社的自卫。1860—1940年农民斗争与资本主义的转变》（普林斯顿，1983）。关于阿根廷图库曼蔗糖区的著作有唐娜·盖伊的《19世纪阿根廷的农村工人阶级：在图库曼种植园的强制劳动》，载LARR 13/1（1978）和豪尔赫·巴兰著《1870—1914年阿根廷图库曼的移民、劳动力和农村无产阶级的形成》，载《人口统计与经济》10/2（1976），

619

关于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见拉斐尔·巴劳纳著《厄瓜多尔山区的一种大庄园》，载奥斯卡·德尔加多编《拉丁美洲的土改》（墨西哥，1965）；迈克尔·陶西格著《哥伦比亚考卡山谷农村雇佣劳动的发展，1700—1970年》，载邓肯和拉特利奇合编《土地与劳工》；马尔科姆·迪斯著《哥伦比亚的一个咖啡种植园，1870—1912年昆迪纳马卡的圣巴巴拉》，载同上书；戴维·C·约翰逊著《19世纪哥伦比亚的经济与社会变化：1850—1885年的桑坦德》（未发表的博士论文，伯克利，1977）；皮埃尔·吉尔霍德斯著《哥伦比亚的土地斗争》，载R·施塔芬哈根编《拉丁美洲土地问题与农民运动》（纽约州，加登城，1970）；马尔科·帕拉西奥斯著《1850—197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剑桥，1980）；威廉·P·麦格里维著《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查尔斯·伯奎斯特著《1886—1910年哥伦比亚的咖啡与冲突》北卡罗来纳，达勒姆，1978）；卡特琳·勒格朗著《从公有土地到私有财产：1870—1936年哥伦比亚的土地占有和农村冲突》（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斯坦福

大学，1980）。

关于玻利维亚的新著作有拉米罗·康达尔科·莫拉莱斯著《"恐怖的威尔卡"萨拉特：1899年土著人叛乱史实》（拉巴斯，1965）；欧文·P·格赖斯哈伯著《19世纪玻利维亚尚存的印第安人公社：一个地区的比较》，载JLAS 12/2（1980）；西尔维亚·里韦拉·西斯坎奎著《玻利维亚高原大庄园的扩张：构成一个地区寡头性的因素》，载《前进》（拉巴斯）2（1978）；安德鲁·皮尔斯著《农民与革命：玻利维亚实例》，载《经济与社会》1/3（1972）。关于智利，见前引C·凯的博士论文；布赖恩·洛夫曼著《农村的斗争：1919—1973年智利的政策与农村劳工》（布卢明顿，1976）；A·J·鲍斯著《从西班牙征服到1930年智利的农村社会》（剑桥，1975）；和莫里斯·蔡特林著《智利的内战：从未获得成功的资产阶级内战》（普林斯顿，1984）。

6. 1860—1930年西语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经济与社会

关于约1860—1930年期间古巴、波多黎各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制糖业历史的书目评论，见本书第5卷书目评论第5、6和7节。

7. 1870—1930年拉丁美洲城市的发展

620

作为概论而言，有几本重要的拉美城市研究著述是特别有用的，但并不仅限于1870—1930年这个时期，如：豪尔赫·恩里克·阿多伊编《拉丁美洲的城市化：途径与问题》（纽约，1975）；特别是阿多伊和理查德·M·莫尔斯撰写的论文；理查德·M·莫尔斯编《拉丁美洲的城市》（2卷集，墨西哥，1973）1.《前言》、2.《历史的发展》；和何塞·路易斯·罗梅罗著《拉丁美州：城市与构想》（墨西哥，1976）。此外，以下的文集中还有详尽的论述：

拉丁美洲高级研究所编《拉丁美洲的城市和地区》(巴黎,1970;西班牙译文,墨西哥,1973),对库斯科、麦德林、瓜达拉哈拉以及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城市均有所研究;并见理查德·P·谢德尔、豪尔赫·E·阿多伊和诺拉·斯科特·金策合编《从开始直到现在的美洲城市化》(海牙,1978),其中特别是亚历杭德罗·罗夫曼、理查德·M·莫尔斯、詹姆斯·R·斯科比、罗伯托·科尔斯特·孔德和胸希·洛佩斯·德·尼斯诺维奇、斯潘塞·L·莱特曼以及豪尔赫·巴兰撰写的论文。

涉猎历史以外的各种学科将十分有助于读者们了解这一时期城市化问题的一般背景。社会学家们的有关著作最为丰富,可以首先阅读早期有影响的研究著述,如:安德鲁·H·怀特福德著《拉丁美洲的两个城市:对社会阶级的比较评述》(威斯康星,伯洛伊特,1960),本文对哥伦比亚波帕扬与墨西哥克雷塔罗两个城市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比较,在本书之后作者再次以波帕扬单独作为重点撰写了《中世纪的一个安第斯城市:传统的城市社会》(密歇根州,东兰辛,1977);又如菲利普·M·豪泽与利奥·F·施诺尔合编《城市化研究》(纽约,1965),特别是其中由吉迪恩·舍具里和施诺尔撰写的几章;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新泽西,恩格尔伍德,1969)。社会学家们的其他有意义的著作有约翰·沃尔顿著《权贵与经济发展:关于拉丁美洲城市政治经济的比较研究》(奥斯汀,1977),和布赖恩·罗伯茨著《农民的城市、第三世界城市化的政治经济》(伦敦,1978),以及比较专业化的研究作品如何塞·路易斯·德·伊马斯的《一个草原城市的社会结构》(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和玛丽·C·梅吉著《墨西哥的蒙特雷:内部格局与外部关系》(芝加哥,1958)。阿瑟·S·莫里斯著《以加拉加斯为例说明拉丁美洲的城市发展模式》,载《城市研究》15/3(1978)第299—312页;佩德罗·平沙斯·盖格著《巴西城市网络的发展》(里约热内卢,1963),和马丁·T·卡茨曼著《曼彻斯特与圣保罗:城

621

市迅速发展产生的问题》（斯坦福，1977）都是经济学家根据历史背景对当代发展作出衡量的有用的研究著述。理查德·P·谢德尔在其所著《从人类学本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对拉丁美洲城市的研究》，载《城市人类学》32/2（1974）第139—170页，有效地概括了人类学方面的见解。马文·哈里斯在其早期的重要著作《巴西的城市与乡村》（纽约，1956）中通过人类学的现场工作有趣地对巴西一个小城镇的社会历史进行分析。类似的研究有鲁文·雷娜对一个省会的分析：《巴拉那：阿根廷一个城市的社会界线》（奥斯汀，1973）和尤金·A·哈梅尔著《伊卡的权力：秘鲁一个公社的社会结构史》（波士顿，1969）。地理学家查尔斯·S·金萨顿提供了另一种专题研究的模式：《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间发展，1870—1930年》（亚利桑那，坦佩，1974）。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工作者们当然在城市发展方面贡献了珍贵的资料。其代表作有彼得·W·阿马托著《关于哥伦比亚波哥大上流社会居住区模式的分析》（伊萨卡，1968）；卡洛斯·阿莱特萨和乌戈·巴拉基尼合著《蒙得维的亚城自殖民地时期至今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史》（蒙得维的亚，1971）；何塞·哈维尔·马丁尼和何塞·马里亚·塔尼亚合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建筑装璜》（2卷集，〔第1卷1800—1900年，第2卷1900—194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1967）；以及卡洛斯·马丁内斯著《波哥大：1536—1900年城市发展梗概》第1卷（波哥大，1976）。

理查德·M·莫尔斯撰写的的一系列文章，对引导读者选择书籍和确定选题或方法论的构想都非常有用，这些文章载LARR 1/1（1965）第35—74页；6/1（1971）第3—52页；和6/2（1971）第19—75页。莫尔斯撰写的另几篇文章也很有帮助，其中包括《19世纪美洲城市制度的发展》，载JIAS 17/1（1975）第4—26页；《拉丁美洲的城市：功能与结构特点》，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4（1961—1962）第473—493页；和《1750—1920年拉丁美洲城市化的趋向与模式》，载JIAS 16/4（1974）第416—447页；

《优先、地区化、依附性：关于拉丁美洲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问题》，载《经济发展》11/41（1971）第55—85页；和《拉丁美洲城市史绪论》，载HAHR52/3（1972）第359—394页。尤金·F·索弗和马克·D·舒奇曼补充了另一篇引起争论的文章《城市与社会：它们在拉丁美洲历史研究中的关系》，载LARR 14/2（1979）第113—129页。马丁·H·萨布莱著《拉丁美洲的城市化》（新泽西，梅塔钦，1971）为综合性书目资料提供了重要的起点。研究者也需要参考现在出版的期刊，如《拉丁美洲城市研究》（有6卷，贝弗利希尔斯，1971—78）；《城市史年鉴》（莱斯特，1974—）；《城市主义过去与现在》（密尔沃基，1976—）；和《城市杂志》（贝弗利希尔斯，1974—）。

622

已有的关于城市人口的数字与定义（见CHLA，第4卷，第7章，注2），是难以捉摸的。研究者为了把资料来源凑在一起对材料作出估计，首先要查阅下列有价值的成果：上述莫尔斯编《拉丁美洲的城市》第2卷，为1750—1920年之间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的主要城市提供了资料；理查德·E·博耶和基思·A·戴维斯合著《19世纪拉丁美洲的城市化：统计与资料》（洛杉矶，1973），有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秘鲁主要城市的资料；豪尔赫·恩里克·阿多伊与玛丽亚·埃莱娜·兰登合著《1850—1930年之间拉丁美洲城市化初步统计与分析》，载《巴拉圭社会学杂志》42—43（1978）第115—173页，论述了国民平均增长率、主要城市的发展和包括四个最大城市的主要指标，并提供了有关的表格。尼古拉斯·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著《拉丁美洲人口史》（伯克利，1974）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兼人口统计学家对人口总趋势的全面分析的佳作。其他对更专业化问题有用的指南有：亚历杭德罗·莫雷罗·托斯卡诺著《1810—1910年墨西哥体制模式的变化》，载HM 22/2（1972）第160—187页；理查德·E·博耶著《墨西哥的城市：19世纪的设计思想》，载HM，同期第142—159页；理查德·W

·威尔基著《1910—1970年墨西哥城市发展及其居民区景观的变化》，载詹姆斯·威尔基和迈克尔·迈耶斯合编《当代墨西哥》（伯克利，1976）第99—134页；基思·A·戴维斯著《19世纪墨西哥的城市人口趋势》，载HM21/3（1972）第481—254页；和苏尔玛·L·雷奇尼·德·拉特斯著《1869—1960年阿根廷城市化人口概况》（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

关于拉丁美洲分国的综合性论著往往包含相当数量城市化模式的资料。其中可以查到与此有关材料的一些著作有：威廉·P·麦克格雷维著《1845—1930年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罗里·米勒、克利福德·T·史密斯和约翰·费希尔合编《现代秘鲁的社会与经济变革》（利物浦，1976），特别是罗斯玛丽·索普和杰弗里·伯特伦以及布赖恩·B·罗伯茨的论文；卡洛斯·F·迪亚斯·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纽黑文，1970)；里卡多·M·奥尔蒂斯著《1850—1930年阿根廷经济史》（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5）；詹姆斯·R·斯科比著《阿根廷：一个城市与一个民族》（第2版，纽约,1971）；小曼努埃尔·迪格斯著《移民、城市化和工业化》（圣保罗，1964）；理查德·格雷厄姆著《1850—1914年不列颠与巴西现代化的开始》（剑桥，1968）；图利奥·霍尔珀林·唐伊著《拉丁美洲现代史》（马德里，1969）；和T·林恩·史密斯著《巴西：人民与体制》（第4版，巴吞鲁日，1972）。

许多拉丁美洲城市史比本章论述的时期更广。在他们之中有些章节涉及1870—1930年，如理查德·M·莫尔斯著《从公社到大都市：圣保罗史》（盖恩斯维尔，1958；再版，纽约，1971）；葡萄牙文本，圣保罗，1970）；居伊·布尔代著《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与移民：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1974）；前引何塞·路易斯·德·伊马斯和鲁文·雷娜两书也涉及里奥奈尔托和巴拉那等阿根廷城市；克洛德·巴塔永著《在墨西哥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巴黎，1971；西班牙文本，墨西哥,1973）；克洛德·巴塔永和

623

塔莱娜·里维埃·达尔克合著《世界的大城市：墨西哥》(巴黎，1973；西班牙文本，墨西哥，1973)；埃莱娜·里维埃·达尔克著《瓜达拉哈拉及其地区》(巴黎，1971；西班牙文本，墨西哥，1973)；西奥多·E·尼科尔斯著《哥伦比亚的三个港口：关于卡塔赫纳、圣玛尔塔和巴兰基亚发展的研究》(波哥大，1973)；和伊夫·勒卢著《米纳斯吉拉斯的城市》(巴黎，1970)。

内容大部分论述1870－1930年的书籍有：沃伦·迪安著《圣保罗的工业化，1880—1945年》(奥斯汀，1969)；马克·D·舒赫曼著《阿根廷城市的流动性与一体化：自由派时代的科尔多瓦》(奥斯汀，1980)；理查德·莫尔斯编《1900年的利马：批判研究文选》(利马，1973)，该书绝大部分选摘自华金·卡佩洛的主要著作《利马的社会学》(4卷集，利马，1895—1902)；詹姆斯·R·斯科比著《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1870—1910年》(纽约，1974；西班牙文本，布宜诺斯艾利斯，1977)；和尤金·F·索弗著《从爱尔兰到潘帕草原：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人移民的经验》(纽约，1980)。还可参见以下论文：小班布里奇·考埃尔著《19世纪的城市移民：巴西累西腓实例》，载JIAS 17/1(1975)第43—63页；E·杰弗里·斯坦著《加拉加斯的运输与城市化，1891－1936年》，载JIAS同期，第82—100页；杰拉尔德·M·格林菲尔德著《依附性与城市经验：1885—1913年圣保罗的公共事业部门》，载JIAS 10/1 (1978)第37—59页；和埃米莉娅·维奥蒂·达·科斯塔著《19世纪巴西的城市化》，载弗朗西斯科·德·索拉诺编《伊比利亚城市研究》(马德里，1975)第399—432页。

624

8. 1930年以前的拉丁美洲工业

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及以后一段时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简称ECLA或CEPAL)出版的正式报告和政策文件明显地推

动了对拉美早期工业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发起的关于依附性辩论也对此提供了推动力，有一部分是针对ECLA(CEPAL)的结构主义者关于这一主题研究途径的反应。尽管在最近几十年已写出了许多著作，但塞尔索·富尔塔多著《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历史背景与当代问题》（第2版，剑桥，1977）仍是拉美经委会派假说最精练的阐述。富尔塔多确立了以30年代为拉美工业化进程起点的观点，他接受了修正主义分子对这一分期问题提出异议的挑战，论证了1929年以前宏观经济中制造业所取得的成就，使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首要地位。在同一学派综合性分国论著有：奥尔多·费勒著《阿根廷的经济》（伯克利，1967）；塞尔索·富尔塔多著《巴西的经济发展》(伯克利，1965)；阿尼瓦尔·平托著《智利：发展失败实例》（圣地亚哥，1962)。早期有关依附论观点尖锐的论述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其所著《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与不发达：对智利与巴西历史研究》(纽约，1969）开始提出的，认为1929年的世界大萧条震动了拉美的对外贸易部门和触发了工业化的动力。关于类似而又有区别的观点，可重点参阅西罗·F·S·卡多索和H·佩雷斯·布里诺利合著的阐述大陆概况的佳作《拉丁美洲经济史》，第2卷（巴塞罗那，1979）和现在的第一流作品J·V·莱文著《出口经济：其发展模式的历史观》（马萨诸塞，剑桥，1960)。F·H·卡多佐和E·法莱托合著《拉丁美洲的依附与发展》（伯克利，1979）着重论述了按依附论的构思在出口导向的发展阶段中制造业的形成发展。 625

这个学派有许多论著的主题远远超出工业和工业化的范围。然而，结构主义与依附论的著作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在经济增长中心赞助下由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特别丛书则是基于古典经济学并附有大量统计材料的著述：W·贝尔著《巴西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1965)；T·B·伯恩伯格和S·A·雷斯尼克合著《殖民地的发展：计量经济学研究》（1975)；C·F·迪亚斯·

亚历杭德罗著《阿根廷共和国经济史论文集》(1970); M·J·马马拉基斯著《智利的经济增长与结构：从独立到阿连德》(1976); C·W·雷诺著《墨西哥经济:20世纪的结构与增长》(1970)。但是，在关于拉丁美洲的工业和工业化的辩论中的新修正主义出现的比较精确的时间，可以从沃伦·迪安的习作《圣保罗的工业化，1880—1945年)(奥斯汀，1969)问世时算起。迪安强辩说，二次大战前工业化的进度，在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时期是最快的，这引起了一场争论，既有为过去的观点辩护的，又有支持了修正主义假说的，从而产生了大批文献。著名的文章有：A·费希洛著《巴西进口替代的起源与后果》，载E·迪·马尔科编《国际经济学与发展：纪念劳尔·普雷维什论文集》(纽约，1972); W·卡诺著《圣保罗工业集中的根源》(圣保罗，1977); J·M·卡多佐·德·梅洛著《论落后的资本主义：关于巴西经济形成与发展修正观点的批判文集》(圣保罗，1982); 和F·R·维西尼亚著《在大萧条以前：20世纪20年代巴西的工业》，载R·索普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洲：外围在世界危机中的作用》(伦敦，1984)。还有把制造业兴起的基础与咖啡业的蓬勃发展相联系的叙事性研究著述如：A·C·卡斯特罗著《1860—1913年在巴西的外资企业》(圣保罗，1979)和S·席尔瓦著《巴西咖啡业的发展与工业的起源》(圣保罗，1976)。有些著作比过去的但很有价值的早期历史编纂规范著作前进了一步，如N·维莱利亚·卢斯著《为巴西工业化而奋斗，1808—1930年》(圣保罗，1961)。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从修正主义观点撰写的工业专题研究著作，626 如F·R·维西尼亚著《在“出口”经济中的工业投资：1914年以前巴西的经验》(伦敦，1979)，它们继S·T·斯坦著《巴西的棉纺业：不发达地区的纺织企业，1850—1950年》(马萨诸塞，剑桥，1957)和A·P·卡纳布拉瓦著《1861—1875年圣保罗省棉花的发展》(圣保罗，1951)等开拓性著述之后，使这方面著作的数量和范围扩大了。

关于巴西早期工业发展著作的论文质量，仅就书目评介的角度而言，只有关于智利的同类著作才能与之相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发表了直接论说1930年以前制造业和工业发展问题的若干著述。其中大部分（虽非全部）都坚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智利的重要分水岭。见M·卡尔马尼亚尼著《1860—1930年智利的工业发展与经济的不发达》（都灵，1971）；C·乌尔塔多著《人口集中与经济发展：智利实例》（圣地亚哥，1966）；H·W·基尔施著《在传统社会中的工业发展：智利企业家与现代化的冲突》（盖恩斯维尔，1977）；R·拉戈斯著《智利的工业：结构性的前提》（圣地亚哥，1966）；O·穆尼奥斯著《1914—1965年智利的工业增长》（圣地亚哥，1968）和《智利的工业化进程》（圣地亚哥，1972）。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可称之为新结构主义论或者"后期"依附论。

关于其他国家，直接论说这方面的著述不多，比较分散。除前引材料以外，关于墨西哥1930年以前时期工业概况可以从W·P·格莱德和G·W·安德森合著《墨西哥的政治经济》（麦迪逊，1963）和L·索利斯著《墨西哥的经济现实：回顾与展望》（墨西哥，1970）中收集到。此外，有从不同观点撰写的两部优秀的论文集（其中包括宝贵的统计资料）：C·卡多索编《19世纪的墨西哥（1821—1910）》（墨西哥，1980）和E·佩雷斯·洛佩斯编《墨西哥近期的经济增长：墨西哥状况》（奥斯汀，1967）。关于更早的时期有R·A·波塔什著《墨西哥储备银行：1821—1846年的工业发展》（墨西哥，1959）这是研究方面的典范之作，可谓博大精深。墨西哥的纺织业也像巴西纺织业那样，吸引了学者的兴趣：例如，见D·克雷米蒂斯著《19世纪的纺织业》（墨西哥，1973）。

近来出版的许多有关阿根廷的综合研究著作中大多渗透了扩散论的观点，见前引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论文集；R·科尔特斯·孔德著《1880—1914年阿根廷的进步》（布宜诺斯艾利斯，

1979)；R·科尔特斯·孔德和E·加略著《现代阿根廷的形成》（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E·加略著《1880—1930年阿根廷的土地开发与工业发展》，载雷蒙德·卡尔编《拉丁美洲事务。圣安东尼论文集》第22期《牛津，1970)；V·巴斯克斯—普雷塞登著《阿根廷实例：移民因素、对外贸易与发展，1875—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和《危机与债务》（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以及G·迪·塔利亚和M·齐默尔曼合著《阿根廷经济发展阶段》（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上述这些著作坚持把阿根廷现代工业的根源放在出口发展时期。迪·塔利亚和齐默尔曼利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企图创造一种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翻版用于阿根廷，他们认为，工业化的前提在1914年以前早已经具备了，但是在1930年以前一直没有实现自动的持续发展。其他的作者对20世纪20年代的看法并不那么否定。

关于其他国家的著述甚至更为零散，只是间接地阐述工业这个主题。研究哥伦比亚其他方面的一些优秀的专著中涉及这一主题的具体资料不多，反映了制造业的规模很小：如R·布鲁著《从独立到1920年安蒂奥基亚的经济发展》（波哥大，1977)；D·朱著《大萧条和哥伦比亚的工业化》（圣莫尼卡，1977)；W·P·麦格里维伊著《1845—1930年哥伦比亚经济史》（剑桥，1971)；M·帕拉西奥斯著《哥伦比亚的咖啡，1870—1970年：经济、社会和政治史》（剑桥，1980)；弗兰克·萨福德著《务实的理想：哥伦比亚为建立一个技术精英阶层而奋斗》（奥斯汀，1976)。S·J·亨特著《19世纪秘鲁的发展与鸟粪》（普林斯顿，1972）驳斥了前引莱文在其所著《出口经济，…》中的假说，对秘鲁的制造业在本世纪初可能出现的环境做出了比较肯定的分析。在H·博尼利亚著《鸟粪与资产阶级》（利马，1973）和E·耶佩斯·德尔·卡斯蒂略著《1820—1920年的秘鲁：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世纪》（利马，1972）两书中有对秘鲁工业潜力不同的估计。并见下引索普和伯特伦合著《1890—1977年的秘鲁》。

有些作者试图将结构主义论与依附论原理同后迪安修正主义（甚至连同其早期的关于制造业和工业化的叙述性说明）融为一体。最成功的是F·S·韦弗著《阶级、国家与工业结构：南美洲工业增长的历史进程》（韦斯特波特，1980）。从不同的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框架作出的毫无逊色的分国研究，有R·索普和G·伯特伦合著《1890—1977年秘鲁：开放经济的增长与政策》（伦敦，1978）——其中还有许多关于制造业状况的宝贵资料，以及J·G·帕尔马著《外部失衡与内部工业化：1914－1935年智利》，载 628 C·艾贝尔与C·M·刘易斯合编《拉丁美洲、经济帝国主义与国家：从独立到现在对外联系的政治经济》（伦敦，1985）。N·H·莱夫著《巴西的不发达与发达》（2卷集，伦敦，1982）并不怎么打算把早期的这些观点融合一体，而更倾向于加以驳斥，并对巴西历史作了许多说明。

最近的这些著作使人们对一度遭到忽视的由拉美学者们在1930年以前撰写的有关制造业发展详情或者提出的促进工业化的方案等又恢复了兴趣。这些材料突出的例子有A·E·本赫著《阿根廷的经济》（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28－1930）和《现代经济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1920）；F·A·恩西纳著《我们的经济劣势》（圣地亚哥，1912）；以及A·莫利纳·恩里克恩著《国家的大问题》（墨西哥，1909），后者曾引起了拉美大陆普遍重视。具有分国重要意义的著作如F·阿莱萨·帕斯·索尔丹著《工业：经济、技术与社会研究》（利马，1933）；P·L·冈萨雷斯著《智利的工业》（圣地亚哥，1916）；A·加兰著《秘鲁的工业概述》（利马，1902）；J·马丁内斯·拉马斯著《乌拉圭的财富与贫困》（蒙得维的亚，1930）；O·莫拉托著《乌拉圭的制造业》（蒙得维的亚，1927）。并见A·多尔夫曼著《阿根廷工业经济的发展》（布宜诺斯艾利斯，1938）和R·C·西蒙森著《在国家经济中的工业状况》（圣保罗，1937）。

当前的著作常常引用各国政府机构编辑的大量统计资料。虽

然在30年代以前大多数拉美国家还没有开始在定期的基础上积累宏观经济的资料，但早期的全国性普查，如阿根廷在1895年和1914年，巴西在1890年和1920年举行的普查，包含着宝贵的——即使并不一定都可靠——的资料。同样，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也曾举行过局部性的工业调查，例如，1922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即进行过这类调查。类似的资料在英国贸易部和美国商业部这一时期的官方调查和报告中可以查到。这类资料有时收编在正文中，如F・L・贝尔著《哥伦比亚：商业与工业手册》（华盛顿特区，1923）；W・H・凯贝尔著《南美洲：一个工业和商业的场地》（伦敦，1919）；D・M・费尔普斯著《去南美洲的工业移民》（纽约，1936）；G・威思著《拉丁美洲的工业》（纽约，1945）；和L・J・休利特编《拉丁美洲的工业化》（纽约，1946）。

修正主义观点的主题往往大多是一些特定论题。涉及的问题很多，例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问题。除了前面所列对于巴西和智利的研究外，可见R・米勒著《试论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世界发展》9/8（1981），该文对此作了谨慎的估计。有关更早期的外部冲击性质的讨论，可见J・C・恰拉蒙特著《1860—1880年阿根廷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关于巴林危机影响的论述可见前引科尔特斯・孔德、加略等人的著作。G・拉宁斯编《政府与经济发展》（纽黑文，1971）和各个其他论著中，如韦弗著《阶级、国家与工业结构》，都有一些关于政府政策和制造业增长的讨论。然而，对于政策问题最突出的调研是A・V・维莱拉和W・苏济甘合著《1889—1945年政府政策与巴西的经济增长》（里约热内卢，1973），本书作出了典范性的分析并树立了一种不仅对巴西，而且对其他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框架。波塔什著《墨西哥储备银行》对在19世纪早期的研究具有同样的价值。关于阿根廷，见D・J・盖伊著《1873－1906年卡洛斯・佩列格里尼和早期工业化的政治》，载JLAS 11/1（1979）。索普编《20世纪30年代的拉丁美

洲》中有几篇优秀的论文谈到许多政策问题。关税、货币供应和汇率是特别受到重视研究政策形成的领域。有关这些方面过去的但突出的著作是L·奥斯皮纳·巴斯克斯著《哥伦比亚的工业与保护措施》(麦德林，1955)。J·C·尼科劳著《1835—1854年阿根廷的工业与海关》(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同前引恰拉蒙特著《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都是重要的研究著作。关于巴西，除F·R·维西亚尼的著作以外，并见M·T·R·O·维西亚尼著《1906—1912年巴西的关税保护制与工业增长》(巴西利亚，1981)。C·M·佩莱斯与W·祖济甘合著《巴西货币史：对货币政策、货币流通和货币体制的分析》(里约热内卢，1976)。 630
有用的著作还有：J·潘迪亚·卡洛耶拉斯著《巴西的货币政策》(圣保罗，1960)；C·M·佩莱斯著《1889—1945年巴西的货币、财政与外汇的正统派观念对经济的影响》(里约热内卢，1971)和E·A卡多佐著《19世纪巴西的外汇率：计量经济学模式》，载《发展研究杂志》19/2(1983)。关于墨西哥20世纪20年代期间货币政策与制造业的讨论可见E·费尔南德斯—乌尔塔多编《中央银行的50年》(墨西哥，1976)一书中的论文。有关拉丁美洲各国正规通货和银行业历史情况的材料大多是比较间接的材料。有关巴西货币供应、外汇与工业的资料，质量特别高。O·扬尼著《巴西的工业化与社会发展》(里约热内卢，1963)填补了在体制方面的政策研究之不足，尽管其大部分内容并不限于这段时期，但对于工业化的社会性特点有某些透彻的见地。在这方面，前引韦弗、基尔施和博尼利亚的著作也很有用。强调移民企业家和外部影响对早期制造业所起作用的著述有：迪亚斯·亚历杭德罗的《论文集》；R·格雷厄姆著《1850—1914年英国与巴西工业化的开始》(剑桥，1968)；和V·B·雷伯著《1810—188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商行》(马萨诸塞，剑桥，1979)。并见迪安著《圣保罗的工业化》。强调本国人对早期工业增长作出贡献的著作有L·奥尔特加著《硝石、智利企业家与太平洋战争的起

源》，载JLAS 16/2（1984），以及前引卡诺和卡多佐·德·梅洛的著作。关于象阿根廷1875年创立的阿根廷工业俱乐部（后改名阿根廷工业联盟）和智利1883年组成的工厂发展协会这类在20世纪开始以前，由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建立的工业组织的会员状况及其社会成分等，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关于劳工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可是，大多数作品的重点是在1930年以后，有若干著作则侧重于非工业部门以及新颖的主题，难以对所有这些著作做出概括。有关劳工和工业增长的辩论范围已扩大到包括直接讨论工资率和薪金等影响制造业需求弹性的要素问题。关于拉丁美洲城市工人阶级和早期劳工运动历史，见本卷书目评论第9节。

9.1880—1930年城市工人阶级和早期拉丁美洲工人运动

有几本拉丁美洲工人运动通史其内容包括了1930年以前这段时期。其中近期出版的有：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著《拉丁美洲有组织的劳工》（纽约，1977），和胡利奥·戈迪奥著《拉丁美洲劳工运动史》（2卷集，墨西哥城，1980—1983）。戈迪奥一书的第1卷涉及1918年以前的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的运动，第2卷阐述整个地区1918年至1930年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罗贝631 尔·帕里斯和马德琳·勒贝里乌合著《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了简短有益的调研，载雅克·德罗兹编《社会主义通史》（巴黎，1978）IV，第165—255页。

最全面的书目提要仍是卡洛斯·拉马编《拉丁美洲：1492—1936年》（《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V，巴黎，1959）。以后有一部德国人编的《拉丁美洲工人运动：编年与书目，1492—1966年》（巴特洪堡，1967）。其他材料可见：肯尼思·保罗·埃里克森、帕特里克·V·佩佩和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合著《对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工组织的研究：哪些问题

尚待研究？》，载LARR 9/2（1974）第115—142页。

收藏拉丁美洲早期工人报刊最多的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埃里克·戈登、迈克尔·霍尔和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合著《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巴西和阿根廷资料概况》，载LARR 8/3（1973）第27—77页，以及雷蒙德·布维和库内拉·霍尔图伊斯合著《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墨西哥资料概况》，载LARR 10/1（1975）第155—168页，以上两书对该所在拉美大国这一方面资料的馆藏情况作了描述。

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专论有：卡洛斯·M·拉马编《空想社会主义，1830—1893年》（加拉加斯，1977），书中翻印了早期的一些重要文件。阿弗雷多·戈麦兹著《拉丁美洲的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巴黎，1980）试图对整个拉美大陆的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一概括性调研。有两本概述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其中都包括了1930年以前时期的大量资料：如罗伯特·J·亚历山大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新不伦瑞克，1957），和鲍里斯·戈登堡著《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斯图加特，1971）。

有几本著作对阿根廷劳工运动的主流作了有益的研究，尽管有时带有较强的党派性倾向。如：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著《阿根廷地方工人联合会——阿根廷革命工人运动的思想和路线》（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第2版，1971）一书中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阐述。塞瓦斯蒂安·马罗塔著《阿根廷工会运动及其起源与发展》（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0—61）则持有工团主义的观点。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是哈辛托·奥多内著《阿根廷的无产阶级工会主义》（布宜诺斯艾利斯，1949）。关于社会党人，见达尔多·库内奥著《胡安·B·胡斯托与阿根廷的社会斗争》（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和理查德·沃尔特著《1890—1930年阿根廷的社会党》（奥斯汀，1977）。

最有帮助的书目提要是莱安德罗·古铁雷斯编《阿根廷工人阶级史和现状研究资料与书目提要汇编》（托尔夸托·迪·特莱

632

研究所，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编《阿根廷的劳动者阶级及其历史文件，1890—191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中翻印了有关劳工运动各个方面的文件。居伊·布代著《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与移民：布宜诺斯艾利斯（19世纪和20世纪）》(巴黎，1974）和詹姆斯·R·斯科比著《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1870—1910年》(纽约,1974),以及何塞·帕内蒂里著《1870—1910年阿根廷在大量移民时期的劳工》(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三书中包括了有关生活和劳动状况的大量资料。唐娜·J·盖伊著《妇女、日工和工业化：1810—1914年阿根廷》,载LARR 16/3（1981)第65—89页,分析了妇女的作用。

关于早期的劳工运动，见何塞·拉策尔著《90年代的阿根廷马克思主义者》(科尔多瓦，1969)，和贡萨洛·萨拉戈萨·鲁维拉著《19世纪末无政府主义与阿根廷的工人运动》,载《社会运动》103（1978）第7—28页。希尔达·伊帕拉圭尔和奥费莉亚·皮内托合著《1870—1895年科尔多瓦的工人阶级组织》(科尔多瓦，1968）是一本研究地方状况的专著。

雅可夫·奥韦著《无政府主义与阿根廷的工人运动》(墨西哥城，1978）为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运动作出了有充分文献根据的说明。奥斯瓦尔多·拜尔所著的一些著作中对阿根廷无政府主义的特点作了阐述，特别是《塞韦里诺·迪·乔瓦尼：暴力的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和《巴塔哥尼亚惨案的复仇者们》(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

对于1917年以后的时期，见胡利奥·戈迪奥著《1919年的悲惨的一周》(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埃米利奥·J·科比埃尔著《1917—1920年共产党的基础》,载《一切都是历史》106（1976）第7—31页，以及戴维·罗克著《1890—1930年阿根廷的政治》(剑桥，1975)。

有几本概述巴西早期劳工运动的著作，如鲍里斯·福斯托著《城市劳工与社会冲突（1890—1920)》(圣保罗，1976),弗朗西

斯科·富特·哈德曼和维克托·莱昂纳迪合著《巴西工业与劳工史：20年代的创始期间》（圣保罗，1982），和谢尔登·马兰著《1890—1920年无政府主义者、移民与巴西的工人运动》（里约热内卢，1979）。马兰的著作也有英文本，在其论文中有：《巴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载《关于拉丁美洲研究的太平洋沿岸会议会议录》4（1975）第101—116页；《1890—1921年巴西的劳工与左派：夭折的运动》，载HAHR 57/2（1977）第254—272页；《1890—1921年移民与巴西的劳工运动》，载道里尔·奥尔登和沃伦·迪安合编《关于巴西和葡语印第安的社会经济史》（盖恩斯维尔，1977）；和《20世纪20年代城市劳工与社会变革》，载L-BR 16/2（1979）第215—223页。

633

有些早期出版的著作仍有其重要性。埃韦拉尔多·迪亚斯著《巴西社会斗争史》（圣保罗，第2版，1977）是1930年以前时期曾亲身参与许多斗争的人叙述的一部回忆录历史文集。有相当数量的资料在埃德加·罗德里格斯的各种著作中也可以查到，特别是《巴西的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里约热内卢，1969），和《民族主义与社会文化》（里约热内卢，1972）。阿西斯·西芒著《工会与政府：及其与圣保罗的无产阶级形成的关系》（圣保罗，1966）仍然是从社会学角度对圣保罗劳工运动所作的有影响的说明。

罗纳德·奇尔科特著《巴西及其激进左派：1922—1972年共产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兴起的书目提要注释》（纽约，米尔伍德湖，1980）是这类书目提要中最广泛的。保罗·塞尔吉奥·皮内罗和迈克尔·M·霍尔合编《1889—1930年巴西的工人阶级》（2卷集，圣保罗，1979—1981）和埃德加·卡罗内编《1877—1944年巴西的工人运动》（圣保罗，1979）是两部文件汇编。亚拉·阿温·扈利著《1917年圣保罗的罢工与无产阶级组织进程》（圣保罗，1981）一书中选编了自1917年圣保罗罢工以来的重要文献。

西尔维亚·马尼亚尼著《圣保罗的无政府主义运动（1906—1917）》（圣保罗，1982）一书虽然受到强烈批评，但对圣保罗早

期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发展过程作了充分文献根据的研究。弗朗西斯科·福特·哈德曼著《无祖国亦无领袖：巴西工人生活与无政府主义文化》（圣保罗，1983）着重论述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玛丽亚·瓦莱里亚·戎奥·佩纳著《妇女与女工：妇女在工厂体制构成中的状况》（里约热内卢，1981）为早期工业化方面关于女工情况提供了资料。并见玛丽亚·瓦莱里亚·戎奥·佩纳和埃尔卡和门东萨·利马合著《徒劳的奋斗：第一共和国劳工政策中的妇女》，载卡门·巴罗佐编《妇女与妇女界》（圣保罗，1983）第17—33页。迈克尔·M·霍尔著《移民与早期圣保罗的工人阶级》，载《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历史年鉴》12（1975）第393—407页，分析了少数民族工人的状况。

634

巴西共产党的历史已受到相当的重视。约翰·W·F·杜勒斯著《1900—1935年巴西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奥斯汀，1973）是一部长篇的叙事史，并着重谈到20世纪20年代党的领袖们。有些书重新发表了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的许多早期的著作，其中有米谢尔·扎伊丹编《巴西共产党的构成（1922—1924）》（圣保罗，1980）。埃德加德·卡罗内编《巴西共产党（1922—1943）》编入了该党自创立以来的许多文件。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如奥克塔维奥·布兰当著《斗争与论战》（圣保罗，1978），埃托尔·费雷拉·利马著《进军路线：战争回忆录》（圣保罗，1982），和莱昂西奥·巴斯鲍姆著《六次冒险复生（回忆录）》（圣保罗，1976）。《纪事与历史》评论用第1期和第2期（1981和1982年）为巴西共产党早期历史出了专刊，其中包括选自阿斯特罗吉尔多·佩雷拉档案的未发表过的资料。埃德加尔·德·德卡著《1930年：失败者的沉默》（圣保罗，1981）一书提供了对工农集团重要的说明。

在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总编辑指导下完成的17卷丛书《墨西哥工人阶级史》（墨西哥，1979）提供了墨西哥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史全面概况，其中有几卷将在下文中分别述及。此外，

豪尔赫·巴苏尔托著《墨西哥的工业无产阶级（1850—1930）》（墨西哥，1975）和路易斯·阿赖萨著《墨西哥工人运动史》（4卷集，墨西哥，1964—1965）都很有价值。

墨西哥工人运动研究中心（CEHSMO）出版了一本《工人历史》杂志（1974）和一部总名称为《工人杂志》的文献集，前者是登载专题著述的丛刊，后者是翻印文件的汇编。该研究中心还出版了一本书目提要《墨西哥工人运动：书目提要》（墨西哥，1978）。除此以外的参考书，见何塞·沃尔登伯格著《关于墨西哥阶级与工人运动研究的特点：1970—1978年》，载《关于工人运动历史斗争的纪事》（普埃布拉，1980）第1、13—47页。

在约翰·M·哈特著《1860—1931年无政府主义与墨西哥的工人阶级》（奥斯汀，1978）一书中论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胡安·费利佩·莱亚尔和何塞·沃尔登伯格著《在波菲利奥·迪亚斯独裁时期开始时自由派的状况》（载《墨西哥历史中的工人阶级》第2卷，墨西哥，1980）一书中有大量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的劳工运动资料。关于后一时期，见西罗·卡多索、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埃莫西利洛和萨尔瓦多·埃尔南德斯合著《从波菲利奥独裁到自由派时代》（载《墨西哥历史中的工人阶级》第3卷，墨西哥，1980），该书有助于了解波菲利奥·迪亚斯时期并对墨西哥自由党作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戴维·沃克著《波菲利奥·迪亚斯时期的劳工政策：1876—1902年墨西哥城的工人阶级组织与波菲利奥·迪亚斯》，载TA 37/3（1981）第257—289页，侧重阐述了迪亚斯政权怀柔的特点，较少涉及其高压的特点。 635

关于迪亚斯末期工人阶级与劳工运动的突出研究是罗德尼·D·安德森著《在自己土地上的流浪者：1906—1911年墨西哥的产业工人》（迪卡尔布，1976）。安德森对墨西哥自由党在墨西哥工人中的影响颇持怀疑态度。关于另一种观点，见詹姆斯·D·科克罗夫特著《1900—1913年墨西哥革命中的知识界先驱者》（奥斯汀，1968）、阿尔曼多·巴特拉在《1900—1918年的〈复兴

报）：反映1910年墨西哥革命最激进思潮的战斗性报刊》（墨西哥，1977）中重印了选自自由党党报的一些文章。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的一些著述的英译文可参阅戴维·普尔编《国家与自由：墨西哥革命中无政府主义影响，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奥克尼，桑迪，1977）。

巴里·卡尔著《1910—1929年工人运动与墨西哥的政治》(2卷集，墨西哥，1976；第1卷第2版，1981）是一本对劳工问题非常有价值的综述，其内容包括20世纪20年代革命时期在内。并见拉蒙·E·鲁伊斯著《劳工与心理矛盾的革命者：1911—1923年墨西哥》(巴尔的摩，1976)和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著《第一届制宪政府（1917—1920)》（载《墨西哥历史中的工人阶级》第4卷，墨西哥，1980)和A·奈特著《1900—1920年工人阶级和墨西哥革命》，载JLAS 16/1（1984）第51—72页。

马乔里·鲁斯·克拉克著《墨西哥有组织的劳工》(查珀尔希尔，1934）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本有影响的论著。关于这一时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见吉列米娜·巴埃纳·帕斯著《劳工总联合会》，载《墨西哥政治学与社会学评论》83（1976)，和何塞·里韦拉·卡斯特罗著《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正统工团主义和革命工团主义》，载《社会运动》103（1978）第31—52页。关于共产党的有用的书有曼努埃尔·马克斯·富恩特斯和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阿劳霍合著《墨西哥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时期：1919—1943)》（墨西哥，1973)，和巴里·卡尔著《1910—1919年墨西哥共产党形成时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载HAHR63/2（1983）第277—305页。

636

法维奥·巴尔沃萨·卡诺著《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从路易斯·N·莫罗内斯到安东尼奥·J·埃尔南德》（普埃布拉，1980)和罗乔·瓜达拉马著《墨西哥的工团主义政治：1918—1929年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墨西哥，1981)对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特别重视。关于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的衰落和

以后对拉拢和控制工人进行斗争的情况可见阿纳尔多·科多瓦著《危机的时代（1928—1934)》(载《墨西哥历史中的工人阶级》第9卷，墨西哥，1980)。

涉及智利劳工运动较长历史时期的论著有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著《19世纪智利工人运动史》(圣地亚哥，1956)；豪尔赫·I·巴里亚·塞龙著《从1910至1926年智利的社会运动》(圣地亚哥，1960)和《智利工团主义简史》(圣地亚哥，1967)；以及路易斯·瓦伊塔尔著《智利工人运动到人民阵线的形成与发展》(加拉加斯，1979)。

彼得·德·谢佐著《1902—1927年智利城市工人与工会》(麦迪逊，1983）是一部重要的论著，它提供了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相当数量的资料。并见他的文章《智利1903年瓦尔帕莱索海员罢工与革命的劳工运动》，载JLAS11/1（1979）第145—168页。关于北部劳工斗争的背景资料，见迈克尔·蒙特奥著《智利的硝石时代：1880—1930年经济依附的发展》(麦迪逊，1982)。

在胡利奥·塞萨尔·霍韦特著《雷卡瓦伦：智利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起源》(圣地亚哥，1965）中论述了雷卡瓦伦这位复杂的人物。并见胡利奥·塞萨尔·霍韦特、豪尔赫·I·巴里亚·塞罗恩和路易斯·瓦伊塔尔合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选集》(圣地亚哥，1965)。关于共产党的有埃尔南·拉米雷斯·内科切亚著《智利共产党的起源与形式》(圣地亚哥，1965)，和该党领袖埃利亚斯·拉斐特的回忆录《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生平》(圣地亚哥，1956)。詹姆斯·O·莫里斯著《精英、知识分子和舆论趋同：对智利的社会问题和工业关系体系的研究》(伊萨卡，1966）论述了20世纪20年代劳工立法的起源。

关于秘鲁的劳工运动有价值的著作有：丹尼斯·苏尔蒙特著《1900—1956年秘鲁的劳工运动》(利马，1975)；彼得·布兰查德著《1883—1919年秘鲁劳工运动的起源》(匹兹堡，1982)；彼达·帕雷哈·普夫克尔著《秘鲁的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1904

637

—1929)》(利马，1978)和维尔弗雷多·卡普索利著《1900—1919年秘鲁的工人斗争》(利马，1976)。

关于乌拉圭，见弗朗西斯科·R·平托斯著《乌拉圭工人运动史》(蒙得维的亚，1960)，和赫克托·罗德里格斯著《我们的工会(1865—1965)》(蒙得维的亚，1965)。关于巴拉圭，有弗朗西斯科·高纳著《巴拉圭工会与社会史概论》(亚松森和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关于玻利维亚最有帮助的著作，有吉列尔莫·洛拉著《1848—1971年玻利维亚劳工运动史》，由克里斯廷·怀特里德译(剑桥，1977)。关于哥伦比亚有米格尔·乌鲁蒂亚著《哥伦比亚劳工运动的发展》(纽黑文，1969)。关于委内瑞拉有胡利奥·戈迪奥著《1850—1944年委内瑞拉的工人运动》(加拉加斯，1980)。

关于加勒比地区，特别见埃韦利奥·特列里亚·托卡著《古巴工人代表大会》(哈瓦那，1973)和古巴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史研究所编《古巴工人运动：文件与论文集》第1卷(1865—1925)、第2卷(1925—1935)(哈瓦那，1975)。关于波多黎各，有安杰尔·金特罗·里韦拉编《波多黎各的工人斗争：文献史料》(纽约，1976)和亚米拉·阿西斯著《1898—1919年波多黎各的妇女斗争》(圣胡安，1979)。关于圭亚那，见沃尔特·罗德尼著《1881—1905年圭亚那的工人史》(巴尔的摩，1981)和阿什顿·蔡斯著《1900—1961年圭亚那工会主义史》(乔治敦，1964)。

关于中美洲1930年以前发展的资料有以下的论著：路易斯·纳瓦斯著《巴拿马的工人运动(1880—1914)》(圣何塞，1979)；马里奥·波萨斯著《洪都拉斯的工人运动斗争》(圣何塞，1981)；拉斐尔·门希瓦尔著《萨尔瓦多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斗争》(圣萨尔瓦多，1979)和阿里斯蒂德斯·奥古斯托·拉林著《萨尔瓦多工会运动史》，载《大学杂志》4(1971)第136—179页。

10. 1870—1930年
拉丁美洲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

本章主要的资料是思想家的著作，他们是拉丁美洲知识界的领袖们，其中大部分是文人，部分是新闻工作者，部分是社会或政治理论家，而大部分还是政治家或官员。他们很少是专业学者，按今天的观念来说，他们缺少余暇、图书资料以及有素的训练来 638 从事广泛的经验主义式研究。然而，思想家并不是孤立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被人尊重的和有影响的知名人物。这个时期的知识界和政府上层份子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对思想方面的研究成为了解政治历史的重要途径，特别在了解为政策奠定基础的设想方面更是如此。尽管政府发言人受到最大的注意，但是对统治集团内部和外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做了论述。评论中所选择的个人及其著作随本章的结构而定，不是传记式而是考题式的。拉丁美洲的思想是同欧洲分不开的；欧洲知识界和政治思潮的有关情况将作为经常参考的资料、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讨论关于拉丁美洲的二次文献。

在编写本章书目提要中遇到了三个主要问题。首先是缺少超出国家范围和把1870—1930年作为整体的综合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尤其是缺少对西语美洲和巴西思想的比较研究。第二个问题是缺少个人经历书目提要论著，甚至关于重要人物的也缺少。为了分析思想的来龙去脉，必须建立记录专文初稿和发表历史过程的档案，以便加以综合。有些著作通常首先作为论文或讲话发表，同时往往又略加修改再发表几次。人们欢迎下列这些经过刻苦努力写成的著作，如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纳瓦萨尔等著《关于唐·胡斯托·谢拉的总书目》(墨西哥,1969)；彼得·J·泽林格著《知识分子的发展与巴伦廷·莱特列尔的影响：书目提要研究》,载《智利历史与地理评论》136 (1968)第250—284页，

和吉列尔莫·鲁永著《关于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个人传记书目提要》(利马，1963)；人们也为其他人物诸如田赫涅罗斯、莫利纳·恩里克斯或奥利维拉·维亚纳缺少类似著作而叹息。

第三个关于书目提要的问题，是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分析并没有归入现已建立的学术分类中。必须借助于人文学家对文学和哲学论文的研究，又须借助于社会科学——历史学家对政治上层人物、社会运动以及意识形态的研究。不仅该两类研究往往侧重于不同的知识分子，而且前者往往不太重视政治与社会背景，后者又不太重视对思想本身的分析。此外，前后两类研究分别进行的调查往往又受到各自不同的问题和方法论的引导而各异。

639 有两本关于思想的综合研究著述也许是最好的，它们都是由确实具有历史背景感的人文学家撰写的：阿尔韦托·苏姆·费尔德著《西语美洲文学目录评论：散文作家》(墨西哥，1954)，和马丁·S·斯塔布著《寻求一致性：1890—1960年西语美洲思想论文的模式》(查珀尔希尔，1967)。可惜的是两本书都没有再版。关于19世纪，莱奥波尔多·塞亚著《西语美洲思想的两个阶段》(墨西哥，1949，英译本《拉丁美洲的思想》，俄克拉何马，诺曼，1963)虽然作者的哲学观点与历史超然性是对立的，但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著述。对巴西和西语美洲进行综合论述唯一的著作是琼·弗朗哥著《拉丁美洲现代文化：社会与艺术家》(第2版，伦敦，1970)。法朗索瓦·布里科著《爱丽儿的冒险》，载《代达罗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101(1972)第109—136页，提出了许多高见。威廉·R·克劳福德著《拉丁美洲一个世纪的思想》(第2版，马萨诸塞，剑桥，1961)是一本标准的评述思想家的手册；哈罗德·E·戴维斯著《拉丁美洲的思想：历史概况》(巴吞鲁日，1972)也很有用。马里奥·贡戈拉著《西语美洲大学的渊源与哲学》，载约瑟夫·梅尔和理查德·W·韦瑟里德合编《拉丁美洲大学》(阿尔伯克基，1979)第17—64页，是一篇全面阐述16世纪到20世纪西语美洲教育思想的优秀论文。

其他比较研究中也多少涉及思想领域，这类著作有，卡尔·索尔伯格著《1890—1914年阿根廷与智利的移民与民族主义》(奥斯汀，1970)；小霍巴特·A·斯波尔丁著《拉丁美洲有组织的劳工》(纽约，1977)；和托马斯·E·斯基德莫尔著《工人与士兵：20世纪拉丁美洲的城市劳工运动与上层人物的反应》，载弗吉尼亚·伯恩哈德编《1850—1930年上层人物、群众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奥斯汀，1979)。J·劳埃德·米查姆著《拉丁美洲的教会与政府》(查珀尔希尔，1934)不是明确的比较研究，但仍是一本标准的指南。克劳迪奥·贝利斯的近著《拉丁美洲的中央集权主义传统》(普林斯顿，1980)尽管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一个方面的看法，但切合本章主题颇有价值。关于组合主义，见菲利普·C·施米特尔和罗纳德·C·牛顿的论文载弗雷德里克·B·派克和托马斯·斯特里奇合编《新组合主义》(圣母大学，1974)；并见詹姆斯·M·马洛伊著题为《拉丁美洲的独裁主义与组合主义》的一本概论(匹兹堡，1977)。

其内容真正与本章范畴相符的分国著作仅限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在这少量的分国研究中，属于综合性方面的，关于阿根廷，见何塞·路易斯·罗梅罗著《阿根廷的政治思想》(第3版，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英译本(斯坦福，1963)，特别是他的《20世纪阿根廷社会的思想发展》(墨西哥，1965)。亚历杭德罗·科恩著《在国家发展中的哲学思想》(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也可算是权威性主要资料。《1862—1930年阿根廷的现代史》(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3)对非专业读者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著作。戴维·罗克著《1890—1930年阿根廷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兴衰》(剑桥，1975)是基础性读物。鉴于阿根廷首都是该国知识界大多数人发表意见的地方，詹姆斯·R·斯科比著《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广场到郊区，1870—1910》(纽约，1974)是一本有价值的书。关于巴西，见T·E·斯基德莫尔著《黑人成为白人：在巴西思想中的种族与民族》(纽约，1974)和若昂·克鲁斯·科

640

斯塔著《巴西思想史》(伯克利，1964)。关于智利，弗雷德里克·B·派克著《智利与美国》(圣母大学，1963) 全面论述了思想和政治并包括了便于进一步研究的大量注释。关于秘鲁，欧亨尼奥·张·罗德里格斯著《冈萨雷斯·普拉达、马里亚特吉与阿亚·德拉托雷的政治文学》(墨西哥，1957)是一部完全研究思想的著述。F·B·派克著《秘鲁近代史》(纽约，1967)，和豪尔赫·巴萨德雷的杰作《秘鲁共和国史》(第5版，6卷集，利马，1961—62) 都是有益的参考书。

专著中比较有用的，关于阿根廷，有：理查德·C·沃尔特撰写的关于大学改革的著述《阿根廷的学生政治》(纽约，1968) 和《阿根廷1918年大学改革知识分子的背景》，载HAHR 49/2 (1969) 第233—253页；H·斯波尔丁的一篇简介《阿根廷社会学》，载拉尔夫·伍德沃德编《1850—1900年拉丁美洲的实证主义》(波士顿，1971)，其中有些令人感兴趣的论点。桑德拉·F·麦吉著《1900—1932年阿根廷反革命的社会渊源》(未发表的博士论文，盖恩斯维尔，弗罗里达大学，1979)开辟了研究20世纪20年代政治权力的新领域。关于乌拉圭的何塞·E·罗多，戈登·布拉泽顿为他在英国出版罗多著《爱丽儿》(剑桥，1967) 一书所写的序言是非常优秀之作。关于巴西，费尔南多·阿塞维多著《巴西的文化》(纽约，1950) 对研究实证主义教育思想很有价值；并见罗伯特·G·纳奇曼著《实证主义、现代化与巴西的中等阶级》，载HAHR 57/1 (1977) 第1—23页。罗伯特·康拉德译若阿金·纳布科著《废奴主义》(厄巴纳，1977)一书的英文版(并有诠释)
641
对非专业读者很有用。理查德·格拉厄姆著《土地占有者与帝国之倾覆》，载L-BR 1 (1970)第44—56页，结合社会与政治背景对废奴思想进行了研究，他的《若阿金·纳布科，保守派史学家》，载L-BR 17 (1980) 第1—16页，也是一篇有价值的作品，但用“保守派”的标签值得怀疑。小W·道格拉斯·麦克莱恩著《阿尔贝托·托雷斯，特别的民族主义者》，载L-BR 4 (1967) 第17—34

页，是一篇有用的提要，但阿达尔贝托·马森的近作《阿尔贝托·托雷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圣保罗，1979）是研究托雷斯最好的一本著述；约瑟夫·L·洛夫著《1882—1930年南里奥格兰德与巴西的地区主义》(斯坦福，1971)一书阐述了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关于智利的资料有各种各样。亚历杭德罗·富恩萨利达·格朗东著《拉斯塔里亚及其时代》(圣地亚哥，1893）和路易斯·加尔达梅斯著《巴伦廷·莱特列尔及其作品》(圣地亚哥，1937）都是追随者为先辈们写的思想评传；里卡多·多诺索著《智利的政治思想》(墨西哥，1946）内容包括了1891年以前时期；西蒙·科利尔著《智利"波塔莱斯"时期(1830—1891)的历史编纂工作》，载HAHR 57/4（1977）第660—690页，是一篇杰出的指南；艾伦·沃尔著《古为今用：19世纪智利历史的教益》(巴吞鲁日，1982）一书论述了思想变化的几个方面；弗朗西斯科·A·恩西纳著《智利史》(20卷集，圣地亚哥，1941—1952）是了解1891年以前政治事件的一部好参考书；哈罗德·布莱克莫尔著《1886—1896年英国的硝石与智利的政治：巴尔马塞达和北部》(伦敦，1974）是了解这一时期必读的著作；关于20世纪可见胡利奥·海泽·冈萨雷斯著《智利史，1861—1925年议会时期》第1卷(圣地亚哥，1974)；让·皮埃尔·布朗潘著《1816—1945年在智利的德国人》(科洛涅，1974）详尽地叙述了这方面的情况。阿诺德·鲍尔著《智利农业社会》(剑桥，1975）一书为1910年前后智利上层人物的特点作了深刻的描述；布赖恩·洛夫曼著《智利：西班牙资本主义的遗产》（纽约，1979）为非专业读者了解20世纪政治的社会基础很有裨益；弗雷德里克·M·纳恩著《1920—1931年的智利政治：武装部队的光荣使命》(阿尔伯克基，1970）恰如其份地强调了军队的作用。胡利奥·塞萨尔·乔布特著《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圣地亚哥，1955）是一本同情者的著作。詹姆斯·O·莫里斯著《上层人物、知识界和舆论趋同。智利社会问题与工业关系体系研究》(伊萨卡，1966）是一本对1924年劳工法研究的权威性

著作。

关于墨西哥19世纪末期的思想，见查尔斯·A·阿莱著《1867—1910年墨西哥的“科学家派政治”和自由主义的继续》，载《革命：墨西哥与美国》(墨西哥，1976) 第139—152页；L·塞亚著《墨西哥的实证主义》(第3版，墨西哥，1968) 是一本标准的论著，但须以W·德克·拉特著《波菲利奥·迪亚斯时期的实证主义》(墨西哥，1975) 作为补充；莫斯塞斯·冈萨雷斯·纳瓦罗著《墨西哥的社会学与历史学》(墨西哥，1970) 对本章涉及的几个人物的思想有简要评述；M·S·斯塔布著《墨西哥思想中的土著主义与种族主义：1857—1911年》，载JLAS 1 (1959) 第405—423页，阐明了主题；丹尼尔·科西奥·比利加斯等合著《墨西哥现代史》(10卷集中的前9卷，墨西哥，1955—72) 是必备的参考书；关于青年协会派，胡安·埃尔南德斯·利马在《青年协会的几次会议》(墨西哥，1962) 一书中作了介绍，前者与帕特里克·罗曼内尔的哲学论著《墨西哥思想的形成》(第2版，圣母大学，1967) 都很有用；恩里克·克劳塞著《墨西哥革命中的考迪略文化》(墨西哥，1976) 对1915年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情况作了说明，亨利·C·施米特著《墨西哥人的根源：1900—1934年墨西哥思想的自我与社会》(得克萨斯，科利奇站，1978)，阐明了社会改革与人权主义之间复杂关系；约翰·沃马克的《萨帕特与墨西哥革命》(纽约，1969) 是超群的。詹姆斯·D·科克罗夫特著《1900—1913年墨西哥革命的知识界先驱》(奥斯汀，1968) 和约翰·M·哈特著《1860—1931年无政府主义与墨西哥的工人阶级》(奥斯汀，1978) 都是关于无政府主义和墨西哥自由党的补充论著。拉蒙·E·鲁伊斯著《劳工与心理矛盾的革命者：1911—1923年的墨西哥》(巴尔的摩，1976) 和巴里·卡尔著《世界劳工局、立宪主义与1915年2月公约》，载《墨西哥历史中的劳动制度与劳动者》(墨西哥和图森，1979) 第603—632页，都对政府政策作了阐述。让·梅耶在《墨西哥革命》(巴黎，1973) 一书中对1910—1930年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许

多修正，强调革命政府的发展；阿纳尔多·科尔多瓦著《墨西哥的革命思想》(墨西哥，1973）从左派的观点作了鼓励性的解释。彼得·H·史密斯著《权力的纠纷：20世纪墨西哥的政治新手》（普林斯顿，1979）则对独裁主义政府持另一种态度。

关于秘鲁除了综合性论述外，J·巴萨德雷在《在秘鲁和美洲的周围》选集（利马，1954）中评论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的论文是一篇优秀之作。赫苏斯·查瓦里亚著《1890—1930年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与现代秘鲁的兴起》(阿尔伯克基，1979）阐明了马里亚特吉思想的民族背景；约翰·M·贝恩斯著《秘鲁的革命：马里亚特吉与神话》(亚拉巴马，1972）则阐明了马里亚特吉思想中的欧洲渊源；彼得·F·克拉伦著《现代化、混乱和阿普拉主义：1870—1932年秘鲁阿普拉党的起源》(奥斯汀，1973)，是一本研究论著的典范作品，强调了阿普拉主义与特鲁希略地区的联系；小托马斯·M·戴维斯著《对秘鲁阿普拉党土著主义的重新解释》，载HAHR 51/4（1971）第626—645页，和法朗索瓦·金瓦利耶著《1920年秘鲁的官方土著主义》，载马格努斯·莫纳编《拉丁美洲的种族与阶级》(纽约，1970）第184—196页，都是分析批判的论文；史蒂夫·斯坦著《秘鲁的民众主义。群众的兴起与社会控制的政治学》(麦迪逊，1980）为了解阿亚·德拉托雷提供了极好的背景情况；罗伯特·J·亚历山大编《阿普拉主义·维克托·劳尔·德拉托雷的思想与学说》(肯特，1973）是对阿亚不加批判的研究论著，也是原著主要论据有用的英译本。并见耶稣会会士杰弗里·L·克莱贝著《1921—1924年的民众大学与阿普拉主义的起源》，载HAHR 55/4（1975）第693—716页。 643

11．1870—1930年拉丁美洲的文学、音乐与艺术

编写拉丁美洲文化书目评论直接遇到的问题是现有书目资料

本身的问题：残缺不全，范本很少，其中有许多是见不到的。甚至在文学方面——拉丁美洲文化艺术中研究得最多的一个领域，无论是有关整个大陆或各国文学作品方面的经典性历史著述都很少。关于绝大部分时期的音乐、绘画、建筑和电影的情况，现有资料确实非常少。此外，关于“拉丁美洲”文化的大多数论著并未包括巴西在内。本文虽已涉及1870—1930年这段时期，但读者查阅CHLA第3卷关于1810—1870年这段时期书目评论第18节也有裨益。

关于文化史的综合著作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语美洲文化史》（墨西哥，1947）；英译本《西语美洲文化简史》由G·蔡斯译并有一章附录，（纽约，1947），虽然其内容比罗列作品加以诠释的一张清单多不了多少，仍然是综合调研中最有用的。G·阿西涅加斯著《七种肤色的大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5）；英译本《拉丁美洲：文化史》（纽约，1966）也有价值，但主题较分散。S·克利索尔德著《拉丁美洲：文化梗概》（伦敦，1965），对非专业读者入门有所帮助。J·佛朗哥著《社会与艺术家：拉丁美洲的现代文化》（伦敦，1967）这本书的书名未免哗众取宠，言过其实，但仍不失为一本令人感兴趣的文学概论。关于巴西，F·德·阿泽韦多著《巴西的文化》（里约热内卢，1943；英译本，纽约，1950），仍是一本必读的概论。并见N·维尔内克·索德雷著《巴西文化总况》（里约热内卢，1970），和W·马丁的杰作《巴西知识界历史》（圣保罗，1981）。

644

关于拉丁美洲的思想及其文化影响，见M·S·斯塔布著《寻求一致性》（查珀尔希尔，1967），对1890—1930年这一时期特别有用；L·塞亚著《拉丁美洲的思想》（2卷集，墨西哥，1965；英译本，俄克拉何马，诺曼，1963）对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文化倾向是不可缺少的资料，另外还有两本著作也有助于了解这段时

期，只是书名有些古怪耶，埃塞基耶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著《思想家：潘帕斯草原的爱克斯光片》(布宜诺斯艾利斯，1933)和奥克塔维奥·帕斯著《孤独的迷宫》(墨西哥，1950)。关于巴西，见J·克鲁斯·科斯塔著《巴西思想史》(里约热内卢，1956；英译本，伯克利，1964)，和I·林斯著《巴西实证主义史》(圣保罗，1964)

汇编拉丁美洲经典性原文的阿亚库乔文集在加拉加斯出版，有J·C和L·A·罗梅罗合编《1815—1898年保守主义者的思想》(1878)；C·M·拉马编《1830—1893年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主义》(1977)和L·塞亚编《拉丁美洲实证主义思想》(2卷集，1980)。这些书籍有极好的编年附录(这是由古巴出版机构“美洲之家”首创而在拉美普及的一个创新)，为研究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很有益的背景资料。

建筑学

最有用的提纲挈领的著作是L·卡斯特罗著《从前哥伦布时期到现在的拉丁美洲艺术与建筑史》(纽约，1969)，尽管简单扼要，但还不是手册。类似的著作有F·布尔里奇著《拉丁美洲建筑的新方向》(纽约，1969)；谈这段时期晚期的著作有，J·E·阿多伊著《拉丁美洲的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和R·塞格雷编《拉丁美洲的建筑》(墨西哥和巴黎，1975)。综合论述的有D·F·达马兹著《拉丁美洲的建筑艺术》(纽约，1963)；和P·M·巴尔迪著《巴西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各种艺术》(圣保罗，1975)。

有价值的分国概述有I·E·迈尔斯著《墨西哥的现代建筑》(纽约，1952)；S·莫霍伊·纳吉著《卡洛斯·劳尔·比利亚努埃瓦与委内瑞拉的建筑》(纽约，1964)；关于西语美洲的有J·阿朗戈和C·马丁内斯合著《哥伦比亚的建筑》(波哥大，1951)；关于巴西，H·E·明德林著《巴西的现代建筑》(纽约，1956)，

645

E·科罗纳编《巴西建筑学辞典》(圣保罗,1972),是深广兼备的工具书,还有A·德·索萨著《论巴西的建筑》(圣保罗,1978),对瓦哈夫希克、科斯塔、尼迈尔等的评价言简意赅。

绘画与雕塑

奇怪的是——无疑,这是有经济上的原因——关于拉丁美洲的艺术综述,现有的英语著作比西班牙或葡萄牙语著作还多。关于综合概论,见卡斯特多著《拉丁美洲艺术与建筑史》和S·L·卡特林与T·格里德合著《自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艺术》(纽黑文,1966)。专门论述现代的有,G·蔡斯著《拉丁美洲的现代艺术》(纽约,1970),本书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M·特拉杨著《拉丁美洲的新绘画作品》(波哥大,1961),和D·巴扬著《西班牙语美洲造型艺术的冒险》(墨西哥,1973)是两位当代著名拉美艺术评论家的著述。并见D·巴扬编《拉丁美洲的艺术》(墨西哥—巴黎,1974),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助下出版的又一本结构严谨的总论。

关于墨西哥,见B·史密斯著《墨西哥艺术史》(伦敦,1979);和印制精美富丽的《墨西哥造型艺术的四千年》第3卷:《近代与现代艺术》(墨西哥,1971),内有大量插图,本书由E·奥戈尔曼等编,并附有由J·费尔南德斯撰写的关于19世纪及L·卡多萨与阿拉贡合写关于革命时期艺术的章节。并见费尔南德斯著《墨西哥近代与现代艺术》(墨西哥,1952)和卡多萨与阿拉贡合著《当代墨西哥绘画》(墨西哥,1953),两者都是切合本文主题的读物。其他有用的著作有B·S·迈尔斯著《我们时代的墨西哥绘画》(纽约,1956);J·A·曼里克著《1910—1970年艺术的进程》,载《墨西哥通史》第4卷(墨西哥学院,1976)第285—301页;E·巴埃斯·马西亚斯著《圣卡洛斯学院的基金会与历史》(墨西哥,1974);O·帕斯著《墨西哥革命壁画》(墨西哥,1960);琼·夏洛特著《1920—1925年墨西哥壁画的复兴》(纽黑文,1966),

是一位当时身历其境的人的权威性见解；A·里德著《墨西哥的壁画家》（纽约，1966）；O·S·苏亚雷斯著《墨西哥壁画运动的详情》（墨西哥，1972），是一本由古巴艺术专家撰写的多层次研究佳作；和R·蒂沃尔著《墨西哥艺术文献集》（墨西哥，1974），提供了珍贵的背景资料。E·W·韦斯曼的《墨西哥的雕塑》（马萨诸塞，剑桥，1950）对这段时期的艺术很有见地。 646

关于古巴，见戈麦斯·西克雷著《今日古巴的绘画》（哈瓦那，1944），是一位巴黎先锋派的前成员撰写的；和L·德·拉·托连特著《古巴的造型艺术研究》（哈瓦那，1954）。关于委内瑞拉，第一流的权威是A·博尔顿，见他所著《委内瑞拉绘画史》（3卷集，加拉加斯，1972）；此外还有J·卡萨迪利亚和P·布里塞尼奥合著《雕塑、雕塑家：关于委内瑞拉的雕塑作品》（加拉加斯，1977），也有这个领域的重要著作。关于安第斯国家，见G·希拉尔多·哈拉米略著《哥伦比亚的绘画》（墨西哥，1948）；T·努涅斯·乌雷塔编《现代绘画》（2卷集，利马，1975）把秘鲁艺术分为1820—1920年和1920—1968年两个时期，并为读者提供了别处得不到的插图；M·劳埃尔著《20世纪秘鲁绘画概况》（利马，1976）特别有助于了解土著主义方面的问题；J·索沃加尔著《论秘鲁艺术及其论文》（利马，1975），本书作者本人就是秘鲁民族主义艺术的倡导者。M·伊韦利克和G·加拉斯合著《从殖民时期到1981年智利的绘画》（瓦尔帕莱索，1981）附有美丽的插图，是一本有关智利所有时期艺术的最佳概览。

关于阿根廷，见：特别是R·布鲁格蒂著《阿根廷的艺术史》（墨西哥，1965）；A·佩列格里尼著《当代阿根廷绘画概况》（布宜诺斯艾利斯，1967），是这位能言好辩的作者一家之言，但值得一读；和科尔多瓦·伊图武鲁著《阿根廷绘画八十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978）。关于乌拉圭艺术最有用的著作有J·P·阿吉尔著《从土著时期到现代乌拉圭造型艺术的发展进程》（蒙得维的亚，1958）。

巴西出版了很多现代和近代艺术辞典和手册，以20世纪20年代——这与墨西哥类似——特别是1922年圣保罗现代艺术周为转折点的中心时期。见R·庞图瓦尔著《巴西造型艺术辞典》(里约热内卢，1969)，C·卡瓦尔坎蒂著《巴西造型艺术辞典》(5卷集，巴西利亚，1973)，P·M·巴尔迪著《巴西的现代主义》(圣保罗，1978)，对了解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是很好的书，并对建筑师对新潮流的贡献也有透彻的见解；A·阿马拉尔著《1917—1930年巴西现代主义的艺术与建筑》(加拉加斯，1978)，是一本巴西一般出版物中都能看到的评论文章和原始文件的选集。最后，A·阿马拉尔著《塔尔西拉，她的作品及其时代》(3卷集，圣保罗，1975)，生动地阐述了整个时期。

647

音　乐

三本最著名的英文著作是：N·斯洛宁斯基著《拉丁美洲音乐》(纽约，1945)，作者看法偏执，但仍是一本令人感兴趣的读物；G·蔡斯著《拉丁美洲音乐指南》(纽约，1955)；和G·贝阿格著《拉丁美洲音乐概论》(新泽西，1979)，后者则是一本详尽得多的学术性著述。《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20卷集，纽约和伦敦，1980)，本书对了解拉美是不可缺少的，就其他地区而言本书也是令人钦佩的，蔡斯和他的学生对此书再一次作出了重大贡献。O·马耶尔—塞拉著《拉丁美洲的音乐与音乐家》(2卷集，墨西哥，1947)，对本时期仍有用。并见I·阿雷茨编《拉丁美洲的音乐》(墨西哥—巴黎，1977)和M·莫雷诺·弗拉希纳尔斯编《非洲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巴黎，1977)，这两本有用的书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

关于分国的，从墨西哥开始，见O·马耶尔—塞拉著《墨西哥音乐概况》(墨西哥，1941)；和研究美洲音乐的最大权威R·M·史蒂文森所著的《墨西哥音乐》(纽约，1952)。关于古巴，A·卡彭铁尔著《古巴音乐》(墨西哥，1946)仍是一本经典著作。

有用的还有著名专家J·阿德沃尔著《古巴音乐概况》(哈瓦那，1969)；和E·马丁著《古巴音乐史概况》(哈瓦那,1972)，后者是一本十分简略的概览。

关于哥伦比亚，见J·I·佩尔多莫·埃斯科瓦尔著《哥伦比亚音乐史》(波哥大，1938)，和A·帕尔多·托瓦尔著《哥伦比亚的音乐文化》(波哥大，1966)。S·克拉罗·巴尔德斯和J·乌鲁蒂亚·布隆代尔合著《智利音乐史》(圣地亚哥，1973)，是一本关于智利情况令人信服的综合性论著。V·赫苏阿拉多的《阿根廷音乐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1)，和R·阿里萨加的《阿根廷音乐百科全书》(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是两本不可缺少的著作。乌拉圭最重要的著作是S·萨尔加多著《乌拉圭音乐文化简史》(蒙得维的亚，1971)，尤其有助于了解这段时期。

关于巴西，马里奥·德·安德拉德的《试论巴西音乐》(1928)仍具有其历史性的意义,还有R·阿尔梅达的《巴西音乐史》(1942)也是反映当时情况的文献。从更加现代的观点阐述的著作有L·H·科雷亚·德·阿泽韦多著《巴西音乐的150年，1800—1950年》(里约热内卢，1956)，和M·A·马康德斯编《巴西音乐百科全书：专家学者、民间说唱和通俗乐曲》(2卷集，圣保罗，1977)，虽然作品目录方面基础薄弱些，但却是一部非常珍贵的资料。

电 影

648

最全面的综合著作是C·埃内伯勒和A·古穆西奥—德拉贡合编《拉丁美洲电影》(巴黎，1981)，还有E·B·伯恩斯著《拉丁美洲电影：影片和历史》(洛杉机，1975)，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G·S·德·乌萨韦尔著《美国影片在拉丁美洲的全盛时期》(安阿伯，1982)，阐明了电影事业开始的最初几十年中好莱坞渗透拉丁美洲市场和文化的情况。

有关墨西哥电影的研究著作面特别广泛，最杰出的是E·加西亚·列拉的不朽之作《墨西哥电影史文献》(10卷集，墨西哥，

1968—），既详细又严谨。有用的还有他的早期著作《墨西哥电影》（墨西哥，1963），以及类似的著作，J·阿亚拉著《墨西哥的电影事业》（墨西哥，1968）。比较侧重谈电影历史的著作有A·德·洛斯·雷耶斯著《1896—1900年墨西哥电影的起源》（墨西哥，1983），和《1896—1930年墨西哥电影与社会》（2卷集，第2版，墨西哥，1983），为本时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背景情况；英文版的范本，C·J·莫拉著《墨西哥电影：1896—1980年一个社会的反映》（伯克利—洛杉机，1982）也是一本侧重谈电影历史的著作。

A·古穆西奥—德拉贡最近出版了一本资料丰富的著作《玻利维亚电影史》（墨西哥，1983）；智利也出版了两本好书，即M·戈多伊·克萨达著《智利电影史》（圣地亚哥，1966），全面又详细，和C·奥萨·库的优秀著作《智利电影史》（圣地亚哥，1971）。关于阿根廷，见D·迪·努维莱著《阿根廷电影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E·多斯·桑托斯著《本国电影》（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多少有点民众主义的观点；M·博顿著《阿根廷的文学与电影》（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很适合我们的要求；和J·M·科塞洛著《内格罗·费雷拉：一部天才的电影创作》（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更多地表彰了早期制片人前辈。

关于巴西，见A·贡萨加和P·E·萨莱斯·戈麦斯著《巴西电影70年》（圣保罗，1966），G·桑托斯·佩雷拉著《巴西电影总况》（里约热内卢，1973），本书不够精练，但还没有可替代它的类似著作；R·约翰逊和R·斯塔姆合编《巴西电影》（E·不伦瑞克，1982），对研究拉美电影的所有学者是一本重要资料；和P·E·萨莱斯·戈麦斯著《温贝托·毛罗、"电影艺术"的先驱者》（圣保罗，1974），对早期最伟大的导演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的启蒙作用方面作了评价。

本段书目提要几乎专门介绍有关全大陆或分国的二次文献资料来源，而不分别介绍每个作者(著名作者也不例外)。本文不拟为重要原著版本提供索引，也不准备列举最重要的英译本。读者可查阅B·A·肖的《拉丁美洲文学作品英译本：加有注释的书目提要》（纽约，1976）。

最有用的书目提要著作有：S·M·布赖恩特著《有关拉丁美洲文学书志的精选目录》(得克萨斯，1976)，共收662条包括学者从事研究的各个方面；P·沃德编《牛津西班牙语文学手册》(牛津，1978），其范围也包括了西语美洲；W·雷拉编《从19世纪到1970年的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书目提要检索指南》（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A·弗洛雷斯编《1609—1974年有关西班牙语美洲作家的书目提要》（纽约，1975），是一本最有用的精选的实用手册；J·贝科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研究的资料来源》(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全书64页，是一本极好的简明目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总书目提要》（巴黎，1972）；和泛美联盟编《拉丁美洲文学辞典》（华盛顿，1958—），可惜其中只有玻利维亚、中美洲、智利、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这几卷。

分国书目提要：D·W·福斯特著《墨西哥文学。二次文献的书目提要》（新泽西，梅塔钦，1983），可作为基础；还有A·M·奥坎波和E·普拉多·贝拉斯克斯合编《墨西哥作家辞典》（墨西哥，1967），可用作详细的个人书目提要入门。自1979年以来“经济文化出版社”这家第一流的出版社出版了与《现代墨西哥文学评论》原版相同的复制版本，为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书目提要资料来源。

关于加勒比地区，见D·W·福斯特编《波多黎各文学。二次文献书目提要》（康涅狄格，韦斯特波特，1982），何塞·马蒂国家图书馆编《19世纪古巴诗歌书目提要》（1965），和L·

卡多索与J·平托合编《委内瑞拉文学综合辞典》(委内瑞拉，梅里达，1974)。

关于安第斯地区，见J·E·恩格尔柯克和G·E·瓦德合编《新哥伦比亚书目提要》(墨西哥，1950)；J·M·巴纳达斯和J·J·科伊合著《玻利维亚文学的表现与历史现实》)科恰班巴，1977)；F·和L·巴里加合编《厄瓜多尔文学辞典》(基多，1973)；D·W·福斯特编《秘鲁文学·二次文献书目

650 提要》(新泽西，梅塔钦，1983)；同一作者编《智利文学·工作书目提要》(波士顿,1978)是另一本不可替代的著作；和E·什穆莱维奇编《智利史辞典》(圣地亚哥，1977)。

同往常一样，有关拉普拉塔地区的资料很丰富。有J·H·贝科编《阿根廷书目提要文献：书目提要、选集、历史与综合评论》(布宜诺斯艾利斯，1959)，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而D·W·福斯特编《阿根廷文学·研究检索指南》(纽约，1983)，是这位辛勤的书志学者又一个突出贡献；还有P·奥加姆比德和R·亚尼也提供了一本很有条理的著作：《阿根廷文学辞典》(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关于乌拉圭，见W·雷拉编《乌拉圭文学书目提要文献》(蒙得维的亚，1963)；关于巴拉圭，依然是被忽视的，见R·马克斯韦尔和J·D·福特合编《巴拉圭文学书目提要试编》(马萨诸塞，剑桥，1934)。

最后，关于巴西，《巴西文学研究概况》(里约热内卢，全国书籍研究所,1963)，是一本综合性评论和书目提要；以及R·德·梅内泽斯编《巴西文学辞典》(5卷集，圣保罗，1969)，内容涉及4,000名作家，值得注意。

西班牙文与英文选集有：A·弗波雷斯编《西班牙语美洲历史和短篇小说与小说选集》(纽约，1967)，是此后的选集编者的参考基础；A·弗洛雷斯和H·M·安德森合编《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杰作》(2卷集，纽约，1974)，也许是所有选集中最有吸引力的作品；M·贝内德蒂和A·具尼特斯·罗霍合编《西班牙语美

洲叙事体文学--世纪》（哈瓦那，1976）；S·门顿编《西班牙语美洲短篇小说：评论历史选集》（2卷集，墨西哥，1964）；C·里波利和A·巴尔德斯皮诺合编《西班牙语美洲戏剧作品》评论选集（纽约，1972）；J·拉福格编《1886—1930年拉普拉塔的戏剧作品》（加拉加斯，1977）；C·里波利著《美洲的知识观：1836—1959年西班牙语美洲论文选》（纽约，1961）；戈登·布拉泽斯顿编《西班牙语美洲现代派诗集》（牛津，1968）和J·E·帕切科编《1884—1921年现代派选集》（2卷集，墨西哥，1970），两书范围不同但都是优秀之作；G·赛德编《墨西哥诗歌选集》（墨西哥，1971）；经典作品文集有A·德·玛丽亚一坎波斯合编《反映墨西哥革命的群众歌谣》（2卷集，1962）；A·卡斯特罗·莱亚尔编《墨西哥革命小说》（2集卷，墨西哥，1960）；D·奥古斯丁·德尔·萨斯编《阿根廷诗歌总选集》（巴塞罗那，1969）；G·阿拉编《1538—1968年阿根廷诗歌汇总：评论与选集》（2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0）。对外国读者最有价值的巴西文学选集无疑地是C·休利特编《巴西文学》（3卷集，华盛顿，1974），该书附有葡萄牙语原文，英语注释和极好的书目表。

651

历史与评论

杰出的拉丁美洲文学的综合评论有，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思潮》（墨西哥，1949），其内容包括巴西，并且初版是英文版（马萨诸塞，剑桥，1945），作者的论断具有持久的权威性。还有一部很有价值的书是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著《美洲文学比较历史》（4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其内容包括巴西、海地和美国。其他英文本知名的通史有J·弗朗科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概况》（剑桥，1969），和她的《自从独立以来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伦敦，1973），两本书都具有有用的摘要；D·P·加拉格尔著《西班牙语美洲

文学观点有些武断，载P·E·拉塞尔编《西班牙：西班牙研究手册》（伦敦，1976）第429—471页。除上述的以外，西班牙文版最好的综合论著还有E·安德森·因贝特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2卷集，墨西哥，1954）是一本杰出的综合和评论指南，也有英文版本；A·苏姆·费尔德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评论书目》（2卷集，墨西哥，1959）受到普遍赞扬。最后，值得指出的还有B·G·卡特著《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历史评述》（墨西哥，1970）；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由C·费尔南德斯·莫雷诺编的历史评论文集《拉丁美洲文学》（墨西哥一巴黎，1972）是一本富有想象力的集体成果。

关于小说方面，最著名的作品有L·A·桑切斯著《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发展及内容》（马德里，1953）；F·阿莱格里亚著《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史》（墨西哥，1959）；J·洛韦卢克编《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圣地亚哥，1969），后者是一本杰出的评论选集并具有深远影响；和K·施瓦茨著《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现代史》（2卷集，迈阿密，1972）。A·S·比斯卡著《本土主义小说的状况》（蒙得维的亚，1972），对本大陆的地区主义运动作了最透彻的阐述；还有T·佩雷斯编《三本典型的小说》（哈瓦那，1971），为读者提供了有关《旋涡》、《堂·塞贡多·松勃拉》和《堂娜·芭芭拉》三本小说主要的论文选和书目索引。L·

652 莱文著《西班牙语美洲短篇小说史》（墨西哥，1966），仍是本专题的一本最好著作。

关于西班牙语美洲的诗歌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少得出奇。其中最好的有S·尤尔凯维奇著《西班牙语美洲新诗歌创始人》（第2版，巴塞罗那，1984），其内容涉及本时期的后期；和G·布拉泽斯顿著《拉丁美洲诗歌》（伦敦，1975），本书以现代主义为起点。并见M·H·福斯特著《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史》（印第安纳，克利尔克里克，1981）。关于"现代主义"有大量书目提要，其中优秀的著作有M·恩里克·乌雷尼亚著《现代主义简史》（墨

西哥，1954），是一本典范；和I·A·舒尔曼著《现代主义的起源》（墨西哥，1966）。J·乔达诺著《幻想的时代》（圣地亚哥，1970），和A·拉马著《鲁文·达里奥及现代主义》（加拉加斯，1970），两书都根据当时文化背景评论达里奥的作品，是所有评论家的基础读物；还有F·佩鲁斯著《拉丁美洲的文学与社会：现代主义》（墨西哥，1976）；和N·希特里克著《现代主义的矛盾》（墨西哥，1978），后者是一本流行的读物。关于个别现代派诗人的最著名研究著作也许是I·A·舒尔曼著《何塞·马蒂作品的象征与色调》（马德里，1960）。关于西语美洲先锋派的诗歌综合性研究著作也比较少（不同于巴西的情况）。最有价值的大概是O·科利亚索斯编《拉丁美洲的先锋派》（哈瓦那，1970）；而G·德·托雷著《先锋文学史》（马德里，1965），也是一本主要的综合性读物。关于个别作家的，有A·德·温杜拉加为《比森特·维多夫罗，诗歌与散文》（马德里，1967）这本选集写的杰出的序论；和T·朗宁著《博尔赫斯的极端主义运动及其诗歌》（密歇根，莱斯普罗，1981）。

于关戏剧作品，见J·J·阿罗姆著《西班牙语美洲戏剧史》（第2版，修订版，1967），和F·道斯特著《19世纪和20世纪西班牙语美洲戏剧史》（墨西哥，1966）。最后，对前面所述各方面都有用的总背景资料，见R·G·梅亚德和P·G·厄尔合著《西班牙语美洲散文简史》（墨西哥，1962），A·萨科托编《西班牙语美洲散文索引》（纽约，1971），R·L·杰克逊著《拉丁美洲文学中的黑色形象》（阿尔伯克基，1976），和A·佩斯卡特略编《拉丁美洲的妇女与男人》（匹兹堡，1973），其内容包括西班牙语美洲和巴西的小说。

各国文学

关于墨西哥，评论19世纪小说的权威性著作有J·L·马丁内斯著《民族的表现：19世纪的墨西哥文学》（墨西哥，1955）。

同上作者著《寻求表现的墨西哥》载《墨西哥通史》第3卷（墨西哥学院，1976）第283—337）页，是极有价值的，由C·蒙西瓦伊斯著《略论20世纪墨西哥文化》是前者的续篇，载同上书，第4卷，第303—476页，也是一篇卓越的综合论文。并见J·布拉什伍德著《在小说中的墨西哥》（奥斯汀，1966）；和A·M·奥坎波编《当代墨西哥小说评论》（墨西哥，1981），是对20世纪作品的有见识的评论著作选。评论墨西哥革命小说的最佳作品有A·德索著《墨西哥革命小说》（墨西哥，1972），马克思主义观点，但却是无比的经典之作；J·拉瑟福德著《革命时期的墨西哥社会：文学探索》（伦敦，1971）；和R·罗德里格·科罗内尔编《墨西哥革命小说评论汇编》（哈瓦那，1975），后者是一本突出的评论文集，汇编了有关这一重大文学现象的主要评论文章。

关于加勒比地区，见M·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著《多米尼加文学史概况》（圣多明各，1966）；D·萨默著《一个主人代替了另一个主人：多米尼加小说中民众主义的家长式夸夸其谈》（圣多明各，1983），本书犀利的争取妇女平等的观点可能是整个拉丁美洲小说中比较普遍的反映；关于波多黎各，J·L·冈萨雷斯著《波多黎各的文学与社会》（墨西哥，1976）。关于古巴，见J·A·波图翁多著《古巴文学史概要》（哈瓦那，1960），作者是1959年以来古巴文坛最有影响的评论家，和R·拉索著《古巴文学史》（墨西哥，1974）。令人奇怪的是，以革命观点改写古巴文学史的工作仍未进行，至今还没有这一领域观点明确的新著作。关于中美洲，唯一的一本最重要的评论著作是R·L·阿塞韦多著《中美洲小说》（波多黎各，里奥彼德拉斯，1982），文风严谨内容全面。

关于委内瑞拉，见M·皮康·萨拉斯著《委内瑞拉文学的状况与发展》（加拉加斯，1940），和J·利斯卡诺著《当代委内瑞拉文学概论》（加拉加斯，1972）；关于哥伦比亚，见A·戈麦斯·雷斯特雷波著《哥伦比亚文学史》（波哥大，1956）；和D

·麦格雷迪著《1844—1959年哥伦比亚小说史》(波哥大,1962)。

关于厄瓜多尔,见I·J·巴雷拉著《厄瓜多尔文学史》(基多,1960);R·德斯卡尔西著《厄瓜多尔戏剧评论史》(基多,1968);和A·罗哈斯著《厄瓜多尔小说》(墨西哥,1948)。关于玻利维亚,见F·迪亚斯·德·梅迪纳著《玻利维亚文学史》(马德里,1959),和E·菲诺特著《玻利维亚文学史》(拉巴斯,1964)。

玻利维亚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首先归功于1952年革命,归功于对民族文化的一致看法;而在秘鲁,也许是在全拉美的最激烈和严酷的文化论战战场,论战不断,特别是关于土著主义的辩论仍在继续。最好的综合研究论著有L·A·桑切斯著《秘鲁文学概论》(利马,1972),和《秘鲁的文学:秘鲁文化史的进程》(5卷集,利马,1966)。但是,关于土著主义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这场辩论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马里亚特吉、巴尔卡塞尔等人,而到70年代和80年代再度达到高潮。见X·阿夫里尔等著《马里亚特吉与文学》(利马,1980);L·E·托尔德著《1848—1948年秘鲁散文作家索引》(利马,1978);近几年两本突出的著作是A·科尔内霍·波拉尔著《秘鲁的文学与社会:土著主义小说》(利马,1980),和胡利奥·罗德里格斯—路易斯著《土著主义的诠释与实践:克洛林达·马托和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的土著主义小说》(墨西哥,1980)。 654

智利是拉美一些最伟大的诗人诞生之地,该国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把注意力放在全大陆而不仅限于智利;见R·席尔瓦·卡斯特罗著《智利文学概况》(圣地亚哥,1961);A·托雷斯·里奥塞科著《智利文学简史》(墨西哥,1956);F·阿莱格里亚著《20世纪智利的文学》(圣地亚哥,第2版,1967);和J·普罗米斯著《1842—1975年智利文学的文献与档案资料》(圣地亚哥,1977)。

关于阿根廷文学整个时期的评论著作十分丰富,但就综合性

评论著作而言，有关19世纪的评论多于有关20世纪的评论，后一时期由于政见分歧和个人至上主义而受到影响，其结果导致了源源不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总的说来内容空洞华而不实。在本时期突出的历史著作有R·罗哈斯著《阿根廷文学史：关于拉普拉塔文化发展的哲学论文》(9卷集，布宜诺斯艾利斯，1957)，是本大陆的经典著作。其他重要的综合性论著有A·云克的《阿根廷的社会文学：从民族解放到现在的文学运动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1）；J·C·吉亚诺著《阿根廷文学的持久性》（布宜诺斯艾利斯，1953)；E·卡里利亚著《1800—1950年的阿根廷文学：总况简介》（图库曼，1954)；G·阿拉著《阿根廷与民族文学》（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A·普列托著《阿根廷自传体文学》（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和N·希特里克著《物种之火》（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巩固时期，特别是1880年这一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再次受到重视。见A·拉马著《拉普拉塔的高乔政治文学》（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论述了整个19世纪高乔诗歌与政治的关系；E·菲什伯恩著《1845—1892年的阿根廷小说中对19世纪移民描述》（柏林，1981），举例阐释了小说作者的思想；L·鲁西切著《19世纪80年代阿根廷小说中的意大利移民》（马德里，1974）；和D·比尼亚斯撰写的几本持民众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著述，结构有些松散但仍是无可替代的作品：《阿根廷文学与政治现实：从萨米恩托到科塔萨尔》（布宜诺斯艾利斯，1971）、《寡头统治的极盛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土著居民、军队与边界》（墨西哥，1982）和《奇形怪状的人物、移民与失败》（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后者以移民作家A·迪塞波罗的著作为其出发点。类似的作品有A·R·科塔萨尔编《阿根廷文学中的印第安人与高乔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956)，A·普列托著《文学与不发达》（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和J·埃尔南德斯·阿雷吉著《帝国主义与文化》（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关于本时期的后期，见M·

655

斯克里马格利奥著《1920—1930年先锋派中的阿根廷文学》（罗萨里奥，1974）

关于乌拉圭，就其国家大小和人口数量而言，文学作品十分丰富，见Z·苏姆·费尔德著《乌拉圭知识的发展进程》(3卷集，1941；第3版修订本，蒙得维的亚，1969）；S·博略著《1807—1965年乌拉圭的文学》（2卷集，蒙得维的亚，1965）；J·E·恩格尔柯克和M·E·拉莫斯合著《乌拉圭的小说：书目评论研究》（伯克利，1967）；和W·雷拉著《1808—1968年乌拉圭戏剧史》（蒙得维的亚，1969）；关于巴拉圭，情况恰恰相反，见H·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著《巴拉圭的文学》（布宜诺斯艾利斯，1969）；J·普拉著《巴拉圭文化史札记》（亚松森，1967），同上作者著《巴拉圭的戏剧作品》（亚松森，1967）。

关于巴西，A·科蒂尼奥著《巴西文学概论》（里约热内卢，1955；英译本，纽约，1969）是本突出的综合性概论，本书以最大的综合能力把巴西的文学作品放在国际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并以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为结束。最值得一读的英文著作有E·维里西莫的特具风格的著述《巴西文学提要》(纽约，1945），是本迎合英语读者口味的作品；和S·帕特南热情而修养有素的著述《奇异的旅行：四个世纪巴西作品综合评述》(纽约，1948），本书受到赞扬是当之无愧的。其他基本综合著述还有A·坎迪多著《轻便旅》（圣保罗，1945），《1750—1880年巴西文学结构》（2卷集，圣保罗，1959），和《巴西文学现状》(圣保罗，1964)；N·维尔内克·索德雷著《巴西文学史：其经济基础》（里约热内卢，1940；修订版，圣保罗，1982），和A·博西著《巴西文学简史》（圣保罗，1972）。关于本时期初期，见J·C·德·安德拉德—穆里西著《巴西象征主义运动全貌》（2卷集，巴西利亚，1973）；关于整个时期有，A·L·马查多·内托著《文学中的共和国社会结构》（圣保罗，1973），是符合我们目的的珍贵背景资料；关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时期，见A·博西著《前 656

现代主义》（第3版，里约热内卢，1969）。

巴西现代主义日益引起评论者的重视，重视的程度远远超过对西语美洲现代主义的重视。见W·马丁斯著《现代主义》（第3版，里约热内卢，1969）；R·博普著《1922—1928年现代主义运动》（里约热内卢，1966），作者是这一运动当时的参加者之一；G·门东萨·特莱斯著《欧洲的先锋派与巴西的现代主义》（彼得罗波利斯，1972）；L·伊沃著《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热》（里约热内卢，1974）；F·特谢拉·德·萨莱斯著《现代主义概况》（里约热内卢，1974）；和S·卡斯特罗著《巴西现代主义理论与政治》（彼得罗波利斯，1979）。M·R·巴蒂斯塔、T·P·A·洛佩斯和Y·S·德·利马合著《巴西：1917—1929年，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时期。文献》（圣保罗，1972），本书作为原始资料的来源是非常宝贵的。过去重要的评论刊物如《同类相食者评论》（圣保罗，1976，重印）和《号角》（圣保罗，1974，重印），都已翻印出版以作为评论巴西的参考，正如近年来重印《博学者》和《当代》作为评论西语美洲的参考一样。

最后，关于本时期的最末期，见A·菲略著《30年代的巴西小说》（里约热内卢，1969）。

12. 1830—1930年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会

1830—1930年这一时期关于拉丁美洲教会的历史编纂工作的范围和质量参差不齐，不能与拉美历史其他领域规范的历史著作相比。拉丁美洲教会历史委员会（CEHILA）的任务之一是改善其地位及其工作成果，这一任务将在总编辑恩里克·D·杜塞尔指导下完成，该委员会编的多卷本《拉丁美洲教会通史》（以下简称：HGIAL）将陆续出版，个别卷册已开始问世。该委员会已经出版一份有用的关于教会史的史料来源和编辑方法的总纲：《为了编纂一部拉丁美洲教会史。拉丁美洲教会历史委员会的拉

美各国同仁在基多的首次会商（1973）》（巴塞罗那，1975），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本书目的缺乏。

拉美教会通史数量很少。恩里克·D·杜塞尔著《拉丁美洲教会史·殖民地时期与解放（1492—1973）》（第3版，巴塞罗那，1974）为这一主题提供了一个轮廓；汉斯—于尔根·普里恩著《拉丁美洲教会史》（格丁根，1978）也是本历史梗概。关于现代时期的综合性论著见弗朗索瓦·舍瓦利耶著《从独立到当今一代的拉丁美洲》（巴黎，1977）第415—453页。 657

各国有各自的教会史，它们往往有传统的特点但作为情报资料也是无可替代的。以下是一些精选的书目。卡耶塔诺·布鲁诺著《阿根廷教会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66—71）第7卷从1800年开始写起；胡安·卡洛斯·苏雷蒂著《阿根廷教会史》（布宜诺斯艾利斯，1945）；耶稣会会士吉列尔莫·富尔隆著《1860—1930年之间阿根廷的天主教》，载全国历史学会编《1862—1930年阿根廷现代史》第2卷，第1部分（布宜诺斯艾利斯，1964）第251—292页。若昂·法瓜德斯·豪克等著《巴西教会史》（HGIAL，Ⅱ—2，彼得罗波利斯，1980）；塔莱斯·德·阿泽韦多著《巴西的天主教教义》（里约热内卢，1955）；若昂·阿尔弗雷多·德·索萨·蒙特内格罗著《巴西天主教的发展》（彼得罗波利斯，1972）。费利佩·洛佩斯·梅嫩德斯著《玻利维亚教会史概要》（拉巴斯，1965）。鲁文·巴尔加斯·乌加特著《秘鲁教会史》（5卷集，布尔戈斯，1962）写到1900年为止。鲁道夫·拉普·德·罗斯著《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HGIAL，Ⅶ，萨拉曼卡，1981）；玛丽·沃特斯著《1810—1930年委内瑞拉教会史》（查珀尔希尔，1933）。里卡多·布兰科·塞古拉著《哥斯达黎加教会史》（圣何塞，1967）；耶稣会会士何塞·古铁雷斯·卡西利亚斯著《墨西哥教会史》（墨西哥，1974）。有大量的现代教会的社会学研究论著，其中只有少数是有关历史方面的。例如见，亨利·A·兰兹伯格尔编《拉丁美洲的教会与社会变革》（圣母大学，1970），

和托马斯·C·布吕诺著《巴西教会·宗教政策》(奥斯汀，1982)。

关于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教会状况可通过各种专题研究著作进行了解。关于教会的经济方面，见A·鲍尔著《教会在西班牙语美洲经济中的地位：18世纪和19世纪的赋税与储备》载HAHR 63/4 (1983) 第707—733页。R·F·施瓦勒著《1800—1850年西班牙语美洲的天主教继承权》，载TA 24/3 (1968) 第207—271页，提供了关于天主教情况的资料；关于秘鲁教士方面的有安东尼内·蒂贝萨尔著《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对独立时期秘鲁教会的看法》，载TA 26/2 (1970) 第349—375页。关于墨西哥的天主教制度，见费尔南多·佩雷斯·梅内尔著《主教与墨西哥的独立(1810—1936)》(墨西哥，1977)。迈克尔·P·科斯特洛埃对墨西哥政教冲突的两个不同的根源阐述，见他所著《墨西哥教会的财产。1800—1856年墨西哥大主教辖区内"活动基金管辖范围"的研究》(剑桥，1967)，和《独立时期的墨西哥教会与政府：对1821—1857年圣职推荐权辩论的研究》(伦敦，1978)。

658

有关教士和俗人以及他们的组织，几乎没有专著。教士的思想和活动各个方面研究可见以下著述：C·J·贝尔尼著《1869—1970年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的拉丁美洲主教》，载TA 25/1 (1968) 第265—280页；约瑟普·巴纳达斯著《马丁·卡斯特罗：玻利维亚战斗的教士》，载《玻利维亚纪念贡纳尔·门多萨研究论文集》(拉巴斯，1978) 第169—220页；耶稣会会士何塞·古铁雷斯·卡西利亚斯著《19世纪时期墨西哥的耶稣会》(墨西哥，1972)；弗雷德里克·B·派克著《真正和所谓的异教：1830—1875年秘鲁保守派—自由派斗争的一个方面》，载HAHR 47/1(第50—74页)；和同一作者著《19世纪西班牙语美洲天主教会的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的西班牙根源》，载TA 29(1972) 第1—16页。并见T·G·鲍威尔著《墨西哥中部的教士与农民：在"改革"时期的社会冲突》；载HAHR 57/2 (1977) 第296—313页。

关于宗教思想和惯例的书目也很稀少，但现有的著作还是优

秀的。如耶稣会会士杰弗里·L·克莱伯著《1824—1976年秘鲁宗教与革命》（圣母大学，1977），分析保守教会的旧框框并说明了人民宗教信仰的任务。耶稣会会士鲁道夫·卡德纳尔著《萨尔瓦多教会的权力》（圣萨尔瓦多，1980），叙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教区的生活、宗教团体和教务巡视以及教会改革等方面。路易斯·冈萨雷斯著《不稳定的人民·圣何塞·德·格拉西亚简史》（墨西哥，1968），是一本典范的村社史，并对墨西哥19世纪末天主教的复兴和基督派叛乱有透彻的见地。有两篇从巴西教会全局分析救世主运动的论著：拉尔夫·德利亚·卡瓦著《巴西救世主运动与国家体制：对卡努杜斯和若阿塞罗的重新评价》，载HAHR 48/3（1968）第402－420页；和同一作者著《若阿塞罗出现的奇迹》（纽约，1970）。关于巴西人民的宗教之其他方面，见爱德华多·霍尔内特著《北部的真宗教与假宗教》（萨尔瓦多，1973），和罗杰·巴斯蒂德著《巴西的非洲宗教：走向文明相互渗透的社会学》（巴尔的摩，1978）。

有关现代传教工作方面的论著比殖民地时期更少；维克托·丹尼尔·博尼拉著《上帝的仆人还是人们的主人？亚马孙地区卡普秦修会的情况》（伦敦，1972），主要是论战性的著述。有关新教的现有书目提要，如罗伯特·伦纳德·麦金太尔著《半个世纪的景象：巴西长老制的50年（1859—1910）》（库埃纳瓦卡，1969）；埃米利奥·威廉斯著《新信仰的信徒。巴西和智利的文化变革与新教的兴起》（纳什维尔，1967）；和阿诺尔多·坎克利尼著《豪尔赫·A·温布莱。巴塔尼亚的医生与传教士》（布宜诺斯艾利斯，1980）。关于实证主义，见本卷书目评论第10节。M·安西利亚·奥尼尔著《特里斯唐·德·阿太德与巴西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华盛顿，1939），是一本阐述天主教反对实证主义的著作。

关于教会和政府的问题有广泛的研究，这也许是由于其工作与教会专业人员没有瓜葛的历史学者们对两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感

659

兴趣的缘故。规范的综合著述是J·劳埃德·米查姆著《拉丁美洲的教会与政府。政教关系史》（查珀尔希尔，1934，修订版，1966）；关于地区方面，见弗雷德里克·B·派克著《自1840年以来秘鲁和智利的教会与政府：对比研究》，载《美国历史评论》73/1（1967）第30—50页；和罗伯特·J·诺尔顿著《19世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没收教会财产的比较》，载TA 25，1（1968）第387—401页。研究阿根廷1870—1930年这一时期情况，可见约翰·J·肯尼迪著《阿根廷的天主教、民族主义与民主》（圣母大学、1958），和内斯特·托马斯·奥扎著《19世纪80年代这一代天主教徒和自由派》（布宜诺斯艾利斯，1975）后者谈到19世纪80年代的天主教的后卫行动。有关巴西的政教关系的论著集中于帝国的后几十年，以下几本是比较令人普遍感兴趣的：米洛·佩雷拉著《巴西的政教冲突》（累西腓，1970）；布拉济尔·热森著《巴西的三权至上主义》（巴西利亚，1978）；和塔莱斯·德·阿泽韦多著《政教之间的紧张与危机：巴伊亚在宗教和圣职推荐权方面取得的胜利》（圣保罗，1978）。关于巴西1872—1875年的“宗教问题”及共后果，见玛丽·克雷森蒂亚·桑顿修女著《1872—1875年巴西的教会与共济会制度：王权至上论研究》（华盛顿，1948）；罗克·斯潘塞·M·德·巴罗斯著《宗教问题》，载《巴西文化通史》第6卷（圣保罗，1971）第317—365页；戴维·格罗斯·维埃拉著《巴西的基督教、共济会与宗教问题》（巴西利亚，1980）；乔治·C·A·伯雷尔著《教会与巴西君主制的崩溃》，载HAHR 48/3（1968）第380—401页。进一步了解关于巴西帝国时期教会方面的综合情况，可见乔治·C·A·伯雷尔著《1840—1889年佩德罗二世统治时期的教会》，载亨利·H·基思和S·F·爱德华兹合编《巴西社会的冲突与继续》（南卡罗来纳，哥伦比亚，1969）第113—140页。关于教会改革，见奥斯卡·菲格雷多·卢斯托扎著《巴西帝国的教会改革》（圣保罗，1977）；
660 和伊尔玛·玛丽亚·雷吉娜·多·桑托·罗萨里奥著《红衣主教

莱梅（1882—1942）》（里约热内卢，1962），后者对政教分离后的一位伟大教士作了具有文献根据的研究。关于智利，布赖恩·H·史密斯著《智利的教会与政治：向现代天主教教义挑战》（普林斯顿，1982），是一本政治学著作并很好地分析了1925年宪法中所体现的政教关系。关于厄瓜多尔的研究可见理查德·帕蒂著《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及其时代的厄瓜多尔》(基多，1941），和J·I·拉雷亚著《厄瓜多尔的教会与政府》（塞维利亚，1954）。教会与政府是哥伦比亚历史的主题之一：例如，见费尔南·E·冈萨雷斯·G著《政党与教会的权力》(波哥大，1977)；海伦·德尔帕尔著《红对蓝：1863—1899年哥伦比亚政治中的自由党》（亚拉巴马，1981）；简·迈耶·洛伊著《哥伦比亚联邦时期的初等教育：1870年的学校改革》，载HAHR 51/2（1971）第275—294页。关于危地马拉反教权自由派考迪略，见乌维尔特·J·米列尔著《胡斯托·鲁菲诺·巴里奥斯时期的宗教与政府》（危地马拉，1976)。对墨西哥19世纪政教冲突的详细研究有：简·巴赞特著《墨西哥教会财产的转让：1856—1875年自由派革命的社会与经济方面》（剑桥，1971）；罗伯特·J·诺尔顿著《1856—1910年的教会财产与墨西哥改革》（伊利诺伊，迪卡尔布，1976）；卡尔·M·施米特著《1876—1911年迪亚斯在全国与地方各级的妥协政策》，载HAHR 40/4（1960）第513—532页；在迪亚斯以后这一问题变成了教会与墨西哥革命之间的问题。

天主教社会改良主义在墨西哥是一个最好的范例；无论如何这是具有最充分的文献根据的实例。豪尔赫·阿达梅·戈达尔德著《1867—1914年墨西哥天主教徒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墨西哥，1981）阐述和解释了天主教思想。罗伯特·E·夸克著《1900—1929年墨西哥革命与天主教》（布卢明顿，1973）和戴维·C·贝利著《基督吾王万岁！基督派暴乱与墨西哥的政教冲突》（奥斯汀，1974），本书除了主题以外还注意到天主教社会运动。同类

的还有琼·A·梅耶尔著《基督教》(3卷集,墨西哥,1973—74),是一部材料丰富、详尽的研究著作,有英文节译本:《基督派暴乱:处于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墨西哥人民》(剑桥,1976)。J·塔克著《高原上的圣战:墨西哥基督派暴乱的地区分析》(图森,1982)是一本更具有地方性的研究著作。詹姆斯·W·威尔基和埃德娜·蒙松·德·威尔基合著《20世纪的墨西哥:口碑史》(墨西哥,1969),其中(第411—490页)包括了对老资格的天主教改良派米格尔·帕洛马尔—比斯卡拉的访问记。

索　引

（以下页码均为原书页码，见本书各边码）